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94)

統合與分化： 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 1921-1949

陳耀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4）

**統合與分化：
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
1921-1949**

陳 耀 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自序

臺灣的中共黨史研究，將來應該往何處去呢？

有同學問我，在臺灣研究中共黨史，沒有材料，怎麼辦？很慚愧，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也只能支吾其詞，搪塞敷衍。雖然我知道即使在臺灣，還是有些人有辦法拿到一些不易見的材料，可是我沒有這樣的能耐。只是可憐那位同學問錯了對象，但願我的無知別再要絆倒了這些年輕朋友。

我是在十年前開始著手這本論文的研究。爲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作我的博士論文呢？原來最初也是出於材料的考量。某次，我在圖書館裡無意間發現整套的《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非常興奮，因爲河北黨的歷史直迄當時，仍是中共黨史研究中尚待開發的一塊神秘的處女地。翻開文件一看，其中所描繪的黨內糾紛、背叛，還有許多引人遐想的化名或術語，也立即吸引了我，讓我當下就決定以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作爲我的博士論文題目。

接下來的兩、三年，我完全地投入到此研究當中，跑遍各大圖書館翻閱已出版之相關材料與著作，也曾赴臺灣的法務部調查局與河北省檔案館等機構，蒐集檔案史料。看似萬事俱備，但寫作的過程卻極不順利，爲什麼呢？捫心自問，原來我從來都沒有很好地仔細想過自己的問題意識是什麼。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蒐集與閱讀材料，卻花了兩倍的五、六年的光陰，才想清楚本文的問題意識。每當回想起此一經歷，我總會聯想到耶穌的那一席話：「你爲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路 10:41-42）也願以此話與諸位研究同

好互相勉勵。

在今天資訊爆炸的年代，也許我們更應該擔心的不是資料的不足，而是你有沒有能力去吸收那數量日益膨脹的史料。我曾經去過大陸某一省的檔案館看檔案。因為我是臺灣來的學者，看的檔案既有限制，還只能用筆抄。抄了兩個星期，我好不容易抄滿了整本筆記本。正沾沾自喜之際，突然進來了一位本地的研究生，他毫無阻礙地就調出大批檔案，然後拿出他的數位相機，一張張地拍了起來。不過一、兩個小時的光陰，他拍走的數量恐怕是我這兩個星期所抄檔案的數倍，真是羨煞人了！但是我那時突然想起過去一位研究所的老師在上課時曾對我說過，中共黨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深入大量的材料之後，還能夠安然無恙地走出來，不被材料牽著鼻子走。他說，這樣的人不多，在臺灣恐怕也只有一位。回想至此，看著那位研究生，雖然心中還是羨慕，但也充滿感恩。因為我不是我研究所老師口中的那位高人，如果要我處理數量如此龐大的史料，恐怕我只會淹沒其中，無法自拔而已。我也期許自己與所有的歷史研究者總能夠竭盡所能地去蒐集所需用的材料，但是我現在總會牢記在心：「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出 16:18）原來你所需要的量，上帝早就給你預備好了。

所以，很多時候，不足反而是來自上帝最美好的祝福。我曾聽過某位學者在他的課堂上說，他的書所引用的材料遠遠不如大陸學者，但今天大陸坊間還是流傳著他的著作。我想，這位學者所以令人推崇，首先就應歸功於他敢於面對與承認自己的不足吧！正所謂「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加 6:3）。今天臺灣的中共黨史研究資源雖然不多，但是如果我們在如此有限的資源上也能夠做出一定的成果，就像耶穌所說的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太 25: 21），

那你才有可能被託付更大更多的事。

講了這麼多，我還是沒能回答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即臺灣的中共黨史研究將來應該往何處去？我想這個問題就交給上帝來回答吧。蓋明日之事是由上帝所掌管，我們切不要誇口明日「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雅 4:15），只有聽憑主的吩咐。即使如此，我在周遭近史所同仁與學術界朋友的身上，還是看到未來臺灣中共黨史與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希望。因為，他們總是能夠去發覺並致力於解決自己的問題，也能夠看到彼此間的不同，並嘗試去溝通對話。而且還有人不斷地為這個所，以及這塊土地禱告。整個近史所與所有同仁，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林前 12:12），「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 12:26）。這是一個充滿恩典的場域，願上帝賜福近史所與所有同仁，直到永永遠遠。

我現在要把我的著作呈現在眾人面前。這本書當中還有許多謬誤之處，有的是我未曾察覺者，更多的則是我已經發現，卻因為自身的愚拙與軟弱，而無力予以改正者。我但願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愚拙與軟弱，好叫看到的人得益處，並得以看見上帝在你我身上的作為。蓋「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 127:1）。惟願所有的榮耀全都歸與我主。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

阿們。

陳耀煌

2012年6月9日

目 錄

| | |
|--|------------|
| 自 序 | iii |
| 緒 論 | 1 |
| 第一章 李大釗領導時期的河北革命，1921-1927 | 25 |
| 第一節 中共河北黨的創建 | 27 |
| 第二節 建黨初期北方地區的工人運動 | 48 |
| 第三節 北方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 | 55 |
| 第四節 農村小學教師與北方農民運動 | 70 |
| 小 結 | 79 |
| 第二章 順直省委領導時期的河北革命，1927-1930 | 81 |
| 第一節 中共順直省委事件 | 83 |
| 第二節 六大路線與河北革命 | 107 |
| 第三節 立三路線與河北革命 | 127 |
| 小 結 | 149 |
| 第三章 一九三〇年代前期河北省的共產革命運動， 1930-1934 | 151 |
| 第一節 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 | 154 |
| 第二節 北方蘇維埃運動的理論及其實際 | 169 |
| 第三節 西瓜與紅蘿蔔——北方軍事運動的兩條路線 | 198 |
| 小 結 | 225 |

| | |
|--|-----|
| 第四章 抗戰前冀南地區的鹽民抗爭，1931–1937 | 229 |
| 第一節 官鹽與私鹽 | 232 |
| 第二節 「鹽巡」的性質 | 248 |
| 第三節 共產革命與鹽民抗爭 | 257 |
| 第四節 國家與鹼地改良 | 274 |
| 小 結 | 284 |
| 第五章 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發展與挫敗， 1933–1942 | 287 |
| 第一節 抗戰前夕冀東地區的共產革命 | 290 |
| 第二節 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與崩潰 | 303 |
| 第三節 統一戰線與群眾動員 | 330 |
| 小 結 | 362 |
| 第六章 從減租減息到土地改革，1943–1949 | 367 |
| 第一節 減租減息是爲了什麼？ | 370 |
| 第二節 抗戰後期冀熱察邊區的發展 | 383 |
| 第三節 國共內戰與土改運動 | 408 |
| 小 結 | 448 |
| 結 論 | 453 |
| 徵引書目 | 469 |
| 人名索引 | 497 |

圖表目錄

| | |
|---------------------------------------|-----|
| 一九三〇年代前期的河北省全圖 | 12 |
| 表 1-1 早期北京黨之成員 | 30 |
| 表 1-2 天津青年團國民俱樂部成員組成表 | 33 |
| 表 1-3 1922 年保定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名單 | 71 |
| 圖 1-1 大名七師學生籍貫與就業統計圖 (1923-1934) | 73 |
| 表 2-1 順直省委事件年表 | 98 |
| 表 3-1 1932 年中共中央公告開除的河北黨「叛徒」 | 167 |
| 圖 3-1 1932 年磁縣游擊運動佈置圖 | 183 |
| 圖 3-2 冀中地區圖 | 185 |
| 圖 3-3 張家口地區圖 | 215 |
| 圖 4-1 冀南地區圖 | 231 |
| 表 4-1 河北省土鹽產地及其數量分佈表 | 238 |
| 表 4-2 全國及長蘆鹽區產、放鹽量及稅收、稅率表 (1929-1937) | 243 |
| 表 4-3 長蘆鹽稅徵解表 (1930-1932) | 245 |
| 表 4-4 1934 年全國鹽區放鹽與稅收數比較表 | 246 |
| 表 4-5 1934 年北方各鹽區土鹽產量及官鹽稅收損失表 | 252 |
| 表 4-6 1935、1936 年長蘆官鹽暢銷、滯銷數比較表 | 282 |
| 表 4-7 大名區技術分處 1936、1937 年工作比較表 | 283 |

| | | |
|-------|--|-----|
| 圖 5-1 | 冀東地區圖 | 291 |
| 圖 5-2 | 抗戰初期北方局與河北黨的黨務系統 | 307 |
| 表 5-1 | 晉察冀邊區冀東辦事處所轄各縣區劃表（1940 年） | 338 |
| 表 5-2 | 十三級合理負擔 | 349 |
| 圖 6-1 | 抗戰時期中共晉察冀邊區圖 | 371 |
| 圖 6-2 | 1943 年冀熱邊支部委員成份調查 | 391 |
| 表 6-1 | 1943 年 9 月迄 1944 年底晉察冀第十三軍分區編制 | 403 |
| 表 6-2 | 國共內戰時期冀察熱遼邊區黨組織系統圖 | 412 |
| 表 6-3 | 1946 年下半年冀東地區國軍占領勢力變化 | 429 |
| 表 6-4 | 冀東西部地區國軍、偽軍與地方伙會勢力之變遷 （1946 年 12 月與 1947 年 2 月） | 430 |

緒論

一、研究動機

如何根據中國人自身的經驗，而不是西方人的偏見去重建中國歷史，一直是許多中國研究者的關懷。一些學者想方設法置身於中國的情境，試圖從中去探尋及突顯某種內發的，或來自民間社會的歷史動力，並因此有意無意地忽視、貶低，乃至於醜化外來的，以及國家與政治的影響。這種傾向在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以及政治史的研究中是如此，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史的研究中亦是如此。

首先，以近代以來華北農村地區的發展為例說明，一些學者企圖證明某種類似 Paul A. Cohen 所謂從十八世紀或更早時期發展起來的中國歷史之「內在結構和趨勢」。¹ 他們指出，華北地區的農民早在西方勢力來到之前，已藉由地方政治、市場、文化等網絡，以及親友、同鄉、同儕、師生等各式各樣的特殊關係，結成了大小範圍不一、並具有超階級色彩的地方社群（community）。如 Prasenjit Duara 所謂由華北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式規範構成的「權力文化網絡」，² 以及如 Ralph A. Thaxton 所探討的被冀南地區農

1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61–162, 172.

2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16.

民視為維持生計之主要手段的私鹽產銷網絡與鹽民社群等，³ 皆是其例。此一地方社群與網絡的結成，及其內部人事物的活動和變遷，無不反映了該特定地域內長時期與內在的歷史演變趨勢。所以說是「內在的」，並不是完全否認外來力量的作用，正如 Kenneth Pomeranz 在其關於「黃運區」（黃河及大運河交匯之周圍地區）社經變遷的研究中所指出者，外來力量影響的程度，主要取決於地域性政治與社經結構的差異。⁴

然而，很不幸的，此一既存於華北地區的內在結構和趨勢，與華南地區相較下，本身既是較脆弱的，而且在近代以來，逐漸崩潰。一種普遍的看法是，由於華北地區社會內部的凝聚力量（如宗族勢力）不如華南地區強大，故國家對地方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往往較為突顯。⁵ 再就經濟層面而言，儘管當代學術界就近代中國農村經濟究竟是朝好的或壞的方向發展，仍爭論不休，但更多的學者則接受了黃宗智的看法（儘管論證的方式不盡相同），認為華北地區的農村經濟是處於長期停滯或每況愈下的趨勢——一個自西方入侵以前即已開始的趨勢。此一趨勢，主要反映在人口的持續增加、耕地不足、非農業經濟出路的限制等方面，最後就促成了農業經濟上邊際報酬遞減的「農業內卷化」現象。⁶ 至於馬克斯主義或中共官方所宣稱的階級矛盾，

3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4 Kenneth 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8–10, 14.

5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342–343.

6 Philip C.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即使存在，也不能說是近代中國，尤其是華北農村的主要矛盾，更不是農民苦難的主要來源。⁷

近代以來，在西方勢力影響下，清朝與民國政府當局所推動的某些由上而下之現代化國家建設計畫，使得此一每況愈下的趨勢愈益惡化。許多事實似乎證明，此種藉由國家力量所推動的由上而下之變革常常不切實際，是災難的開端。這些變革計畫，或者如 Kenneth Pomeranz 所言，由於政府當局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沿海等城市地區的發展，忽略並放棄了對如黃運區般邊陲地區所負有的傳統義務（如水利），以至這些地區發生了嚴重的生態危機，並陷於更加貧困落後的狀態；⁸ 又如 Prasenjit Duara 所謂，由於清末民初中國政府當局（特別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所推動的國家現代化建設，以及由此而來之國家政權的深入和捐稅的增加，既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還破壞了華北農村的既存社會結構，致使農民暴露在土豪、惡霸等營利型經紀的剝削下，而國家亦未因此加深其控制，反而與社會更加隔離，此即所謂的「國家內卷化」（state involution）；⁹ Ralph A. Thaxton 甚至更進一步斷言，由蔣介石所掌控的南京政府當局，在世界經濟資本主義體系等外在因素的推動下，採取了一連串國家現代化的建設，試圖將其國家機械深入到地方，並自 1931 年穩固地掌控了長蘆鹽務的管理權後，藉由稅警等武裝力量，直接對既存私鹽市場網絡和當地農民生計造成嚴重威脅，由此即爆發了國家與農民間長時期的持續對抗。¹⁰

7 Philip C. C.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 17, No. 3 (Jul., 1991), pp. 324–326.

8 Kenneth 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pp. 15–16.

9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 250–251.

10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p. 43–81.

由於華北農村地區的主要矛盾並不是階級矛盾，而是國家與社會、外來入侵者與在地群眾，以及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間的矛盾，所以，許多學者就斷言，共產革命所以會在華北地區贏得群眾支持，與其歸因於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或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列寧主義式黨國組織，毋寧說是由於中共在不斷的試錯過程中，逐漸地拋棄外來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乃至於黨的組織，將自身融入於民間社會當中，藉此使革命的政策更適合於各地的實際情形。可以說，中國共產革命是一場因地制宜的「地方革命」！¹¹

那麼，此一地方化革命實際的展開歷程又是如何呢？一般認為，中國共產黨最初是由一群曾受過五四運動的歷練並試圖斷絕與中國傳統之關係的知識份子所組成，他們在外來的馬克思主義與來自莫斯科的指示之啓發與影響下，以城市爲主要的活動據點，試圖藉由產業工人運動來拯救中國。然而，如此不切實際的城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史達林的指示，似乎從一開始就宣判了它自身的死刑。1927年蔣介石在城市發動一連串血腥的清黨運動後，共產黨在城市的基礎遭到嚴重打擊，許多黨員因此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城市轉移至農村地區。儘管如此，繼任的中共中央領導瞿秋白、李立三與王明等人並未從此一歷史中獲得教訓，仍舊持續忠誠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推動不切實際的左傾路線，致使抗戰前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發展遭受極大的災難。直迄1935年前後，被認為更能代表中國主體性與符合實際的毛澤東逐漸掌握中央領導大權後，此一災難的階段才告一段落，而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也從此步上勝利之途。

中共黨史專家認為，抗戰前中共河北黨的發展也有類似情形。儘

11 Tony Saich, "Introdu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 1994), p. 1006.

管早期華北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李大釗，被認為是偏離正統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民粹主義革命家，主張農民有解放自己的力量，並讚揚農民的地方性是階級覺悟的基礎。¹²但李的民粹主義革命觀似乎未能改變華北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的外來性格，如早期河北黨黨員對產業工人運動的著迷，以及少數幹部如張國燾對國共合作議題的反對，同樣反映了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教條主義與不切實際。由於不切實際，京、津城市黨自1923年二七罷工後逐漸走向沒落的命運。1927年李大釗死後所建立的順直省委，以及1931年以後的河北省委，同樣深受當時中共中央領導者瞿秋白、李立三及王明所倡導之左傾路線的影響，持續推動著終將證明徒勞的城市工人運動。而農村黨員也在此一左傾領導的高壓統治下，為了某些不切實際的北方蘇區理想犧牲奉獻。¹³

根據此一論點，許多學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中共當時應當做的不是根據外來的理論教條去由上而下推動劇烈的社會衝突，而是利用現成的具有廣泛基礎的不滿，並提出解決此一不滿的實際政策，以獲得群眾的普遍支持。¹⁴在河北，正如前述黃宗智、Prasenjit Duara、Kenneth Pomeranz，乃至於Ralph A. Thaxton等人所言，當時地方群眾的不滿，並不是由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所規定的階級剝削，而是在

12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50–251.

13 Kathleen Hartford, “Fits and Starts: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ural Hobei, 1921–1936,”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pp. 150–152.

14 John E. Schrecke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pp. 158–163.

長時期歷史積累下，並由於清末民初以來國家現代化建設所加劇的某些如稅賦負擔等超階級之苦難，以及一九三〇年代以來日本入侵所引發的民族矛盾。契合此一地方情境的實際政策，毫不令人意外，便是所謂的統一戰線和稅制改革，頂多也只是緩和的減租減息政策，絕不是激烈的貧富鬥爭。

然而，這些因地制宜的政策能否獲得貫徹，關鍵仍在於地方幹部的領導，這就提出了「組織力量」(organizational weapon) 的問題。所謂的組織力量，是泛指中共外來黨、政、軍的領導。當代西方學者不太情願突顯組織力量的作用，因為過去冷戰時期西方反共的學者便是藉由突顯共黨的組織力量，指摘共產政權是沒有群眾基礎的極權主義政權，所謂革命也不過是少數為外來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蘇聯指示所洗腦的知識份子操弄的革命運動。但是，學者們又不得不承認，沒有外來領導的自發性群眾抗爭不可能自動地生成革命。在此一兩難困境下，學者如 Joseph W. Esherick 提出「解構」黨國的觀點，主張我們不應再把黨國視為一個具體化的巨大整體，而是一個「歷史的產物、文化的構築、人群的集合」。中共或許試圖擺脫其所處社會的束縛，但事實上不可能，愈是下層的幹部愈是如此，他們有意無意地依據地方的實際情形執行上層的指示。¹⁵ 根據此一看法，地方幹部與黨員不再只是中共黨國組織機械中的一個螺絲釘，還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如此就解決了革命領導者的問題。

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日益開放的中國檔案則進一步揭露了那些提供外來革命領導與意識形態，扮演革命「催化劑」角色的地方幹部，不

15 Joseph W.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 1994), p. 1078.

少是當地出身的知識份子。¹⁶在這裡，「地方菁英」(local elite)的概念便被提了出來，他是指藉由任何手段支配某一地區的人。¹⁷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地方菁英以各式各樣的身份出現，包括士紳、地主、商人、民團領袖，此一廣泛的定義，正說明了近現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劇烈變動。¹⁸而在中共黨史中，地方菁英更經常以回鄉知識份子的身份出現。前述 Ralph A. Thaxton 關於冀南地區的研究指出，最初在該地活動的共產黨員是一批富裕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黨員，這些知識份子有的曾在城市中求學，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外來革命思潮的影響。在回鄉以後，他們通過各種關係和由於國家取締私鹽政策而與國民黨政權疏離的地方抗爭領袖 (protest leaders) 合作，藉由傳統的私鹽市場網絡，利用鹽民 (也是農民) 與國家抗爭的傳統，成功地與地方群眾結合。¹⁹在這裡，回鄉知識份子和地方抗爭領袖皆是所謂的地方菁英；而農民被成功動員，雖然與回鄉知識份子從外面帶來的革命福音不無關係，但主要仍是奠基於地方的私鹽市場網絡和農民與國家抗爭的傳統。事實上，地方菁英此一概念，儘管不否認他們所受到的外來影響，但從一開始就被更強調其所反映的地方歷史與文化情境，被用來突顯十八世紀乃至於更早的十六、十七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政權「下放」(devolution) 之過程，²⁰ 同樣也被用來證明中國共產革命與

16 R. Keith Schoppa, "Contour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a Chinese County, 1900–195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4 (Nov. 1992), p. 794.

17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 10.

18 Xin Zha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Henan, 1900–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

19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p. 322–324.

20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p. 305, 340.

地方情境的一致，²¹ 因為這些回鄉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被認為是在傳統的架構下與農民進行結合，²² 這事實上也就是貶低了「組織力量」的作用，如 Ralph A. Thaxton 所言：「黨的領導、組織與宣傳，不過是次要的」。²³

然而，在抗戰以前，這些地方幹部的默默努力，仍然由於深受外來共產國際影響的中共上層之不重視或左傾的高壓手段，以至無疾而終。抗戰爆發後，中共在更務實的毛澤東的領導下，派遣更多知識份子回鄉活動。正如 Ralph A. Thaxton 關於冀南南樂縣千佛村以及 Mark Selden 等人關於冀中饒陽縣五公村革命史的研究表明，這些回鄉知識份子黨員透過宗族、家庭等既存的地域網絡，結合了各式各樣的地方菁英，推動稅制改革等根據地方情境所制定之緩和且務實的政策，掀起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在此一過程中，難免有激進的左傾行為出現，如國共內戰時期的土地改革，但這是由於戰爭的需要以及少數地方暴徒掌握了黨的領導權所致，並非共產黨的主要意圖。整體說來，在 1949 年以前，甚至迄 1950 年代中期為止，共產革命與傳統農村文化中向上的、團結的一面蜜月地結合在一起，締造了一個黃金時期。²⁴ 一些年輕的學者也毫不批判地接受了這樣的論點，宣稱靜

21 Stephen C. Averill,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y,"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p. 282–304.

22 Kamal Shee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38.

23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 321.

24 Ralph A.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3–88; Edward

悄悄的革命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中國農村的國家內卷化問題，重建而非破壞了農村秩序，恢復了傳統農村的社群機制，讓農民依據村莊慣習進行地方自治，並與新的共產黨政權和諧共處。²⁵

上述就是所謂「地方化」的中國共產革命史。²⁶此一論述認為中共應該依據不同的地方情境制定不同的政策，此即「因地制宜」。在華北地區，因為國家與社會等其他矛盾大於階級矛盾，所以階級鬥爭就不會是中共獲得勝利的關鍵；又，由於農民長時期以來已經自發地形成某種超階級且反國家的生存機制，所以共產黨員主要的工作，就是與這些既存機制結合，外來的組織與意識形態領導只居於其次。²⁷

Friedman, Mark Selden and Paul Pickowicz,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9–51, 270. 靜悄悄的革命是 Mark Selden 在 1971 年時便已提出的觀點，見：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附帶一提的是，本註所引之 Thaxton 的著作，係前引 *Salt of the Earth* 的續篇，兩者都是以冀南、豫北為範圍，*Catastrophe* 一書則專門以南樂縣千佛村為對象。

至於本註所引 Edward Friedman 等人之著作，及其後篇 Edward Friedman, Mark Selden and Paul Pickowicz,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探討的則是饒陽縣五公村自中共創立以來迄今的革命史。

25 Huaiyin Li,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uaiyin Li,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 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ng Liu,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Plain and Yangzi Delta*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6 關於 30 年來西方中共革命史研究「地方化」的情形，可見：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8（臺北，2010 年 6 月），頁 143–180。

27 Mark Selden 沒有 Ralph A. Thaxton 走得那麼遠，完全否定「組織力量」的作用。但他認為中共與國民黨政權黨國機械的不同，在於後者只知榨取，前者則是試圖與既存的社會、經濟網絡結合，並致力於貫徹其社經政策（即緩和的稅制改革與減租

如果不這樣做，共產革命就不會成功，還會造成災難。如前引 Ralph A. Thaxton 關於南樂縣千佛村，以及 Mark Selden 等人關於冀中饒陽縣五公村的研究就指出，1950 年代中期以後，中共就是因為依賴國家機械以及某些已經背離地方群眾利益的國家幹部，推動從蘇聯照抄來且不切實際的集體化政策，再掀起階級鬥爭的高潮，撕裂了農村，導致災難，事實上也開啓了另一回合國家與社會的較量。正如 Mark Selden 等人所言，那個時候，地方人民借用了國家發動的鬥爭運動與話語，為他們自己服務，間接與無聲無息地抵抗新的共產中國政權。²⁸

筆者不贊同此一看法，本書試圖證明中共在長時期的革命奪權過程間，如何逐漸地依據其所規定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重劃中國社會，並將其統治建立在此一分化之上。正如陳永發業已證明，共產革命乃由上而下的黨國建設與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兩個互補的過程，而群眾動員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個階級二元分化的社會。我們這裡並不打算、也不可能從經濟史的角度去論證究竟階級剝削是否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此一「數字遊戲」，²⁹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社會裡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而中共的階級分析又是如此廣泛卻也含糊不清的概念，以至對於中共來說，任何矛盾都可以也應該據以成為發動階

減息等)，以改善農民的生活。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p. 235.

28 Edward Friedman, Mark Selden and Paul Pickowicz,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pp. 1–2.

29 Joseph W. Esherick 認為，因為中國農村相關的數據資料是如此的龐雜，任何人都可能從中摘錄相關的資料去證明中國不存在階級矛盾，或相反的情形。儘管他傾向於認為中國農村裡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但他也承認這類的論證是「數字遊戲」。Joseph W. Esherick,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7, No. 4 (Oct., 1981), pp. 387–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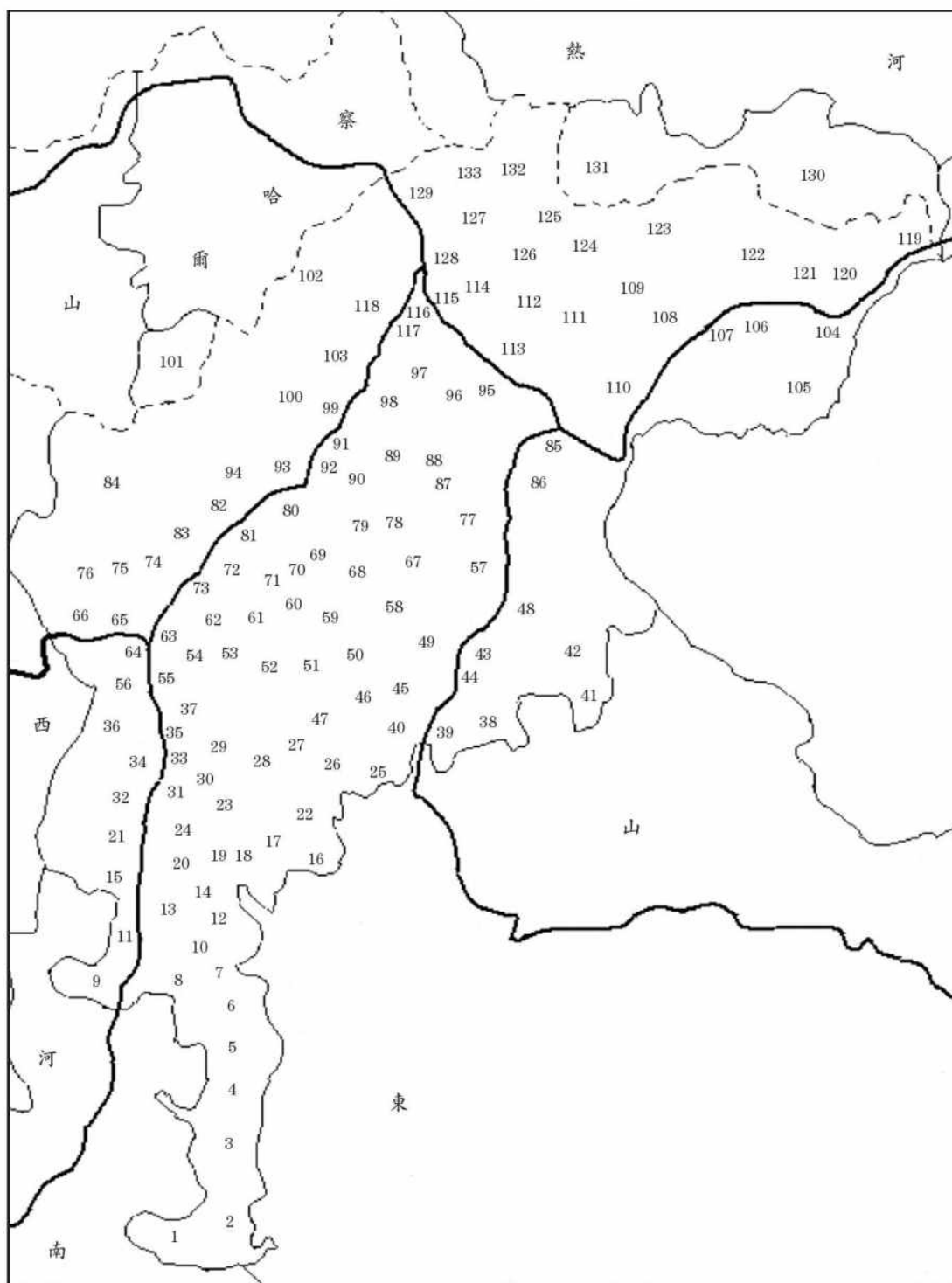
級鬥爭的口實，陳永發所謂「租佃問題不過是個重要的『次要』問題」，正是此意。³⁰

當然，中共不是一開始就能夠靈活地按照其意識形態重劃社會，並據此遂行統治。本書將證明，中共是誕生於一個業已被各式各樣政經文化網絡，或親朋好友等特殊關係所撕裂的社會。前述學者 Ralph A. Thaxton 等人以為這些既存網絡或關係是中國社會與革命凝聚的基礎，只是見樹不見林，忽略了這些既存機制，固然有助於小團體的結成，但也形成彼此間的壁壘，事實上撕裂了整個中國社會。中共最初的發展，也是依循這些既存的網絡與關係，故其內部的結成與分裂，事實上也是其所處外在社會的反映。隨後，中共歷屆「左傾」中央試圖強加一元化的領導於分裂的地方黨之上，屢遭挫敗，這正證明了 Hans J. van de Ven 所言，中共不可能在中國這樣一個分裂的社會上，仿照俄共建立一個無所不能的黨組織機械。但是，同時期黨內不斷的衝突、叛變，以及其所領導的群眾向敵人投降、妥協，不聽從黨的指揮，卻也駁斥了 Hans J. van de Ven 所謂中共必須容納那些追求不同利益與目的的小團體，只要彼此間仍以馬列主義的話語進行溝通的說法。³¹ 無論如何，這一段經歷，教導了日後的中共領導，他們必須正視中國社會既存的分裂，包容地方的多樣性，而不可能設想單純利用黨組織的力量由上而下地消弭這些裂痕。但是，他們又不想讓必然的分化危及自身的統治，所以中共必須依據自身的意識形態重新分

30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1-12, 39, 499, 516.

31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242.

一九三〇年代前期的河北省全圖



資料來源：本圖是參考洪家祿編，《大名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依據民國22年版影印）之插圖所繪。

圖例說明：1. 長垣；2. 東明；3. 濮陽；4. 清豐；5. 南樂；6. 大名；7. 廣平；8. 成安；9. 磁縣；10. 肥鄉；11. 邯鄲；12. 曲周；13. 永年；14. 雞澤；15. 沙河；16. 清河；17. 威縣；18. 廣宗；19. 平鄉；20. 南和；21. 邢台；22. 南宮；23. 鉅鹿；24. 任縣；25. 故城；26. 棗強；27. 冀縣；28. 新河；29. 寧晉；30. 隆平；31. 堯山；32. 內邱；33. 柏鄉；34. 臨城；35. 高邑；36. 贊皇；37. 趙縣；38. 寧津；39. 吳橋；40. 景縣；41. 慶雲；42. 鹽山；43. 南皮；44. 東光；45. 阜城；46. 武邑；47. 衡水；48. 滄縣；49. 交河；50. 武強；51. 深縣；52. 束鹿；53. 晉縣；54. 藁城；55. 欒城；56. 元氏；57. 青縣；58. 獻縣；59. 饒陽；60. 安平；61. 深澤；62. 無極；63. 正定；64. 石門（石家莊）；65. 獲鹿；66. 井陘；67. 河間；68. 肅寧；69. 蠡縣；70. 博野；71. 安國；72. 定縣；73. 新樂；74. 行唐；75. 靈壽；76. 平山；77. 大城；78. 任邱；79. 高陽；80. 清苑（保定）；81. 豐都；82. 唐縣；83. 曲陽；84. 阜平；85. 天津；86. 靜海；87. 文安；88. 新鎮；89. 雄縣；90. 安新；91. 容城；92. 徐水；93. 滿城；94. 完縣；95. 安次；96. 永清；97. 固安；98. 新城（高碑店市）；99. 定興；100. 易縣；101. 涑源；102. 涿縣；103. 涑水；104. 昌黎；105. 樂亭；106. 灤縣；107. 唐山；108. 豐潤；109. 玉田；110. 寧河；111. 寶坻；112. 香河；113. 武清；114. 通縣；115. 大興；116. 宛平；117. 良鄉；118. 房山；119. 臨榆；120. 撫寧；121. 盧龍；122. 遷安；123. 遵化；124. 薊縣；125. 平谷；126. 三河；127. 順義；128. 北平；129. 昌平；130. 都山；131. 興隆；132. 密雲；133. 懷柔。

「—」：省界；「—」：鐵路；「----」：長城。

化社會，使這樣的分化能為黨所控制。後來統一戰線的提出，正是中共對中國地方社會多樣性的默認；但階級鬥爭的深入，則確保了統一戰線以及社會的多樣性服從於黨的領導。兩者既合作又衝突，缺一不可。經過了不斷的運動與鬥爭後，中共終於造成一個如其所望的階級二元分化社會，並在此基礎上擊敗了國民黨政權，建立了一個更龐大的新黨國！

二、研究範圍

河北省，簡稱冀，是古代冀州的所在地，北伐以前稱直隸省，故又簡稱直。有清時期的直隸省省界，北達承德市、張家口以北及遼寧省西部地區，南部則包括今日已劃歸山東、河南省的長垣、東明、濮陽等縣，並包含當代北京、天津兩市轄區。³² 其中北京市在古代稱為幽州或薊城，契丹人的遼朝首先在此建立國都，金、元繼之，明初設北平府，明成祖時改稱北京，又設「順天府」管轄周圍諸地區，以象徵成祖的統治是「順應天命」。³³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民國創立。當時中國政府當局仍承襲直隸省之名，並於天津設立直隸行政公署管理全省事務。又，鑒於直隸省面積過於廣泛，民初政府當局除了將承德與張家口地區劃出，另設熱河、察哈爾特別區外，並將轄京師周圍二十縣之順天府改稱京兆，直轄於中央政府，由地位相當於省長之京兆尹管轄，直隸省範圍因此約縮小一半。1928年北伐完成，國民政府改直隸省為河北省、北京為北平，將河北省省會由天津遷往北平。隨後，國民政府復將河北南部之濮陽等縣，劃歸河南、山東兩省管轄，河北省之面積再次縮減。河北省省會亦由於政治及軍事因素的考量，先後自北平遷往天津、保定等地。此後迄抗戰結束，中共建國為止，河北省的範圍並無重大改變。由於民國時期的河北省與熱河、察哈爾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山東省西部等地區有著密切的關係，且中共河

32 東亞同文會，《中國省別全誌 第十八卷 直隸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20），頁1-4。

33 薛鳳旋，《北京：由傳統國都到社會主義首都》（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6），頁43。

北黨的管轄範圍在抗戰前亦涵蓋這些地區，因此，本文所說的河北省，除特別註明者外，其範圍是以有清時期的直隸省為基礎。

河北省屬黃淮平原（華北平原）的一部分，其地形「除西、北兩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餘都是廣漠無垠的平原地」。³⁴ 該省氣候冬季寒冷少雪，春日乾燥且風沙盛行，夏季炎熱多雨，秋季則晴朗並冷暖適中。居民主要以務農為業，根據日人在一九四〇年代的調查，在「北支那」諸省中，河北的耕地面積（6萬4千餘畝）、農家戶數（422萬戶）僅次於山東省而居第二位，農作物以棉花、高粱、粟、玉蜀黍、大豆為主。另外，河北省亦富含煤、鐵等重要礦產，其中煤礦的產量，根據日人所言，居當時全「支那」產量的四成。³⁵ 而據本文第四章的分析，河北省還是中國主要的食鹽產地，其所產的海鹽被稱為長蘆鹽，是產量與地位僅次於淮鹽的中國第二大海鹽。

雖然有煤、鐵等重要礦產，但如同中國其他省份般，在西方勢力到來以前，河北省並沒有可以稱得上現代化的產業，只有一些小規模的手工業。鴉片戰爭以降，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才陸續發展現代化產業，鐵路、公路等近代交通建設亦逐漸開展，其中著名者有南北向的京漢、津浦、北寧、同蒲線，以及東西向的京包、正太等線。曾作為國都的北京，當然成為這些交通網絡的輻湊中心。但這些交通幹線主要係作為城市之聯絡，大部分的農村地區仍依賴騾、馬、駱駝等牲畜及河道與外界互通有無。在抗戰爆發以後，由於主要交通幹線遭到破壞，這些傳統的聯絡方式益形重要。

河北省的重要城市，除北京外，另外還有作為捍衛國都北京的軍

34 徐向前，〈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1938/05），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南歷史文獻選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9。

35 支那問題辭典編輯部，《支那問題辭典》（東京：中央公論社，1942），頁144、149。

事據點而興起，並在 1860 年開港以後逐漸成爲華北地區主要商港的天津市，該市人口在一九四〇年代時曾一度超越北平而成爲華北地區人口最稠密的城市。³⁶ 位於冀中地區的保定也是作爲軍事要地而興起者，該市在清末民初與抗戰前夕曾是河北省政府的所在地。北邊的承德與張家口則不僅曾是邊防軍事重鎮，還是關內外商業往來要道，兩市在民初分別劃歸熱河與察哈爾兩省所轄，是該二省的省會。接鄰山東、河南兩省的冀南地區則有邢台、大名、邯鄲、磁縣等城市，其中前三者主要也是作爲政治、軍事重鎮而興起的城市，磁縣則是由於盜業與六河溝煤礦的開發而後起者。位於冀東的唐山市因爲開灤煤礦的開採而成爲現代工業城市，抗戰初年升格爲市。在天津南部有個滄縣，它是長蘆海鹽的發源地之一，早期地位不如河間（河間府），但卻是民初以來津南地區的中心。今日的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建市不過百年左右，它是作爲京漢、正太鐵路之交匯點而興起的商業城市，除此之外，它還是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軍事重鎮之一。大體說來，整個河北省可劃分爲以北京、天津爲中心的京津地區，以保定、石家莊爲中心的冀中地區，圍繞在唐山周圍的冀東地區，包括邢台、邯鄲、磁縣與大名在內的冀南地區，以滄縣爲中心的津南地區，還有民國時期不屬河北省所轄的熱南與察南地區，兩者分別以承德和張家口爲中心。其中冀南、冀中與冀東地區在抗戰前曾被稱爲直南、直中與京東地區，但本文爲方便論述起見，仍稱其爲冀南、冀中與冀東地區。

河北省東鄰渤海灣，東北經遼西走廊與日本之殖民地滿洲相通，北部則毗連蒙古平原，西面以太行山脈與閻錫山所控制的山西省爲界，冀南地區則屬曾作爲中華帝國經濟命脈並象徵中華民族之源起的

36 天津地域史研究会，《天津史—再生する都市のトポロジー》（東京：東方書店，1999），頁 9-11。

運河及黃河流域，其地緣位置的重要，自不待言。加上首都北京為本省所懷抱，故河北省自古以來即為兵家必爭之地，民國時期所爆發的幾次大規模內戰，亦是以河北省為主要戰場。

民國時期河北省政局的變遷概述如下。民國初年第一任直隸都督是張錫鑾，1914年袁世凱令各省都督改稱將軍後，由朱家寶任直隸省省長兼將軍，張、朱二者皆是袁的手下，故當時包括首都北京在內的直隸省是為袁世凱的地盤。1916年黎元洪繼任總統，曹錕接任直隸督軍，直系掌握了直隸省。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之際，由於馮玉祥的首都政變，直系慘敗，直隸省復由馮玉祥的國民軍及張作霖的奉系佔領，後國民軍遭到驅逐，奉系獨佔該省。1928年北伐成功，奉系被驅逐關外，直隸省改名河北省，並由晉系的商震擔任省長。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南京方面由於張學良率領奉軍入關相助而獲得勝利，河北省也因此被犒賞給張學良，成為奉系的地盤。1933年，張學良由於東北、熱河的相繼失守引咎辭職，南京政府派遣何應欽接任張學良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之職，並設立以黃郛為委員長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這些超省級機構的設立，實乃南京當局試圖加強對河北省控制所採取的手段。然而，當時真正掌握河北省地盤的仍舊是宋哲元、商震等地方軍閥，代表中央的北平軍分會或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不僅未能控制這些地方軍閥，南京中央頂多也只能透過這些地方軍閥的關係去間接宣示中央在該地的主權而已。³⁷ 日本的入侵進一步侵蝕了國民政府在河北省的主權。迄1935年底為止，大部分的

37 Marjorie Dryburgh, *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3–1937: Regional 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Richmond: Curzon, 2000), pp. 3–8;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170–171.

熱河、察哈爾地區皆已淪陷，冀東地區也被劃為自治區域，國民黨省黨部還被迫遷移至保定辦公。抗戰爆發後，整個河北省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完全淪陷，主要交通線與城市咸由日軍及其所扶植的偽政權占領，農村地區則由共黨的八路軍與各式各樣的「抗日力量」所奪。國民黨曾試圖統一領導河北敵後抗日力量，但遭中共阻礙，被迫自冀中與冀南退往豫北地區，撤出河北省的政治舞台。抗戰結束後，國軍在美軍之援助下反攻河北，雖然最初進展順利，但自1947年後，戰局逆轉，國軍在華北各地相繼失利。1948年，來自東北的第四野戰軍乘破竹之勢，大舉入關。鎮守北平等地的國軍傅作義等部，在孤軍無援下，舉城投降，河北終為中共佔領，並且後來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畿輔重鎮。

三、章節安排

中共誕生於一個分裂的中國社會，一個為各式各樣既存的地方網絡與關係所撕裂的社會。

中共河北黨最初是在李大釗的領導與共產國際的協助下建立起來的。它的成員以知識份子為主，彼此間主要依賴既存的政治文化網絡或親朋好友等關係結合，河北黨也因此深受這些既存的关系網絡束縛，其內部也反映了所處社會的分裂性格。究其實，河北黨事實上是由散居在京、津等各大城市中一個個鬆散的知識份子小團體組成，李大釗是其間聯繫的樞紐，是大家所共同尊重的北方黨大家長。這些知識份子黨員，最初也是依賴李大釗或其自身的關係，去從事革命活動。他們在上層社會間捭闔縱橫，卻沒有能力打入下層群眾，因為群眾也是依賴與自己有關係，以及在經濟或政治上有辦法的菁英或政治團體

來滿足自身的需求。甫創立的中共河北黨沒有足夠的資源，只好尋求其他政治團體與菁英的幫助。他們曾先後聯合吳佩孚與馮玉祥的國民軍等團體，但此一合作關係是建立在權力政治、蘇聯的金援，以及李大釗等少數個人的關係之上，並不穩固。河北黨也只是打著別人的招牌推動革命，沒能建立下層基礎。迨國共分裂，李大釗被捕處死，維繫此一不穩固的北方國民革命聯盟的因素消失，中共的合作者紛紛背其而去，河北黨又回到了一開始分散的小團體的狀態。這是本文第一章所欲探討的主題。

因為這些組成河北黨的分散的小團體，並不是一個整體，他們彼此間本來就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在李大釗被捕處死，以及國共分裂後，這些矛盾就爆發了出來，結果導致持續將近一年多的河北黨內部的衝突與分裂，此即順直省委事件。中共中央曾試圖由上而下地加強黨組織的領導，但反而加劇衝突。最後中央只好訴諸妥協的辦法，安撫河北黨內的各個派系，但傷害已經造成，黨的威信也已受到重創。

中共中央處理順直省委事件的失敗，正說明了單純依賴由上而下黨組織紀律的貫徹，並不足以統合黨內的分裂。本書第二章除了詳述順直省委事件的來龍去脈外，並將進一步指出，當時河北黨由於主觀與客觀的因素，仍採取過去李大釗時代的辦法，依賴其他黨派的政治招牌去推動群眾運動，乃至於參與國民黨左派所發動的和平、合法抗爭。此種做法原本亦是共產黨奪取群眾的策略之一，事實上也有助於打入群眾進行下層統一戰線，本身並無可厚非。但實際活動的黨員，既沒有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未能在過程中逐步地啓發群眾的政治與階級覺悟，結果當然沒能達到改造群眾與社會的目的，反而使自身隨波逐流地陷入既存的政治派系紛爭與社會分裂當中，終究還是為人作嫁。

在經歷一連串的挫敗後，中共不能不逐漸地覺悟到，各式各樣特殊的關係與網絡，雖然有助於革命的推動，但也可以為敵人所用，造成革命陣營的分裂。後來的立三路線所以左，就是當時中共試圖脫離此一既存的關係網絡，從外面用組織的力量與中共的階級話語來動員群眾，但事實上不能為群眾接受，結果只是發動了幾場由少數死硬派領導的「單純軍事運動」，沒有群眾基礎，旋即失敗。

立三路線的失敗，再促成河北黨的分裂，此即本書第三章將介紹的1931年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當時甫接手中央領導的王明等「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依舊不得不訴諸事實上已無甚威信的黨組織紀律，結果還是重蹈順直省委事件的覆轍，造成黨的大分裂，並引來國民黨當局白色恐怖的鎮壓，河北黨幾乎崩潰瓦解。

當此之際，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愈益露骨的侵略，掀起了另一股革命高漲的氣息。北方黨企圖乘此高潮，動員群眾，建立北方蘇維埃政權，1932年的高蠡暴動就是此一計畫的結果之一。但是，當時農村裡各式各樣的關係網絡更為複雜，農民也沒有中共所設想般的政治與階級覺悟，他們總是期待依賴有辦法的菁英或社團領導，以及政府當局的力量，來滿足其眼前的經濟需求。派下去農村工作的幹部，若不是無法自拔地捲入地方既存的政治社會衝突中，失去自身的革命立場，就是脫離群眾地高呼階級鬥爭，走上無疾而終的單純軍事行動之途。

不過，當時「左傾」的中共中央也不總是如此的不切實際。事實上，自1929年以來，北方黨在地方黨務系統外，慢慢地發展出另一套特科系統。特科系統的成員，許多是過去因為犯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被懲處乃至於開除的黨員，他們大部分是知識份子出身，很多還是李大釗時代就入黨的老幹部。這些人在北方上層社會有關係與

辦法，中共因此繼續利用他們推動北方地區的上層統一戰線，1933年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便是特科的傑作之一。但是，這些特科幹部，他們專事上層軍官的統戰（當時稱西瓜政策），完全不重視下層群眾運動（當時稱紅蘿蔔主義），結果像察哈爾事變般，仍不免流於單純的軍事行動，終告失敗。

當代學者批評抗戰前中共白區黨的失敗就是因為中共領導太過教條，脫離地方實際的緣故。這種情形固然存在，如立三路線的例子；但是，從察哈爾事變等例子看來，情形也可能是相反的。地方幹部在發動運動時，拋棄了黨的領導，忘卻了共產黨的政治任務，單單依循既存的關係與網絡串連，訴諸群眾迫切的經濟需求，結果雖然打入了地方，但事實上卻被社會所吞沒，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

所以，革命的地方化不能保證自身的成功，它還須要黨的領導，要為一個超越地方的長遠目標奮鬥，這也就是「現代」的共產革命與「傳統」的自發性群眾運動本質上不相同之處，³⁸前者是長期的、廣泛的及進攻性的運動，後者則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³⁹況且，因為群眾也是依賴某些個別領導或政治黨派的關係來滿足自身的需求，所以事實上與上層政治完全無涉的自發性群眾運動，是否存在，令人懷疑。在下文我們也要證明，中共涉入的幾起自發性色彩濃厚的群眾運動，終究還是透過某些個別群眾領導，乃至於其他政治黨派的關係去動員與結合，下場也多是流於單純的軍事行動。

可是，前面談到的 Ralph A. Thaxton 卻說，在當時冀魯豫三省的

38 此一說法可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9 Lucia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2001), p. 23.

農村社會中存在著另一種不同的自發性群眾運動，那就是鹽民抗爭。他認為以製販土鹽為生的農民，由於其所面對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的國民黨國家機械，故其鬥爭是長期性的，並不像僅以地方軍閥和土匪為抗爭對象的紅槍會般短暫。而且，Thaxton 還說，中共儘管抗戰前由於中央左傾路線的緣故，未能廣泛地與此一運動結合，但幸虧某些務實的下層幹部不顧上層左傾路線，積極地從事鹽民抗爭，故共黨還是能在地方鹽民間獲得信仰，並為日後冀南抗日根據地打下基礎。可是，在本文第四章中將證明，這些鹽民的苦難並非來自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也不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而是地方軍閥政權，所以鹽民抗爭仍舊是與紅槍會一樣，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再者，共黨上層固然瞧不起這些鹽民抗爭，下層幹部也同樣不相信群眾的力量，所以他們發動的鹽民抗爭，事實上也只是以槍桿子為號召的單純軍事行動。況且，國民黨政權也不總是和鹽民對立，他們在抗戰前曾推動鹼地改革，抗戰爆發後還鼓勵土鹽產銷，並予合法化。反倒是外來的八路軍在初來乍到之際，就想方設法併吞、取代這些地方團體，所以我們不能說中共冀南抗日根據地是建立在地方鹽民抗爭的基礎之上。

單純的革命地方化不能保證革命自身的成功，過份的脫離地方化也會促成革命的失敗，這正是抗戰初期河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普遍面臨的困境。如本書第五章將證明，中共抗戰初期所以屢屢在冀熱察邊區（冀東、平北、平西）遭到挫敗，就是因為他們太依賴外來的軍事力量。原來中共在冀東地區並無甚群眾基礎，地方群眾對日本人的信仰甚至還超過對中共的認識。1938年，中共鼓動地方上層份子⁴⁰發動

40 本文所謂的上層份子，是指在地方上行使支配權力的個人與團體，即前述 Joseph

冀東抗日大暴動，配合派遣八路軍進入冀東地區，建立根據地。因為此一暴動原本便是為響應八路軍之到來才發起的，地方幹部與非黨的上層份子皆是依賴八路軍去從事抗日活動，因此，在八路軍退出後，冀東抗日勢力立即瓦解。

由此可見，中共如欲在敵後立足，就必須設法紮根地方。當時中共也曾在冀熱察邊區推動帶有階級鬥爭意味的合理負擔等政策，藉此建立政權基礎。但因為中共在當地的群眾基礎一開始相當薄弱，驟然地依靠外來黨政軍的力量推動這些政策，固然給予地方階級異己份子一大打擊，但也嚇跑了群眾，把群眾驅趕到敵人的一方，致日偽軍的掃蕩到來時，根據地內部眾叛親離。如此看來，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線似乎成了不可並存的兩個面向。Mark Selden 等人所謂中共是訴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緩和的減租減息政策以獲致成功的說法，好像也不無道理。

確實，在第五、六章我們將證明，中共始終沒有放棄統戰，但他們是「一打一拉」地做統戰，拉上層份子抗日，打其反對共產黨的「民主」與社經改革。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中共以合法的面貌，推動貌似有理、有利、有節的合理負擔、減租減息政策，事實上是按其意識形態重新劃分了農村社會，以貧富對立的階級關係取代了過去以地緣、血緣，或者 Ralph A. Thaxton 等人所強調的反抗國家傳統而結

W. Esherick 等西方學者所說的「地方菁英」(local elites)。所以採用上層份子而不是地方菁英一詞，是因為後者乃當代西方學者所發明的名詞，上層份子則是當時共黨文件中所使用者。不過，共黨文件中的上層份子，除指涉那些在地方上有支配權力與影響力的人(如地方的保甲長)外，還帶有階級分析的意含，是指那些地主、富農等異己階級出身的份子。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 10.

成的農村社群，此即陳永發所謂「被控制的農村二元對立」。中共藉此奪取了上層份子的下層群眾基礎，迫使他們不得不跟著共產黨走，這是被控制的統一戰線。整個說起來，就是「一打一拉」。

戰後的土地改革是農村階級鬥爭的最高潮。中共在此一過程中，不僅徹底分化了農村社會，也撕裂了自身黨政軍形式上的組織，所有的人民與黨政軍成員，都要按照中共的階級劃分，排隊過關。中共黨國並沒有因為此一分化而衰微，反而日益壯大，最終擊敗了國民黨政權，建立了另一個更龐大的黨國體制。總結地說，中共生成於一個分裂的社會當中，他們不可能完全消弭這些裂痕並建立一個鐵板一塊的極權主義政體，而是依據其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重新撕裂社會，並將其統治建立在此一再分化的社會之上。

第一章

李大釗領導時期的河北革命

1921–1927

當代西方學者高舉革命生態學（ecology）的口號，試圖去探究革命操作的背景，以及共產黨如何因地制宜地推動革命，獲得成功。但是，最早針對此一議題進行論述的是 Roy Hofheinz, Jr. 在 1969 年所發表一篇名為〈革命生態學〉的文章。Hofheinz 悲觀地斷言，中共的發展與其所處的客觀社會經濟背景沒有相應的因果關係，如河北地區就不存在嚴重的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中共革命的口號在這裡無用武之地，其所以後來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於河北建立根據地，主要係組織運作的產物。¹ 據此推論，Hofheinz 在 1977 年出版的 *The Broken Wave* 一書中，以廣東為例，更進一步指出，由於中共組織力量尚不成熟，以及中國農村本身條件不適合激進的改革政策等原因，北伐時期中共農民運動的失敗乃理所當然，不會因為行動者或農運領導者的不同而改變其宿命。²

1 Roy Hofheinz, Jr.,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 in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 58–59, 77.

2 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89–291.

許多學者不贊同 Roy Hofheinz, Jr.，批評他片面地強調外來的組織因素。如 David S. G. Goodman 等人在重提革命生態學之時，便從相反的視角，試圖去論證中國共產革命與其所處的地方情境存在著如何密切的關係。他們並不否認革命行動者（agency）的主觀因素，但主張其作用僅限於把上層黨的政策與路線，因地制宜地貫徹於地方。³中共後來能夠在河北這樣沒有嚴重土地問題的地方開創根據地，其關鍵便在於地方黨員不再那麼堅持外來的階級路線，而是執行適合地方群眾迫切需求的減租減息等和緩的社經改革政策，獲得群眾的支持。基於同樣的原因，Kathleen Hartford 指出，抗戰前（包括北伐時期）中共河北黨在農運方面並非毫無成績可言，因為河北地方黨員並未死板地執行上層的左傾激進路線，而是採取更適合地方的溫和政策，團結包括菁英與群眾在內的整個農村社群。⁴更早的學者如 Maurice Meisner 等人也認為，河北黨早期的大家長李大釗，是更適合中國情境的毛澤東革命道路的先行者，與崇尚外來西化道路的陳獨秀大相逕庭。⁵這也就是說，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從一開始就步上其「中國化」、「地方化」的正道。

3 Chongyi Feng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0), pp. 12–13.

4 Kathleen Hartford, "Fits and Star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ural Hebei, 1921–1936,"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pp. 144–174.

5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p. 261–262. 此一說法也符合當代中國官方對李大釗的定位，胡喬木在 1989 年就把李對農民的重視和毛澤東相提並論，說「這正是他為把馬克思主義正確地運用於中國的實際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胡喬木，〈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1989/10/29），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選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9），頁 7。

我們認為 Roy Hofheinz, Jr. 片面抬高外來組織力量的說法是錯的，但也不贊成 Maurice Meisner 等人的觀點，蓋其所謂的中國情境或地方社群，本身也被各種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網絡，以及血緣、地緣等私人關係所撕裂。包括河北在內的各地共產黨組織，最初就是依賴這些網絡與關係所建立，以至其後來的活動，深受這些既存關係網絡的局限，黨內也從一開始就反映了其所處社會的分裂性格。如果這就是 David S. G. Goodman 等人所謂革命與地方情境的結合，或是 Meisner 所謂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那麼，此一性格顯然無助於革命的擴大與穩固。就此點來說，Hofheinz 所謂北伐時期中共是依賴外來組織去擴展的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蓋那些過份依恃既存關係結成的黨組織，如果沒有蘇聯、國民黨等更有力的政治團體之協助，也難以獲得發展，乃至於生存。但如此地依賴既存關係、外來組織力量的早期河北黨，也預示了國共分裂以後，一旦這些結成的要素不在，黨自身也將面臨瓦解的命運。

第一節 中共河北黨的創建

一、知識份子黨員的結成

中國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運動是從河北省發起，而中共河北黨最初的領導者則是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北京黨。

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在取得共產國際的同意後，派遣由吳廷康（魏金斯基）領導的代表團抵達北京，⁶ 他們經

6 〈關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0/12/2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

過北大俄籍教授鮑立維的介紹，認識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隨後，李大釗招徠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在北京就讀的年輕學子，在同年9月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此即中共北京黨的前身。

這些知識份子所以加入共產黨與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當然不無關係。論者有謂，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遭受失敗，以及1917年俄國革命的影響，在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社會中，掀起了一股研究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潮流。⁷ 那些後來組成中共北京黨的知識份子也是此一潮流的追隨者。事實上，張國燾等人早在1920年3月便已成立了一個以李大釗為顧問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還透過工讀互助、平民教育等機制，試圖實踐其社會主義的理想。他們曾參加由少年中國學會領導人王光祈贊助成立的北京工讀互助團、作家周作人推動的新村運動，以及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為主體所成立的工學會等團體。⁸ 其中鄧中夏等人還親赴鄰近北京之長辛店京漢路機廠，嘗試進行工人運動。儘管這些運動最後大多無疾而終，且長辛店的工運也實在算不上是「現代化」的產業工人運動，但我們卻不能不說，這些知識份子出於對社會主義的信仰與對群眾運動的熱中，結成團體，並選擇加入共產黨。

除了思想上的因素外，地緣關係在早期共產黨的結合中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如表1-1所示，早期北京黨主要組成者是一批來自南

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下文引用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簡稱為《國際檔案》），頁50。

7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8-19.

8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0-92.

方的知識份子。在該表出現的 32 人中，北方出身者有 10 人，僅佔三成左右；來自南方者卻有 22 人，佔了將近七成之比例，其中又以與毛澤東同籍的湖南人居多，有 13 人，佔了南方籍黨員數的近六成之強。明顯的，湖南籍的同鄉關係在早期中共北京黨的組建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當時中共北京黨便不無自豪地說：「因為居留北京的湖南人很多，所以群眾發展並不困難。」⁹ 論者有謂，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經常利用同鄉、同儕、師生等各式各樣帶有濃厚傳統和地方色彩的私人關係來組建學會和政治團體，此一命題在早期北京黨的組成中也獲得了印證。¹⁰

在早期天津黨的創建過程中，同鄉關係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早期天津黨是以韓麟符（韓致祥）等年輕學子為主體而成立者。韓麟符，漢人，1900 年生，原籍山西榆次。在清朝中期以來「文化的北向移

9 〈中共北京地委國民運動工作報告〉（1927/02/10），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 371。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湖南人是當時北京市最大的外省群體。Sidney D. Gamble 在 1910 年代末對北京的調查指出，北京市的湖南會館與他省會館比較下僅是少數。如果會館數與外省群體數量成正比，此一證據反而證明了中共早期黨組織發展的任意性與地域排他性。以下是 Gamble 的調查：

| | | | | | | | | | | | | | | | | |
|--------|----|----|----|----|----|----|----|----|---|----|---|----|---|----|----|---|
| 皖 | 浙 | 直 | 閩 | 豫 | 湘 | 鄂 | 贛 | 蘇 | 桂 | 粵 | 黔 | 晉 | 魯 | 陝甘 | 川 | 滇 |
| 39 | 38 | 12 | 24 | 14 | 23 | 26 | 69 | 27 | 7 | 36 | 7 | 34 | 7 | 26 | 15 | 9 |
| 總數：413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Sidney D.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Conduc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in China and the Peking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1), p. 233.

10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pp. 35-43.

表 1-1 早期北京黨之成員

| | |
|-------------------------------------|---|
| 1920年9月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 李大釗（河北）、張國燾（江西）、張申府（河北）、鄧中夏（湖南）、羅章龍（湖南）、高君宇（山西）、劉仁靜（湖北）、李梅羹（湖南）、何孟雄（湖南）、繆伯英（湖南）、張太雷（江蘇） |
| 1920年11月 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 | 李大釗（河北）、張國燾（江西）、張申府（河北）、鄧中夏（湖南）、羅章龍（湖南）、高君宇（山西）、劉仁靜（湖北）、李梅羹（湖南）、何孟雄（湖南）、繆伯英（湖南）、朱務善（湖南）、范鴻劫（湖北）、李駿（湖北）、吳汝銘（湖南）、宋介（山東）、張太雷（江蘇） |
| 1921年8月 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 | 李大釗（河北，書記）、羅章龍（湖南）、高君宇（山西）、李梅羹（湖南） |
| 1922年7月 中共北方地方委員會 | 范鴻劫（湖北，委員長）、張昆弟（湖南）、包惠僧（湖北）、何孟雄（湖南）、安體誠（河北） |
| 1923年7月 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 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 | 何孟雄（湖南，委員長）、范鴻劫（湖北，繼任委員長）、李大釗（河北，繼任委員長）、張昆弟（湖南）、包惠僧（湖北）、張國燾（江西）、朱務善（湖南）、蔡和森（湖南）、劉仁靜（湖北） |
| 1924年6月 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 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 | 何孟雄（湖南，委員長）、趙世炎（四川，繼任委員長，後改名書記）、陳喬年（安徽，繼任書記）、范鴻劫（湖北）、高君宇（山西）、朱務善（湖南）、李國暄（湖北）、彭桂生（河北）、陳爲人（湖南）、何資深（湖南） |
| 1925年10月 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 （簡稱北方區委） | 李大釗（河北，書記）、彭桂生（河北）、楊景山（河北）、陳喬年（安徽）、趙世炎（四川）、范鴻劫（湖北）、劉清揚（天津）、夏之栩（湖北）、張兆豐（河北）、李懷才（山東）、羅亦農（湖南） |

資料來源：劉道華、黃小同編，《中共北方區黨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 8-9；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卷 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 96-100。

民」浪潮推動下，許多關內地區的漢人移居內蒙古，¹¹ 韓麟符的父親也在 18 歲時隨山西商人到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喀喇沁旗（相當於熱河南部地區的赤峰市）經商致富，並在此定居。韓幼時就讀熱河建平縣（今屬遼寧省，亦屬喀喇沁旗）的新丘小學，1916 年入天津直隸第一中學（官立中學），曾參與五四運動。據另一位早期天津黨員並曾是五四運動時期由周恩來等人所組織的覺悟社社員劉清揚所言，韓作風漂浮，好出風頭，和一個女學生談戀愛，因此周恩來等覺悟社成員都對他不滿意，不願意吸收他入覺悟社。¹²

後來韓麟符和陳鏡湖（陳印潭、李鐵然）、鄭丕烈、杜真生等建平籍官立中學學生，¹³ 還有官立中學同學于方舟（河北寧河人）、安幸生（河北滄州人），以及天津高等工業學校學生李希逸（李廉祺，河北靜海人）、¹⁴ 商業學校學生李培良（天津人）等人，組成了一個勢力較覺悟社龐大，並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新生社。¹⁵ 曾參加北

11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Leiden: Brill, 2002), p. 80.

12 劉清揚，〈回憶建黨初期黨領導北方人民進行的英勇鬥爭〉，《河北文史資料》，輯 2（石家莊，1981），頁 8。

13 關於韓麟符等早期熱河籍黨員的歷史，可見：周昶陸、趙志明，〈韓麟符的一生〉，赤峰市元寶山區政協文史資料，《韓麟符》（北京：華齡出版社，1993），頁 1-17；劉景恩、李久榮，〈陳鏡湖〉，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黨史人物(-)》（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 343-347；趙志明，〈凶手鄭丕烈〉，《韓麟符》，頁 126；王鴻賓等主編，《東北人物大辭典》（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2），頁 602。

14 李希逸是抗戰前中共河北黨的重要領導者，但由於他日後叛變，故甚少為大陸官方黨史研究者提及。至於他的出身，有說是靜海人，也有說是寶坻人，無論如何，就是天津地區人。見：王積衡，〈回憶大革命時期我在天津的一段經歷〉，《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23（天津，1983），頁 1；中央組織局，〈臨時通知（不列號）〉（1932/04/05），《黨的建設》，期 9（1932/04/20），臺灣法務部調查局：052.1/804/16093 n.9。

15 廖永武，《天津現代革命運動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頁 16。

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張太雷便是新生社的成員之一。¹⁶ 據羅章龍的回憶，張太雷與同樣來自天津的學生于方舟、韓麟符與安幸生在 1920 年 3 月時一同加入了北京馬克斯學說研究會。¹⁷ 又，自 1920 年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以來，這些藉由同鄉關係糾合起來的天津和熱河青年便是其中主要成員。

我們這裡有一份天津青年團國民俱樂部的職員表，該俱樂部雖名義上為國民黨外圍團體，但內部成員多是共產黨、團員，¹⁸ 因此，從該俱樂部成員之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早期中共天津黨團的組成概況。

如表 1-2 所示，早期天津黨成員是以河北與熱河籍黨員居多數，其中河北籍黨員又以來自天津地區者居多數，所以如此，與于方舟和韓麟符等新生社成員的同鄉聯繫當然不無關係。據云，當時韓麟符、陳鏡湖等熱河籍黨員即利用其在家鄉的影響力，並允諾將來可赴廣州或莫斯科學習，吸收了不少熱河青年到津、京求學。¹⁹

此外，韓麟符等人在北京蒙藏學校內的蒙籍青年學子間也有相當影響力，如日後成為中共內蒙古黨的主要領導者榮耀先等來自內蒙古

16 〈張太雷在北洋大學〉，中共天津市紅橋區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紅橋黨史資料彙編》（天津：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7），頁 111。

17 羅章龍，〈憶太雷同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回憶張太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66。

18 據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崔溥及于方舟等人的報告，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之組織「實係由『青年俱樂部』之經驗而來」，「天津國民黨可說無別種勢力在內，國民黨省委員除本團同志外皆為 C.P.（按：即共產黨）同志」。〈崔溥關於組織發展致仲夏的信〉（1924/03-04/12）、〈方舟、廉祺關於天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活動籌備情況等致鍾英的信〉（1924/04/20），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1》（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7，下文引用的《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河北文件》），頁 100、116。

19 王逸倫，〈對熱河地區黨的早期活動的回憶〉，《韓麟符》，頁 104。

表 1-2 天津青年團國民俱樂部成員組成表

| |
|---|
| <p>河北：安毓文（天津）、陳學榮（天津）、王文田（天津）、安鍾英（天津）、董紹良（天津）、田誦堯（寧晉）、于蘭田（寧河）、馮世昌（臨榆）、劉直甫（寧河）、殷樹林（昌黎）、朱鶴洲（寧河）、李任權（灤縣）、張積信（文安）、盧成銘（豐潤）、張仰文（遷安）、王永錄（宣化）、胡九源、張儒林（磁縣）、孫學謙（景縣）、周有志（磁縣）、于樹德（靜海）、孫永鋒（獻縣）、于蘭渚（于方舟，寧河）、侯樹垣（寧河）、王者興（曲陽）、張樞敬（河間）、劉稷臣（寧河）、侯樹德（寧河）、王德萊（博野）、李廉祺（李希逸，寶坻）、胡九皋、朱漢章、盧碩棠（寧河）、謝寶光（天津）、李震五（河間）、張星五、李梅（天津）、王貞儒（天津）、于樹珊（靜海）、武恩詔（灤縣）、魏世麟、侯樹功（寧河）。</p> <p>熱河：盧煥章（平泉）、王富國（建平）、蘇亞文（建平）、盧文煥（建平）、盧文焯（建平）、劉作民（建平）、盧曉謙（盧東白，建平）、石之琳（建平）、韓麟符（赤峰）、韓政平（建平）、韓國禎（建平）、盧文挺（建平）、成蓬嵐（建平）、王俊賢（建平）、王開基（建平）、陳鏡湖（陳印潭，建平）、白庭桂（建平）、孫承恩（建平）。</p> <p>陝西：張寶泉、吳新民、馬價人、符秀、毛毓泳、雷震甲、張根泉、符如璋、崔溥、韋大同、崔浚、魏承恂。</p> <p>湖北：張昌旭。</p> <p>湖南：汪盛荻。</p> <p>安徽：楊立垣。</p> <p>福建：郭可詠。</p> <p>雲南：李師同。</p> <p>浙江：王濟眾、何雪。</p> <p>廣東：吳瑞燕。</p> <p>四川：呂培烈、馬汝邵。</p> <p>奉天：王鴻訓。</p> <p>不明：王鈞、宋乃明、蔣靜一、呂建齋、胡錫錄、曹恢緒、周宗蓮、趙廣湘、李延齡、孫亦訓、王乃寬、蔣國鈞、趙致中、楊叔九、梁樹芳、李發鈞、王識行、李萃。</p> |
|---|

資料來源：〈天津青年團國民俱樂部報告〉（1924/01/10），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漢 12975。

西部的土默特旗（今呼和浩特市）青年，不少人即在韓麟符介紹下入黨。²⁰ 這些包括韓麟符在內的內蒙古籍年輕學子，以北京的蒙藏學校為中心，於 1925 年 4 月成立了一個以土默特旗和喀喇沁旗人為主的「內蒙古革命青年團」，是中共在內蒙古地區的外圍組織。²¹ 無論如何，韓麟符、于方舟等人的同鄉關係確實在早期天津與內蒙古黨的組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總結地說，我們在本節中證實了，中共河北黨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紀律嚴明的列寧主義式政黨，黨員的結合雖然與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及群眾運動的熱誠不無關係，但地域性的既存社會關係則起了更關鍵的作用。這一點雖然證明了中共革命的在地化，但也必須強調的是，這些既存的社會關係有其兩面性。例如，當京、津黨員在 1925 年後伴隨著國民軍退出關外赴張家口等地活動時，他們發現，該地知識份子「鄉土觀念深極了，他們以為關內的都不是好人，外省人都不願意談話」。²² 這就證明了「傳統的個人聯繫可被用來作為小範圍的知識份子之間交流的渠道，但是，這些特殊主義的聯繫具有極大的局限

20 後來榮耀先還利用同鄉關係吸收了同樣在蒙藏學校求學的雲澤（烏蘭夫）、雲潤、多松年、奎壁等人入黨。關於土默特旗青年的入黨及其早年經歷，見：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 54–57；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頁 80–85；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pp. 290–299.

21 順便一提的是，由於韓麟符等早期熱河籍黨員日後多叛變，故當代學者在論及早期內蒙古地區的中共黨務時，往往較強調烏蘭夫等來自土默特旗的青年。然而，實際上烏蘭夫等土默特旗青年在當時的影響力並不大，而韓麟符等人所成立的「內蒙古革命青年團」在內蒙古地區所建立的黨部，亦是以熱河地區為主，而不是土默特旗。相關分析見：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pp. 279, 307–309.

22 〈張家口地方十二月份報告〉（1926/01/21），《河北文件 1》，頁 487。

性，無法作為大的政治組織的框架」。²³ 共產黨當然不甘心局限於這種小範圍的知識份子交流，如下所述，他們極力尋求各式各樣的上層關係，以及其他政治團體的合作，試圖突破此一局限。

二、早期河北黨內的上層份子

上層份子或上層人士是中共統一戰線的術語，在抗戰前後開始，如本文後半部闡述冀東根據地的發展時所示，該名詞便經常出現在中共統戰的文件中。根據中共上層統一戰線的規定，我們大概可以推測所謂上層份子係指「各黨派愛國領袖、國民黨愛國將領、地方實力派」。但此一說法很明顯是中共用來辯護其統一戰線的溢美之詞。因此，即使我們不可能給予該名詞一個明確的定義，但以下為方便論述起見，本文係從一個相對的視角來理解上層份子此一概念，即相對於群眾來說，它指的係菁英份子。又，相對於上節所述影響力局限在地方的年輕知識份子來說，它指的是如李大釗般影響力超越地方格局的上層政治人物。

李大釗，河北樂亭人，1889年生。早年在家接受傳統私塾教育，1905年赴直隸永平府（今盧龍縣）應試，應試期間清廷決議廢除科舉，李乃轉赴永平府中學接受教育。隔年，李考入天津法政專門學校。當時同盟會在天津的影響力頗大，許多青年學子在天津法政專門學校地理教師白毓崑（江蘇南通人）的影響下，投入革命活動，並參與其所創立之天津共和會，李大釗便是其中一位。²⁴ 但是，李大釗本人似乎不甚贊成同盟會激進的暴力手段（特別是當時被頌揚之個人英

23 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7。

24 凌鉞，〈灤州起義〉，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第2編 第5冊》（臺北：正中書局，1975，第三版），頁275。

雄主義式的暗殺與自殺手段)，²⁵ 他既未參加辛亥年間爆發於其家鄉冀東地區並由白毓崑等同盟會員領導的灤州起義，²⁶ 在民國肇建以後，李還站在清末立憲派和民初的進步黨人士湯化龍（湖北羅田人）、孫洪伊（河北天津人）的一邊，支持袁世凱的中央政府，反對國民黨激進派所宣傳的武裝革命運動。

1913年，李大釗在湯化龍等人的資助下赴日留學。留日期間，李與《甲寅》雜誌的創辦人章士釗結識，並在該雜誌上發表類似章氏「調和立國論」（既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也反對孫中山所代表的激進革命主義派）的主張。1916年李自日本回國以後，曾先後擔任《晨鐘報》（後來的《晨報》）、《憲法公言》、《甲寅》日刊、《每週評論》

25 清末革命黨人所以經常訴諸暗殺和自殺手段，與無政府主義之影響、專制政治之壓迫，和革命黨人所頌揚之自我犧牲的革命道德等因素有關。見：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73. 李大釗認為採取這類革命手段固然是由於當時不良政治下的「不獲已之舉」，但此種以暴制暴的做法，導致了群德的衰落以及民初政治的腐敗，實在是不可取也。〈暗殺與群德〉、〈原殺（暗殺與自殺）〉，原載於《言治》月刊，期2（1913/05/01）與期4（1913/09/01），轉引自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文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2-23、44-47。

26 灤州起義是由同盟會所領導發動的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該起義可分為「兵諫」與「北方軍政府」兩個階段。其中灤州兵諫是由駐保定的新軍第6鎮統制吳祿貞、駐灤州的第20鎮統制張紹曾與駐奉天的第2混成協協統藍天蔚於1911年10月所發動，當時吳、藍二人皆是同盟會員，張則是立場傾向革命的人物，他們乘武昌起義爆發之際向清廷提出12條改革政治的政綱，但最後仍以吳祿貞的遇刺和張、藍二人之被解除兵權而失敗。隨後，胡鄂公、王葆真、白毓崑等革命黨人成立了北方革命協會，積極策動時駐灤州的第20鎮下層軍官施從雲、王金銘等人發動兵變，並於1912年1月成立了北方軍政府，與南方革命軍勢力遙相呼應，但旋即遭到北洋軍鎮壓，白毓崑、施從雲、王金銘等人被捕遇害，灤州起義以失敗告終。關於灤州起義的詳細經過，可見：趙潤生、馬亮寬，《辛亥灤州兵諫與灤州起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的編輯，作為一位精神上的「政論家」而非行動上的「政治家」，²⁷ 持續對當代中國政治進行評論，並主要是為立憲主義發聲。當時他經常來往的對象，也是白堅武、張繼、章士釗等在北方政治圈中頗具影響力的上層份子，而不是下層民眾。

1920年4月，以吳廷康為首的俄共代表團抵達北京，他們經過北大俄籍教授鮑立維的介紹，認識了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隨後李大釗便被託付開展北方地區共產革命運動的任務，成為中共北方黨的創始人。筆者以為，共產國際代表團所以會找上李大釗協助創立中共北方黨，除了可能是由於李本人的「民粹主義」(populism)與無政府主義色彩，及其對下層平民教育和工讀互助運動的倡導外，²⁸ 也是由於李本人是一位在北方政治圈具有廣泛關係及深厚影響力的上層份子之故。日後的事實也證明，中共河北與北方黨最初的創建與發展，主要也應歸功於李大釗在上層政治圈而非下層民間社會的關係和影響力所致。²⁹

在創建中共北方黨的過程中，李大釗也找了不少和他類似的上層份子來幫忙。例如，在1920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李致信天津的劉清揚，希望她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劉清揚是天津人，生於1894年，父親是富裕的回族商人。與李大釗相同，劉於天津讀

27 〈政論家與政治家(一)、(二)〉，原載於《甲寅》日刊，1917年2月25日與3月2日，引自《李大釗文集1》，頁304-306、308-310。

28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pp. 25-26, 79-94.

29 關於李大釗入黨前的經歷，這裡是參考：張靜如編，《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朱志敏，《李大釗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至於對李大釗定位的爭議，可見：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What is Wrong with Li Dachao?"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pp. 56-74.

書期間也曾參加白毓崑組織的天津共和會。她的幾位兄長在當時皆是報界名流，與戲劇界有聯繫，也算得上是上層菁英份子。劉本人並未實際參加起義行動，但仍間接透過兄長的關係為白毓崑等人提供經費。³⁰ 民國肇建後，劉投入教育事業，任教天津達仁女校。五四運動時，她與第一女師的學妹郭隆真、李毅韜、鄧穎超等人組織女界愛國同志會，後來又進一步與南開中學學生周恩來、馬駿、李震瀛等人組織著名的「覺悟社」——一個帶有濃厚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團體。³¹ 1920年10月，當劉的愛人張申府自上海帶回組黨的訊息，並於隔月與李大釗創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後，當時他們所欲吸收的第一位黨員便是劉清揚。只不過劉因為即將赴法留學，拒絕了此一要求，直到1925年才再以中共北方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的身份重回北方活動，成為早期中共天津黨的重要領導人物。

早期中共天津黨中另一個重要的上層份子江浩。江浩，又名江注源，1880年生，河北玉田人，清末舉人出身。1908年赴日留學期間參與同盟會，後與王法勤、張繼、王葆真等人組織同盟會北京支部，並參加暗殺攝政王與灤州起義等行動。民國肇建後江當選眾議院議員，並兼負北方國民黨黨務工作，常在天津活動。1916年以後，江浩在「教育救國」的理想下，曾在其家鄉玉田先後創辦農餘校、女

30 劉清揚，〈辛亥革命時期的天津共和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六）》（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趙潤生、馬亮寬，《辛亥灤州兵諫與灤州起義》，頁192。

31 劉清揚早年的經歷及其與早期中共北方黨的關係，見：劉清揚，〈回憶建黨初期黨領導北方人民進行的英勇鬥爭〉，《河北文史資料》，輯2，頁1-22。關於覺悟社的組織及其思想狀況，見：譚小岑，〈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天津覺悟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579-597；片岡一忠，《天津五四運動小史》（京都：同朋舍，1982），頁41-42。

子小學、讀報社和息訟會等民間團體，也算得上是一位「進步」份子。1920年當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江浩與擔任吳廷康翻譯的張太雷皆參與其中，兩個人在早期中共天津黨、團的創建與發展中皆發揮了重要作用。³² 後來他的兒子江震寰、女兒江韻清、女婿王積衡及媳婦趙達，皆成爲早期天津和冀東地區共產革命運動的重要領導者，此與江浩的影響當然不無關係。³³ 除此之外，江浩還與另一位北方籍國民黨黨員李錫九³⁴ 在1920年接辦保定育德中學，如後文所述，該校乃日後中共冀中黨的搖籃，由此便可見得江浩在早期中共河北黨創建中的貢獻了。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上層份子在于樹德。1921年5月，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由於內部思想的混亂，暫時停止活動。隔年，爲恢復天津團，李大釗找上他在天津法政專門學校的老同學——于樹德。于樹德，天津靜海人，1894年生，在法政專門學校就讀時加入同盟會，也是白毓崑的學生以及天津共和會的成員。與李大釗不同，于樹德是一個行動派的革命者。1911年12月，于樹德與同爲白毓崑在天津法

32 李騰俊等著，〈江浩〉，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2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234-260；王積衡，〈江浩先生革命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3，頁9-12。

33 江震寰在1926年被奉系軍閥逮捕殺害；江韻清與趙達是早期天津婦運的領導者，國共分裂後皆回到冀東活動，後者在抗戰期間曾在延安活動；王積衡則是國共合作時期天津國民黨的成員，是否加入中共及其日後的事跡皆不詳。玉田縣志編纂委員會，《玉田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頁505-508；唐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唐山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頁3360-3361；王積衡，〈回憶大革命時期我在天津的一段經歷〉，《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3，頁1-8。

34 李錫九，1872-1952，河北安平人，同盟會出身，曾任眾議院議員，1925年加入中共。中共天津市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天津市組織史資料》（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1），頁16-17。

政專門學校的學生凌鉞等人，組織了一支敢死隊，赴灤州地區推動第20鎮第79標的兵變。當時凌鉞等人還曾試圖暗殺反對革命之第79標標統岳兆麟，負責執行此一任務者正是于樹德，但並未暗殺成功。³⁵

于樹德在民國肇建後重新當起學生，並於1916-20年間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儘管名義上僅是一位學生，但于從未放棄政治活動，他在留日期間便與童冠賢等南開中學留日學子創辦了「新中學會」。³⁶新中學會是一個以河北人爲主的北方國民黨左翼派系，在河北省尤其是天津市教師階層和下層工人群眾間具有廣泛的基礎，對一九二〇年代末期河北政局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³⁷不過最初新中學會是一個帶有濃厚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團體，于樹德本人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

于樹德在回國後，和同爲天津法政專門學校出身，並一同赴日留學，也同樣是新中學會成員的河北豐潤人安體誠在天津擔任教職。他們爲了實現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在天津創辦工人補習學校，是爲日後天津工運的先聲。1921年初，李大釗介紹于樹德以新中學會的代表赴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³⁸回國後，于即在李大釗的委託下恢復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地點就在天

35 凌鉞，〈辛亥灤州起義記〉，《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第2編 第5冊》，頁278-280；趙潤生、馬亮寬，〈辛亥灤州兵諫與灤州起義〉，頁188-191。

36 焦實齋，〈新中學會與新中革命青年社〉，《文史資料選輯》，輯119（北京，1989），頁1-20。

37 〈平津黨務整理意見書〉（1931/04），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會3.3/176.42。

38 于樹德早年的歷史見：中共天津市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天津市組織史資料》，頁15-18；《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07。

津法政專門學校。³⁹此後于樹德即成爲中共天津黨的重要領導人物，提拔了不少革命後進，如中共南皮縣最早的黨員張隱韜便是個例子。根據張的日記記載，他在天津擔任鐵路局見習警察時，與于樹德、安體誠來往密切，並曾赴新中學會的機關，由此推測張亦是新中學會之一員。⁴⁰後來張即是在于樹德的介紹下加入中共，並赴黃埔軍校學習。北伐時期回鄉秘密活動，被奉系軍閥當局逮捕殺害。

這些北方上層菁英份子的影響，並不僅限於河北，在整個北方地區早期中共黨務的組建和發展中皆可發現他們的蹤影。如五四時期的哈爾濱便有一個類似李大釗的人物叫鄧潔民。鄧是李大釗的河北樂亭同鄉人，辛亥革命前後就讀北京江文學校和天津南開中學，1914年赴日本東京留學，與李大釗結識。1917年鄧赴哈爾濱後，和河北樂亭同鄉武百祥等傾向教育救國並信仰基督教的改良者在哈爾濱從事教育活動，建立了東華學校，在哈爾濱的政治圈中發揮重大的影響力。當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開展以後，鄧本人雖然並未加入共產黨，但他與在河北活動的李大釗等人保持著密切聯繫，早期河北和哈爾濱的共產黨員如馬駿、張太雷等人皆曾受過其協助。可以說，鄧在哈爾濱的地位相當於李大釗在北京的地位，兩者皆被視爲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行者。⁴¹

再以山東爲例。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於1920年8月成立時，陳獨秀所能想到在山東建立共產主義小組者是一個叫王樂平的人。王樂

39 〈天津 S.Y. 成立致國昌的報告〉(1922/03/16)，《河北文件 1》，頁 1。

40 河北省南皮縣檔案館編，〈《張隱韜烈士日記》連載(-)〉，《歷史檔案》，1988 年第 3 期（北京，1988 年 8 月），頁 72。

41 James H. Carter, *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1-65.

平，山東諸城人，1884年生，早年曾參加同盟會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民國肇建後曾任參議院議員、山東省議會議員等職，並且還是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的主要領導者。五四運動前後，王在濟南開了一間齊魯書社，書社中經常聚集一群激進的知識份子探討國事，其中如王盡美、王翔千者，皆是王樂平的諸城同鄉，而且王盡美還是王樂平的親戚，他們後來皆成爲中共山東黨的第一代黨員。⁴²又，王樂平有一個大同鄉，山東日照人丁惟汾，也是民初山東政界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在同盟會、國民黨中的輩份都要高出王樂平許多，可說是後者的革命引路人。在二〇年代的北方地區具有極大影響力之國民黨左翼派系「三民主義大同盟」便是由丁惟汾糾合山東人所組成者。由於當時山東人在北京城中數量頗多，故該派系在北京也具有相當勢力。⁴³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丁惟汾的三民主義大同盟作爲國民黨一支左翼派系，一度與中共北方黨積極合作，兩者還曾一同攜手打擊由謝持、鄒魯所領導的民治主義同志會等國民黨右翼團體。⁴⁴

42 安作璋主編，《山東通史 現代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 16-22、763-764；丁龍嘉、張業賞，《王盡美》（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 23-35；丁龍嘉、張業賞，《鄧恩銘》（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 26-33。

43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225-226.

44 民治主義同志會大約成立於 1923 年，乃當時北京最大的國民黨右翼團體。中共北京黨對於該團體相當苦惱，曾試圖派人打入該團體予以分化。1924 年國民黨北京市黨部成立，由於該市黨部咸由共產黨員及張伯根、郭春濤等國民黨左派所掌控，民治主義同志會乃向國民黨中央控告選舉不公，並因此在國民黨內掀起一股聯共和反共之爭。1925 年以後，馮自由、鄧家彥等人組成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即西山會議派），其主要成員即民治主義同志會者。見：〈各委員報告〉，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下文引用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簡稱爲《中央文件》），頁 189；丁惟汾，〈國民黨北方黨務報告〉（1926/01/07），《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頁 272-273。民治主義同志會對北京市黨部選舉不公的控告，見：〈北京黨員王文彬等呈總理文〉（1924/07/01），黨史館：漢 9165。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雖然早期北方黨下層的主要基礎是張國燾等藉由私人關係糾合在一起的年輕學生，但實際的領導者卻是他們的老師李大釗等上層份子。也因為後者的影響力，北方黨的影響力才能夠跨出北京與天津市，並與整個北方地區革命者結成廣泛的網絡。

三、知識份子間的矛盾

可是，無論是同鄉關係，抑或李大釗等人在上層政治圈的影響，都不能算是有計劃與紀律的組織行爲，毋寧是非正式的私人交往。正因為如此，早期河北黨的組成與意識形態皆相當混雜。例如，1920年9月成立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便混入一些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組織等問題上與共產主義者發生衝突，旋即脫離中共。⁴⁵但眾所周知，無政府主義在隨後仍持續在中共黨內發生影響。

組織內部的混雜，也導致黨員就革命所應走的路線產生分歧。中共一開始設想走純粹群眾路線的革命道路，並在第一個綱領即宣稱要斷絕與「黃色知識份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關係」。⁴⁶但事實上很難做到，如前所述，許多早期的中共河北黨領導本身就在上層政治圈中相當活躍，要他們切斷與其他黨派的關係，走純粹的下層群眾路線，談何容易？

以張申府爲例。張是河北獻縣人，生於1893年，早年也與李大釗的同鄉郭人麟等同盟會革命黨員，以及民初政壇名人章士釗等來往密切。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發起前，他已是北大哲學系教授。據張自述，他是北京第一位共產黨員，和李大釗同是北京黨的發起人，劉清

45 〈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中央文件1》，頁14；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199-200。

46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央文件1》，頁3。

揚、趙世炎、周恩來，以及朱德等中共名人都是他介紹入黨的。1921年，他以蔡元培私人秘書身份，偕同蔡元培赴法國，後來組織了巴黎中共小組。但張只把共產黨當作一個朋友的團體，而非有紀律的政黨組織。他不贊同激進的群眾路線，嘲弄同時期在法國蒙達尼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等共產主義者發起的抗爭運動，招致蔡和森等人的仇視。後來蔡和森、陳延年、尹寬等人主導成立少年中國共產黨，決議驅逐張申府出黨。張申府以為這些人不過是他的學生，竟敢造次，勃然大怒地咆哮：「你們敢？如果陳獨秀是我，你們敢把他逐出共產黨嗎？」周恩來與趙世炎雖然也贊同蔡和森的激進路線，但又不敢違背張申府，只能緘口不言。最後，共產國際否定了蔡和森等激進學生的主張，改組少年中國共產黨為中共旅歐支部，並委派張申府為通訊員。⁴⁷

年長一輩的領導者反對他們學生所主張的激進路線，類似的世代衝突也發生在中國黨內，特別係圍繞在即將展開的國共合作議題上。原來，根據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規定，在殖民地與落後國家中的共產黨必須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同時，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的聯盟，並投入反抗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解放運動。⁴⁸ 會後，共產國際派遣馬林（原名 Hendrius Sneevliet）前來中國尋覓值得合作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當時馬林看上的是在華南地區頗具勢力之孫中山的國民黨。而中共中央後來也在馬林的催促下，先後於1922年7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大）和1923年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三大）上通過「民主聯合戰線」和「國民運動」的方案，

47 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4–123.

48 〈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國際檔案2》，頁138–147。

指示黨員與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合作，並加入國民黨，推動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運動。⁴⁹

儘管如此，不少地方黨員，如北京黨成員張國燾，依舊堅持走工人運動的路線，反對共產國際推動的國共合作。張國燾甚至辯稱：「北方沒有國民黨組織，也就談不上支持它」。當時不少黨員支持張國燾的立場，他們還組織了一個以張國燾為首、並以北京黨黨員為主的「小團體」，在黨內發揮重大的影響力，以至總書記陳獨秀差點為此就幹不下去了。⁵⁰ 至於向來即與國民黨和上層政治圈相處融洽的李大釗則是在此一衝突中採取了毫不令人意外的調和立場，他雖同情張國燾等人的某些看法，但基本立場仍是附和馬林，後來張國燾也在李大釗的調和下讓步了。⁵¹ 儘管如此，反對國共合作的聲音始終存在於北京

49 〈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中央文件 1》，頁 64-66、146-147。關於馬林和國共合作的推動經過，可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86-90；Tony Saich, e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E. J. Brill, 1991), pp. 1-198.

50 "Letter from H. Sneevliet to G. Zinoviev, N. Bukharin, K. Radek and G. Safarov" (1923/06/20), in Tony Saich, e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pp. 612, 616;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9-13。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則辯稱此一小團體實乃子虛烏有的污蔑。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1 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 239。但陳獨秀當時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證實了此一團體的存在，說張國燾「在黨內組織小團體，是個重大的錯誤」，但他也承認張「無疑對黨是忠誠的」。〈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央文件 1》，頁 172。關於張國燾小團體事件的探討，還可見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pp. 108-110.

51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1 冊，頁 243。李大釗個性傾向調和，張國燾對此也有些不滿。後來他於 1929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講課稿中就提到，中共籌建時期，他與陳獨秀堅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但李大釗傾向調和，「有些動搖」。陳獨秀甚至還寫信跟張國燾說：「如守常（按：即李大釗）動搖，就不客氣地開除他。」張國燾

黨內，在 1925 年時中共北方區委仍批判：「北方雖然有幾個『老』黨員（按：『』為引者所加）可以算是左派，但他們向來少注意到群眾的工作，不能在黨中形成有實力基礎的左派。另一方面，他們正因為自己沒有抓住廣大群眾和別種感情，對於右派反動的行動，不取『一刀見血』的手段去反對，而還持觀望的態度游移不定。」⁵² 這裡所謂的左派「老」黨員，當係指與共產黨積極合作的徐謙、丁惟汾，以及跨黨黨員于樹德、江浩等人。此一批判言論正突顯了世代衝突一直存在於北方黨內。⁵³

然而，究其實，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皆屬於菁英階層，張國燾等初出茅廬的革命者也不能算是下層群眾。伴隨著政治經歷的累積，這些年輕的知識份子黨員終將成長為如李大釗般的上層份子。早期中共北京黨與另一位頗具影響力的上層政治人物胡鄂公的關係，正足以說明張國燾等人的曖昧色彩。胡鄂公，即胡南湖，湖北江陵人，與民初的北方政治圈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早在灤州起義之際，應北方革命黨人之請，黎元洪領導的湖北軍政府派遣胡鄂公攜帶鉅款前去援助與

在這裡把自己抬到李大釗之上，這點有待商榷。但這段史料也足以讓我們一窺李大釗的性格及其與張國燾的不同。K. B. 舍維廖夫提供，〈張國燾關於中共成立前後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 年第 2 期（北京，2002 年 2 月），頁 54–55。

52 〈我們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1925/11/25），沈雲龍主編，《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依據 1927 年京師警察廳編譯會所編版本影印出版），頁 900–901。

53 關於清末民初和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中的世代差距問題，可見：Andrew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8–13;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23–24.

領導北方革命。1911年12月，為推動灤州兵變計劃，王葆真、白毓崑等革命黨人在天津成立北方革命協會，作為北方各革命黨組織的聯合機構，胡鄂公被推舉擔任該協會的會長。⁵⁴ 民國肇建後，胡曾先後擔任國會議員、北洋政府教育次長等要職，持續在北方政治圈中從事活動。當共產黨創建之初，胡鄂公曾在北京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出版《今日》雜誌。後來該組織改名「共產主義同志會」，並曾寄報告給共產國際，自稱於1922年2月16日正式成立，由胡鄂公任書記，有一萬多名之正式會員，其最終目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及世界共產主義共和國」。⁵⁵

除了是一位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外，如李大釗般，胡鄂公也是許多年輕共產主義者的恩師益友。據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的回憶，許多赴北京求學的湖北籍知識份子經常接受胡鄂公和另一位被中共驅逐出黨並同樣在北京政治圈活動的鄂籍黨員李漢俊的幫助，胡等人還與陳潭秋領導的中共武漢黨有密切的聯繫。⁵⁶ 在1923年7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黨員提案接受胡鄂公入黨，引起激烈的爭辯，最後中共中央以胡是國會議員，並且有幫助曹錕賄選之嫌疑，拒絕其入黨的要求。⁵⁷ 有趣的是，提出此一提案的人是高君宇，他是反對與國民黨合作之張國燾小團體的成員之一。⁵⁸ 由此看來，張國燾及北京的年

54 關於胡鄂公於辛亥期間在北方地區的革命活動，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第2編 第5冊》，頁183-240；趙潤生、馬亮寬，《辛亥灤州兵諫與灤州起義》，頁176-185。

55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3-4。

56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62。

57 〈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紀要〉，《中央文件1》，頁183-185。

58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頁12-13。

輕知識份子黨員是否完全是站在擁護下層群眾運動的立場才反對與國民黨的合作，令人懷疑。

再者，即使張國燾等年輕知識份子黨員不贊同國民黨介入下層工人運動，但眾所週知，學生是一種身份而不是職業，它既缺乏經濟資源，政治角色也難以定位。因此，這些知識份子如希望有所作為，他們就不得不尋求其他社會各階層，以及政治團體的援助。⁵⁹ 又，這些熱中於群眾運動的知識份子黨員終將發現，下層群眾與其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權益，毋寧更希望藉由上層政治的力量去滿足自身的需求。而且，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式各樣之政治黨派，在共產黨成立以前，早已插足下層群眾運動當中了！

第二節 建黨初期北方地區的工人運動

一、政治化的無產階級

早期的中共河北黨中，除了知識份子以外，也有少部分工人出身的黨員，如當時中共正太路工運領導者孫雲鵬便是個例子。孫乃天津人，早年曾在長辛店京漢路機械廠和天津北洋鐵工廠做工，1905年後在石家莊正太路總機廠當工匠。當北京共產主義者開始在長辛店從事工人運動以後，孫亦透過好友史文彬、王俊（兩者皆是早期中共在京漢路的工運領導者）與北京的共產主義者發生關係，並旋即由羅章龍介紹加入共產黨。1922年底，共產黨在孫雲鵬的幫助下，成功發動正太鐵路工人罷工，獲得勝利。只不過參與罷工的工人大多是藉由同

59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13-17。

鄉關係組成並由孫雲鵬所領導之「戒煙酒會」中的「禮民」，他們「並不是了解我們（按：指中共）的主義，係孫雲鵬將他們以感情請進來的，所以他們都是孫系，只是認識孫個人不認識團體，加入後從無訓練，對於團體和主義一點不明白」。⁶⁰ 似此透過某些群眾領袖動員下層群眾的作法，是當時中國群眾運動的一個特色。⁶¹

所以，下層群眾參與運動並不必然代表其有任何政治覺悟，甚至那些作為中介者的群眾領導亦是如此。這些群眾領袖，如孫雲鵬般，常常與上層政治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唐山的鄧培為例。鄧培，廣東三水人，1883年生，14歲時隨舅父到天津德泰機廠當學徒，1900年滿徒出師，到京奉路唐山機廠作工匠。唐山機廠中有許多工匠是廣東人，他們是唐山工人中的廣東幫，鄧培便是此一廣東幫的領袖人物之一。⁶² 後來中共透過鄧培的關係，吸收了梁鵬萬、阮章和王麟書等重要的唐山工人領袖入黨，⁶³ 並在1922年10月進行為期八天的罷工，迫使廠方答應工人所提的大部分經濟要求，獲得了勝利。

鄧培這些人固然是工人，但從他們的經歷中，我們又注意到這些人不是單純的「工人」，如梁鵬萬與阮章便是知識份子出身。可是，

60 〈伯莊關於保定、正定、石家莊等地考察情況的報告〉（1925/05/12），《河北文件23》，頁6。

61 關於孫雲鵬的歷史及早期石家莊工運的發展，見：劉一身，〈孫雲鵬〉，《黨史人物（一）》，頁238-267。

62 王士立，〈鄧培〉，《黨史人物（一）》，頁66-67。

63 梁鵬萬，廣東中山人，南開大學肄業，早期中共工運領袖，後背叛，1951年被中共處死；阮章，廣東人，曾就讀南開高中，京奉路唐山廠工人領袖；王麟書，唐山人，鄧培的徒弟兼女婿。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864；《唐山市志》，頁3344-3345；羅章龍，〈緬懷早期北方工人運動的幾位戰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9（天津，1984），頁8-12。

由梁等人所代表的唐山工人與唐山交通大學學生組成的唐山團中，卻存在著嚴重的工學界線。⁶⁴ 當時唐山團站在工人一方，批評工學衝突乃肇因於交大學生的「自由浪漫色彩」，及其對黨的主義的不了解。⁶⁵ 事實上梁等「工人」亦相當傲慢，梁後來到廣東工作時，便因此引起廣東黨團同志的不滿。⁶⁶ 再者，鄧培原來也曾是一位同盟會員。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鄧培就已加入同盟會，並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募款；民國肇建後，孫中山曾藉探視同鄉的機會來唐山南廠活動，並成立了「華民工黨」的組織，鄧培也列名其中，仍然是一位孫中山的追隨者。⁶⁷ 可以說，鄧培是一位政治化的工人。

工人、農民等下層群眾選擇與上層政治黨派合作，也反映了他們對自身力量的不信任。正如後來駐華共產國際代表的分析般，大多數

64 1924年唐山團的組成中，有45位京奉路製造廠工人與21位唐山交通大學學生，其中梁鵬萬負責組織工作。〈唐山團的組織情況報告〉（1924），《河北文件1》，頁216。

65 〈試卷第一號〉（1925/06/22），《河北文件1》，頁261。

66 梁鵬萬日後在香港工作時，與當時社青團廣州領導阮嘯仙發生了衝突。阮批評梁「輕視學生，分開界線」，甚至還「當眾宣言學生靠不住，很為工人吐氣的樣子」；梁則反批評粵區團「做事太懦」、「以擴地盤為目標」，甚至虛報人數等等。〈嘯仙復實庵信〉（1923/09/30）、〈梁鵬萬致仁靜信〉（1923/10/20）、〈梁鵬萬致中夏信〉（1923/10/27），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下文引用之《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廣東文件》），頁105、126、150。梁鵬萬在香港的活動可見：Kit-ching Chan Lau,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 32-36.

67 〈鄧培參加同盟會和支持辛亥革命〉、〈鄧培參加華民工黨〉，《黨史人物(-)》，頁109。還有，根據羅章龍的回憶，民國初年另一個在北方亦有相當勢力的政治團體——由陳翼龍組織的社會黨，亦曾在唐山工人間發展。但鄧培並沒有加入社會黨。〈羅章龍教授談唐山、開灤五礦罷工〉，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輯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243-244。

的中國群眾並不習慣自己當家作主，他們認為政治是少數集團和個人的事業，群眾只能響應這些少數政治家的號召而已。⁶⁸ Sidney D. Gamble 在他於 1910 年代末對北京市的調查也指出，老百姓由於缺乏教育與經驗，所以根本無從自助，僅能依賴官員發起改革，特別是高級的官員。⁶⁹ 換句話說，工農群眾因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選擇與政治黨派合作，希望藉由後者的力量來滿足自身的需求。

以中共北方黨最自豪的鐵路工人運動為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工人群眾並不如中共設想般先進，當時北方路工「依靠政治的心理非常之深」，他們「總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總以為政治勢力是非常可怕，必視一軍事勢力作靠山，以相排擠」。⁷⁰ 而負責與上層政治黨派接頭的工人團體領袖，也常常藉此機會上下其手，為自己謀取利益。根據包惠僧的回憶，北方鐵路工人間存在著許多依地域關係所劃分的「幫」，如福建幫、湖北幫、安徽幫等等，當時中共是透過這些「幫」的領袖之關係打入到群眾當中，如經常為學者們所提起的林詳謙便是福建幫領袖，其他還有同屬福建幫的周達光，湖北幫的楊德輔、周天元，江南幫的黃桂榮與曾玉良等人，皆是當時與中共合作之「幫」的領袖。⁷¹ 事實上，鑒於鐵路在戰事上的重要性及其龐大的收入來源，其他各政治黨派亦試圖與這些工人領袖合作以擴展其在鐵路系統中的勢力。工人領袖本身亦懂得利用這些政治資源，或是販賣鴉片、勒索

68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29/09/30），《國際檔案 8》，頁 168。

69 Sidney D. Gamble, *Peking*, p. 69.

70 〈河南工運報告〉（1927/10/03），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2》（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4，下文引用的《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河南文件》），頁 130。

71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頁 387。

運商，或者藉此擊敗其他工人派別，以擴張自身的勢力。⁷²

工人內部幫派的存在，及其與政治黨派的合作，正足以證明既存的網絡與關係，雖然有助於小團體的結成，但事實上卻撕裂了整個中國社會。早期北方黨利用個別的群眾領袖與幫派關係，去動員群眾，但未進一步予以改造，結果亦不能不使自己受到這些領袖與幫派界線的束縛，而且不自覺地捲入地方政治的派系衝突之中。

二、共產黨領導下的北方工人運動

1922-1923 年間，中共北方黨再透過吳佩孚的關係，聯絡工人群眾團體的領袖，掀起一波北方鐵路工人運動的高潮。吳佩孚乃直系軍閥的首領，自 1920 年直皖戰爭直系擊敗段祺瑞的皖系後，北京便成為直系的禁巒，直迄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為止。當時許多北方地區的知識份子視吳佩孚為一位「開明軍閥」，甚至早在 1920 年直皖戰爭之際，便有不少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大學生站在吳佩孚的一邊，支持其所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吳廷康等國際代表也同意大學生的立場，只要他們不因此放棄青年團的獨立組織即可。⁷³ 事實上，中共最初對吳佩孚的態度亦相當曖昧，他們認為吳佩孚和張作霖雖然都是妨礙民主政治的軍閥，但前者好過後者。⁷⁴ 其中向來與北方政治人物極為相善的李大釗亦認為胡適等人提出的以吳佩孚為領導的「好人政府」之主張，在當時的混亂局勢中亦是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⁷⁵

72 〈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7/11/24)，《河南文件 2》，頁 326。

73 〈魏金斯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08/17)，《國際檔案 1》，頁 34-35。

74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1922/06/15)，《中央文件 1》，頁 40。

7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1 冊，頁 232。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驅逐張作霖的奉系勢力出關外後，進一步試圖肅清在北方鐵路中具有雄厚勢力之親奉的交通系。李大釗乃乘此機會透過其好友白堅武（同時也是吳佩孚的重要幕僚）的關係，向交通局長高恩洪建議在北方的鐵路派設「密查員」。⁷⁶隨後，李大釗便在吳佩孚的默許下，介紹了許多中共黨員（主要是北京黨成員）赴各路擔任密查員，共黨在北方鐵路工人間的勢力因此大增，此即陳獨秀在1923年三大上報告中所謂中共與吳佩孚為反對交通系而結成的短暫合作關係。⁷⁷然而，中共勢力的擴展，引起吳佩孚的不安，他害怕工人罷工會影響其收入來源。最後，吳佩孚不得不與中共分道揚鑣，並於1923年2月7日血腥鎮壓京漢鐵路之工人罷工，此即著名的二七慘案。⁷⁸當時那些與中共合作的工人領袖最初確曾希望藉共黨之力以維持自身的地位，並透過中共領導的罷工來提高工人工資以增加各幫的收入，故亦願意與中共合作。然而，當罷工失敗後，許多工人領袖便與中共分手，甚至由於利益分贓不均，導致兩者不合。⁷⁹其中還有如鄭州工人領袖劉文松者，從此走上反赤的道路，成為中共眼中「藉工會造私人勢力的工賊」。⁸⁰由此可見，建立在私人情誼、政治權謀，以及利益交換之上的合作關係，本身是極其不穩固的。

無論如何，失去吳佩孚的支持後，共產黨在北方工人群眾間幾乎

76 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581。

77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央文件1》，頁169。

78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6-207.

79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p. 114;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頁399-400。

80 〈河南省委致京總黨團的信〉（1927年10月16日），《河南文件2》，頁179。

無能為力，直到 1925 年後，北方黨才再度在國民軍的掩護下掀起另一波工運高潮。關於中共與國民軍合作的開展，我們將留待下節再述，這裡僅先簡單地談談共產黨如何利用國民軍的關係去開展北方的工人運動。首先，以天津的工人運動為例。事實上，早自五四運動以後，便有不少共產黨員試圖打入天津的工人群眾中，如新中學會出身的成員于樹德、安體誠等人便曾在天津成立工人工餘補習學校，年輕一輩者如于方舟、李培良、安幸生、盧碩亭等人，自于樹德、安體誠轉移至浙江等地活動以後，接續了他們的工作，在天津辦理平民學校，吸收不少紗廠工人。這些共產黨員最初也是利用工人的同鄉關係打入其中，如李培良等人即利用工人項瑞芝的同鄉關係打入日資裕大紗廠，並於 1925 年 8 月成功動員該廠工人起來罷工，只不過由於直隸督軍李景林之鎮壓而失敗。⁸¹ 1925 年底，與中共合作的國民軍第三軍孫岳部接收天津。儘管該軍本身仍「未脫卻軍閥的實質」，且孫岳本人亦恐懼民眾勢力的發展，但中共天津黨仍是乘此機會掀起了另一波工運高潮，甚至公然掛出天津總工會的招牌，直迄隔年 3 月奉系勢力驅走國民軍、進入天津後，天津工運才復走入消沉。⁸²

與此同時，石家莊工人運動也在國民軍的掩護下重新開展。如前所述，中共在 1922 年時曾藉由孫雲鵬的關係發動正太鐵路罷工運動，

81 司呈祥，〈參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動的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10（天津，1980），頁 75–85；項瑞芝，〈記一九二五年砸裕大事件的前前後後〉，《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10，頁 116–121。

82 〈田錦報告（特別的）〉（1926/01/04）、〈二月份報告（田錦）〉（1926/02）、〈瑞關於天津環境不良工作停頓致曾延的信〉（1926/03/23），《河北文件 1》，頁 437、519、525。關於此一時期天津工運的發展，還可見：Gail Hersht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2–220.

但在 1923 年二七事件後，孫雲鵬離開石家莊，該地工運因此沒落。1924 年底時，石家莊周圍地區是屬國民軍第三軍孫岳部的駐地，雖然孫雲鵬當時已離開石家莊，但中共仍派遣王斐然、高克謙、袁子貞和傅茂公（彭真，山西曲沃人）等幹部赴該地，試圖在孫岳部的掩護下發動正太路和石家莊大興紗廠的工人運動。然而，在 1926 年後，孫岳部由於奉系的壓迫撤出石市，石市工運也由此再度沒落，共產黨員高克謙等人被捕處死，彭真則被迫逃至天津活動，成為日後中共在天津、唐山地區的工運領導人物。⁸³ 至於鄰近石市的井陘煤礦，由於國民軍在該地仍有相當勢力，故中共井陘縣委甚至在 1927 年國共正式決裂後，仍然能夠在國民軍第三軍地下黨員李斌的掩護下持續活動，直迄 1928 年井陘縣委由於環境之壓迫而被迫撤銷為止。⁸⁴

北方黨單純依恃他人提供的政治掩護與私人關係去動員群眾的作法，本身就宣告其所發動運動的短壽。更嚴重的是，中共在此過程中，正不自覺地捲入到一場政治權謀與派系衝突當中，慢慢地喪失了其原初抱持的共產革命理念。

第三節 北方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

一、共產國際與北方革命

張國燾等激進的年輕革命者為國共合作妥協了其一開始所堅持的群眾路線，工人運動也必須配合整個政治局勢，結合某些政黨軍隊或工人領導才得以發動。這些做法，使得群眾運動與中共本身成為某些

83 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37-46。

84 中共井陘礦務局委員會，《石家莊黨史資料 輯 5 井陘煤礦工人鬥爭史》（石家莊：出版者不詳，1987），頁 20-29。

政治派系的附屬，他們不敢公開自己的政治面目，甚至逐漸地拋棄了階級鬥爭的理念，結果便使自身不自覺地融入到北方（以至於整個中國）的政治權謀與派系的衝突當中，失去了獨立性。國民革命正是此一過程的具體表現。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革命運動自開展一始，便與共產國際推進世界革命的使命，以及維護蘇聯在華利益，息息相關。⁸⁵ 當 1920 年前後北方的共產主義運動萌芽之初，經常在北京活動並與當地中國共產主義者接觸的各式各樣國際代表中，有蘇聯派駐北京的外交代表如優林、作為海參崴聯共遠東局外交科的代表吳廷康，以及來自赤塔的遠東共和國的代表等人。這些代表的活動，特別是赤塔的代表，往往受到蘇聯在華北的利益所支配，其主要目的便是培養與支持一支政治軍事團體，與親日的張作霖抗衡，並進一步建立一個親蘇的、以北京為首都的中國政府。⁸⁶ 此一使命，反映了更多政治的權謀，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念。

1922 年前後，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華南地區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展開談判之際，莫斯科內部也有不少人建議在北方地區與吳佩孚進行類似的合作關係，其中如越飛者還建議由北方的吳佩孚和南方的孫中山聯合建立一個中國政府。⁸⁷ 李大釗對此亦撰文呼應，他不僅為吳佩孚的「軍閥」身份辯解，說中國現狀「倒不在於因有軍閥而苦惱，苦惱的倒是沒有真正好樣的軍閥」，而且還暗批孫中山動員民眾的辦

85 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p. 22.

86 Harold R. Issacs and Albert Treint, "Document 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5 (Jan.-Mar. 1971), pp. 102-103.

87 〈越飛致孫中山的信〉（1922/09/15）、〈越飛致馬林的信〉（1922/09/18），《國際檔案 1》，頁 127、130。

法固然好，但「並不那麼容易」，最後還說什麼「統一政府的出現已是必然的明顯的事實」，⁸⁸ 這顯然是為共產國際湊合孫、吳組織聯合政府的政策做宣傳。後來北方黨在直系掩護下發動北方工人運動，也與此一聯吳政策有關。但是，孫中山最後仍不願放棄聯合張作霖反對吳佩孚的立場（甚至還為共產國際極為痛恨的親日派張作霖說話），⁸⁹ 莫斯科也疑懼吳佩孚日後可能北向蒙古發展而與蘇聯發生衝突，⁹⁰ 加上 1923 年二七慘案的爆發，致使共產國際決定放棄在北方地區聯合吳佩孚的計畫，而專心致力於以華南地區為中心的國共合作。

吳佩孚從可能的朋友轉變成為敵人，對北方地區共產革命運動的發展造成嚴重的打擊。自 1923 年二七慘案爆發後的兩年內，北方地區的共產黨活動受到吳佩孚白色恐怖的打壓，甚至在 1924 年 5 月之際，北京與天津黨、團還由於張國燾的被捕致名單洩露，不得不重新改組（如北京團的「公開解散，秘密另組」），⁹¹ 不少舊黨員也因此紛赴外地避難（如李大釗赴莫斯科），⁹² 而由趙世炎、劉伯莊、李季達、粟澤等甫自歐洲、莫斯科歸國的黨員接替他們的工作。與此相反，華南地區的共產革命運動則是在國共合作關係的掩護下，突飛猛進。此一情形再度說明革命的發展與政治局勢的變遷密切相關。過去相當強

88 〈就孫、吳兩氏統一中國的方策與《北京周報》記者的談話〉，原載於《北京周報》（日文），號 33（1922/09/17），轉引自《李大釗文集 4》，頁 227-230。

89 〈孫中山給越飛的信〉（1922/11/02）、〈孫中山致越飛的信〉（1922/12/20），《國際檔案 1》，頁 144-146、166-167。

90 〈越飛致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摘錄〉（1923/01/26），《國際檔案 1》，頁 209-210。

91 〈1924 年北京地方團公開解散、秘密另組及審查合格的團員名單〉，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的足跡——北大地下黨有關史料選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51。

92 馬熙群等，〈李大釗〉，《黨史人物（一）》，頁 29-32。

調下層群眾路線的張國燾此時所以轉變態度，贊同國共合作，⁹³也是意識到革命者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空談革命的緣故。

1925年前後，北方政局又有了一大丕變。還在前一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之際，原屬直系將領的馮玉祥、胡景翼和孫岳發動政變，致使直系失敗，吳佩孚被迫離開北京，馮等人亦於隔月在北京成立了黃郛的攝政內閣，驅逐清廢帝溥儀出京，此即「北京政變」。隨後，馮玉祥等人改編自己的部隊為國民軍，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慨然允准，公開號召國民會議，主張在北京成立國民會議預備會，以為中國的臨時政府。

對於馮玉祥的北京政變與孫中山的北上及其所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儘管當時中共黨內頗有異議，如負責北方區委的趙世炎就認為「倘若沒有堅持第一次大會（按：指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政綱的決心，倘若完全受右派為官為宦的包圍，到北京只做元老、只做三角同盟事業」，那麼「孫中山是不可以到北京」的。⁹⁴但當時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加拉罕等人則贊成孫中山北上與國民軍合作，以開展北方地區國民革命運動，中共中央也因此決意支持孫中山北上。⁹⁵至於趙世炎的主張後來也為北京黨否絕，⁹⁶中共中央（實際上是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為了因應此一新的局勢，還特地於1925年底成立由李大釗所領導的北方區委推動北方地區的工作。⁹⁷

93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頁357。

94 趙世炎，〈孫中山可以北來麼？〉，趙世炎主編，《政治生活》，期20（北京，1924年11月7日）。

95 〈鮑羅廷關於國民黨的書面報告〉（1925/01/24），《國際檔案1》，頁566。

9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頁364-372。

97 〈魏金斯基致加拉罕的信〉（1924/12/07）、〈魏金斯基致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1924/12/19），《國際檔案1》，頁558、562。

而共產國際亦於 1925 年初開始對國民軍進行軍事援助，如派遣以伏龍芝為領導的軍事教官團協助國民軍在張家口和洛陽設立軍事學校，並給予國民軍金錢、武器上的實際支援等等，⁹⁸ 甚至還在北京設立一個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為主席的機構領導中國的軍事工作。⁹⁹ 無論如何，北方地區的國民革命運動，自此以後便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二、國民革命時期北方地區的上層統一戰線

事實證明，也正是在馮玉祥國民軍的掩護下，河北省的革命運動得以暫時擺脫過去直系白色恐怖統治下的低迷狀態，獲得巨大的發展，如前節所述之 1925 年天津工人運動的復興便是個例子。

但是，共產黨與馮玉祥之間仍互相疑懼。在天津，儘管中共依賴孫岳的力量重豎起天津總工會的招牌，但該部實際上仍「未脫卻軍閥的實質」，孫岳本人也害怕民眾勢力的發展。¹⁰⁰ 保定共青團亦指出，國民軍並不是民眾的武力，甚至還有拉夫、拉車等壓迫民眾的行為，只不過「現在不必遽於攻擊，以至破臉而不可收拾」。¹⁰¹ 在馮玉祥方面，當 1925 年底郭松齡失敗以後，馮玉祥曾一度對反奉之事轉趨消極。1926 年初，布勃諾夫所領導之聯共中央政治局赴華使團曾要求馮

9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 52 號記錄〉（1925/03/1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2 號記錄〉（1925/05/2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3 號記錄〉（1925/06/05），《國際檔案 1》，頁 582-583、624-627、630。

9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1 號記錄〉（1925/04/17），《國際檔案 1》，頁 604。

100 〈田錦報告（特別的）〉（1926/01/04）、〈二月份報告（田錦）〉（1926/02）、〈瑞關於天津環境不良工作停頓致曾延的信〉（1926/03/23），《河北文件 1》，頁 437、519、525。

101 〈葆亭西外工作計劃〉（1926/01/11），《河北文件 1》，頁 449。

玉祥作出一定政治保證，並簽訂同意設立政治部等政治協議，但馮玉祥一方面既害怕共產黨奪取其軍隊的領導權，並用對付蔣介石的方式來對待他，另一方面馮又害怕表現得太紅而與張作霖開戰，故拒絕了此一要求。¹⁰² 對於馮玉祥的態度，固然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存在著許多不滿的聲音，然而，鑒於張作霖與日本勢力在華北地區的日趨擴展，蘇聯為維持其自身在北方地區的利益起見，也不得不對馮玉祥採取妥協立場，¹⁰³ 並且批評中共在北京所持的路線過左，而主張在北京建立一個「只能是有馮玉祥、國民黨和其他各種溫和派參加的聯合政府」。¹⁰⁴

毫無疑問，在國際的指示下，當時中共北方黨所注重的是上層統一戰線，而不是下層的群眾運動。以內蒙古地區的國民革命運動為例。如前所述，早期中共河北黨曾藉由韓麟符等地方黨員的關係，吸收不少熱河籍（尤其是韓的家鄉喀喇沁旗）與土默特旗的青年學子加入共黨，而且還在內蒙古地區組織了一個內蒙古青年團的共黨外圍團體。值得注意的是，喀喇沁旗由於自清朝中葉以來的「文化的北向移民」，已成為內蒙古漢化最深的地區，土默特旗同樣也是漢化相當深入的地區——不少人甚至連蒙語也不會講。¹⁰⁵ 韓麟符「內青團」所吸收的成員主要是來自這兩個地區，這就表明了中共在內蒙古地區的影響力僅限於漢化較深的地區而已。然而，廣大的內蒙古地區仍是以

102 〈加拉罕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02/11），《國際檔案 3》，頁 77。

103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頁 75-76。

10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 93 號記錄〉（1925/12/03），《國際檔案 1》，頁 742。

105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pp. 285-286, 320.

非漢化地區爲主。因此，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北方黨爲了在北方地區推動更廣泛的統一戰線，決定放棄韓麟符等較年輕學子組成的內青團，試圖與另一個由白雲梯等在內蒙古地區具有更豐富之政治閱歷及人脈關係，並且與國民黨關係較爲密切的老一輩民族主義者合作。

白雲梯，蒙古族人，1892年生，他也是喀喇沁旗人。清末時期，該旗的親王貢桑諾爾布（1870年生，簡稱貢王）因深感新式教育的重要性，乃在家鄉創辦崇正學堂等新式學堂，並派遣該旗青年赴日留學，希圖藉由推廣新式教育以解放蒙古族。民國成立後，貢王被袁世凱任命擔任蒙藏事務局（蒙藏院）總裁，他藉職務之便於1913年成立了北京蒙藏學校，繼續推廣其教育救族之理想。¹⁰⁶ 白雲梯便是蒙藏學校出身的民族主義者，他與同爲蒙藏學校出身的包悅卿，以及被貢王派赴日本留學的金永昌等人結合，以蒙藏學校爲中心，吸收了來自呼倫貝爾的達斡爾蒙古人郭道甫、福明泰等同樣傾向透過教育解放蒙古族的進步知識份子，並藉其在北京政治圈中的影響力，結成了一個帶有濃厚之泛蒙古主義色彩，並親近國民黨的內蒙古民族主義者網絡。¹⁰⁷

很明顯的，白雲梯等內蒙古民族主義者的影響力，韓麟符等年輕共產主義者難以望其項背。因此之故，當北方地區國民革命運動開展以後，共產國際放棄了韓麟符而支持白雲梯。後來也正是在共產國際

106 喀喇沁旗志編纂委員會，《喀喇沁旗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1252-1255。

107 關於白雲梯等蒙古族民族主義者早期的歷史，見：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pp. 78-242. 白雲梯的傳記可見：赤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赤峰市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頁3238-3240。

的催促下，白雲梯等人於 1925 年 10 月在張家口成立了以白雲梯、郭道甫等人為領導，並包含年輕的內蒙古共產主義者在內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以下簡稱內人黨）。該黨成立的目的，便是為了推動內蒙古地區的國民革命運動以及與馮玉祥國民軍的統一戰線。然而，內人黨與國民軍的結盟純粹是利益的結合，馮玉祥欲藉白雲梯等人之力與外蒙和蘇聯聯絡，並動員內蒙地方軍事力量助其擊敗奉軍；白雲梯的內人黨也並未因此放棄其泛蒙古主義的終極目標——一個始終存在於莫斯科、馮玉祥與中共心中的疙瘩。¹⁰⁸

中共作為此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同樣被要求加入以白雲梯為主導的內人黨。但韓麟符等內蒙古中共黨員對此相當不滿，回到家鄉去組織地方民團和土匪，拉了一支自己的武裝，並在內人黨成立不久後，也在張家口召開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與內人黨抗衡。但當時駐內蒙古的共產國際代表奧斯羅夫（Aleksandr I. Oshirov）對於大同盟沒有信心，韓麟符也支持不下去，其武裝後來被內人黨和國民軍併吞。而中共中央對大同盟一事亦大為不滿，批評韓麟符等人做的是沒有群眾基礎的土匪工作，要他們立刻停止大同盟的工作，把大同盟所領導的農民都轉入農協，蒙古群眾則加入內人黨或國民黨，還要與內人黨保持友誼關係。¹⁰⁹ 至於韓麟符本人也在此事之後被調離北方，黨內地位從此下降。¹¹⁰

108 關於內人黨與馮玉祥和蘇聯的結合，見：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pp. 352–365.

109 〈三特區工作問題〉，《中央文件 2》，頁 64–65。

110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pp. 311, 361, 503–531, 537–538.

三、李大釗路線

莫斯科所以能夠順利在北方地區推動與國民軍的統一戰線，筆者以為，正是時任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的功勞。例如，當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佛鼎因為不恥白雲梯等官僚政客而不願加入內人黨時，勸他去支持和參加該黨者正是李大釗；¹¹¹ 當北方區委派去張家口國民軍底下工作的蕭三（蕭子暉）等人被國民軍將領敵視，做得滿腹苦水，甚至還被軟禁在平民教育處內不讓宣傳，¹¹² 乃至於被下「逐客令」時，也是李大釗說現在正是開展馮玉祥工作的時候，不能去碰他，還因此把蕭三調回北京工作。¹¹³ 再以劉伯堅的遭遇為例。劉是四川人，早年赴法勤工儉學，後赴莫斯科學習，1926年5月隨馮玉祥一同回國，任國民軍總政治部主任。由於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劉一上任後就搬出蘇聯紅軍的黨代表制度，加上是新人得寵，因此與國民軍將領處得很不好。李大釗因此致信劉，要他放棄以黨治軍、以黨治國的理念，還要他小心，不要讓「老馮」失望，以免澆熄他的滿腔熱誠。¹¹⁴ 另一個例子是前述的韓麟符。當韓麟符與內人黨的對立做得太過火時，李大釗乃在黨內《中央政治通訊》上撰文，批評韓包辦了三特區的國民黨工作，而且只是名義上養了一班如張良翰般不工作且抽大煙兼逛窯

111 佛鼎，〈內蒙古革命的發生、發展簡況〉，人民出版社編輯，《革命回憶錄》，輯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35。

112 〈張家口地方十二月份報告〉（1926/01），《河北文件1》，頁479。

113 樂天宇，〈大革命時期張家口地區革命活動的回憶〉，《河北文史資料》，輯8（石家莊，1981），頁88-89。

114 〈守常同志來信〉（1926/12/05），《中央政治通訊》，號14；〈切實改進與做好西北軍中的政治工作——致劉伯堅〉（1926/11/09），《中央政治通訊》，期11。上述兩文係引自《李大釗文集5》，頁126、159-160。

子的人。¹¹⁵ 論者有謂，前述中共中央解散大同盟的指示正是李大釗的傑作，這種說法不無道理。¹¹⁶

李大釗要求韓麟符等人退讓，實因為他更關懷的是國民革命軍事上的勝利。因此，當國民軍於 1926 年 8 月南口戰役失利，被迫西撤後，李大釗所領導的北方黨試圖尋求其他北方軍閥的合作。例如，在河北與河南，他們聯合直系叛將靳雲鶚、田維勤、魏益三，「使之北拒奉，東拒魯，西向潼關與國民軍攜手」；¹¹⁷ 在山西，李大釗等人也試圖與閻錫山結盟，甚至還贊同閻錫山在馮玉祥國民軍外另組一北方國民軍系統。¹¹⁸ 在山東，李大釗則先是聳恿張宗昌「趕快去吃江蘇這一塊肥肉」，以驅孫（傳芳）拒楊（宇霆）；¹¹⁹ 在寧漢分裂後，因外界謠傳奉系有犧牲張宗昌以換取奉寧妥協，故代表漢方的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又託楊度極力慫恿張宗昌投誠漢方。¹²⁰ 此外，李大釗等人還把主意打到奉軍頭上，他們一度打算與奉系談判，相約劃中國為兩大政府，¹²¹ 後來還曾離間深受張作霖重用的奉系軍事智囊與新派領袖

115 〈北方區對於三特別區及西北軍中工作的意見〉（1926/10/18），《中央政治通訊》，期 10，引自《李大釗文集 5》，頁 152–153。

116 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p. 537.

117 〈守同志來信〉（1926/12/05），《中央政治通訊》，號 14，引自《李大釗文集 5》，頁 124。

118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1927/01），《中央政治通訊》，號 15，引自《李大釗文集 5》，頁 180–181；〈給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報告（之一）——關於晉閻之報告〉（1927/01/25），《李大釗文集 5》，頁 192。

119 〈守同志來信〉（1926/12/05），《中央政治通訊》，號 14，引自《李大釗文集 5》，頁 124。

120 〈天津黨部駐漢辦事處致中央黨部報告〉，黨史館：漢 12917。

121 〈守常政治報告〉（1926/09/08），《中央政治通訊》，號 3，引自《李大釗文集 5》，頁 119–120。

楊宇霆。¹²² 由此可見，李大釗更傾向依賴上層政治權謀的操弄，而非階級性的下層群眾動員，達成國民革命的勝利。

更複雜的是，我們很難明確地斷言李大釗的合作對象，其政治立場究竟是親共，抑或反共。如前述代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去做張宗昌工作的楊度，當時確是同情中共者，今天其女兒與友人皆宣稱他在北伐時期已是中共秘密黨員，但確切入黨時間應是 1929 年在上海的事。¹²³ 另一個極具爭議的例子則是北京國民黨黨員路友于。路乃山東諸城人，早年赴日本留學，曾參加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23 年回國後，在丁惟汾的介紹下加入國民黨，亦屬丁所領導的「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成員之一。如前所述，丁惟汾、王樂平等山東籍國民黨員和李大釗等共產黨員的關係頗為融洽，大同盟也曾是與共產黨積極合作的北方國民黨左翼派系。然而，在 1925 年五卅運動以後，大同盟與中共漸行漸遠，乃至被中共視為與西山會議派勾結，並以戴季陶主義為中心的新右派。其中，路友于被指控煽動與中共北京黨密切合作的國民黨左翼蕭忠貞（湖南人）等人說：「畢竟我們還是同黨的兄弟，他們（按：指共產黨員）終歸是外人。」¹²⁴ 然而，問題在於，當奉系當局於 1927 年 4 月搜捕蘇聯大使館時，路友于當時亦在蘇聯大使館內，並與李大釗同樣遭到逮捕殺害。為什麼已經被中共指為右派份子的路友于會出現在掌握共黨機密文件的蘇聯大使館內呢？這個問題

122 〈給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報告（之四）——關於楊宇霆的報告〉（1927/01/25），《李大釗文集 5》，頁 217-223。

123 楊雲慧，《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

124 〈中共北京地委國民運動工作報告〉（1927/02/10），《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頁 362-364。

恐怕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答案。¹²⁵

但是，不論楊度、路友于等人的政治立場如何，從他們過去的歷史，我們至少可以知道，李大釗與這些北方政治圈的上層份子彼此間早已非常熟稔，也經常合作從事各式各樣的政治運動。像馮玉祥、孫岳、張之江等國民軍將領，在辛亥年間灤州起義爆發時，皆是第 20 鎮的下級軍官，他們早就透過軍隊中武學研究會結合起來，¹²⁶ 並和李大釗、于樹德、江浩等人一樣，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灤州起義，後來也和北方國民黨有著聯繫，彼此間早就結識。¹²⁷ 李大釗會找這些舊識合作，並不讓人意外。

這些上層份子如此嫻熟於運用其人脈關係從事上層統戰，以至經常忽略了下層的群眾運動，後來成為中共河北黨軍運領導的張兆豐便

125 當代大陸史家對於路友于的評價亦相當苦惱，索性乃將中共北京黨對其所謂「新右派」的指控視而不見，還說路友于實際上亦不滿意丁惟汾的做法，說到底就是路友于始終是一位左派人士。陳豔紅，〈對路友于的評價之辨正〉，《北京黨史》，1996 年第 3 期（北京，1996），頁 58-60。無論如何，今日大陸當局已為路友于「平反」，還在李大釗陵園附近為他蓋了一座紀念碑。至於國民黨方面對路友于的評論，同樣也尊其為「義士」，但也抹去其「聯共」的一面。見：〈路友于傳〉，黨史館：一般 230/1502。

126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 98-123。

127 如向來即與北方同盟會主持人王法勤、李石曾等人相善的孫岳在灤州起義失敗後，赴南京陸軍部任陸軍十九師師長，因參與反袁運動而被迫流亡在外，後來藉由直系曹錕的關係被招到保定創辦軍官教導團，並結納了許多河北籍以及如徐永昌、續西峰、續範亭等來自山西的革命黨人，他們是後來國民軍第三軍的骨幹。其中如續範亭者日後還加入了共產黨，並曾在西安事變策反楊虎城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陳森甫，《西北軍建軍史》（臺北：春秋雜誌社，1975），頁 26；穆欣，《續範亭傳》（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胡景翼、岳維峻的第二軍則由陝西靖國軍轉變而來，許多靖國軍將領如史可軒者，後來也成為共產黨員，故有人便說陝西的共產主義運動是由靖國軍孕育而成者。孟伯謙，《回向人道》（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頁 9。

是個例子。張兆豐，河北磁縣彭城人，生於 1890 年，陶瓷手工業家庭出身。張早年畢業於保定育德中學，也是同盟會員，後因在河北從事反袁運動，遭當局通緝，故走避陝西，參加陝西靖國軍。北方共產黨創立前後，張與前面談到的江浩、李錫九等人在天津活動。1924 年張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派任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執行委員，並在同年 5 月加入中共。鑒於張在北方政治圈中的人脈，以及他與國民軍將領的關係，在 1925 年北方地區國民革命展開後，張毫不令人意外地成爲首批被派赴國民軍中活動的黨員之一，曾擔任國民軍第三軍（孫岳部）第三混成旅的參謀長。¹²⁸ 前述以石家莊爲中心的正太路和井陘煤礦的工人運動便是在該旅的掩護下重新開展者。

1926 年，方振武背叛魯軍張宗昌，投靠馮玉祥，被編爲國民軍第五軍。張兆豐所在的第三軍第三混成旅被編入該軍，並隨軍先後開赴湖北、陝西、河南等地作戰。張本人亦在 1926 年底的援陝之役中立下大功，被升任第五軍第三師師長。¹²⁹

在此一南北征戰的過程中，原本便具有濃厚軍人色彩的張兆豐，也愈益脫離群眾。當 1927 年 7 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分共前後，張兆豐正隨方振武部駐紮鄂北襄陽與豫南南陽一帶（前面談到的江浩此時也在部隊中）。當時中共湖北省委派張學武、李富春、廖劃平等人去組織鄂北特委，擬在該地策動暴動。事實上，鄂北襄陽、棗陽、隨州各縣有許多如紅槍會、硬肚會般以反抗軍隊、土匪爲目的的自發性農民武裝自衛團體，每縣人數約在十萬以上。¹³⁰ 當時有許多地方

128 蘇旭、黃占江、沙友林，〈張兆豐烈士生平〉，《河北文史資料》，輯 8，頁 55-60。

129 蘇旭、黃占江、沙友林，〈張兆豐烈士生平〉，《河北文史資料》，輯 8，頁 61-62。

130 〈中共鄂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27/09），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9》（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下文引用的《湖北革命歷

共產黨員本身就是此種自發農民武裝團體的領袖，中共原本是可以利用這些團體來發動由下而上的群眾暴動，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這一方面是由於地方黨員「顧慮身家」，不願參與暴動，地方農民也相當痛恨外來駐軍（包括張兆豐所在的方振武部），故外來的鄂北特委及張兆豐部不能與地方農民接頭；再者，當時鄂北特委及張兆豐等軍隊黨員本身主觀上也較依賴軍事力量，故此一暴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上層的「軍事投機」。¹³¹ 整個事件的經過是，當中共中央派遣新任鄂北特委書記陸沉赴襄陽催促暴動時，張兆豐剛被方振武趕出軍隊，並正與鄂北特委考慮如何抽出他的舊部以圖發展。隨後因張兆豐在襄陽站不住腳，大夥只好跑到棗陽去，由張致信其舊部要他們脫離方振武。後來張兆豐又顧慮部隊抽出後沒有根據地，所以又提議到隨州與樊鍾秀、鄧寶珊的建國軍（也是鄂北人民痛恨至極的駐軍）合作，大家又跑去隨州。此時已有人對只依賴張兆豐軍隊的作法有不同意見，但這時又來了一個中央大員王一飛，王還是堅決主張致力於恢復張兆豐的軍隊，張與江浩皆贊同王的主張，所以大家還是東奔西跑，繼續等待著張的軍隊。但軍隊終究沒有來，張兆豐與江浩兩位堅持等待軍隊者也作鳥獸散，所謂的鄂北「暴動」就此結束了！¹³²

另外，在李大釗的影響下，不少最初冀望藉由下層群眾力量改造中國社會的年輕黨員，也逐漸成長為嫻熟於現實政治的上層份子，如

史文件彙集》簡稱《湖北文件》），頁 110-111。

131 〈中共湖北省委關於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10），《湖北文件 3》，頁 268-272。

132 〈中共鄂北特委陸沉致中央信〉（1927/12/13），《湖北文件 9》，頁 119-124。後來整個鄂北特委皆因此遭到中央警告處分，其中特委書記陸沉則被開除中央委員職務。〈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11/14），《中央文件 3》，頁 481、484。

李渤海（黎天才）便是個例子。李係山東蓬萊人，曾參加山東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後入北大就讀，與韓麟符等人相善，曾一同組織「澄社」，「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1923年李渤海在高君宇及何孟雄的介紹下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轉黨。¹³³ 當時北京團領導黃日葵還稱贊他說：「此人最努力，終日能奔走，於北方各地尤熟悉，實為不可少的人才。」¹³⁴ 在李大釗死後，李渤海承繼其未完成的志業，其所領導的北京市委不僅經常在胡鄂公家裡開會，還繼續透過胡鄂公與張友漁（山西人，孫文主義學會出身，是當時北京報界名流）做上層統戰工作，並派人去策反北京警察以支持武漢政權。¹³⁵ 李渤海的作為，完全脫離了群眾。當時也有中共北京市委委員不滿意這種作法，批評李渤海官僚化，專門與舊官僚楊度、北大教授兼新中學會成員高仁山等來往。¹³⁶ 後來北京市委在1927年10月被破壞，李渤海遭到逮捕，楊度等「舊官僚」竟棄其不顧南下，加上同時被捕的北京市委書記王蓋臣出賣了他，李渤海因此憤而脫離共產黨，投靠東北軍張學良，成為張學良的心腹愛將。¹³⁷

總結地說，李大釗領導的河北黨，幾乎全力投注於上層統戰，忽略下層的群眾運動，還要群眾不要發動鬥爭，要他們等國民軍或國民

133 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32。

134 〈黃日葵給團中央的信〉（1924/07/10），《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頁98。

135 〈京津黨部駐漢辦事處致中央黨部報告〉（1927/07/02），黨史館：漢12917；陳荷夫編，《張友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30-34。

136 〈彭述之給中央常委的信〉（1928/02/14），《河北文件2》，頁174-175。

137 羅健，〈西安事變前後的黎天才〉，《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北京，2000年8月），頁152。

黨到來後再解決問題，以至加深群眾對自身力量的不信任。¹³⁸ 甚至爲了維繫統一戰線，中共河北黨放棄自身的武裝力量（如韓麟符的大同盟），只是派黨員到國民黨、國民軍中，利用他們的政治招牌，由上而下地推動革命，頂多也只是幫助「擴大左派的勢力以打擊右派」。¹³⁹ 至此爲止，北方黨已徹底失去自身立場，不自覺地捲入到地方派系衝突當中，他們的作爲，終將流於爲人作嫁的徒勞。

第四節 農村小學教師與北方農民運動

一、返鄉知識份子與冀中、冀南農村黨的成立

在前面幾節中，我們將論述的重點放在北京及天津黨的發展，以及城市工人運動和上層統一戰線方面，甚少提及京、津等大城市外之河北農村黨的發展。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於當時中共河北黨的重心也是放在京、津等大城市，以及上層的統戰，而不是廣大的農村地區與農民群眾。不過，在京、津黨發起後不久，冀中、冀南等農村黨也隨之成立。儘管當時河北農村黨的力量微弱，但鑒於它們在日後河北共產革命運動中佔有的重要地位，故在此我們也有必要談一談早期中共河北農村黨及農民運動發展的概況。

與早期其他中共農村黨建立的模式相同，中共河北農村黨最初也是由某些曾在城市求學並加入革命行列之返鄉知識份子發起成立。以冀中地區的保定黨爲例。早期中共保定黨是以保定育德中學爲中心向

138 〈順直黨的現狀〉（1928/07/11），陳潭秋文集編輯組，《陳潭秋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 34；〈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文件 職工運動決議案〉（1928/12/20-22），《河北文件 2》，頁 690。

139 〈豫區關於軍運、農運及國校工作的報告〉（1926/10），《河南文件 2》，頁 22。

表 1-3 1922 年保定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名單

| 姓名 | 籍貫 | 學校 | 姓名 | 籍貫 | 學校 |
|-----|------|------|-----|------|------|
| 張仲毅 | 直隸邢台 | 河北大學 | 楊其綱 | 直隸衡水 | 育德中學 |
| 王錫疆 | 直隸高陽 | 育德中學 | 安志成 | 直隸新安 | 育德中學 |
| 王其彭 | 直隸故城 | 育德中學 | 鄒 舫 | 直隸完縣 | 育德中學 |
| 陳允登 | 福建閩侯 | 育德中學 | 彭桂生 | 直隸曲陽 | 育德中學 |
| 李德蔭 | 直隸高陽 | 育德中學 | 張廷瑞 | 京兆涿縣 | 育德中學 |
| 林夢書 | 直隸保定 | 育德中學 | 孫有曾 | 京兆涿縣 | 育德中學 |
| 高振鴻 | 京兆霸縣 | 育德中學 | 唐士奎 | 直隸安國 | 育德中學 |
| 陶永立 | 直隸保定 | 育德中學 | 石學會 | 直隸徐水 | 育德中學 |
| 馬克勤 | 直隸蠡縣 | 育德中學 | 莫易琨 | 直隸吳橋 | 育德中學 |
| 卜錫珺 | 直隸定縣 | 育德中學 | 武振華 | 京兆香河 | 育德中學 |
| 劉承浩 | 直隸無極 | 育德中學 | 劉官諤 | 直隸棗強 | 育德中學 |
| 曹冠英 | 直隸新城 | 育德中學 | 王耀郁 | 直隸阜平 | 育德中學 |
| 吳寶華 | 直隸易縣 | | | | |

資料來源：〈王錫疆關於保定團稱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原因致國昌的信〉(1922/04/06)，《河北文件 1》，頁 16-18。

外開展。1908 年，同盟會河北分會主盟人陳幼雲（蠡縣人），以及另一位也曾參與灤州起義之北方同盟會領袖郝仲青（霸縣人），爲了培養革命後進及建立秘密活動據點，成立育德中學。該校「創辦人全係同盟會之老黨員，頗有革命精神，故其教育重實用，提倡學生自治，非他校當差式的可比」。¹⁴⁰ 1917 年，育德中學設立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後來成爲中共重要領袖之劉少奇、李富春和李維漢等人皆曾在此

140 〈團保定地委關於社會情況及組織工作的報告〉(1924)，《河北文件 1》，頁 204。

學習過。¹⁴¹ 在北方共產革命運動開展以後，育德中學亦成爲冀中地區的共黨據點，如表 1-3 所示，早期保定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幾近全數是育德中學學生，他們主要來自周圍農村地區，「大半都是農家子弟，放假後都到農村」，¹⁴² 「十之八九居鄉」，¹⁴³ 而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也在有意無意間被這些居鄉學子帶回農村地區。

不過，這些冀中地區的居鄉學子當時似乎未發動任何值得我們注意的農民運動，他們的努力要到 1930 年後才逐漸有收獲。倒是冀南「沙區」的返鄉黨員與北伐時期的紅槍會運動存在著些許關係，故在這裡我們先談談冀南沙區農村黨的發展概況。

冀南沙區是指以大名爲中心的清豐、南樂、濮陽等周圍諸縣，因該地是黃河故道的沙原地區，故被稱爲沙區。¹⁴⁴ 謝台臣、晁哲甫、王振華等人於 1923 年 7 月成立的省立第七師範學校(大名七師)，係沙區黨發展的中心。¹⁴⁵ 如同圖 1-1 所示，大名七師是一個農村師範學校，其主要目的是爲地方農村培育高小教員，故其學生大多來自鄰近農村地區，畢業後亦多回鄉擔任小學教員。許多冀南地區黨員皆是由此出身，如抗戰前中共冀南黨的重要領導者趙紀彬、李大山、劉大風三人便是七師學生，他們在畢業後前往濮陽縣井店完小任教，後來

141 育德中學的歷史可見：市地名辦公室，〈育德中學的革命活動〉，《保定文史資料》，輯 1（保定，1984），頁 101-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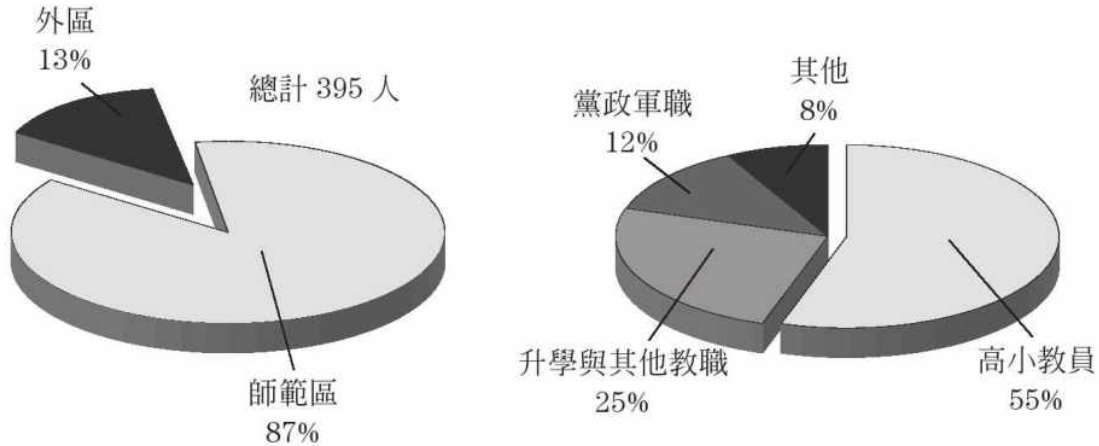
142 〈葆亭西外工作計劃〉（1926/01/11），《河北文件 1》，頁 450。

143 〈孫澈之關於保定團的活動及代表問題致中英的信〉（1924/12），《河北文件 1》，頁 180。

144 趙紀彬，〈直南沙區黨組織的早期活動〉，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編輯組，《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頁 172。

145 洪家祿編，《大名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依據民國 22 年版影印），頁 459。

圖 1-1 大名七師學生籍貫與就業統計圖（1923-1934）



資料來源：〈河北省立大名師範學校一覽〉，河北省檔案館：645-1-36。

註：師範區包括大名(116)、清豐(43)、南樂(42)、濮陽(41)、成安(21)、長垣(19)、東明(16)、永年(15)、肥鄉(11)、廣平(9)、曲周(6)、雞澤(5)；外區包括邯鄲(15)、磁縣(8)、威縣(6)、任縣(3)、南和(3)、柏鄉(3)、高邑(2)、廣宗(2)、邢台(2)、趙縣(2)、平山(2)、南宮(1)、新河(1)、鉅鹿(1)。括弧內的數字是人數。

井店地區便成爲冀南沙區共黨的主要據點之一。¹⁴⁶

再者，這些地方黨員還與地方自發性農民武裝自衛團體紅槍會有關係。眾所週知，民國時期的山東與河南由於兵連禍結，農民經常組成紅槍會等武裝團體以求自保。接連山東、河南兩省的冀南地區也因

146 趙紀彬，河北濮陽人，1926年入黨，曾任中共濮陽縣委宣傳部長、陝西省委宣傳部長，並曾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某部中做政治工作，後因叛徒出賣遭到逮捕，出獄後與共黨脫離關係，1950年重新入黨，1982年病逝。李大山是河北大名人，早期中共冀南黨領導者，後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資料員。劉大風亦是河北濮陽人，化名安明，日後叛變。安明，〈一九二五至三四年中共直南黨的活動大事記〉、張增敬，〈直南、豫北黨的一些歷史情況〉、趙紀彬，〈直南沙區黨組織的早期活動〉，《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1（上），頁99、118、172；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頁703。

此盛行槍會運動，其中大名縣早在 1918 年時便有山東朝城的紅槍會會首劉希賢（劉小辯）前來宣傳槍會。1926 年後，由於北伐戰事興起，當地人民為求自衛，普遍結成紅槍會，聚眾抗議，迫使縣府解散縣議會、車馬局、實業局、警局、辦稅局、教育局等政府機關，因此加深軍隊對槍會的仇視。1927 年 3 月，大名縣留守司令邱鍾衡與紅槍會教師劉希賢因事齟齬，控告劉意圖不軌，冀南鎮守使、直魯軍閥謝玉田便藉口委任劉為司令，騙其入縣城，予以殺害。大名與鄰近各縣之紅槍會眾因此大憤，聯合圍攻大名縣城，軍隊亦對槍會施行報復，在農村地區燒殺劫掠。¹⁴⁷

當時地方共產黨員也參與槍會運動，如趙紀彬便在槍會中擔任參謀長。¹⁴⁸ 根據日後擔任邢台中心縣委書記馮溫（馮和齋，肥鄉人）的說法，當時冀南地區的黨員為響應北伐，主動拉攏槍會首領，不少地方黨員還曾任槍會總指揮，槍會所屬農民群眾大多也是學生黨員的親戚朋友或佃戶雇工。¹⁴⁹ 不過，在這些共產黨員奪取紅槍會之領導前，該地槍會運動即由於軍閥的收買而結束。1927 年 7 月，孫殿英軍抵達大名縣，與紅槍會首領結拜兄弟，紅槍會因此歸順孫殿英，從「原來反對苛捐雜稅的農民起義，一變而成向農民要款的軍閥了」。¹⁵⁰ 轟動一時的冀南槍會運動也告一段落。

冀南槍會運動固然短暫，但從此一事例中我們還是可以得到一點

147 洪家祿編，《大名縣志》，頁 545；長野朗，《土匪、軍隊、紅槍會》（東京：支那問題研究所，1931），頁 266-268。

148 安明，〈一九二五至三四年中共直南黨的活動大事記〉，《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頁 102。

149 和齋，〈我對直南黨的觀察和我的覺悟〉（1929/03/23），《河北文件 3》，頁 282。

150 晁哲甫，〈直南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師革命史〉，《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頁 137-138。

啓示。在槍會暴動中，槍會會眾與官軍的對抗，表現了其自發的、群眾化的一面；不過，槍會與孫殿英的妥協及其後轉變成合法的「自衛團」，¹⁵¹則又表現了下層群眾並不總是與外來或上層的政治團體處於對立立場，他們也希望藉由後者之力量去滿足其需求並爭取生存的空間。共產黨所以失敗，一方面既是由於他們不能夠由下而上地去動員群眾，反而依賴少數紅槍會首領的關係去由上而下地發動鬥爭；再者，共產黨又不具備足夠的力量去滿足群眾的需求、保護群眾的安全，及控制地方群眾，致該群眾運動的領導權最終為其他政治團體所奪。此種情形，在日後河北省農村地區的鬥爭中將一再重演。

二、冀東玉田暴動

冀東唐山周圍的農村地區也是中共河北黨農民運動的大本營之一，這個地區在1927年時曾爆發著名的玉田暴動。玉田暴動是源自冀東地區的反旗地變民鬥爭。所謂的旗地乃滿清入關之際，朝廷當局為節省軍費分發給旗人官兵作為他們部分服役報酬的免稅土地。這些旗人地主自己並不管地，他們大多僱用地方農民耕耘土地，或轉賣給地方農民。「到清朝下臺時幾乎所有的旗地都落入到私人手中」，由地方農民所有。¹⁵²1926年底，奉系當局為彌補軍費之不足乃威脅農民出錢買地，否則將賣與他人，如此便引起地方農民的強烈反抗，在1927年前後先後爆發多起反旗地變民鬥爭。¹⁵³

151 長野朗，《土匪、軍隊、紅槍會》，頁268。

152 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17-220.

153 〈直隸省之農民反抗運動（1926年12月～1927年3月）〉，黨史館：部10958。

共產黨最初也是藉由農村小學教員的關係去發動冀東農民。1925年暑假，前述的天津黨員江浩和另一位玉田人葉善枝¹⁵⁴曾一度赴玉田農村，聯絡當地小學教員。當時玉田縣農村小學教員薪資相當微薄，每月僅七、八元，生活清苦，故對現存的社會體制深感不滿，希冀改革，因此成爲國共兩黨吸收的對象。自1924年起，玉田縣教育局爲提高小學教師水平，舉辦小學教師講習班。江浩和葉善枝來到以後，將此一團體轉變成爲爭取提高教師薪資的鬥爭團體，並且透過江浩個人的關係，達到增加薪資和撤換縣教育局長的勝利。¹⁵⁵

再者，這些農村小學教員素來深受農民尊重，許多人還是某些傳統農民團體的領袖。因此，透過這些小學教員的關係，中共得以更進一步去動員下層群眾，甚至可以利用某些傳統農民的組織發展農運。據日後中共冀東地區農運領導者張明遠（張金言，玉田人，農村小學教員出身）所言，當他於1926年冬自廣州農運講習所回到玉田從事農運以後，發現農民對於「農民協會」的名稱和組織感到相當生疏，因此當地農運領導者決定採用農民易於接受的傳統組織「聯莊會」等名稱。¹⁵⁶此外，他們還與地主的民團合作，如遷安和唐山各有二十村的民團，玉田亦有十村的民團，皆在國共兩黨黨員的指揮下。¹⁵⁷

154 葉善枝，1898-1949，河北玉田人。曾在南京當兵。後經邵力子、葉楚傖介紹加入國民黨，並經江浩介紹加入共產黨，是中共在冀東地區的重要農運領導者。1931年因參加羅章龍之非常委員會，被開除黨籍。1936年投靠國民黨。1949年被共產黨政權逮捕，死於獄中。玉田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玉田縣志》，頁516。

155 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16-30。關於河北農村小學教員的薪資，根據李景漢等人一九三〇年代在定縣的調查，該地農村小學教師最低者全年才只有40元而已，也就是月薪不到4元。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216。

156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51。

157 〈直隸省農民部工作報告〉（1927/03/05），黨史館：部10957。

無論如何，北伐前後冀東反旗地變民的鬥爭，便是在這些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地方群眾團體組織之名義下發動者。

然而，這些地方群眾固然有濃厚的鬥爭精神，但也不是不願意與政府當局妥協。1926年12月，葉善枝領導的國民黨直隸省農民部得知薊縣爆發反旗地變民鬥爭，乃指派張明遠和唐山礦工出身的河北豐潤人楊春霖前赴該地，但他們抵達薊縣時，運動已因政府當局的妥協而結束。至於隨後玉田爆發的反旗地變民鬥爭所以會演變成搗毀縣署和焚燒縣議會的暴力行動，則是因為張明遠等人即時趕到，予以煽動，加上縣署當局採取強硬的態度，拒絕農民的要求，以至爆發激烈的衝突。不過，最後農民還是由於年關將近，忙著過年，故在縣長應允緩期一個月辦理後，暫停鬥爭。¹⁵⁸

在李大釗等人於1927年4月被捕處決後，京津地區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也遭到嚴重破壞，玉田農運一度流於完全自主的狀態。1927年10月，以蔡和森為領導的中共北方局發佈所謂〈北方暴動計劃〉，規定京津、冀東、冀南和內蒙三特區為四大暴動區域，¹⁵⁹中共河北黨領導才又逐漸恢復與玉田黨的關係。當時玉田四鄉民眾與縣城警察衝突，不滿新任的高縣長，情勢相當緊張。雖然高縣長曾事先希望與農軍和解，但暴動終究在19日爆發了。農軍迅即攻佔縣城，並推舉「進步紳士」王卻三任縣長，解散警察。然而，京東特委書記葉善枝在抵達縣城後，主張撤出，以免駐在唐山及遵化馬蘭峪之敵軍前來鎮壓。葉的主張雖遭到張明遠、楊春霖、解學海的反對，但農軍最後仍

158 〈直隸省之農民反抗運動(1926年12月~1927年3月)〉，黨史館：部10958；〈直隸省農民部工作報告〉(1927/03/05)，黨史館：部10957。

159 劉道華、黃小同，《中共北方地區黨史研究》，頁92。

是於 21 日撤出縣城，至縣城北方的郭家屯進行整頓。¹⁶⁰ 農軍抵達郭家屯後，收編玉田北山及遵化北山之土匪隊伍，攻打土豪吳殿三位於吳莊子之家，勢力大增。然而，由於來自唐山及遵化馬蘭峪之敵軍的進攻，農軍自亂陣腳，隊員多私自逃跑，隊伍幾近瓦解。正當此時，河北黨代表于方舟抵達遵化城北王爺陵，召集隊伍至該地開會，決定成立京東人民革命軍，以楊春霖為總司令，張明遠為總指揮，決議再次奪取玉田縣城。然而，冀東農軍早已因馬蘭峪之敗大傷元氣，在赴縣城途中，於遵化的魯家峪遭到敵軍圍剿，立即崩潰瓦解，于方舟、楊春霖、解學海、劉自立等人被捕處死。中共黨史中著名的玉田暴動乃就此結束。¹⁶¹

很明顯的，玉田暴動雖然係一場帶有濃厚地方群眾色彩的抗議運動，但抗爭的最初階段都是採取赴縣城請願的作法，這又說明了群眾仍希圖藉由政府的力量而不是可能付出生命代價的抗爭手段去滿足自身的需求。事實也證明，若不是外來革命者的煽動，以及縣府當局拒絕農民的要求，農民亦不至走上激烈的抗爭乃至於武裝暴動之途。最後，在暴動失敗後，當地黨員與農民紛紛響應奉軍的招募，以為借軍隊名目可以在鄉村公然存在，乃至復仇劫獄，¹⁶² 這又再度證明了群眾對自身的不信任，而相信外來軍隊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在玉田暴動當中，同樣也不能將其基礎穩固地建立在地方群眾間，必須依賴少數在群眾間甚有威望的菁英份子動員群眾，如此便不難想像「張會長（按：

160 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共中央北方局 綜合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 106；張明遠，《我的回憶》，頁 76-87。

161 張明遠，〈玉田一帶農民運動的回憶〉，《天津歷史資料》，期 1（天津，1964），頁 74；張明遠，《我的回憶》，頁 70-72、87-92。

162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 96。

張明遠)一跑、楊大炮(按:楊春霖)一捕,號稱二萬人的農會遂全體瓦解,群眾沒能在此過程中進一步提高其政治與階級認識。¹⁶³ 由此可見,玉田暴動是有限的傳統「自發性」抗爭。

小 結

中共北方黨誕生於一個分裂的社會,即一個為各種既存的政經文化網絡與地緣血緣等特殊關係所撕裂的社會。這樣一種分裂的局限性,從一開始就反映在北方黨內,如黨組織本身是由許多分散的知識份子小團體構成、黨的活動主要局限在與黨員有關係的地區,或者黨員之間由於世代、工學等界線引起的紛爭。所有這些裂痕,被隱藏在備受北方黨員所共同尊敬的李大釗領導之下,李調和了黨員間的差異,串連起各個分散的小團體,並依恃他的關係,建構了一個龐大卻又鬆散的革命網絡。

北方黨員就靠著李大釗及他們各自的關係與網絡,向京、津城外廣大的河北與北方地區擴展活動。然而,他們所面對的也是一個分裂的世界。工人、農民不是什麼有階級覺悟的整體,毋寧也是被各種特殊關係或既存網絡所分割的群體。而群眾對自身力量的不信任,以及對政治權力的依賴,使得任何企圖無視上層政治的民粹主義式群眾動員,終將成為泡影。

163 〈順直省委通告第六號〉(1928/01/27)、〈順直省委會議文件——農運決議案〉(1928/01),《河北文件2》,頁94、128。關於玉田暴動中黨領導的問題,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看法,同樣是冀東地區出身的黨員呂職人(經歷不詳)認為該暴動是一場缺乏政治思想基礎的運動,張明遠則堅稱玉田暴動是在黨領導下所爆發的暴動。呂職人,〈于方舟同志革命的一生〉,《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3,頁25;張明遠,〈有關玉田農民暴動幾個問題的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3,頁28。

嫻熟於北方上層政治的李大釗深知此點，從他當時的所做所為來看，李並不是 Maurice Meisner 所設想的民粹主義者。其他北方黨的成員，最初或許仍天真地幻想單憑群眾的力量能夠改造中國，但在李大釗的領導與共產國際的催促下，加上其各自主觀與客觀上的局限性，他們最後也承認，上層統一戰線是有其必要的。

確實，上層統戰是中國共產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李大釗領導下的河北黨，幾乎忘了共產黨所以與眾不同之處，那就是黨的領導與階級鬥爭。他們完全不談黨的領導，甚至沒能也不敢公開自己的政治面目，結果只是使自身成為北方政治權謀和派系衝突的一部分。至於階級鬥爭，當時河北黨頂多也只是打著別人的政治招牌，依循某些既存的網絡與關係（如工人間的幫、農村裡的槍會與聯莊會），透過某些群眾領袖，間接地由上而下地動員群眾，結果當然沒能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及其對共產黨的信仰。一旦政治的掩護或群眾的領袖不在，共產黨終究成為脫離群眾的孤家寡人。

Maurice Meisner 與當代中國官方稱贊李大釗是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之先行者，當代西方學者也宣稱共產革命必須與其所處的地方情境結合，才能獲致成功。但李大釗領導時期的河北黨，是如此無法自拔地陷入到當時為各種政治黨派與特殊關係所分裂的地方情境當中，以至喪失了獨立性，成為此一分裂社會的一部分，並隨著這個社會的裂痕而崩裂。在李大釗死後，這些既存於河北黨內的裂痕，終將暴露出來，並導致長達一年有餘的黨內衝突，此即下章將探討的順直省委事件。

第二章

順直省委領導時期的河北革命

1927–1930

當代西方學者設想階級矛盾並非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中共採取的因地制宜政策就不應該是依恃外來的教條與組織推動的激烈的階級鬥爭，而是緩和的減租減息、稅制改革等政策，以及民族或愛國主義的訴求。Kathleen Hartford 便認為，戰前河北的地方黨員，由於組織控制尚不嚴密，他們得以規避傾向激烈階級鬥爭的左傾中央領導的監督，更靈活地採取某些超階級的策略，贏得地方群眾的支持，使中共在河北的勢力逐步發展。在這裡，降低階級鬥爭的口號與黨的組織領導，是中國共產革命地方化，也就是中共成功的前提。反之亦然。

Patricia Stranahan 關於戰前與北京黨並列的上海黨的研究中也得出同樣結論。¹ 她認為階級矛盾並非戰前上海社會的主要矛盾，而且此一客觀前提是不容許被操弄 (manipulate) 者。所以 Stranahan 主張，中共如欲獲得生存，第一點就是不要強調階級鬥爭，甚至不要做工人運動，而應專注於用愛國主義去獲得知識份子的同情；其次，她主張中共應該少一些家長式領導 (patriarchy)，給予地方黨員更多

¹ Patricia Stranahan,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

的自主性 (initiative)，讓他們可以訴諸群眾的實際需求，而不是依據階級鬥爭的口號，打入地方社群 (community)。但是，中共一開始沒有這樣做，反而更強調組織的領導與工人運動，敵視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結果就導致黨的官僚化與脫離群眾，以及隨之而來的內部分裂。可是，側重實際的地方黨員，在中共中央於 1931 年離開上海後，得以更因地制宜地訴諸愛國主義，並用非組織的方式去聯絡黨外的知識份子，以至中共形式上的組織在上海即使已經破產，但實際上的影響力卻逐漸擴大。

可是，在上一章中，筆者已經證明，李大釗領導下的河北黨，其最大的缺點就是缺少 Patricia Stranahan 等人所批評的組織領導與階級動員。黨本身實質上係由許多分散的小團體所組成，聯繫彼此間的主要樞紐是李大釗；黨員活動時也未曾高呼階級鬥爭，頂多是高舉他人的政治招牌，透過某些個人的關係，依循既存的關係網絡，由上而下地動員群眾。在此一狀態下，任何再進一步地降低組織領導與放棄下層群眾的動員，都是令人難以設想的。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中共應該走向另一個極端，由上而下地加強組織紀律與高呼階級鬥爭呢？在接下來即將探討的順直省委事件與立三路線時期的河北黨務中，我們將看到，當時中共中央確實有此一企圖，但結果卻加速了河北黨的分裂，並使自身在社會中變得更加孤立。這裡的關鍵仍在於，當時的中國社會與早期中共的黨組織，原來早已被某些政治黨派與既存的社會文化網絡及關係所分裂。在中共還未能在相當程度上打入其中，並依據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將其重劃成一個能為黨所控制的二元分化的社會前，中國的共產革命運動，就極容易流於如李大釗時期般，將自身整個地融入到地方政治派系的衝突與社會分裂當中，喪失獨立性地隨波逐流，或者就可能像接下來介

紹的「左傾」時期般，出現一個接一個脫離群眾的「單純軍事行動」！

第一節 中共順直省委事件

一、彭述之與順直省委

1927年4月6日清晨，三百餘名奉系軍警、偵探和憲兵包圍並進入蘇聯大使館搜查，逮捕包括李大釗在內的數十位北方國共兩黨重要領導幹部，並於隨後槍斃其中的二十名份子，李大釗亦在其中，此即所謂蘇聯大使館事件。中共北方黨務因此陷於群龍無首狀態，其中的河北黨，「爽快地說，還不成一個真正的組織，只有東一群、西一群黨員而已」。²同月底，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五大）召開，鑒於李大釗死後北方黨破產的情形，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順直省委負責領導河北及臨近諸省地區的黨務工作，並委派中央委員彭述之為省委書記。但由於彭述之在武漢工作不能立即赴北方任職，中共中央乃責成參加五大的北方代表陳為人先行返回河北，進行省委成立的籌備工作。陳為人來到北方後，雖然由於天津市委李季達等人對陳的代表資格與省委設立地點等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發生些許波折，³但順直省臨委仍舊在1927年6月中旬成立於天津，並由陳為人、劉伯莊、李季達三人分別負責工運、組織和宣傳工作。大約在7月底前後，彭述之終於抵達北方，並於8月1日在天津成立由彭述之擔任書記的順直正式省委。北方革命自此後進入順直省委時期。⁴

2 〈順直省委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1927/12/12)，《河北文件2》，頁65。

3 〈順直臨時省委關於組織糾紛問題的報告〉(1927/06/27)，《河北文件2》，頁29-38。

4 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頁88。

與此同時，南方地區的中共黨務也由於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相繼清黨，陷入困境。爲此，中共中央於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漢口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徹底檢討國民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及日後黨務發展的方向。在該會上，中共中央宣稱，儘管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舊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或國民革命，但此一革命目的之達成必須依賴由下而上之工農群眾的階級鬥爭，尤其是農村的土地革命，而不是專恃與代表異己階級之國民黨或軍隊軍官合作，藉其力量由上而下地達成革命目的。會議認爲，過去陳獨秀等「機會主義」的中央領導錯誤地將國民革命和階級鬥爭對立起來，以爲由下而上的階級鬥爭阻礙了國民革命的開展，乃至爲開展上層統戰，忽略並限制下層的群眾鬥爭。⁵ 因此，中共中央指示黨員放棄過去那種沒有平民式精神的上層領袖式結合，⁶ 並到群眾間發動工農武裝暴動，⁷ 貫徹由下而上的群眾路線。會議最後選舉成立由瞿秋白領導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從此中國共產革命開始了所謂的瞿秋白時期。

爲了貫徹此一平民式路線，各級黨部被要求提拔工農份子到領導機關，以撤換那些仍殘留在黨領導機關內的機會主義份子。當時中共各地黨部確實也掀起一股提拔工農分子的風潮。在北方地區，如山東省委領導鄧恩銘甚至建議成立一個由每月收入不足 10 元的工人組成之黨，⁸ 並且實際上也於 1927 年 10 月山東省委成立時把工人出身的盧福坦拱上山東省委書記，儘管隨後 11 月省委常委改組時復由知識

5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中央文件 3》，頁 249-293。

6 〈中央通告第一號〉（1927/08/12），《中央文件 3》，頁 312。

7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1927/08/21），《中央文件 3》，頁 334-335。

8 〈米特凱維奇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8/01），《國際檔案 7》，頁 297。

份子出身的鄧恩銘接替書記職位，並由同為知識份子出身的丁君羊、王元昌等人實際領導山東省委的工作。⁹

前面提到的內人黨亦在國共分裂以後，經歷同樣「工農化」之轉變。在1927年8-9月間，內人黨在烏蘭巴托（庫倫）召開一場類似八七會議的特別會議。在該會上，白雲梯、金永昌、李丹山等過去領導內人黨的老一輩民族主義者遭到批判，他們的領導職務也由更具草根性色彩之下層群眾或曾在莫斯科學習的年輕學子取代，如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牧民出身，並曾參加獨貴龍反抗運動的孟和烏力吉接替白雲梯的內人黨書記一職。過去由呼倫貝爾人郭道甫所擔任的秘書一職，亦由曾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克什克騰旗人白永倫接替。至於白雲梯等人後來則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主席丹巴道爾吉的協助下逃離烏蘭巴托，並在隔年發表一份以「內蒙古國民黨」為名的反共宣言——〈內蒙古國民黨清黨運動〉，公開打出反共、反蘇聯「赤色帝國主義」的旗幟，從此成為共產黨的死對頭。¹⁰

在河北，中共於八七會議後也立即派遣蔡和森去北方組織北方局，以負責在北方地區貫徹平民式革命路線。蔡和森當時所採取的手段，首先就是要扳倒「彼得羅夫（按：指彭述之）集團」，¹¹打破彭述之、劉伯莊、陳為人三人壟斷省委的局面。¹² 蓋彭述之被認為是機

9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41-42。

10 關於內人黨的烏蘭巴托特別會議及其後黨內的分裂，見：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pp. 694-747. 白雲梯的「反共宣言」見：〈內蒙古國民黨清黨運動〉，《民國日報》，1928年10月26日，第4頁。

11 〈米特凱維奇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不早於1927年12月5日於上海），《國際檔案7》，頁160。

12 〈順直省委致中央信〉（1928/02/01），《河北文件2》，頁133。

會主義領導陳獨秀重要的左右手及理論宣傳家，瞿秋白還批評「彭述之主義」是「孟塞維克主義在中國的化身」，¹³ 國民革命運動的失敗，彭述之當然難辭其咎。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與彭述之兩人是當時中共黨內人所皆知的死對頭。蔡、彭兩人一度為爭奪向警予鬧得不愉快，¹⁴ 北伐時期蔡還站在瞿秋白的一邊攻擊彭述之主義。由此看來，中央派蔡和森組織北方局的這一安排，頗有弦外之音。蔡和森也確實不負中共中央所託，在抵達北方後不久，即於9月22日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當著地方黨員的面宣讀他的《黨的機會主義史》大作，數落陳獨秀、彭述之「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公開羞辱彭述之，還在會後改組順直省委，由安源礦工出身的朱錦棠取代彭述之擔任省委書記一職。

以上諸多措施的主要目的，即中共中央企圖依據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重新改造整個黨。這點非常重要，中共日後亦不斷地藉由整黨鬥爭，加強黨的整個領導。但不同的是，日後中共的整黨是配合由下而上的群眾鬥爭，而八七會議後的整黨卻主要是依賴由上而下的紀律與命令，其結果不僅流於形式，粗暴的手段更引起被批判者的不滿，乃至於挑起個人的意氣與利益衝突，促成更大的分裂。

13 〈中國革命中之共產黨黨內問題〉(1927/02)，瞿秋白選集編輯組，《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32。當時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間也有相同的看法，很明顯是受到瞿秋白的影響。〈納索諾夫、阿爾布列赫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05/21)，《國際檔案4》，頁271。

14 向警予原是蔡和森的愛人。1925年初蔡和森因病赴北京治療時，彭述之恰巧回到上海工作，並與向警予發生戀情。蔡和森回滬後知道了此事，向中共中央抱怨。陳獨秀等中央領導因此申斥彭述之，並派蔡和森、向警予赴蘇聯，避免風潮擴大。鄭超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76；Stephen A. Smith, *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 (Richmond: Curzon, 2000), pp. 124-125.

當時的順直省委便面臨此一困境。如朱錦棠者，「終日在房子裏踱來踱去，表現得十分無聊的神情」，他「在政治、理論各方面的水準甚低」，實際上省委事務仍舊依賴彭述之（事實上北方局亦是如此，書記由津浦路工人出身的王荷波擔任，但實際掌權者是蔡和森）。¹⁵ 因此，蔡和森乃在 11 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後向中共中央控告彭述之勾結北京市委叛徒段純¹⁶ 等人（但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認為這種說法很成問題），¹⁷ 還說彭在前章所述的玉田暴動中犯了堅持攻城的盲動主義軍事投機錯誤（可是當時中共黨內普遍認為蔡和森的北方局在 10 月 6 日發佈的〈北方暴動計畫〉才是北方盲動主義的代表），¹⁸

15 陳碧蘭，《我的回憶》，頁 248；〈彭述之給中央常委的信〉（1928/02/14），《河北文件 2》，頁 181。

16 段純，湖南邵陽人，北大學生，1927 年回鄉，1929 年後參加陳獨秀和彭述之的托派。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頁 43。

17 〈順直省委致中央信〉（1928/02/01），《河北文件 2》，頁 132-136；〈米特凱維奇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不早於 1927 年 12 月 5 日於上海），《國際檔案 7》，頁 160。

18 〈致中央的信〉（1928/01/28），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 124。〈北方暴動計畫〉規定以京津、冀東、冀南和內蒙三特區為四大暴動區域進行暴動。當時中共中央曾針對北方局的暴動計畫發出警告，國際代表也批評「在北方提出武裝暴動作為行動口號的問題是錯誤的」。在 1928 年初彭述之離開順直省委後，中共中央仍然致信蔡和森和順直省委批評過去北方局的北方暴動計畫是玩弄暴動的軍事投機，要順直省委從北方局的錯誤中記取嚴重教訓。後來陳潭秋、周恩來等人到順直省委後亦認為是蔡和森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另外，當時中共山東省委也自我批評說 1928 年初的淄川暴動，實是山東省委只知盲從北方局暴動指示的惡果。見：劉道華、黃小同，《中共北方地區黨史研究》，頁 92；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共中央北方局 綜合卷》，頁 107；〈佩佩爾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7/11），《國際檔案 7》，頁 150；〈致順直省委及和森信〉（1927/12/25），《中央政治通訊》，期 16，臺灣法務部調查局：052.1/809/2777 v.1-2；〈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文件 順直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1928/07/22-23）、〈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文件 黨務問題決議案〉（1928/12/20-22），《河北文件 2》，頁 358-

甚至還說彭述之在來到順直省委後不久就有第三黨的傾向（當時尚無第三黨）等等，¹⁹ 最後竟然矯中央之命調彭述之離開天津，²⁰ 並乘彭離開天津之際，於 1928 年 1 月 27 日召開順直省委改組會議（一月改組會），把京綏路工人出身的王藻文拱上省委書記，蔡和森則是以中央巡視員之職領導順直省委工作。短暫的彭述之時代，就如此粗暴地被蔡和森結束掉了。

二、蔡和森、王藻文與順直省委

平心而論，八七會議後的中共中央原本亦是指示採取由下而上的群眾路線方式來整黨，號召全黨把過去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付在群眾之下加以審查」。²¹ 此一群眾路線，如後來毛澤東時期的整黨般，確實也起了相當大的震撼作用。作為「中間環節」的省級領導，是此一波整黨的主要對象，普遍被視為「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在機會主義者們手裡」，紛紛中箭落馬。²² 過去與「老頭子」陳獨秀相當親密的

359、592；〈中共山東省委關於政治黨務情形的報告〉（1928），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 1》（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下文引用之《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簡稱為《山東檔案》），頁 473-474。

19 〈爲述之、和森事向中央的報告〉（1927/12/23），《河北文件 2》，頁 75-76。

20 〈彭述之給中央常委的信〉（1928/02/14），《河北文件 2》，頁 179。當時中共中央僅要彭述之立即停職，由中央巡視員蔡和森會同順直省委徹查此案並報告中央核辦。蔡和森日後亦承認，當時中共中央確實沒有要調彭述之離開天津（蔡還因此不滿中央）。〈北方工作決議案〉（1927/12/04），《中央通信》，期 14，臺灣法務部調查局：052.1/809/V.1-2；〈關於順直問題的口頭報告〉（1928/09/15），《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 153、157。

21 〈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央文件 3》，頁 305。

22 〈米凱特維奇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不早於 1927 年 12 月 5 日），《國際檔案 7》，頁 164。

省級領導如彭述之及長江局書記羅亦農等人，在此一清算機會主義領導的風潮下，當然難以倖免。²³各地的省委領導在整黨過後，也幾乎威信盡失。其中順直省委在1928年一月改組會後，差不多可說是只剩下一個空招牌，不僅省委不能處罰下層黨員，甚至連最低限度分配工作的權威都沒有，因為大家都認為紀律就是機會主義。尤有甚者，黨員普遍認為，「群眾的意見都是對的」，「黨員有何意見，指導機關必須接受」；²⁴如果發現省委有機會主義的嚴重錯誤及怠工等毛病，還「可直接由黨員群眾動議撤銷其職務」；²⁵甚至黨內還普遍瀰漫著一股罵領導的風氣，認為誰能罵黨罵省委，誰就是好漢等等。²⁶群眾路線的威力，可見一斑。

但是，這個時候的群眾路線又是不徹底的。如前述彭述之等人事實上也沒有被「付在群眾之下加以審查」，只是因為中央或蔡和森個人的一紙命令就被撤職，彭當然不會服氣，也不可能像後來整黨時的

23 彭述之與羅亦農兩人早年皆曾赴莫斯科東方勞動主義者大學學習，還是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的主要負責人。在1924-1925年間，彭、羅回國工作後，與許多同樣是旅莫歸國的學生結成所謂的「旅莫派」，在黨內發揮重大的影響力。據張國燾所言，這些「旅莫派」不過是一些圍繞在陳獨秀周圍，捧著陳獨秀招牌發號施令之不切實際的書生。作為此一旅莫派首領的彭述之與羅亦農兩人，則是當時陳獨秀相當依賴的左右手。當彭述之在順直省委遭到清算的同時，長江局書記羅亦農也在1927年底因湖北下層黨團員的批判，遭到撤職的處分。見：鄭超麟，《懷舊集》，頁66、68-6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頁10、13-14；陳耀煌，〈路線之爭？——中共湖北省委事件（1927-1928）〉，胡春惠、吳景平主編，《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變遷》（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香港：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頁651-671。

24 〈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文件 黨務問題決議案〉（1928/12/20-22），《河北文件2》，頁592-593。

25 〈順直省委通告第一號〉（1928/01），《河北文件2》，頁99-100。

26 〈順直黨的現狀〉（1928/07/11）、〈巡視順直工作報告〉（1928/09/09），《陳潭秋文集》，頁34-36、40-41。

做法般，自我批判。再者，那些被提拔起來取代「機會主義領導」的工農份子，也不是像後來的整黨般，係從激烈的群眾運動中出身的積極份子，而只是由上而下地指派。究其實，當時中共根本也沒有真正地由下而上地動員群眾。那些工農成份出身的黨員，事實上也早已脫離群眾化了。

如前章所述，李大釗領導時期的北方革命，由於過份強調上層政治、軍事手段的運用，以至黨員的活動大多侷限在國民軍或國共兩黨領導機關內，嚴重脫離社會，成為靠「革命津貼」過活的職業革命家。²⁷ 甚至那些工人群眾出身的黨員亦是如此，蓋當時北方黨內的許多工人黨員，原本便是共產黨用錢請來的，他們認為「共產黨是有錢的，共產黨要他們革命當然要出錢請他們」，就算「不請他們革命，也是要錢的」，他們不向路局鬥爭要工餉，「倒向黨要」。²⁸ 而且他們領取的革命津貼還不在少數，如前章提到的唐山工人梁鵬萬被調赴香港活動時，中共給他的津貼是每月 50 元，相當北京城內工資的最高標準。²⁹

不過，當時共產黨發給黨員的革命津貼，多是取自國民黨方面的

27 中共黨內有所謂「革命職業家」和「普通黨員」的區別。前者係指那些因全部時間用來做黨的工作而不得不靠黨吃飯者，後者則是指在社會中從事職業養活自己，並繳交黨費者。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頁 135。

28 〈河南省委報告（節要）〉（1927/09/04），《河南文件 2》，頁 83-84。

29 〈梁鵬萬致中夏信〉（1923/10/27），《廣東文件 1》，頁 151。1927 年時北京工人的薪資，最高者是電話工人的每月 40 元，最低者如機器、印刷、自來水、地毯、校役工，每月只有 6 元。〈北京特別市黨部工人部五月份報告〉（1927/07/04），黨史館：部 10999。又，根據 Sidney D. Gamble 的調查，1910 年代末期北京市工人的平均工資為 4.5-6.5 元，至於當時北京的基本生活費，二口之家一年需 65 元，四口之家一年需 93 元，低於此一水平者即屬貧困者。Sidney D. Gamble, *Peking*, pp. 183, 270.

經費，故自國共分家以後，共產黨失去了「一切特殊的經費來源」，也無法再從國民黨方面獲得所需的工作經費及黨員薪津。³⁰ 當時順直省委即言：「民校（按：國民黨）經費前途更屬茫然，故賴民校維持我們各處黨，是已然不行了，那麼各處黨的工作馬上要受很大的影響。」³¹ 這就暗示了，在李大釗時期河北黨的經費主要是取之於國民黨直隸省黨部的經費。在國共分裂以後，此一經費來源斷絕，固然江浩、于樹德等人曾事前把部分國民黨省黨部經費提領出來，³² 但終究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故不可能再如李大釗時期般豢養著許多「革命職業家」。這就意味過去許多靠黨吃飯的革命職業家，必須要重回社會靠自己的力量謀生，還要繳納黨費。然而，對於那些脫離群眾和社會甚久的「群眾」來說，要再重回社會工作，談何容易。因此，不少黨員仍希望能留在黨的領導機關裡，領取革命津貼靠黨吃飯，或至少由黨發給救濟金，以維持生活。但順直省委本身亦因經費困難，故不可能答應所有這些要求，如此就難免引起許多「群眾」黨員對省委的不滿，如 1928 年一月改組會上被提拔為省委書記的王藻文便是其中的一位。

王藻文，京綏路工人出身，曾於 1926 年初擔任天津總工會主席。在彭述之到來以後，王藻文等京綏路工人因失業向黨要求救濟，彭述之不買帳地說：「失業是個人問題，黨不管。」「你們去拉膠皮（人力車）。」³³ 王藻文因此憤憤不平，並在京綏路工人間大做反黨宣傳，導

30 〈蘇兆征和向忠發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8/05/07）、〈中國共產黨代表給農民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8/05/16），《國際檔案 7》，頁 446、455。

31 〈順直省委每月經費預算的請示〉（1927/08/12），《河北文件 2》，頁 58-62。

32 宋柏主編，《北京現代革命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頁 88。

33 〈順直省委關於京綏路及西北工作方針〉（1928/01），《河北文件 2》，頁 102。

致省委與地方工人黨員間出現裂痕。³⁴ 至於彭述之所以拒絕王藻文的要求，有學者批評是彭個人生活奢華及不理會下層工人黨員的生活之故，³⁵ 孰不知省委委員出入坐車或穿著華麗之衣服等奢華行爲，實有其工作上的需要，中共中央亦有相關規定，³⁶ 故此一批評沒有道理。我們認爲，彭述之所以拒絕王藻文的要求，實在是由於省委經濟困窘所致。

但是，爲了倒彭而倒彭的蔡和森可顧不了這麼多。他來到北方之後，立即派遣王仲一前去拉攏王藻文等京綏路工人。³⁷ 王仲一，又名王振翼，山西天鎮縣人，他雖是知識份子出身，但早自 1922 年起就在京綏路工人間活動，與王藻文原本便相當熟識，而且他也反對彭述之的省委領導，說他們「都是一些老爺們，工人看他們是先生們」。³⁸ 1927 年 9 月下旬，蔡和森先後改組北京市委和順直省委，其中新北京市委便是由京綏路工人出身的王蓋臣擔任書記（後於 10 月北京市委的大破壞中被捕叛變），³⁹ 王仲一則取代陳爲人擔任省委工委的領導職務，當時對此一改組相當不滿的北京市黨員，便批評這是王仲一的「鐵路組派」排斥劉伯莊、陳爲人的作爲。⁴⁰ 至於王藻文，也在隔年一月改組會上當選省委書記。日後中共中央指順直省委衝突事件中應當負最嚴重責任者是蔡和森、王仲一與王藻文三人，此一指控不無

34 〈關於順直問題的口頭報告〉（1928/09/15），《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 150-151、155。

35 宋柏主編，《北京現代革命史》，頁 88。

36 〈中共山東省委關於政治黨務情形的報告〉（1929），《山東檔案 1》，頁 477。

37 〈關於順直問題的口頭報告〉（1928/09/15），《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 155。

38 〈順直代表王仲一的發言〉（1928/06/26），《黨史人物(-)》，頁 178-179。

39 此即所謂「藤牌營慘案」，北方局書記王荷波等人在此事件中遇害。宋柏主編，《北京現代革命史》，頁 85。

40 〈彭述之給中央常委的信〉（1928/02/14），《河北文件 2》，頁 174-175。

道理。⁴¹

根據王藻文日後所言，蔡和森的改組完全靠拉夫，無條件地提拔工農份子；所謂的教育工人也只是空頭，完全是「捧」。⁴² 所謂的「捧」，簡單地說就是用金錢收買，⁴³ 最多也只是假濟難會「救濟」之名以行之。⁴⁴ 當時河北濟難會的領導，正是工人出身的前順直省委書記朱錦棠。據蔡和森所言，朱在一月改組會後主張普遍救濟失業黨員，蔡和森最初雖反對，後來仍是妥協，決定由地方區委自行決定。⁴⁵ 結果不僅失業工人有津貼，在業工人也有，⁴⁶ 特別是省委所在地的天津工人黨員領得最多。原來自改組會後省委書記王藻文曾向天津紗廠工人出身的省委委員李德貴、⁴⁷ 王德振等人說，大家作工吃飯不成問題，公然分錢給工人黨員。最初王藻文仍以救濟為名，但後來卻變本加利，發給所有工人黨員津貼，整個天津第一區區委被視為

41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產國際的報告〉（1928/11/2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選輯（1927-193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 43。

42 〈王藻文的談話〉（1929/01/22），《河北文件 23》，頁 47。

43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產國際的報告〉（1928/11/28），《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選輯（1927-1933）》，頁 43。

44 〈順直省委最近工作情況報告〉（1928/09/20），《河北文件 2》，頁 488。此種「博愛主義」乃當時中共黨內普遍存在的傾向。如共產國際代表便痛斥中共把黨的大部分預算花在救濟失業人員的慈善活動上，致使經濟更加困窘，並呼籲共產國際不要支持這種人道主義。〈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02）、〈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05/01），《國際檔案 7》，頁 362、424。

45 〈對順直問題的書面報告〉（1928/11/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 165。

46 陳潭秋，〈巡視順直工作報告〉（1928/09/09），《河北文件 2》，頁 479。

47 李德貴因日後背叛中共，遭中共暗殺，故當代大陸官方著作甚少談及此人。但根據另一位天津工人出身的山東籍黨員司呈祥回憶，李是天津紗廠出身的舊黨員。在 1928 年初，省委委員傅茂公（彭真）原本要找司呈祥去省委工作，但司考慮到李德貴當時正失業，故推薦李德貴去省委工作。司呈祥，〈參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動的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10，頁 96-97。

「分錢會」。但由於錢不敷分配，只有李德貴等少數負責幹部有錢，因此工人黨員大為不滿，批評李德貴，此事才爆發出來，王藻文也被傳喚到中央批判。但王仍堅持己見，說工人黨員辛苦，應該獲得津貼。他回到順直省委後，仍然繼續發錢。不過，王藻文僅帶回去數百元，旋即用盡。中共中央又在此時致信順直省委，要省委自己解決經濟問題，王藻文與王仲一因此不滿，說中共中央不要順直。⁴⁸ 借用後來陳潭秋與劉少奇的話來說，王藻文這批人根本不是什麼「群眾」，只是純粹想靠黨吃飯的「僱傭革命黨棍」或「流氓無產階級」。⁴⁹ 以這種「群眾」黨員取代彭述之等所謂「機會主義領導」的辦法，與後來群眾路線式的整黨本質上大異其趣。

三、劉少奇、陳潭秋與順直省委

192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順直工作，決定派劉少奇赴天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身份，領導全國鐵路總工會的工作，並同時以中央委員的身份領導順直省委。⁵⁰ 劉少奇來到北方後，首先注意到的即是順直省委內部鬧得烏煙瘴氣的僱傭革命問題。為此，劉少奇領導的順直省委乃指示各級黨部必須嚴格徵收黨費，並規定如有連續三個月不繳者，即予開除。⁵¹ 然而，當時河北黨內部僱傭革命的習氣已深，不少黨員不僅拒繳黨費，甚至當國民黨

48 〈關於順直問題的口頭報告〉(1928/09/15)，《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156-157；〈順直省委黨務工作報告〉(1928/07)，《河北文件2》，頁431。

49 陳潭秋，〈巡視順直工作報告〉(1928/09/09)、趙啓，〈怎樣改造順直的黨？〉(1928/11/17)，《河北文件2》，頁481、535。

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76。

51 〈順直省委通告第四號〉(1928/06/01)，《河北文件2》，頁305-306。

政權佔領北平（北伐軍於 1928 年 6 月佔領北京後，將北京改名為北平）、天津後，許多工人黨員抱怨給國民黨幹有錢，給共產黨幹是白幹，因此大批倒戈投靠國民黨。⁵² 天津工人出身的省委候補委員黃金榮等人還因索錢未遂而向國民黨告密，以至整個天津的工作幾乎完全塌台，僅能勉強維持。⁵³ 王藻文等「流氓無產階級」雖然在隨後的順直省委七月改組會（見後述）上遭到罷黜，但仍然繼續在平津地區煽動那些被開除工作、留黨察看，或被停止津貼之動搖黨員反對新省委（如挑撥順直省委交通安體仁，說省委懷疑他勾結以脫黨份子于樹德為首的「北平政務會」，要謀害他，提醒他小心等），致使後來的順直省委領導陷入嚴重的困境。⁵⁴

當然，劉少奇倒也不是完全否認革命職業家存在的必要，如據王藻文日後所言，劉少奇到河北後事實上也極力「捧」他；⁵⁵ 蔡和森也說，劉少奇認為這些工人黨員縱然有些毛病，但「的確還是群眾的領袖，工作一起來這些小毛病不大成問題，現在的問題只是經濟太困難了，假若錢多工作是容易起來的」。⁵⁶ 究其實，當時劉少奇與地方黨員間所以會爆發衝突，也並不完全是由於僱傭革命的問題，而係肇因

52 〈順直省委最近工作情況報告〉（1928/09/20），《河北文件 2》，頁 488-489。

53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 116-118；〈順直省委報告第一號〉（1928/08/22），《河北文件 2》，頁 460-461；小孩，〈濟難會的救濟工作〉（1929/01/27），《河北文件 3》，頁 74。

54 〈順直省委最近工作情況報告〉（1928/09/20）、〈安體仁的申明書〉（1929/02），《河北文件 2》，頁 494-495、763-764。于樹德即前章所述早期中共天津黨的領導幹部之一。他在國共分裂以後的 1928 年初前後，在香港加入由譚平山等人所組織的「第三黨」。〈索洛維耶夫給布哈林的信〉（1928/02/06），《國際檔案 7》，頁 301。安體仁，河北豐潤人，從他的姓名及其與于樹德的關係推測，他應該是早期中共天津黨兼國民黨新中學會成員于樹德、安體誠的親友。

55 〈王藻文的談話〉（1929/01/22），《河北文件 23》，頁 48。

56 〈對順直問題的書面報告〉（1928/11/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 164。

於平民式群眾暴動路線的相關爭執。

如前所述，在李大釗時期，中共中央與北方黨過份依賴上層政治、軍事的手段去推動革命，直到 1927 年 9 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正式宣告放棄利用國民黨的旗幟推動革命，⁵⁷ 故在此之前便已來到北方的彭述之與蔡和森等人仍舊帶著國共合作的心態從事活動，順直省委也依然繼續高舉「青天白日」的旗幟，直迄接受十一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新決議為止。⁵⁸ 在此會議上，鑒於八七會議以後許多黨員仍保存對於「左派國民黨」等中間份子的幻想，中共中央乃提出「蘇維埃的工農民權獨裁的口號」，以及「無間斷革命的理論」，即指中國革命將從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急轉直下地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⁵⁹ 如此一來，黨員不僅要發動平民式的暴動，還必須徹底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乃至於建立屬於工農群眾的蘇維埃政權。

順直省委雖然接受了十一月擴大會議的決議，但由於當時順直黨內忙於倒彭，所以也沒有貫徹決議，很多下層地方黨員還是採取過去國共合作時期的老辦法。劉少奇對此相當不滿，並在 1928 年 4 月北伐軍佔領京津前夕，由順直省委發出一決議，要黨員乘機進行暴動，「實行部分的奪取政權，一直到總的全省的大暴動」，並要黨員組織群眾，準備「將來參加殺人、放火的工作」。至於那些「與國民黨任何機關及蔣馮閻機關接洽者，開除」！⁶⁰ 然而，對於那些已習慣上層統戰活動，以及假國民軍、國民黨的招牌由上而下地推動革命的北方黨

57 〈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1927/09/19)，《中央文件 3》，頁 369。

58 〈順直報告〉(1927/11/19)，《中央政治通訊》，期 16，臺灣法務部調查局：052.1/809/2777。

59 〈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央文件 3》，頁 453、459。

60 〈順直省委通告〉(1928/04/11)，《河北文件 2》，頁 289-304。

員來說，這種平民式殺人放火的行動及推翻國民黨和軍閥政權的指示，實在難以接受。結果，不僅王藻文等北方黨員極力反對劉少奇的指示，早已與王藻文等人打成一片的蔡和森也向中共中央打劉少奇的小報告。中共中央也因此動怒，批評該指示「完全受農民意識的支配」，「表現極多成份的盲動主義」。⁶¹事實證明，劉的指示也未曾實現，如當北伐軍於1928年夏抵達天津之際，仍有中共黨員隨著普通群眾高舉青天白日旗前往歡迎；⁶²唐山的工人群眾甚至在北伐軍抵達以後，還「辨不清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⁶³由此看來，劉少奇真可謂弄巧成拙了！

很明顯的，無論是劉少奇還是中央於1928年7月派來巡視的陳潭秋（湖北黃岡人，中共湖北黨的創始人之一）等外來領導，如欲擊敗王藻文等「僱傭革命黨棍」或「流氓無產階級」，同樣也必須像蔡和森般尋求其他地方黨員的協助。只不過與蔡和森不同，陳、劉所尋求的合作者主要是那些知識份子出身，曾在天津、保定等城市求學並入黨，後回到家鄉從事活動的地方黨員。正如陳、劉日後所承認者，下文將提到的七月改組會是在「小資產階級的擁護之下」擊敗王藻文等流氓無產階級。只不過當時由於過份「將就小資產階級的意識」，致改組會後的河北黨「又重新被小資產階級意識所支配」。⁶⁴

61 〈關於順直問題的口頭報告〉(1928/09/15)、〈對順直問題的書面報告〉(1928/11/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157、164；《中共中央北方局 綜合卷》，頁112。

62 〈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文件 宣傳工作決議案〉(1928/12/20-22)，《河北文件2》，頁619。

63 〈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文件 黨務問題決議案〉(1928/12/20-22)，《河北文件2》，頁587-589。

64 〈巡視順直工作報告(二)〉(1928/11/08)，《陳潭秋文集》，頁55-56；趙啓，〈怎樣改造順直的黨？〉(1928/11/17)，《河北文件2》，頁540。

表 2-1 順直省委事件年表

| 順直省委 | 中央 |
|--|--|
| | 1927年 |
| | —4月 李大釗被捕處死，中共北方區委遭到破壞。 |
| | —5月 中共五大召開，決議成立順直省委。 |
| ○ 順直省委正式成立於天津，彭述之擔任書記。 | —8月 八七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革命進入瞿秋白時期。 |
| ○ 蔡和森攜帶八七會議決議前往北方，負責成立北方局，並改組順直省委，由朱錦棠取代彭述之任省委書記。 | —9月 中共中央正式宣告放棄國民黨的旗幟。 |
| ○ 北方局發佈〈北方暴動計畫〉。玉田暴動爆發，旋即失敗。 | —10月 |
| | —11月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彭述之、蔡和森二人皆與會。 |
| | 1928年 |
| ○ 順直省委召開改組會議，王藻文取代朱錦棠擔任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離開北方。 | —1月 |
| ○ 劉少奇以中央委員及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身份前往北方，領導全國鐵路總工會及順直省委的工作。 | —3月 |
| ○ 保南第二省委事件爆發。 | —5月 |
| ○ 北伐軍占領京、津。 | —6月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向忠發取代瞿秋白任中央書記，瞿秋白時期結束，中國共產革命進入六大路線時期。 |
| ○ 陳潭秋抵達北方，與劉少奇聯合地方下層知識份子黨員，召開順直省委改組會，把蔡和森、王藻文與王仲一驅逐出省委，並由韓連會任省委書記。 | —7月 |

- 京東護黨請願團事件爆發。
 - 代表六大路線的周恩來來到北方，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批評陳潭秋與劉少奇的作法，並重新改組省委，由新任省委組織部長張慕陶掌握省委實際領導權。一年半載以來的順直省委事件就此落幕。
- 10月

—12月

↓

當時順直省委內有一位專門從事農運的黨員叫閻懷聘者，正定縣北豆村人。正定縣乃保定南部(保南)農村地區中共黨務活動的中心，閻本人則是於保定讀書時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赴天津工作，並曾赴廣州農運講習所學習。北伐時期，閻被派回北方農村地區工作，赴玉田活動，但由於語言不通，不能融入當地農村，故又回省委工作。⁶⁵ 1928年順直省委一月改組會後，省委透過閻的關係，與以正定為中心的保南黨恢復了關係。然而，此次的久別重逢竟是以不愉快的結局收場。保南地區的黨員在得知省委之情形後，大表不滿，一方面批評省委不要保南，既不給指示，也沒有津貼；再者，由於一月改組會沒有保南、冀西地區的黨員參加，故保南黨員認為該改組會不合法，應即召集全省黨員大會組織正式省委。閻懷聘把保南黨員的抱怨帶回省委後，蔡和森卻沒有打算回應，反而改組正定縣委，「淘汰消極、怠工、動搖的知識份子」。⁶⁶ 閻懷聘回正定後，乃因此大肆鼓動黨員否認省委，並聯絡保南、冀南各縣黨員，於5月初召開代表大會，成立臨時省委。⁶⁷ 此即所謂保南第二省委事件。

閻懷聘等另立省委的保南黨員，就當時中共的組織原則來看，即

⁶⁵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72。

⁶⁶ 〈順直省委關於正定縣委目前工作方針〉(1928/03)，《河北文件2》，頁283。

⁶⁷ 〈巡視順直工作報告(-)〉(1928/09/09)，《陳潭秋文集》，頁43。

便稱不上是叛徒，亦是分裂黨的機會主義者。然而，在陳潭秋、劉少奇等人看來，第二省委事件正好為他們召開七月改組會提供一個極好的藉口。正如蔡和森日後的批評，七月改組會有「遷就保南同志反對省委乃合法之意」。⁶⁸ 當時中共中央亦已從赴滬報告之順直團省委書記尹才一的口中得知此事，乃立即指示陳潭秋停開會議，先赴保南地區巡視並解決問題。但當時改組會業已閉幕（7月22-23日），陳潭秋亦極力辯稱保南工作開展較他處稍好，該地黨員是積極的，是站在工作觀點上反省委的。⁶⁹ 無論如何，木已成舟，七月改組會把正在莫斯科參加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大）的蔡和森、王藻文、王仲一驅逐出省委，由另一位津浦路工人出身的韓連會任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後來也承認既成事實，說七月改組會雖有一些小的缺點，但在總的路線上與六大沒有矛盾。⁷⁰

68 〈對順直問題的書面報告〉（1928/11/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164。

69 〈巡視順直工作報告(-)〉（1928/09/09），《陳潭秋文集》，頁43。

7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78。蔡和森後來由於他在順直省委犯的錯誤，以及當時黨內同僚李立三、瞿秋白和周恩來等人對他的不滿，被撤銷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位，由李立三取代其職。但當時共產國際代表反對此一處分，認為該處分破壞了黨內的團結。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產國際的報告〉（1928/11/28），《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編（1927-1933）》，頁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20；〈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12/10），《國際檔案8》，頁48-50。

王藻文與王仲一後來被開除候補中央委員的職位。其中前者在1929年因中共欲予暗殺未遂而叛黨，導致順直省委的大破壞；後者是在被調到江蘇工作後，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且與已脫黨的陳獨秀、彭述之等「取消派」份子維持著曖昧關係，於1930年10月被開除出黨。王仲一之弟在五十年後致信中共中央，希望為其兄洗刷冤屈，但經中共中央組織部調查，王仲一在順直省委時期確實製造了「黨內派別無原則的糾紛」，故拒絕王仲一之弟的要求。〈中共中央組織部（79）幹審字209號〉，《黨史人物(-)》，頁177。

四、京東護黨請願團事件

儘管陳潭秋與劉少奇是在「小資產階級」的合作下推翻王藻文的省委，但他們實際上與這些小資產階級間也存在嫌隙。正如冀東農運領袖張明遠所言，陳潭秋任內的省委書記雖係工人出身的韓連會，但實際掌權者卻是陳潭秋。陳相當重視城市工作，忽視農村工作，在任用幹部上也受到唯成份論之影響，以工人階級為主。如張明遠雖然名列省委委員，但陳潭秋從未要他彙報農運工作，也沒有與他談過任何意見或指示，甚至連省常委開會也不通知他。⁷¹ 至於鼓動第二省委的閻懷聘等人，在改組會後，雖未被開除黨籍，但也受到留黨察看之處份。⁷² 唯一一個受到重用的保南地區黨員是郝清玉，一位鞋店工人出身的黨員。毫無疑問，陳潭秋在七月改組會後的舉措，不能使這些小資產階級地方黨員沒有受到欺騙的感覺。

陳潭秋、劉少奇所以不願重用這些小資產階級黨員，一個原因就是擔憂他們不能貫徹群眾路線。這些黨員秉持過去李大釗時期的作風，較強調上層統一戰線以及由上而下的革命活動。以熱河籍黨員韓麟符為例。如前所述，韓雖然在最初一段時期表現得相當激進，並反對與老一輩內蒙古民族主義者白雲梯等人合作，還組織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與白雲梯的內人黨相抗衡。但韓本人是知識份子菁英，而且還是身居要津的政治人物，不是下層群眾。他不僅利用關係在其家鄉熱河南部地區拉了一支屬於自己的武裝，還霸佔內蒙古三特區國民黨黨部，排斥異己，惹得中共中央和李大釗不滿，被迫離開內蒙古到南方

71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 120-121。

72 〈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文件 政治紀律決議案〉（1928/07/22-23），《河北文件 2》，頁 424-425。

活動。韓後來曾參加南昌暴動，在暴動失敗後又回到北方，與杜真生和鄭丕烈等熱河籍黨員取得聯繫。⁷³1928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隸屬順直省委領導的內蒙古特支，韓麟符被任命為特支書記。⁷⁴

根據順直省委的指控，韓麟符在赴熱河任職經過冀東途中，竟鼓動該地黨員接受張敬堯、徐永昌等軍閥的委任，還為這些軍閥在冀東收編潰軍，甚至派黨員去任軍官等等，如唐山市委書記趙鏞⁷⁵便受韓麟符的委派，率領一批動搖黨員及失業的工人黨員投靠褚玉璞，自己擔任營長。順直省委因此決議開除韓麟符內蒙特支書記的職位並予留黨察看。⁷⁶韓本人雖然承認與當地軍隊合作，但他辯稱說這是因為省委給他的錢不夠，加上途中遭到打劫，以至到冀東後寸步難行。恰巧當時有張次屏、張開運等軍官，接受日本關東軍的委任來到冀東活動，韓便打算「用軍閥名義得到他一點錢」，以便發動農民工作，絕無依賴軍事力量的投機觀念。⁷⁷韓雖然希望取信於省委，但一方面卻與內蒙古籍黨員楊洪濤⁷⁸等人聯繫，打算另組省委來幹，計畫打通外

73 杜真生、鄭丕烈二人早在蔡和森時期便被派回熱河，企圖聯絡過去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的會員，準備暴動。當時彭述之譏笑杜、鄭等人無何等實力，多係吹牛，純為騙取旅費而已。廣鈞，〈杜真生簡介〉，《韓麟符》，頁141；〈致中央的信〉（1928/01/28），《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126-127；〈彭述之給中央常委的信〉（1928/02/14），《河北文件2》，頁182-183。

74 周昶陸、趙志明，〈韓麟符的一生〉，《韓麟符》，頁46。

75 趙鏞，陝西府谷人，黃埔軍校出身，曾參加玉田暴動，後被逮捕，抗戰時在冀魯豫邊區和魯南區抗日根據地活動，1941年被日軍殺害。陳華魯，〈趙鏞〉，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15（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296-321；張明遠，《我的回憶》，頁91。

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頁120。

77 〈韓麟符關於在京東農運情況與對個人處罰的申述〉（1928/09/05），《韓麟符》，頁147-148。

78 楊洪濤，察哈爾宣化人，和韓麟符相同，也是早期天津學生運動的領袖及中共內蒙

蒙，與共產國際直接發生關係，如果中共中央不承認，即直接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當時他們還在地方黨員間散佈說，現在仍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革命沒有軍事力量是不能成功的」！⁷⁹

陳潭秋領導的順直省委，高舉平民革命的旗幟，反對韓麟符般片面強調上層統戰的作法，原本也無可厚非。但許多天津、冀東和熱河地區的地方黨員與韓有密切的關係，而且他們自過去李大釗時期以來就執著於上層統戰，所以也贊同韓的主張，不少人還在韓的鼓動下去張敬堯等軍隊中當軍官。再者，這些小資產階級在七月改組會後，未能在省委中獲得更多的權位，早已相當不滿。省委對韓的懲處，無疑更是火上加油。因此之故，在韓的懲處被通過後，佔有順直黨「中級幹部」多數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之國共合作時期的「老人」，⁸⁰便起來到處鼓動。這些「老人」，如與韓麟符同樣是新生社出身的李希逸，四處奔走批評省委開除韓麟符的方法不正確，煽動地方黨員反對省委開除韓麟符；⁸¹他們還質疑七月改組會不合法，說該會如同一月改組會般，是上層拉夫式的改組，不能代表下層群眾的意志，只是「跋扈」的陳潭秋等人狼狽為奸的把戲，因此要求再召集一個全省黨

古黨的領導人物之一，1929年被捕出獄後投靠楊虎城，後來中共與楊虎城的合作，楊洪濤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頁 695。

79 〈順直省委最近工作情況報告〉(1928/09/20)，《河北文件 2》，頁 494；〈順直省委中字二號〉(1929/01/02)，《河北文件 3》，頁 1-2。當時也有許多內蒙地方黨員認為由於民族議題在內蒙地區仍是首要的，故在內蒙地區仍有必要繼續與國民黨合作。見：〈順直省委關於內蒙目前工作計劃〉(1928/09)、〈順直省委關於內蒙工作問題向中央的報告〉(1928/09)，《河北文件 2》，頁 496-506。

80 〈關於改組順直省委的請示報告〉(1928/11/17)，《陳潭秋文集》，頁 62。

81 〈兩封公開的信〉(1928/12/31)，《河北文件 23》，頁 45。

員代表大會，重新改組省委。⁸²

尤有甚者，這些「老人」還挑起河北黨內地方情結的衝突，批評劉少奇及之前的彭述之都是過去曾在南方犯過錯誤者，⁸³ 還說當時省委內部有一個山西派（如前述的王藻文、王仲一皆是山西人），這個山西派不僅不了解河北地方下層的情形，其中為首的傅茂公（彭真）還是一個相當壞的人。彭真是山西曲沃人，在山西求學時加入共黨，1925年由於閻錫山的通緝轉赴石家莊從事工人運動，後來再度因為被通緝而被調往天津做工人運動。⁸⁴ 由於彭真的工人運動經驗，後來歷屆省委領導皆相當器重他，如彭述之便稱贊他能群眾化，觀念亦好。⁸⁵ 蔡和森在一月改組會後，亦調彭真來省委工作。後來王藻文赴莫參加六大時期，彭真還代理省委書記一職，此與劉少奇和陳潭秋的重用當然不無關係。可是，河北地方「老人」黨員很不喜歡彭真，如李運昌（李芳歧，河北樂亭人）領導的樂亭縣委便批評彭真破壞黨的紀律，說一位已被縣委開除黨籍的黨員王成奎，竟然只需在天津和彭真談過一次話，便恢復了黨籍，甚至王還威脅樂亭縣委說：「縣委沒有權力開除我，省委已恢復我的黨籍」。⁸⁶ 另一位「老人」張兆豐也批評說，彭真要軟硬手段應付工作和同志，這是要發生許多困難的；冀東農運領導葉善枝主張「直人治直」、「反對山西人指導直隸工作」，明顯亦是對彭真而發。⁸⁷ 甚至同樣是山西人的王藻文，日後亦向中央

82 〈巡視順直工作報告〉（1928/09/09）、〈張兆豐致中央的信〉（1928/10/05），《河北文件 2》，頁 480、511-512；〈巡視順直工作報告(二)〉，《陳潭秋文集》，頁 54。

83 〈張兆豐致中央的信〉（1928/10/05），《河北文件 2》，頁 515。

84 田西如，《彭真傳略》，頁 46-54。

85 〈彭述之關於順直組織的報告〉（1928/01/05），《河北文件 2》，頁 83。

86 〈樂亭縣委關於改造順直黨的意見〉（1928/12/18），《河北文件 17》，頁 34。

87 〈張兆豐致中央的信〉（1928/10/05），《河北文件 2》，頁 515。

指控說彭真和他一樣，拿錢收買工人黨員，如前面談到的李德貴便是被彭真提拔到省委當「脫產」的革命職業家。⁸⁸

無論如何，在李希逸、張兆豐、葉善枝等「老人」的煽動下，河北黨內再度掀起一股反省委的浪潮。10月13日，唐山市委領導人傅蔚如與趙鏞、玉田縣委書記宋哲三及樂亭縣委代表李運昌等人組成「京東代表團」（京東護黨請願團），當面向陳潭秋抱怨，並請陳轉達他們的意見書給中央。⁸⁹但陳潭秋等省委領導勃然大怒，其中彭真甚至主張取消下層黨部。⁹⁰省委後來也決議停止冀東四縣縣委及市委的職務，並派人去接收工作。⁹¹然而，冀東黨員不服從省委的改組，拒絕交代工作，還扣留替省委送信給傅蔚如的郭宗鑒，其中葉善枝並且煽動郭宗鑒說：「不要太蠢，不要傻幹，不要受別人（按：指彭真）利用。」甚至傅蔚如等人還威脅郭宗鑒交出陳等人的地址，打算「結果」他們。⁹²

當然，陳潭秋沒有轉達京東代表團的請願書給中央，還向中央打小報告，批評這些地方黨員是「極端民主化」（冀東黨員則反譏說過去省委的領導根本無所謂的民主，何來極端之有）。⁹³陳等省委領導

88 〈王藻文的談話〉（1929/01/22），《河北文件 23》，頁 47-48；司呈祥，〈參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動的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10，頁 97。

89 〈與李啓芳談話〉（1928/12/20），《河北文件 2》，頁 583；〈樂亭縣委關於改造順直黨的意見〉（1928/12/18），《河北文件 17》，頁 35。

90 〈與李啓芳談話〉（1928/12/20），《河北文件 2》，頁 583。

91 〈關於改組順直省委的請示報告〉（1928/11/17），《陳潭秋文集》，頁 60。

92 〈關於北方黨糾紛問題〉（1928/12/06），《陳潭秋文集》，頁 65-66；芝，〈一封覆信〉（1929/02/07），《河北文件 3》，頁 136-137；昌偉，〈兩封公開的信〉（1928/12/31），《河北文件 23》，頁 44。

93 伍豪，〈改造順直黨的過程中幾個問題的回答〉（1928/12/18），《河北文件 2》，頁 567。

還說順直從來都沒有「黨」，因為順直黨起源自一些知識份子的小團體，沒有深入無產階級的基礎；國共分裂以後，這些小資產階級逐漸落伍；一月改組會上，順直黨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受到一個打擊，但取而代之的是流氓無產階級的意識；七月改組會著重打擊流氓意識，因此小資產階級意識又再度抬頭。可以這麼說，順直黨過去的基礎已經腐爛，即使再召開一個以這些舊黨員為基礎的全省代表大會，順直黨也不可能獲得轉變，蓋「白種人生的兒子還是白種啊」！相反的，應該由中央擔負起改造任務，由上而下地改造順直黨，把無產階級意識灌輸到順直黨當中。⁹⁴ 因此之故，陳潭秋等人乃停止省委工作，並請中央派員組織一特委處理一切工作。⁹⁵

陳潭秋的批評難免有給河北黨亂帶帽子的嫌疑，但卻點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河北黨內部原來即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裂痕，如個人意氣之爭、地方情結、僱傭革命引申出來的利益糾葛，或是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間的工學界線等等。這些裂痕大多來自於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即一個原本就被各種政治社會網絡與關係所撕裂的社會。在李大釗死後，這些裂痕慢慢地浮出表面。蔡和森、劉少奇與陳潭秋等人訴諸由上而下的組織紀律，企圖消弭這些裂痕的做法，反而加深了彼此間的鴻溝。這也就證明了，中共不可能單純依靠黨組織機械的力量，鞏固他的統治，甚至對黨組織的領導。

94 趙啓，〈怎樣改造順直的黨？〉（1928/11/17），《河北文件 2》，頁 530-544；〈巡視順直工作報告（二）〉（1928/11/08），《陳潭秋文集》，頁 56。

95 〈順直省委通告〉（1928/10/28），《河北文件 2》，頁 517-518；〈韓連會、陳潭秋、劉少奇致傅蔚如信〉（1928/10/28），引自《劉少奇傳》，頁 122。

第二節 六大路線與河北革命

一、張慕陶與六大路線的執行

隨後，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前來北方解決此一衝突，並於 1928 年 12 月底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實際上是個改組會議，故以下簡稱十二月改組會。只不過與劉少奇、陳潭秋的期望相反，十二月改組會的精神傾向與地方黨員妥協，如前述與省委敵對的張兆豐、葉善枝等人，不僅未在會議後遭到懲處，其中張兆豐還成爲 1929 年新省委的軍委領導人，葉善枝則是農民運動委員會的成員，並兼領新成立的「教學委員會」。十二月改組會選擇與地方黨員妥協，實在是現實環境的使然下不得不採取的策略。蓋如前述，當時河北地方黨員大多如韓麟符等人般，較強調上層的統戰路線，並更傾向於由上而下地去推動革命，而且他們確實也多是小資產階級出身。如果說韓麟符等黨員是腐爛與不好的，那整個河北乃至於北方就真的如陳潭秋所說的般，是從來都沒有黨的。況且，這些地方黨員在地方上都很有勢力，如要另起爐灶再找新的黨員，恐怕也很難與這些舊黨員脫得了關係。當時「老人」張兆豐便不無誇耀地說，離開了舊的線索，是絕對找不到新線索的，⁹⁶這也是事實。因此，周恩來來到河北後，一方面既爲那些舊黨員解套，說每個黨員都免不了犯過或多或少的錯誤，故現在的做法並非是掃除過去的舊黨員，而是號召所有黨員到群眾中做實際工作，從工作中發現及糾正錯誤；⁹⁷另一方面，周則嚴厲批評劉少奇等

96 〈張兆豐致中央的信〉(1928/10/05)，《河北文件 2》，頁 513-514。

97 〈周恩來關於順直省委改組的意見向中央的報告〉(1928/12/17)、伍豪，〈改造順直黨的過程中幾個問題的回答〉(1928/12/18)，《河北文件 2》，頁 552-553、557-571。

人所謂順直黨整個爛掉的說法，還要劉少奇在順直省委機關報《出路》上做自我批評，承認停止省委職權的做法及批評順直黨舊基礎已全部腐爛的說法是錯誤的。⁹⁸

十二月改組會的妥協精神，同時也是中共六大路線的反映。在1928年6月於莫斯科所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肯定八七會議與十一月擴大會議的布爾什維克精神，也認為十一月擴大會提出建立工農民權獨裁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是正確的，但又批評此二會議犯了嚴重的盲動主義錯誤，還不正確地提出「無間斷革命」的說法，以為革命仍不斷高漲。相反的，六大指出革命高潮的到來固然不可避免，但中國革命的高潮已暫時過去，現時既沒有革命高潮，工農革命的發展也不平衡，故不可過份估量革命形勢。因此，六大決議指出，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和帝國主義目前只應作為「宣傳」口號，爭取群眾才是現時的總路線。而黨所要爭取的群眾，除了過去所提出的工農群眾之外，還包括農村富農在內的某些中間力量。固然黨必須要提防這些中間勢力，但目前不必加緊反對這些人，還要去聯合他們。⁹⁹這也就意味著黨員可以在某種程度下去開展有限的上層統一戰線，同時也意味著中共中央公開承認運用上層政治、軍事手段的必要性，儘管這些政治、軍事手段仍必須具有群眾的基礎，但黨員也不需要如八七會議以來的情形一樣，由於害怕犯軍事投機的錯誤而不敢去做上層政治、軍事工作。¹⁰⁰因此，我們認為，順直省委十二月改組會是八七會議以來「平民式」革命路線的讓步。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本人就是一位相當嫻熟於上層統一

98 趙啓，〈錯誤觀念的糾正〉（1928/12/18），《河北文件 2》，頁 572-577。

99 〈政治決議案〉（1928/07/09），《中央文件 4》，頁 306-319。

100 〈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中央文件 4》，頁 485。

戰線與政治、軍事手段運用的革命者。自從1924年自歐洲歸國以後，周曾先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等職，並領導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和南昌暴動。毫無疑問，長期的軍事工作經歷，使得周更強調上層統戰及政治、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在國共分裂以後，周的主要工作還是在軍事方面，當時聚集在他周圍的人也多是和他一樣有類似軍事經歷或曾在蘇聯受訓過的軍事人材，他們後來若不是在中央特科服務，負責上層統戰或暗殺叛徒、保護中央人員的工作，¹⁰¹ 就是被派赴蘇區擔任紅軍的軍事領導。明顯的，周恩來這些人物與前述的韓麟符和張兆豐等北方「老黨員」一樣，都不反對上層統戰與政治、軍事手段的運用。如此看來，周恩來召開的順直省委十二月改組會會重用張兆豐等「老黨員」，並不令人詫異。

當時在周恩來力薦下前來順直省委工作的張慕陶，¹⁰² 也不是一位平民式的革命者。張慕陶，原名張金印，在順直省委工作時化名張金刃，陝西旬邑人，早年在西安求學時經魏野疇的介紹加入共黨，是早期中共陝西黨的重要領導者。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張被派赴馮玉祥國民軍工作，曾任國民軍總政治部政治處長，其在西北地區的地位之高及影響力之廣，無庸贅言。後來中共藉張的影響力，在陝西發動渭華暴動，但暴動失敗，張離開陝西。在中共籌備六大時，張在海參崴當交通，負責接送六大代表去莫斯科。由於他在接送工作中表現活

101 中共在1927年11月成立了由周恩來負責的特科，隔年11月又成立了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史（1920-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482-483。

102 〈周恩來關於順直省委改組的意見向中央的報告〉（1928/12/17），《河北文件2》，頁555。

躍，受到周恩來等中央代表賞識。隨後，因陝西赴六大代表團全體被捕，張便作為陝西代表參加六大。回國後，因周恩來的推薦，張被調赴順直工作。當時有人反對由張擔任順直省委組織部長，說他愛吹牛拍馬，行爲也有時荒唐、假積極，但在周恩來的力挺下，張還是當選省委組織部長。¹⁰³ 十二月改組會後的省委書記雖是工人出身的韓連會，但實際領導權卻是在張慕陶手中。

我們認為，張慕陶在北方地區所執行的正是六大路線，這一點可以從 1929 年順直省委領導下的軍事工作看出端倪。在十二月擴大會召開後，順直省委成立了以張兆豐為書記、白之鈺為秘書的軍事運動委員會（軍委）。¹⁰⁴ 中共的軍委系統，原本便是六大前後才開始積極推動的。¹⁰⁵ 軍委的工作，根據平民式革命路線的邏輯，即打入軍隊下層，與士兵生活在一起，和士兵打成一片，等待時機，動員士兵群眾打倒反動軍官，此即由下而上的「士兵路線」，它的對立面是只有與軍官合作的「紙上談兵」式之上層「軍官路線」。¹⁰⁶

但是，黨員在從事軍事運動時，往往仍是採取上層的軍官路線，不願意到軍隊下層當普通士兵，這也是張慕陶領導的順直省委所經常遇到的問題。¹⁰⁷ 以四十七軍高桂滋部的工作為例。高部乃「毅軍」出身，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黨即藉由李大釗的關係打入高部當中，許多黨員在該部擔任軍官要職。國共分裂後，高部與楊虎城部移

103 《中共中央北方局 綜合卷》，頁 71；唐寶林，《中國托派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頁 263。

104 〈順直軍委軍事運動報告〉（1929/01/15），《河北文件 3》，頁 45。

105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不早於 1928 年 5 月 4 日），《國際檔案 7》，頁 429-442。

106 〈順直省委通告第十號〉（1929/02/03），《河北文件 3》，頁 110-114。

107 〈順直省委通告第十號〉（1929/02/03），《河北文件 3》，頁 111。

駐安徽阜陽、太和一帶，當時中共河南省委曾要高部黨員發動暴動，但該部黨員仍是拼命拉攏上層軍官，不願去做下層士兵運動及周圍農村地區的農民運動，成爲「單純的軍事工作」。¹⁰⁸ 河南省委即批評，「高軍中的同志，多是官長，無下層兵士，是很危險的」。¹⁰⁹ 隨後，鄰近的楊虎城部的黨員即因楊虎城的清黨被迫退出軍隊，不得不倉卒地發動一場毫無群眾基礎的暴動（1928年4月9日），其中黨員魏野疇還試圖勾結地方土匪，最後反被土匪殺害，此即阜陽暴動。¹¹⁰

至於高桂滋部的黨員則仍舊隱藏在該部內（主要是教導營），並於1928年7月隨部移駐河北靜海。據順直省委所言，該教導營的黨員全是班長。後來這些班長有一次打算趕跑某位隊長，但又得知該營早已決定撤換一切隊長，故該營支部因此認爲既然他們要被撤換了，何必得罪他們，況且還有必要和他們維繫關係；但該軍共黨軍委卻主張不管他們走與不走，都要起來鬥爭，趕走該營所有長官。最後該營即在軍委的主張下起來鬥爭，且由於高桂滋恰好也打算撤換該營所有長官，故鬥爭最後獲得勝利。但順直省委軍委事後仍批評該軍軍委的主張是錯誤的，認爲只要能把那一個惹事的隊長趕走，使群眾認識自身的力量即可，不需要得到很大的勝利，以免引起敵人注意，招致失敗。¹¹¹ 順直省委軍委的態度，與前段所述河南省委對高部黨員的批評，形成一個明顯的對比。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共此時對士兵路線

108 〈胡倫給中央的信〉（1927/12/19），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安徽現代革命史資料長編》，卷2（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頁60。

109 〈王子和給葆和兄的信〉（1928/01/09），《河南文件3》，頁20。

110 李力果，〈皖北暴動史略〉（1944/09/12），《安徽現代革命史資料長編》，卷2，頁71-72。

111 〈順直軍委軍事運動報告〉（1929/01/15），《河北文件3》，頁50-56。

的強調，有稍稍減弱的趨勢。順直省委軍委對軍官的立場，正如中共六大上所規定對富農等中間力量的政策般，固然應小心提防，但也無需刻意反對之。因此，我們認為，張慕陶領導時期的工作實是六大路線的反映。

軍官路線原來就是張兆豐等北方「老黨員」所嫻熟的上層統戰，事實上，中共北方黨在國共分裂後，還和許多軍官保持關係。如前所述，六大前由於強調平民式革命，利用軍官關係發動革命會遭到批評。六大以後，平民式革命路線讓步，順直省委等北方黨就大肆利用這些線索發展活動。

以山東煙台劉珍年部的軍事工作為例。劉珍年原屬奉軍李景林部，北伐時期歸張宗昌指揮，抵禦南軍。1928年7月北伐軍占領平、津後，劉宣布易幟，投靠國民政府。但劉的野心相當大，他在膠東地區極力發展自己的勢力，到處收編潰兵，還創辦芝罘陸軍軍官學校培育官兵，並秘密求助於共產黨。根據順直省委所言，當時劉珍年並不是真正的覺悟，而是因為「在各方面碰釘子」後才和共產黨合作。¹¹²但是，中共仍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積極派人到該部工作。事實上，當時劉部內已有共產黨員活動。如劉的弟弟劉錫九（劉武年）便是一個失了聯絡的共青團員，在該部政治部工作，¹¹³他後來也是中共北方黨的重要幹部。其他還有在芝罘陸軍軍官學校擔任政治指導員的李楚離，以及由中共中央軍委派去領導工作的胡允恭等人。¹¹⁴大概在1929

112 〈克明給中央的報告〉(1929/09/23)，《河北文件4》，頁58。

113 〈魯委關於軍事工作的報告〉(1929/06/26)，《山東檔案2》，頁76。

114 李楚離，河北元氏人，他是抗戰時期中共河北地區抗日根據地的重要領導幹部，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等要職；胡允恭，即胡萍舟，安徽人，早期中共地下黨的活動者。

年4月前後，煙台黨與順直省委接頭，並從此歸順直省委管轄，¹¹⁵而順直省委亦先後派軍委白之鈺、因失業而暫時寄居在北平的彭雪楓及李素若等人到該部工作，¹¹⁶成立以李素若為書記的軍事特支。這些人在煙台做得有聲有色。據云，在劉珍年統治下的煙台，借共產黨的名義找事很容易，但是拿國民黨的招牌找事就不可能。¹¹⁷但也實在是因為表現得太紅了，不僅蔣介石派人來監視劉珍年，劉本人也相當害怕，還對胡允恭說：「我不反共，但此地的共產份子我要調查，一一都知道。」後來胡等共產黨員也先後被迫離開該部。¹¹⁸儘管此一工作最後的結果仍是失敗，但中共利用劉珍年的關係在該地發展工作，正說明張慕陶領導下的順直省委並不反對軍官路線。¹¹⁹

對於張慕陶來說，只要能夠達到他所認為的「革命」目的，軍官路線或上層統戰並沒有錯，不一定要拘泥於群眾或士兵路線。以中東路事件後順直省委策劃的東北軍鄭澤生騎兵旅兵變為例。鄭部在1926年時屬國民軍，原本便係依賴共產黨幫他收編軍隊。國民軍在南口潰敗後，鄭部投降晉軍，後來又被奉軍收編為三十一軍及第五、

115 〈順直省委特派員白之鈺關於煙台黨組織情況的報告〉（1929/12/08），《山東檔案2》，頁124。

116 彭雪楓，河南南陽人，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在馮玉祥於北平所創辦的育德學校學習軍事，1928年初經育德學校同學張維瀚的介紹到韓復榘於河南開封辦的訓政學院學習，也是軍人出身，是後來中共新四軍的重要將領；李素若，河北濮陽人，中共冀南黨的創始人之一。

117 〈山東省委巡視員曹克明對煙台的巡視報告〉（1929/10/25），《山東檔案2》，頁120。

118 〈胡克波關於煙台工作給中央軍事部的信〉（1930/03/07），《山東檔案2》，頁160-162。

119 關於當時中共在劉珍年部的工作，可見：馮文綱等著，《一代名將——彭雪楓傳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49-54。

六旅騎兵旅，駐在冀東遵化一帶。1929年8月中東路事件爆發後，鄭部奉命調赴同江、富錦一帶與蘇聯作戰，但該部既多熱河地方土匪、民團出身，且非東北軍的嫡系，故頗不願遠赴北境作戰。該軍參謀長共產黨員陳服遠（經歷不詳，已與黨失掉關係甚久）和一蒙人出身的旅長等軍官，想要甩掉鄭澤生，把軍隊拉到熱河學朱毛成立紅軍。陳服遠等人因此與已被開除黨籍的韓麟符聯絡，又經韓的介紹和張兆豐接上頭。但陳服遠一開口就要蘇聯及庫倫（即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幫助，張兆豐則「太不機警」，竟然跟陳說國際的幫助是很少希望的，要他去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產，自己想辦法。張慕陶知道此事後勃然大怒，立即再找來韓麟符、李希逸、張兆豐、陳服遠等人會議，但陳已經猶豫，最後軍隊開走，兵變也沒發動起來。張慕陶乃向中央批評張兆豐「馬馬虎虎」，隨後張兆豐就被調到各地巡視，軍委書記則由同樣是軍人出身的廖劃平接任。在此一事件中，張慕陶固然也堅持兵變後一定要提出組織紅軍、擁護蘇聯、擁護中國革命和蒙古民族獨立等口號，¹²⁰但他的風格更接近過去的李大釗，即關注現實政治的結果，而不拘泥於群眾路線的原則。

張慕陶上臺後才設立的軍委「特科」系統，其主要的工作也是暗中從事上層統戰。以特科成員張友漁為例。張是山西靈石人，知識份子兼新聞編輯出身，早年就讀山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曾擔任山西《并州新報》的代理編輯，轉赴北京法政大學就讀後又擔任北京《世界新報》的編輯。新聞編輯的職務使得張經常與一些名流政要交往，其活動也多侷限在上層社會。在北伐軍占領京津後（由閻錫山晉軍所

120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09/05）、〈克明給中央的報告〉（1929/09/23）、〈順直省軍委八九兩月軍事工作報告〉（1929/10），《河北文件4》，頁17-20、55、266、269、272-273。

佔)，先後擔任天津市長的南桂馨、崔廷獻（兩者皆是晉系人物）邀請張擔任《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後又要他去天津市政府作新聞科長。當時共產黨也看重張的關係，指示他專事上層的統戰活動。除張友漁外，其他如薄一波、胡熙庵、李予昂等人，也靠著「山西老鄉」的關係（尤其是天津造幣廠廠長薄以眾之關係，薄以眾的夫人是閻錫山的堂妹），在天津市政府和憲兵司令部等軍政機關中工作，他們全部都是順直省委軍委特科的人員。¹²¹ 後來順直省委便宜稱，「軍委在天津的工作有憲兵、軍警兩支部，共十餘人，零星的線索很多」，¹²² 這應該就是張友漁、薄一波等人的貢獻吧！

特科除了做「統治階級上層的統戰工作、情報工作」外，還有「對革命同志的掩護工作和營救工作」，¹²³ 以及暗殺工作。如當時已被順直省委罷黜的前省委書記王藻文、李德貴等人，曾夥同另一位同樣是京綏路工人出身、並曾任 1928 年七月改組會後省委委員的楊繼錄（因生活腐化和疑心其姘頭被黨內同志拐跑而與省委衝突，在 1929 年初被開除黨籍），¹²⁴ 跑到省委濟難會裡，把東西全部搬走，還綁走一人。¹²⁵ 十二月改組會後的順直省委開始仍對王等人採取妥協態度（如說王自我批評的態度很好、很誠懇），¹²⁶ 但後來還是決定派郭宗鑒去暗殺他們，這位郭宗鑒（四川長壽人，黃埔軍校出身，後被國民黨逮捕，死於獄中）便是新成立之特科成員。只不過郭沒殺死王藻文，王

121 《張友漁回憶錄》，頁 42-49；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 69-76。

122 〈中字第 66 號直字第 293 號〉（1929/11/29），《河北文件 4》，頁 355。

123 《張友漁回憶錄》，頁 45。

124 〈順直省委通告第十一號〉（1929/02/08），《河北文件 3》，頁 140-142。

125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04/14），《河北文件 3》，頁 364。

126 〈曉楚致雲光兄的信〉（1929/01/20），《河北文件 3》，頁 63-64。

則因此叛變，導致 1929 年 6 月順直省委的大破壞。¹²⁷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在張慕陶領導順直省委以後，順直省委就從此放棄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只專注於上層的統戰工作。實際的情形是，省委軍委一開始是一個相當獨立且隱秘的組織系統，它是一個「不與普通黨的機關相聯貫」的特別機關，¹²⁸ 其經費不僅取之於地方黨部，也由中央軍委直接補助。¹²⁹ 儘管軍委後來被歸併到地方黨組織的系統下（即省委軍委、縣市委的軍事科和士兵運動委員會），但特科工作仍舊獨立，如同張友漁所述，當時特科人員在會議時從不談地方黨的情況，他們對地方黨組織也不了解。¹³⁰

總而言之，張慕陶就像李大釗般，同樣重視上層統戰，而且都是務實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們都不避諱利用那些既存的政治網絡與私人關係去開展活動。平心而論，此一作法有助於黨打入到社會當中，本身並無可厚非。但是由於在實際活動中，張、李兩人同樣都忽略群眾，甚至不談黨的領導與階級鬥爭，致使自身完全地融入到其所處的地方情境當中，完全喪失了獨立性，結果就很難不流於單純為人作嫁的和平、合法鬥爭。

127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頁 75。根據《大公報》的報導，郭宗鑒暗殺王藻文後，王似尚有一口氣，他在彌留之際說出「殺我者郭宗鑒」。法巡捕因此偕同王之妻，赴法租界搜捕與王時常來往者，王妻認出一名李子芳者，李被捕後，供出共黨情報，導致北平黨大破壞。〈破壞共黨機關經過〉，《天津大公報》，1929 年 6 月 16 日，版 11。

128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不早於 1928 年 5 月 4 日），《國際檔案 7》，頁 429。

129 〈順直軍委致中央軍事部函〉（1929/01/19），《河北文件 3》，頁 62。

130 《張友漁回憶錄》，頁 45-46。

二、和平又合法的北方革命

根據中共六大的規定，儘管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局勢獲得暫時的穩定，但由於帝國主義不願放棄在華特權、工業經濟的危機很難找到出路、資產階級式的改良方法不能徹底解決農村土地問題，以及統治階級間的持續衝突等原因，故當時的中國仍不可避免革命的前途。在此一革命高潮日漸且必然高漲之勢中，群眾將從日常的經濟鬥爭走上非法的武裝暴動革命之途，最終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地主軍閥及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政權，建立蘇維埃的工農民權獨裁制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¹³¹ 然而，這只是共產黨方面一廂情願的說法，並不全然是事實。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儘管存在著各式各樣可能引起革命的矛盾，但這些矛盾並不必然逼使群眾走上經濟鬥爭乃至於非法的武裝暴動之途。相反的，群眾更傾向於發動和平且合法的請願運動，藉由政府當局的公權力由上而下地解決矛盾。甚至這些和平且合法的請願運動，也並不全然是「自發性」的，它們常常是各派上層政治團體有意無意推動下的產物。中共並非不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要求黨員參加這些團體與運動，鼓動群眾從溫和的抗爭走上激烈的暴動之途，藉此揭露政府當局及黃色群眾團體的欺騙性，提高群眾的階級與政治覺悟，把群眾爭取過來。

那麼，實際的情形又如何呢？首先，讓我們從北伐後北平的工人運動說起。1928年6月，北伐軍占領北京，並於同月中旬易名為北平市，從此北平進入了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然而，當時北平的「統治階級」內部並不統一，如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最初是被右翼的「西

131 〈政治議決案〉(1928/07/09)，《中央文件4》，頁299、311-312。

山派」掌握，但該派旋即為左翼的新中學會與三民主義大同盟聯手擊敗。其中新中學會即前述河北籍跨黨黨員于樹德成立的團體，該團體以河北人居多，故在河北省下層（尤其是天津市）頗有勢力。至於三民主義大同盟則是由李大釗的好友山東人丁惟汾、王樂平創辦，該團體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曾一度是與共產黨積極合作的國民黨左派。北伐軍占領北平後，隸屬大同盟之李樂三、李吉辰、張寅卿等人被任命為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他們提拔許多山東同鄉加入。在聯合新中派擊敗西山派後，大同盟在北平的勢力更是水漲船高，其中張寅卿等人即利用他們在市黨部及「民眾訓練委員會」中的職位，於1928年6月成立北平市總工會，煽動該市之電車、電燈、郵政、人力車夫等工人，進行一連串以增加工資、改善工作環境為目的的罷工，贏得不少北平市工人的支持。不過，1929年以後，由於丁惟汾等國民黨左派領袖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遭到以陳果夫、胡漢民為首之保守勢力打壓，加上北平市內新中學會聯合代表晉系勢力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打擊大同盟的勢力，迫使張寅卿等大同盟份子不得不孤注一擲地煽動北平市人力車夫於1929年10月發動一場砸毀電車的暴動，但旋即失敗，大同盟在北平市工人間的影響力遭到嚴重打擊，其在北平市黨部內的地位亦為新中派所奪。¹³²

人力車夫係被大同盟操弄、煽動起來罷工，但這不是說工人完全係被動的政爭工具。如人力車夫所以要砸毀電車，實由於電車的營業大大減少了人力車夫的收入，致使人力車夫長久以來即相當仇視電

132 關於北伐後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的內鬥及工人運動的發展，請見：〈平津黨務整理意見書〉（1931/04），黨史館：會 3.3/176.42；〈北平特別市黨部ノ紛糾ト對電車大暴動ノ經過〉（昭和4年12月），*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el S348, file S9440-3;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pp. 222-283.

車。¹³³在這裡，我們看到群眾的需求與國民黨內部的政爭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至於中共方面，順直省委雖然在人力車夫罷工期間派遣省委李子芬（湖北黃梅人，曾參加六大，1929年前後在順直工作，後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35年病死獄中）、軍委谷雄一等人前去領導，¹³⁴但由於中共在北平群眾間的影響甚微，李子芬等人只能在旁乾瞪眼，毫無作為。¹³⁵

再以天津為例。國民黨天津市黨務在北伐軍到來後正式公開，最初亦是由大同盟派與新中派聯合執政的局面。隨後，新中派亦在晉系的天津市政府（先後由南桂馨、崔廷獻擔任市長）的支持下，擊敗大同盟派，獨霸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新中派在天津下層工人間頗有勢力，他們亦懂得煽動工人群眾罷工，以擴張自己的政治影響，作為自身的政治資本。¹³⁶同前述北平人力車夫一樣，當時天津工人確實也在這些罷工中，滿足自身部分的需求，故亦願意配合，而且只把鬥爭局限在經濟層面，並非反國民黨的政治罷工。¹³⁷至於共產黨方面，儘管順直省委本身就設在天津，但他們同樣也無力插手天津的工人運動，甚至當某次天津總工會率千餘人赴天津市政府請願，適逢崔廷獻市長外出之際，時任市政府第三科長並受到崔廷獻庇護¹³⁸的共產黨員張友漁竟出面向工人宣稱：「市府對工人利益向極保障」，工人所請

133 〈順直臨時省委職字通告第一號〉（1927/06/27），《河北文件 2》，頁 24。

134 〈順直省委關於北京唐山天津等地鬥爭情況的報告〉（1929/10/25），《河北文件 4》，193。

135 〈順直省委關於群眾鬥爭的報告〉（1929/10/30），《河北文件 4》，頁 246-247；〈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0/02），《國際檔案 9》，頁 61。

136 〈平津黨務整理意見書〉（1931/04），黨史館：會 3.3/176.42。

137 Gail Hersht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pp. 221-224.

138 陳荷夫編，《張友漁回憶錄》，頁 49。

願之事，「應由社會、公安兩局及勞資調解委員會調解，無結果時，市府再開仲裁會解決」，實無請願之必要。¹³⁹當然，張友漁的立場是兩難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必須煽動工人持續向國民政府發動抗爭；但是，因為他是順直省委派到天津市政府裡面從事統戰工作，故又不得不站在政府當局的立場上安撫群眾，為政府勞資仲裁的政策作宣傳。

在唐山亦是如此。事實上，雖然張慕陶領導時期之順直省委對北平、天津與唐山的工人運動同樣重視，但北平黨始終侷限在學生群眾中，「市委的精神為學校環境所支配」，一提到工人運動就希望能從外面派工運職業家來；¹⁴⁰至於天津黨在張慕陶時期之初雖然在天津的「下邊」區（天津市的下半部，有裕源、北洋紗廠等重要產業）尚有些許影響力，¹⁴¹但在1929年4月天津黨遭破壞後，地方黨員即因白色恐怖等因素而不敢動作，¹⁴²群眾也「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¹⁴³因此之故，當時省委對唐山地區的工人運動用力尤多。如前所述，早自河北黨創立之初，中共便藉由鄧培的關係打入京奉路唐山南廠的粵籍技術工匠間，並曾發動罷工運動。不過，限於鄧培的粵籍關係，共黨最初在唐山工人間的影響大多也僅限於南廠內，未能擴及周圍的開灤煤礦（由唐山、趙各莊、林西、馬家溝、唐家莊五礦組成）礦工，因為這些礦工多是來自臨近農村地區的臨時工，是非技術性的「北方

139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04/14），《河北文件3》，頁346-348。

140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05/20）、〈順直省委給北平市委的指示信〉（1929/08/14），《河北文件3》，頁477、649。

141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04/14），《河北文件3》，頁352-361。

142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04/22），《河北文件3》，頁366-369。

143 〈順直省委關於天津、唐山、其他各地與省委本身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29/04/29），《河北文件3》，頁410。

小工」。¹⁴⁴

1929年3月，國民黨唐山市黨部成立，掌握該市黨部者是國民黨中的左翼「改組派」。這些左翼份子自市黨部成立一始便積極煽動五礦工人成立各自的工會，並於3月底設立了「五礦區工會聯合辦事處」（其中有些成員乃共產黨的叛黨黨員），¹⁴⁵提出增加薪資等六項經濟要求，其鬥爭目標是開灤煤礦的幕後英國老板。¹⁴⁶

中共唐山市委針對國民黨的黃色工會，最初是提出反對國民黨包辦工會，組織工人自己的工會等口號，但同時又積極參與其中。¹⁴⁷後來張慕陶則乾脆連「打倒黃色工會」和「打倒國民黨工會」的口號都不准提了，要唐山黨「在推進群眾鬥爭中事實上反對國民黨」。¹⁴⁸結果，五礦礦工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爭得「小惠」，獲得勝利。¹⁴⁹至於共產黨則不僅未能達到「事實上反對國民黨」的目的，甚至連自身影響力的擴大也極其有限，如不少下層群眾便說：「工會不好，你還不能反對他；你反對他，他說你是共產黨。」¹⁵⁰也就是說，群眾害怕與共產黨發生關係，以免惹麻煩。而地方黨員也不敢去領導群眾鬥爭，他們說：「我們家有老小，廠有工作，逃跑失業，誰來供給生活！」還批評由外來者組成的唐山市委說：「市委遇事有錢花」，「市委太膽

144 〈唐山團內外組織情況報告〉（1926/01/21），《河北文件 1》，頁 467；〈順直省委對唐山工作計劃之指示〉（1928/03），《河北文件 2》，頁 280-281。

145 〈雨銘關於五礦鬥爭情況給中央並全總的報告〉（1929/05/10），《河北文件 3》，頁 433。

146 永野，〈京奉沿線に於ける労働運動の趨勢〉，《滿鐵調查時報》，卷 9 號 5（大連，1929 年 5 月），頁 69-77。

147 〈唐山市委工作報告〉（1929/08/15），《河北文件 17》，頁 54。

148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04/22），《河北文件 3》，頁 373-374。

149 〈順直省委報告〉（1929/05/11），《河北文件 3》，頁 461-462。

150 〈唐山市委工作報告〉（1929/08/15），《河北文件 17》，頁 56。

小了，我們還不跑，他們早不見了！」最後索性就說：「不敢負責任了，一負責任就要發生事變，以後來往報告別寫我們的名字了！」就是因為怕惹麻煩、怕失業，所以唐山地方黨員和群眾更傾向於利用國民黨黃色工會的招牌，由上而下地進行合法鬥爭。¹⁵¹ 特別是在中共唐山黨一度遭到破壞（確切時間不詳，大約在前述的五礦罷工之後和同年7月之間）後，大家越來越恐懼。如前述那些以粵籍工匠為主的南廠黨員，他們不敢和黨發生關係，也不敢活動。某次有二千餘工人連署請願釋放被捕工人，該廠黨員只是把連署名單送去國民黨市黨部就算完事，因為他們都很害怕。¹⁵²

事實上，除了前述的北平、天津、唐山之外，在青島、大連等北方大城市中，於北伐後亦陸續掀起工人運動的高潮，只不過這些工人運動也多是由「改組派」等國民黨左翼派系而非共產黨領導。¹⁵³ 此一事實告訴我們，儘管群眾並不全然是逆來順受的順民，他們也有最低的基本需求，內心中也存在著一股追求公正、平等的俠義之心。然而，問題在於，國民黨政權並不只是一味地壓制群眾運動而已，他們也會用自己的招牌去由上而下地動員群眾，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群眾的經濟需求（至少比當時共產黨給的多），而且也確實因此贏得不少群眾的支持。群眾在謀求生活條件改善的同時，亦希望維持最基本的安全和工作需求，故往往也期待藉由政府當局之力來滿足他們的要求，而不是如中共所期盼般「自發性」地起來發動經濟乃至政治

151 〈唐山市委工作報告與計劃〉（1929/09），《河北文件 17》，頁 85。

152 〈唐山市委工作報告〉（1929/08/15），《河北文件 17》，頁 58；〈順直省委給唐山市委的指示〉（1929/07/29），《河北文件 3》，頁 571-572。

15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10），《國際檔案 8》，頁 198、204。

的抗爭。

當然，我們可以辯稱說，共產黨所以在這些城市中毫無作為，不過是由於國民黨在城市中的控制力量較為穩固罷了。然而，當時農村中的共產黨員和群眾，如同他們在城市中的同伴般，也較傾向於藉由國民黨政府當局的公權力，由上而下且和平、合法地解決問題。

以 1929 年 2 月爆發之濮陽溫邢固暴動為例。該暴動的領導者趙紀彬等共產黨員，如前章所述，大多是在大名七師就讀時加入共產黨者。這些人皆是大名周圍地區出身，並在七師畢業後到井店完小任教，溫邢固即位於井店東方的一個小鎮。溫邢固暴動是由趙等人以該鎮為中心發起的反抗民團團長蔡鴻賓、縣教育局局長劉潤之及溫邢固惡霸地主溫振剛的鬥爭。不過，此一鬥爭實際上是趙紀彬等人先與國民黨縣黨部的李素若（也是共產黨員）等人「打過招呼」後才發動的。而且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縣黨部還站出來為農民說話，肯定他們集會的合法性，並不顧縣長同意與否，扣押蔡鴻賓等人。但縣長本來就不滿共黨，於是在共黨叛徒蔡兆麟（蔡鴻賓之子）的協助下取得共產黨的宣傳文書，據以逮捕趙紀彬等共產黨員。國民黨縣黨部和趙紀彬七師的師長謝台臣等人出面為趙等人辯護，還一狀告上了國民黨省黨部，訴諸法律手段與「土豪劣紳」打官司。但最後還是敗訴，趙等人被叛處有期徒刑。很明顯的，溫邢固事件是一場利用國民黨招牌由上而下推動的和平合法的群眾鬥爭，並不是為推翻國民黨政權而發動的群眾暴動。¹⁵⁴

當然，像濮陽、大名般遠離省委的農村黨黨員所以會經常訴諸請

154 冀南革命鬥爭史編審委員會編，《冀南革命鬥爭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頁 38-40。

願、打官司等合法與和平的手段，表現出極濃厚的「取消主義」傾向，與缺乏省委的經常領導當然不無關係。¹⁵⁵如後來順直省委便指出，「大名、濮陽與省委關係不密切，指導薄弱」，故黨員多以國民黨名義做工作。¹⁵⁶另外，同一時期的邢台（當時稱為順德）黨亦是如此。如同冀南沙區早期的黨務發展般，邢台黨最初的發展亦是以邢台省立第十二中學和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為中心展開的。這些學校不僅吸收了許多如藺笑秦（磁縣人，後叛變）般來自周圍諸縣的知識份子，也有一些曾就讀保定二師等其他外地學校，但因參加學潮而被開除的冀南地區學子，如日後曾擔任邢台中心縣委和直南特委書記的馮溫（馮和齋，肥鄉人，日後叛變，但當時順直省委認為他非常努力，對黨的策略相當了解）¹⁵⁷便是其中的一位。這些學子在 1925 年前後開始在邢台地區發展黨務活動後，透過他們的私人關係聯絡周圍諸縣的知識份子（如自 1922 年起就自北京返鄉活動的磁縣彭城籍黨員王子清），擴大了以邢台為中心的地方黨務網絡。¹⁵⁸

北伐時期，邢台黨拉了不少紅槍會領袖（有些人本身就是）及農民（許多皆是學生黨員的親戚朋友及佃戶雇農）起來響應北伐軍。只不過國共分家後，邢台、磁縣黨與順直和河南省委皆斷絕了聯繫，黨員完全成了「深山野人」。1928 年初，順直省委派人來召開冀南代表大會，但地方黨員在開完會議後依然回家睡悶覺；6 月，省委又派朱林森（隆平人，早期隆平黨的創建者）來巡視，但朱所帶來的卻是保

155 紅斌，〈幾點零星的意見〉（1929/03/23）、〈順直省委關於群眾鬥爭及本身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29/04/06），《河北文件 3》，頁 291、330。

156 〈順直組織狀況〉（1929/06），《河北文件 3》，頁 522。

157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04/14），《河北文件 3》，頁 362。

158 關於邢台黨早期的發展，見：《冀南革命鬥爭史》，頁 16-20。

南第二省委事件的「可笑消息」，所以還是未能與省委建立密切的關係。既然「共產黨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地方黨員也就索性「到國民黨裡且混混吧」！恰巧國民黨來組織群眾，地方黨員以為有辦法了，「便是掛國民黨招牌去好公開組織群眾」，不少人跑去國民黨當黨務指導委員，有的人則因進不了國民黨的門垂頭喪氣。他們的理由是這樣可以在國民黨裡當偵探，抓住國民黨政權。但在省委看來，這些地方黨員不過是害怕發動鬥爭，根本缺乏實際群眾工作的經驗罷了。¹⁵⁹

這些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的農村地區黨員，藉口「共產黨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事實上根本也不總是如此。以冀中的正定黨為例，如前所述，在蔡和森領導時期，順直省委即已藉由閻懷聘的關係與正定黨接上頭，後來還提拔一位正定籍的工人黨員郝清玉為省委領導。在張慕陶時期，順直省委仍繼續推動以正定為中心之保南農村地區的活動。由此可見，在正定，共產黨並不是「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當時正定黨員卻仍然堅持必須要以國民黨農協的名義進行號召才行，許多人還贊同閻錫山推動的「村閭制度」，參與村長的選舉，完全是合法運動的路線。張慕陶等省委領導對此雖然不贊同，卻也無可奈何，只是警惕地方黨員堅持與國民黨在「精神上」永遠敵對的原則。¹⁶⁰ 後來省委派郝清玉、陳潭秋去正定開黨員會議，郝等人發現該地黨員竟然還只是幫「新豪紳」鬥「舊豪紳」，許多人抓到村長的職位後卻什麼事都不幹，連正定縣委也主張不要退出「反革命」的國民黨，甚至還有人說些什麼「環境好、工作沒辦法」的話。¹⁶¹ 順直

159 和齋，〈我對直南黨的觀察和我的覺悟〉（1929/03/23），《河北文件3》，頁277-283。

160 昌偉，〈一封指示的信〉（1929/01/02），《河北文件3》，頁3-8。

161 清玉，〈巡視保南工作的感想〉（1929/05/10），《河北文件3》，頁442-446。

省委根本管不了正定黨，結果也就失去了關係。

現在我們知道了，很多河北下層地方黨員更傾向於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由上而下且和平、合法地推動「革命」。這些黨員中，很多人仍相信國民黨有革命作用，有的人則是不清楚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差別，甚至還有人捲入國民黨的內部政爭，無法自拔（如說這個國民黨不好，那個國民黨還好），或是利用國民黨黨部反對地方政府（如前述的溫邢固暴動），還有人則是只反國民黨卻不反對三民主義。¹⁶²總而言之，這就是合法、和平運動的傾向。

那麼，當時順直省委對於此種和平、合法運動的傾向，又是抱持著怎樣的態度呢？根據中共中央所制定的路線，當時的中國必須要採取非法的武裝暴動手段，才能徹底解決所有可能引起革命的矛盾。所以，那些合法、和平的運動，儘管在革命初期仍有必要，但也只是暫時手段，因為代表帝國主義與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不可能徹底解決這些矛盾。當時順直省委內有人如此批評地方黨員的合法、和平運動傾向說：「我們抓住國民黨的機關幹些什麼呢？提出共產黨的口號來麼？這是不可能的！即使提出來，群眾也只認為這是國民黨提出的。提國民黨的口號麼？那我們自己幹的又是反革命了！」¹⁶³正確的做法是，共產黨員在從事群眾運動時，不能僅止於透過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機關，給群眾好處，而是要領導群眾自己起來去爭好處。¹⁶⁴然而，鑒於當時實在有太多黨員傾向合法、和平的運動，張慕陶領導的順直省委亦不得不在此問題上有所妥協，主張用「說服」的方法使那些尚

162 〈順直省委通告第十九號〉（1929/03/12），《河北文件 3》，頁 253-254。

163 西一，〈打破對國民黨的一切幻想〉（1929/03/05），《河北文件 3》，頁 209。

164 趙啓，〈國民黨不給工人好處，共產黨要給工人好處〉（1929/03/05），《河北文件 3》，頁 201-204。

留在國民黨內的黨員退出國民黨，反對用「命令主義」的方式令其退出，¹⁶⁵更不准說這些人都是「朽木不可雕也」。¹⁶⁶結果，事實證明，如此溫和的態度不可能遏制黨內普遍存在的合法、和平運動傾向，黨員仍舊堅持留在國民黨內，繼續推動著由上而下的群眾運動。而國民黨政權在群眾間的威信也日益提高，正如陳潭秋當時所言，許多北方群眾仍「寄望於國民黨，認為他們真的在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鬥」。¹⁶⁷如此一來，「革命」就在無形中逐漸地被「取消」掉了！

第三節 立三路線與河北革命

一、張慕陶的下臺與賀昌的登場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似此種合法、和平的傾向，並不僅發生於北方地區，而是同時整個中共黨內普遍存在的現象。如在蘇州，「反動派」奪取農村政權後，共產黨員竟也跑去縣衙門登記，「看來他們想方設法去當官」，這與前述正定黨投入國民黨政權的村長選舉，如出一轍。¹⁶⁸

再者，眾所周知，當時中共黨內出現一個以陳獨秀為名義領導的反對派——也就是所謂的「托派」。這些托派份子許多是早期共黨重要的領導幹部，如前面提及的彭述之、劉伯莊便是其中成員。他們在瞿秋白領導時期遭到冷漠，乃至受到無情的打壓。1929年前後，這

165 〈順直省委通告第十九號〉(1929/03/12)，《河北文件3》，頁259。

166 金刃，〈說服、佩服、命令主義〉(1929/03/23)，《河北文件3》，頁275。

167 〈中共直隸省委最近工作狀況〉(1929/06/02)，《陳潭秋文集》，頁71。

168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0/02)，《國際檔案9》，頁64。

些失意份子逐漸形成以陳獨秀為中心的黨內小團體，即托派。根據中共所言，托派主張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了，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獲得了勝利，取得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因此，儘管革命的高潮有再到來的可能，但目前並不是革命高潮的階段，各地所發生的群眾鬥爭也只是「革命失敗的餘波」，並不能證明統治階級的動搖。據此推論，托派份子認為現在應採取合法運動的手段，並以「國民會議」為中心的口號，取消蘇維埃的旗幟。¹⁶⁹ 這些主張與前述地方黨員「取消主義」的行徑，不謀而合。特別是在中東路事件後，陳獨秀等人還反對中共中央僅提出「擁護蘇聯」和「世界革命」的口號，¹⁷⁰ 這使得中共中央更為惱怒，認為陳獨秀等人是作了資產階級的俘虜，與改組派、第三黨等資產階級左派在野黨相同，¹⁷¹ 乃決議開除陳獨秀、彭述之等托派份子的黨籍，¹⁷² 托派與中共終於決裂。¹⁷³

與此相應，中共黨內自六屆二中全會（1929年6月20–25日）以來亦掀起了一股反「取消主義」的浪潮。在該會議上，中共中央針對六大以來一年內中國情勢的發展，指出「國民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尚未完全打破，改良主義在群眾中還留有很多幻想」，此種情形反映到黨內，就是「和平發展、合法運動」的右傾思想，不少黨員不僅降低

169 〈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1929/10/05），《中央文件5》，頁495–506。

170 〈撒翁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1929/07/28），《中央文件5》，頁394–396。

171 〈中央答覆撒翁的信〉（1929/08/03），《中央文件5》，頁389–393。

172 〈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的決議案〉（1929/11/15），《中央文件5》，頁549–555。

173 關於托派在1929年前後的形成，以及陳獨秀當時的觀點，見：Gregor Benton,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6), pp. 29–33.

共產黨自身的政治口號，接受國民黨的欺騙政策，還假公開工作之名義，「投降到國民黨的法律下面去求得公開」，最終就是取消了共產黨的革命，其中順直黨正是此一右傾「取消主義」的代表。因此，當下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積極反對黨內的右傾錯誤，「在一切群眾的鬥爭中，堅決地提出反國民黨的口號，領導一切鬥爭都向著這一總的目標前進」。¹⁷⁴

張慕陶領導的順直省委對於中央路線的向左轉並非渾然不知。事實上，至遲自 192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所召開的順直省委擴大會後（九月擴大會，召開此會議之主要目的是為恢復 6 月時因王藻文等人之叛變而被破壞的省委組織，會後由張慕陶直接擔任順直省委書記），¹⁷⁵ 順直省委在路線上亦開始向左轉，除了號召黨員與右傾的合法和平傾向作堅決奮鬥外，¹⁷⁶ 對於農村富農階級的態度亦有極大的轉變。在張慕陶上任之初，順直省委在農民運動策略上主張只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不要沒收一切土地，並反對一切觸犯富農、中農的利益以至農村階級戰線凌亂的作法，¹⁷⁷ 此種主張明顯是中共六大「不應該故意加緊對富農的鬥爭」政策的反映。¹⁷⁸ 不過，在六屆二中全會後，中共中央要求黨員從事農民運動時，除必須積極吸收雇農、貧農份子外，還要嚴防富農份子的加入；¹⁷⁹ 而九月擴大會後的順直省委也因此對富農態度上有極大的轉變，指示黨員說「農村民主戰線

174 〈政治決議案〉，《中央文件 5》，頁 191、193、206-207。

175 〈順直省委秘書處最近工作計劃（九月份起）〉（1929/09/21），《河北文件 4》，頁 31。

176 〈北方共產黨目前的中心任務〉（1929/10/01），《河北文件 4》，頁 99。

177 〈順直省委通告第十八號〉（1929/02），《河北文件 3》，頁 190。

178 〈農民運動決議案〉（1928/07/09），《中央文件 4》，頁 356。

179 〈組織問題決議案〉，《中央文件 5》，頁 221。

是從雇農起至中農止，排斥富農」，當「富農還參加運動的時候，我們就要堅決向廣大貧苦農民群眾指出半地主性富農的妥協與反革命性，準備打倒他，決不讓富農有乘機獲利的可能」。¹⁸⁰

儘管如此，中共中央對於九月擴大會後的順直省委領導仍相當不滿意（中共中央不承認九月擴大會），¹⁸¹ 甚至還派一些人來監督、領導順直的工作。如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關向應便在此時被派赴順直工作，儘管駐華共產國際代表非常不贊成此一人事調度，認為這會影響政治局的工作，並使共青團失去領導者。¹⁸² 後來擔任順直省委與河北省委共青團書記，並是 1931 年「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中心人物的曹策，可能亦是在此一時期前來。但由於筆者未能尋獲曹的相關資料，故僅知道他在 1929 年曾擔任九江共青團書記和浙江共青團省委書記，也是共青團系統出身者外，其餘經歷並不清楚。

1929 年 12 月，李立三、項英等中央大員決定親自前來河北興師問罪，並在 12 月 18 日召開一場會議。從該會議的紀錄看來，除了張慕陶一個人代表順直省委說話外，其他的人（除李立三、項英外，還有陳潭秋、關向應等人）全部都站在批評河北黨的立場。當時李立三和張慕陶等人所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唐山的黃色工會運動。

如前所述，當時唐山工人在國民黨當局由上而下地支持下，先後成立五礦區工會聯合辦事處等工會，發動數起以改善生活條件為目的

180 〈北方秋收鬥爭的工作方針〉(1929/09/22)，《河北文件 4》，頁 43。

181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09/23)、〈順直省委員會紀錄〉(1929/12/18)，《河北文件 4》，頁 66、393。

18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聯席會議紀錄〉，《國際檔案 8》，頁 260。

的抗爭運動，獲得勝利，因此當地工人對國民黨有相當大的信仰。而共產黨員則是因為恐懼觀念等原因，只能依附在國民黨的招牌下從事活動，以至黨的影響力日益縮小。後來，順直省委透過一位地方黨員劉成章的關係，逐步恢復唐山地區的活動。劉成章的出身不詳，僅知他是唐山趙各莊、唐家莊礦區工人組織「敵血同盟會」的領袖，¹⁸³還與附近地區的農民有密切關係（當時開灤礦工多是來自鄰近農村地區的居民）。某次農民們組織農民協會，還跑來趙各莊要劉成章當農協的主席。¹⁸⁴不過，由於當時唐山地區只有國民黨的黃色工會，故劉成章與工人群眾皆是黃色工會的成員。1929年9月初，劉成章領導的工人群眾懷疑礦區的黃色工會委員侵吞會費，向唐山的五礦聯合辦事處請願，要求查帳，後來亦確實查出許多弊病，舊黃色工會因此被迫改組，由工人群眾選出自己的委員。當時張慕陶的順直省委因此頗為興奮，大呼趙各莊工會是「赤色工會」，要求地方黨員運用趙各莊的經驗，擴大到其他各礦中去，從事黃色工會改組的工作。¹⁸⁵然而，問題在於，劉成章等人仍是以黃色工會的招牌發動抗爭，其最終目的亦僅限於「以群眾的力量，打黃色領袖」，不是要推翻黃色工會、搗毀五礦聯合辦事處，頂多也只是占領它（這是省委對唐山市委的命令）。¹⁸⁶因此，工人群眾是否把趙各莊工會當成一個「赤色工會」，不無疑問。

當時李立三等人便不認為趙各莊工會是「赤色工會」。事實上，

183 〈唐山市委工作報告及計劃〉（1929/09），《河北文件 17》，頁 88。

184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09/05），《河北文件 4》，頁 14。

185 〈順直省委關於北京唐山天津等地鬥爭情況的報告〉（1929/10/25）、〈順直省委職工運動報告〉（1929/10），《河北文件 4》，頁 193、281-286。

186 〈順直省委給唐山市委的指示〉（1929/10/05），《河北文件 4》，頁 140。

中共中央此時亦為黃色工會的問題所困擾。當時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便指責李立三等中央領導人「一工廠一工會」政策，致使黨員在已有黃色工會的工廠中，放棄籌建赤色工會的準備，還把爭取黃色工會中的職位視為目的，根本放棄共產黨自身的革命，為「取消主義」的發展打下基礎。¹⁸⁷ 中共中央也承認他們犯了錯誤（但又辯稱這正足以證明當時中國黨內最大的危險是右傾之說法），¹⁸⁸ 故李立三等人相當重視唐山工運中的黃色工會問題。

在會議上，張慕陶首先誇耀劉成章領導之反黃色工會運動的成績，說這些工會現在都在共產黨手裡，還稱讚劉成章告訴工人們要起來組織自己的工會（儘管黨在工人間的影響不如劉個人的影響力）；但關向應則反駁說趙各莊等地的工會不是什麼赤色工會（頂多也只能說可以轉變到赤色工會），因為工會首領多是黃色領袖，凡事皆與黃色工會的五礦聯合辦事處商量解決，關因此批評張慕陶的省委是口頭上左傾，行動與策略上則助長下面右傾；先前批評整個順直黨都爛掉的陳潭秋也接著說，趙各莊工會是黃色工會，不是赤色工會；張慕陶對此則反駁說，指趙各莊工會是黃色工會是不正確的，只能說它有黃色工會傾向；李立三則接著起來批評張慕陶說，趙各莊工會根本就是與五礦聯合辦事處存在著政治關係的黃色工會，不是什麼赤色工會；最後，在眾人圍剿之下，張慕陶才稍做退讓地承認，趙各莊工會是黃色工會帶有赤色工會的傾向。¹⁸⁹

18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1929/10）、〈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10），《國際檔案 8》，頁 195、206-207。

188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12），《國際檔案 8》，頁 329。

189 〈順直省委員會紀錄〉（1929/12/18），《河北文件 4》，頁 389-468。

隨後，張慕陶被要求到上海去和全國總工會「討論」，最後終於結論說唐山工人「對於自己礦區中的黃色工會是反對的，但還要到礦業總工會（按：五礦聯合辦事處）請願；他們反對礦山國民黨的市黨部，但對於黨部仍有幻想；他們反對黃色委員，自己仍想作黃色委員」。總而言之，工人仍是在黃色工會的架構下從事活動。因此，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堅決地打跑黃色委員，搗毀黃色工會，趕走國民黨的指導員，反對各派國民黨，如此才能根本消滅黃色工會，建立赤色工會的組織。¹⁹⁰ 換言之，地方黨員從此後不僅不能再繼續用國民黨的招牌，由上而下地從事合法運動，還要站在國民黨外面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推翻國民黨政權。

隨後，中共中央派賀昌（化名毅宇）來取代張慕陶的領導。賀是山西離石人，1920年於太原的山西省立一中求學時，經高君宇的介紹，與同儕王仲一一起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賀離開山西，轉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活動，並於同年轉黨，但仍主要從事團務工作。1929年春，賀被調往香港擔任中共南方局書記。¹⁹¹ 1930年初，中共中央鑒於張慕陶所領導的順直黨犯了右傾取消主義錯誤，並且懷疑順直領導機關已為國民黨左翼的改組派、第三黨及業已脫黨之陳獨秀「取消派」滲入（這也被認為是當時中國各地黨部普遍存在的情形），¹⁹² 故決定把在香港工作的賀昌、聶榮臻（廣東省委軍委書記）、陳復（廣東番禺人，國民黨左派陳樹人之子，香港工人日報社副社長）

190 〈順直工人鬥爭形勢與我們的工作〉（1930/01/26），《河北文件 5》，頁 47-52。

191 梁金保等著，〈賀名播幽燕——記青年革命活動家賀昌同志〉，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山西革命回憶錄》，輯 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 79-90。

19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01/30）、〈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0/02），《國際檔案 9》，頁 46、70。

調到順直工作，並由賀昌取代張慕陶順直省委書記的職位。從此以後，河北與北方革命邁入所謂立三路線的時期。

所謂的立三路線，簡單地說，即是要黨員由下而上地動員群眾，在城市中發動總同盟政治罷工（而不僅是經濟鬥爭），在農村中發動地方暴動（不能僅限於游擊運動）和土地革命（也不能僅限於帶有超階級色彩的反捐稅鬥爭），¹⁹³ 並首先在一省、數省地區取得勝利，最後發展到全國的勝利，推翻國民黨的政權，建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¹⁹⁴ 此一路線背後的邏輯是，群眾革命情緒的日益高漲及革命形勢的愈趨成熟，全國皆然，「毫無例外」（北方亦是如此），¹⁹⁵ 唯一的缺憾僅在於黨組織力量的薄弱和黨內各種右傾觀念（如取消主義與只跟在革命情緒高漲之群眾背後的「尾巴主義」）。因此之故，為完成目前革命的任務，必須縮小黨內的民主，加強對下層的控制，乃至於黨內生活軍事化，把全黨形成一個軍營，一切指揮絕對集中，這正是後來李立三中央決定把黨、團組織暫時統一起來為一「行動委員會」的理論基礎。¹⁹⁶

賀昌、聶榮臻等甫被派來北方擔任領導工作的幹部，皆是立三主義的信徒。以聶榮臻為例。聶當時主要負責的是組織和軍事工作（儘管省委軍委書記仍是廖劃平，但聶的地位無疑較廖還要高），他當時的立場就是堅決反對某些北方黨員所提出的北方例外論（或北方落後論，即認為北方與南方情況不同，故游擊運動和地方暴動路線不適合

193 〈中央通告第七十號〉（1930/02/26），《中央文件 6》，頁 28。

194 〈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1930/06/11），《中央文件 6》，頁 118-121。

195 〈順直省委會議紀錄〉（1930/04），《河北文件 5》，頁 248。

196 〈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組織任務〉（1930/07/22），《中央文件 6》，頁 205-206。

在北方執行)，¹⁹⁷ 宣稱北方農村群眾的鬥爭從一開始就是「地方暴動」（而不是按照機械的先游擊後暴動之階段論），還誇稱如果做得好，北方工作將可較南方獲得更快的成功。¹⁹⁸ 至於擔任省委書記的賀昌更是一個大左派。在某次論及唐山工運的策略時，省委常委張昆弟（湖南人，自 1922 年起便在北方地區從事工人運動）提出所謂「管理生產，占據礦場」的激進口號；聶榮臻則是把焦點集中在奪取政權上，反駁說現在提管理生產的口號，會令群眾忘了奪取政權的鬥爭；賀昌則是進一步地把地方暴動和管理生產聯繫起來，還說管理生產「不僅礦山適用，一般都適用」。¹⁹⁹ 這種不僅要奪取政權，還要進行管理生產的社會主義建設，正係呼應李立三「決定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必然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勝利」的說法。²⁰⁰ 無論如何，賀昌正是立三路線在北方的代表者。²⁰¹

爲了推動立三路線，賀昌等人還把那些過去隱藏在國民黨機關內進行統戰工作的黨員找出來，使投入地方暴動。以張友漁等軍委特科人員爲例，如前所述，這些人過去都是在國民黨機關中任職，利用其私人關係從事上層統戰活動。在賀昌掌握順直省委領導權後，便把「消極的特支同志」²⁰² 拉出政府機關，要他們到街上去發傳單。然而，這些人既不懂得群眾動員的技巧，還是大名鼎鼎的公眾人物，跑到街上去大刺刺地發傳單，哪有不被人發現的道理。因此，毫不令人意

197 〈順直省委五月工作報告〉(1930/06/07)，《河北文件 5》，頁 462。

198 〈順直省委第十次常委會議紀錄〉(1930/06/02)，《河北文件 5》，頁 374-375。

199 〈順直省委第十次常委會議紀錄〉(1930/06/02)，《河北文件 5》，頁 373、376-377。

200 〈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1930/06/11)，《中央文件 6》，頁 126。

201 洪易，〈李立三主義在順直的實際運用〉(1930/12/14)，《河北文件 6》，頁 479。

202 〈克明給中央的報告〉(1929/09/23)，《河北文件 4》，頁 54。

外，當時任職市公安局的李予昂便在一次發傳單的行動中遭到逮捕，幸虧最後還是靠著私人關係所以未遭到殺害，只被押回原籍山西去而已。²⁰³順便一提的是，當時業已因王藻文等人之叛變而暴露身份並被迫離開天津憲兵司令部的薄一波，也在1930年初「中央軍委某負責同志」的計劃下，前赴唐山試圖發動晉軍李生達三十六師的二一四團兵變，只不過最後由於領導的不堅決而流產。²⁰⁴這位「中央軍委某負責同志」正是聶榮臻，至於在薄的回憶錄中被指為立三路線之執行者的省委書記張慕陶，早已被賀昌取代，不能為立三路線負責。²⁰⁵

二、立三路線時期冀南農村地區的暴動

立三路線倡導推翻國民黨的非法武裝暴動。平心而論，在立三路線還沒成為領導路線以前，河北黨某些地方黨部就已著手進行武裝行動。只不過大多帶有濃厚的自發性色彩，而且就像北伐時期的冀東玉田暴動般，全都是依賴少數個別黨員的地位與關係，以及某些既存的地方網絡與社群去動員群眾，結果當然不易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與對黨的認識。加上群眾的領導者又相當依賴政治、軍事的外援，以至往往流於少數人的軍事行動，其下場若非遭到鎮壓，就是接受政府當局或軍事集團的收編，成為革命的敵人。而立三路線則要求黨員完全拋棄他人的招牌及那些既存的地方網絡或人際關係去發動暴動，可是地方黨員根本做不到這一點，他們雖然高呼黨的口號，但實際上還是像過去一樣靠某些個別地方群眾領袖去動員，結果就是成為脫離群眾更加嚴重的「單純軍事行動」。

203 陳荷夫編，《張友漁回憶錄》，頁49。

204 〈順直省委會議紀錄〉（1930/04），《河北文件5》，頁250。

205 薄一波，《七十年代的奮鬥與思考》，頁84-85。

以冀南地區為例。前述本文已談過早期大名、濮陽與邢台黨發展的概況，事實上，磁縣也是中共冀南黨發展的一個重點地區。磁縣黨最初是由磁縣彭城人王子清發起。王曾在北京求學並於1922年入黨，回鄉後以岳城西小屋小學（由此推測，王亦是農村小學教員）為中心開展活動，並吸收在邢台完成學業回鄉的藺笑秦等人入黨。²⁰⁶ 又，磁縣彭城周圍一帶地區，是屬太行山下的半山區，交通不便，當地農民常依據某些既存的家族、村落等地域網絡，結成具有超階級性質的自衛團體，如天門會（紅槍會之一支）便是其中一種。²⁰⁷ 在北伐時期，天門會在豫北、冀南之林縣、安陽、武安、磁縣一帶勢力相當龐大，其中以岳城為中心的磁南地區天門會還曾在1926年底與張學良的奉軍發生過激烈的衝突。²⁰⁸ 不過，即使如天門會般帶有濃厚自發色彩的群眾鬥爭，也相當依賴政治軍事力量的外援，如北伐時期天門會的領袖韓欲明便曾主動與奉系張作霖接洽，並接受奉軍的資助與北伐軍

206 《冀南革命鬥爭史》，頁11-13。

207 天門會最初是由河南林縣東油村知識份子郭官林所創。1925年，天門會與土匪發生衝突，郭官林怕累及自身，乃脫離會務，該會領導權隨即由另一位貧農出身的韓根仔掌握。韓後來改名韓欲明，假稱「真命天子」，在1926年8月於東油村設立政府，公然否定民國政府當局的統治。周圍地區農民亦因天門會在抗拒土匪方面頗有成效，相率加入，天門會之勢因此大盛，並擴及鄰近的冀南、豫北諸縣。馬場毅，《近代中国華北民眾と紅槍會》（東京：汲古書院，2001），頁61-68。

208 當時磁縣南區有一位名叫李有祿者，因在其家鄉受到區長王松亭的迫害，憤而跑到林縣去學習天門會，並在家鄉設壇授徒，意圖報復。當時磁縣南區民眾亦因軍隊和官廳的壓迫，憤恨已極，相率加入天門會。1926年年底，有數百名天門會會眾到岳城鎮南區警察所內，架走王松亭，不意竟與當時駐紮磁縣的奉軍發生衝突。同年12月下旬，張學良抵磁，見天門會會眾仍擬圖頑抗，派兵圍剿，當地群眾慘遭奉軍屠戮，死傷不計其數。但奉軍亦不敢久駐農村，故天門會仍在磁南一帶農村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去臘磁縣紅槍會變亂之始末〉，《大公報》，1927年3月8日，第6版；長野朗，《土匪、軍隊、紅槍會》，頁269-270。

對抗。²⁰⁹ 根據中共河南省委所言，當時天門會所以反對國民黨與北伐軍，正是因為國民黨拒絕援助他們。²¹⁰

1928年，天門會遭馮玉祥驅散，首領韓欲明被迫流亡東北，天門會似乎消聲匿跡。然而，實際情形卻大謬不然，根據順直省委所言，當時涉縣、磁縣、武安、林縣一帶的民團皆是豪紳地主領導之「天門會的化身」。在1929年5月前後，這些天門會化身的民團擬策動一場暴動，時在天門會中擔任相當於參謀職務的王子清因此到北平找黨，誇口說天門會有多大勢力，要黨予以援助。順直省委雖然也知道王是吹牛，但也派了二人前去工作。²¹¹ 磁縣黨便因此與順直省委接上了頭。

1929年底，王子清等人又在磁縣城郊的甘草營一帶發動後來被稱為「插耬應差」的鬥爭，要求把過去應歸佃農負擔的差役轉歸地主負擔（地主應差）。但順直省委從一開始便對此一鬥爭相當不滿意，因為地方黨員在此一鬥爭中沒有否認一切支應，並進一步聯繫到反軍閥混戰的運動；²¹² 另一方面，鬥爭主要是依賴王子清、唐壽山等在地方上極具威望的上層份子發起，群眾只有對這些個人的信仰，缺乏對黨的認識。甚至這些地方黨員還派人去和國民黨調停，掛起國民黨農民協會的旗幟跑到豪紳的家門口去示威。²¹³ 結果就只是流於和平、

209 馬場毅，《近代中国華北民眾と紅槍会》，頁69。

210 〈河南省委報告〉（1927/09/04），《河南文件2》，頁85。

211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05/20），《河北文件3》，頁475；〈順直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09/23）、〈順直省軍委八九兩月軍事工作報告〉（1929/10），《河北文件4》，頁63-64、268-269。

212 〈順直省委給邢台中心縣委的指示信〉（1929/11/20），《河北文件4》，頁346-347。

213 〈直南的政治經濟狀況及群眾鬥爭〉（1930），《河北文件5》，頁145-148；《冀南革命鬥爭史》，頁32-34。

合法的請願運動。

除了磁縣甘草營鬥爭外，其他如大名的反華洋義賑會鬥爭（該會占地未付錢）、任縣與肥鄉的小學教員加薪鬥爭，以及任縣反硝磺局鬥爭（硝是製作鞭炮原料，過去不收捐稅，自1930年後開始收捐稅，引起抗議），沒有一個不是採取向國民黨政府當局和平請願的方式。在賀昌等順直省委領導者看來，這根本就是右傾、調和、不正確的傾向。²¹⁴ 然而，當時順直省委對此亦無辦法，蓋在1930年以前，順直省委對冀南黨的領導關係只是斷斷續續，不甚穩固。1929年4月，省委巡視員陳潭秋、郝清玉在邢台黨員張信卿家中召開冀南黨的工作會議，成立邢台中心縣委，由馮溫任書記兼宣傳部長，劉大風任組織部長，林喻屏（河南濮陽人）²¹⁵ 任秘書。不過，邢台中心縣委直轄於黨中央，非屬順直省委管轄。²¹⁶ 加上冀南地處偏遠，中央根本鞭長莫及，省委即使派巡視員，也只是「走馬看花」、「馬到成功」，無法起到領導的作用，²¹⁷ 故邢台中心縣委幾近於一個獨立王國。後來省委乃以縣委領導「務廣而荒，有名無實」之名，決議縮小中心縣市委的職權，並規定所有的中心縣市委皆歸省委管轄，以加強對下層的領導，但這又惹得邢台中心縣委不滿，起來抗議。²¹⁸ 為此，省委先後

214 〈直南的政治經濟狀況及群眾鬥爭〉(1930)、〈順直省委給直南的指示信〉(1930/02/16)，《河北文件5》，頁143-144、149-152、158-159。

215 喻屏，〈中共邢台中心縣委的一些情況〉，《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1（上），頁126-127。

216 〈順直省委給邢台中心縣委的指示信〉(1929/11/20)，《河北文件4》，頁344-346。

217 〈順直省委員會紀錄〉(1929/12/18)，《河北文件4》，頁400。

218 〈順直省委通知第十一號〉(1929/10/18)、〈順直省委給邢台中心縣委的指示信〉(1929/11/20)、〈中字第66號直字第293號〉(1929/11/29)，《河北文件4》，頁173、344-346、364-365。

調中心縣委馮溫、劉大風及冀南巡視員張含輝等人到省委了解狀況。正當此時（1930年3月），邢台中心縣委委員王近瑞（清豐人）被捕叛變，導致中心縣委大破壞。順直省委藉此機會，派郝清玉、張兆豐、吳正庭（團省委代表）等省委大員去磁縣成立以馮溫為書記的直南特委（4月），把對冀南黨的領導權抓在省委手中。²¹⁹冀南黨自此後進入了立三路線時代。

郝清玉等人亦不負省委所望，在5月底，冀南黨即宣稱在磁縣、大名已分別建立紅二十與二十一軍。²²⁰冀南地區的黨員數也自3月左右的280人，暴增至6月時的1,300人。²²¹除此之外，郝清玉還開除了在当地黨員間極有威望的大名七師校長謝台臣，以及教員晁哲甫、王振華等人的黨籍。如前所述，大名七師最初便是由與共產黨有密切關係的謝台臣等人所創，其教員亦多是共產黨員，故大名七師乃共產黨在冀南沙區的大本營。²²²在1929年雙十節前後，有七師和十一中學生通信，批評三民主義，被軍警發現，導致七師與十一中遭到搜查。²²³謝台臣等人因此不滿共產黨，說黨幼稚的指示染紅了七師。鑒於謝等人每月所繳交之50元黨費對冀南黨務的影響，所以儘管謝等人既未實際參加黨的工作，還發牢騷，但共黨最初並未予以嚴厲的處分。²²⁴郝清玉等人來到冀南以後，直接向謝台臣等人要錢買槍，以準備暴動。謝等人不給，如此一來，郝等人當然更無顧忌地以取消派

219 中共河南省濮陽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直南地區黨的前期活動概述〉，《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1（上），頁7-8。

220 〈擁護直南的紅軍〉（1930/05/30），《河北文件5》，頁350。

221 〈順直省委五月工作報告〉（1930/06/07），《河北文件5》，頁460。

222 〈順直省委組織部工作情形〉（1929/10），《河北文件4》，頁130。

223 〈中字第66號直字第293號〉（1929/11/29），《河北文件4》，頁363。

224 〈巡視大名、南樂、清豐、濮陽的工作報告〉（1929/11/26），《河北文件5》，頁134。

之名義，開除了他們的黨籍。²²⁵

但是，我們不應過份強調立三路線對冀南黨所可能帶來之傷害。實際的情形是，地方黨員對於省委指示之地方暴動計劃大多興趣闕如，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與安危。如許多被派遣回鄉的大名七師學生皆猶豫不決，他們雖想革命，但又留戀學校生活，不願違背父母的意志，也沒有衝鋒陷陣的情緒，所以只在家裡待了幾天後便又跑回學校去，什麼工作也沒有做；南樂的黨員同樣也是故意遲延、推諉、不願下鄉，不願做公開活動，也不贊成用黨的名意散發傳單，甚至還背著直南特委書記馮溫與另一位特委委員劉大風「談判」。前一章已介紹過，劉大風是濮陽人，也是七師學生，還是冀南沙區黨的創建者之一。但他不相信群眾，嘲笑立三路線號召的群眾鬥爭。²²⁶

事實上，在當時直南特委中，只有特委書記馮溫一個人熱情地執行省委路線。²²⁷ 其他的直南特委委員，如劉大風和在磁縣工作的張兆豐等人皆放棄了下層群眾運動，只計劃著如何利用王子清等傳統農民團體（如天門會等會門）的領袖來號召群眾組織紅軍。欲擴張勢力的王子清等會門領袖最初亦贊成暴動，甚至還害怕農民不願跟著走，建議放火燒掉農民的房子。後來，王子清等人也確實於1930年5月1日在岳城發動了暴動，但實際上這些群眾團體的領袖相當動搖，結果暴動失敗。隨後，特委又計劃五卅暴動，但那些群眾領袖沒有來，群眾也動不起來，暴動當然沒有發動。張兆豐等人還是堅持與會門領

225 安明，〈一九二五至三四年中共直南黨的活動大事記〉，《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1（上），頁105。

226 〈順直省委巡視員巡視大名報告〉（1930/06/18）、〈順直省委巡視員關於南樂工作的報告〉（1930/06/19），《河北文件5》，頁474、477、480-481。

227 曉霧，〈直南報告——巡字第三號〉（1930/09/06），《河北文件6》，頁312。

袖接頭，靠他們的關係動員群眾，甚至還掛起紅二十軍的名號，但最後仍舊被會門領袖們騙了，這些領袖在暴動時皆找不到人，群眾也因此沒有發動起來，所謂的紅軍根本只是個空招牌而已。²²⁸ 同一時期，大名縣委也藉由土匪領袖的關係，成立紅二十一軍。但後來因為大名縣委動搖，害怕會「殺人流血」，所以掛起紅軍的招牌後也沒有下文。順直省委對此相當震怒，批評這種以由上而下的「軍事陰謀」取代由下而上「群眾動員」之行動是「單純的軍事行動」，²²⁹ 還上綱上線地說，這就是「富農意識」的表現。²³⁰

三、立三路線時期冀東與冀中農村地區的暴動

在同一時期冀東與冀中地區的農村暴動中，也普遍犯了「單純軍事行動」的錯誤。

在冀東地區。如前所述，早在 1927 年之時，玉田縣周圍地區反抗旗地變民的農民群眾曾在時任國民黨直隸省黨部農民部領導之葉善枝，以及張明遠等農村小學教員出身的共產黨員領導下，發動一場玉田暴動。在暴動失敗後，當地黨員有的在韓麟符鼓動下，率領農民參加張宗昌等軍閥的部隊，有的回鄉繼續擔任小學教員，正如順直省委在 1929 年時所言，共黨在玉田縣的小學教員間具有相當的影響力。²³¹ 除此之外，不少人還跑到國民黨機關中去謀職，如玉田便有部分黨員在縣府機關中做事，過著「灰色生活」；²³² 豐潤的黨員則全

228 〈直南工作會議紀錄〉(1930/07/20)，《河北文件 19》，頁 18-41。

229 〈直南行委關於擴大紅軍與建立蘇維埃政權問題給省行總委的報告〉(1930/08/04)，《河北文件 19》，頁 44-45。

230 〈順直省委給直南特委信〉(1930/07/02)，《河北文件 6》，頁 5。

231 〈順直省委組織部工作情形〉(1929/10)，《河北文件 4》，頁 128。

232 〈順直省委給玉田縣委的指示信〉(1930/05/16)，《河北文件 5》，頁 315。

部都是「做官的」，以至放棄黨的工作。²³³ 不儘如此，這些當老師或當官的黨員，對於當地前仆後繼的群眾運動，很少能起到領導的作用，大多僅只是群眾的尾巴而已。²³⁴ 其中如由流氓書記張志全²³⁵ 領導的遵化黨，雖然可以影響兩萬群眾，但黨也只能在群眾中當「調和派」而已。²³⁶ 甚至遵化黨還在「旗民爭墾地」的鬥爭中提出「分糧不要地」的口號，在順直省委看來，這與玉田黨做了四個多月反「編遣庫券」的苛捐雜稅鬥爭卻毫無成效的情形一樣，都是由於富農份子混入革命陣營中的緣故。²³⁷ 因此，在1930年5月底，順直省委乃向冀東各縣黨部發了一指示，說由於反捐稅已經不再是群眾的迫切需求，故黨員不應再侷限在反捐稅鬥爭的富農路線上，而要積極發動地方暴動，以達成建立北方蘇維埃政權的任務。²³⁸

1930年5月28日，省委巡視員曹策（團省委書記）和葉善枝來到玉田，指示玉田黨以鴉鴻橋²³⁹ 碼頭工人的五卅示威為中心，配合

233 〈順直省委豐潤工作會議紀錄〉（1930/05/15），《河北文件5》，頁299-300。

234 〈順直省委關於京東群眾工作給省委巡視員及京東黨部的信〉（1930），《河北文件5》，頁175、180。

235 張志全，遵化人，曾參加玉田暴動，1929年春至1930年春間任遵化縣委書記，抗戰時在家鄉從事抗日活動，1947年被殺害。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頁749。

236 〈順直省委組織部工作情形〉（1929/10）、〈順直省委員會紀錄〉（1929/12/18），《河北文件4》，頁128、400。

237 〈順直省委致京東各縣委及全體同志信〉（1930/05/26），《河北文件5》，頁339-340；〈玉田縣委會議紀錄〉（1930/05/13），《河北文件17》，頁106。

238 〈順直省委致京東各縣委及全體同志信〉（1930/05/26），《河北文件5》，頁338-341。

239 座落在還鄉河（薊運河分支）的鴉鴻橋與鄰近的窩洛沽是玉田縣與冀東地區重要的商業集鎮，還是土布的盛產區。見：魏宏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305-315。

周圍農民隊伍準備攻城。但當時包括縣委書記陳鐵錚（又名陳士杰、魏蘇，經歷不詳）在內的地方黨員皆極害怕，說省委是外省人，批評這種做法是斷送玉田革命、犧牲地方黨員。曹策因此祭出紀律，但這些地方黨員竟說要開除就全部開除！曹不留情地開除了七個人，並改組下層黨部。不過，賀昌對於曹策仍很不滿，因為曹在主觀上竟認為要執行省委的路線很困難，所以主張對黨內說是要暴動，但對群眾還是宣傳要示威。賀昌以為曹策和葉善枝是給玉田黨的富農份子包圍起來了，批評曹策的意見是「皮毛意見」，對於問題的了解「很機械」。所以後來賀昌就以改造團省委的藉口，以「小吳」（應指吳正庭，此人日後叛變，經歷不詳）取代曹策任團省委書記（曹策反對說這要團中央批准，聶榮臻則站在賀昌的立場上反批曹策說贊成改造就不要反對調人），還派另一個同樣主張反捐稅鬥爭不重要的軍委領導廖劃平去領導冀東暴動。²⁴⁰

6月25日，廖劃平在遵化縣城內召開冀東豐潤、玉田、遵化、遷安諸縣聯席會議，宣達省委的指示並成立以葉善枝為書記的京東特委。與會的冀東地方黨員皆自我批評小學教員黨員多不堅決，以及過去冀東黨普遍犯了和平發展的錯誤，承認目前只有解決豪紳地主並沒收其土地予以分配才能解決貧民痛苦。會議最後總結說冀東暴動的條件已經成熟，要黨員們不要再存等待觀念，只要抓緊某一問題就可以轉變成地方暴動。²⁴¹

儘管此次會議之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順直省委仍相當失望，因為該會議把焦點集中在民團、警察、馬巡和「瑪非隊」等地方武裝的

240 〈順直省委第十一次常委會議紀錄〉（1930/06/07），《河北文件 5》，頁 414-431。

241 〈京東特委關於京東黨員代表會議經過情況給省委的兩個報告〉（1930/06/28），《河北文件 17》，頁 118-147。

策動上，乃至於忽略了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流於「單純的軍事行動」。省委批評靠此辦法組織的「紅軍」（名號不詳），只是黨內而非群眾的，是和平發展而非鬥爭來的，是錯誤的經濟觀念和升官主義下形成的，甚至是吸收許多吸「白麵」之不堪一擊的病夫所組成的。²⁴²更糟糕的是，冀東地方黨員後來都因為白色恐怖藏了起來，其中任京東特委書記的葉善枝也因為父親遭捕而被罰了四枝槍。²⁴³很明顯的，儘管地方黨員最終在省委的壓迫下暫時放棄了利用國民黨招牌的合法運動，但他們並未因此走到下層去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仍試圖策動警察、民團的兵變，從事「單純的軍事行動」。但終究仍是失敗，一事無成。

同一時期的冀中地區也爆發了幾起無疾而終的騷動事件。在涿縣，曾在保定育德中學學習並加入共產黨的張廷瑞於 1928 年自天津監獄獲釋以後，回到家鄉涿縣活動，通過時任教涿縣鄉村師範之黨員魏頌堯及其叔尚莊村小學校長的關係，到尚莊村擔任小學教員。張後來發動他家裡的雇農起來反對他的地主父親，因此被迫離開涿縣赴北平等地活動。²⁴⁴當時順直省委對此相當滿意，指示冀南黨要學習涿縣的經驗，公開地以赤色綱領向雇農宣傳。²⁴⁵不過，事實上，涿縣鬥爭根本不是黨領導下的鬥爭，只是單純的個人活動。²⁴⁶在此狀況下，地方群眾乃至於黨員，根本不清楚共產黨是什麼團體。與涿縣同

242 〈順直省委關於京東特委代表大會的批評與今後工作指示〉（1930/07/06），《河北文件 6》，頁 28-29、34-35。

243 〈順直省委第十七次常委會議紀錄〉（1930/07/19），《河北文件 6》，頁 101。

244 王暢，〈中共保定市委創建人之一——張廷瑞烈士光輝的一生〉，《河北文史資料》，輯 10，頁 71-82。

245 〈順直總行委給直南特委的指示信〉（1930/10/05），《河北文件 6》，頁 366。

246 〈順直總行委給保屬特委指示信〉（1930/10/09），《河北文件 6》，頁 374。

屬保屬特委管轄的安平縣黨員便說：「我知道我們是共產黨，一定會成功的，加入裡面也好玩。」²⁴⁷

無論黨員是出於什麼緣故入黨，順直省委現在要所有的黨員不顧一切地投入地方暴動。完縣（今順平縣）五里崗之共產黨員韓永祿自保定育德中學畢業後，回鄉擔任國民黨村長。在 1930 年 5 月時，順直省委爲了推動保屬地區的工作，派遣省委農運部長郝清玉及秘書徐步雲到保定組織保屬特委。保屬特委的首要工作，便是糾正過去保屬地方黨員利用國民黨招牌，乃至於不敢把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拿出來與群眾知曉的「右傾」錯誤。²⁴⁸ 後來完縣的韓永祿也因爲身份暴露，於 8 月發動完縣五里崗暴動，還組織了紅二十二軍。然而，事後證明，五里崗暴動也不過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並未由下而上地動員群眾，也沒有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最後甚至還自行解散了紅二十二軍，在順直省委看來，這實在是可恥的機會主義。即使成績不令省委滿意，韓永祿也爲此賠上了自己的性命，於隔年被國民黨政權逮捕殺害。²⁴⁹

另外，蠡縣也於 8 月發生了一起流產的暴動。畢業於保定二師並回鄉擔任小學教員的博（野）蠡中心縣委王志遠、劉憲增等人，策劃埋伏四十多位蠡縣縣城中高小、師範的學生黨員在縣城內，等待城外的農民隊伍攻城時起來暴動，奪取縣城。但最後農民隊伍沒有來，暴動也根本未曾發生。²⁵⁰ 幸運的是，博蠡黨並未因此遭到破壞，黨

247 〈保屬特委關於各縣市及特委工作情況給河北省委的報告〉（1930/11/04），《河北文件 18》，頁 21。

248 〈保南工作會議〉（1930/06），《河北文件 18》，頁 6-15。

249 〈順直總行委就完縣武裝暴動給保屬特委的指示信〉（1930/09/30），《河北文件 6》，頁 346-349。五里崗暴動的經過可見：完縣黨史辦公室整理，〈完縣五里崗暴動〉，《河北黨史資料》，輯 2（石家莊，1985），頁 187-197。

250 〈順直省總行委就博蠡暴動流產給保屬特委的指示信〉（1930/10/10），《河北文件

員儘管因為白色恐怖或是消極不幹，或是等待大幹，但終究仍是留在當地農村中繼續活動。²⁵¹ 後來保屬特委還打算發動游擊戰爭，但旋不久李立三下台，中央路線轉變，順直省委因為內部叛變與外部的破壞，再度與保屬黨失去聯繫，保屬的游擊運動也未曾發動，直到1932年，保屬黨才再度在這些舊基礎上發動了著名的高蠡暴動。

對於當時各地普遍出現「單純軍事行動」的情形，順直省委並不是不清楚，卻無可奈何。1930年6、7月間，中央秘書處秘書長余澤鴻²⁵² 被派來順直傳達新的指示，說中央計劃組織全國四大軍區（廣東、順直、湖北、上海），以爭取武漢的勝利。其中順直黨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動天津、唐山、北京、太原四大城市的武裝暴動，以及冀東、冀南、保定三處地方暴動，其中後三者還必須各自成立五萬紅軍沿鐵路向北平與天津發展，配合全國的軍事行動。²⁵³ 為了執行此一計劃，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北方局（書記賀昌，組織部長余澤鴻，宣傳部長陳復），指導整個北方地區的黨務工作。至於順直省委亦於7月21日決議合併黨、團省委，成立順直總行動委員會，直接指揮各項鬥爭，落實中央的指示。順直總行委在成立後不久，旋即於8月4日

6》，頁384-389；王志遠，〈博蠡地區的建黨和農民運動〉，《河北文史資料》，輯2，頁23-41。

251 〈保屬特委關於各縣黨的工作情況給河北省委的報告〉（1930/11/15），《河北文件18》，頁33-36。

252 余澤鴻，四川長寧人，化名曉野，曾任湖北省委與中共中央秘書長，1930年赴順直工作，1931年赴中央蘇區工作，1935年於四川戰死。李德明，〈余澤鴻〉，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17（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165-182。

253 〈順直省委第十八次常委會議紀錄〉（1930/07/21）、〈全國革命高潮與北方黨目前的政治任務決議案〉（1930/08/04），《河北文件6》，頁109-112、198-229。

發佈〈全國革命高潮與北方黨目前的政治任務決議案〉，²⁵⁴以呼應中共中央於6月11日所公佈之〈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作為北方革命依循的指導路線。

與此同時，順直省委軍委領導廖劃平被召回上海與中央軍委大員劉伯承（中央軍委參謀長）、聶榮臻（6月時被調回中央做特科工作）、歐陽欽（湖南寧鄉人，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後到紅三團工作，抗戰時期在陝甘寧邊區工作，1978年病逝）等人討論工作。在該會上，聶榮臻批評北方黨員的「北方落後論」（說北方黨曾指群眾是神經病），並說在北方成立紅軍是完全有可能的；歐陽欽則說北方黨應放棄錯誤的軍官路線，執行由下而上的「兵暴」路線；劉伯承甚至說北方黨有濃厚的機會主義，並要求堅決地驅逐這些機會主義份子。對於這些批評與指示，廖劃平不是不清楚，但他又能如何呢？省委對於地方的控制力是如此薄弱，以至省委派出的巡視員最後都被地方黨部包圍軟化，放棄立場。²⁵⁵如前述被分別派去冀東與冀南工作的曹策與張兆豐即是例子。在這種上行下不效的窘態下，省委如何能夠完成中央的指示呢？

儘管如此，余澤鴻、廖劃平把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北方紅軍，支援全國軍事行動的計劃，帶回北方。但旋不久李立三即倒台，中央路線轉變，順直省委既未及執行建立北方紅軍的計畫，也因為黨內的鬥爭與當局的鎮壓，再度崩潰瓦解。北方黨也由此結束了順直省委的領導時期。

254 〈全國革命高潮與北方黨目前的政治任務決議案〉（1930/08/04），《河北文件 6》，頁 198-229。

255 〈順直問題會議紀錄〉（1930/08/19），《河北文件 6》，頁 267-294。

小 結

瞿秋白、李立三的政策所以「左」，就在於他們沒有認清中國社會是一個已被各式各樣政治勢力與特殊關係所分裂的社會，而幻想群眾已在階級壓迫與反帝、反封建和反國民黨統治的迫切需求下團結起來，以至由上而下地訴諸組織紀律，強迫黨員拋棄他人的政治招牌，禁止幹部再透過任何既存的特殊關係去從事革命。此一粗暴的做法，不僅導致黨的分裂，並且由於過度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招致白色恐怖。革命也同時變得更加的孤立，脫離群眾，而流於一場場「單純的軍事行動」。這就證明了中共不可能單恃一個龐大的極權主義式的黨國機械，統治中國這樣一個多樣化且分裂的社會。

也許這些左傾的上層領導已慢慢發現，由上而下的組織紀律不足以駕馭此一分裂的社會與黨組織，無法跨越既存的鴻溝。向來即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北平黨，在當時賀昌的省委看來根本就是取消派的大本營，所有的一切政策傳到市委及下級的支部，皆被相繼地打折扣，未能具體執行。²⁵⁶ 連北平黨都是如此，那就更遑論冀東、冀中與冀南等地方黨了。即使省委派下去工作的特派員沒有被地方黨包圍、軟化，地方幹部對省委的指示與紀律，也熟視無睹，如此也無怪乎前述的唐山群眾領導劉成章竟然敢威脅說：「唐山暴動起來，不怕省委不找我。」蓋當時共黨沒有這些群眾領袖的幫助，在群眾間幾乎無能為力。中共中央也因此不得不重新考慮對劉成章的懲處。²⁵⁷

然而，如果我們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以為中共應該完全拋棄黨

256 〈順直總行委給北平行委的指示信〉(1930/09/15)，《河北文件 6》，頁 319。

257 〈順直省委第十八次常委會議紀錄〉(1930/07/21)，《河北文件 6》，頁 113。

的組織領導，以便與其所處的地方情境結合，這也是以偏概全。筆者以為，那些高呼共產革命「地方化」的學者，事實上只是從另一個角度幻想中國社會是一個整體。他們以為中國的地方社會，在反國家的共同目標下，透過某些既存的文化網絡或特殊關係，早已和諧地結合起來。孰不知他們所頌揚的那些既存的網絡與關係，也同時把中國整個社會撕裂為各式各樣的群體。這些社會群體又經常與上層不同的政治派別結成短暫的合作關係，互相利用，以滿足其各自的利益。David Strand 在關於 1920 年代北京人力車夫抗爭的研究中便發現此一現象，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群眾的抗爭「只是公開地展現了群眾內部的分裂」。²⁵⁸

中共最初必須利用這些既存的裂痕打入到社會當中，但關鍵在於他們接下來能不能依據其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重新分化社會，以此建立其黨國統治。如果共產黨不能夠塑造一個能為其所控制與操弄的二元分化社會，而僅只限於利用他人的招牌或現成的社會關係動員群眾，那麼他們的革命活動就很難不流於為人作嫁的和平、合法抗爭，這就是張慕陶與前章所述李大釗領導時期之河北黨的現象。黨不能成為社會的領導者，反倒為社會所吞沒與撕裂。前述的順直省委事件固然是由於中共中央欲由上而下地貫徹組織紀律所引起，但其中的裂痕早就存在於李大釗領導時期。那些是導源於其所處社會中既存的裂痕，張慕陶也坐視這些裂痕在黨內的存在與擴展。當後來的立三路線與國際派領導的中央再度欲貫徹黨的組織紀律之際，這些裂痕又再度迸發出來，開啓另一回合黨內的衝突，此即下章將探討的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

258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p. 196.

第三章

一九三〇年代前期河北省的 共產革命運動，1930–1934

1930 年代前期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一方面，由於日本愈益露骨的入侵，中國掀起一股看似超階級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浪潮。再者，自 Prasenjit Duara 以來的一些學者主張，中國近代以來不斷深化的國家內卷化現象，在此一時期由於國民黨當局愚蠢地試圖加強對地方的控制，達到高潮，河北的農村地區尤其如此。這就導致農民與國民黨當局的離心離德，為中共日後的到來做好準備。¹

可是，學者們又宣稱，國民黨深入國家機械的魔爪，在農村地區雖然產生反效果，但在城市卻收得相當成效。例如，在中共白區黨的大本營上海，國民黨特務即成功地破壞共黨組織，其中 1931 年中共特務頭子顧順章的被捕叛變，影響尤大，導致上海中共特務網的瓦解、黨部的破壞，以及總書記向忠發等中共要人被捕。²如下文所述，同樣的白色恐怖也導致平津黨與河北省委的破壞，以及內部的叛變與

1 如李懷印、劉昶等人就不加批判地採用國家內卷化的觀點，描述革命前華北農村的背景。Huaiyin Li,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pp. 351–352; Chang Liu,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pp. 91–113, 164–196.

2 顧順章事件，請見：Frederic Wakeman, Jr.,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51–161.

分裂。

中共官方與當代學者認為，當時中共左傾的領導應為白區黨的破壞負責。他們的指控，如據 1942 年高崗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主要有如下幾點：(一)瞿秋白以來迄王明時期臻於高峰的中共中央左傾領導，硬搬教條理論，執著於城市的工人運動，無視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要求黨員冒險地發動政治抗爭，導致被鎮壓；(二)左傾中央領導片面地堅持下層群眾武裝抗爭，以至完全否認上層統戰的必要性；(三)不了解革命的不平衡性，忽略北方與陝甘地區革命力量仍落後於敵對勢力，不合理地要求北方地區發動武裝抗爭，幻想一下子就要獲得全國勝利。³

當代西方學者承襲了這樣的說法，但也做了細部的修正。如前述的 Kathleen Hartford 與 Patricia Stranahan 等人就辯稱，正因為左傾路線導致各省省級領導的破壞，反而予下層黨部更大的空間，不必再執著於階級鬥爭，而是訴諸國家內卷化所造成的某些超階級、反國家的訴求，以及日益升高的民族主義浪潮，並借用某些既存的社會關係與網絡，重建中共地方黨的基礎。像 Mark Selden 等人關於冀中五公村的研究顯示，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就有一些知識份子回鄉活動，他們採取上述因地制宜的策略，為抗戰時期冀中根據地的建立鋪平了道路，使中共得以在這裡成功地推動一場超階級的寧靜革命，最終獲得勝利。Linda Grove 則從相反的角度去證明革命超階級化與地方化的重要性。她以為冀中高陽的紡織工業就是在既存的超階級地方網絡上發展起來的，政府的力量只是其次。這種超階級的地方關係也在農民間形成某種不以階級為界線的「偽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3 〈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1942/11/17-18)，臺灣法務部調查局：294.902/421/5594。

如同鄉、親屬關係，她說這與農民的不滿並非來自階級壓迫，而是洋貨、洋布的傾銷有關。所以，共產黨反地主的階級鬥爭不能在冀中農村獲得共鳴，1932年高蠡暴動因此失敗。直到後來中共放棄階級鬥爭，訴諸抗日救國的口號，才獲得群眾支持。⁴

同樣的，在上層統一戰線方面，學者們以為直到1936年劉少奇來到平津領導北方局工作，放棄孤注一擲的下層統戰與暴力的群眾運動，訴諸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選擇與地方勢力進行合作後，中共才開拓新的局面。⁵在此之前的共產黨則因為完全拒絕上層統戰，以至自動放棄與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與福建人民政府等反政府勢力合作，結果中共與反叛者兩敗俱傷，反倒讓國民黨當局漁翁得利。這與Patricia Stranahan關於上海黨在戰前訴求超階級的民族抗日口號，尋求黨外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合作，才可以擴張勢力的說法，如出一轍。

我們不贊同這種看法。這些學者忽略了他們所高舉的某些地方的超階級性關係，雖然有助於小規模團體的結成，事實上卻撕裂了整個中國社會。此種分裂的性格也反映到黨內，如前章所述，順直省委事件的爆發就是肇因於這些早自李大釗時代就存在的黨內裂痕，後來瞿秋白、李立三欲由上而下地貫徹組織紀律，消弭這些裂痕，但適得其反。1931年，由於立三路線的失敗，以及國際派中央再試圖加強由上而下的控制，河北黨內的新仇舊恨再迸發出來，造成黨的再分裂。此即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

4 Linda Grove, *A Chinese Economic Revoluti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88-93.

5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1928-37年》（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7），頁293-330。

省委的破壞，使得原來便尾大不掉的下層黨更不服組織紀律。地方黨員或許不自覺地利用某些既存的地方網絡從事活動，但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打算在此基礎上發動革命，像高蠡暴動如果沒有外來幹部的催促，恐怕也不會發生。即使爆發，由於運動仍過份依賴個別黨員的領導，以及既存的地方網絡與特殊關係，使得暴動本身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它的短暫性。

河北黨素來是如此地依賴這些既存的政治社會網絡與關係去從事活動，所以即使中央堅持群眾路線與下層統戰，河北黨實際上卻一直持續上層統戰與拉攏菁英。本節將證明，北方黨始終沒有放棄上層統戰，但問題在於他們的上層統戰根本就缺乏黨的領導與下層基礎。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失敗，也不應歸咎於共產黨放棄了上層統戰，毋寧是相反的情形。

第一節 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

一、河北省委的分裂

1930年6月李立三發佈〈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後，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掀起一股反立三路線的浪潮，原因是李立三曾提出「第三條道路」的說法，主張：「說只有兩條路：不是同共產國際一起，就是反對共產國際，這個說法不對。還有第三條道路：爲了中國革命並同共產國際在一起。」⁶李立三還宣稱：「等我們拿下武漢，我們就可以同共產國際和兄弟的俄國黨談談，對他們說現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聯席會議記錄〉（1930/08/06），《國際檔案9》，頁267。

在是發動世界大戰的時候了，蘇聯紅軍應積極進行干預。」⁷ 甚至還公然挑戰共產國際的權威說：「要麼我們忠於共產國際的電報，對中國革命犯罪，要麼我們忠於中國革命……。」⁸ 無論如何，在共產國際看來，立三路線是不能再被容忍下去了。

1930年8月上旬，共產國際派瞿秋白與周恩來回中國取代李立三。9月24-28日，瞿秋白與周恩來召開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於上海，決議由向忠發擔任書記，實際主導權則在周恩來與瞿秋白手上。但共產國際不滿意六屆三中全會認為立三路線與共產國際路線一致的說法，⁹ 也不罷黜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因此致信批評中共中央（十月來信，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收到）。¹⁰ 中共中央接到此信後，立即作出決議，承認六屆三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間的矛盾是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¹¹ 並於12月23日對全黨發出第九十六號通告，自我批判。¹² 隨後，中共中央命李立三到莫斯科接受檢討，並於隔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重新改組領導班子，由王明擔任書記，並由與王明同樣是留莫歸國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派掌權。從此以後，中共黨史便進入了著名的王明路線，即國際派的領導時期。

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08/07），《國際檔案9》，頁276。

8 〈斯托利亞爾給洛左夫斯基的信〉（1930/08/05），《國際檔案9》，頁261。

9 〈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1930/09），《中央文件6》，頁282。

10 〈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11/16），《中央文件6》，頁644。

11 〈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1930/11/25），《中央文件6》，頁500。

12 〈中央緊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1930/12/23），《中央文件6》，頁546-547。

當時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遠東局¹³爲了打倒李立三，曾經暗地裡找共青團團員談話，要他們捍衛共產國際的路線，反對李立三的領導；¹⁴遠東局還煽動某些群眾團體黨團的領導黨員，這些人原來就反對李立三的暴動路線及將群眾團體併入行委的作法，¹⁵故與遠東局立場一致，其中最有名的反立三路線健將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系統的羅章龍、何孟雄。

許多對李立三早已懷恨在心或想乘此機會奪取領導權的地方黨員，也積極投入反立三路線的鬥爭，當時的河北黨內便有很多這樣的人。早在李立三派賀昌掌握順直省委以後，河北黨內便已出現與立三路線不同的聲音。此一不穩狀態最初是由北平黨開始。中共北平黨始終是以知識份子爲主，他們在工人群眾間的影響力相當薄弱。根據順直省委的說法，當時北平黨內還有陳獨秀的「取消派」陳慶餘等人，他們在1930年4月前後曾跑到唐山等地散播共產國際與中國黨無關、中國黨即將塌台、目前黨的一切工作皆是命令主義的謠言。¹⁶北平市

13 1927年國共分裂後至1929年春前，共產國際並未設置駐華代表，1929年3月始在上海設立遠東局，負責共產國際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與菲律賓等國之共產黨間的聯繫，1931年後停止職務。Alexander M Grigoriev, "The Far Eastern Bureau of the ECCI in China, 1929–1931," in Mechthild Leutner et al., ed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pp. 156–157.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聯席會議記錄〉(1930/08/06)，《國際檔案9》，頁265。當時共青團也確實有足夠的理由支持共產國際，蓋李立三取消團組織系統，將其併入所謂的「行委」系統，國際代表對此表示「堅決反對青年團支部與黨支部合併」，批評中共中央此一作法「是粗暴違反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機構原則」。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08)，《國際檔案9》，頁304。

15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與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談話記錄〉(1930/08/18)，《國際檔案9》，頁321–327。

16 〈順直省委津平唐太書聯席會議紀錄〉(1930/06/28)，《河北文件5》，頁505、514、523。

委另外的幾位重要幹部，如王青士、趙作霖和市委書記曹策等人，也很有問題。王青士是安徽霍邱人，曾參加1928年安徽阜陽暴動，後赴北平活動，順直省委批評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理由是其允許黨員去當黃色工會委員；至於北大學生出身的山西平順人趙作霖則是個與取消派陳慶餘有關係的政治動搖者。¹⁷ 曹策更是一個大麻煩，如前章所述，曹是共青團省委書記，賀昌以其在領導冀東地區暴動時犯了「錯誤」，加以撤換。曹因為賀昌未經團中央批准便撤他的團省委書記職，非常不滿，後來又在上海聽了袁炳輝（中央總行委主席團成員之一，亦是共青團的領導成員，1932年於共青團書記任內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的話，對於賀昌改組團省委一事愈加不滿，¹⁸ 他甚至向北平團市委說「新（團）省委成立後，對北平工作是沒有指示的，你們看他們是否來信」，¹⁹ 煽動下層黨團員起來反對省委。

六屆三中全會閉幕後，北方局書記賀昌回到北方，於10月10日在天津召開北方局擴大會議，傳達六屆三中全會的指示。在接到國際的十月來信後，賀昌也立即覆信中央，聲明接受反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決議，²⁰ 並於12月16日召開北方局常委會議，傳達中央新指示。隨後北方局取消，另成立河北省委，由阮嘯仙任書記，負責管理河北、山西、陝西、甘肅與河南北部的黨務工作。²¹

但賀昌限定十月來信只在少數幾個北方局上層領導間流傳的作

17 〈順直省委第十二次常委會議紀錄〉(1930/06/23)，《河北文件 5》，頁 490-491；〈順直省委平、津、唐三市聯席會議紀錄〉(1930/07/18)，《河北文件 6》，頁 66-67。

18 〈順直省委第十八次常委會議紀錄〉(1930/07/21)，《河北文件 6》，頁 123-124。

19 〈順直省委工作報告〉(1930/08/04)，《河北文件 6》，頁 191。

20 〈毅字給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12/20)，《河北文件 6》，頁 495-496。

21 〈河字通告第壹號〉(1930/12/21)，《河北文件 6》，頁 497。

法，²² 引起不滿。曹策便控訴賀昌在天津市委會上公開指示：「要很快地領導這一鬥爭，否則被別的同志領導去了！」有趣的是，當時曹策不知道從哪裡取得內幕消息，也知道十月來信的內容，乃致信中共中央批評北方局，認為北方局先是執行了立三路線，後又根據不正確的三中全會路線召開北方局擴大會議，接到十月來信後又秘而不宣，因此建議中央立即停止由北方局改組而成並阻礙反立三路線鬥爭的河北省委，另由反立三路線最堅決的黨團員組成新的河北省委，甚至建議由共產國際遠東局解散現在的中共中央，另外召集緊急會議，成立新的臨時中央，並在半年內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徹底解決一切問題。但曹策的建議，旋即為童長榮擔任書記的天津市委否決，曹因此批評童是立三路線份子。²³

童長榮雖然否決了曹策的建議，但也只是四票對三票險勝，顯見曹策等反對派有相當勢力。在 1931 年 1 月 2 日的天津市委會上，曹策與趙茨平、紀庭梓、蔣曉海等地方黨員合作，將市委會突然改為緊急會議，改組天津市委為天津臨時市委，由曹策擔任書記。²⁴ 曹等人召開天津緊急會議的行動，無巧不成書地預示了中共中央即將爆發的分裂。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於 1 月 7 日召開六屆四中全會，選出以王明為首的新中央領導。此一結果引起羅章龍等工運系統黨員不滿，這些人從一開始就反對四中全會的召開，因為四中全會是以原中央委員為主體的會議；而羅等人所號召的緊急會議，

22 〈童長榮關於河北反立三路線的鬥爭與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報告〉（1931/02/03），《河北文件 7》，頁 19。

23 〈曹策關於反立三路線問題致天津市委、河北省委、中央政治局的信〉（1931/01/12），《河北文件 7》，頁 3-6。

24 〈童長榮關於河北反立三路線的鬥爭與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報告〉（1931/02/03），《河北文件 7》，頁 19-27。

即使不是中央委員，只要共產國際批准邀請便可參與。²⁵ 羅章龍等人得不到回應，於是組織非常中央委員會，與四中全會中央對立。他們在四中全會後派張慕陶、韓連會（二者皆前順直省委書記）、袁乃祥等人到北方聯絡，成立了由曹策領導，包括蔣曉海（時任省委互濟會黨團領導）、²⁶ 吳化之（1930年初的北平市委書記，後任省委秘書長）、²⁷ 李延瑞（早期天津黨的領導）、李昌榮（李友才，時任河北省委秘書長）、葉善枝（冀東黨的重要領導）、張昆弟（設在北平之全國鐵總黨團書記）等人在內的緊急會議籌備處，至於張慕陶、韓連會則作為非常中央委員會的中央特派員，留在北方工作。²⁸

這些「籌備處」份子大多是過去河北黨的重要領導，他們在河北乃至於整個北方黨內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加上當時四中全會所成立的中共中央尚未樹立權威，黨員大多仍不清楚究竟誰才真正代表正確的國際路線，因此，不少河北黨員在籌備處成立後也站在籌備處的一邊反對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如阮嘯仙領導的河北省委便公然宣稱籌備處總的精神是正確的，組織籌備處也是必要的，²⁹ 結果阮所領導的河北省委因此消極怠工，將領導權讓給籌備處，省委委員還以個人身

25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第4版），頁158。

26 〈河北臨時省委報告〉（1931/03/04），《河北文件23》，頁105-106。

27 吳化之，又名吳化梓，湖北漢川人，是早期中共湖北黨的成員，與惲代英、林育南關係密切，曾在安源從事工人運動、赴莫斯科留學，還曾領導湖南秋收暴動，並擔任過江蘇、浙江省黨團書記、北平市委書記等職。1933年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日戰爭期間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中共建政後擔任軍委情報部、對外文化聯絡方面之工作。1990年病逝北京。

28 〈童長榮關於河北反立三路線的鬥爭與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報告〉（1931/02/03），《河北文件7》，頁33-35。

29 〈河北臨時省委告同志書〉（1931/02/08），《河北文件7》，頁56。

份參加籌備處工作。³⁰ 在北平，北平市委書記蕭鳴與黨員趙作霖、袁行莊（袁靜）、王定南（王作賓）、冀丕揚等人也投靠籌備處，這些人和仍忠於四中全會中央的劉錫五各自成立了北平市委。蕭鳴等人的市委後來雖然被判定為非法，蕭等人也被開除出黨，但他們在北平市黨員間的影響力還是很大。³¹ 其他如天津市委書記童長榮、唐山的王雅堂、保屬特委的郝清玉等人，全部投靠了籌備處。³²

為此，中共中央乃派遣陳原道、徐蘭芝、周啓敦等人組織中央代表團來天津工作。徐等人來到後，不僅吸收過去立三路線時期的順直省委領導賀昌、陳復，以及公開投降籌備處的阮嘯仙、余澤鴻等人，還試圖挽回曹策等籌備處的領導人。賀昌等人批評陳原道不以「組織手段」處置籌備處份子的辦法是「書生式」、緩不濟急的，也很不滿意陳原道只從上海調幹部來工作，不起用地方老幹部。³³ 但最後陳原道等人還是只開除張慕陶、韓連會、曹策、葉善枝等「右派領袖」的

30 〈最近一個月的河北情形〉（1931/03/14），《河北文件 7》，頁 127。

31 冀丕揚，〈我在北平的 10 年〉、〈顧卓新訪問記〉、〈王定南同志訪問記〉，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的足跡》，頁 240-241、248、256-258。冀丕揚是綏遠人，1928 年在北平求學時入團，1930 年轉黨，後來曾在中共華北特委工作；王定南是河南內鄉人，1928 年在北大讀書時入團，1930 年轉黨，後來主要作「特科」工作，曾在 1933 年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工作，並在 1945 年策動高樹勳部叛變。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頁 83-85。劉錫五是河南孟縣人，1904 年生，1925 年入黨，先後曾在上海、河南、東北等地工作，1931 年在河北被捕，1936 年出獄。抗戰與國共內戰時期在太行山與東北地區工作，中共建國後繼續留東北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等職，文革時被迫害至死。

32 〈徐蘭芝、陳原道關於舊河北省委的錯誤及今後措施致中央的信〉（1931/01/31）、〈童長榮關於河北反立三路線的鬥爭與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報告〉（1931/02/03），《河北文件 7》，頁 12-13、35-37。

33 〈河北臨時省委報告〉（1931/03/04），《河北文件 23》，頁 86、100-104。賀昌後來也因此被迫做自我批評。見：〈賀昌對自己執行立三路線及調和主義錯誤的聲明書〉（1931/04/04），《河北文件 7》，頁 170-171。

黨籍，吸收了李昌榮（李友才）、李延瑞等其他籌備處份子回到黨內，³⁴並於2月成立由隴海路工人出身之徐蘭芝擔任書記，但實際上是由屬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陳原道掌權的河北臨時省委（3月下旬改組為正式省委）。

然而，事實證明，籌備處份子的「回黨」並非真心誠意。他們雖然宣佈解散籌備處，但其宣佈解散的文件仍舊批評四中全會，並說河北省委是分裂黨的小組織。究其實際，這些回黨的籌備處份子仍是在政治上保留，以待他日重新恢復籌備處工作。³⁵既然如此，中共又為什麼要任用這些人呢？筆者以為，關鍵便在於中共河北黨一直缺乏組織基礎，太依賴個人的關係，以至黨員即使犯了嚴重的組織紀律，省委也不得不遷就。就像周恩來在1928年底處理順直省委事件、重新起用被批判的老黨員般，陳原道的河北省委也陷入同樣的困境。蓋這些籌備處份子在黨內的「關係」很好，他們掌握了省委大部分舊的交通線索，³⁶省委離開他們便無能為力。

二、河北省委的破壞與重建

河北省委冒險起用這些問題人物，終究付出慘痛的代價。原來，籌備處份子和已被開除黨籍的韓麟符、李希逸等人有往來。如前所述，韓、李在北方的上層社會關係很好，影響力頗大，中共雖然開除他們的黨籍，但事實上並未與「韓麟符集團」切斷關係，而且還利用

34 〈河北臨時省委關於籌備處反省委反中央問題的報告〉（1931/03/12），《河北文件7》，頁123-124。

35 〈河北臨時省委緊急通知第一號〉（1931/03/23）、〈河北臨時省委報告第二號〉（1931/03/25），《河北文件7》，頁150-152、156。

36 〈泰安關於解決天津北廠問題及北方黨的情形致中央的信〉（1931/02/23），《河北文件7》，頁82。

這些人的關係去推動上層統戰，如前述張慕陶領導順直省委時期的鄭澤生兵變計劃中，便有韓參加。後來，石友三部有一個「諮議」拿著廿餘萬元來天津替石友三買軍火，與共產黨接頭，中共順直省委打算藉此機會打入石部。³⁷ 這位「諮議」即韓麟符的同鄉、早期中共熱河黨的重要領導者杜真生。根據杜日後的告白，他在1930年1月從石友三處騙到廿五萬元，這批錢後來給韓麟符等人拿去從事活動，並沒有為石友三買軍火。³⁸ 韓等人雖與中共合作，但自成一派，有自己的組織。韓與李希逸、呂職人、翟少癡、張宗義、于蘭田、杜真生、鄭丕烈、盧東白、張澍等早期天津、冀東、熱河黨的成員，在天津辦了一個勢力不小的小組織（有人叫作第二省委），³⁹ 該組織與中共存在著既對抗又合作的關係。1931年初，張慕陶前來組織緊急會議籌備處時，便積極聯絡韓等人。後來中共開除張慕陶、韓連會、曹策、葉善枝等籌備處份子之黨籍的理由之一，便是他們仍與韓麟符等「取消派份子」公開勾結。⁴⁰ 1931年2月9日，韓麟符與楊新華在天津成婚，由於時任清水河縣公安局長的前共產黨員曲步霄（綏遠人，也是早期中共熱河黨的領導者之一）叛變，韓麟符、鄭丕烈、于蘭田等韓麟符集團之重要成員皆遭到逮捕，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⁴¹

當時國民黨當局還透過韓麟符集團的線索，逮捕了許多與該集團關係密切的籌備處成員。⁴² 其中如在冀東一帶頗有關係的葉善枝在被

37 〈順直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09/05)，《河北文件4》，頁19-20。

38 周昶陸、趙志明，〈韓麟符的一生〉，《韓麟符》，頁52-55。

39 王積衡，〈我所知道的韓麟符〉，《韓麟符》，頁101-102。

40 〈河北臨時省委關於反右傾及開除張金刃、韓連會、曹策、葉善枝等黨籍的決議〉(1931/02/18)，《河北文件7》，頁73。

41 周昶陸、趙志明，〈韓麟符的一生〉，《韓麟符》，頁60-62。

42 〈河北臨時省委關於籌備處反省委反中央問題的報告〉(1931/03/12)，《河北文件7》，頁124。

捕後立即叛變，導致了唐山黨的破壞。⁴³ 曾任省委秘書處發行科工作的徐樹榮也在被捕後叛變。⁴⁴ 由於秘書處掌握省委內部機密文件與黨員名單，故「老徐」的叛變引起河北省委極大的恐慌，被迫重新改組秘書處，還要求中共中央派特科人員來除掉老徐。⁴⁵ 只不過，省委既沒有除掉「老徐」，反而還導致天津市的大戒嚴，河北省委被迫遷移至北平。⁴⁶

1931年4月，河北省委遭到另一波大破壞。原因是前籌備處的回黨份子李延瑞等人在李的家中開秘密會議，當時國民黨當局已掌握消息，派人暗中監視。而被中共河北省委派去監視籌備處份子的省委招待處主任蒲振聲（蒲秋潮）也因此被國民黨當局跟蹤，致河北省委亦被掌握。4月8日，國民黨當局一舉逮捕籌備處份子張慕陶、吳化之、李延瑞夫婦與河北省委陳原道及其愛人省委秘書長劉亞雄、省委書記徐蘭芝和鐵總黨團書記周啓敦等多位要員，河北省委幾近於崩潰

43 〈河北臨時省委關於唐山黨被破壞情況致中央的信〉（1931/02/29），《河北文件7》，頁106。

44 〈泰安關於解決天津北廠問題及北方黨的情形致中央的信〉（1931/02/23），《河北文件7》，頁80。

45 〈河北臨時省委報告第二號〉（1931/03/25），《河北文件7》，頁154。

46 根據當時擔任河北省委秘書長安子文的回憶，1931年初張國燾來北方巡視時，決定要調安子文去中央擔任特科工作。但在赴中央前，安還必須組織一隻「打狗隊」，負責鏟除某些叛徒和內奸，俟任務完成後始赴中央。安說的叛徒和內奸，可能就是「老徐」諸人。安子文當時並未完成任務，他與省委交通科長周仲英在座落於天津法租界的前北方局機關「墾業公司」內遭到逮捕，因此導致天津黨的破壞。又，安子文原名安志翰，曾化名徐子文，陝西綏德人，1925年在北京入黨，北伐時期在吉鴻昌部工作，曾任河南省委、中共中央與順直省委的交通工作；周仲英則是湖北襄陽人，曾參加鄂北武裝暴動，後任北平市委軍委和中共中央交通等工作。見：安子文，〈我的一段經歷〉，《革命史資料》，輯1（北京，1980），頁3-5；吳林泉、彭飛，〈草嵐春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4-15。

瓦解。後來阮嘯仙、廖劃平、劉錫五三個倖免於難的省委委員雖然於4月10日在北平重建河北省委，但回黨的籌備處份子李昌榮復聯絡過去樂亭黨的領導人並曾領導1928年「京東護黨請願團」的李運昌（剛從滿洲工作回來）等人，打算另推天津市委書記張友清擔任省委書記，推翻阮嘯仙的河北省委，致使河北黨再度陷入分裂的危機。⁴⁷

爲此，中共中央派殷鑒等人赴北平指導河北黨的工作。殷鑒也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他在抵達北方後，於1931年5月成立由他擔任書記的河北省委。但旋即河北省委又因爲省委秘書長郭亞先（郭兆祥、河北良鄉人）被捕叛變，遭到大破壞。省委書記殷鑒、軍委書記廖劃平（被捕後亦叛變）、唐山市委書記胡錫奎，以及李楚離、劉瀾濤、孔祥禎、張友清、劉尊棋等北方黨的重要幹部皆遭到逮捕，⁴⁸省委剩下阮嘯仙等幾位幹部，他們雖然在5月下旬再度恢復河北臨時省委，但這些人既不名一錢，還要面對滿街的叛徒，工作實在是進行不下去了。⁴⁹

當時中共中央亦派人前來營救被捕的北方幹部。陳原道、劉亞雄被捕後，劉亞雄的父親劉少白爲營救女兒及女婿，到處奔走，中共中央也派了胡鄂公、楊獻珍前來協助劉少白的營救工作。但胡鄂公本人既沒辦法，⁵⁰楊獻珍也因爲河北省委互濟會黨團書記賴德的被捕叛變

47 〈河北臨時常委關於省委被破壞情況致中央的信〉（1931/04/21）、〈河北臨時省委關於省委被破壞經過及目前各地情形給中央的報告〉（1931/05/01），《河北文件7》，頁191-202。

48 吳林泉、彭飛，《草嵐春秋》，頁20-22。

49 〈河北省委石恪關於六二六事變致中央的信〉（1931/07/09），《河北文件23》，頁115-117。石恪是阮嘯仙的化名。

50 〈河北省委石恪關於六二六事變致中央的信〉（1931/07/09），《河北文件23》，頁117。

而遭到逮捕，營救工作事實上未能完成。⁵¹

無論如何，河北黨在遭受一連串的破壞後，過去那些在北方甚有工作經驗並具有廣泛關係的舊幹部或是被捕入獄，或是叛變脫黨，只有極少數人如阮嘯仙般逃離北方。⁵² 他們的職位由一些與北方地區無甚關係，且缺乏工作經驗的新幹部接任（當時河北省委為遏止叛變與破壞的風潮，提出反對留戀舊幹部的守舊主義）。⁵³ 這些新幹部不少是由中央自外地調來者，部分則是從河北下層提拔起來者，其中很多人都是下層工農群眾出身的黨員。如在五月破壞後接替省委書記職務的馬輝之（原名馬星榮）便是湖南長沙出身的貧苦工人，馬在1926年入黨，1927年後赴蘇聯學習，1930年秋回國後曾在上海工作一段時期，隨後因滿洲省委書記陳潭秋在哈爾濱被捕，滿洲黨遭到破壞，馬被中央派赴滿洲從事工運工作。隔年3月，馬被調回上海，全總負責人羅登賢告訴馬，中央要派他去北平，接替籌備處份子張昆弟，擔任全國鐵路總工會黨團書記（鐵總設在北平）。據說，當時「全總有一負責同志」（應該就是羅登賢）還跟馬輝之說，中共中央要他回北平，附帶送他一個老婆（指陳潭秋的愛人徐全直，馬在滿洲工作時就是住在陳潭秋的住處），所以馬領導時期的河北省委一直催中央趕快調徐全直來。⁵⁴ 只不過，後來老婆沒有討到，馬也在11月時因為叛徒胡敬民的告密而與北平市委書記平杰三一同遭到逮捕，致使河北省

51 楊獻珍，〈入草嵐子監獄前後〉，《革命史資料》，輯1，頁6-14；吳林泉、彭飛，〈草嵐春秋〉，頁33-40。

52 〈栾芳關於北平的報告〉（1931/08/31），《河北文件7》，頁238。

53 〈河北省委關於開除廖劃平等十六個叛徒的決議〉（1931/10/12），《河北文件7》，頁276。

54 〈栾芳關於北平的報告〉（1931/08/31），《河北文件7》，頁239-240。

委再次遭到破壞。⁵⁵

隨後，趙聲（趙琛）、曾健（曾健人）、李竹聲（李致竹）等人再度恢復河北省委，並由趙聲擔任書記。這個趙聲是何許人也，由於資料侷限，我們並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在11月初才由全總派來北方做工運，⁵⁶由此推測，趙亦是工人出身者。曾健也是工人黨員，1925年在江西萍鄉加入青年團，隨後便待在萍鄉從事工運與紅軍工作，曾任萍鄉縣委書記與工農革命軍直轄第二團團長，1928年後赴上海工作，1931年被派赴河北工作，是後來河北省委的軍委書記。⁵⁷至於李竹聲則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四中全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長。李待在河北的時間不長，他隔年便回到上海工作，並於1934年與同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袁家鏞等人被捕叛變，為國民黨中統工作。

綜上所述，1931年河北省委一連串的破壞，雖說是由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所致，也與過去自李大釗時代遺留下的黨內裂痕，以及立三路線、王明國際派上台所促成的派系衝突，不無關係。在過程中，韓麟符、張慕陶等早已為黨所開除或懲處的份子，竟然在其中發揮相當大的影響，以至中共中央也不敢對他們輕舉妄動，這就再次證明了，黨外的私人關係網絡超越了黨的組織紀律，黨已為其所處的社會吞噬。就這一點來說，國民政府當局逮捕韓麟符等老幹部，反而無意間幫助了中共拋棄過去的歷史包袱，共黨也狠下心來公告開除了許多河北黨老幹部。但是，北方黨本身的孱弱及其在社會中的孤立，逼

55 馬輝之，〈白區工作局部情況的回憶〉，《河北黨史資料》，輯1（石家莊，1985），頁121-130。

56 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共中央北方局 綜合卷》，頁153。

57 〈河北省委致中央的信〉（1932/03/03），《河北文件8》，頁154。

得中共後來不得不重新召回某些老幹部，包括表 3-1 裡被公告開除的李希逸、李渤海等人，他們在日後的察哈爾事變或西安事變裡，也起了一定作用。下文將提到負責推動北方地區的上層統戰，且直屬中央特科所轄的華北特委，也是由與中共若即若離的張慕陶等人組成，這一點我們將留待本章第三節再述。在下一節，我們暫時把視線轉移到下層，看看到底當時河北下層有沒有像 Kathleen Hartford 等人所設想般，由於上層領導的破壞，更靈活地採取貼近地方的政策，建立革命基礎。

表 3-1 1932 年中共中央公告開除的河北黨「叛徒」

| 姓名 | 經歷 | 姓名 | 經歷 |
|--------------|---------------------|-----|---------------------------|
| 張開運 | 中共黨內經歷不詳。 | 韓連會 | 順直省委書記、曾參加籌備處。1931 年叛變。 |
| 徐蘭芝 | 河北省委書記。1931 年叛變。 | 嚴靜平 | 天津法商學院學生。 |
| 楊繼錄 | 順直省委委員。1928 年叛變。 | 張樹堂 | 平綏路工人出身。1930 年叛變。 |
| 廖劃平 | 河北省委委員與軍委。1931 年叛變。 | 潘問友 | 中央黨報編輯與河北省委宣傳部長。1931 年叛變。 |
| 賴 德 | 河北互濟會書記。1931 年叛變。 | 李德威 | 河北青年團書記。1931 年叛變。 |
| 郭亞先 (郭兆祥) | 河北省委秘書長。1931 年叛變。 | 李國瑜 | 河北青年團秘書。1931 年叛變。 |
| 楊培芝 | 河北省委油印。1931 年叛變。 | 周啓瑜 | 楊培芝妻。1931 年叛變。 |
| 郭靜民 | 河北互濟會秘書長。1931 年叛變。 | 張子英 | 河北互濟會。1931 年叛變。 |

| | | | |
|--------------|--|-----|---|
| 楊吉安 | 北平市委組織部長。1931年叛變。 | 康 遜 | 左聯、北大學生。1931年叛變。 |
| 俞振邦 | 中國大學學生。1931年叛變。 | 郭棟鳴 | 河北互濟會秘書長。1931年叛變。 |
| 張 賓 | 河北省委秘書處。1931年叛變。 | 史名溢 | 法大學生。1927年叛變。 |
| 李天民 | 1927年叛變。 | 李渤海 | 1927年叛變。 |
| 李 仁 | 河北省委交通。1930年叛變。 | 鞠少清 | 河北省委交通。1931年叛變。 |
| 王 興 | 河北省委軍委。1931年叛變。 | 徐樹文 | 北方局外交主任。1931年叛變。 |
| 葉善枝 | 河北省委農運工作。1928年即開始告密，1930年才被發現，亦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押。 | 李希逸 | 河北省委宣傳。1928年即與內蒙古「取消派」勾結，1931年才被發現，亦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押。 |
| 杜振聲 (杜真生) | 與李希逸同。 | 鄭丕烈 | 與李希逸同。 |
| 曹 策 | 河北青年團書記、曾參加籌備處。1931年叛變。 | 劉學信 | 河北互濟會秘書。1931年叛變。 |
| 李藜春 | 1931年叛變。 | 劉清連 | 湖北省委工作。1929年叛變。 |
| 劉子厚 | 劉清連之子、河北青年團工作。 | 閻懷聘 | 正定第二省委領導、天津市區委書記。1929年叛變。 |
| 李 澤 | 天津市區委書記。1929年叛變。 | 陳滌雲 | 天津交通。1929年叛變。 |
| 劉清瑞 | 天津區委工作。1930年叛變。 | | |

資料來源：中央組織局，〈臨時通知（不列號）〉，《黨的建設》，期9（1932年4月20日），臺灣法務部調查局：052.1/804/16093 n.9。

第二節 北方蘇維埃運動的理論及其實際

一、城市中的抗日運動與工人抗爭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30分，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作戰課課長石原莞爾，指使南滿鐵路守衛隊，炸毀瀋陽城外柳條湖之南滿鐵路，指控中國人所為，不待通知日本總領事館，即發兵五百人進攻瀋陽城的北大營，此即「九一八」事變。當時在北平就醫的東北邊防司令張學良，在國民政府中央的指示下，採取不抵抗政策。因此，日本在隨後的三、四個月，輕而易舉地攻佔吉林、黑龍江兩省，並於1932年1月2日攻陷錦州（錦州事變）。東北地區，除熱河省以外，咸為關東軍所支配。⁵⁸

日軍侵略東北的事件，激起中國內部廣泛的抗日運動浪潮，同時也成為各政治黨派乘機擴張自身勢力的口實。如當時北平托派彭述之等人所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北方區」便提出「對日宣戰」、「抵制日貨」、「對日經濟絕交」等口號，在群眾中起了相當作用，甚至許多共產黨員也受到他們的影響。⁵⁹至於共產黨在爭取抗日運動的領導權上同樣也不落人後，只不過他們提出的口號和他人不太相同罷了！根據當時河北省委所言，日本強佔滿洲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的序幕；作為帝國主義走狗的國民黨理所當然地採取了出賣民族利益的不抵抗主義，其中張學良更是一個無恥的賣國賊。因此之故，「為了求得民族解放戰爭之實行與勝利，必須首先打倒反革命的

58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251-252。

59 〈河北省委關於省委組織、各地工作、取消派活動等給中央的報告〉（1931/11/23），《河北文件23》，頁124。

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國民黨政府，建立蘇維埃形式下的工農民主專政在全國的統治」。黨員必須加緊群眾工作，號召廣大群眾起來，為實現此一目的而奮鬥。⁶⁰ 此即所謂「民族革命戰爭」路線。⁶¹

在當時中國各大城市中，確實爆發了普遍的抗日運動。然而，姑且不論這些參與者（主要是知識份子）的動機為何（如天津反帝大同盟的參與者多半是依賴個人感情的關係拉來者，故流動性甚高），⁶² 我們可以發現，作為抗日運動主體之知識份子最初常常是採取向政府當局和平請願的方式進行活動，他們既沒有跑到群眾間去從事抗日動員，也沒有像共產黨所設想般，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與建立蘇維埃專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共產黨員還是這些合法、和平抗日運動的領導者。

爆發於 1931 年 11-12 月間，著名的北京大學南下抗日救國示威團事件，即是一例。如前所述，中共北平黨始終是以知識份子為基礎，這些知識份子固然熱情有餘，但又常常桀驁不馴，不服從黨的領導，甚至導致內部分裂，如前述籌備處事件最初正是以北平黨為中心爆發開來的。後來，河北省委雖然重建於北平，但由於省委的持續被破壞，北平黨務仍不見起色，始終仍陷於「一種派別鬥爭和個人攻擊」的混亂狀態中。⁶³ 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有一些北大學子受到抗日風潮的影響，於 1931 年 11 月 31 日組織抗日救國示威團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政府團結抗日。當時示威團裡有一位劉德承（即顧卓新），遼寧省義縣人，他在 1930 年入北大讀書，並參加共產黨。1931 年初

60 〈河北省委宣傳大綱〉(1932/01/04)，《河北文件 8》，頁 1-18。

61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1932/01/01)，《中央文件 8》，頁 1-13。

62 〈巡視天津反帝組織工作的報告〉(1932/08/22)，《河北文件 9》，頁 200。

63 〈河北省委對平市工作的決議〉(1931/12/15)，《河北文件 7》，頁 339。

籌備處事件爆發時，劉是屬於籌備處份子蕭鳴、趙作霖所組成之北平市委的成員，與忠於四中全會之劉錫五的北平市委對立。在籌備處被判定為反黨的小團體後，劉向中央承認了錯誤，回到黨內，並在1932年後擔任北大黨支部書記、北平代理市委書記等職。⁶⁴

劉德承雖然回到黨內，但他反對中共中央所謂國民黨與蘇維埃兩個政權對立的理論，主張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放在第一位。在南下示威團發起時，他無意遵從黨的指示發起反國民黨的示威運動，打算把活動侷限在「到街道上走一走」而已。當時河北省委倒也不是完全反對和平請願，但認為應在請願過程中不斷宣傳教育群眾，要他們了解請願的不足，自動走上反對統治階級的鬥爭道路。後來示威團雖然因為請願未遂與南京當局發生流血衝突，但完全是擦槍走火的事件，不是預先的計劃。河北省委因此對劉德承很不滿意，說他右傾；劉也不服氣地反譏省委「混亂到現在還未建立起一個領導機關」。⁶⁵ 省委派了一個交通去找他，劉則反唇相譏說：「省委忙，派個狗來都成！」⁶⁶ 後來省委乾脆把劉德承開除出黨，以警儆尤。⁶⁷

北京大學南下抗日救國示威團事件雖然證明了大多數學者的看法，即當時中共中央提出的「左」傾口號並不適於實際的抗日需求，但是，地方黨員在領導活動時實際上也沒提出這種口號，所以把當時

64 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頁85；〈顧卓新同志訪問記〉，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的足跡——北大地下黨有關史料選編》，頁248。劉德承後來曾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經工作，內戰時期任遼北省委副書記、嫩江省委書記等要職。

65 〈河北省委關於劉同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1932/02/27），《河北文件8》，頁132-137、146。

66 〈河北省委對劉同志第二次決議〉（1932/03/21），《河北文件8》，頁257。

67 〈河北省委開除劉德承黨籍的通知〉（1932/05/02），《河北文件8》，頁373。

共黨未能掌握抗日運動的領導歸咎於中央左傾路線，實有待商榷。再者，這些抗日運動並不全然採取與國民黨當局敵對的態度，所以因為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而把所有的抗日運動都視為反國民黨的運動也是有問題的。更複雜的是，如前述的一九二〇年代末期的群眾運動，以及下面將提到的天津工人運動所示，群眾不是只有抗日或不抗日、反國民黨或反共等非此即彼的二元選項，他們也可能選擇與其他政治黨派結合。

根據中共的理論，由於日本的入侵、世界經濟恐慌，以及一連串國內的天災人禍，一九三〇年代以來之中國國民經濟呈現每況愈下的趨勢。此一「國民經濟總崩潰」的現象，與滿洲的淪陷一樣，全都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的責任。所以，要挽救此一局勢，就必須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蘇維埃專政，還要擁護蘇聯，打倒帝國主義。而且，鑒於全國抗日運動和群眾經濟鬥爭的高漲，共產黨又開始設想以南方蘇區的紅軍為主力，「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在此一過程中，如河北黨般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黨」，必須開展一切群眾的鬥爭（尤其是工人群眾的鬥爭），領導任何部分的、日常的經濟鬥爭及反帝鬥爭，走向總的向國民黨統治進攻的道路上去，以響應、配合紅軍的行動，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⁶⁸

當時中共河北省委也接受了此一看法。例如，鑒於世界經濟不景氣和日軍入侵所造成的城市工人失業浪潮，⁶⁹ 河北省委便要求黨員積極投入失業工人的經濟鬥爭，並進一步將其發展為反帝、反國民黨統

68 〈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1932/01/09），《中央文件 8》，頁 34-48。

69 Gail Hershatl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p. 224.

治的政治鬥爭。⁷⁰ 然而，實際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以天津的紗廠失業工人鬥爭為例。1932年初，裕大紗廠工人由於廠方停工而失業，其中有二百多人結成「糾察隊」到市政府要飯吃，當時天津市委以為「這次鬥爭很明顯地表現出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反黃色工會的政治意義」。⁷¹ 然而，事實上，該鬥爭最初是國民黨市黨部以每人3毛錢的代價，收買裕大失業工人，借口反對比（利時）商電車加價所發動的救濟失業工人鬥爭。共產黨是後來才參加進去，鼓動工人向市黨部和市政府提出發玉蜀麵、不交房租、不遷工房、舊工人一律復工的四項條件。⁷² 至於國民黨市黨部所以發動該鬥爭，主要是由於劉不同領導的市黨部與市政府由於電車加價分贓不均，前者因此煽動工人起來組織糾察隊保衛市黨部並阻止電車通行。⁷³ 無論如何，裕大失業工人鬥爭原本便不是為了反對國民黨政權所爆發者。而當時共黨天津市黨部內關於此一鬥爭究竟要局限在失業工人的經濟鬥爭或進一步發展成擁護紅軍和蘇維埃的政治鬥爭上，發生嚴重的爭論。其中巡視員黎日暉（經歷不詳）堅持一定要加上擁護紅軍和蘇維埃的口號，天津市委書記馮溫（即前章所提及之直南特委書記）則以為工人不明瞭紅軍和蘇維埃，故仍主張組織失業團，向國民黨社會局要飯吃，等到國民黨辦不到時，再領導工人向國民黨鬥爭。但後來支持工人的劉不同下台，工人因此以為向國民黨要求救濟是無望了，加上該失業團領袖被劉不同（代表蔣介石派）的政敵改組派收買，致使失業團最後被迫解散，

70 〈河北省委關於失業工人運動日（二月二十五日）決議〉（1932/02/18），《河北文件8》，頁104-111。

71 北心，〈天津市委報告（通訊第二號）〉（1932/01/04），《河北文件19》，頁109-110。

72 〈天津市委通訊第五號〉（1932/02/26），《河北文件19》，頁146。

73 〈天津日暉十二月二十日報告〉（1931/12/20），《河北文件19》，頁86-87。

改編成爲國民黨的便衣隊，鬥爭因此宣告失敗。⁷⁴

天津紗廠失業工人鬥爭的例子告訴我們，即使共產黨關於「國民經濟總崩潰」的說法是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人必然會自發地起來爲爭取自身的利益而鬥爭。實際的情形是，當時天津工人間存在著各種政治關係，正如馮溫的描述般，在工人中「汪精衛、胡漢民派及其他一切派別（取消派等），是很複雜的」。⁷⁵這也就是說，事實上甚少存在著純粹自發性的群眾運動。當然，這並不是說群眾全然是各政治黨派爭權奪利的工具，那些與劉不同結合的紗廠失業工人當然有屬於自己的期望，但他們並不是依賴自己的力量去爭取自身的利益，而是期望藉由上層的政治力量來滿足他們的需求。由於政府當局並非總是能夠滿足群眾的需求，加上共產黨煽動的緣故，其中難免有部分經濟鬥爭會發展成爲政治鬥爭。然而，此一轉變的契機往往難以掌握，究竟在什麼情況和時機下鬥爭應由「自發性」的經濟鬥爭轉變成政治鬥爭，沒有一定的規則可言。如此一來，參與領導這些鬥爭的共產黨員便很難不會犯了左的或右的錯誤。⁷⁶

74 〈天津市委日暉同志二月八日報告〉(1932/02/08)、〈津市日暉同志二月十一日報告〉(1932/02/11)、〈天津市委關於工會問題的報告〉(1932/03/13)，《河北文件 19》，頁 121-125、137、161。

75 〈天津市委和□關於工會問題的報告〉(1932/03/26)，《河北文件 19》，頁 168。

76 如當時河北省委便批評黎日暉低估經濟鬥爭，批評他關於工人要飯吃的經濟鬥爭口號代表落後工人意識的看法是錯誤的；但同時省委又說僅僅提出援助失業工人的口號是不夠的，應該要更進一步發展成反日本帝國主義及國民黨的鬥爭，此一批評很明顯是針對馮溫而發。中共中央也批評此一運動只束縛在經濟的範圍裡，不努力提高罷工的政治化。〈河北省委對天津工作的指示信〉(1932/03/17)，《河北文件 8》，頁 235-239；〈關於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1932/06/25)，《中央文件 8》，頁 369。

當然，馮溫的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確實，當時很多工人並不認識什麼蘇維埃或紅軍，如果一定要像黎日暉所主張般，非得要同情紅軍、蘇維埃或赤色全國總工

二、北方蘇維埃運動路線與冀南磁縣暴動

不過，即使當時國民黨統治下之城市知識份子抗日運動及工人經濟抗爭皆未如共產黨所預期般，發展成反國民黨與帝國主義的政治抗爭，當時北方各地區仍是傳出幾件令共產黨振奮的消息。例如，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各地興起組織抗日義勇軍的浪潮。這些義勇軍固然絕大多數是由舊東北軍將領、國民黨地方官吏、地主豪紳，以及「胡匪」首領等所謂「階級異己份子」所組織與領導者，但其中也有部分隊伍與共產黨有聯繫。再者，在陝西、甘肅邊界，由劉志丹、謝子長所領導的陝北地方武裝也在九一八事變前後和來自晉西地區由閻紅彥等人領導的晉西游擊隊結合，於1932年2月成立了由謝子長任總指揮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並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改組為紅二十六軍，負起開創陝甘邊蘇區的任務，⁷⁷ 儘管這支隊伍實際上更像是土匪、軍閥，而不是什麼紅軍。

無論如何，在這些消息的鼓舞下，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

會的人才能加入赤色工會，那麼赤色工會就被大大限制了。因此，馮溫等人以為，只要在鬥爭中積極，堅決反對國民黨及其工會，了解各反動派別都是騙人的工人就可以使之加入赤色工會。在此一問題上，中共中央與河北省委皆站在馮溫的一方批評黎日暉。如中共中央便認為黎的作法是拒絕群眾的左傾關門主義。河北省委亦指出，只要是那些不滿意黃色工會和國民黨的工人就應當吸收加入赤色工會，或者以兄弟團、姐妹團等名義予以結合，在黃色工會中從事反對派的活動，這也就是所謂的「下層統一戰線」。〈天津市委日暉同志二月八日報告〉（1932/02/08）、〈天津市委關於工會問題的報告〉（1932/03/13），《河北文件 19》，頁 126、160；〈關於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1932/06/25），《中央文件 8》，頁 378；〈河北省委對天津工作的指示信〉（1932/03/17），《河北文件 8》，頁 240-242。

77 〈中央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1932/04/20），《中央文件 8》，頁 202-208。

治局(1931年9月成立)於1932年6月24-26日，召集河北、滿洲、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北方各省的代表，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北方會議)，指出目前北方革命運動的發展，已「向黨迫切地提出了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的任務」。⁷⁸ 北方黨一方面要持續投入北方工人日常經濟鬥爭，並發展成爲反國民黨與帝國主義，及擁護蘇維埃政權、紅軍與蘇聯的政治鬥爭；⁷⁹ 同時，北方黨也被要求注意開展農村鬥爭，特別是集中在「創造鞏固與發展陝甘邊新的蘇區」和「開展義勇軍運動與樹立黨的領導」上，至於其他北方農村地區的黨也要「開展農民日常鬥爭，發動與擴大游擊運動」，以進一步建立新的北方蘇區。⁸⁰

爲了建立北方蘇區，河北黨也被指示繼續推動城市工人運動和反帝鬥爭，並注意開展東北義勇軍運動和農村地區的鬥爭，其中農村鬥爭則被要求集中注意在「接近蘇區的直南」、接近東北地區的冀東北寧路一帶，和其他鐵路周圍地區或已有激烈之農民鬥爭發展的地區。⁸¹ 河北省委也立即接受了此一新路線，⁸² 致力於繼續推動平、津、唐三大城市的工人運動（但實際上無甚成績），以及冀中、冀南等農村地區的抗爭，與北方地區的軍事運動。以下首先就讓我們從冀南地區的農村抗爭談起。

78 〈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1932/06/24)，《中央文件 8》，頁 356。

79 〈關於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1932/06/25)，《中央文件 8》，頁 363-385。

80 〈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1932/06/26)，《中央文件 8》，頁 391-394。

81 〈中央關於貫徹北方各省代表會議精神給河北省委信〉(1932/07/22)，《中央文件 8》，頁 316-334。

82 〈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的決議〉(1932/07/25)，《河北文件 9》，頁 73-95。

如前所述，立三路線時期，中共順直省委派巡視員馮溫赴冀南地區，與林喻屏於1930年6月在磁縣組織了以馮溫為書記的直南特委。11月，直南特委改組為直魯豫邊區特委，駐在河南彰德，由廖劃平擔任書記，管轄冀南、魯西、豫北一帶的黨務。隔年2月，直魯豫邊特復稱直南特委，管轄地區不變，並由馮溫擔任特委書記。⁸³立三路線倒台後，冀南黨內也掀起一陣騷亂。如張兆豐之子張錫珩因其父在立三路線時期犧牲，相當痛恨立三路線，他在巡視冀南時便提出要為過去在立三路線時期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黨員平反，但被拒絕。⁸⁴隨後，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爆發，省委調廖劃平與馮溫到省委工作（廖劃平擔任軍委書記，馮溫任天津市委書記），並派阮嘯仙去冀南巡視工作。⁸⁵阮召開會議向冀南黨員宣達反立三路線的指示，時任特委組織、宣傳工作的冀南老黨員劉大風起來為立三路線時期被開除出黨的大名七師教員晁哲甫等人平反，但同樣遭到拒絕，劉大風因此工作消極，並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帽子。⁸⁶不過，整體說來，冀南黨並未因為籌備處事件而分崩離析。1931年5月，省委委派磁縣天門會出身的王子清，取代立三路線時期便在冀南地區作軍事工作、並且時常抱怨「直南生活太苦了，沒決心在直南工作」⁸⁷

83 《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頁147-148。

84 安明，〈一九二五至三四年中共直南黨的活動大事記〉，《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1（上），頁105；〈直南特委關於前一階段工作和特委內部工作人員情形向省委的報告〉（1931/12/25），《河北文件19》，頁104-105。

85 〈河北臨時省委報告〉（1931/03/04），《河北文件23》，頁97。

86 安明，〈一九二五至三四年中共直南黨的活動大事記〉，《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1（上），頁105-106。

87 〈直南特委關於前一階段工作和特委內部工作人員情形向省委的報告〉（1931/12/25），《河北文件19》，頁101。

的李九思(李劍森)任直南特委書記，冀南地區的工作逐漸步入正軌。

當時河北省委主要的關懷在平漢路沿線一帶，特別是駐在該地的石友三部。石友三是一位以反覆無常著名的軍閥。他原本是馮玉祥的屬下，1926年國民軍在南口之役失利後一度投靠閻錫山，後來雖然又跟隨馮玉祥進軍河南，但在1929年馮部反蔣時又偕韓復榘一同叛馮投靠蔣介石，致使馮玉祥不戰而敗，被迫下野，石友三本人也因此被任命為安徽省主席。同年12月，石部復在浦口發動叛變，投靠唐生智部，但旋不久又因唐生智失敗而歸誠中央，被任命為河南清鄉總指揮，受韓復榘節制。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後，石復叛變投靠閻、馮一方，負責由河南進攻魯西、皖北。隨後，石見晉軍在山東作戰不利，又與中央私通，退往黃河北岸。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命張學良負責處理華北軍事善後事宜，所有晉軍、西北軍等軍隊，悉歸張學良節制整編，石友三的十三路軍亦屬其中。⁸⁸

但石友三本性難移，駐紮在冀南平漢路沿線地區時，經常截留列車貨運以充軍餉，還被盛傳與汪精衛、陳濟棠的廣州國民政府聯絡。或許正是此一緣故，當時國民政府有意調石部南下參與圍剿共黨蘇區，故石部調動的傳聞在當地甚囂塵上，該部士兵到處派款、派草、拉牲口、要新兵，鬧得相當厲害。中共河北省委對於石部的工作相當重視，當時被派赴冀南工作的高克林便是負責該部工作。高是陝西華縣人，1925年入黨，北伐時期在馮玉祥部工作，曾任西安中山軍事政治學校黨支部書記。國共分裂後曾參加渭華暴動，後調到順直擔任軍委工作。高本人雖然積極肯做，能夠吃苦，但帶有濃厚之「機械組

88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226-232；鄧哲熙，〈韓、石叛馮和閻、馮聯合反蔣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輯1（北京，1960），頁34-39。

織論」傾向，個性很強，相當頑固，不能接受批評。⁸⁹ 只不過石友三的工作實際上沒有發動起來，高後來調任大名縣委書記，是抗戰前冀南黨主要的領導者之一。至於石友三也於 1931 年 7 月在華北日本特務機關的支持下，公然通電討伐張學良，⁹⁰ 遭張學良派兵圍剿，石友三兵敗，逃往山東韓復榘處尋求庇護，他所領導的十三路軍建制至此解體。⁹¹

除了石友三部外，河北省委還相當重視位於鐵路周圍之磁縣煤礦、陶瓷工人和車夫的工作。事實上，磁縣本身並不是大城，它所以在 1930 年後逐漸成為中共冀南黨的中心，主要是因為該縣乃峰峰、西佐、台子寨（今磁縣觀台鎮，與河南安陽所屬之六河溝煤礦隔漳水相望，同屬英國福公司，「六河溝煤礦」即包括此地）等煤礦的所在地。同樣位於磁西地區的彭城不僅是煤礦的出產地，還是陶瓷的生產中心。因為彭城等地皆位於西部山區，煤礦和陶瓷都是由車夫運送至光祿與碼頭鎮後再轉運出去，⁹² 故該地也有許多車夫。這些礦工、瓷工和車夫，理所當然是以無產階級先鋒隊自我標榜的共產黨重視的工作對象。

然而，這些工人似乎並不如共產黨所設想般，帶有現代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政治覺悟，如 1932 年 2、3 月間爆發的六河溝礦工罷工，便不是當事人馬載、紀德貴等人回憶裡指稱，由共產黨領導的萬人大

89 〈直南特委關於前一階段工作和特委內部工作人員情形向省委的報告〉（1931/12/25）、〈直南特委報告〉（1933/01/31），《河北文件 19》，頁 103、404。

90 西村成雄著，曾淑卿譯，《張學良「滿洲」與日中之霸權》（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 64。

91 于學忠，〈東北軍討伐石友三的戰爭〉，《文史資料選輯》，輯 6（北京，1960），頁 107-111。

92 〈直南行委報告第二號〉（1930/09/06），《河北文件 19》，頁 61-62。

罷工。⁹³ 實際上該地礦工不過四千五百人，黃色工會就支配約一千人，其他大多數工人則無組織，共產黨也只是發展了兩個不過二百五十人的「朋友社」，發展四個新黨員，恢復三個舊黨員，當地共黨竟因此沾沾自喜，「簡直是笑話」！⁹⁴ 至於六河溝黨的三位領導馬載（馬存漢，安陽縣委書記）、胡金山（五卅時期即已入黨但「老沒進步」）、⁹⁵ 紀德貴三人，一個是沒計劃而整天忙個不停的知識份子（當指馬），另兩個工人其中一個因為胃病而擔誤工作，一個則是因為家裏有幾畝田所以整天找不到人。另外還有一個不知名的「地主小寶寶同志」，師範學校出身，膽子很小，參加群眾大會時一句話也不說，自認沒能力、沒作用。⁹⁶ 除此之外，在同一時期還爆發了西佐礦工罷工，但該地支部黨員自己不敢幹，只鼓動「領幹的」（工頭）去幹。⁹⁷ 磁縣中心縣委書記劉大風對此也不糾正，只是在工作上表現沒辦法，甚至恐慌。⁹⁸ 總而言之，磁縣煤礦工人的罷工既不是純粹的自發性群眾鬥爭，也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罷工，更像是由工頭領導的國民黨黃色工會運動。

礦工以外，冀南黨還發動了一個以車夫為主體的「小車社罷工」。車夫原是地方農民的兼職。1932年春，彭城大旱，許多農民無法謀

93 中共河北省邯鄲市委黨史辦公室，〈六河溝煤礦萬人大罷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1（上），頁169-171；《冀南革命鬥爭史》，頁54-56。

94 〈河北省委致直南特委與全體同志的指示信〉（1932/08/16），《河北文件9》，頁151-152。

95 〈直南特委關於前一階段工作和特委內部工作人員情形向省委的報告〉（1931/12/25），《河北文件19》，頁104。

96 〈直南特委工作報告（報告第一號）〉（1932/06/05），《河北文件19》，頁229。

97 思寧，〈在革命危機日益增長中直南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1932/09/25），《河北文件19》，頁281。

98 〈直南特委工作報告（報告第一號）〉（1932/06/05），《河北文件19》，頁229、234。

生，車夫數量因此激增，盜窰主和商人乘機降低工錢，引起車夫不滿。⁹⁹ 根據當事人共產黨員王維綱的回憶，有個在李兵莊（位於彭城到碼頭鎮的中途）擔任小學教員的韓玉如跑去找時任碼頭第三高小校長的王維綱，王又找了李欣然幾個小學教員，以及磁縣中心縣委書記劉大風等人，跑到李兵莊成立「小車總社」，把車夫從黃色工會領袖蘇老煥等三人手中奪了過來，並發動抗爭，最後獲得勝利。¹⁰⁰

不過，當時河北省委的說法與此不太相同，他們批評冀南黨在車夫已發動罷工兩個月後仍不去爭取領導，結果車夫就由一個地主、一個甲長、一個基督徒（此當指蘇老煥等三人）領導去了。共產黨去了後，並沒有把車夫奪過來，而是打算依靠這些「反動首領」的關係介紹到下層，然後奪取群眾。但後來還是沒有把群眾奪過來，在抗爭時也沒打出「紅旗」而只打出「白旗」，所以群眾「還不認識我們是共黨」。¹⁰¹ 當然，王維綱幾個小學教員的個人影響力是擴大了，在當地群眾眼裏，他們是英雄，大家大誇「先生好」！但在省委眼裏，這類「不要黨」的行徑是布爾什維克的恥辱。¹⁰² 至於磁縣中心縣委書記劉大風，他當時住在彭城，完全沒有能力去動員黨員推動工作。河北省委很憤怒，派人去磁縣批評這些知識份子黨員，其中如王維綱者在聽

99 《冀南革命鬥爭史》，頁 56-57。

100 王維綱，〈磁縣小車社工人罷工的勝利與白龍廟暴動的失敗〉，《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頁 148-152。王維綱是磁縣當地人，他亦是抗戰時期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者，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等重要職務。李欣然也是磁縣人，是磁縣第一批的共產黨員之一，抗戰時期曾任中共北方局秘書，1942 年戰死。

101 〈河北省委致直南特委與全體同志的指示信〉（1932/08/16），《河北文件 9》，頁 152-153。

102 〈小車夫鬥爭的佈置〉（1932），《河北文件 9》，頁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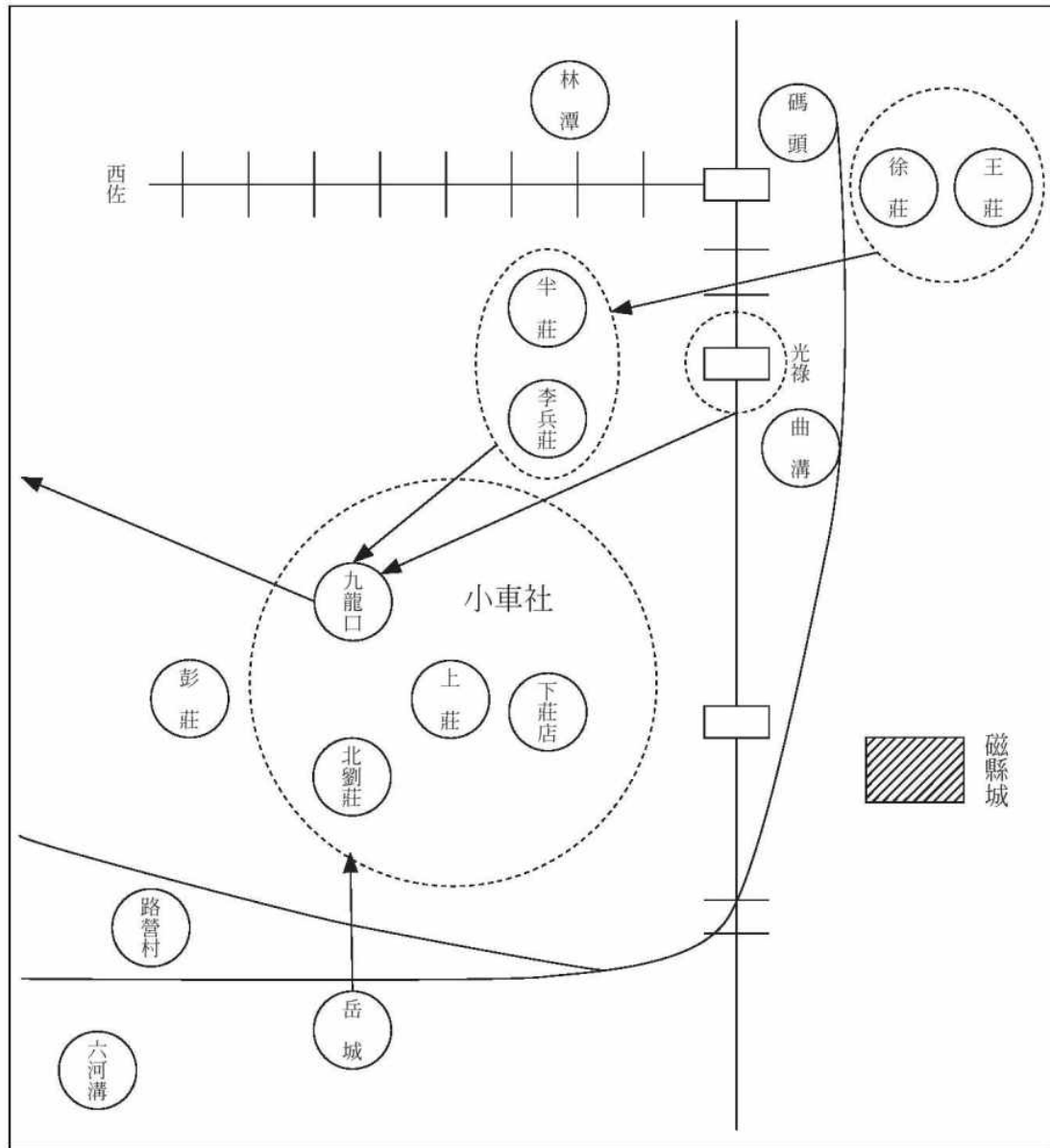
了省委巡視員的批評後，痛哭流涕，甘願放棄他小學校長的職位去從事革命；但也有像李九思這種黨員，他在先前就一直抱怨冀南生活太苦，現在省委再派人來批評他，他就乾脆承認說他不行，實在受不了這種苦，請求省委把他開除。¹⁰³

河北省委並不反對經濟鬥爭，也承認暫時利用國民黨的招牌去推動工作，但終極目標還是要建立北方蘇維埃。為此，1932年8月，河北省委派遣楊新之與陳原道等人到磁縣發動游擊運動。楊等人抵達後，籌組了一支約一百五十人的「直南工農紅軍游擊隊第一支隊」，支隊長王維綱，政委楊新之，唐壽山、馬載分任第一、第二大隊長。游擊運動最初打算從林潭、王莊、徐莊、光祿、岳城各地同時發起，襲擊各地之民團，但因民團事先獲知消息，所以實際的參與者並不多，而且游擊隊也沒有從事群眾動員，因此成了單純的軍事行動。發動的第二天，游擊隊抵達西部（嶺西）的白龍廟一帶，原以為該地近山適於建立根據地，沒想到該處民團勢力雄厚，輕而易舉地便擊敗了游擊隊，並逮捕王維綱、唐壽山等諸位領導，短暫的磁縣游擊運動就此結束。¹⁰⁴ 至於省委派來的楊新之與陳原道，前者因為愛打瞌睡（實際上是給敵人嚇到快死了），所以被省委開除黨籍，昭示全黨；陳則是為了準備游擊運動，停止其他一切的鬥爭，致使游擊運動成了單純的軍事行動，而且在事後也是「很恐慌地走了」，省委對他很不滿意，

103 〈直南特委工作報告（報告第一號）〉（1932/06/05），《河北文件 19》，頁 228、237。

104 〈河北省巡視員對直南情形的報告〉（1932/10/13），《河北文件 10》，頁 56-63；〈直南特委楊新之報告〉（1932/10/22）、〈直南特委發動磁縣游擊戰爭的經驗與教訓〉（1932/10/22），《河北文件 19》，頁 288-299；王維綱，〈磁縣小車社工人罷工的勝利與白龍廟暴動的失敗〉，《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頁 152-155。

圖 3-1 1932 年磁縣游擊運動佈置圖



資料來源：〈直南特委楊新之報告〉（1932/10/22），《河北文件 19》，頁 294。

儘管日後省委也承認，陳原道不重視群眾日常鬥爭的錯誤實際上是省委的指示所造成的。¹⁰⁵ 無論如何，磁縣的游擊運動是一場缺乏群眾基礎的單純軍事行動。

三、高蠡暴動

像磁縣游擊運動般單純軍事行動的錯誤，並不是個例，前章提到立三路線時期的農村暴動中，便有多起這樣的例子，即領導者醞釀武裝暴動時，並未積極動員下層群眾，只專注於上層軍事工作的準備。我們這裡要談的 1932 年 8 月冀中地區的高蠡暴動，也是有名的例子。

冀中地區位於鐵路附近，也是北方會議上中共中央所謂已有激烈農民鬥爭的地區。如前所述，1930 年立三路線時期，順直省委為發動冀中地區農民暴動，曾於同年 6 月成立以郝清玉為書記的保屬特委。隔年初，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爆發，郝清玉等重要的冀中領導幹部皆站在籌備處的一方反對四中全會中央，其中郝清玉還壯烈地說：「親愛的同志們，我們在戰線上再見！」¹⁰⁶ 河北省委因此撤銷保屬特委，並在冀中地區成立保定、博蠡、涿縣、石門（石家莊）四個中心縣委。¹⁰⁷ 但此時工作仍似有似無，無甚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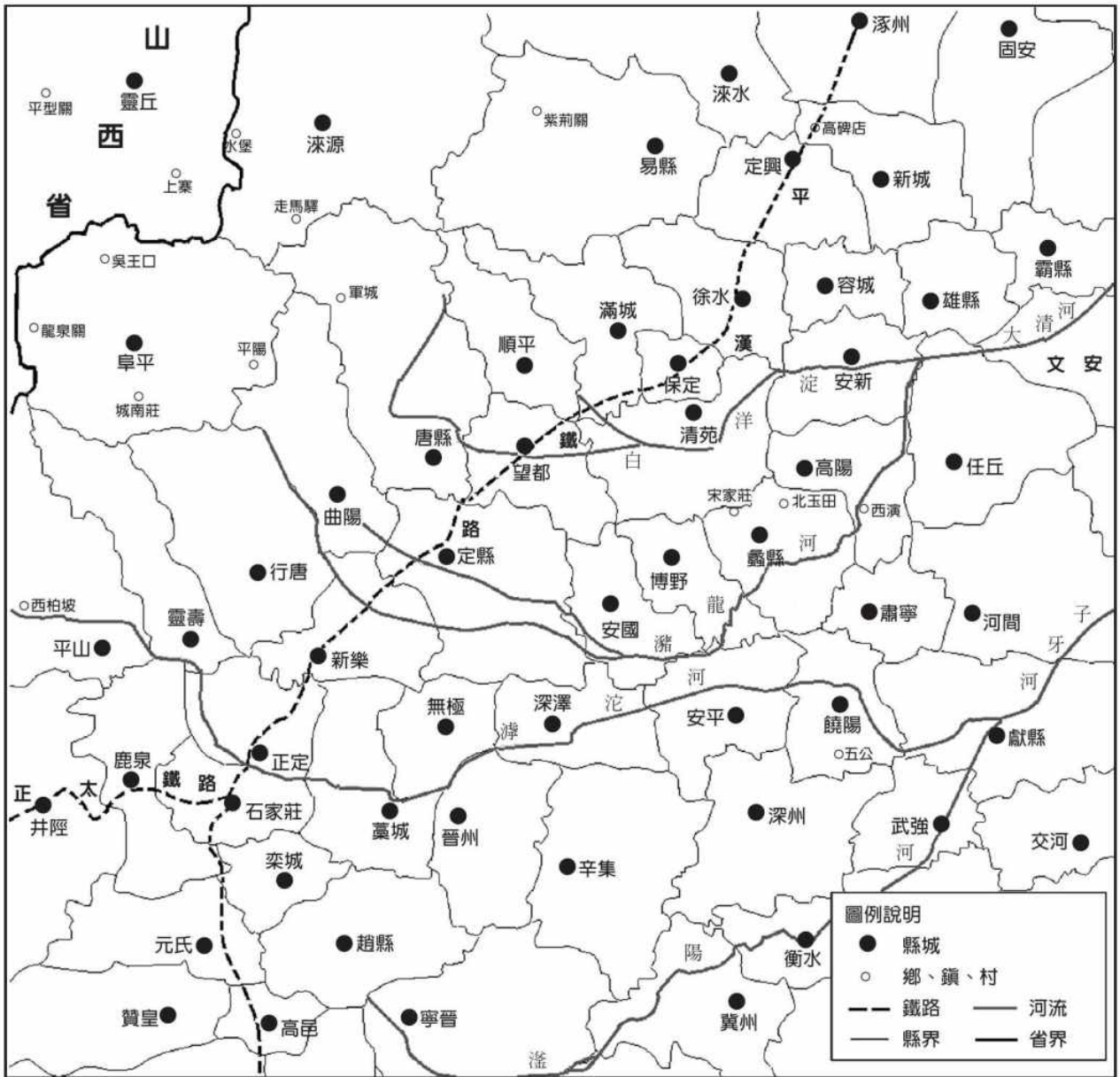
1931 年 11 月，河北省委改組石門中心縣委為直中特委，管轄石家莊及其周圍正定、井陘、平山、新樂、靈壽、元氏、趙縣、藁城、贊皇、高邑等縣的黨務（相當於今日石家莊市的轄區）；隔年 1 月，

105 〈河北省委駐直南特委的特派員青同志來平時關於楊、陳兩同志在直南的工作情形的報告〉（1932/11/08）、〈河北省委關於直南工作的決議〉（1932/11/16），《河北文件 10》，頁 164-165、239。

106 〈最近一個月的河北情形〉（1931/03/14），《河北文件 7》，頁 131。

107 〈河北臨時省委報告〉（1931/03/04），《河北文件 23》，頁 97。

圖 3-2 冀中地區圖



河北省委復成立保屬特委，管轄保定及其周圍涿縣、定縣、安國、望都、博野、蠡縣、容城、滿城、清苑、高陽、安平、深澤、徐水、完縣、行唐、曲陽、易縣、涞源、安新、唐縣、饒陽等縣的黨務（相當於今日保定市的轄區）。其中，保屬特委係由賈臣（賈振峰，經歷不詳）任書記，直中特委則由李嘉年領導。¹⁰⁸ 李嘉年原名李興唐，山西崞縣人，1926年入黨，他在1930年以前曾擔任北大法學院支部書記、北平市政工作委員會書記等職，但還只是個無名小卒。1931年5月，天津市委被破壞，李興唐奉命接任天津市委書記，從此嶄露頭角，逐漸成爲日後中共北方黨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導人，並且以化名「黎玉」著名於中共黨史。

當此之時，冀中農村地區爆發了幾起「自發性」群眾鬥爭。1931年，兩三個贊皇鄉村師範學校的中共黨員打算把教育局長拉去示威，儘管當時中共贊皇黨並無甚群眾基礎，而且此一舉動還被河北省委斥爲立三路線的盲動主義，後來也沒擴大成大規模的行動。¹⁰⁹ 隔年初，贊皇縣又由於縣府通過了錢糧加征的決議而引發群眾抗爭，但當時中共在該地的組織仍甚薄弱，故不能發生影響。只是後來贊皇區委（三名知識份子）中某一黨員私自與地方土匪接洽，毫無頭緒地就通知省委說某日要攻打縣城（與農民反錢糧加征鬥爭一事有否連繫，不詳），後來區委也就草草地決定某某爲紅二十五軍軍長，某某爲政治部主任，但無後續消息。¹¹⁰ 此外，在靈壽等縣亦爆發了幾起農民抗爭事件，其中靈壽還拉起了一支一百餘人的農民自衛隊。但由於資料

108 《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頁123-126。

109 〈河北省委指示石門中心市（縣）委〉（1931/10/05），《河北文件7》，頁261-262。

110 〈直中特委工作總報告第三號〉（1932/03/18），《河北文件18》，頁98-99、110-111。

不足，我們無從得知靈壽「游擊運動」的詳細經過，只知道該地黨員根本不發動群眾鬥爭，以為只有槍桿子才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所謂的游擊運動也不過是一場爆發於舊曆 7 月 20 日（1932 年 8 月 21 日）的繳槍未遂運動罷了！¹¹¹

從當時的文件得知，河北省委最初較重視的是直中特委所轄之石家莊市地區，而不是保屬特委領導的高陽、蠡縣等保定市地區，甚至當時省委與保屬特委的關係也尚未恢復，而必須依賴直中特委與之間接聯繫。¹¹² 不過，石市地區的黨務基礎實際上也相當薄弱，儘管該地黨在 1932 年初號稱有三百餘位黨員與一百餘位的團員，而且其中大部分還是貧農與自耕農，¹¹³ 但後來知道，石市黨只是「拿著簿子到各鄉村去簽名，不論男女老幼，不問政治認識，一概歡迎入黨」。¹¹⁴ 而且當 1932 年 5 月直中特委遭到破壞時，書記黎玉被捕入獄，特委人員竟因此全數跑到北平避風頭。¹¹⁵ 後來雖然省委派人去恢復直中特委，但石市地區的黨務仍然一蹶不振，直迄八路軍來到後才又逐漸恢復起來。

當石市地區黨務工作走下坡的同時，保屬地區的黨務工作則有了起色。當時保屬黨的工作是從保定市內的知識份子鬥爭展開的。1932 年初，保定志存中學和第六中學發起要求政府當局抗日的示威運動，二師附小也爆發要求免除學雜費和驅逐教員的鬥爭，但兩者最後皆以

111 〈直中特委報告〉（1932/09/09），《河北文件 18》，頁 225-226。

112 〈河北省委關於省委組織、各地工作、取消派活動等給中央的報告〉（1931/11/23），《河北文件 23》，頁 122。

113 〈河北省委向中央轉報石莊報告第二號〉（1932/01/24），《河北文件 8》，頁 27-28。

114 〈河北省委接受中央指示的決議〉（1932/04/12），《河北文件 8》，頁 287。

115 〈河北直中工作組織報告〉（1932/08/15），《河北文件 9》，頁 139。

學生遭到開除告終。¹¹⁶而且這些鬥爭全都不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爆發，與共產黨沒有關係，團市委還因此被批評是右傾機會主義。¹¹⁷

緊接著又爆發了著名的保定二師鬥爭。二師鬥爭爆發的原因，當代大陸官方史家歸諸於學生的抗日情緒和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¹¹⁸但根據當時河北省委的說法，該事件的源起是二師校長以該校學生「毆打國家主義派」為由，開除十幾個「革命學生」，引起抗議。¹¹⁹這裡的「革命學生」當指共產主義者，蓋該校原本便是眾所皆知的共黨大本營；至於國家主義派也是當時保定市內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政治派別，如省立二女師便是該派的巢穴。¹²⁰無論如何，在此之後，學生爆發了抗爭運動，河北省教育廳廳長陳寶泉因此解散二師，並派軍警包圍該校，最後爆發流血衝突，此即著名的保定二師學潮。雖然有共產黨員牽扯其中，但這些黨員的行動表現出更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當時河北省委見形勢孤立無援曾指示參與黨員退出，但這些黨員竟加以拒絕，以至有流血慘案的發生。¹²¹又，參與的共產黨、團員並沒有提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甚至由共黨黨員組織的二師學潮後援會還與國民黨進行合作。¹²²可見二師學潮並不是為了反國民黨才爆發的。

116 〈團河北省委關於保定反帝大同盟青年部的組織領導及鬥爭形勢的報告〉(1932/06/04)、〈團保屬特委報告〉(1932/06/27)，《河北文件 20》，頁 187-188、203-205。

117 〈△△同志關於保屬工作給團河北省委的報告〉(1932/06/10)，《河北文件 20》，頁 192。

118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 民國上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 158。

119 〈河北省委為保定慘案緊急通知〉(1932/07/10)，《河北文件 9》，頁 34。

120 〈平津冀黨務視察總報告〉(1931/07/10)，黨史館：會 3.3/176.44。

121 〈河北省委致保定特委的指示信〉(1932/07/12)，《河北文件 9》，頁 42-44。

122 〈河北省委致保定特委的指示信〉(1932/07/29)，《河北文件 9》，頁 99。

不過，志存中學、保定二師等學生運動的重要性不在其本身，而是在於很多保屬地區的地方黨團員皆在保定求學，如團保定市委本身就是以二師為中心，團員多是二師學生（雖然才三十餘人）。¹²³ 透過這些學生的關係，保屬黨得以把工作進一步帶到周圍農村地區。

事實上，當時冀中地區的農村經濟由於普遍的水災、苛捐雜稅的負擔，以及美英棉麥的傾銷而遭到嚴重打擊，農民也經常發動「自發性」的抗爭。不過，這些自發性抗爭大多局限在如「搶麻」（因水災的緣故，低地皆遭水淹，只有生長在高地的麻和高粱不受災害，故貧民常有搶麻之行動）等經濟鬥爭，加上地方農民害怕被人認出，所以參與的人數不多，規模也不大。¹²⁴ 由此看來，這些忙著填飽肚子的農民，恐怕壓根兒也沒想過推翻國民黨政權、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等問題。

再者，儘管當時冀中地區的群眾風起雲湧地起來發動抗爭，但當時保屬特委並不相信地方群眾，他們最初只想策動定縣駐軍兵變。早自 1932 年初起，保屬特委便經常提到當地駐軍東北軍十四旅因久未發餉而有發動兵變的可能，¹²⁵ 但又害怕兵變後地方群眾不敢拿槍（因為地方群眾害怕被認出），打算調外地的群眾來拿槍。¹²⁶

當此之時，蠡縣爆發了鹽民的自發抗爭。冀中盛產私鹽，其中如

123 〈河北省委巡視員巡視保屬的報告書〉（1932/06/20），《河北文件 8》，頁 497；〈團保定市委一個同志給團河北省委的報告〉（1932/06/27），《河北文件 20》，頁 206。

124 小興，〈團保屬特委工作報告〉（1933/01/01），《河北文件 20》，頁 433-434。根據時人的調查，高陽附近的農村，在一九三〇年代初即因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人民生活感到艱難。1931 年又逢水災，損失尤重。王藥雨，〈河北高陽縣舊城村實地調查〉，原載：《中國農民銀行月刊》，卷 1 期 5（1936 年 5 月），轉引自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鄉村經濟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頁 489。

125 〈河北省委對保定軍事工作指示信〉（1932/02/16），《河北文件 8》，頁 92。

126 〈河北省委致保定特委的指示信〉（1932/07/29），《河北文件 9》，頁 96-98。

潞瀧河流經之高陽、蠡縣、博野等縣，每當乾燥之春秋二季時，由於土壤之毛細管作用，鹽類聚積於土壤表面，成為白色粉狀體，形成大片「鹼地」，¹²⁷不少地方農民依靠私下製販土鹽與硝鹽（兩者的差別與販製，見下章）為生。但根據當時鹽法的規定，製販私鹽是不被允許的。國民政府當局在當地亦設有鹽巡負責查緝私鹽，並設置官鹽店與硝磺局，前者負責販售官鹽，後者負責收買硝（硝有軍事上的用途），兩者皆是招商承辦。但這些機關深受地方鹽民反對，¹²⁸以至官鹽收入呈現每況愈下的趨勢。以接鄰高、蠡之饒陽縣為例，據該地鹽商永泰呈稱，饒陽向來每年可售三千餘包官鹽，但由於私鹽氾濫，官鹽銷數遞減，至1933年，每月竟僅售二、三十包而已。其中有北崗村者，該村有八百餘戶，竟連一粒官鹽也賣不出去。某次有緝私隊伍前往該村查扣私鹽數車並逮捕鹽犯，竟遭地方群眾包圍及毆打成傷，不僅鹽犯及贓物皆遭奪回，緝私隊還被迫勒令出誤會甘結。¹²⁹冀中潞瀧河流域一帶私鹽之氾濫和鹽民之囂張，由此可見一斑。

關於華北地區私鹽的製販情形及由此而來的衝突事件，我們將在下章論及中日戰爭前夕冀南地區的鹽民鬥爭中再詳細探討。這裡只需要簡單地提出，1932年4月4日蠡縣爆發的一場鹽民抗爭事件，實

127 〈遵部令會同考察冀南各縣鹼地情形暨擬具改良方案仰祈鑒核施行由〉，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128 但也有很多硝民與硝磺局勾結，冒領熬硝牌照熬製與販售硝鹽。〈鹽稅與財政及地方治安之關係〉，河北省檔案館：680-11-1462；〈緝務會議紀錄〉（1934/05/11），河北省檔案館：680-11-739。

129 〈商人永泰呈為私硝充斥官鹽滯銷懇恩偵查滯銷根源設法嚴禁以維稅收而保商業〉（1933/10/23）、〈商人永泰呈為梟匪益形猖獗聚眾毆傷緝私官兵官引幾成廢弛續再呈明懇恩准密派廉明幹員前往查行縣拘辦並平毀硝池以免效尤〉（1934/01/06）、〈長蘆稽核分所片函據緝私第四大隊呈報饒陽縣村民聚眾阻撓緝私毆打官兵請飭縣究辦等情抄送原呈請飭縣究辦呈報〉（1934/01/11），河北省檔案館：680-11-298。

實際上是採取向政府和平請願的手段，而且請願時帶頭者還先跑了，這就說明了鹽民的抗爭並不是由下而上之社會與國家的對抗，他們希望儘可能藉由政府當局的力量由上而下地解決其生活問題。尤有甚者，這場鬥爭既不是在共黨領導下所爆發者，當地共產黨、團還採取置之不理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¹³⁰

事實上，即使冀中災民與鹽民前仆後繼地起來抗爭，但卻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這些自發性鬥爭直接導致高蠡暴動。高蠡暴動實際上是共產黨由上而下強迫發動起來者。

如前章所述，高、蠡等縣是共黨在冀中地區發展較早的地區。1930年8月，博蠡中心縣委王志遠、劉憲增曾領導博蠡暴動。不過，自立三路線倒台後，博蠡黨即與省委斷絕關係。直迄保定二師學潮後，河北省委才要保屬特委或是透過定縣兵變，或是藉由高、蠡工農鬥爭來創建新的蘇維埃區域。¹³¹ 因此緣故，保屬特委才於1932年7月復成立博蠡中心縣委。雖然以「博蠡」為名，但該中心縣委的主要基礎卻在蠡縣與高陽兩縣，博野縣則由於工作不甚發展，故由蠡縣就近指揮。¹³²

當時蠡縣分五區，其中西北區是中心縣委書記宋洛曙的家鄉，是蠡縣黨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之一。宋是鄉村師範學生，情緒很好，工作很努力，但缺乏經驗，他在1927年時由其外甥曹承宗介紹入黨，曹在高蠡暴動爆發時正擔任蠡縣財政局長兼共黨縣委組織部長，情緒很

130 〈河北省委保定巡視員工作報告〉（1932/08/28），《河北文件 9》，頁 224、236；
〈△△同志關於保屬工作給團河北省委的報告〉（1932/06/10），《河北文件 20》，頁 192。

131 〈河北省委致保定特委的指示信〉（1932/07/29），《河北文件 9》，頁 98。

132 〈保屬特委為佈置蠡縣、高陽鬥爭致省委的報告〉（1932/07/21），《河北文件 18》，頁 153、157。

不好，又不努力。蠡縣東北區則是黨員田順德、王鳳齋的家鄉，前者曾在高陽讀過高小，後者則是在 1930 年由其在保定二師讀書的侄子王森桂介紹入黨。該區黨務發展甚為普遍，其中南玉田村的村長及村內職務完全為共黨掌握。¹³³再者，蠡縣東北區還是一個織布工人區域，¹³⁴高、蠡等冀中地區手織布工業極為發達，但因洋布入侵及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影響，土布工業遭到打擊，這可能也是促使高蠡暴動爆發的因素之一。¹³⁵高陽則分為西、北、東南三區。其中東南區的西演村是區委書記蔡書林的家鄉，蔡曾在高陽縣立師範學習，該校老師多是保定二師畢業的學生，蔡本人則在畢業後回東南區北莘莊任教，還曾擔任過警察。此區雖是新發展者，但在高蠡暴動前夕也有千餘位的黨團員和群眾。¹³⁶

高蠡暴動前夕的保屬特委書記是黎亞克。黎亞克，原名李濟道，又名李任予、李力一，廣東新豐人，早年曾在北平、廣州地區活動，1929 年調閩西蘇區擔任軍事工作，是立三路線在閩西蘇區的忠誠執行者。立三路線倒台後，黎亞克遭到批鬥，加上其愛人黎樹容被捕處

133 〈河北省委保定巡視員工作報告〉(1932/08/28)，《河北文件 9》，頁 232；〈保屬特委為佈置蠡縣、高陽鬥爭致省委的報告〉(1932/07/21)，《河北文件 18》，頁 153-154；王夫，〈冀中星火〉，《河北革命回憶錄》，輯 6（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84），頁 2-4。

134 〈保特工作報告〉(1932/08/12)，《河北文件 18》，頁 173。

135 土布經濟衰落引起冀中農民之不滿，這是當時中共所持的看法。但根據後人的研究，1930-1937 年間以高陽為代表的冀中土布業，雖然發展勢頭減慢，布機和布匹數量亦有所減少，但並沒有衰落。其中 1930-1933 年期間實應說是冀中布業兩個興盛期間的過渡期。河北大學地方史研究室、政協高陽縣委員會，《河北文史資料輯 19：高陽織布業簡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頁 6。

136 〈保屬特委為佈置蠡縣、高陽鬥爭致省委的報告〉(1932/07/21)，《河北文件 18》，頁 154；王夫，〈冀中星火〉，《河北革命回憶錄》，輯 6，頁 4-5。

死，致其「時常哀挽悲痛消沉」，故被調回中央工作。¹³⁷ 根據河北省委的報告，大約在 1931 年 11 月，中央派了南方出身的黎同志來北方工作，此黎同志當指黎亞克。當時省委因其不會說北方話，乃派他到北平做反帝和文化的工作。但黎的工作能力差，精神又不好，乃至於鬧出群眾不相信他是共產黨員的笑話。¹³⁸ 大概在保定二師學潮前，省委派黎亞克去擔任保屬特委書記。

1932 年 8 月 8 日，黎亞克前往蠡縣、高陽巡視後，保屬特委以爲蠡縣東北區與高陽東南區「地方暴動」的條件已成熟，指示立即組織並領導群眾暴動，奪取政權，成立紅軍，以蠡縣財務局長曹承宗（報告中稱爲李才先者）爲軍長。¹³⁹ 20 日，河北省委代表湘農抵達保屬特委，這位湘農的個人經歷不詳，只知道他是個南方人，曾有紅軍經驗，當時保屬黨員稱呼他爲「南方蠻子」。湘農來了後，保屬特委又改變策略，認爲高蠡一帶地方暴動的條件尚未成熟，目前應只是發動游擊戰爭（省委則反駁說高蠡已具備了地方暴動的條件）。¹⁴⁰ 此一策略的轉變無疑是湘農的作用，蓋黎亞克當時是個相當「左」的人，他以爲客觀的條件已經成熟，群眾都迫切希望蘇維埃紅軍來，還說什麼共產黨不發動，群眾沒飯吃；至於湘農則認爲「群眾目前迫切的要求是吃飯問題，反日反帝打倒國民黨沒有比吃飯問題迫切」，他還以

137 陳耀煌，〈中共閩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1927-1931）〉，《國史館學術集刊》，期 4（臺北，2004 年 9 月），頁 52、62；王健英，《中國紅軍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 308-309。

138 〈河北省委關於省委組織、各地工作、取消派活動等給中央的報告〉（1931/11/23），《河北文件 23》，頁 132。

139 〈保屬特委爲佈置蠡縣、高陽鬥爭致省委的報告〉（1932/07/21），《河北文件 18》，頁 158-159。

140 〈河北省委致保定特委指示信〉（1932/09/04），《河北文件 9》，頁 268-269；〈保屬特委關於高蠡鬥爭致省委報告〉（1932/08/27），《河北文件 18》，頁 200。

爲高蠡之豪紳地主共有三萬枝槍，就算連打兩次折扣算七千五百枝槍，他們還是有足夠的能力消滅游擊隊。¹⁴¹ 事實證明湘農的說法更符合實際，黎亞克與省委高估了鬥爭形勢。

根據另一位剛從「完縣暴動」逃出來的易北（黎亞克前任的保屬特委書記賈臣，又名賈振峰）所言，他們當時決定在高陽東南區和蠡縣西北區、東北區成立游擊隊三個團，賈臣擔任第二團（蠡縣西北區）的政委。賈臣抵達該地後，先找曹承宗要槍要錢，曹說沒有，還說現在去收槍，農民群眾會起來和游擊隊拼命，最好等明年青紗帳起再說。但賈臣硬是要現在幹，曹則說「那麼幹吧」，但後來就沒和共產黨見面了。¹⁴²

隨後湘農來了，他主張暫緩，但賈臣等則說來不及了（因爲蠡縣東北區已被縣政府抄了兩次），所以大家決定所有武裝 29 日集中到蠡縣東北區去。但在 26 日，中心縣委書記宋洛曙竟公然告知當地學董和村長，要他們把全村武裝交給他，但沒有結果；後來游擊隊知道了，就把這些村長、學董集合起來，宋洛曙還在隔天（27 日）到處繳槍，但地方黨員卻又礙於情面不敢參加。後來游擊隊又跑到鄰近的蠡縣林堡、博野吳王莊與清苑李家莊一帶繳槍，但地方黨員還是不敢出面（如林堡），甚至還有黨員以情面關係放走地主豪紳（如博野）。另外，當時游擊隊曾跑到某一高利貸者家中繳槍，但只有一個婦女在家，共產黨向她要槍，婦女說沒有，打了她一槍了事。當天晚上，游擊隊在毫無秩序的情況下回宋家莊宿營。

141 〈保屬特委關於高蠡鬥爭致省委報告〉（1932/08/27），《河北文件 18》，頁 202-204；〈河北向平（即湘農）關於保定游擊戰爭問題報告〉（1932/10/10），《河北文件 23》，頁 234-236。

142 易北，〈保定游擊戰爭的經驗與教訓〉（1932/10/20），《河北文件 18》，頁 242-243。

28日，游擊隊先是往西到博野一帶搶錢繳槍，但中途因遇到勢力強大的民團，所以又繞回往蠡縣東北區去。沿途游擊隊皆未從事群眾工作，群眾也不敢告訴游擊隊哪裡有財主可打（怕財主報復）。當天下午，游擊隊回到蠡縣東北區，派人到高陽東南區通知該地黨員發動。29日上午，游擊隊原本打算出發前往高陽東南區，但因為途中殺了一個敵人偵探，嚇跑了四十多位地方黨員（當場一個嚇暈），由蠡縣東北區黨員和群眾組成的游擊第二大隊因此動搖，耽誤了游擊隊行程，直到下午才到高陽東南區，並攻下北莘莊的公安局，途中雖曾領導群眾去分糧，但地方群眾仍因為怕報復而不敢拿。

30日，游擊隊跑到西演村，在該地打了一個官鹽店，號召群眾參與分糧、分鹽，並逮了兩三個豪紳，只不過負責看管的當地黨員因同鄉關係放走了他們。當天下午游擊隊回到北莘莊，但遭到敵人圍攻，游擊隊被衝散，湘農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只剩下幾個冀中地區的黨員，他們都很害怕，很想解散游擊隊，但又相信湘農有辦法，所以最後決定等湘農回來再打算。當天晚上，所剩無幾的游擊隊躲在莊稼裡休息，突然有個看青的大喊一聲：「那是誰們呀！」大家嚇得跑了起來，禁也禁不住，最後剩不到五個人，隊伍也就解散了。¹⁴³

暴動失敗後，很多人把矛頭指向湘農，說他「目空一切、自大，不和地方同志合作」。¹⁴⁴ 省委日後的總結中亦批評湘農一開始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不相信有人能夠領導游擊隊，所以把一切領導權抓在手

143 湘農，〈高陽蠡縣游擊戰爭的經驗和教訓〉（1932/12/22），《河北文件 10》，頁 433-441；易北，〈保定游擊戰爭的經驗與教訓〉（1932/10/20），《河北文件 18》，頁 243-252；〈河北向平（即湘農）關於保定游擊戰爭問題報告〉（1932/10/10），《河北文件 23》，頁 237-241；王夫，〈冀中星火〉，《河北革命回憶錄》，輯 6，頁 9-27。

144 〈武報告〉（1932/10/04），《河北文件 10》，頁 8。

中，採取個人英雄主義式的領導，在游擊隊中造成「非有南方蠻子領導不可」、「湘農不在沒有辦法」的心理。¹⁴⁵ 據云，當時湘農還當面對省委說：「北方工農群眾尚未有奪取政權的決心」，這在省委看來，正是所謂北方落後論的論調，必須予以批判。¹⁴⁶ 然而，實際的情形也確是如此。不僅外來的湘農不相信北方群眾的力量，地方黨員也不相信地方群眾的力量，而地方群眾也確實沒有展現什麼偉大的力量。如同前面所敘述般，群眾因為同鄉等關係或害怕被報復而不敢行動，以至湘農號召群眾分糧時，群眾竟然向他翻白眼，不知幹嘛，結果只好由湘農替群眾去拿東西。¹⁴⁷ 省委日後也自我批評地承認，太高估了群眾的力量，以至發出錯誤的指示——即要保屬特委不僅要發動游擊戰爭，還要組織地方暴動，結果就放棄了下層艱苦的群眾運動。¹⁴⁸

出身蠡縣的當代中國作家梁斌，早年在家鄉參加革命，1930年入保定二師求學，曾親眼目睹二師的抗爭與家鄉的農民暴動。後來他以此為背景，創作了小說《紅旗譜》三部曲。故事述說當地農民朱老忠、嚴志和等家庭自清末以來即如何受到地主的壓迫，他們渴望公平正義，卻不知如何打倒地主與其背後的官僚政權。這時，一個外來的革命家賈湘農出場，他啟發了朱家與嚴家的青年，教導他們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打倒封建地主階級。這些貧苦農家青年聽了賈湘農的教誨後，眼睛為之一亮，毫不猶豫地就帶著全村貧苦農民走上了革命的

145 〈河北省委關於蠡縣高陽游擊戰爭的總結〉(1932/11/15)，《河北文件 10》，頁 212-213、223-225。

146 〈河北省委關於元道湘農兩同志的錯誤及張金仞的黨籍問題致中央的信〉(1932/11/17)，《河北文件 10》，頁 258。

147 〈河北濃關於蠡高游擊戰的申明書〉(1932/12/15)，《河北文件 10》，頁 388。

148 〈河北省委關於蠡縣高陽游擊戰爭的總結〉(1932/11/15)，《河北文件 10》，頁 207-211。

道路。¹⁴⁹

梁斌認為，階級鬥爭的怒火早已蘊藏在農民心裡，只待外來革命者予以點燃並組織起來。當代學者如 Linda Grove 等人卻不這樣想，他們以為農民早就依據某些超階級的意識與社會網絡結合起來，並發動自發性的抗爭，是外來革命者推動不切實際的階級鬥爭，才導致抗爭的失敗。確實，在革命者來到以前，地方農民早已透過某些既存的超階級機制結合一致。但是，如果沒有湘農等外來幹部的領導與催促，難以想像這些自發性的農民團體能夠爆發任何大規模的抗爭，乃至於革命運動。而這些外來幹部在打入農村之後，如果未能深入灌輸農民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而不僅僅是點燃既存在農民心中的階級怒火），並據此重新分化農村社會，打破超階級意識與社會網絡的局限，革命也難以獲得生存與進一步的擴展。湘農在當時沒能做到這一步，以至暴動流於脫離群眾的單純軍事行動，最後還落得目空一切的罪名。考慮到當時各種主觀、客觀的局限，這又何嘗不是非戰之罪呢？

149 梁斌，《紅旗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當代學者解讀《紅旗譜》時，雖然承認階級鬥爭是該書的主題，但又說梁斌真正想表達的是蘊藏農民心中傳統鄉土的俠義、公正之心，以及民族的氣魄。耿傳明，〈植根鄉土的「革命敘事」——紅旗譜與二十世紀鄉土中國的革命〉，《北方論叢》，2004年第6期（哈爾濱，2004年11月），頁49-53。但是，所謂傳統鄉土的俠義、公正之心與民族氣魄，其與階級鬥爭間的界線又何在呢？考慮到梁斌創作時的年代背景，筆者以為，當代學者的解讀也只是牽強附會的溢美之詞罷了。

第三節 西瓜與紅蘿蔔—— 北方軍事運動的兩條路線

一、河北省軍委與下層士兵路線

高蠡暴動告訴了我們，群眾本身是有待改造而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可是當時中共上層卻總是高估群眾的革命性，否定上層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要求黨員貫徹理外皆紅的下層群眾路線，結果就招致其他政治黨派與上層份子的仇視，群眾也望而卻步，最終不得不流於脫離群眾的單純軍事行動。此一左傾路線不僅帶給當時的群眾運動相當大的災難，也阻滯了軍事運動的推展。

1931年初，陳原道等人在恢復河北省後，立即重建軍委系統，由廖劃平（書記）、薄一波、彭幹臣三人負責。¹⁵⁰ 隨後廖叛變，薄被逮捕，河北省軍委乃自1931年底後改由江西萍鄉工人出身、擁有紅軍軍事工作經歷的曾健領導，直迄1933年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為止。

東北抗日義勇軍運動是當時河北省軍委的重點工作之一。如前所述，在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地掀起一股義勇軍的熱潮。當時中共中央對此頗為興奮，並在1932年的北方會議上要求北方黨注重東北義勇軍的工作。但是，東北義勇軍的領導多是前國民黨軍官和政府官員、胡匪頭子，以及某些地富份子，這些階級異己份子與敵對團體的「抗日行動」在共產黨眼中既是動搖也是欺騙群眾的，故中共中央乃

150 〈河北省軍委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及最近工作計劃大綱〉（1931/03/19），《河北文件7》，頁138。

指示北方黨要「有計劃地選派幹部及赤色群眾打入義勇軍中去」，「揭發上層反動領袖的欺騙，以爭取他們的下層群眾」，此即下層士兵、群眾路線的軍事工作。¹⁵¹

河北由於與東北地區接鄰，故中共中央也指示河北黨必須注意發展東北義勇軍的工作。當時也有許多義勇軍領袖主動找河北黨合作，這一方面既是因為他們認為共產黨員是很「難得的人才」，同時也是想藉此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如有東北軍第九旅工兵營營長于澄者，北伐時期在朱培德部任中校團副，因痛恨國民黨在九一八時不戰而退，乃致信洮南地區廿五路義勇軍司令趙大中（北伐時期在朱培德部任上校科長），勸其與共產黨合作，並說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有出路。儘管這個于澄腦筋簡單，政治上不了解，喜歡出風頭，但據說也具有決心。另外還有很多在平津求學的熱血青年，在九一八事變後主動赴東北義勇軍工作。其中有些人跑到錦州第四路義勇軍司令耿繼周處，向耿說「共產黨有蘇俄的彈藥、盧布接濟」，後來耿也因此派人來北平找黨。但共產黨要他們揭舉紅旗，沒收地主土地，積極進攻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該代表拒絕，共產黨也就沒有理會他了。耿繼周因此不滿，以為是該代表從中阻撓，故通緝該代表，並持續向共產黨示好。¹⁵²

除上述例子外，河北團省委也主動派了一些知識份子去遼東義勇軍工作。但這些派去工作的團員根本不相信群眾力量，只知聯絡軍官，也不能吃苦，還鬧戀愛問題，可說是充分發揮了他們「小資產階

151 〈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1932/06/26），《中央文件 8》，頁 392-393。

152 〈河北軍委關於東北義勇軍的報告〉（1932/03/01），《河北文件 8》，頁 148-152。

級的動搖性」。¹⁵³ 但是，根據河北省委的自我批評，當時抗日義勇軍的工作所以無甚成績可言，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省委軍委認定所謂的義勇軍就是胡匪，以為義勇軍找共產黨就是要槍要錢（這也不完全不是事實），因此打從心裡就瞧不起義勇軍，所以根本就沒有重視義勇軍的工作，如此當然成效甚微。¹⁵⁴ 這也就是過份強調反對與上層合作的「左」傾路線所造成之後果。

另一個由河北省委軍委領導之山西境內的「客軍」運動，也因為太強調士兵路線而招致失敗。在抗戰之前，由於黨務組織不健全等因素，山西省的黨務工作經常是由河北黨領導。1930年10月，北方局派遣劉天章¹⁵⁵去太原重建山西省委。隔年初，儘管當時河北省委認為他們實際上並無力量兼管山西、陝西等北方各省的黨務工作，¹⁵⁶仍舊先後派遣薄一波、賀昌等人去山西工作。¹⁵⁷ 當時中原大戰剛結束不久，北方政局仍在初步重建的過程中，山西內部局勢亦頗為複雜。蓋原來盤踞山西的閻、馮軍隊崩潰瓦解，山西王閻錫山也蟄居大連，整個山西軍政頓陷群龍無首之局勢。這時山西境內，除原本的晉軍外，另有十萬客軍，其中著名的有歸晉中馮玉祥（中原大戰後寄居山西汾陽）所屬的支應遴、高桂滋師，晉南有宋哲元所屬的張自忠、

153 〈團河北省委關於《對遼東工作的決議》給中央的報告〉（1932/10），《河北文件20》，頁308-309。

154 〈中共關於貫徹北方各省代表會議精神給河北省委信〉（1932/07/22），《中央文件8》，頁324-327。

155 劉天章，陝西高陵人，北大學生出身，1920年參加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大以後加入共產黨，曾任中共豫陝區委委員兼軍委委員等職，1929年後到順直省委工作，是早期北方黨的重要幹部。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頁26。

156 〈殷鑒關於工作佈置致中央的信〉（1931/06/03），《河北文件7》，頁228-229。

157 〈河北臨時省委報告〉（1931/03/04），《河北文件23》，頁98。

馮治安、劉汝明、鮑剛、張人傑等師，晉東南則有孫殿英、龐炳勳等部。這些部隊由於紀律敗壞，就地征索，帶給當地人民相當大的災難與損害。¹⁵⁸ 加上駐軍本身的軍餉沒有一定的來源，士兵生活相當痛苦，軍官亦頗有怨言，故當時中共河北省委軍委非常重視這些山西客軍的工作。

事實上，劉天章所領導的山西省委本身也較重視軍事工作。當時山西省委軍委書記是谷雄一，河北安國縣人，1928年晉軍將領商震擔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時，在北平開辦了一所河北軍事政治學校，谷雄一便是該校學員。或許由於商震本人是保定人，故河北軍事政治學校吸收了許多冀中地區的知識份子參加，其中也包括不少共產黨員，除谷雄一外，其他著名者還有習從真（習靜波，河北行唐人）、馬芳庭（馬富春，河北贊皇人）、牛清明（牛清玉，河北新樂人）等人。商震本人並不屬晉軍嫡系，他是同盟會員出身，曾參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活動，1917年後才投入晉軍，故閻錫山對他頗有戒心。商本人亦想脫離晉軍懷抱，他在1928年擔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後開辦軍事政治學校，原本便帶有培養自身勢力的意味。因此，1929年後，閻便調商回太原，委其任山西省主席，並由晉籍軍官統轄其軍隊，還將河北軍事政治學校合併到山西軍官教導團，藉此架空商震。直到1930年中原大戰後，閻錫山逃亡大連，商震才重新擔任三十二軍軍長，恢復實權，並在前述的1931年石友三之變後，離開山西，駐紮冀南邢台、大名一帶，從此脫離了晉系。¹⁵⁹

158 何智霖，〈閻錫山策調客軍出山西省境史料選錄〉，《國史館館刊》，復刊第33期（臺北，民國91年12月），頁192。

159 商震的歷史見：唐永良，〈商震歷史概述〉，《文史資料選輯》，輯8（北京，1960），頁98-106。

當時在河北軍事政治學校內活動的共產黨員，也隨著商震先後轉移於河北、山西之間，逐漸擴充自身勢力。而順直省委及後來的河北省委亦頗思利用這批黨員大幹一番事業。如在 1930 年時，順直省委便指示時任山西特委書記並在山西軍官教導團內任職的習從真發動太原武裝暴動，但習等人事實上並未發動，因此被斥為北方例外主義者而遭罷黜，¹⁶⁰ 後來北方局派劉天章來晉組織山西省委應當就是為了取代習從真的職位。此外，共產黨還派了牛清明等在山西軍官教導團內工作的黨員到冀中、冀南地區活動，協助省委軍委張兆豐策動地方駐軍李生達、孫楚等部的兵變，只不過後來暴動沒有發動起來，時任平漢北段兵暴委員會書記的張兆豐也被捕遇害。¹⁶¹

中原大戰結束後，客軍高桂滋第十一路軍駐在山西平定一帶。如前所述，高桂滋與中共北方黨的淵源相當深厚，早在李大釗時期，中共北方黨便曾派員至該部活動。在張慕陶領導順直省委時期，共產黨員亦曾試圖在該部發動兵變。儘管該部中的共產黨員始終只聯絡上層的軍官，而不是艱苦地在下層士兵間工作，但這還是不能打破共產黨試圖發動該部兵變的幻想，如殷鑒在重建河北省委後便又把算盤打到該部上，¹⁶² 劉天章領導的山西省委也在 1931 年 5 月的省委軍事會議結束後，派谷雄一、牛清明、吳耀禮、馬芳庭等人到該部運動。原則上，當時谷雄一等人的工作仍應依循嚴格的士兵路線，發動士兵群眾日常不斷的鬥爭，藉此團聚士兵群眾，提高他們對官長的階級仇恨，

160 王啓明，〈回憶山西軍官教導團地下黨的活動〉，山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西革命回憶錄》，輯 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 5。

161 蘇旭、黃占江、沙友林，〈張兆豐烈士生平〉，《河北文史資料》，輯 8，頁 64；王啓明，〈回憶山西軍官教導團地下黨的活動〉，《山西革命回憶錄》，輯 3，頁 5-6。

162 〈河北省委關於山西駐軍情形和組織兵變經過致中央的信〉（1931/06/17），《河北文件 7》，頁 235。

但也須爭取部分「同情的、動搖的下級軍官」，因為他們的軍事知識、指導技能有助於革命工作的推展，故爭取這些人並不算是「動搖黨的正確路線」。¹⁶³

1931年7月4日，谷雄一等人乘高桂滋赴北平為其父祝壽之際，發動所謂的「平定兵變」（也有說是由於黨員叛變致事跡敗露，故不得不提早發動暴動），成立以赫光（萬錫勳，寧夏固原人，1925年入黨，1926年入高桂滋部工作）為軍長，谷雄一為政委的紅二十四軍。隨後，紅二十四軍開到阜平縣，佔領該縣城，成立由牛清明任主席的蘇維埃政府。但不久後為二十四軍收編的東北軍沈克部叛變，軍長赫光、政委谷雄一等人遇害，軍隊隨即瓦解，僅有少部分人逃往陝西參加劉志丹與謝子長的隊伍。¹⁶⁴著名的平定兵變宣告失敗。

除高桂滋部外，當時共黨在山西境內的另一個「客軍」運動對象是駐紮汾陽周圍一帶的馮玉祥等部隊。河北黨與汾陽馮玉祥部發生關係的經過如下：眾所周知，馮玉祥在1926年國共合作仍在進行的當時，為聯絡蘇聯，乃派其長子馮洪國與女兒馮弗能到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其中馮洪國在回國以後，竟然參加了陳獨秀的取消派，走上「反黨」之路。不過，大概在1931年前後，馮洪國被取消派開除後，在南京認識了一個任教於東方大學的中共黨員，後來這兩個人便跑到山西汾陽軍校教書。汾陽軍校是由馮玉祥所創辦，馮自1930年中原大

163 〈山西特委對十一師工作決議〉（1931/05/13），臺灣法務部調查局：255.31/803/11399。

164 平定兵變之經過，見趙憲、王德琦整理，〈紅二十四軍的創建和阜平蘇維埃始末〉，《河北黨史資料》，輯5（石家莊，1986），頁178-186；王啓明，〈回憶山西軍官教導團地下黨的活動〉、馬芳庭，〈蹉跎歲月裡的戰鬥〉、牛清明，〈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四軍創建始末〉，《山西革命回憶錄》，輯3，頁1-32。

戰失敗後便蟄居於汾陽，並結合當時駐紮晉南一帶之客軍鮑剛、張人傑、孫殿英等部，圖謀發展。馮洪國等人去後，與一些已在該校活動的共產黨員成立汾陽臨時縣委。後來有一個姓王的中共特務正好在該部活動，便和汾陽臨時縣委發生關係，由王擔任書記，從此工作便發展起來了。¹⁶⁵

當時中共河北省委軍委對此頗為興奮，打算以汾陽為中心，發動駐在鄰近地區的鮑剛、張人傑與孫殿英等部兵變。此一兵變計劃是根據下層士兵路線制定，其目的無非是要驅逐馮玉祥等上層軍官，奪取他們的下層士兵為共黨所有。1931年4月中旬，駐汾陽永安鎮的國軍一個排，終於在共產黨員馮金福等人的領導下兵變，隨後開往晉西的呂梁山與由拓克寬、閻紅彥等人所領導、改編自晉西地區販運鴉片的「武裝土客」而成的「中國工農紅軍西北游擊大隊晉西游擊隊第一大隊」會合。這支部隊在1931年9月因山西當局的圍剿，被迫轉入陝甘邊活動，成為日後紅二十六軍的基礎。¹⁶⁶只不過，在兵變過後，中共在馮玉祥等軍隊內的組織也因此被破壞，黨員遭到驅逐。¹⁶⁷此一「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兵變付出慘痛代價。

二、中共華北特委與上層軍官路線

事實證明，很多在軍隊中活動的黨員仍舊傾向於走上層軍官路線，而不是下層士兵路線。如在汾陽馮玉祥部工作的黨員，原來也只

165 〈河北軍委會同志關於軍事工作的報告〉（1932/06/12），《河北文件8》，頁466、470-471。

166 梁金保、景占魁，〈激流勇進——記前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劉天章〉，《山西革命回憶錄》，輯2，頁107-109。

167 〈河北省委關於黨團工作幹部調配等問題致中央的信〉（1932/07/04），《河北文件9》，頁10。

是做上層的聯絡，沒有建立下層士兵的組織，也沒有發展領導士兵的日常鬥爭，更沒有注意周圍地區的農民工作，完全是軍官路線式的軍事運動。¹⁶⁸ 再以晉城的孫殿英部工作為例。孫是河南永城人，早年曾在家鄉參與會道門，並販運毒品，是豫西地區的著名匪首，1925年時投靠憨玉昆，參與憨胡（景翼）之戰。憨玉昆失敗後，孫又投靠國民軍第三軍。北伐戰事期間，孫屬張宗昌部直魯聯軍，是北伐軍的敵人。直魯聯軍失敗後，孫接受蔣介石的收編，效忠南京國民政府。1930年中原大戰興起，孫見反蔣勢力雄厚，又投靠馮玉祥。閻、馮失敗後，孫率部退駐山西晉城一帶，被張學良收編為第四十一軍。¹⁶⁹ 1932年，有一些共產黨員在晉城孫部中活動，只不過這些黨員似乎並不打算發動士兵由下而上地暴動，「槍殺反革命長官」，進行游擊戰爭，而只是聯絡上層軍官，甚至還把組織秘密悉數公布於長官之前。¹⁷⁰

當時標榜群眾運動、士兵路線的中共上層領導，對此情形當然不是一無所知。事實上，因應瞬息萬變的局勢，為了掌握機會，當時中共中央在地方黨部省委軍委系統外，還另外成立一個特科系統。前者是走下層士兵運動路線，即「紅蘿蔔主義」；後者則專注於與上層軍官的聯絡，後來被譏為「西瓜政策」。而且，與前述張慕陶順直省委時期特科隸屬省委軍委管轄者不同，河北省委時期的軍委是歸地方黨部領導；¹⁷¹ 而特科系統，如下文所述，它與地方黨部和省委軍委是互相平行的兩套組織系統，直接歸中共中央特科管轄。

168 〈河北省委給汾陽同志信〉（1932/05/30），《河北文件 8》，頁 429。

169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輯 7（北京，1960），121-132。

170 〈河北省委致晉城同志的信〉（1932/06/19），《河北文件 8》，頁 489-493。

171 〈河北省軍委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及最近工作計劃大綱〉（1931/03/19），《河北文件 7》，頁 140。

如前所述，1931年以後，河北省委因籌備處事件以及叛徒的叛變而屢遭破壞，當時河北省委由於沒有特科人員，拿叛徒沒有辦法，一再要求中共中央派人來解決叛徒。¹⁷²而中共中央也確實派了很多特務來北方，如當時中共的特務頭子陳賡便曾在1931年6-9月間來過北方。陳賡所以來北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他過去的上司顧順章不久前叛變，陳不得不暫時離開上海以避風頭；另一方面，陳賡也兼負營救北方被捕黨員的職責。¹⁷³有趣的是，當時河北省委竟不知道陳賡是何方神聖，只知道有個叫「陳根」的人來到天津，自稱是中央派來做特務工作，整個天津市委和軍委完全受其支配，而且該人在經濟上很有辦法，令人「非常懷疑」。¹⁷⁴由此可見，河北省委所代表的地方黨務系統與特科系統不僅是平行的兩套組織系統，而且後者的地位甚至還在前者之上。

大約就在陳賡來到北方期間，出現了一個迄今為止仍不甚爲人了解的中共華北特委（又稱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從名稱可見，此一組織就是特科系統的一部分。而且，令人值得玩味的是，該組織的參與者十之八九都是在北方上層社會間有著廣泛關係與深厚之影響力，且在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前後被開除出黨或叛變的舊幹部。如擔任該特委組織部長的蕭鳴（實際上也是該特委的主要領導者）便在不久前因爲參與籌備處的緣故而被開除出黨，沒想到才不過幾個月的光陰，他竟然成了華北特委的領導者。¹⁷⁵另一個與蕭鳴同樣因反

172 〈栾芳關於北平的報告〉（1931/08/31），《河北文件 7》，頁 240。

173 穆欣，《陳賡大將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122-123。

174 〈河北省委關於各地工作狀況給中央的報告〉（1931/09/26），《河北省委 7》，頁 246。

175 胡華，〈蕭鳴〉，《中共黨史人物傳》，卷 20，頁 340。

抗四中全會、投靠籌備處而被開除出黨的趙作霖，他不僅是華北特委的成員，還是托派彭述之、任曙、耿炳光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北方區」的一份子。¹⁷⁶ 其他如參加蕭鳴所成立且不被中央承認的北平市委之籌備處份子冀丕揚、王定南(王作賓)、袁行莊(袁靜)等人，也都是華北特委的成員。

除此之外，華北特委還吸收了很多河北省委不要的人。如前面提到的籌備處領導並被開除出黨的張慕陶和吳化之，他們在1931年4月8日與河北省委陳原道等人一同遭到逮捕，後來也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在獄期間，張、吳脫離籌備處，並與共產黨員合作，故被允許恢復黨籍。¹⁷⁷ 後來張、吳兩人也做了聲明，¹⁷⁸ 回到省委工作。但省委還是很瞧不起他們，張等人也不欣賞省委。如在對高蠡暴動的評價上，張慕陶批評該暴動是省委盲動情緒下的軍事陰謀，¹⁷⁹ 而如前述，省委當時雖然承認他們在該暴動中犯了「左」的錯誤，但也反駁說「只有取消派、右派才認為這次游擊運動是盲動」。¹⁸⁰ 隨後，兩者間的關係每況愈下。據云，當時中央說要看張慕陶在群眾工作中的表現如何再恢復他的黨員資格，所以省委派他到天津去做下層群眾工作，但張慕陶不願意，要求離開平津；¹⁸¹ 後來省委又派他去做《反

176 〈河北省委關於省委組織、各地工作、取消派活動等給中央的報告〉(1931/11/23)，《河北文件 23》，頁 123-124。

177 〈河北鳴虎對張 XX 吳 XX 二人意見書〉(1932/09/19)，《河北文件 9》，頁 400-401。

178 〈張金仞申明書〉(1932/09/12)、〈華梓給河北省委的聲明書〉(1932/09/21)，《河北文件 9》，頁 367-369、402-405。

179 〈金人申明書〉(1932/10/25)，《河北文件 10》，頁 105-106。

180 〈河北省委關於蠡縣高陽游擊戰爭的總結〉(1932/11/15)，《河北文件 10》，頁 231。

181 〈河北省委關於元道湘農兩同志的錯誤及張金仞的黨籍問題致中央的信〉(1932/11/17)，《河北文件 10》，頁 258。

帝新聞》，張以為這是無聊之事不屑做，¹⁸² 請求回到他的家鄉陝西去從事紅二十六軍的運動，並建立西北蘇區，打通與蘇聯的聯繫。¹⁸³

有趣的是，西北蘇區計劃可不是張慕陶個人的痴人說夢。如前所述，在北方會議之時，中共中央即指示北方黨以紅二十六軍和陝甘蘇區為中心建立一個北方新蘇區。再者，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更早於1931年7月前後，共產國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派遣以王若飛（化名黃敬齋）為首的幾位中共黨員，從蒙古進入綏、陝一帶，成立西北特委，調查西北情形，「以寧夏為工作中心，建築軍事工作，組織游擊隊，漸漸成為紅軍」。¹⁸⁴ 當時跟隨王若飛回國的有前國民軍將領吉合等上層人物，他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打入下層，而是去策動烏審旗獨貴龍運動之首領孟庫爾吉與鄂托克旗之「張司令」等地方武裝首領，然後到陝北參加與協助陝甘邊紅軍的軍事工作。而且，根據吉合的回憶，他們與中共中央的聯繫只能經由王若飛一人，一旦失去聯繫，不要勉強去找，否則可能會發生極大的危險。¹⁸⁵ 由此可見，西北特委與蕭鳴的華北特委一樣，都是專門從事上層統戰和軍事、政治工作的「特殊」黨部，所以不能與地方黨部任意發生關係，而是直屬中央領導（西北特委在10月王若飛被捕後，因為沒有「關係」，所以吉合等成員四處星散，無工作可做）。而像張慕陶與吳化之等由中共中央刻意保釋出來從事「特殊」工作的黨員，他們也不歸河北省委等地方黨

182 〈河北省委致中央的信〉(1932/12/18)，《河北文件 10》，頁 414-415。

183 〈金仞意見書〉(1932/11/28)，《河北文件 10》，頁 276-279。

184 〈王若飛自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關山渡若飛：王若飛百年誕辰紀念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 7；〈內蒙平民革命黨田 XX 向前書的報告書〉(1933/07/01)，《河北文件 12》，頁 100、103。

185 吉合口述，徐建源、韓光整理，《我的革命生涯》（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頁 104-107、123-125。

部管轄，而是屬華北特委的成員。這也就是何以當陳原道直接致信張慕陶要他到上海找中央時，河北省委會「誤會」陳原道這種「超組織的」行動是錯誤的。¹⁸⁶而從隔年張慕陶被派赴馮玉祥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司令部擔任政治部部長一事看來，中共中央當時恐怕真的有事要找張慕陶。¹⁸⁷

無論如何，我們這裡要說的是，華北特委主要的工作就是從事北方地區的上層軍官工作，而且還直接接受中央特科指揮，並背著仍舊崇奉下層士兵路線之河北省委，私下活動。在隔年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爆發後，中央巡視員鄧發要求該特委「改進工作」，與地方黨部合作，但該特委竟答覆說：「根據我們工作的保密原則，如果得不到上級的指示，要把我們的情況告訴你們是不可能的。……要解釋所有這些情況是很方便的，【但】我們越進行解釋，我們就越違背保密的原則。」從這段話也可清楚了解華北特委的組織與工作性質，甚至不是任何代表中央的人皆可獲知其內部情形。當時鄧發對此雖無可奈何，也不得不說「這是對的」。¹⁸⁸

186 〈河北省委致中央的信〉(1932/12/18)，《河北文件 10》，頁 416。

187 另一個被河北省委拿來與張慕陶相提並論的武止戈也是個例子。武是陝西渭南人，1923 年在北京入黨，隔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李立三倒台後，共產國際派了包括武在內的一批人赴蘇區工作，但武在抵達瀋陽時即遭逮捕，一年後出獄，不久後到北平工作。當時河北省委對他頗不客氣，批評他還是與托派耿炳光等人來往，武也因此被迫做自我批評，並公開斷絕與托派的關係。但河北省委還是不相信他，不給他工作。武因為生活實在過不下去，懇求省委給他分配工作。他後來也是華北特委的成員，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吉鴻昌部中工作，1933 年陣亡。〈河北省委組幹與王建臣談話經過的報告〉(1932/08/23)、〈武止戈給河北省委申明書〉(1932/08/28)，《河北文件 9》，頁 214-219；〈武報告〉(1932/10/04)、〈武止戈要求分配工作致省委的信〉(1932/11/18)，《河北文件 10》，頁 6、259-260。

188 鄧發，〈關於張家口前線工作情況的報告〉(1933/06/18)，《河北文件 12》，頁 22-23。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當河北省委正痛斥那些在汾陽馮玉祥部內的黨員只從事上層軍官工作的同時，華北特委竟然透過趙彥卿、馮洪國等馮玉祥親信的關係和馮玉祥達成合作協議。根據自稱是華北特委領導人的吳成方及當代大陸官方學者的說法，華北特委不僅派蕭鳴去與馮玉祥接洽，而且他們在從事工作時不受「左」傾路線所限，甚至可任意運用幹部、發展黨員，也不用與地方黨部發生聯繫。¹⁸⁹

除了馮玉祥部外，在後來參與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其他部隊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華北特委的影子。以孫殿英部為例，如前所述，在中原大戰後，孫殿英部被改編為四十一軍，駐防山西晉城一帶。在九一八事變後，有一些共產黨員如宣俠父、南漢宸者在該部工作。1933年2月，孫部奉命赴熱河前線與日軍作戰，但旋即失敗，孫部退往沽源、沙城一帶駐守。¹⁹⁰ 在此之前，擔任孫部顧問的李錫九（即前述中共河北黨的創黨元老之一）力薦孫殿英任用韓麟符等人，因此孫乃向張學良請求保釋韓麟符。隨後，在未辦理任何手續的情況下，由張學良的機要秘書潘文郁（也是共產黨員）出面，經另一位前中共河北黨黨員李渤海（黎天才）主辦，釋放韓麟符及其小集團成員杜真生、鄭丕烈、李希逸等人，其中韓麟符到孫部擔任政訓處處長。¹⁹¹ 今天我們都說韓等人到孫部工作是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的結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韓麟符及其集團的成員（還有李錫九、宣俠父和南漢宸

189 吳成方，〈抗日同盟軍的醞釀和成立〉、劉涓迅整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大事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頁1-6、175-176；丘政權，〈察哈爾抗日前三年間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民國檔案》，1990年第1期（南京，1990年2月），頁93-100。

190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輯7，134-135。

191 周昶陸、趙志明，〈韓麟符的一生〉，《韓麟符》，頁63-64。

等前一、二年還在國民黨黨政軍機關中做事的人)，當時到底是不是共產黨員，無從證實。就算他們是共產黨員，但他們的立場也如同前面談到的張慕陶等人般，被崇尚群眾路線之一般地方黨部（如河北省委）瞧不起，而只能在華北特委之指揮下做上層統戰。如根據當時河北省委的文件所云，至遲於 1932 年 10 月時，孫部中已有一大群托陳派、第三黨、改組派份子活動，另外還有韓麟符的「韓派」透過該軍副軍長的主要助手張存真從事活動，故該派在孫部中勢力不小。在當時河北省委眼中，韓麟符這些人不是什麼共產黨員，而是「冒牌共黨」。¹⁹²不過，令人諷刺的是，後來也是在這些「冒牌共黨」的關係下，才會有部分的孫部隊伍投靠抗日同盟軍。

三、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

現在就讓我們來談一談著名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的經過。

1932 年 7 月，日本關東軍藉口其特務人員石本權四郎在熱河失蹤，進兵熱河，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張學良因此辭職，隨後國民政府再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仍由張任分會委員長。同年底，日軍大舉進攻熱河，熱河省主席湯玉麟告急。隔年初，山海關失陷，國民政府為示抗戰決心，乃調于學忠、商震、宋哲元、萬福麟、湯玉麟等軍團分別鎮守熱河與冀東地區，但情勢仍對中方不利。迄 1933 年 3 月，熱河重鎮承德、赤峰等地皆告失守，湯玉麟遁走，張學良再度引咎辭職，國民政府乃委何應欽為分會委員長。然國軍仍節節敗退，迄 5 月中旬止，日軍已連陷冀東諸縣，並進抵位於天津、北平間的香河一

192 〈張 XX 同志在孫殿英部中工作歸來後之報告〉（1932/10/10）、〈銳與李、閻君談話經過〉（1932/10/10），《河北文件 10》，頁 48-53。

帶。不過，日本天皇只准關東軍佔領熱河，不准其染指河北，關東軍因此北撤。隨後，國民政府於同年5月設立以黃郛為委員長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並派何應欽與日方簽定塘沽停戰協定。根據此一協定，冀東十九縣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中、日雙方之軍隊皆不得進入，中國從此喪失對冀東地區的統治權。¹⁹³

針對此一局勢的發展，中共河北省委提出「武裝保衛平津與河北，擴大民族革命戰爭」，和建立「民眾政權」等口號。¹⁹⁴此一「民眾政權」的口號，反映了中共當時對「中間派」的緩和態度。還在不久前，中共便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對外宣稱準備與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保證民主權利和保障民眾創立武裝義勇軍的任何武裝部隊訂立抗日、反國民黨的作戰協定。¹⁹⁵但是，可不要誤會了，「民眾政權」的提出並非意味著取消「蘇維埃政權」，它只是用來幫助蘇維埃政權吸引更廣泛的「落後」工人群眾和小資產階級；至於擴大民族戰爭還是需要加強黨的領導，以保證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在反帝運動中的領導權。¹⁹⁶這也就是說，任何欲與共產黨簽定「作戰協定」的武裝部隊皆必須先臣服於黨的領導。當然，這只是中共自己的期許。後來察哈爾事件中與中共結盟的軍隊，就沒有全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在熱河抗戰失敗後，許多地方義勇軍和正規國軍隊伍由於害怕南撤長城可能遭到繳械的命運，故皆向西逃竄，致使察省成爲「雜軍」

193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256-258。

194 〈河北省委關於目前河北戰爭形勢與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1933/01/15），《河北文件11》，頁9、16。

195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1933/01/17），《中央文件9》，頁458。

196 〈河北省委關於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們的中心任務〉（1933/02/05），《河北文件11》，頁70-91。

匯聚之地。據時人的研究，當時匯聚察省的雜軍主要有駐在多倫一帶的前東北義勇軍馮占海部、駐在沽源一帶的孫殿英部，與集結在豐寧以西的湯玉麟部等軍隊。¹⁹⁷而察省在不久前還是西北軍宋哲元的地盤。宋哲元，山東樂陵人，馮玉祥嫡系出身，在辛亥革命前便已跟隨馮玉祥闖蕩江湖，是西北軍的主帥之一，曾先後擔任熱河省都統及陝西省政府主席等地方要職。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宋跟隨馮玉祥一同反蔣。戰事結束後，西北軍將領多下野閒居，西北軍舊部亦被縮編成一個軍，由宋哲元擔任軍長，張自忠、馮治安擔任師長，此即廿九軍的由來。1932年9月日軍入侵熱省前夕，宋哲元被調任察哈爾省主席，其所率領之廿九軍亦隨之進駐察省。隔年2月，宋奉命率部赴前線作戰，由佟麟閣接任察省主席。¹⁹⁸那時，馮玉祥也留滯在察省。如前所述，馮在中原大戰後先是蟄居汾陽，辦了一個汾陽軍事學校，並與共產黨密切往來。1932年3月，馮跑到泰山，在其舊部韓復榘的庇護下「讀書」；同年10月，馮又到張家口依附前下屬宋哲元。實際上，馮自從中原大戰以後，一直斷斷續續地暗中推動反蔣運動，並積極與各反蔣份子如李烈鈞等串聯，當時駐防察省的雜軍如孫殿英、馮占海等部，亦是馮的串聯對象。¹⁹⁹至於宋哲元留在察省擔任警衛的彭國政團以及察省代主席佟麟閣，皆與馮暗通款曲，他們後來也都參加了抗日同盟軍，其中佟擔任抗日同盟軍第一軍軍長，彭則係第一軍第一師的師長。

197 李君山，〈論一九三三年之「察馮事件」——以「軍閥政治」觀點之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期60（臺北，2004年5月），頁166-169。

198 馬先陣等編，《西北軍將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1-12。

199 李君山，〈論一九三三年之「察馮事件」——以「軍閥政治」觀點之考察〉，頁173-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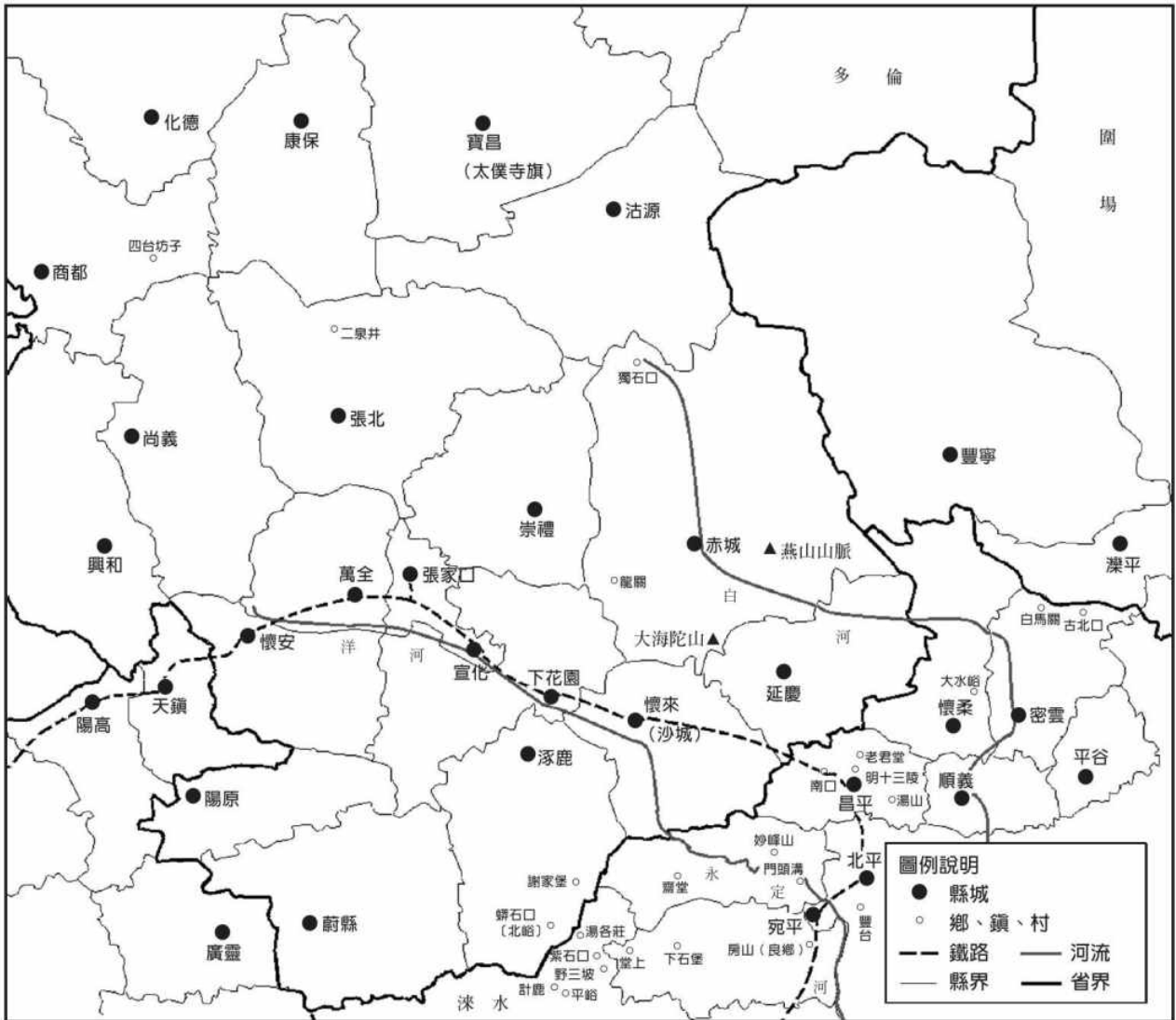
另外，馮玉祥還致電由汾陽軍校學員組成的「教導團」和駐在介休、孝義的鮑剛與張人傑部一同北上「抗日」，其中教導團在名義上亦屬廿九軍，鮑、張二人則是方振武舊部，由於方部在1926年時曾被編成國民軍第五軍，故也算是「西北軍」出身者。方振武後來投靠蔣介石，但於1929年以陰謀反蔣被軟禁於南京，其部隊於中原大戰時投靠馮玉祥，並在戰事結束後隨馮部駐在晉西汾陽、介休、孝義一帶。九一八事變後，與胡漢民一起被幽禁在湯山的方振武隨胡等人同時被釋放，方在被釋後即前往山西與馮玉祥「串聯」。但鮑剛等人原本便對馮的計劃興趣闕如，甚至方最初也不太願意北赴察哈爾抗日，後來雖勉強北上，但鮑剛在中途即退出，僅剩張人傑一師和鮑師的張中孚團抵達察省。而張人傑亦桀驁不馴，故方振武實際上無甚力量。²⁰⁰ 無論如何，就在汾陽軍校教導團、方振武殘部，以及吉鴻昌帶來的一些人馬抵達後沒多久，²⁰¹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於1933年5月26日正式宣告成立，馮玉祥通電就任同盟軍總司令。

當此之際，中共河北省委也派了一些人去工作，並在1933年5月時成立了一個以柯慶施為書記的前線工作委員會（前委），其主要工作就是積極爭取下層工農士兵群眾，開展他們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揭穿馮玉祥這些假群眾力量以擴張自己勢力之軍閥官僚的面具。然而，前委很快就發現，在各部隊中還有一個以張慕陶為代表的「華北特委」系統在從事活動。張慕陶是被華北特委派到馮部擔任抗日同

200 阮玄武，〈方振武生平〉，《安徽文史資料》，輯20（合肥，1984），頁78-80；喬明禮遺稿，〈方振武北上抗日和方吉聯軍的失敗經過〉，《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頁84-87；李君山，〈論一九三三年之「察馮事件」——以「軍閥政治」觀點之考察〉，頁176-177。

201 〈河北省委關於張家口的行動經過及工作佈置給中央的報告〉（1933/06/17），《河北文件12》，頁7。

圖 3-3 張家口地區圖



盟軍司令部之政治部工作，其地位之高及影響力之大，無庸置疑。另外，前委也在孫殿英部中發現專門做上層活動的韓麟符派，但最初前委只把他們當成「反動派」而不是共產黨員，²⁰² 後來才發現他們也是屬於「特別部（special department）的同志」，這些人拒絕移交工作給前委。²⁰³

這些「特別部的同志」不僅在組織系統上與前委互不相屬，他們的工作路線也與前委的士兵路線不同，是以馮玉祥等上層軍官為中心，試圖推動馮等人與南京的混戰，使共產黨從中漁利。似此種一切都是為了聯絡軍閥並擴大其間矛盾的「特科工作路線」，被當時前委譏為「西瓜政策」。²⁰⁴ 與此相對，主張動員群眾並揭露馮玉祥等軍閥官僚面目的前委路線則被稱為「紅蘿蔔主義」。前者裡紅外不紅，後者裡外皆紅。不過，由於同盟軍的領導權從一開始就掌握在馮玉祥等軍閥的手裡，共黨的影響力相當薄弱，故前委儘管反對張慕陶與馮玉祥妥協，但其本身往往也不得不迫於客觀環境，放棄擁護蘇維埃與紅軍的口號，而實際上採取了「西瓜政策」。²⁰⁵

在 1933 年 6 月底、7 月初，同盟軍先後占領張北、沽源等縣，吸收東北義勇軍鄧文、李海青等駐在鄰近地區的雜軍，以及張北縣地主張勵生所組成的地方隊伍等各路人馬，逐漸擴張勢力。當時同盟軍中與共產黨有密切關係者是由王沛南（王霖）擔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師（即汾陽軍校教導團改編者），以及由宣俠父、許權中分別擔任師

202 〈Wang. 關於 XX 軍 117B5R 的報告〉（1933/05/26），《河北文件 11》，頁 385。

203 鄧發，〈關於張家口前線工作情況的報告〉（1933/06/18），《河北文件 12》，頁 18。

204 〈關於河北前委的材料〉（1933/10/18），《河北文件 12》，頁 224-225；〈河北前線負責人關於察哈爾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34/01），《河北文件 13》，頁 95。

205 〈河北省委關於張家口的行動經過及工作佈置給中央的報告〉（1933/06/17），《河北文件 12》，頁 9-11。

長的第五師和第十八師，另外在李海青的騎兵第五、第六師中也有相當的共黨勢力。

然而，伴隨著同盟軍的逐漸擴張，其內部的分裂也愈益顯著。一方面，柯慶施所領導的前委不斷在同盟軍內部發動士兵鬥爭，還動員各地群眾召開大會、建立救亡會等組織（其高潮是7月25日召開的華北禦侮救亡代表大會運動），這些行動當然使得馮玉祥等軍官和共產黨間的關係更加尖銳化起來。²⁰⁶ 另一方面，當時同盟軍內部也存在著向北與向南發展路線的爭執。事實上，河北省委從一開始就希望同盟軍南下經涿鹿、懷安、宣化、懷來等地到蔚縣、平漢線一帶發展，但當時吉鴻昌等將領卻主張向北發展，蓋根據前委所言，他們打算把部隊拉到北邊去與日本合作。²⁰⁷ 原來，當時同盟軍內部支持北向與日本合作者並不在少數，如馮玉祥本人在同盟軍成立前後便曾積極與日本「串聯」；而據鄧發所言，當時中共特科人員也曾向馮玉祥建議派某位叫「張根英」（疑為張金仞——即張慕陶之誤譯）者去與日本聯絡（他們還舉出蘇聯的布列斯特合約為例來說服馮玉祥），試圖藉此為同盟軍和共產黨爭取更多的時間去從事工作。²⁰⁸ 尤有甚者，根據河北省委所言，當時前委對於南下路線也相當懷疑，蓋他們不知道到了平漢線以後要靠什麼生存。因此緣故，河北省委乃積極策動保定、石家莊、定縣為中心的平漢線游擊戰爭以響應同盟軍南下。然而，由於省委組織部長阮錦雲被捕叛變導致7月的省委大破壞，及

206 〈河北前線負責人關於察哈爾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34/01），《河北文件 13》，頁 104-108。

207 〈河北前委關於省委最近指示的討論〉（1933/07/03），《河北文件 12》，頁 89-91。

208 鄧發，〈關於張家口前線工作情況的報告〉（1933/06/18），《河北文件 12》，頁 23-24。

隨後 9 月省委秘書陳竹君的叛變導致的另一波大破壞，省委本身自顧不暇，冀中黨也因陳竹君（來自冀中的幹部）的叛變而被破獲，所謂平漢線游擊戰爭當然也就無從實現了。²⁰⁹

隨後，由於傾向同盟軍的孫殿英四十一軍奉命向西開往包頭（韓麟符亦隨之而去），²¹⁰ 代表南京方面的馮欽哉、龐炳勳等部開入察省南部，同盟軍主力乃向南集中在張家口、宣化、龍關一帶，以應付國軍的圍剿。當此之際，馮玉祥竟然於 8 月 5 日公開宣佈下野，共產黨與吉鴻昌、方振武等諸將領不得不再率領剩餘軍隊北撤至張北一帶。8 月 24 日，同盟軍在張北二泉井召集會議，成立了由柯慶施、張慕陶、吉鴻昌等七人擔任常委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專負「軍事指揮」，並一致確定了向南發展的路線。但應走哪條路向南發展，意見依舊分歧。原來張慕陶與劉桂堂等將領早在獨石口時便曾開會決定要經獨石口到平北一帶「討賊」（用「討賊」取代「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因為方振武等將領反對提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但前委則以該路線不安全（實際上也是反對張與同盟軍等將領勾結）而反對之，適逢駐在商都的高樹勳部表示希望與同盟軍一齊行動，故最後同盟軍乃決定由

209 〈小何給陳的兩信〉(1933/10/04)，《河北文件 12》，頁 184-185、188-189。

210 韓麟符隨孫殿英部到包頭後，中共內蒙特委也對其充滿敵視態度，批評「右派韓麟符」協助孫殿英欺騙利用士兵，阻礙中共在孫部內的士兵工作。然而，內蒙特委沒有解釋的是，韓在孫部裡培育的學生隊，卻是中共較有基礎的團隊。〈小王關於綏遠工作的報告〉(1934/03/19)，中央檔案館等編，《內蒙古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8，下文引用的《內蒙古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內蒙文件》），頁 258-259。由此看來，韓麟符與中共一直存在著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順便一提的是，當時與韓一同在孫部裡活動者，還包括李錫九、呂職人等早期中共天津黨員，他們也隨孫部一起到包頭活動。1934 年孫部覆滅，韓麟符回到山西榆次老家，同年被前中共熱河黨員後叛黨的鄭丕烈槍殺。周昶陸、趙志明編著，《韓麟符》，頁 406。

商都南下。²¹¹

可是，當時部隊早已因馮玉祥歸誠中央而動搖不安。與馮玉祥、張慕陶關係甚好的王沛南第二師及東三省土匪出身的騎兵第六師等部先後叛變，方振武、劉桂堂等部也留滯獨石口，前委只好率領宣俠父第五師與許權中第十八師獨自西進。但於途中接到高樹勳的來信表明其不能參與同盟軍的苦衷，加上經商都南下之路已被封鎖，同盟軍乃在抵達四台坊子（9月2日）後又折回去。當此之際，方振武、劉桂堂、湯玉麟又說熱察邊境混亂，同盟軍可經獨石口南下經熱察邊境以出平北，擺脫宋哲元的追軍。同盟軍在此一前無出路、後有追兵的窘態下，終究還是走上了經獨石口南下之路。然而，到獨石口後，前委才發現方、劉、湯等人早已與吉鴻昌在9月10日召開了一個「四頭會議」，改組成立「討賊軍」（最後還是沒提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爲了便利軍事行動」起見，前委最後決定在表面上暫時採取「西瓜政策」，但仍須堅持群眾鬥爭的「紅蘿蔔主義」，並且在9月12日以開除張慕陶、王沛南等人的黨籍以示其政治上的毫不動搖。²¹²

共產黨當時雖然在名義上仍與方振武、吉鴻昌合作，但兩者間實際上早已貌合神離。在獨石口會師後，共產黨的軍隊跟在方振武等軍隊的後面向北平前進。當方部於9月中、下旬在前線作戰並先後占領懷柔、密雲等縣時，共產黨竟然在懷柔縣前的大水峪向西繞道，企圖

211 〈河北前委關於前線工作的報告〉（1933/10/16），《河北文件 12》，頁 212-213；〈河北前線負責人關於察哈爾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34/01），《河北文件 13》，頁 114-115。

212 〈河北前委關於前線工作的報告〉（1933/10/16）、〈關於河北前委的材料〉（1933/10/18）、〈劉少文報告〉（1933/12/03），《河北文件 12》，頁 216-218、226-227、338-342；〈河北前線負責人關於察哈爾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34/01），《河北文件 13》，頁 116-120。

乘方部拖住國軍之際，經昌平縣的老君堂，通過南口、昌平之間越過平綏鐵路往南去。但計劃未成，最後只好跟著吉鴻昌、方振武向東經小湯山、過順義，前往冀東。10月10日，同盟軍走到白河前，因為水深無法渡過，暫時駐紮該地。隔天，敵軍追至，雙方開戰。再隔天，同盟軍全軍覆沒。²¹³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至此終告落幕。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正如河北省委日後所評論般，儘管馮玉祥等軍官和「右派份子」張慕陶妥協出賣，但前委實際上也未能堅持其「紅蘿蔔主義」，而是「一貫地在盡量爭取現在局面的延長，不由我們分裂的機會主義路線下做消極的活動」。也就是說，當時前委和右派張慕陶都是「西瓜政策」者，忽視與放棄艱苦的下層群眾運動，而與上層軍官妥協。²¹⁴ 總而言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依舊是一場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單純軍事行動而已。

四、鐵夫路線之爭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表明了，中共中央表面上左傾，但事實上為現實的考量，也不是完全拒絕上層統戰。可是，上層統戰理論上仍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並在過程中建立下層群眾基礎。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的華北特委與前委，則是把西瓜政策推行到極端，乃至放棄黨的領導與建立群眾基礎的努力。這一點當然不能為中共中央所接受，也引起地方黨員的反感，因為後者從來堅持群眾路線，他們根本無從知曉有華北特委此一獨立系統，更不贊同上層統戰的必要性。抗日同盟

213 〈劉少文報告〉(1933/12/03)，《河北文件 12》，頁 343-345；〈河北前線負責人關於察哈爾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34/01)，《河北文件 13》，頁 121-124。

214 〈河北省委關於前線工作報告的總結〉(1933/12/25)，《河北文件 12》，頁 396、412。

軍的失敗在這些人看來，完全是河北黨長期以來官僚主義墮落的結果，如曾任河北省委宣傳理論舵手的李鐵夫便是這樣認為的。

李鐵夫，朝鮮咸鏡南道人，原名韓傳鑒，又名胡國明，朝鮮共產黨出身，曾在上海工作，後任北平反帝同盟書記。根據河北省委於1932年10月時所言，當時李才剛出獄不久，他在過去一年中雖曾犯過許多錯誤，但亦有成績，且忠實積極，故省委有意重用他。²¹⁵ 隨後李也擔任了省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等職，是河北省委主要的理論打手，專門在河北省委黨報《北方紅旗》上撰文批判那些已被驅逐出黨的托派、取消派。²¹⁶ 而從後來李鐵夫所發表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李在革命的理論上確實有一定程度的造詣。

當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於1933年5月爆發後不久，河北省委也由於組織部長阮錦雲等人的先後叛變而遭致一連串的破壞，包括李鐵夫與省委書記趙聲在內的所有省委成員幾乎全遭逮捕，直到該年10月在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化名田夫）的主持下才重新恢復河北省委。而李鐵夫在被捕至南京後不久，由於其朝鮮友人的營救，旋即出獄，並輾轉回到了河北省委。由於切膚之痛，李在回到河北後不久即針對黨內叛徒問題寫了一篇〈關於黨內問題的幾個意見〉。他認為這些黨內暗探都是那些利用中共在入黨限制上的模糊性而混進來的「階級異己份子」。這些階級異己份子常常以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阻礙著正確的國際路線之執行，一旦面對反動階級的尖銳進攻

215 〈河北省委關於高蠡平漢線游擊鬥爭情形及省委人員工作分配情況致中央的信（第六號）〉（1932/10/03），《河北文件10》，頁4。

216 鐵夫，〈事實在無情的打著取消派的嘴巴〉（1932/11/28），《河北文件10》，頁285-302。

時，他們就會走上叛變之途。²¹⁷ 河北等白區黨所以經常發生叛變，正是此一緣故。

當代中共官方學者咸認為李鐵夫的言論是針對四中全會以後王明的左傾路線而發，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蓋李鐵夫不僅讚揚四中全會路線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還宣稱 1932 年北方會議後所揭櫫的北方蘇維埃路線（該路線在當代中共官方黨史中被定位為王明路線的表述）是正確的。而這些正確的路線所以未能實現，同樣也是那些只會包辦、命令群眾運動的官僚主義階級異己份子搞的鬼。²¹⁸ 「高麗李」又認為，河北黨的組織系統本身就是官僚主義的體現，黨的領導都帶著無所不知的高傲態度來對待下層黨員，而下層黨員及他們所提出之正確意見也因此遭到打壓。²¹⁹ 這些官僚的省委領導既不願意去接近群眾，也只是在口頭上空喊著打倒國民黨、奪取政權等根據其主觀臆測所得出的口號，如此當然就難免出現「左」傾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錯誤，²²⁰ 抹煞了群眾「德謨克拉西」的要求。²²¹ 因此，李鐵夫主張當時的中共必須要毫不迴避地徹底執行黨內鬥爭與自我批評，²²² 打破黨的關門主義，向無產階級的覺悟份子開門，把階級異級份子趕出去。²²³ 最好莫過於召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或臨時擴大會議，²²⁴ 來個徹底的整黨。如此一來，黨才能真正步上布爾什維克化

217 高麗李，〈關於黨內問題的幾個意見〉（1933/11/20），《河北文件 12》，頁 289-308。

218 高麗李，〈關於黨內問題的幾個意見〉（1933/11/20），《河北文件 12》，頁 289-308。

219 高麗李，〈關於官僚主義的嚴重性〉（1933/12/25），《河北文件 12》，頁 374-388。

220 鐵夫，〈左傾機會主義的反動性〉（1934/01/20），《河北文件 13》，頁 32-44。

221 〈河北高麗李文章之四〉（1934/01/21），《河北文件 13》，頁 45-53。

222 〈河北高麗李文章之五〉（1934/01/23），《河北文件 13》，頁 54-63。

223 鐵夫，〈轉變基礎和反關門主義的問題〉（1934/01/24），《河北文件 13》，頁 64-72。

224 高麗李，〈關於目前整頓組織的幾個意見〉（1933/12），《河北文件 12》，頁 434。

之途，並貫徹正確的國際與四中全會的路線。

李鐵夫的看法，事實上也有一定道理。正如本文所一再強調，共產黨員在實際動員群眾的過程中，往往更傾向於依賴上層政治、軍事的手段，而不是下層群眾的動員，如此一來，共產革命難免就流於合法、和平運動或單純的軍事行動之途。僅就河北省委時期的群眾運動來說，高蠡暴動與冀南磁縣游擊隊就是單純軍事行動的最好例子，其中如高蠡暴動也是經常被李鐵夫用來證明省委官僚主義化的例子。再者，剛結束不久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也是一場缺乏群眾基礎的單純軍事行動。在對此一事件的評價上，李鐵夫與河北省委同樣都認為該事件是由於群眾反日情緒的高漲所致，兩者同樣也都同意馮玉祥等軍官是投機的軍閥（李鐵夫還批評馮是蟄居在張家口的「反動怪物」），而且都承認右派張慕陶在該事件中起了阻礙的作用。不同的是，省委認為前委在路線上是正確的，只是在實際的執行中未能堅持，以至流於軍官路線之途；李鐵夫則以為前委的路線根本就是錯的，因此不能把前委與張慕陶兩者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前委從頭到尾都是「西瓜政策」者），還說前委的官僚主義、機會主義錯誤原來也是整個河北省委的固疾，所以省委和該事件的失敗也脫不了關係。²²⁵

正因為「鐵夫路線」反映了一定事實，所以當時黨內也有不少人贊同他的看法。如1934年初擔任河北省委書記的孟堅（孟用潛）不僅贊同李鐵夫的看法，還說他「在組織上、政治上是有保證的，並且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幹部」，故建議讓他參加省委工作。²²⁶

225 省委與李鐵夫對察哈爾事件的評論分別見：〈河北省委關於前線工作報告的總結〉（1933/12/25），《河北文件 12》，頁 389-423；鐵夫，〈關於河北省委前線黨工作報告的總結的檢討〉（1934/02/04），《河北文件 13》，頁 133-177。

226 仲良，〈河北省委組織報告（作為省委工作檢討的補充）〉（1934/02/23），《河北文件 13》，頁 339。

然而，在中共中央聽起來，鐵夫路線毋寧相當刺耳。一方面，中共中央誤會了李鐵夫的意思，以為李不贊同蘇維埃的路線，否認當時中國革命的高漲形勢，所以中央批評李鐵夫是右傾取消主義者（當時孟堅即為李鐵夫的被曲解為他叫屈，但孟本人也因此遭到警告）。²²⁷再者，即使承認李鐵夫在路線上並未與四中全會路線衝突，但按照他的看法，正確的四中全會路線從來也只是紙上決議而已，三年多來的黨務也沒有進步，甚至整個黨的領導機關皆為異己階級出身的官僚主義份子所掌握，這無異於否認了當時整個中國黨存在的意義，其最終也必然如取消派、右派份子般走上反黨的道路。²²⁸所以，鐵夫路線被指責是「偷運托陳取消派和羅章龍、張慕陶右派的私貨」之「新取消主義」，²²⁹李鐵夫與其愛人張秀岩（時任天津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也因此被打入冷宮，生計上遭到嚴重困難。直到1936年春劉少奇前來領導北方工作後，李鐵夫才再度被重用，被任命為天津市委書記，但其本人在一年後即病逝。²³⁰

李鐵夫指摘河北黨領導是官僚主義者，與當代西方學者和中共官方學者關於抗戰前中共領導是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批評，如出一轍。不同的是，李鐵夫主張在維持黨的領導與布爾什維克精神下發動群眾，當代西方學者則否定了黨的領導與共產主義革命，以為任憑群眾和地方黨員依照既存的地方網絡與關係去行動，革命才能成功。但是，察

227 〈中央致北方代表石心及河北省委的信〉（1934/03/30），《中央文件10》，頁169-170、174；仲良，〈河北省委組織報告（作為省委工作檢討的補充）〉（1934/02/23），《河北文件13》，頁341-345。

228 〈河北省委討論鐵夫同志問題的提綱〉（1934/02/26），《河北文件13》，頁376-381。

229 〈河北省委關於反對鐵夫同志的新取消主義的決議〉（1934/03/01），《河北文件13》，頁396。

230 張秀岩，〈往事回憶〉，《河北文史資料》，輯8（石家莊，1981），頁74-77。

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已證明了，戰前中共統戰的失敗，不應完全歸咎於外來黨組織的高壓領導與左傾政策。因為那些與中共合作的將領，以及在軍隊中活動的黨員張慕陶等人，完全依賴既存的私人關係結合，桀驁不馴地自行其是，無視黨的領導，也沒有致力於發動群眾。這讓我們質疑，貶低外來黨組織領導的革命地方化，果真如西方學者所聲稱般，是革命致勝的關鍵嗎？

小 結

光田剛以為華北地區是一個為各派政治勢力所撕裂的「中間地帶」，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雖然試圖使其「中央化」，但最終仍不能不流於實質上的「分治合作」。中共方面也是要到 1936 年以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採取更「柔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獲得這些「中間派」的合作，才成為在此一「中間地帶」獲得勝利的「最後一人」。²³¹

確實，在瞿秋白、李立三與王明的領導下，中共中央也曾多次試圖加強「中央化」的組織紀律，但事實上未能駕馭華北黨內外的各派勢力，徒然加劇了既存的分裂傾向，乃至於引爆如順直省委事件或本章所介紹的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般的黨內衝突。但是，我們不應該因此得出另一個極端的結論，即以爲既然共黨不能駕馭這些黨內外的分裂勢力，最好的辦法就是縱容他們的存在，並與其妥協合作。過去李大釗、張慕陶領導時期的河北黨，以及察哈爾事變中的華北特委就是採取了此一辦法，結果只是失去了黨的獨立性，使自身捲入到各式各樣的地方派系衝突中，成了爲人作嫁的革命。所以統一戰

²³¹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頁 331-338。

線一定要能夠為黨所控制，否則黨就可能反過來被其統戰的對象牽著鼻子走。

但是，既然共黨和國民黨中央都沒辦法加強外來的由上而下的「中央化」於此一「中間地帶」，他們又如何可能駕馭那些中間派呢？關鍵就在於群眾動員與階級鬥爭。光田剛也注意到了分割華北地區的各派政治勢力是以一個為「紳士」階層所分裂的農村社會為基盤，²³²但他卻沒有進一步分析中共如何看待此一分裂的農村基層，僅是執著於「柔軟」的上層統一戰線。試問，如果中共也是像其他軍閥政權般，把黨國基礎建立在這樣一個分裂的農村社會之上，憑什麼認為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軍會成為華北地區此一「中間地帶」的「最後一人」呢？

所以，我們主張，共產黨必須再進一步依據其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分化既已被各式各樣「紳士」或團體，以及網絡或關係所撕裂的底層社會。只有經過此一過程，中共才能夠改造群眾，把群眾從那些「紳士」手中奪過來。這些被剝奪群眾基礎的「紳士」或「中間派」，在統一戰線中也就不得不任憑中共擺佈。這不是「柔軟」的，而是與「中央化」相輔相成的統一戰線。

光田剛與前述各式各樣強調革命「地方化」的學者，其論點最大的矛盾就在於，他們認為革命者推動適合地方情境的政策，或與地方「中間派」合作，是革命成功的關鍵（國民黨的失敗就在於太強調「中央化」，卻做不到）。可是他們又不能告訴我們在這樣一個分裂的中國社會中，中共到底要使政策適應哪個分裂的部分或與哪個派系合作，

232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頁 11-14。作者係根據陳志讓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79）與 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兩書得出此一觀點。

才算是「因地制宜」。結果他們就不得不得出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觀點，事實上無視中國社會既存的分裂性格。下文將批判的 Ralph A. Thaxton 關於冀南地區鹽民抗爭的研究，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第四章

抗戰前冀南地區的鹽民抗爭

1931–1937

在 1934 年鐵夫路線之爭後，由於不斷的叛變和國民黨的鎮壓，中共河北黨在平、津兩市中的組織基礎即使未完全崩潰瓦解，也已無能為力。隨後到抗日戰爭爆發期間，中共河北黨尚能有所作為的地區，主要是在冀東和冀南的農村地區。其中，冀東黨的發展我們將留待下章再行討論，本章所要探討的是抗戰前中共在冀南農村地區的活動及其與地方鹽民抗爭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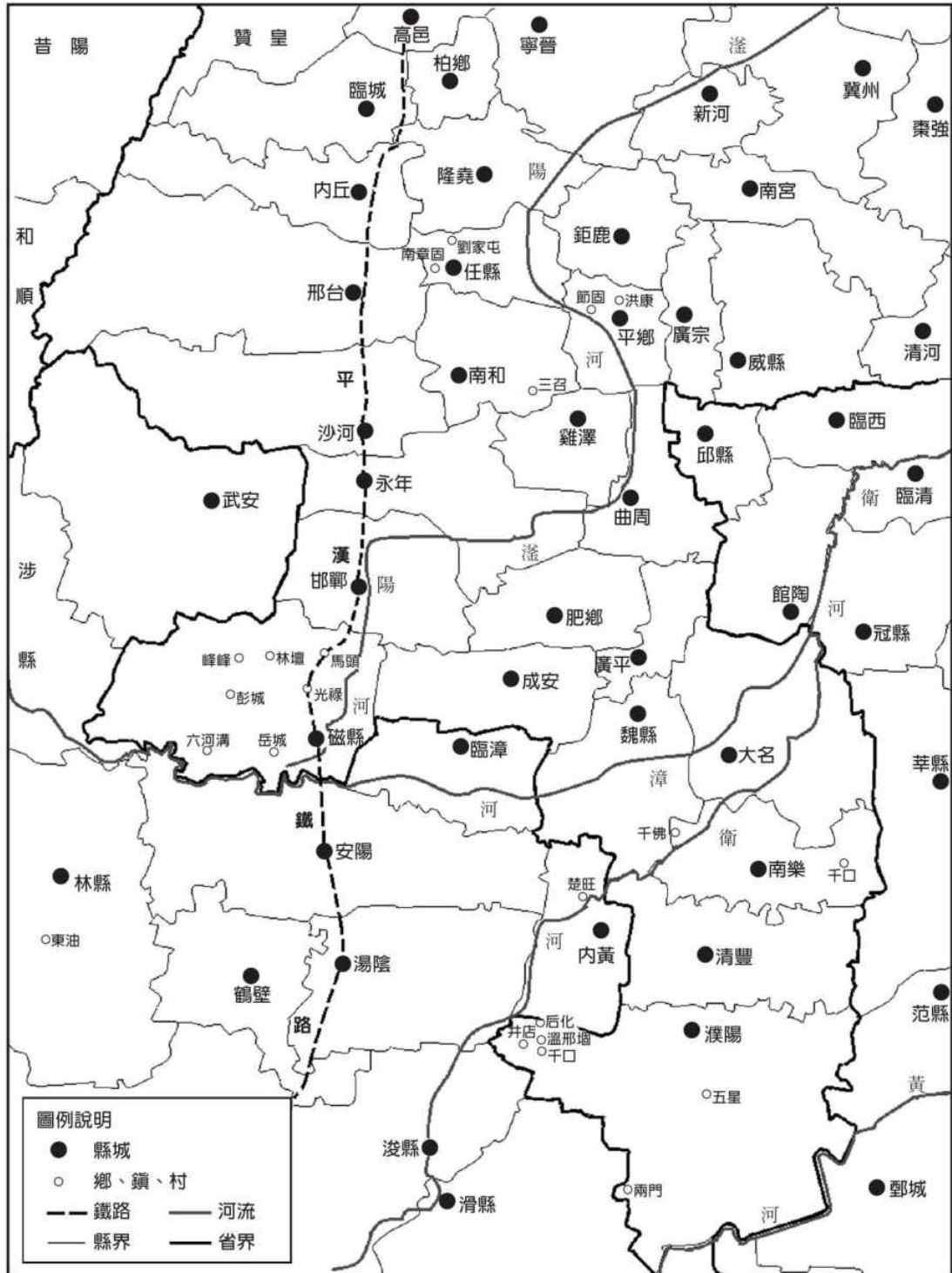
自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以來，河北（特別是冀南地區）及其鄰近諸省經常爆發「自發性」的鹽民抗爭（本文所指稱的鹽民，除特別說明者外，主要係指製販私鹽的民眾）。Ralph A. Thaxton 認為，鹽民製販私鹽及其抗爭的行動，本身更多地反映了當地社會既存的內在因素和動力，而不是外來之政治與軍事力量的作用。他主張一九三〇年代以來河北省所普遍發生的鹽民暴動，係由於在世界資本主義影響下、以蔣介石「財政家族」為首之現代化國民黨國家機械向農村更進一步伸出其魔爪，致使農村既存的社會結構與人際關係瓦解，農民從此更加暴露於國家貪婪的稅收機械之威脅下，生活日益困頓，以至最終不得不走上與國家長期對抗的結果。由於冀南地區是中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在華北地區主要的抗日根據地之一，因此，Thaxton 便把鹽民鬥爭與

共產革命聯繫起來，指稱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在此建立根據地，正是由於地方出身的下層黨員不顧上層「左」傾領導的反對，推動符合地方實際的政策，因此獲得了這些具有長期反抗國家機械傳統之鹽民的支持，並進一步把鹽民的經濟性抗爭轉變成反國民黨、反日的政治性抗爭，為日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及中共最終的勝利打下了基礎。¹

但是，我們認為，鹽民的苦難並不是直接來自於蔣介石的「財政家族」或世界資本主義之壓迫，毋寧是肇因於分裂的軍閥勢力。因此，鹽民即使由於生活困苦而經常發動自發性的抗爭，但這些抗爭往往只是短暫的地方性經濟抗爭，並不具有政治意味，也不是什麼社會

1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Thaxton的觀點是源自其師James C. Scott的「道義經濟學 (moral economy)」。Scott 在對東南亞地區的農民運動與共產革命的研究中指出，傳統東南亞農村社會中早已存在著階級分化，但由於對立階級間的關係受到一套傳統的道德倫理規範束縛（如地主有義務幫助佃農渡過難關），故矛盾並未激化到你死我活的鬥爭階段，農民也願意接受地主的支配。可是，自資本主義入侵以來，農業商業化發展，地主為追求利潤，不惜違反固有的道德倫理，對農民一味剝削。農民不僅喪失了地主的庇護，還進一步暴露在國家機械與世界市場的威脅下，生活無著，以至不得不起來發動抗爭以求回歸到過去的社會並謀得基本生存。Scott認為此正是東南亞農村社會一直動盪不安，也是共產主義運動在該地盛行的原因。Thaxton 在一九八〇年代時即據此理論探討抗戰時期中共太行山區的歷史，*Salt of the Earth* 也不脫此一論點。Scott 之看法，見：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Thaxton 對太行山區的研究見：Ralph A. Thaxton,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對 Thaxton 與道義經濟學的批評，見：陳永發，〈從 Ralph Thaxton 的研究論抗日時期中共在太行山區及其附近的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3（臺北，1984 年 6 月），頁 333–386；Yung-fa Chen and Gregor Benton, *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Critique*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86);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67.

圖 4-1 冀南地區圖



與國家的長期對抗。況且，國民黨政權並不總是一味的壓迫鹽民，他們也會採取積極的改革政策，甚至在抗戰以後還進一步與鹽民合作。至於中國共產黨固然同情鹽民的處境，並頗思利用鹽民的自發性抗爭來發展自身力量，但共黨的上層「左」傾領導本身既不滿足於這些暫時且自身分裂的地方性經濟抗爭，下層地方幹部實際上也較依賴外來的政治、軍事力量而不是鹽民群眾的動員。再者，即使戰前的共產革命確曾與鹽民抗爭進行過短暫的結合，但如果共產黨未能進一步給予其外來的組織領導與控制，這樣的結合是不會自發地生成革命運動。實際的情形也證明，日後的中共冀南抗日根據地本來就是更依賴外來的八路軍而不是地方的自發性群眾團體所建立者。

第一節 官鹽與私鹽

一、長蘆鹽區的沿革

民國時期承襲明清以來的傳統，在食鹽的產製、運銷方面皆有嚴格的規定，所謂「產鹽有定場，行鹽有定額，運鹽有定商，銷鹽有定岸」，正是近現代中國鹽業制度的最佳寫照。根據此一制度，全國被劃分為數個鹽區，其中河北省屬於長蘆鹽區。

長蘆鹽區乃中國主要的海鹽產區之一，其大致範圍為北起河北省臨榆縣界，南迄山東省海豐縣界。清初時期，長蘆鹽區共設有 24 處鹽場，後來陸續裁撤，迄 1919 年止僅餘蘆台、豐財等 8 場。但鹽產仍舊過剩，故復加以裁廢。一九三〇年代時，長蘆鹽區僅存座落於河北省寧河及天津兩縣境內的豐財場（下分塘沽、鄧沽、新河三區），以及位於寧河縣營城、寨上兩莊之蘆台場。根據 1935 年的調查，長蘆鹽區之總面積，包括廢場在內，計共 1 千萬餘畝，其中仍持續運作

的曬灘（長蘆鹽為灘曬）有 350 副。² 長蘆鹽區不僅產鹽量豐富，其產鹽成本亦相當低廉。一般說來，當時中國的製鹽方式可分為煎製及曬製兩種，其中曬製又可分為板曬及灘曬。長蘆鹽區是運用較便宜的灘曬之法，每擔只需 0.228 元之成本，而兩淮鹽區產鹽量雖較長蘆鹽區多，但其所運用之煎製（1.3 元／每擔）、板曬（1.31 元／每擔），甚至灘曬（0.47 元／每擔）之法所需的成本，皆較長蘆鹽高出數倍。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日本控制了長蘆鹽區，長蘆鹽由於其生產成本之低（2,500 厘／甓），受到日本人的高度重視。⁴

中國政府自西漢以來即設有鹽官管理長蘆區之鹽務。明朝洪武元年，朝廷在滄州長蘆鎮設置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長蘆之名乃由此而來。有清時期於天津設長蘆都轉鹽務使司，管理長蘆區鹽務。民國初年之鹽務管理系統採取二元制，設立鹽務署及鹽務稽核所，前者屬財政部管轄，負責鹽務行政事務；後者則是北洋政府以鹽稅為擔保與英、俄、德、日、法五國簽訂「善後大借款」的產物，其職責是在外國人的監督下，徵收、存儲鹽稅及放鹽。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仍承此制。不過，九一八事變後，南京當局為節省經費、增進辦事效率，決定由稽核所兼負鹽務署及各地鹽運使之職，稽核機關之職權乃愈形膨脹。⁵ 與此相應，長蘆鹽區在民國初年亦設置長蘆鹽運使分司及長蘆鹽務稽核分

2 土地委員會，〈鹽區土地調查報告〉（1935/1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蒐藏之全國經濟委員會檔案（以下簡稱全經檔）：26-01-39。

3 土地委員會，〈鹽區土地調查報告〉（1935/12），全經檔：26-01-39。

4 當時日人所佔據之各殖民地的產鹽成本，分別是：關東州 5,750 厘／甓、滿洲 3,430 厘／甓、臺灣 5,950 厘／甓。興中公司鹽業部，〈本邦工業鹽自給政策上北支鹽業開發重點之經濟的理由〉（1938），河北省檔案館：680-4-2607。

5 中國鹽業總公司編，〈中國鹽業史 近代當代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 58-60、95-100。

所。北伐時期，長蘆鹽務稽核分所一度停頓，至 1929 年 4 月始恢復。⁶ 隨後，長蘆鹽務稽核分所之職權也愈形膨脹。1933 年以後，長蘆鹽運使所管轄之行政及緝私等事務，悉歸長蘆鹽務稽核分所掌握，鹽務機構暫時走向統一。⁷

在食鹽的運銷方面，自明朝萬曆年間開始，長蘆鹽區即採用官督商銷的「引岸專商」制。由官府發給鹽商「引票」(運銷鹽的特許憑證)，規定「引岸」(銷區)和「引額」(銷量)。清朝年間，由於朝廷不斷需索等因素，鹽商紛紛破產，朝廷乃開始在部分地區實行官運官銷，並最終設立官運總局接管運銷。民國初年，軍閥勢力插足鹽運，組成包商專賣集團，相繼成立德興、裕蘆、合豐、利津等公司，接辦破產鹽商之引地，包辦長蘆鹽之運銷。此後直迄中日戰爭前夕，大體上仍沿此制。⁸

二、私鹽的產銷

不過，除了官鹽外，在地方下層亦廣泛流通著私鹽。所謂的私鹽，主要係指未向政府納稅之鹽或灌銷非指定銷售地區的官鹽。私鹽的種類繁多，其中廣泛流通於河北省的私鹽，主要有以下幾種：

- (1)場(灘)私：長蘆鹽場面積廣泛，其所能產製之鹽額較實際的銷售量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常有生產過剩之鹽留於鹽灘上，致開啓走私之門。如 1931 年漢沽及鄧沽兩場先後發生重

6 〈民國十八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蒐藏之鹽務檔（以下簡稱鹽務檔）：S-02-69-(1)。

7 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省志：鹽業志》（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頁 155-157。

8 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省志：鹽業志》，頁 114-115。

大的走私案，場警及官運經理處之官員亦牽涉其中。當時張學良甚至為此派衛隊常川駐守鄧沽，不料私犯仍是桀驁不馴，經常與駐兵發生衝突，如 1932 年便曾發生一起私犯圍剿並殺傷數十名駐兵的慘劇。⁹ 場私之為亂，由此可見一斑。

- (2)廢場（灘）私：長蘆鹽區產鹽之鹽場，在清初時尚有 24 場，隨後陸續裁撤，至民國初年時僅餘 8 場，並後續歸併為 2 場。那些被廢棄的鹽場，政府當局並未予以妥善處置，致有地方居民仍利用該廢場生產私鹽，此即所謂的廢場私。
- (3)鄰私：指侵灌長蘆鹽銷區之鄰近諸省所產的官鹽。由於長蘆官鹽之稅率為當時全國最高，故其賣價往往亦數倍於鄰近諸省所產之官鹽。鹽商及地方群眾有鑒於此，乃攜運鄰近諸省的官鹽至長蘆官鹽銷區販售。當時侵灌長蘆鹽銷區的鄰鹽，主要有來自山西的潞鹽、山東的魯鹽，而來自安徽的淮鹽亦侵灌長蘆鹽在河南省及冀南的銷區，嚴重影響了長蘆鹽的銷路。¹⁰
- (4)外私：指由日本等外國地區輸入的私鹽。當時侵灌長蘆鹽銷區的外私，主要是指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自東北及內蒙地區輸入的遼鹽及蒙鹽。
- (5)漁私：根據當時鹽法之規定，漁業用之漁鹽每百斤僅徵稅 0.3 元，低於食鹽數倍。因此，某些居住在沿海地區的非漁戶者，便借用他人之漁鹽摺，冒名赴漁鹽局領運漁鹽偷賣，此即所謂

9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民國二十一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1)。

10 銷於河南省之長蘆鹽稅率每擔 8.5375 元，較潞鹽（6.3）、淮鹽（8）、東鹽（6.3）為高，故蘆鹽在河南的銷區，常為鄰私所侵灌。甚至售於冀南地區的蘆鹽，由於稅率較售於河南者低（每擔 8 元），亦沖銷蘆鹽在河南省的銷區。見〈委員李佩恩呈長蘆鹽運使署〉（1934/06/18），河北省檔案館：680-11-765。

的漁私。¹¹

除此之外，尚有以鹹菜¹²等各種形式存在的私鹽。不過，在各種私鹽當中，以本文所欲討論之土私影響官鹽銷路最大。

土私，即土鹽，亦稱小鹽（官鹽稱大鹽），係地方居民收取富含鹽類土壤淋製所獲之鹽。當時一般坊間的說法把土鹽和硝鹽混為一談，但嚴格說起來，兩者並不相同。土鹽是鹽民為產鹽刻意淋製者，硝鹽則是硝民提硝的副產品。在成份上，根據南京國民政府於 1931 年 5 月所公佈之「鹽法」（為別於北洋政府時期之鹽法，時人多稱此鹽法為「新鹽法」）的規定，未含有氯化鈉（NaCl）85%以上之鹽，不得作為食鹽。¹³ 蓋鈉為人體必須之養份，係體液中重要的電解質，可保持體內水份（但過量之鈉會導致高血壓）。硝鹽所含氯化鈉比率較高，雖然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硝鹽所含之硝酸鹽（nitrate）會致癌，¹⁴ 但民國時期的專家並不清楚此事，所以認為硝鹽是合格的食鹽（但仍

11 〈交議提議各案暨報告調查事項草案〉（1934/06/29），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1。

12 鹹菜之影響官銷，茲以山東鹹菜為例。該項鹹菜傾銷冀省者，為數甚鉅，僅在秦皇島一地，每年即不下 30 萬斤。該鹹菜係以山東私鹽醃製，每斤僅售 3 分 7 厘，較廉於官鹽者倍蓰，致使官鹽銷路漸減。〈緝務會議紀錄〉（1934/05/11），河北省檔案館：680-11-739。

13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14 硝酸鹽在進入人體後，與唾液和腸道內的微生物發生作用，形成亞硝酸鹽。亞硝酸鹽在腸道內再與氮類物質結合，會產生致癌物質，導致食道癌與胃癌的發生。硝酸鹽經常存在於人們日常食用的食物中，如蔬菜本身即含有硝酸鹽，而栽種蔬菜所施用的肥料，更是提高了硝酸鹽的含量；熱狗、香腸等肉品醃製物的製造商為維持產品的色澤，往往亦會添加亞硝酸鹽。其他如地下水的污染，或工業廢料的排放，使得人們常常曝曬在硝酸鹽的威脅之下。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於 1970 年代所公佈成年人每日硝酸鹽的安全攝取量為 200-250 毫克，而現代人攝取的硝酸鹽量卻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陳玉梅、林宜昭，〈你每天吃多少硝酸鹽？〉，《康健雜誌》，期 17（臺北，2000 年 2 月 1 日），頁 78-79；謝曉雲，〈亞硝酸鹽、防腐劑、色素：熱狗裡藏著致病危機？〉，《康健雜誌》，期 60（臺北，2003 年 11 月），頁 184-185。

是非法的私鹽)。土鹽則由於本身所含氯化鈉有時不及 40%，而被禁止。¹⁵ 由於硝鹽與土鹽皆屬私鹽，兼之生產者身份與產地重疊，當時民間甚至官方文件中(如下文所引檔案名)把兩者混稱為硝鹽或硝土，但應該注意，硝鹽因是提硝的副產品，產量極少，主要困擾官方的私鹽應是土鹽。

土鹽主要產於中國北方，以河北、河南、山東最著，在江蘇淮北一帶亦有少部分之土鹽產地。此種分佈狀況，與氣候和土壤類型有密切關係。蓋華北平原之土壤是由河淤地和風移黃土組成，富含碳酸鹽、氯化鹽、硫酸鹽和硝酸鹽等鹽類。在雨量大且排水易之區域，這些鹽份除為植物所攝取外，餘者多隨排水流洩。然而，在如河北平原般雨量不豐且排水不易之低窪地區，鹽類不易排洩，往往聚積在土壤當中，以至形成大片的「鹼地」。

抗戰前河北省的土鹽產地，如表 4-1 所示，¹⁶ 大體上主要分佈於以下三個區域：(1)冀中潞瀧河流域；(2)冀南滏陽河流域；(3)冀魯豫邊界之漳河流域。潞瀧河源於太行山，流經博野、蠡縣、高陽諸縣而匯入大清河。該流域土壤每當乾旱之春秋二季時，由於土壤之毛細管作用，¹⁷ 鹽類聚積於土壤表面，成為白色粉狀體，因此生成大片「鹼

15 〈鹽稅與財政及地方治安之關係〉，河北省檔案館：680-11-1462；張子豐、張英甫，《河南省火硝土鹽之調查》(出版地不詳：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1932)。

16 土鹽既屬非法，其實際產量事實上是無法計算的。當時各處所得出之土鹽產量，多是依據縣政府之填報，而縣政府之填報又係依據區、鄉、村長調查而來。區、鄉、村長之調查，或憑鹽民片面述說，或竟以個人臆測，以圖敷衍了事，欲其精確，自不可能。〈據查報冀魯豫等省查禁硝土鹽工作應分別切實推進令仰籌議辦理具報由〉(1935/11/01)，河北省檔案館：680-6-1050。

17 土壤之毛細管作用即指土壤中的可溶性鹽類隨著上升水流的蒸發，積累與地表。一般說來，蒸發作用愈強，地表積累的鹽份愈多。龔子同等著，《中國土壤系統分類》(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頁 384。

表 4-1 河北省土鹽產地及其數量分佈表

| 產量（市擔） | 縣 名 |
|---------------|---|
| > 100,000 | 曲周 |
| 50,000-99,999 | 平鄉、雞澤、清豐、鉅鹿 |
| 10,000-49,999 | 隆平、濮陽、南樂、饒陽、高陽、武強、安平 |
| 9,000-9,999 | 邯鄲、深縣、任縣 |
| 8,000-8,999 | 蠡縣、寶坻、廣宗、靜海、任邱、博野、鹽山、徐水、清苑 |
| 7,000-7,999 | 定縣、獻縣、豐潤、定興、河間 |
| 6,000-6,999 | 撫寧、南皮、慶雲、新城、完縣、藁城、正定、寧晉、滿城、安新、安次、武邑、肅寧、滄縣、灤縣、雄縣 |
| 5,000-5,999 | 清河、大城、容城、威縣、樂亭、南宮、望都、新河、文安、昌黎 |
| 4,000-4,999 | 交河、冀縣、新樂、衡水、青縣、東光、武清、廣平、內邱、新鎮、南和、永清 |
| 3,000-3,999 | 寧河、宛平、大興 |
| 2,000-2,999 | 天津 |

資料來源：〈各縣土鹽產量估計表〉（1938年7月製，根據事變前長蘆鹽務管理局附設改良鹼地委員會調查），河北省檔案館：680-6-1115。

地」。¹⁸正如前章所述，導致高蠡暴動的一個可能因素便是私鹽問題。

除瀦瀧河流域外，滏陽河與漳河流域即位於本章所欲探討的冀南地區。滏陽河源於磁縣西部，經磁縣、邯鄲、曲周、平鄉、隆平等縣匯入白河。該流域鹼地之形成，實由於地勢低窪，使地下水面幾與地面相接。農民不知排水，且因灌溉水量甚微，爭相引水，致灌溉水常

18 〈遵部令會同考察冀南各縣鹼地情形暨擬具改良方案仰祈鑒核施行由〉，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與地下水面相接。每當春秋乾旱，水份逐漸蒸發，土壤毛細管作用將鹽質帶至表土，遂形成大片鹼地。¹⁹ 如在曲周、平鄉、雞澤三縣，其硝池之多，真如千巖萬壑，淋私之廢土堆，如山積延，袤綿互至五、七十里，橫十里、八里或二、三十里不等，並與隆平、鉅鹿、廣平三縣打成一片，而具歷史之深，問其土著，亦不知有若干年矣。²⁰ 其中又以曲周縣最爲惡名昭彰，是冀南諸縣私鹽產製之中心。²¹

另一個同樣也流經冀南地區的漳河，該河每於夏秋季經常氾濫，使清豐、南樂、大名等縣之低窪地區盡成澤國，鹽質聚積，鹼土遂生。根據 1936 年的調查，大名全縣地畝數約 2,673,199 畝，鹼地則有 29,618 畝，佔全縣地畝數 1.1%；再者，大名全縣人口 566,975 人，鹼民即有 25,065 人，佔全縣人口 4.35%，平均鹼民每口所有鹼地 1.18 畝，此數不可謂不驚人。²² 不過，與潞瀧河、滏陽河流域比較下，漳河流域之鹽質含量較低，若經常耕耨及施以肥料，並不難改鹼地爲良田。其中如大名之鹼地，即非因鹽質過濃致無法耕種，實由於農民因土鹽獲利甚厚，致使農田失其農業上之作用。²³ 論者有謂，當時河北之鹼土，可分爲天然與人工造成兩種。其中後者多是村民將淋過之土，復堆積利用而成。²⁴ 此種鹼土，並非富含碳酸鈉且完全不能耕種

19 〈遵部令會同考察冀南各縣鹼地情形暨擬具改良方案仰祈鑒核施行由〉，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20 〈稅警局長張中立報告書〉(1935/02/15)，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3。

21 〈調查員馮毓良報告 8 月 5 日至 12 日調查完竣情形〉(1932/08/12)，河北省檔案館：680-26-99。

22 〈大名技術分處七月份工作報告〉(1936/07/22)，河北省檔案館：680-6-1070。

23 〈遵部令會同考察冀南各縣鹼地情形暨擬具改良方案仰祈鑒核施行由〉，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24 〈呈文政字七〇〇號〉(1935/08/16)，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之黑鹼土，而是稍加改良、深耕後即可種植的白鹼土。根據調查，當時冀西南之鹼土多屬後者，是農民故意造成者。²⁵

除此三大流域外，在冀東、津南及平漢路沿線地區亦有小塊鹼地分佈。如位於津南地區的滄縣，為長蘆海鹽的發源地之一，在民國時期，該地亦深受土鹽氾濫所苦，並與鄰近之鹽山、大城、青縣等縣，形成一活潑的土鹽市場網絡。²⁶ 在冀東地區，根據 1934 年之調查，該地區所流通的各種私鹽（漁私、海私、天曬私、奉私等），共佔去官鹽銷路之十分之六，其中土私一項即佔了十分之二五，是流通最廣的私鹽。²⁷ 不過，這些地區的鹼地，如平漢路沿線之定縣、望都、清苑諸縣，鹽份含量較低，不能耕種者甚少，只要稍加改良，即可變為良田。²⁸ 換言之，這些地區鹼地形成之原因，主要亦是「人工造成」而非「天然」的。

鹼地由於不適耕種，故不值錢，且鹼地完糧納稅與好地相同，許多人民因此稱其為「害地」。²⁹ 不過，對於當地居民來說，鹼地又何嘗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論者有謂，製販土鹽自古以來即為地方農家的主要副業，正是此意。況且，土鹽之產製並不困難，成本亦不高。一般說來，華北諸省所產之土鹽，可分為熬製與曬製者。在冀南地區

25 〈調查冀省產硝土鹽各縣報告〉（1935/04），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3；〈為函復查禁各縣硝土鹽治標治本方法鈔錄出產硝土鹽各縣之名清單請察照知由〉，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26 〈據商人義昌店呈大城青縣硝鹽甚熾請轉飭各縣長派警協緝由〉（1933/12/30），河北省檔案館：680-11-298。

27 〈交議提議各案暨報告調查事項草案〉（1934/06/29），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1。

28 〈遵部令會同考察冀南各縣鹼地情形暨擬具改良方案仰祈鑒核施行由〉，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29 〈據雞澤縣縣長代電陳報該縣地方硝鹽情形詳加體察似應妥籌根本解決辦法以消弭各縣永久糾紛函請核辦見覆〉（1934/07/30），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以曬製者居多，鹽民有用磚石砌成長方池曬者，有用鐵鍋曬者，有用洋鉛鐵作成二、三尺方長之盤曬者，有用缸盆放置院內或屋頂上曬者，製法皆相當簡單，即便有熬製者亦係用柴灶，無須花費成本。³⁰不過，由於土鹽味苦，一般人民亦不樂食。其所以氾濫，實與官鹽售價的日益高漲及華北農村經濟的破產，有莫大關聯。查民國初年，河北各縣農村富庶，官鹽之售價亦僅居 1934 年售價之三分之一弱，故土私較少；乃自 1931 年以還，軍事迭興，戰火遍地，農村愈益窮困，農民謀生日艱，不得不以販賣土鹽為唯一之營業，加上官鹽課賦日增，民眾無力購食官鹽，土私乃因此大興。³¹如根據 1934 年之一份調查，在冀中高陽一帶，每斗粟米之售價，竟不能易食官鹽 5 斤。³²如此一來，群眾當然爭相競食乃至於產銷私鹽了！

三、鹽民苦難的來源

從表 4-2 可知，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7-1937），長蘆鹽區的總稅收量，有顯著的提昇，特別是 1931-1932 年間，總稅收量足足增漲一倍。然而，與稅收之急速增長比較下，長蘆鹽區的總放鹽量

30 〈呈報調查職區硝土鹽產製情形並造送圖表硝土鹽樣仰祈鑒核轉由〉（1934/10/09），河北省檔案館：680-11-771。根據另一份調查，當時冀南各縣鹽民製作土鹽的過程如下：首先，選取含鹼較多之地，用木耙耙鬆表面浮土，使水份容易蒸發；二、三日後，將已乾燥之土掃成小堆，再置一、二日後，用車運至長方形之淋滷池；淋滷時，將鹼土放入池內，以水淋之，使成滷水而流入滷水缸，即成鹽滷；然後再將鹽滷轉入長方形之曬鹽池，經日光曝曬二、三日後，即可成鹽。〈呈文政字七〇〇號〉（1935/08/16），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31 〈財政部長蘆鹽務稽核所稅警第七區整頓硝私提案〉（1934/06/26），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1。

32 〈呈報調查職區硝土鹽產製情形並造送圖表硝土鹽樣仰祈鑒核轉由〉（1934/10/09），河北省檔案館：680-11-771。

並未呈相應的增長趨勢，甚至還曾一度衰退。由此可見，總稅收量之增加，乃由於稅率提昇的緣故，此一現象正說明了抗戰前的長蘆鹽務，實呈江河日下之勢。³³ 論者有謂，放鹽量減，而稅收轉見增加，則其增加之故，必由於民間負擔之增重歟！³⁴

那麼，這些龐大的鹽稅收入究竟是流入誰的口袋呢？如前所述，自1913年善後大借款以來，鹽稅即作為借款的擔保而為列強所掌握，不僅由稽核所徵收的鹽稅必先存放於由借款國在華設立的銀行或其認可的其它存款處，以支付由鹽稅所擔保的各項債款外，其所餘款項（即鹽餘）也不是中國政府能夠自由支配者。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恢復稽核所制度以後，乃大幅調整鹽稅之徵收及存放制度。按照新的規定，各稽核分所徵收鹽稅後，必須先存放於中國銀行，記在財政部長帳內，俟後財政部長始將應支付外債之款項，撥給稽核所並存入各地外國銀行。換言之，在此一新規定下，國民政府重新掌握了鹽稅的支配權。再者，在北洋政府時期，地方政府不僅經常任意截留鹽稅，還增設各種附加稅捐，以應付地方當局的開銷。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地方當局截留鹽稅之事不僅被嚴格禁止，原由地方政府徵收的鹽斤附

33 〈硝鹽會議大會紀錄〉（1934/07/3-5），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0。除了稅率之大幅提昇外，總稅收量之增加與當時南京當局改新衡制亦不無關係。自1934年1月1日起，財政部令飭全國鹽務機關秤放鹽斤時一律改用市秤（1擔等於110.23磅），廢止過去所用之司碼秤（1擔等於140磅），但計算鹽斤稅額時仍以擔為單位，稅率無形中提高約25-30%，不僅鹽商因此怨聲載道，採取罷運手段抵制；民眾同樣也抱怨連連，譏諷說：「商人短秤，尚有罰則；公家竟然短秤，似非所宜。」味根，〈取締硝土鹽與改良鹼地〉，《鹽業與鹽工》，期8（臺北，民國64年8月），頁31；〈呈報硝鹽情形及整理進行辦法仰祈鑒核〉（1934/10/30），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34 〈民國十九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2)。

表 4-2 全國及長蘆鹽區產、放鹽量及稅收、稅率表 (1929-1937)

| 項目 年度 | 產鹽量 (千擔) | | 放鹽量 (千擔) | | 稅收 (千元) | | 平均稅率 | |
|----------|----------|-------|----------|------------------|---------|--------|------|------|
| | 全國 | 長蘆 | 全國 | 長蘆 | 全國 | 長蘆 | 全國 | 長蘆 |
| 1929 | 47,951 | 4,632 | 36,094 | 3,681 | 156,973 | 8,272 | 4.35 | 2.25 |
| 1930 | 33,157 | 4,404 | 38,158 | 4,344 | 160,814 | 10,294 | 4.21 | 2.38 |
| 1931 | 35,760 | 5,285 | 41,554 | 4,756 | 170,765 | 10,817 | 4.11 | 2.27 |
| 1932 | 37,504 | 4,439 | 36,976 | 5,428 | 157,212 | 22,126 | 4.25 | 4.08 |
| 1933 | 37,057 | 5,156 | 38,438 | 5,336 | 172,224 | 21,456 | 4.48 | 4.02 |
| 1934 | 45,045 | 6,550 | 41,454 | 4,358 | 177,461 | 22,539 | 4.28 | 5.17 |
| 1935 | 52,674 | 7,776 | 43,669 | 5,102 | 185,416 | 26,775 | 4.25 | 5.25 |
| 1936 | 48,272 | 8,376 | 50,544 | 6,405 | 217,811 | 29,694 | 4.31 | 4.64 |
| 1937 | 43,265 | 3,954 | 41,018 | 1,089 (1-3 月) | 217,705 | 16,531 | 5.31 | — |

- 備註：1. 產鹽量包括所產粗鹽、精鹽及其副產品之總量。
 2. 放鹽量乃鹽務稽核所按照放鹽准單所列粗鹽、精鹽及其副產品之數量。1936-1937 年之放鹽量係根據各該年年報〈各區繳足全稅鹽斤統計表〉所記載者。
 3. 平均稅率是根據稅收／放鹽量估算而成。其中 1937 年之長蘆鹽區的平均稅率，因僅有該鹽區該年度 1-3 月的放鹽量，故無法估算。

資料來源：〈民國十八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1)；〈民國十九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2)；〈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民國二十一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1)；〈民國二十二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2)；〈民國二十三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3)；〈民國二十四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4)；〈民國二十五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1-(1)；〈民國二十六年鹽務總局年報〉，鹽務檔：S-02-71-(2)。

加稅捐也於 1931 年後劃歸中央統一徵收。³⁵ 這些措施，無疑予人此種印象，即當時中國的鹽稅收入，絕大部分流入南京政府當局的國庫。Ralph A. Thaxton 認為，以長蘆鹽稅為主要收入的北平財政機關，在 1931-1932 年前後已由蔣介石的「財政家族」掌握，這種看法在表面上似乎不無道理。³⁶

然而，實際的情形果真是如此嗎？根據表 4-3，我們可以發現，1930-1932 年的長蘆鹽稅，撥付給河北省財政特派員的數額佔了相當大的比例。財政特派員係南京國民政府在全省所設置者，其職責是管理各省徵收應解繳中央的稅款。在 1929 年 4 月長蘆鹽務稽核分所恢復職權以前，河北省鹽款帳目是由河北省財政特派員管理，同年 11 月移交稽核分所以後，河北省財政特派員仍試圖插手鹽稅，經稽核分所「竭力抗拒，幸未成為事實」。³⁷ 中原大戰爆發後，蔣介石為結納奉張，乃應允平、津地區的軍政、財政權悉由奉系掌握。³⁸ 1931 年 1 月，為實踐此一諾言，宋子文北上與張學良洽談北方財政問題，根據兩方的協議，河北省財政特派員在名義上雖仍屬財政部，但實際上則由張委派。也就是說，張學良得以藉此支配河北省應解中央的稅款。其中如鹽稅一項，當時鹽務稽核總所即准許河北省財政特派員的請求，將支付外債攤額、機關經費及匯解總所後的餘款，撥付河北銀行和東三省官銀號，並不留存中央銀行。³⁹ 換句話說，當時長蘆鹽稅的大部分，實際上是流入了張學良的口袋，而不是蔣介石「財政家族」

35 丁長清、唐仁粵主編，《中國鹽業史 近代當代篇》，頁 96-97、159。

36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 55.

37 〈民國十八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2)；〈民國十九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2)。

38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頁 147-148。

39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表 4-3 長蘆鹽稅徵解表（1930-1932） 單位：千元

| 項目 年度 | 稅收 收入 | 機關經費支出 | | 外債攤額 | | 撥付財政 特派員 | | 匯解鹽務 稽核總所 | |
|----------|----------|--------|------------|-------|------------|-------------|------------|--------------|------------|
| | | 數額 | 佔收入 百分比 | 數額 | 佔收入 百分比 | 數額 | 佔收入 百分比 | 數額 | 佔收入 百分比 |
| 1930 | 10,294 | 722 | 7.01 | 1,675 | 16.27 | 7,636 | 74.18 | 240 | 2.33 |
| 1931 | 10,817 | 746 | 6.90 | 2,498 | 23.90 | 7,360 | 68.04 | 240 | 2.22 |
| 1932 | 22,126 | 1,267 | 5.73 | 2,957 | 13.36 | 7,827 | 35.37 | — | — |

備註：「—」為無資料。

資料來源：〈民國十九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民國二十一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1)。

的金庫。

1933年3月11日，張學良因熱河事件引咎辭職，蔣介石乃任命何應欽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表，並於同年5月成立以黃郛為首的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分別監督河北省之軍政事務。就表面上看來，南京國民政府似乎自東北軍手中奪回了河北省的領導權。然而，實際上駐紮在河北省境內及其周圍地區的軍隊仍多非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而是以馮玉祥西北軍舊部及東北軍為主。可以說，當時南京中央雖試圖建立一套高於省級的領導機構以穩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但此一控制實際上相當膚淺。不僅何應欽、黃郛不可能使這些地方軍政領袖屈服，日後接替何、黃職位的廿九軍軍長宋哲元，固然亦一心嚮往一個統一中國的理想，但他從不認為此一理想意味著他必須與南京中央建立密切的關係。⁴⁰

40 Marjorie Dryburgh, *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3-1937*, pp. 3-8.

表 4-4 1934 年全國鹽區放鹽與稅收數比較表

| | 放鹽數（千市擔） | | 稅收數（千銀元） | |
|-----------------|--------------------|-------------------|----------------------|--------------------|
| | 第一組 | 第二組 | 第一組 | 第二組 |
| 民國 3-15 年間的平均數 | 18,999 | 19,410 | 35,999 | 35,327 |
| 民國 18-23 年間的平均數 | 21,790 | 18,263 | 89,828 | 39,139 |
| 比較增多或減少 | 增 2,791 即 14.7% | 減 1,147 即 5.9% | 增 53,829 即 149.5% | 增 3,812 即 10.8% |

備註：第一組是指該區鹽務已全歸中央管理者，包括山東、淮北、淮南、松江、兩浙、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鹽區；第二組則是指該區鹽務非鹽務稽核機關所能完全管理者，包括長蘆、河東、口北、晉北、廣東、雲南、四川鹽區。

資料來源：〈民國二十三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3)。

而根據長蘆鹽務稽核分所的說法，北平軍分會每月軍費 4 百餘萬元，其中鹽稅項下即須擔負 150 萬元，⁴¹ 可知當時鹽稅仍有相當大的數量係歸地方軍政機關所用，即由非蔣介石所能控制的地方軍政領袖支配。固然我們沒有確切資料說明其詳細的分配數額，但是，可以確信的是，當時長蘆鹽區的稅收既非完全歸蔣介石的「財政家族」所有，長蘆鹽務稽核分所若僅依賴南京中央的力量，而不尋求地方軍政領袖的合作，恐怕亦不可能順利地執行其職務。1934 年鹽務稽核總所便根據中央控制力的強弱，將全中國的鹽區劃分為二組，其中長蘆鹽區即屬中央控制力較弱的鹽區（表 4-4）。

再者，所謂地方鹽斤附加稅統歸中央徵收一事，同樣也未獲實現，而這也正是長蘆鹽稅率始終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當時中央財政部雖令飭各省鹽斤附加稅自 1931 年 3 月 1 日以後，一律劃歸財

41 〈鹽稅與財政及地方治安之關係〉，河北省檔案館：680-11-1462。

政部統一核收，但長蘆、口北及重慶三處，並不包括在內。⁴² 根據1932年的統計，該年長蘆鹽區之總稅收額2千2百餘萬元，其中地方附加稅即佔了將近一半，約1千萬元。⁴³ 此一地方附加稅，如前所述，主要是用於支付地方的軍費（尤其是東北軍），而不是流入蔣介石財政家族的口袋。再者，長蘆鹽區之稅率自1932年以後增漲了將近一倍，也是由於長蘆鹽區自該年開始增收地方附加稅之緣故。Ralph A. Thaxton 雖然注意到此一稅率的突然增長是由於東北之淪陷，致使政府當局不得不增加長蘆鹽之稅率以彌補此一損失，⁴⁴ 但卻忽略了遼寧省的鹽稅從一開始即是由奉軍所支配的東三省官銀號提解給張學良為首的東北政務委員會，⁴⁵ 而不是屬於蔣介石「財政家族」的中央銀行之財政部長帳下。因此，長蘆鹽稅自1931年以後的突然暴增，主要是用來彌補奉系而不是南京中央政府的損失。

無論如何，鹽民的苦難並不是直接來自於蔣介石代表的南京中央政府與在幕後操弄中國政治的資本主義列強，毋寧是肇因於分裂的地方軍閥勢力。如此一來，以為這些鹽民的抗爭是針對中央政府或資本主義列強，甚至將其等同於社會與國家對抗的說法，就不能不引起我們質疑了。

42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43 〈民國二十一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1)。

44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 57.

45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第二節 「鹽巡」的性質

一、自由貿易精神下的新稅警制度

欲了解鹽民抗爭的性質，莫過於對鹽民直接抗爭的對象「鹽巡」進行剖析。「鹽巡」是緝私隊的泛稱，民國以來之鹽務緝私工作，最初隸屬掌管鹽務行政部門之鹽運使。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曾於1929年底設立緝私處，各地設緝私局，歸財政部管轄，緝私部門因此暫時獨立，與行政、稽核二部門形成三權分立之勢。1930年4月以後，財政部復令由各稽核分所之經理、協理及各銷區的稽核員兼任緝私監察官，緝私部門乃再度歸併於稽核部門之下。⁴⁶1931年，財政部以各區緝私機關多有剋扣軍餉、虛報名額情事，決議於鹽務稽核總所內設立稅警科，接管緝務，各地原設之緝私局亦由設置於各鹽務稽核分所內的稅警課取而代之。⁴⁷此一連串對緝私稅警的改革，在Ralph A. Thaxton看來，意謂著國民黨國家機械對地方控制的加強。他認為自1930年以來，作為蔣介石財政家族代表者之一的宋子文為增加國家稅收，建立了一套由國家控制並強而有力的稅警制度。而自1931年以後，此一稅警制度亦在長蘆鹽區開始實施，取代了過去由鹽商領導之孱弱的商巡，並使國家機械的控制深入到如冀南地區般偏遠的農村地區。而地方縣府當局，亦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壓迫下，被迫與稅警團合作，如此便嚴重地破壞了當地傳統土鹽市場的網絡，致使地方群眾起而反抗，形成國家與社會長期對抗的態勢。⁴⁸

46 〈民國十九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2)。

47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48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p. 68-69.

然而，如前所述，自 1929 年長蘆鹽務稽核分所恢復後不久，華北諸省即陷入蔣、馮、閻等軍閥混戰的戰火當中。隨後，東北軍入關，河北省政權包括長蘆鹽務的管理權，皆為張學良掌握，直迄 1933 年為止。因此，雖然兩淮、兩浙等鹽區於 1931 年間先後改編成立新的稅警制度，但長蘆鹽區則要等到 1932 年 10 月始正式成立長蘆緝務委員會，改組緝私局為分所稅警課，⁴⁹ 並於 1934 年改組舊的緝私大隊為稅警大隊——共官警 3,612 名，分駐於九個稅警區。⁵⁰ 長蘆鹽區緝私制度改革的緩慢，事實上正反映了當時南京中央政府對長蘆鹽區控制力之薄弱。

改組為新稅警制度前的緝私制度確實相當不完善，不僅人員、裝備不足，隊伍缺乏訓練，甚至由於薪餉太薄，不足維持生計，致官長經常賣缺扣餉吃空，士兵則放私、護私、販私，無所不為。⁵¹ 依賴如此的緝私隊伍，其緝務之毫無成效，亦可想而知。例如，1932 年 5 月，駐防冀南大名一帶之緝私第八大隊，其中濮陽駐隊罰禁過苛，招致民眾武裝反抗，該大隊竟因此將分駐鄰近各縣之分隊，一併撤歸大名縣城內，致緝務廢弛。至於聚集縣城中的緝私隊兵，不但對於地方毫無幫助，且管束不嚴，經常發生冶遊鬥毆之情事，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⁵² 而這也正是後述以濮陽為中心的冀南沙區所以會在 1932 年爆發大規模鹽民暴動之主要因素。

不過，即使緝私制度改組為所謂較中央化的稅警制度以後，仍未

49 〈民國二十二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2)。

50 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省志：鹽業志》，頁 180-183。

51 〈民國十八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1)。

52 〈督察員劉伯揚呈為據報調查大名一帶八大隊駐防緝私情形〉(1932/10/04)，河北省檔案館：680-26-99。

能有效地解決私鹽問題。首先，稅警的設計，實際上更多地反映了鹽務稽核所長期以來所抱持之「就場徵稅」、「自由貿易」的精神，而不是南京中央政府欲將其財政觸角深入到偏遠農村地區的野心。眾所週知，傳統的引岸專商制本身存在諸多缺陷，尤其鹽商之貪污腐敗更是為人所詬病。自民初鹽務稽核所設立以來，第一任稽核所會辦英國人丁恩（Richard Dane）即依據他在印度管理鹽稅之經驗，極力主張取消官賣和專商制度，實行就場徵稅、自由貿易制度，即在產鹽地方，設立場區，管理鹽產，在鹽斤未起運之先，直接抽稅一次，以後即任其運銷，不再干涉。⁵³ 如此一來，「鹽價必低，鹽價既低，則購之者、用之者必眾，而國家稅收自必增加矣」。⁵⁴ 至於令人頭疼的私鹽氾濫問題，也終將由於官鹽稅率之減低而消失於無形。此一自由貿易之主張，雖因鹽商之抵制等諸多因素而無法獲得貫徹，但鹽務稽核所自民國初年以來，仍是秉持此一精神，在全國各鹽區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馬寅初等人的呼籲下，自由貿易之主張愈形高漲。1931年頒布的新鹽法本身便反映了自由貿易的理想，該法開宗明義即指出：「鹽就場征稅，任人民自由買賣，無論任何人不得壟斷」。⁵⁵ 在1934年年底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上，鑒於南京前不久爆發的毒鹽案，代表陳肇英、周啓鋼等人也認為，土鹽氾濫之根本原因，正是專商之把持引岸，唯有在自由競爭之原則下，聽任人民自由買賣，土鹽問題始能獲得根本解決。⁵⁶

53 吳蕤，〈民初鹽政之產銷與徵權〉，《鹽務月刊》，期48（臺北，民國62年9月），頁17。

54 〈1913年12月9日丁會辦致張總辦函〉，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鹽務史資料選輯》，卷1（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頁199。

55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56 〈五中全會改革鹽政兩提案原文〉，河北省檔案館：680-11-959。

Ralph A. Thaxton 提到宋子文推動的新稅警制度，實際上亦是根據秉持自由貿易精神之新鹽法所設置者。由於自由貿易之改革重在鹽場之管理（就場徵稅），故新鹽法所規定之稅警制度，亦是以鹽場為駐防重點。至於銷岸之緝私，不獨費用浩繁，且收效極鮮，雖然有必要於要隘地方酌留查緝，但仍以鹽場為查緝重點，蓋「緝遠不如緝近」。⁵⁷ 也就是說，新鹽法中規定的稅警，實際上僅是場警。

在長蘆鹽區，稅警所駐防的重點也是位於天津周圍的豐財、蘆台場，而不是偏遠的銷區。1934年長蘆鹽區劃分的九個稅警區中，天津及其附近之鹽場即有三支稅警隊駐防，天津的運署有一支駐防，冀東地區一支，至於廣大的津南、冀中、冀南等私鹽氾濫之地，只有四支駐防。⁵⁸ 長蘆鹽商對此稅警制當然相當不滿，蓋由於此制的實行，所有內地稅警盡行裁撤，如此一來，各縣「梟匪」均可變為商販，到處夾私售私，行動自由，誰敢究詰。⁵⁹ 其中如冀南磁縣雖然私鹽氾濫，但一度竟無一稅警分隊常川駐縣。⁶⁰ 在河南省亦是如此，該省由於稅警薄弱，故經常由於鄰鹽沖銷及土私氾濫，以至官鹽滯銷。⁶¹ 而河南省督銷局亦早在1931年間便曾建議在該省組織裝備良好之緝私隊，以遏阻私鹽之風，不料鹽務稽核總所竟以尚非其時，不予核准。⁶² 此與河南省本身並非產鹽的鹽場不能說沒有關係。

57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58 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省志：鹽業志》，頁183。

59 〈為五中全會議決新鹽法二年完成困難實多謹臚列長蘆情形祈准收回成命〉（1935/01/05），河北省檔案館：680-11-959。

60 〈為磁縣緝私兵力單薄祈准續調稅警並令縣協助以維稅銷由〉（1934/06/01），河北省檔案館：680-11-328。

61 〈財政部河南督銷局鹽務稅收總局致長蘆鹽運使署公函督字第四三三號〉（1934/06/14），河北省檔案館：680-11-765。

62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不過，這並非是說鹽務稽核所或稅警團對土鹽問題完全視而不見或撒手不管。伴隨著土私的愈加氾濫，與鹽稅短絀之愈益嚴重（見表 4-5），鹽務稽核所乃派曾仰豐召集長蘆鹽務與稅警人員，以及地方官員等相關人士，於 1934 年 7 月 3-5 日召開土鹽會議，以謀求徹底解決土鹽問題之方法。同年 9 月 17 日，奉命調派長蘆鹽區擔任稅警局局長的張中立，督率特務大隊遊緝冀南，一面平毀硝土鹽池，一面推銷官引，自靜海縣至濮陽縣止，共計 37 縣，迄翌年 1 月 24 日始返天津。據當時的官方報告，此一大規模遊緝所獲之成果，實足驚人，不僅平毀鹽池有二十萬座，鹽鍋三十萬口，傾棄硝土鹽不下十數萬斤，甚至未損一彈，未傷一人，可說是打破長蘆緝私有史以來之紀錄。若與 1929 年平鄉、曲周鹽民繳了緝私隊馬後營之槍械，或者 1932 年濮

表 4-5 1934 年北方各鹽區土鹽產量及官鹽稅收損失表

| 鹽區 | 銷岸 | 產生土鹽 縣數 | 估計年產土鹽 數量（市擔） | 現行官鹽 稅率 | 估計稅收損失 （千元） |
|----|-------|------------|------------------|------------|----------------|
| 長蘆 | 河北及永平 | 72 | 956,000 | 8.133 | 7,775 |
| 山東 | 東綱引岸 | 53 | 1,469,000 | 5.400 | 7,933 |
| | 徐州五岸 | 5 | 32,000 | 4.900 | 157 |
| 河南 | 蘆鹽引地 | 17 | 308,000 | 8.033 | 2,474 |
| | 東鹽引地 | 7 | 199,000 | 6.300 | 1,254 |
| 淮北 | 五六岸 | 4 | 45,000 | 5.100 | 230 |
| 總計 | | 158 | 3,009,000 | | 19,812 |

資料來源：〈民國二十三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3)。

陽、清豐鹽民先後驅逐緝私第八大隊等慘敗的情形相較，實不可同日而語。⁶³

然而，似此種暫時性的大規模巡緝仍不能掩飾「鹽巡」力量薄弱的事實。根據調查，當時稅警駐防各縣之平均兵力僅十三、四名，而河北省之縣份即使以最小者四、五十里之遼闊計之，以十三、四名之官警查緝數十方里之地面，難免有顧此失彼之虞。⁶⁴冀中饒陽縣稅警駐防之情況，即充分反映了此一情形。饒陽縣乃一土私重鎮，過去駐防該縣的舊緝私隊，不僅緝私不力，甚至公然放池放私，地方警團亦從中漁利包庇，致鹽民有恃無恐。1934年4月，該緝私隊奉命改組，舊有緝私隊官兵多存五日京兆觀念，大肆放私。繼之由於大調防，各地防務空虛，土私乃更加氾濫。隨後，新的稅警成立，雖正值土鹽運銷之旺季，但該稅警竟專事操練，放棄緝私，兼及大裁人員，一隊警力僅有三十餘名，防地卻有十縣之多，如何能夠有效緝捕？⁶⁵無論如何，駐防地方稅警數量的單薄，更突顯了國民黨國家機械對偏遠農村深入之局限。

二、地方當局與鹽務緝私

再者，緝私所以難以徹底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稅警多是外來

63 〈稅警局長張中立報告書〉（1935/02/15），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3；〈爲覆送私鹽稽查線圖說祈核轉由〉（1935/03/07），河北省檔案館：680-11-960；〈財政部長蘆鹽運使署、鹽務稽核分所會呈財政部鹽務署總所呈文政字第五六八號〉（1935/03/19），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3。

64 〈財政部長蘆鹽務稽核所稅警第七區整頓硝私提案〉（1934/06/26），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1。

65 〈呈復奉令飭查七區硝鹽情形仰祈鑒核由〉（1934/11/02），河北省檔案館：680-11-771。

者，並不了解地方情形。而鹽民在地方上則有著廣泛的關係，故往往稅警一離駐所，即有人民與鹽戶暗通消息，並藉故拖延稅警時間，使鹽戶得移藏他處，稅警則徒勞無功。⁶⁶ 當時稅警局局長張中立便感慨地說，平毀工作若專恃稅警力量，即用一萬人廢一年之時，恐猶不能徹底。⁶⁷ 因此之故，如欲徹底緝私，地方政府當局的配合實居關鍵。

當時國民政府當局有鑒於此，亦制定「地方政府查緝獎勵辦法」，規定查禁之土鹽提給縣長作為公費，以鼓勵地方當局協助緝私。⁶⁸ 然而，地方官員或以鹽務不屬專責，故遇有私鹽治罪及協助緝私之事，輒取放任態度；⁶⁹ 部分地方官紳則是出於同情立場，認為鹽民是為求生存，迫於無奈，始走上製販土鹽一途；甚至還有地方暗收土硝稅，謂土硝戶熱心公益，應加保護等等。⁷⁰ 因此之故，縣級以下的地方官紳，對於緝私事務，多立於旁觀者的地位。一旦稅警與鹽民發生衝突，地方官紳為維持地方治安，往往亦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例如，1933年11月，緝私第五大隊第一分隊在河間縣城內的大石廟逮捕熬淋私鹽之人犯劉永清諸人，正擬帶回滄縣法辦，有民眾四、五百人到縣政府請願釋放人犯。河間縣府人員及士紳亦向該分隊陳情，聲稱該犯係無知愚民，家貧無以謀生，故挺而走險，況且該地並未設官鹽店，懇請網開一面，允許保外候訊。當時緝私分隊迫於情勢，亦不得不暫准請求。⁷¹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地方當局的妥協，致使稅警孤掌

66 〈財政部長蘆鹽運使署鹽務稽核分所公函〉(1934/08)，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67 〈稅警局局長張中立報告書〉(1935/02/15)，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3。

68 〈民國二十四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4)。

69 〈河間萬慶餘對硝鹽會議擬具議案〉(1934/06/28)，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1。

70 〈財政部長蘆鹽運使署鹽務稽核分所公函〉(1934/08)，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71 〈為第五大隊第一分隊前赴河間查緝硝私所獲鹽犯被迫獲釋請飭縣依法究辦〉(1934/02/06)，河北省檔案館：680-11-299。

難鳴，如此一來，緝務工作當然難以獲得貫徹。況且，某些地區本身並未設置官鹽店，除上述的河間外，產土鹽甚盛的冀南堯山、鉅鹿、平鄉、長垣、東明也未設官鹽店，⁷²這就更使得稅警及地方政府當局沒有立場去制止居民製販私鹽。

尤有甚者，當時對於鹽犯的懲罰，實際上亦不嚴重。如販運私鹽至四、五百斤之鹽犯，竟僅判拘役十日，如此既不能懲一而儆百，鹽犯又何所畏而不為乎？⁷³但這並非是說當時國民政府私鹽治罪之法不嚴苛，實乃由於地方當局的縱容之故。⁷⁴如定縣縣長便說：「農村破產，貧民淋製硝鹽，並不為過，若稅警查緝送案，將朝送而夕釋。」⁷⁵既然地方當局打從心裡就不打算懲處鹽民，那麼法令規定得再如何嚴苛，也徒成具文。再者，當時法律條文不僅未起懲戒之作用，反而束縛了稅警行動。例如，稅警使用槍械，有條例章責束縛，不至萬分危急，或相當時期，不得擅便開槍。然鹽犯在拒捕時，恆多以死抗拒，此時稅警即陷於兩難境地。若堅持緝捕，即不免發生流血慘劇；若委曲求全，示以寬容，則鹽民必以稅警為易與，以至稅警威信盡失。⁷⁶1934年9月，冀南大名縣發生了一起因緝私所引起的騷亂，當時稅警不得已用槍自衛，卻蒙非議。⁷⁷稅警執行緝務之困難，由此可見一斑。

無論如何，縣長等地方官紳對於武力緝私一事，多持保留態度。

72 〈稅警第八區調查硝私事項表〉(1934/11)，河北省檔案館：680-11-771。

73 〈整理鹽務討論會會議提案〉(1934)，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7。

74 〈硝鹽會議大會紀錄〉(1934/07/3-5)，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0。

75 〈呈報硝鹽情形及整理進行辦法仰祈鑒核〉(1934/10/30)，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76 〈為覆送私鹽稽查線圖說祈核轉由〉(1935/03/07)，河北省檔案館：680-11-960。

77 〈民國二十三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3)。

當時長蘆鹽區亦曾召集各縣縣長赴天津開會，謀求他們的支持。各縣縣長固然口頭應允，但仍多以緝私為不得已之辦法。如高陽縣縣長和靜海縣代表便主張，在稅警出發鏟除以前，必先廣為宣傳，庶免人民誤會，較為妥善；完縣代表亦認為，土鹽味苦，原非人民所樂用，設法降低官鹽售價，才是禁止土鹽的根本之道。⁷⁸ 簡單地說，地方官員仍多以為稅警應以和平之手段緝私，最好莫過於使鹽民自己就範。⁷⁹ 然而，要那些以產土私鹽為生的武裝鹽民束手就擒，恐怕無此可能。

Ralph A. Thaxton 認為：「儘管西方正統的學術典範強調（國民黨）國家官僚機械的瓦解，但資料卻給我們指出另一個方向，即（國民黨）中央政府及其恢復的鹽務機構，征服了敵對的軍閥，並將其統治深入到農村中，尋求新的稅收來源。」⁸⁰ 而稅警制度的建立及其成效，正足以證明此一點。然而，從上述可見，不僅稅警本身存在著人員、裝備不足等諸多侷限，地方官紳亦多出於維持地方治安或同情鹽民之立場，不願積極配合緝私。加上中央政府官員間秉持自由貿易之主張者所在多有，他們對於稅警的深入鄉間，實在興趣闕如。事實上長蘆鹽區稅警亦是以天津周圍鹽場而不是如冀南地區般偏遠之銷區為其駐防重點。由此看來，Thaxton 的說法，實在難以令人苟同。

78 〈鹽稅與財政及地方治安之關係〉，河北省檔案館：680-11-1462。

79 〈據查報冀魯豫等省查禁硝土鹽工作應分別切實推進仰籌議辦理具報由〉（1935/11/01），河北省檔案館：680-6-1050。

80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 70.

第三節 共產革命與鹽民抗爭

一、鹽民抗爭的性質

前面我們已詳細探討了鹽民苦難的來源與政府當局對鹽民的「壓迫」情形，下文緊接著就鹽民抗爭本身及其與共產革命間的關係進行探討。

伴隨著製販私鹽所得在農民經濟來源中所佔之比重愈益增加，鹽民為維持此一收入來源，逐漸形成各式各樣的組織，以護衛土鹽的製販和運銷，甚至常不惜生命抗拒官方的緝私。如在冀南之鉅鹿、威縣、廣宗、曲周、平鄉、永年六縣境內，常有百里不毛之地，無法耕種，製販土鹽成為民生第一出路。縱有緝私隊前往剿毀，民眾動輒聚眾拒捕，拼命犧牲亦在所不惜。審其原因，雖係由於民性粗野，實亦迫於生計問題耳。⁸¹

再者，這些鹽民抗爭，不僅限於一村、一縣，有時還有跨村、數縣之聯合抗爭事件爆發。據濮陽縣長於1934年之報告，有鹽民首領王銀山、王順興在濮陽縣城之家中開會，竟有附近各縣鹽民首領八、九十人與會，圖謀抵制稅警；⁸² 雞澤縣長亦報告說，於1934年7月30日清晨，有千餘名持槍刀且來自山東邱縣、冠縣一帶之淋鹽窮戶，聲稱接到平鄉縣鹽戶之雞毛帖，故途經該縣欲赴平鄉開會。⁸³ 由

81 〈調查員馮毓良呈報調查情形〉(1932/08/16)，河北省檔案館：680-26-99。

82 〈為呈報遵令布告嚴禁硝匪聚眾並轉令公安局查明制止各情形請鑒核備查由〉(1934/06/25)，河北省檔案館：680-11-338。

83 〈據雞澤縣縣長代電陳報該縣地方硝鹽情形詳加體察似應妥籌根本解決辦法以消弭各縣永久糾紛函請核辦見覆〉(1934/07/30)，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此可見，鹽民組織甚至還橫跨省界，形成冀魯豫邊界的一股大勢力。

Ralph A. Thaxton 以為，鹽民抗爭與流行於當時華北諸省的紅槍會等會門抗爭，本質上截然不同。因為會門抗爭的對象是「地方性」的軍閥苛捐雜稅及軍隊和土匪的武裝劫掠，故持續時間並不長。如在北伐時期會門運動在冀魯豫邊界曾達到巔峰，但隨後由於國民黨任命之縣長取消了軍閥之苛捐雜稅並收編會門為縣警團，會門運動乃逐漸消沉。至於鹽民的反抗對象則是一個由於與國際經濟制度建立了緊密連繫（即指以鹽稅收入為擔保的外債），而被迫急切地尋求擴大財政收入之中央國家機械，故與會門等短暫的地方性鬥爭不同，鹽民抗爭乃長期的社會與國家之對抗。尤有甚者，這些反對國家財稅機械之鹽民鬥爭最初儘管是自衛性的，其領導者亦不是從一開始就急切地欲反對國民黨的政治秩序，然而，伴隨著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農民提出無情的財稅要求，逼使鹽民鬥爭最終不得不形成一個以終結國民黨政權為目的的政治性鬥爭。⁸⁴

但是，前文已證明，由於政府對地方的控制並不深入，鹽巡的力量實際上亦不強大，緝務工作也總是斷斷續續，所以鹽民抗爭大多也僅是短暫的地方性鬥爭，並且往往與紅槍會等傳統會門團體混同。如長蘆稅警局局長張中立便指出，冀南諸縣人民多屬黃沙會、紅槍會徒，悖逆異常，稱為土私淵藪，緝私人員向來不敢深入。⁸⁵ 在土私重鎮大名，紅槍、天門、黃馬掛等會勢力甚大，團結亦固，常有聚眾反抗緝私之情事發生；而位於冀、魯、豫三省邊界之長垣和東明等偏僻縣份所以未設官鹽店，據云正是由於該地紅槍會、天門會的阻撓，致

84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p. 22-23.

85 〈稅警局局長張中立報告書〉(1935/02/15)，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3。

無法銷售「大鹽」(官鹽)耳。⁸⁶又，大名、濮陽、肥鄉、廣平、長垣、東明、曲周、永年諸縣聯繫而成的土鹽網絡，也是以紅槍、天門、黃馬掛等會門為護符而形成者。⁸⁷另外，鹽民組織也經常與土匪組織混同，如據山東東綱公所所言，在山東便常有鹽犯藉聯莊會與土匪之力持械護運私鹽之情事發生。⁸⁸無論如何，這些證據告訴我們，鹽民抗爭與「地方性」的會門或土匪運動在本質上沒有差別。

那麼，共產革命與這種短暫的地方性傳統鹽民抗爭之間，又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

就筆者所知，第一個共產黨與鹽民抗爭結合的例子出現在山東省高唐縣。高唐位於山東西北部，鄰近本章所探討的冀南地區，是日後中共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一部分。北伐前後時期的山東社會由於連年的兵荒馬亂，地方秩序不安，土匪、槍會等地方武裝組織相當興盛，高唐所在的魯西北地區於1927年間便曾先後爆發李太黑領導的紅會抗糧暴動(2月)、朝城工會與范縣紅會的反駐軍薛傳峰的騷亂(4-5月)、陽谷農民圍城抗糧暴動(6月)，以及冠縣紅槍會反抗駐軍的暴動(9月)等等。⁸⁹

1928年4月，在共產黨員金谷蘭的領導下爆發了高唐縣谷官屯「紅團」暴動。金是谷官屯人，他自山東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畢業後即回鄉活動，其家人在當地教育界頗有威望，如其二哥曾留學日本，後來創辦了高唐縣立中學並任校長，金的族姪也是縣城文廟小學的校

86 〈調查員馮毓良報告8月5日至12日調查完竣情形〉(1932/08/12)，河北省檔案館：680-26-99。

87 〈調查員馮毓良呈報調查情形〉(1932/08/16)，河北省檔案館：680-26-99。

88 〈鈔山東東綱公所快郵代電〉(1935/02/19)，河北省檔案館：680-11-959。

89 〈山東省委十二月份工作總結及今後黨的工作意見〉(1927/12/28)，《山東檔案1》，頁209-210。

長，一家都是地方上層份子，在地方上很有地位。⁹⁰紅團則是一支以貧農為中心並雜有部分自耕農的地方武裝組織，團員每人有紅槍一支（許多團員便是紅槍會人），大家都知道該組織是給貧農謀利益的，金谷蘭是此一團體的領袖。在1928年4月前後，紅團先是聯合周圍紅槍會起來反抗地畝加捐，後來還殺了官府派來的鹽巡五人（因為該地貧民多是淋私鹽者），因此引來官方圍剿，以至失敗。這裡我們可以發現，鹽民抗爭確實與紅槍會等地方性傳統會門抗爭緊密結合。不過，根據金谷蘭所言，該紅團是「在國共合作時期成立的，只望南軍到來給我們謀利益，決不（是）自己起來去幹」。⁹¹也就是說，谷官屯暴動並不完全是農民與鹽民的自發性抗爭，其目的毋寧是為了聲援「南軍」（即北伐軍），期待後者能為他們爭取利益，所以這也不能算是一場社會與國家的對抗。

二、1932年冀南沙區的鹽民抗爭

在谷官屯暴動後，我們沒有再發現共產黨與華北地區鹽民鬥爭結合的案例，直到1932年冀南沙區的鹽民抗爭為止。

如前章所述，在1932年6月的北方會議以後，冀南地區由於接近鄂豫皖蘇區的緣故，被河北省委視為農村運動之重點發展區域。當時河北省委與直南特委將其工作重心放在鐵路沿線的磁縣等地，並曾

90 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魯西北革命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頁35。

91 關於谷官屯暴動的經過，可見：〈中共山東省委關於目前山東政局和黨的策略與工作的報告〉（1928/06）、〈關於高唐紅團工作的報告〉（1928），《山東檔案1》，頁338-339、467-472；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魯西北革命史》，頁34-38。

在 1932 年 8 月發動磁縣游擊運動，但旋即失敗，磁縣工作也因此暫時消沉。不過，與此同時，大名、濮陽等內地縣份的工作則逐漸開展。事實上，早在 1931 年阮嘯仙巡視冀南後不久，除了磁縣中心縣委以外，直南特委還在邢台、肥鄉與大名分別設立了中心縣委。其中邢台中心縣委也位於鐵路沿線地區，是共黨重視的發展區域，但該縣委「大部分都在停頓狀態、組織亦不寬廣」。⁹² 肥鄉則是早期中共冀南黨領導者馮溫的家鄉，所以發展較早，但實際上也無甚工作。甚至在肥鄉中心縣委成立後，該地黨員和上級領導仍長期脫離關係，有時直南特委三個月不派一人去巡視，就算寫信去他們也不回信，⁹³ 所以事實上該地工作也無甚開展。

值得注意的倒是大名中心縣委，該中心縣委管轄區域為大名、南樂、清豐、濮陽等縣。這些縣份皆位於遠離鐵路的內陸，是黃河舊道，故被稱為沙區，也是盛產土鹽的地區。大名中心縣委最初是從當地小學教員與學生間發展起來的。當時有個地方知識份子黨員劉晏春，濮陽人，後來成為中共華北黨的重要領導幹部。據劉的回憶，他在 1930 年入黨時正在濮陽城內的第一模範小學教書，該校中也有許多共產黨員，這些小學教員和學生在城南的兩門、五星等鎮，以及接鄰濮陽縣的清豐縣等地區有密切關係。1931 年，在劉晏春領導下，許多地方小學教員聯合起來發動增薪、罷教運動，並衝入縣教育局內抗議，但沒有成功。⁹⁴

92 〈直南特委給河北省委信（通訊第七號）〉（1932/04/21），《河北文件 19》，頁 186。

93 〈河北直南巡視員王△△關於直南十餘縣黨的組織狀況及工作的報告〉（1932/06/26），《河北文件 19》，頁 257。

94 劉晏春，〈憶濮陽人民的革命鬥爭〉，《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頁 224、234-236。

當時中共的文件中也提到一起清豐縣的罷教運動，這指的應該就是由劉晏春所領導者，蓋濮陽城關與其周圍地區和清豐接鄰，當時係屬清豐縣委所轄。至於所謂的濮陽縣委則設在濮陽縣西部的千口、化村等地，⁹⁵ 並由不善講話、性情遲鈍，但很有鬥爭經驗，而且能吃苦耐勞的王從吾擔任書記。⁹⁶ 王也是個小學教員，任教於濮陽兩門的第七模範小學。⁹⁷ 而根據當時共產黨的描述，這些小學教員確實發起了一個以加薪為主要口號的罷教運動，也真的有人衝到縣教育局裡抗議，對全縣影響很大。然而，當時大名中心縣委又說，這些知識份子黨員實際上很不可靠。⁹⁸ 因為他們雖然很傾向共產黨與紅軍，實際上卻根本不清楚共產黨和紅軍是什麼團體，並且還在國民黨裡做事。後來直南特委採取組織紀律手段強迫他們退出國民黨，並開除其中不退出者，還處罰了大名中心縣委書記高克林，因為就是他允許地方黨員去加入國民黨的。⁹⁹

1932年，濮陽周圍諸縣爆發了一連串鹽民自發抗爭事件，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由於駐防大名一帶之緝私第八大隊的濮陽駐隊罰禁

95 〈河北省委向中央轉報直南工作報告〉(1932/03/10)，《河北文件 8》，頁 179-180。

96 〈直南特委關於前一階段工作和特委內部工作人員情形向省委的報告〉(1931/12/25)，《河北文件 19》，頁 105。

97 田園，〈黨領導的濮陽兩門一帶農民運動〉，《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 (上)，頁 211。

98 〈河北大名中心縣委工作報告〉(1932/05/11)，《河北文件 19》，頁 202-204。

99 〈河北直南巡視員王△△關於直南十餘縣黨的組織狀況及工作的報告〉(1932/06/26)，《河北文件 19》，頁 255-256。高克林後來反駁說冀南工作做不好主要是由於省委過去派來的人都不好所造成的，因此高乃主張以後省委派人來必須先交地方黨考察兩個月，在省委看來，這完全是「違反組織原則的右傾觀念」。〈關於高同志決議〉(1932/08/04)、〈對於高同志反組織〉(1932/08/04)，《河北文件 9》，頁 321-322、356-357。

過苛，以至引起民眾群起反抗，迫使該大隊最後撤歸大名縣城內之事。¹⁰⁰ 當時中共大名中心縣委指示在鹽民組織內活動的黨員，要有計劃地領導該鬥爭，由「反緝私隊」及「與硝磺局算帳」的目標，進一步轉變成反國民黨的政治性抗爭。¹⁰¹ 同年 8 月 13 日由省委巡視員所召開之冀南四個中心縣委的聯席會議也指示濮陽黨必須以鹽夫工會為中心，進一步成立兩河鹽夫工會，將鬥爭從反鹽巡鬥爭發展成反地主富農的階級鬥爭，並提出明確的政治路線。¹⁰² 而地方黨員如劉晏春、王從吾等人，原本便是鹽民團體的首領，他們也在此事件中起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如該年 9 月成立的包括濮陽在內的八縣鹽民聯合會，其主席便是「富的中農」出身之鹽民領袖兼共黨濮陽縣委書記王從吾。¹⁰³ 而且，據政府當局的說法，該組織「頗具現代化」，「絕非腦筋簡單之硝民所能為者也」，¹⁰⁴ 可見現代化的共產革命與傳統的鹽民鬥爭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也不應過份強調共產黨與鹽民的結合。當時河北黨黨內宣傳刊物《北方紅旗》報導了 1932 年濮陽縣城裡的一場鹽民抗爭，很生動地描述了鹽民抗爭與組織的情形，值得參考（文中強調標記為筆者所加）：¹⁰⁵

100 〈督察員劉伯揚呈為據報調查大名一帶八大隊駐防緝私情形〉（1932/10/04），河北省檔案館：680-26-99。

101 〈河北大名中心縣委工作報告〉（1932/05/11），《河北文件 19》，203。

102 〈兩河鹽夫工作決議案〉（1932），《河北文件 9》，頁 339。

103 〈直南特委祝關於直南各地黨的組織與工作情形的報告〉（1932/12/08），《河北文件 19》，頁 338。

104 〈財政部長蘆鹽務稽核所稅警第七區整頓硝私提案〉（1934/06/26），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1。

105 〈濮陽通訊〉（1932/07/25），《北方紅旗》，期 10，臺灣法務部調查局：052.1/7432/60986。

到了十五號十二點鐘光景，城內西北兩街的鹽民與郊外鹽夫匯合一起，將鹽巡處團團包圍。該處巡長事先聞風逃匿，只留有幾個職員和鹽巡，失去了群眾打的對象。同時，公安局長帶著幾名武裝警察，一面勸慰，一面威嚇。但是群眾毫不為動。這時，負責指揮的人臨時動搖，一聲不響，致使群眾形成群龍無首的現象，進退不知所措。這樣僵持了一點多鐘，縣長代表到場，要向群眾演講。於是群眾中走出來兩個士紳，乘機大出風頭，發號令叫群眾恭聽縣長代表「訓話」。……

這樣又支持到了下午兩點，群眾情緒表現鬆懈，並有的自動走開。然而警察卻越來越多，雙方相持，完全陷於僵局。但是在這兩點鐘的時間內，群眾中發現新的真正的領袖。經過一番鼓動，將群眾引到鹽巡處附近的一塊空地上開會。這時群眾中走出一人，用最粗率的詞句向大眾演講，向大家提議一同向北磕頭，意思就是對神立誓。磕完頭，群眾轉向鹽巡處，蜂擁而入，強迫鹽巡和職員立即出境。在這個當兒，警察和縣長代表湊出來，做好做歹，答應在十六號十二點以前准保鹽巡出境。當時有些人知道這又是欺騙，極力向大家鼓動，無奈大多數人已認為滿意，沒法再堅持下去。於是開始整隊遊行，原來打算經過刮民黨（按：指國民黨）黨部，搗毀它；但因為走錯了路線，狗黨部算僥倖免此一難。示威隊伍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最後，又開大會，決定召集全縣代表大會，產生正式組織，派代表與他縣聯絡。

這段引文告訴了我們，第一，鹽民團體本身相當鬆散，也帶有濃厚的傳統意味（如向神立誓的行爲），所以前述政府當局報告所謂鹽民組織

「頗具現代化」的說法，難免誇張。再者，鬥爭進入高潮之際，民眾或許會打出如反日本帝國主義等政治口號，但是像 Ralph A. Thaxton 所謂藉由唱大戲的方式宣傳抗日救國的說法，除了在王從吾等人日後的回憶中曾提起外，¹⁰⁶ 我們沒有在其他文件中發現。事實上，從當時中共黨內報告可見，鹽民抗爭主要侷限在經濟要求上。前述於 9 月成立的鹽民聯合會，只是提出武裝鹽夫反鹽巡、永遠製小鹽等六項經濟鬥爭綱領，鹽民本身的意思也侷限在「打鹽巡」、「打老窩」（冀南鹽巡的根據地是大名，打老窩就是指打大名）。¹⁰⁷ 王從吾等人後來雖然進一步提出要「反地方政府」，但仍然沒有提出反國民黨的口號。¹⁰⁸ 這告訴了我們，除非共產黨能夠進一步深入組織，持續煽動與操弄鹽民，否則鹽民不僅很難投入大規模的政治抗爭，而且還會像前段引文描述般，「表現鬆懈」，「自動走開」。由此可見，外來的組織領導與宣傳不是像 Thaxton 所形容般，只是次要的因素啊！

可是，共產黨承認當時他們根本不能控制鹽民團體。這些團體的領袖多是地、富份子，他們雖然也是黨員，但共產黨與這些階級異己份子之間幾乎是同床異夢。如濮陽縣鹽民協會的領袖楊進才雖然與王從吾等人頗為相善，但共黨上層領導卻以為楊是個富農（高克林說他是貧農），是舊社會的「光棍」，是一個英雄。他反對共黨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也不願意從事反地主和富農的階級鬥爭。因此，共黨最後乃

106 王從吾、高克林、張會之、吳寶合，〈濮陽鹽民鬥爭〉，《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頁 205。

107 〈直南各中心縣委等工作情況及特委工作佈置〉（1932/10/26），《河北文件 19》，頁 303-305。

108 〈河北省委致直南特委與全體同志的指示信〉（1932/08/16），《河北文件 9》，頁 154。

開除其黨籍。¹⁰⁹ 後來河北省委雖然不斷三令五申要地方黨員打破「幻想與地主、富農聯合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¹¹⁰ 但鹽民組織內部的地方黨員從未曾在該組織內部發動階級鬥爭，¹¹¹ 而鹽民組織始終也只是由地方上層份子所領導的超階級性團體。

最後，令人諷刺的是，當時中共冀南沙區黨真正著力的並非鹽民暴動，而是另一場濮陽游擊隊運動。此一游擊隊運動是由省委特派員陳原道所指揮者。據云，該游擊隊既不是透過黨的組織力量去推動，也缺乏群眾基礎，完全是依賴幾個「小豪紳」地方黨員去籌組。¹¹² 再者，此游擊隊專門從事與豪紳合法、和平的算賬運動。儘管如此，游擊隊的行動還是惹得一些豪紳不滿，他們指摘游擊隊是共產黨（事實也是如此）。因此，這些「富農」出身的游擊隊領導後來也都跑了，其他剩下來的也只是把游擊隊當作「副業」，他們白天都在家裡做事，晚上如果有行動時就集會。¹¹³ 又，當時省委特派員陳原道還反對游擊隊發動下層群眾鬥爭，他怕「鬥爭一發動必遭敵人壓迫，敵人一壓迫即妨礙了整個游擊隊的佈置」。¹¹⁴ 即使如此，當地駐軍的打壓最終還是導致游擊隊的不戰而潰。當時大名、濮陽一帶是龐炳勳的駐地，防共甚嚴。在其防地內，無論進出城皆須經詳細盤查，如口音不對，或在太陽下山後才進城者，皆被寬衣解帶搜查全身，而且在該地如能

109 〈直南特委報告〉(1933/01/31)，《河北文件 19》，頁 415-416。

110 〈河北省委關於直南工作的決議〉(1932/11/16)，《河北文件 10》，頁 248。

111 〈直南特委工作報告〉(1932/12/21)，《河北文件 19》，頁 376。

112 〈直南特委工作報告〉(1932/12/21)，《河北文件 19》，頁 363。

113 〈直南特委祝關於直南各地黨的組織與工作情形的報告〉(1932/12/08)，《河北文件 19》，頁 335-336。

114 〈直南特委關於陳玄濤、蘇湘農同志右傾錯誤的報告〉(1933/01)，《河北文件 19》，頁 419。

報告一位共產黨員，即賞現大洋兩千元。因此之故，游擊隊隊員都覺得危險太大，以至多逃奔他鄉或躲藏起來，許多人也因此不敢承認是共產黨員。¹¹⁵ 當時在黨員間還盛傳著一句話：「雞叫到明年。」意思就是說今年不成，明年准成。¹¹⁶ 後來游擊隊也就煙消雲散了。

毫無疑問，省委對濮陽游擊隊的實情非常不滿，因為前不久才失敗之磁縣與高蠡游擊運動也全都是不重視發動下層群眾的單純軍事行動，而且省委還因此遭到中央批評，所以當時河北省委也嚴重警告直南特委不要爲了準備游擊運動而放棄群眾的日常鬥爭，以至走上「立三主義」盲動路線之途（當然也不要只侷限在日常鬥爭）。¹¹⁷ 除此之外，河北省委還派了領導高蠡暴動的湘農、賈臣等人來冀南，取代完全放棄群眾日常鬥爭的陳原道。但是，這個「南方蠻子」湘農大概是因爲高蠡暴動失敗的打擊，所以變得異常消極浪漫，老是抱怨「南方生活好，北方生活不好，還是回南方……北方創造了蘇區開始也不如南方蘇區好」，¹¹⁸ 吵著要「回上海去，到南方工作」，¹¹⁹ 還說「有一個地方念念書也是很好的，像我們這樣生活是很痛苦的，死也比我們這樣生活著好些」。湘農不久後即離去，他和陳原道在直南留下了一些非組織所允許、與國民黨員間的「超階級」私人關係，暴露了直南特委之所在，惹得省委非常震怒。¹²⁰

115 〈直南特委王△△的報告〉(1932/12/09)，《河北文件 19》，頁 345-346。

116 〈直南特委工作報告〉(1932/12/21)，《河北文件 19》，頁 361。

117 〈河北省委關於直南工作的決議〉(1932/11/16)，《河北文件 10》，頁 247、249。

118 〈直南特委再批評祝同志〉(1932/12/27)，《河北文件 19》，頁 385。

119 〈直南特委祝關於直南各地黨的組織與工作情形的報告〉(1932/12/08)，《河北文件 19》，頁 340。

120 〈直南特委關於陳玄濤、蘇湘農同志右傾錯誤的報告〉(1933/01)，《河北文件 19》，頁 420；〈河北省委來訊第八號〉(1933/04/22)，《河北文件 11》，頁 294-295。

更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是，雖然此時濮陽等縣之鹽民鬥爭正如火如荼地進展著，但中共濮陽游擊隊卻完全與鹽民鬥爭沒有關係，而且濮陽黨還爲了組織游擊隊而完全放棄了領導鹽民抗爭。¹²¹這也就是說，王從吾等人參與鹽民抗爭，純粹是個人的事。後來，冀南沙區的鹽民把地方緝私隊逼得躲入大名城，大獲全勝。但此一勝利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個別共產黨員如王從吾、劉晏春者在此一鹽民鬥爭中發揮的作用，但卻沒有道理以爲鹽民鬥爭和共產革命有任何直接的承繼關係。況且，如前所述，這些冀南地區的小學教員黨員，許多人還是國民黨員或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他們到底是代表共產黨、國民黨、地方鹽民，或是其本身的利益在行動，這是說不清楚的。

三、冀南地區東北諸縣的游擊運動

事實也證明，共產黨並未能在鹽民抗爭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其在冀南沙區的勢力。1933年以後，由於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的爆發，河北省無暇顧及冀南農村地區的工作，加上省委隨後由於組織部長阮錦雲等人的先後叛變而遭致一連串的破壞，其與冀南黨的關係也因此中斷。在與省委失聯的這段期間，冀南沙區也曾爆發幾起群眾的自發性抗爭，如由濮陽災民所發動的借糧分糧、奪取武裝之鬥爭，以及大名的「紅槍國術團」與鹽民抗爭，¹²²其中也有個別共產黨員活動，如接替王從吾擔任濮陽中心縣委書記的兩門第七模範小學校長

121 〈直南特委關於祝同志來直南工作的批評（祝即軍委湘農）〉（1932/12/27），《河北文件 19》，頁 382。

122 〈直南特委報告〉（1934/06/04），《河北文件 19》，頁 501。

田秉和（田園）便曾參與 1933 年下半年爆發的濮陽災民鬥爭。¹²³ 但這些鬥爭並不能完全說是為「黨」所領導，如大名七千名鹽夫與三百個國術團的鬥爭爆發於 1933 年 12 月，但直南特委直到四個月後才與之發生關係；至於濮陽災民鬥爭則始終局限在分糧吃大戶的經濟行動，不僅沒有進一步聯繫到游擊戰爭和建立蘇區的鬥爭，而且還採取和平的手段，由三五人寫封信向地主借糧，並在借到一些糧後，兩者便「各不相犯」、「和平共處」，鬥爭就此告終。¹²⁴

當時河北省委與冀南黨的聯繫，時有時無。我們這裡有幾份 1934 年初國民黨當局破獲的中共河北黨內往來信件，很好地說明了省委與下層黨交往的實情。¹²⁵ 從這些信件可知，省委並非不知道濮陽災民等鬥爭的情形，但直南特委講得太「一般」，省委無法了解，要求特委更具體地報告。又，鑒於當時北平、天津黨的破壞，省委還不斷地叮囑特委小心叛徒，但似乎為時已晚，大名、南樂等縣已有許多黨員遭到逮捕。但省委說直南黨的破壞還只是一部分，要求特委立即調一些幹部到平津工作，因為「直南已成為幹部唯一來源」。但特委卻一直以經費等問題推託，還抱怨「黨還是借用我們的錢」，「我們的已經花完了」，所以不僅去平津成問題，恐怕連宣傳品與文件也出不了。後來省委批評特委一再「政客式地拒絕」派人來省委討論工作，當指此事。¹²⁶ 最後，省委還要求直南特委注意劉桂堂部的工作，說該部

123 田園，〈黨領導的濮陽兩門一帶農民運動〉，《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頁 212-223。

124 〈直南特委李 X 關於直南工作中錯誤傾向的報告〉（1934/07/12），《河北文件 19》，頁 517-518；〈河北省委給直南黨的指示信〉（1934/09/27），《河北文件 15》，頁 162。

125 《天津來往信件登記》，臺灣法務部調查局：255.35/809/9302。

126 〈河北省委給直南黨的指示信〉（1934/09/27），《河北文件 15》，頁 166。

抗日情緒很高，要特委派人打進去，把領導權奪過來。劉桂堂是山東土匪出身，以「劉黑七」的渾名著稱，先後為張宗昌、北伐軍與韓復榘所收編，還曾參加前章所述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同盟軍失敗後，劉部竄逃河北等地，最後回到魯西。但是，據河北省委後來的說法，當時直南特委根本沒有注意士兵工作，連一次計劃也沒有。¹²⁷

1934年5月前後，省委找來在唐山工作的黎玉，跟他說冀南黨領導有問題，要他去了解一下情況。黎玉來到冀南後，立即把這段失聯期間冀南鬥爭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向省委做了報告，還痛斥王子清為書記的直南特委領導犯了取消主義、官僚主義的錯誤，省委也接受黎玉的看法。¹²⁸隨後，黎玉即把王子清調到北平，還清除了前冀南黨領導高克林、劉大風等人。¹²⁹同年11月，黎玉將直南特委劃分成直南與直魯豫兩個特委。前者是在南宮中心縣委的基礎上所成立者，管轄南宮、任縣等冀南地區東北諸縣（相當於今日邢台市轄區的東部諸縣）的黨務，以南宮籍黨員李菁玉擔任書記；後者則管轄磁縣周圍諸縣與冀南沙區的工作，並由黎玉和六河溝工人出身的紀德貴先後擔任書記。¹³⁰兩者中則又以直南特委所轄之東北諸縣的工作為中心。

1934年7月以後，平鄉、任縣、鉅鹿一帶接連爆發了鹽民等地方性的群眾抗爭。其中在平鄉西部，有鹽民團體在領袖李老正等人的

127 〈直南特委李 X 關於直南工作中錯誤傾向的報告〉（1934/07/12），《河北文件 19》，頁 516。

128 〈直南特委李 X 關於直南工作中錯誤傾向的報告〉（1934/07/12），《河北文件 19》，頁 518；〈河北省委給直南黨的指示信〉（1934/09/27），《河北文件 15》，頁 163。

129 〈直南特委關於開展直南黨反右傾取消主義經過的報告〉（1934/08/05），《河北文件 19》，頁 536。

130 黎玉，〈中共直南特委工作回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 1（上），頁 108-111。

領導下，於該年7月中旬占領了節固鎮公安局，並擬進一步攻打平鄉縣城。在此一鬥爭中，有共產黨員趙學勤參與，並且有共產黨員劉文忠（劉子厚）領導的游擊隊自任縣、隆堯一帶前來助陣。¹³¹ 河北省委對此一消息相當興奮，指示直南特委應「發動平鄉附近黨的組織，用各種方法去打進平鄉游擊戰爭」。¹³² 事實上，當時鄰近平鄉的任縣也已爆發了諸起群眾抗爭，如城北地區的短工會鬥爭，城西的抗糧鬥爭，以及與平鄉接鄰之城東區鹽民抗爭，其中也有許多共產黨員參與並擔任領導。但這些共產黨員實際上並不相信群眾的力量。如在抗糧鬥爭中農民大多採取傳統幫口、會門的組織手段，國民黨、共產黨在農民間皆有影響，其中共產黨號召群眾的口號是：共產黨紅軍要來了，群眾不僅可以分地，還可以多分好地，不加入是不行的。可見得這些共產黨員更依賴的是外來的軍事力量，而不是下層的群眾。他們雖然悲嘆生活條件惡劣，但總是盼望紅軍的到來，而且已經整整盼了兩年了！¹³³

既然共產黨員是如此依賴外來的軍事力量來發動革命，後來以平鄉、任縣等冀南東北諸縣之鹽民等群眾鬥爭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游擊運動會成為「單純的軍事行動」，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1935年初，河北省委宣傳部長李華生（畢根）抵達冀南，起草〈抗日游擊隊行動綱領〉，要冀南黨員準備發動游擊運動。3、4月間，畢根與李菁玉、張霖之等直南特委領導召開多次會議討論游擊運動計劃，並決議在5

131 中共平鄉縣委黨史辦公室，〈平鄉縣鹽民鬥爭記述〉，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4（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頁140-144。

132 〈河北省委給直南黨的指示信〉（1934/09/27），《河北文件15》，頁167。

133 〈直南東北縣份工作報告〉（1934/08/17），《河北文件19》，頁561-578。

月發動。然而，由於共黨一開始便計劃依賴地方保安團之兵變發動游擊，故當保安團方面已獲知消息並將團兵調離後，游擊計劃也因此流產。李菁玉隨後也由於黨內的糾紛而被調離冀南，並由李華生接任直南特委書記一職。¹³⁴

1935年8月，直南特委令人相當驚訝地突然成立了一支「中國工農紅軍平漢線游擊隊」。究其實，原來特委「是在不費絲毫艱苦的工作，召集幹部會議討論，憑空依據一個中心支部，集合百數十人，馬上成立一個游擊大隊，就算是完成了開展游擊戰爭的任務，這簡直是自欺欺人的笑話」。¹³⁵ 該游擊隊是共產黨藉由某些在鹽民、土匪等地方群眾團體中擔任領袖之地方黨員的關係，匯集其部下所成立的隊伍。根據直南特委前一年在威縣的調查，當地群眾完全只看領袖而行動，如果領袖不動他們也不會動。¹³⁶ 即使游擊隊的招牌正式掛起來以後也是如此。據云，游擊隊中有許多鹽民，他們純粹是看游擊隊政治部主任（何人不詳）的面子才參加的。在鹽民眼裡，該政治部主任是「天人」，各地群眾皆歡迎他去，一旦看到了他，鹽民即發狂似地親近他、擁抱他，並搶著與他握手。¹³⁷ 對此，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些崇拜「天人」的鹽民真的了解共產黨和紅軍嗎？

至於這些「領袖」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才與共產黨合作，這一點我們雖不敢斷言，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政治認識與當時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很不一樣。根據直南特委所言，當時東北諸縣的地方黨員，

134 《冀南革命鬥爭史》，頁 82-84。

135 〈河北省委關於直南勞苦群眾武裝鬥爭開展的形勢與直南黨在領導游擊運動中的錯誤〉（1935/08/15），《河北文件 16》，頁 332。

136 〈直南東北縣份工作報告〉（1934/08/17），《河北文件 19》，頁 568。

137 〈直南特委關於直南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及其勝利的開展〉（1935/08/31），《河北文件 19》，頁 636。

既不了解「擁護蘇聯」和「粉碎五次圍剿」之口號，而且還說著「東（三）省人民生活安定，日本人並不壓迫」的話。¹³⁸可見得這些地方黨員既不是共產主義的信徒，更算不上是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者。

如果說共產黨曾對此一游擊運動發生任何影響，那絕不是政治與組織上的領導，而是使得游擊隊更加依賴軍事的力量。事實上，當時地方黨員在領導此一游擊運動時所根據的邏輯就是「武器萬能，有了槍什麼都不成問題」。¹³⁹所以，運動發動後，游擊隊就到處橫衝直撞地去打民團、保安團以繳槍械。他們或許曾顧慮到單純軍事運動的危險，所以也曾打算發動地方群眾起來參與，但其發動群眾的辦法是強迫群眾立即分該村豪紳地主的米，因此反而引起群眾不滿。更麻煩的是，當時游擊隊內部四分五裂，有隊長「勾結漢奸企圖打死政委」，雖然沒有成功，但最後還是拐槍逃跑。¹⁴⁰當時河北省委派王光華（郭杰，他與劉文忠後來成為該游擊隊的負責人）等幹部前來協助，省委書記高文華也在1935年底親自前來視察，他日後回憶時宣稱「直南游擊戰爭不是烏合之眾的冒然舉動」，「是黨的領導和群眾鬥爭密切結合的產物」。¹⁴¹不過，當時的河北省委卻認為冀南游擊隊根本就是一支缺乏黨領導的烏合之眾，並說該游擊隊「幸而不為敵人所消滅，亦必流為土匪」。¹⁴²果不其然，冀南游擊隊在隔年春便遭到國民黨當局

138 〈直南特委八月底工作報告的一段〉（1934/08/30），《河北文件 19》，頁 588-589。

139 〈直南特委關於直南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及其勝利的開展〉（1935/08/31），《河北文件 19》，頁 633。

140 〈怎樣開展冀魯豫邊區黨的工作？〉（1935/08/23），《河北文件 16》，頁 342。

141 高文華，〈抗戰前夕的河北省委〉，《河北黨史資料》，輯 2（石家莊，1985），頁 42。

142 〈河北省委關於直南勞苦群眾武裝鬥爭開展的形勢與直南黨在領導游擊運動中的錯誤〉（1935/08/15），《河北文件 16》，頁 333。

鎮壓，其與日後中共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也沒有任何直接的承繼關係。

Ralph A. Thaxton 認為，共產革命勝利的關鍵在於其能否與自發性的群眾抗爭結合，外來的黨組織領導僅是次要的因素。¹⁴³ 可是，冀南游擊隊失敗的例子告訴我們，如果共產黨沒有予這些自發性群眾抗爭團體更進一步的黨組織領導與控制，即使他們可能暫時地結合在一起，但此種自發性團體「幸而不為敵人所消滅，亦必流為土匪」，難以生成革命組織。這就證明了單純地與「地方」結合還不足以保證革命的勝利。

第四節 國家與鹼地改良

一、開放私鹽之議

Ralph A. Thaxton 設想在國家機械的深入下，鹽民終將走上與國家持續對抗之途。我們在前面業已證明此一論點的謬誤，指出鹽民的苦難並非來自一個強大的國家機械，毋寧是分裂的地方軍閥；鹽民抗爭的短暫性，也不足以保證日後革命（或 Thaxton 所謂反國家的長期抗爭）的勝利。我們這裡還要問，國家與鹽民是否一定要走上你死我活的抗爭之途？即使鹽民抗爭如 Thaxton 所形容般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鹽民苦難的客觀環境根源——土地的貧瘠、排水與灌溉的不良，就可以因此解決了嗎？

事實上，並非所有的土鹽皆被視為非法。如晉、陝地方政府當局為增加稅收便鼓勵各該省土鹽的流通，其中山西當局甚至打算假官專

143 Ralph A.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 321.

賣之名義，限制長蘆鹽流通，以推銷土鹽。¹⁴⁴ 當然，晉陝與冀南地區之土鹽不能相提並論，如晉陝地區的土鹽不僅生產過程較為複雜，其味道亦不如河北土鹽般苦，甚至成份上也與河北土鹽不同，對人體危害較小。¹⁴⁵ 況且，當時掌握晉陝政局的閻錫山等軍閥，對於蔣介石的財政家族來說，原本便是「非法的」，他們對於土鹽的政策會與南京當局截然不同，倒也不是件太令人驚訝之事。

不過，即使是由蔣介石之財政家族所掌控的南京政府當局，其對於河北土鹽也並不總是採取強硬之壓迫手段。事實上，鑒於武裝緝私之不可能徹底根除土鹽問題，不少人乃就土鹽所以興起之原因，設想根本解決之道。如當時鹽務稽核總所便以為，如欲根除私鹽問題，唯有實行「減稅敵私」或「禁徵並行」之策，如此則數年之後，可以言就場徵稅、自由貿易，不僅解決了私鹽問題，並可將中國數百年來鹽業制度的缺失，一掃而空。¹⁴⁶

所謂的「減稅敵私」是指降低土鹽盛行地區的官鹽稅率，以增加人民購食官鹽的意願；「禁徵並行」則是指對土鹽徵稅，以期能收寓禁於徵之效。此兩種辦法固然皆不無道理，並且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鹽務稽核所長期以來所秉持之自由貿易的理想，但由於不符合實際情形及侵犯了鹽商等既得權益者的利益等緣故，故不可能獲得貫徹。如「減稅敵私」之策原本便與政府當局欲遏阻土私之風以增加國家稅收的宗旨不符，故不被接受。至於「寓禁於徵」，此種做法雖不無先例，但土鹽產區過於零星散漫，勢難設立機關予以管理及徵稅。且人民所

144 〈民國二十二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2)。

145 〈呈報調查職區硝土鹽產製情形並造送圖表硝土鹽樣仰祈鑒核轉由〉(1934/10/09)，河北省檔案館：680-11-771。

146 〈民國二十二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2)。

以刮土淋私，其動機無非就是為逃避苛沉的鹽稅負擔。因此，要他們自動報稅，「恐無此事實」。再者，一旦硝土鹽合法化，人民勢必選擇食用較便宜的土鹽，如此一來，官鹽將更無銷路可言。¹⁴⁷如河南東部地區，向來即為盛產土私之地，1927年地方當局對其徵收土鹽牌照稅，准其流通。然而，鹽戶以此獲得保障，乃風起雲湧，製販土私，致營此業者，日見增多，但官鹽卻未因此而暢裕。¹⁴⁸在豫西南之襄八、汝光等蘆、潞鹽並銷區域，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亦曾一度開放土鹽，原希冀稅收因此暢旺，不料，「歷時未久，竟不聞官引暢銷，但聞商家倒閉，人民未脫食硝之害，國家感受減課之殃」。¹⁴⁹在1934年底至1935年初由長蘆鹽區稅警局長張中立率領之大規模遊緝行動後，當地鹽民既未因此自斂，反因政府當局釋出減稅敵私、廢除引岸、自由貿易之風，使鹽民咸以私鹽即將開放，欣喜若狂，乃因此更加團結，抗拒之意愈加彌堅。¹⁵⁰

也有人建議由政府或工廠收買土鹽，以為工業之用。如河南省督銷局鑒於土私問題之棘手，便曾建議鹽務稽核總所，招商設廠，精製土鹽。然以無人承辦之故，此一提案乃無疾而終。¹⁵¹雞澤縣長亦提議在出產土鹽之地，一方面賤價售賣官鹽，另一方面則由久大精鹽公司收買該地土鹽，另行製鍊，但同樣被視為「窒礙難行」而遭到否

147 〈鹽稅與財政及地方治安之關係〉，河北省檔案館：680-11-1462。

148 〈委員李佩恩呈長蘆鹽運使署〉(1934/06/18)，河北省檔案館：680-11-765。

149 〈為五中全會議決新鹽法二年完成困難實多謹臚列長蘆情形祈准收回成命〉(1935/01/05)，河北省檔案館：680-11-959。

150 〈為覆送私鹽稽查線圖說祈核轉由〉(1935/03/07)，河北省檔案館：680-11-960；
〈呈為謹在瀝陳實行新鹽法關於長蘆之稅收私鹽灘產皆與國計民生有絕大關係引懇
慎加考慮由〉(1935/03/25)，河北省檔案館：680-11-959。

151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決。¹⁵²何以說是窒礙難行呢？緣根據鹽法之規定，一般工廠於鹽場購買的工業用鹽，由於一律免稅，故每百斤只須1角2分左右，但土鹽卻須4、5元之譜，幾成1比40之比例，成本上不合算，當然窒礙難行。¹⁵³

最後，冀、魯、豫三省之土鹽，如前所述，與晉北等地之土鹽比較下，不僅味道更苦，且對人體之危害更大，故准其流通，無異以人民之生命換取稅收之增加，同樣是窒礙難行。因此之故，此項土鹽既不能供民食，又不便作工業之用，實屬無可利用。開放土鹽之議，終被打消。¹⁵⁴

二、鹼地改良之策

既然武裝緝私不可能完全鎮壓土鹽走私，而開放土鹽之策在實際執行上又窒礙難行，故有人乃提出「鹼地改良」之策，以期解決土私問題，滿足國家稅收需求，同時亦富裕農民，解決農民之生計問題，獲得雙贏的結果。

事實上，民國以來，政府當局為解決各種私鹽問題，即不斷訴諸土地改良一策。例如，在1919年，北洋政府財政部曾設立棉墾局，打算開墾長蘆廢灘地，派員測勘，後因經費無著，無法維持，於1923年停辦。¹⁵⁵在平漢路沿線的定縣也開鑿了七千餘口井，灌溉改良鹼

152 〈據雞澤縣縣長代電陳報該縣地方硝鹽情形詳加體察似應妥籌根本解決辦法以消弭各縣永久糾紛函請核辦見覆〉(1934/07/30)，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函為准函據雞澤縣縣長陳明禁止硝鹽兩項計劃窒礙難行經擬訂禁止復請查照由〉(1934/08/20)，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153 〈鹽稅與財政及地方治安之關係〉，河北省檔案館：680-11-1462。

154 〈硝鹽會議大會紀錄〉(1934/07/3-5)，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0。

155 土地委員會，〈鹽區土地調查報告〉(1935/12)，全經檔：26-01-39。

地，農民對於鑿井灌田之利益，皆有深切認識。¹⁵⁶但這些改革，大多僅限於由地方政府或社會團體所推動者，規模既小，成效亦相當有限，故仍不能改善土鹽問題。

1933年，河南省政府建設廳有開濬河渠計劃，鹽務稽核總所乃計劃與其合作，多開河渠以引水沖淡土質（開河養淡），中央政府財政部旋即核定合作辦法，並函全國經濟委員會派員會同河南省政府會勘河流。¹⁵⁷翌年，鹽務稽核總所正式決議，在冀、魯、豫三省與地方政府合作，實施開河養淡工程，並先從豫省著手，每月在鹽稅項下撥款三萬元，作治河工程之用。至於冀、魯兩省，則一方面貫徹地方政府查緝獎懲辦法，加強緝私；另一方面則於冀省土鹽最盛地方，降低官鹽稅率，以資抵制土私。¹⁵⁸

當此之際，也有不少人士主張立即在冀南等土私盛產之區，實施鹼地改良，其具體辦法有：（一）開渠鑿井以資養淡；（二）機犁深耕以遏鹼性；（三）擇（棉）籽播種以盡地利。¹⁵⁹當時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對此頗為贊同，乃建議財政部仿照河南省辦法，在河北省設立水道土壤整理委員會，並撥華北救濟戰區公債基金餘款二百萬元，實施鹼地植棉。¹⁶⁰就在各方人士的催促下，中央政府財政部於1935

156 〈遵部令會同考察冀南各縣鹼地情形暨擬具改良方案仰祈鑒核施行由〉，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4。

157 〈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69-(3)。

158 〈民國二十三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3)。

159 〈擬具冀西南硝地整理計劃呈請諮商辦理並令示祇遵〉（1935/01/08），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160 〈呈請將救濟戰區公債改為救濟河北農村之用仰請鑒核轉請立法院核議施行〉（1935/01），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2。

年 11 月正式成立長蘆鹽區改良鹼土委員會，負責鹼地改良工作。¹⁶¹不過，當代大陸學者咸認為，鹼地改良計劃之用意雖然良善，但由於該項計劃所需花費甚大，農民既無錢，政府亦不願投資，故不過是「說說而已」。¹⁶²

確實，改良鹼土委員會從一開始便深受經費所苦，無論是疏濬河道或大規模的引水灌溉，所需資金恒在百萬元之譜，不可能一併進行。不過，委員會每年仍有基金三十萬元可資運用，¹⁶³故仍能擇其平近易行者，逐次推動改革計劃。¹⁶⁴所謂「平近易行」者，係指鑿井與植棉兩事。鑿井可資灌溉，棉花則為抗鹼性極強之作物（尤其是美棉），兩者皆需款不多，需時不久，用力少而收效多。但由於經費及人力之侷限，仍不可能普遍推動鑿井植棉工作，委員會乃根據財政部委派之土壤學專家劉和等人的調查，依各地鹼質之輕重分別酌定實施改良方法，劃定大名、平鄉、高陽、武強四區，成立技術分處，並令各縣政府協助工作進行。其進行方法，在鹼性較輕之地，教導並貸款給農民以種植抗鹼性強的美國棉花；在鹼性較重之地區則給予農民鑿井貸款，以汲取淡水灌地瀉鹼。¹⁶⁵

161 該委員會由長蘆鹽務稽核分所經理兼鹽運使、長蘆鹽務稽核分所協理、財政部特派專門委員、河北省政府建設廳廳長、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五人組成。由此可見，此一計劃是在中央政府財政部、鹽務機關以及地方政府等各方面合作下推動的。〈長蘆鹽區改良鹼地委員會暫行組織章程〉，河北省檔案館：680-6-1050。

162 中國鹽業總公司編，《中國鹽業史 近代當代編》，頁 152。

163 鹼地改革之經費來源為何？根據鹽務稽核總所年報之記載，該經費是由盛產土鹽區所銷鹽引項下，每擔加徵整理費 5 元，每年約計可得 20 萬元，撥充應用。另外的 10 萬元可能是來自華北水利委員會的資助。〈民國二十四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鹽務檔：S-02-70-(4)。

164 〈長蘆鹽區改良鹼地委員會第一次幹事會議紀錄〉（1935/11/14），河北省檔案館：680-6-1050。

165 〈長蘆區改良鹼地經過事略〉，河北省檔案館：680-6-1112。

自 1936 年始，各地工作次第展開。以大名區為例，該區包括大名、南樂、清豐、邯鄲四縣，共分得三萬元經費。該區技術分處處長漆中權於 1936 年 4 月 12 日正式成立分處後，召集縣、區、鄉、村長會議，組織鹼地種棉會。根據統計，該年度大名區參加改革計劃者共有 2,877 戶鹼民，並在 9,869.8 畝的鹼地上試行植棉。¹⁶⁶ 除大名區外，平鄉區則委託洋行用新法鑿深井一處，該深井之供水量，可抵數十小井之供水量；至於土地鹼化極為嚴重的高陽百尺村（該村位於瀦瀧河流域，年產土鹽近 10,000 擔）¹⁶⁷ 則計劃放淤，用虹吸管引河水灌浸鹼地，並設水閘節制水量。¹⁶⁸ 另外，津南滄縣與鹽山兩縣雖非鹼地改良計劃之預定地，亦在 1936 年 5 月前後開始設立鹼地種棉會進行鹼地改革，計迄 7 月為止，兩縣共設 35 處種棉會，會員 927 人，植棉 6 千 3 百餘畝，發給棉籽共約 5 萬 1 千餘斤。¹⁶⁹

當然，鹼地改革計劃的推動過程中，一定會遭遇困難。特別是農民知識低下，舊習甚深，要他們積極配合，並不容易。以武強縣為例，該縣點軍、張橋、王莊等村之鹼農，咸以為此次所貸棉種係抗鹼性甚強的作物，不知該棉種僅能種植於輕鹼地，乃播種於重鹼地區，以至所植棉籽均未能發芽，損失甚鉅。¹⁷⁰ 在大名區，配合植棉的鹼農當中，種植五畝以下者佔全數 86.64%，六至十畝者僅 10.13%，十

166 〈大名區技術分處工作報告（自 3 月 24 日起至 5 月 20 日止）〉，河北省檔案館：680-6-1060。

167 〈長蘆鹽務稽核所稅警局第六區調查硝私事項表〉（1935/03），河北省檔案館：680-11-771。

168 〈長蘆鹽區改良鹼地經過事略〉，河北省檔案館：680-6-1112。

169 〈滄縣、鹽山兩縣改良鹼地推廣植棉報告書〉（1936/07/13），河北省檔案館：680-6-1062。

170 〈為呈復武邑縣點軍村等處棉籽不發芽情形仰祈鑒核示遵由〉（1936/09/23）、〈武強區技術分處九月份工作報告〉（1936/09/30），河北省檔案館：680-6-1064。

畝以上者則不過 3.23% 而已，由此可見鹼農對改革工作之不信任及其試探心理。¹⁷¹ 再者，植棉有一定程序，種植前須以犁深耕二次左右，播種亦有其適當的時節，播種以後還需經常施肥及中耕（鋤地），以切斷土壤之毛細管，避免水分蒸發，使鹼聚於表面。¹⁷² 但農民或因懶惰、無知，或為節省勞力計，以至播種多不得法，影響了棉花的收成。更嚴重的是，不少鹼民及與土私貿易有密切關係之地方士紳及官員，有意無意地阻擾工作之開展，致使改革不可能徹底進行。¹⁷³

儘管如此，鹼地改革工作仍收到了一定的成果。總計 1936 年一年，植棉鹼地共 72,055.5 畝，平均產量以每畝 70 斤計，共可收獲 5,043,885 斤之棉，每畝地約可獲利 14 元。至於貸款開鑿之井則共 452 口，總貸款數計 58,260 元。其他如滏陽河的測量、冀中瀕瀧河流域之高陽百尺村的吸虹工程，以及平鄉縣之自流井工程，亦在陸續開展當中。¹⁷⁴

當然，植棉畝數之增加並不必然意味著官鹽銷數相應的提昇。表 4-6 是開始實施鹼地改革前後之 1935 及 1936 兩年的官鹽暢銷與滯銷數的比較表。從該表中，我們可以發現，被視為鹼地改革最有成效的第八區，官鹽銷數不昇反降。根據分析，導致此一滯銷情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前述之冀南游擊運動的發動，當地縣長為維持地方治安

171 〈大名區技術分處工作報告（自 3 月 24 日起至 5 月 20 日止）〉，河北省檔案館：680-6-1060。

172 〈改良鹼地植棉須知〉（1936/01），河北省檔案館：680-6-1111；〈大名技術分處七月份工作報告〉（1936/07/22），河北省檔案館：680-6-1070。

173 〈大名區技術分處工作報告（自 3 月 24 日起至 5 月 20 日止）〉，河北省檔案館：680-6-1060。

174 〈長蘆鹽區改良鹼地委員會一年來工作情形概略〉（1936/12），河北省檔案館：680-11-746。

表 4-6 1935、1936 年長蘆官鹽暢銷、滯銷數比較表

| 稅警防區 (區部所在縣份) | 1935 年 | 1936 年 | 暢銷數 (擔) | 滯銷數 (擔) |
|------------------|------------|------------|-----------|-----------|
| 特別區 (天津) | 580,937.21 | 555,297.18 | | 25,640.03 |
| 第四區 (樂亭) | 290,392.11 | 245,018.58 | | 45,373.53 |
| 第五區 (靜海) | 56,400.68 | 59,359.83 | 2,959.15 | |
| 第六區 (高陽) | 480,441.90 | 564,961.99 | 84,520.09 | |
| 第七區 (武強) | 589,058.45 | 608,133.52 | 19,075.07 | |
| 第八區 (大名) | 176,112.14 | 174,197.36 | | 1,914.78 |

資料來源：〈長蘆區官鹽銷數暢滯原因〉，河北省檔案館：680-4-2596。

起見，請求土鹽開禁，致當地私鹽之風大盛，減損了官鹽銷數。另一方面，鹼地改良工作僅推行年餘，在許多地區，鹼民只因此認識鹼地可植棉，並未放棄淋鹽，況且過去積存之私鹽尚多，鹼民也不可能盡行毀棄。¹⁷⁵ 無論如何，鹼地植棉之成效仍有待更長的時間來證明。

當時改良鹼地委員會並未因官鹽銷數未立即提昇而感到失望，他們仍對鹼地改革工作充滿信心，並計劃增加 1937 年各地鹼地植棉之畝數。¹⁷⁶ 表 4-7 是大名區技術分處於 1937 年 5 月的報告，從中可見，鹼地改良的推展有相當的成果，在戶數、畝數、棉種各方面，皆有將近三、四倍的成長。

遺憾的是，「七七事變」的爆發，迫使鹼地植棉改革計畫停頓，其過去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隨著戰亂的持續擴大而付諸流水。儘管如

175 〈長蘆區官鹽銷數暢滯原因〉，河北省檔案館：680-4-2596。

176 〈二十六年度改良鹼地工作進行計劃(技術會議紀錄)〉(1936/11)，河北省檔案館：680-6-1142。

表 4-7 大名區技術分處 1936、1937 年工作比較表

| 年別 | 種棉會數（會） | 種棉戶數（戶） | 植棉畝數（畝） | 棉種數量（斤） |
|------|---------|---------|---------|----------|
| 1936 | 119 | 2,877 | 9,869.8 | 73,132.9 |
| 1937 | 212 | 8,668 | 39,733 | 268,910 |

資料來源：〈大名區技術分處二十六年五月份工作報告〉（1937），河北省檔案館：680-6-1096。

此，此一時期的鹼地植棉計劃，仍向後人證實了鹼地改良的可行性。抗戰期間，日本傀儡政權的長蘆鹽務管理局便曾於 1942 年冬恢復改良鹼地委員會，在天津附近之潮宗橋至種福台一帶進行放淤工作。¹⁷⁷

鹼地改革的經驗告訴了我們：國家與鹽民不是非得一定要走上對抗之途不可。批判國民政府不可能實現「中央化」的日本學者光田剛，不無稱贊地說黃郛治理華北的經濟論是以農村的節約與自給自足為基礎的「農本主義」。¹⁷⁸農本主義原來就帶有反現代的色彩，像 Ralph A. Thaxton 的道義經濟學一樣，該主義以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會帶給農民更大的災難。一些左翼學者如 Mark Selden 等人在頌揚共產革命的民粹主義性格時，也不忘高舉中共「自給自足」的政策。然而，從上述鹼地改革所需投入的成本來看，農民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鹼地改革，他們還需要國家的投入。所謂的自給自足，恐怕也只是共產黨宣揚的神話罷了。

但是，單純地依賴國家的投入也不可能保證改革成功。況且當時南京政府分配給冀南這樣偏遠地區的稅警都不足夠了，哪裡有餘力投入更多的資本去改良鹼地呢？可是，後來的共產黨卻做到了。怎麼做

177 〈長蘆鹽區改良鹼地經過事略〉，河北省檔案館：680-6-1112。

178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頁 244。

到的呢？Mark Selden 等人關於冀中饒陽縣五公村的調查告訴了我們，在 1960 年代之際，中共不顧人民死活地動員了大量民力，發動華北地區規模廣大的水利建設（如建水壩與挖井）。¹⁷⁹ Selden 等人的目的在於突出當時業已背離農民的中共如何殘酷地剝削農民為黨國利益服務，但是如果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鹽民抗爭與失敗的鹼地改革比較下，Selden 等人的調查反而證實了中共不是也不可能單純地依賴黨國機械維持其龐大的統治，而是把它的統治建立在一個被階級鬥爭所撕裂的社會之上。因為那些村民，很多就是在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鼓舞或脅迫下，自願或被迫地投入水利建設工作。

小 結

在抗戰爆發以後，長蘆鹽區鹽場為日本所佔領，因此，不只共產黨而已，連國民黨也積極推動地方土鹽的產銷，土鹽乃因此由「非法」躍昇為「合法」的商品。正如 1940 年以前擔任國民黨濮陽縣長兼第十區行政專員的丁樹本所言：「在未抗戰以前，為國家收入計，各地嚴禁土鹽。自沿海地帶失守，鹽區為敵佔領，當時為抵制計，乃命令各縣以海鹽為私鹽，以土鹽為官鹽，竭力提倡。因土鹽內有硝質過多，吃了有毒，乃設鹽務處聘專門人員研究改良之，此後海鹽在該區絕跡矣。」¹⁸⁰ 既然國民黨在抗戰時期也不反對土鹽的產銷，那就沒有道理認為共產黨所以能夠在冀南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並擊敗國民黨獲

179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pp. 72-73.

180 〈河北省政府委員兼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丁樹本從政抗敵報告書〉，黨史館：一般 535/12。

得最終的勝利，是由於其與長期和國家對抗的鹽民抗爭結合的緣故。而贊同土鹽的丁樹本，最後也被八路軍趕出冀南。這就更證明了，國共兩黨勝敗的主要關鍵不在於鹽民的支持，而是軍事力量的較量。

中共最初是靠外來的八路軍打入敵後的河北地區。1937年10月，中共冀豫晉省委成立，由前直南特委書記李菁玉擔任書記，負責領導包括冀南地區在內的冀魯豫邊區之黨務工作。當時與上層領導已斷絕聯繫多時的許多冀南地區黨員，也在抗戰爆發前後自動組織地方性的游擊運動。不過，冀豫晉省委卻不信任這些自發的游擊運動，因為他們認為冀南地區的黨員仍舊像1935-1936年間的游擊運動般，是透過某些地方上層份子的關係去間接組織游擊隊，故不僅黨在這些游擊隊中沒有穩固的控制力，那些與共產黨合作的上層份子，許多人也很有問題（冀豫晉省委說其中還有漢奸）。因此，在1937年底冀豫晉省委打算派新組織的直南特委隨正規八路軍赴冀南地區工作前，便先致信在該地活動之舊直南特委說，對於紅槍會、大刀會、土匪這些「反動」組織的策略要正確運用，因為「在過去，我們對這些東西的工作，一般地講來都是吃虧很大、賺錢很少的。1935年直南開發游擊戰爭的時候，我們各地差不多都吃了土匪流氓的虧，破壞我們政治影響，侵犯群眾利益，奸淫搶掠，拐械潛逃的事情發生了無數起。」因此，在抗戰爆發後，對付這些自發的群眾團體，一方面應採取「抗日統一戰線」，聯合它們一同進行抗戰；同時還要採取「上聯下抬頭」的辦法，即在與其上層領導聯合之掩護下打入其下層，奪取其群眾，團結群眾在共黨的政治領導之下，肅清那些反動首領與漢奸。¹⁸¹ 隔

181 〈去把反日游擊戰爭的烽火燃燒遍全華北〉（1937/12/10），《冀南歷史文獻選編》，頁1-7。

年中，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領導的部分八路軍一二九師正規軍隊東進冀南後，也確實毫不令人意外地打擊了許多自發性群眾武裝團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宮六離會事件。¹⁸²

當然，只是外來的八路軍或上層統戰的聯合，還不足以鞏固共黨的統治，關鍵在於「下抬頭」。在接下來我們將證明，如果共產黨不能發動由下而上的階級鬥爭，重新教育群眾與分化農村，外來的八路軍與共黨政權也不可能長久維持。

182 六離會是地方性會門組織，抗戰初期在冀南的東北諸縣有著相當大的勢力。據徐向前等人所言，南宮、棗陽、清河等縣皆屬該會勢力範圍，致使該地政府號令不出城門。〈關於冀南情況的報告〉(1938/06/09)，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2(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12。

根據中共官方黨史的說法，六離會是由清河傳入南宮，並由韓方剛與趙立金所領導的「封建」會門。在八路軍到來之初，共產黨與六離會尚能和平共處。後來，南宮大漢奸李耀庭在六離會與八路軍間挑撥離間，並最後掌握了整個六離會，從此六離會便日趨反動，不僅聚賭販毒，還走上與共產黨敵對之道路。1938年5月，有六離會成員在南宮董張馬村繳了八路軍的械，並殺害包括八路軍一二九師津浦支隊政委王育民在內的幾位八路軍官兵，因此八路軍乃武裝鎮壓六離會，並予解散。此一事件，根據大陸官方黨史的說法，是「完全正確」、「非常必要」與「深入人心」的。中共南宮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一九三八年南宮縣六離會事件始末〉，《河北黨史資料》，輯6(石家莊，1986)，頁151-161。

第五章

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發展與挫敗

1933–1942

Mark Selden 的「延安模式」，長期以來在西方學術界裡，一直是中共革命為何會獲致最後成功的主要參照觀點。該論點認為，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策略、緩和的社經改革，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參與，既改善了群眾的生活，還動員與贏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在此一過程中，因為中共更強調的是團結與漸進的改革，也就是寧靜的革命，階級矛盾與鬥爭被貶低為次要的因素，黨的領導也被忽略，因為對 Selden 來說，革命的民主與民粹性格，才是中共成功的關鍵。¹

這樣的論點，背後隱藏的是國家與社會、組織與群眾、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線等二元對立的結構。Mark Selden 不能理解，對於共產黨來說，這些表面看似對立的面向，能夠而且必須辯證地結合。換句話說，人民民主與專政原是表裏一體，群眾鬥爭的發起是黨加強對社會控制的關鍵，失卻階級原則的民族抗戰也不可能勝利。陳永發在其專著裡已證明這些論點，並指出 Selden 的謬誤，我們這裡不再贅述。²

由於陳永發的證據充足，今天西方學者也承認他的論點，但卻指

1 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2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稱陳的說法只適用在他所研究的新四軍根據地——華中地區。因為這個地方土地問題嚴重，所以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就開始在該地推動激進的、撕裂地方社群的階級鬥爭。在華北地區，中共還是只訴諸緩和的減租減息與稅制改革，而不是激進的土地革命。因為在華北地區，租佃問題不嚴重，苛捐雜稅引起的衝突才是主要的社會矛盾。所以，如 R. Keith Schoppa 斷言，中共革命的策略會因應環境的不同而改變，我們簡稱為「因地制宜」。³

因為共產革命是「因地制宜」的，所以延安模式依舊適用在華北地區。如 Pauline Keating 雖然不贊同延安模式放諸四海皆準，但承認至少可以用來理解延安地區的革命，因為該地區沒有土地問題。⁴ 我們這裡指的華北地區當然包括河北在內，如 Carl E. Dorris 很早就試圖證明，延安模式係來自中共在晉察冀邊區的經驗。⁵ David S. G. Goodman 也指出抗戰時期太行山區的共產革命，反映了社會各階層不同的利益，不只是窮人的革命，這也是中共因地制宜地用緩和的改革政策取代激進的土地革命的結果。⁶ Goodman 後來主編華北抗戰一書，強調革命生態學（ecology）的重要性，事實上就是提高革命的

3 R. Keith Schoppa, *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2002), pp. 279–280.

4 Pauline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13, 241–243.

5 Carl E. Dorris,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anan Commu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8 (Dec., 1976), pp. 697–719.

6 David S. G. Good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0).

因地制宜性格。他們很準確地指出各地革命進程的不一致，也證明革命領導者與組織的重要性。但該書主要是欲說明中共此時如何藉由寧靜革命的手段，造就了一個以中農爲主的公平社會；領導的重要性也在於爲實施寧靜的革命提供保障，以及擷取失敗的經驗，使革命更加地方化。⁷

寧靜的革命降低了共產革命階級鬥爭的性格，幹部的地方化則是事實上貶低外來領導的作用。在 Mark Selden 等人關於五公村的研究（此研究是 David S. G. Goodman 等人在華北抗戰一書中贊揚者），以及 Ralph A. Thaxton 關於南樂縣千佛村的研究中，主角都是地方幹部，革命成敗的關鍵全繫在這些人能否摒棄外來的組織領導，執行和緩而非激烈的社會改革政策。

可是，在前面我們已經證明了，抗戰前河北黨的屢屢失敗，主要就是肇因於過度的「地方化」。河北黨在推動上層統戰時，總是不能自拔地融入到地方的派系鬥爭中，以至往往未能維持自身的獨立性；在動員下層群眾時，幹部又總是依賴某些個別群眾領導的中介，依循既存的社會網絡或關係，甚或借用別人的政治招牌，結果還是未能啓發群眾的政治與階級覺悟，乃至流於爲人作嫁的革命。左傾中共中央領導不甘心只是耕人之田，訴諸由上而下的紀律，要幹部執行極左的路線，但下場則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孤立。如何在加強黨領導的同時，結合由下而上的階級鬥爭，這是中共已經發覺，卻仍未能妥善解決的難題。

抗戰爆發之初，中共仍未能很好地把這兩者辯證地結合一致。接

7 Chongyi Feng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pp. 8-13.

下來，我們要用以冀東爲主的冀熱察抗日根據地爲例，⁸說明中共在抗戰爆發之初，依舊是利用外來八路軍的力量與某些個別幹部或地方上層份子的關係，去建立抗日根據地。他們雖然已經意識到必須趕快在軍隊掩護之下發動由下而上的階級鬥爭，但結果卻還是訴諸由上而下的黨國力量去推動激進的社會變革，以至如過去左傾領導的時期般，使得自身更加孤立。在經歷不斷的挫折與修正後，中共才日益靈活地掌握「一打一拉」的政策，慢慢地把華北農村社會按照其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分化了開來，也由此鞏固了他的黨國基礎。

第一節 抗戰前夕冀東地區的共產革命

一、立三路線後冀東黨的恢復

冀東，係指天津——北京——古北口一線以東的河北省東部地

8 冀熱察抗日根據地是由冀東、平西、平北三塊根據地組成。這些根據地之間的界線並不明顯且互相重疊，冀東也不是冀熱察抗日根據地的中心。但是，與平西等地相較下，冀東根據地的歷史最爲長久，它在抗戰前後至國共內戰時期最具持續性。所以我們在這裡是以冀東爲中心進行論述，必要時輔以平西等地的情況進行說明。研究冀東地區共產革命最深入的學者是中國南開大學的魏宏運及其所領導的團隊。但他們的論點與 Mark Selden 相仿，都是強調階級鬥爭不是革命正道，主張因地制宜的緩和政策與統一戰線才是革命成功的關鍵。不同的是，魏宏運將此一辦法稱爲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顯見中共官方觀點的影響。魏等人關於冀東的研究，見：魏宏運主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Hongyun Wei, "Social Reform and Value Change in the Jin Cha Ji Anti-Japanese Border Region," in Chongyi Feng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pp. 93–114. 在後一篇論文中，魏宏運舉了許多數字來證明中共緩和的改革如何改變冀東農村的階級結構，並造就了一個以中農爲主的農村社會。但他所舉的例子是北岳根據地的調查數字，令人懷疑其論證。其所引資料原文見：〈抗戰六年來北岳區農村經濟與階級關係的變化〉(1943/05)，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農業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頁 213–243。

區。按照民國時期的行政區劃，該地區包括密雲、平谷、懷柔、順義、通縣、三河、香河、武清、寶坻、寧河、薊縣、興隆、遵化、玉田、豐潤、遷安、盧龍、撫寧、臨榆、昌黎、樂亭共 22 縣。由於地處北京以東，故在歷史上又被稱爲「京東」地區。

在地形方面，冀東地區北高南低，北邊沿長城一帶是燕山山脈，南部則是由灤河與白河諸流域沖積而成的平原地區。冀東地區的居民大多以傳統農業爲生，主要糧食作物是高粱、粟、玉蜀黍，經濟作物則有果樹與棉花。原屬灤縣與豐潤二縣的唐山地區（1938 年獨立建市）是開灤煤礦、啓新洋灰廠與北寧路機廠等產業的所在地，乃冀東地區主要的工業區域，也是華北地區的工業重鎮之一。冀東沿海一帶則是長蘆鹽的鹽場，但如前章所述，民國以來由於鹽場的逐漸縮減，此一地區原有的鹽場大多作廢，不少鹽民因此失業。至於商業方面，冀東可說是天津港的直接腹地，其與內蒙地區也有經常的商業往來，前面談到的韓麟符等熱河籍黨員與冀東的地方黨員所以往來密切，與此一既存的商業網絡當然也有關係。⁹

雖然有唐山等工業重鎮、平奉路（北寧路）之現代化建設，以及熱絡的地區貿易，冀東地區的農村自清末民初以來仍舊處於每況愈下的窘態。由於人口過剩（抗戰前夕大約有六百餘萬人）、政府的苛捐雜稅，及其他自然災害（也包括農民破壞當地自然景觀造成的生態問題）等因素，冀東地區雖然如同華北其他地區般以自耕農居多，但農民的收入仍多入不敷出，生活困苦，這也正是冀東農民經常大批移民滿洲（闖東關）的一個主要原因。¹⁰

9 冀東地區農村實態調查班，《第一回冀東地區內選擇農村實態調查概要報告書》（天津：冀東地區農村實態調查班，1936），頁 29。

10 冀東地區農村實態調查班，《第一回冀東地區內選擇農村實態調查概要報告書》，頁

但是，窮困自身並不能生成政治與階級抗爭。在前兩章中我們曾先後談到一九三〇年代前期冀中與冀南地區的農村鬥爭，卻沒有談到冀東地區的農村鬥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共產黨當時在冀東地區的活動遠不如冀中與冀南地區。自立三路線以來，冀東黨始終一蹶不振。其中如唐山黨，儘管被共產黨視為冀東地區首要的發展重點，但該地黨組織卻是冀東黨中最薄弱者。¹¹ 當地工人的鬥爭固然風起雲湧，但共產黨員只是袖手旁觀，並且最後多因黃色工會的「壓制」與「欺騙」而結束。¹² 至於農村地區，雖然革命的情勢有愈趨好轉的趨勢，但黨務也同樣低迷。如李大釗的家鄉樂亭，該地位於沿海地區，也有相當多熬治私鹽的民眾，他們也經常為反對鹽巡的緝私發動自發性的抗爭。可是該地黨員在立三路線以後卻普遍存在著恐怖、消極的觀念，總認為「現在人少，等聯合人多了再幹」，所以放棄了群眾的抗爭。¹³

1932年7月，日軍入侵熱河與冀東，冀東地方局勢混亂，河北省委乃指示冀東黨加緊武裝農民與工人，開展游擊戰爭，發展土地革

29；魏宏運主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頁14-23。張培剛在戰前的調查也指出冀東農村經濟每況愈下的現象，但他發現冀東地區自耕農的比率還是超過半數（52%），佃農與自兼佃農分別佔18%、30%。因此，張培剛說租佃率並不能反應農民真正的經濟地位，因為一個耕種5畝地的自耕農比一個租種50畝地的佃農，實際上還要貧窮得多。這一點也證明了本文序論中所引陳永發的說法「租佃問題不過是個重要的『次要』問題」，中共必須也應該從租佃問題外的其他各層面去挖掘階級矛盾。張培剛，〈冀北察東三十三縣農村概況調查〉，《社會科學雜誌》，卷6期2（北京，1935年6月），頁286-287。

11 〈河北省委給唐山市委的指示信〉（1932/04/15），《河北文件8》，頁306。

12 〈河北省委工運報告（一個調查人的報告）〉（1932/06），《河北文件8》，頁515、522-527。

13 〈河北省委赴樂亭巡視報告〉（1932/06/26），《河北文件8》，頁502。

命，創造蘇區與紅軍。¹⁴ 當此之際，由宋維新（又名穆維新，自 1930 年後擔任灤縣縣委書記，其餘經歷不詳）擔任書記的豐（潤）灤（縣）樂（亭）昌（黎）中心縣委也與河北省委恢復關係。1933 年初，省委派郭滌生建立京東特委於樂亭，¹⁵ 並把工作中心放在平奉路沿線的工人和沿海的漁民、鹽民上。¹⁶ 後來成爲冀東抗日根據地領導者之一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也是在此一時期被派回冀東工作，¹⁷ 當時他被黨內同志視爲一個左傾份子。¹⁸

就在京東特委成立後不久，河北省委因爲組織部長阮錦雲、秘書陳竹君等人的先後叛變，遭致一連串的破壞，直迄 1933 年 10 月以後才逐漸恢復。而省委與冀中、冀南黨的關係也因爲這一連串的破壞而斷絕，只有冀東黨在省委恢復後不久立即與省委接上關係。¹⁹ 而且，令河北省委頗爲興奮的是，由於 1933 年 5 月塘沽協定的簽定所造成的冀東自治化，正符合了中央駐河北代表孔原所謂河北「殖民地化」的論斷。²⁰ 加上當時遷安、樂亭兩縣也先後爆發了鹽民等群眾的抗爭，²¹ 這不能不予河北省委有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幻想。

14 〈河北省委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熱河的緊急通知〉(1932/07/23)，《河北文件 9》，頁 61-62。

15 《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頁 113。

16 〈京東特委工作報告〉(1933/01/17)，《河北文件 17》，頁 286-287。

17 李葆華在父親死後赴日本留學，1931 年在東京入黨，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工作。見：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頁 583。

18 〈林蘭關於巡視京東特委情況向中央的報告〉(1934/04/01)，《河北文件 14》，頁 18-19。

19 仲良，〈河北省委組織報告（作爲省委工作檢討的補充）〉(1934/02/23)，《河北文件 13》，頁 327-328。

20 〈石心關於河北省工作報告之第一部〉(1934/02/09)，《河北文件 13》，頁 181。

21 〈京東特委的組織報告〉(1933/12/17)，《河北文件 17》，頁 349-354。

然而，省委派人赴該地調查後，發現實際的情形並非如此樂觀。首先，在農村地區，儘管京東特委是當時與省委關係最密切、組織最強大的河北農村黨，但該特委書記根本不清楚下層支部的實際情形。²²再者，更令人難堪的是，雖然冀東地區已成為所謂「殖民地化」的地區，但當地的群眾運動並未如孔原所期望般，從九一八事變後以學生為主體之合法、和平式的請願運動，轉變成以工農和士兵群眾為主的直接式革命運動。²³甚至冀東的地方黨員和群眾還認為日本比國民黨軍閥好，因為滿洲國還有建設，中國軍閥只會破壞。其中有的人則說日本的飛機、坦克太厲害了，民眾抗日不會勝利。²⁴如樂亭黨員在日本還在滿洲時便認為距離太遠「沒法反」，在冀東被劃為非武裝區後，則又因距離太近「不敢反」。²⁵所謂「直接的革命運動」，恐怕不過是中共一廂情願的美夢而已。

二、抗戰前夕冀東地區的群眾抗爭

由於冀東的地方黨員是如此不相信群眾的力量，他們向來也是依賴菁英或上層的政治軍事資源去從事「革命」(即過去一再被批評的「單純軍事行動」)。所以，不論是唐山地區的工人，還是農村的下層群眾，自發地起來抗爭，地方黨員也不屑一顧。再如沿海製販私鹽鹽民反鹽巡的抗爭，1933年初中共京東特委所以設於沿海的樂亭縣，原本便有利用鹽民鬥爭的意味。然而，樂亭黨卻以為鹽民抗爭「無關緊

22 仲良，〈河北省委組織報告（作為省委工作檢討的補充）〉（1934/02/23），《河北文件 13》，頁 328。

23 石心，〈關於反帝工作報告〉（1934/02/15），《河北文件 13》，頁 263-264。

24 〈河北省委給京東特委的指示信〉（1934/02/23），《河北文件 13》，頁 351。

25 〈河北中央巡視員林蘭關於樂亭經濟特點及組織概況等向中央的報告〉（1934/03/06），《河北文件 13》，頁 497。

要」，還有地方幹部瞧不起下層鹽民，認為他們是流氓。²⁶事實上，冀東地區共產革命的歷史與鹽民抗爭毫無關係。

爆發於 1934 年 1 月的遷安游擊運動也是一場缺乏群眾基礎的單純軍事行動。遷安在過去一直不是冀東黨的工作重點，不過，當京東特委於 1933 年初成立之際，整個冀東黨卻是以遷安的組織最健全。²⁷在 1929 年至 1934 年間，中共在遷安有一個縣委組織，縣委書記一直是由韓東莊擔任。韓的家鄉位於長河沿岸的後韓莊，抗戰前後遷安縣的黨員也大多是長河沿岸人，如韓東莊於 1933 年底以「右派」罪名被開除後，先後接任縣委書記的便是來自長河沿岸之上、下梨樹峪村的樊順和王平陸。其中王平陸原名高永祥，早年赴東北謀生，九一八事變後返鄉，1932 年春入黨，曾擔任遷安縣委書記、冀熱邊特委書記等職，是抗戰爆發前後冀東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²⁸當 1934 年 1 月游擊運動爆發當時，中農出身並曾在中東路做過路警的王平陸正擔任遷安縣委書記兼京東特委組織部長之職（當時京東特委書記是郭滌生，宣傳部長是李葆華），樊順則是遷安縣委組織部長。王、樊二人政治觀念皆很弱，後者還有些恐怖觀念（即害怕招致危險而不敢活動），但兩者好歹也算得上是老黨員。²⁹1934 年 1 月的游擊運動便是

26 〈河北中央巡視員林蘭關於樂亭經濟特點及組織概況等向中央的報告〉（1934/03/06），《河北文件 13》，頁 482-483。

27 〈京東特委關於京東各地工作情形給河北省委的報告〉（1933/02/17），《河北文件 17》，頁 301-305。

28 遷西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遷西縣志》（北京：中國科學科技出版社，1991），頁 393-396、675-677。

29 〈林蘭關於巡視京東特委情況向中央的報告〉（1934/04/01）、〈河北中巡林蘭同志的報告〉（1934/04/24），《河北文件 14》，頁 18-19、166-167。至於特委書記郭滌生，他在國共合作時期入團，1928 年轉黨，曾先後在冀南、焦作、門頭溝、北平、唐山等地從事活動。

以王、樊二人的家鄉為中心展開的。

那麼，導致這場游擊運動發生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可以確定的是，游擊運動的發生絕不是出於群眾「反日」的情緒，至少游擊隊的綱領中完全沒有反日的口號，這是因為游擊隊的領導者認為群眾害怕日本所致。³⁰ 那麼，群眾是因為所謂國民經濟的崩潰、生活的困苦才起來鬥爭的嗎？這種情形當然也有可能，蓋根據遷安縣委所言，遷安的勞苦群眾雖然「披星戴月」地勞動，仍僅能勉強不致餓死而已。³¹ 但是，沒飯吃是一回事，起來抗爭乃至於投入共產革命又是另一回事。事實上，這些窮苦的地方老百姓有自己的辦法滿足生存的需求，如某些地區便有所謂「吃會」的習俗。³² 「吃會」是某種類似「吃大戶」的運動，當時遷安、樂亭等縣有所謂「民眾齊心會」者，便是「吃會」的具體組織形式。雖然地方群眾視齊心會為共產黨，但他們實際上都不清楚共產黨是什麼，當然也不喜歡過共黨的組織生活。³³ 這也就無怪乎遷安雖有五十餘個黨支部，但實際上能經常開會的不過十個而已。³⁴

1933年12月6日（陰曆10月19日）前後，在王平陸的家鄉長河東區，某個村莊的群眾因為鄉長不讓「吃會」，該村「劉同志」跑到上、下梨樹峪幾個村莊通風報信。這些村莊的民眾很生氣，派人把

30 〈京東特委關於遷安游擊戰爭及工作任務給遷安縣委的指示〉（1934/02/21），《河北文件 17》，頁 421。

31 〈河北遷安縣軍委關於游擊戰爭的報告〉（1934/05/05），《河北文件 17》，頁 476。

32 根據李景漢的調查，在冀中定縣也有「吃會」的習俗。每年清明與十月初一，該縣村莊裡同族的男人會組織成會，上墳祭奠，隨後大家就聚在一塊大吃大喝，叫作「吃會」，一方面聯絡感情，一方面商量本族應當進行的事情。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頁 379。

33 〈河北中巡林蘭同志的報告〉（1934/04/24），《河北文件 14》，頁 164、167-170。

34 〈河北省委給京東特委的指示信〉（1934/02/23），《河北文件 13》，頁 349。

該鄉長抓了起來。該鄉長嚇得說「吃會」是好事，他不僅從未阻止，而且還很贊成。後來該村的閻長等也都跑來保證說，明天一定讓群眾「吃會」。至於那位「劉同志」，原來是個「右派」，他現在也不敢堅持鄉長有壓迫「吃會」一事，但後來大家還是決定明天到該村「吃會」。隔天，二百餘人浩浩蕩蕩地跑到那個准許「吃會」的村莊去。但沒想到鄉長、閻長甚至那個「劉同志」全跑了。大夥很生氣，四下搜人，總算把「劉同志」及其兄弟逮了回來，憤怒地跑到「劉同志」家裡「吃會」，以示懲罰。³⁵

「吃會」以後，「統治階級立刻來了一個白色恐怖」。共產黨員也很害怕，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相信群眾的力量，只知依賴軍事的力量，以為沒有武裝即無從反抗，也不能動員群眾。但最後卻正是由於此一無武裝不可的心態，地方黨員才決定立即拉起游擊運動，搶先在當局派兵來鎮壓前，繳獲地方槍械。

最初所有人決定陰曆 12 月 14 日發動，但因為外面風聲緊，所以提前到 12 月 9 日（陽曆 1934 年 1 月 22 日）發動。該日晚六時，各莊游擊隊赴上、下梨樹峪集結，成立了以孫彩為總指揮的京東紅軍游擊隊。最初游擊隊想打同村豪紳「高某」，但地方黨員卻說「一村人，不好意思」，所以沒有打。後來隊伍就跑到周圍各村莊繳槍，還跑去二撥子打「劣紳」王子凡，並攻下王家。但孫彩和幾個領導又說王氏兄弟是好人，所以繳了幾枝槍便走了。隨後游擊隊乃沿途繳槍，途經廟嶺頭的公安局，抓了公安局長，但沒有槍決，所以公安局長途中偷跑去請救兵。初十日，游擊隊跑到鄰近村莊繳槍，但這些村莊的群眾都很害怕，他們雖然贊成游擊隊，但不敢參加，也不敢說誰是土

35 〈河北中巡林蘭同志的報告〉（1934/04/24），《河北文件 14》，頁 171-173。

豪，怕惹麻煩。事實上，游擊隊本身的士氣也日益低落，很多人吵著要回家，途中偷跑了幾個；還有隊員對游擊隊搶人家的「送老衣」（壽衣）很不以為然，說因此沒臉見人，所以把繳來的槍拿回去送還給人了。當天晚上游擊隊接到縣委通知說有黨員被捕致組織破壞，敵人已知道游擊隊的情形，游擊隊因此很恐慌，大家對後來發展的路線吵了起來。王平陸、樊順說要往東去打民團寨子太平寨，但總指揮孫彩吵嚷著要往西走，並向隊員咆哮說民團早有準備，到那裡是尋死，還說你們在上、下梨樹峪的家鄉都被包圍了，別想回家了！後來隊伍一分為二，孫彩領導的一部分往西走，王平陸等人領導另一部分向東跑，沿途被民團追著打，隔天跑到鴿子庵。這時孫彩給敵人打得落花流水地跑了回來，大家更是害怕，最後就解散了。遷安游擊運動不過三天就此結束。³⁶

在河北省委看來，遷安游擊運動簡直就是高蠡暴動的翻版，是一場不注意群眾日常鬥爭而專注於上層軍事準備的游擊運動。而且，如遵化出身的總指揮孫彩，他過去曾擔任招兵委員、後備軍司令，和閻錫山、馮玉祥及張學良都有過聯絡，1933年在某次民眾救亡大會上認識了共產黨，並經共產黨的介紹到遷安活動，成了京東紅軍游擊隊的總指揮。但如同前面所述，孫在游擊運動中根本不聽從黨的指揮，一意孤行；在游擊運動失敗後還跑到遵化去，大刺刺地告訴某位鄉長說：「我是共黨，我現在要拉游擊。」由此可見，孫彩並不像是什麼群眾，而更像是一位帶有些許神經質的「流氓政客」。中共中央巡視

36 關於遷安游擊運動的經過，見：〈河北中巡林蘭同志的報告〉（1934/04/24），《河北文件 14》，頁 174-178；〈河北遷安縣軍委關於游擊戰爭的報告〉（1934/05/05），《河北文件 17》，頁 480-487。

員則批評他：「簡直是混蛋一名！」³⁷

當然，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當時共產黨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地區。1934年1月14日，馬家溝礦失業工人要求復工遭拒，乃聯合工人發動罷工，造成流血衝突事件，是為「一一四慘案」。慘案發生後，林西、唐家莊、趙各莊、秦皇島等處的工人亦發動罷工予以聲援，最後迫使開灤礦務局不得不簽訂勞資協約答應工人的要求，工人始全部復工。而先前未參加同盟罷工的唐山工人見狀，也要求礦務局給予他們勞資協約中享有的工資補助，但礦務局拒絕，開灤五礦又因此發動同盟罷工，最後也迫使礦務局答應其要求。³⁸對於這幾起罷工事件，中共中央也相當重視，並要河北省委集中力量發展該處工作。³⁹然而，儘管當時唐山黨的領導是黎玉、陳少敏⁴⁰等河北省委的重要領導者，但實際的情形卻是共產黨在罷工工人間的影響力甚微，黨對於罷工的理解不僅全來自「道聽途說」，且省委、唐山市委的組織根本就不嚴謹，其中省委連哪裡有多少黨員都不曉得，又如何去指揮他們呢？⁴¹

3月18日晚，唐山礦九道巷工人為抗議國民黨工會委員尙佩榮、劉俊閣等人貪污工人的補助費起來罷工，隔日公安局長趙巽派員鎮

37 〈河北中巡林蘭同志的報告〉(1934/04/24)，《河北文件 14》，頁 179-180。

38 〈河北省委關於唐山罷工的報告兩個〉(1934/02/15)，《河北文件 13》，頁 268-273；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 民國上卷》，頁 170-172。

39 〈中央、全總執行局致河北黨省委與全總辦事處黨團的一封信〉(1934/01/28)，《中央文件 10》，頁 93-102。

40 陳少敏，女，山東壽光人。1927年入團，隔年轉黨，曾在天津市委、唐山市委工作，抗戰爆發前後在冀魯豫邊區工作，1939年後又轉到鄂中、鄂豫邊活動，中共建國後曾先後擔任人大、政協常委等要職，1977年病逝。

41 〈林蘭關於開灤罷工天津北平等工作情形給中央的報告〉(1934/02/18)，《河北文件 13》，頁 297-299。

壓，造成數名工人傷亡，是為「三一九慘案」。當時日本軍方為控制工人，也派趙大中赴唐山組織「河北省戰區礦工聯合自治總工會」，利用工人對國民黨黃色工會的不滿，提出一些「左」的口號，獲得許多工人群眾的支持。⁴²對於共產黨來說，像趙大中這種漢奸並不足懼，因為無論他再怎樣「左」，總有一定限度。然而，事實上，群眾確實認為日本比國民黨還要好，在日本統治下生活或者可以更有保障。⁴³而且中共唐山黨在工人鬥爭綱領上也只提到反帝國主義，並未提及反日本與漢奸的問題。這是因為有的黨員認為有必要強化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矛盾，因此有意無意地走上了「聯合漢奸」的道路，甚至當地的漢奸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共產黨員，與他們合作。⁴⁴

前述諸多群眾抗爭的例子告訴了我們，某些既存的政治網絡與社會關係雖有助於小範圍群眾的結成，但終將束縛更大規模革命運動的開展。如在遷安游擊運動中，中共最初無意地透過「吃會」習俗動員起群眾，但參與者又總是因為「同村人」等關係限制了自己的行動。究其實，群眾與幹部相信的是槍桿子，而不是自己的力量。在唐山等城市工人間，既存的超階級「封建色彩」同鄉會等團體影響力也很大，河北省委巡視員也承認「要用新的工會來代替許多的同鄉會是很難的」。⁴⁵更複雜的是，各派政治勢力競相插足工人運動，工人也依賴政府當局或其他政治黨派的關係去滿足自己的需求，以至中共地方幹部也總是利用別人的招牌動員群眾，但結果中共總是未能及時提出自

42 石心，〈唐山第三次大罷工經過誌要（白 142 號）〉（1934/03/31），《河北文件 13》，頁 626-646；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 民國上卷〉，頁 172-173。

43 〈河北省委給唐山市委的指示信〉（1934/03/31），《河北文件 13》，頁 617-618。

44 〈河北省委給唐山黨的第四次指示信〉（1934/04/10），《河北文件 14》，頁 80、84。

45 〈河北省工運報告（一個調查人的報告）〉（1932/06），《河北文件 8》，頁 526。

己的政治面目，迨運動過後，群眾仍不知共產黨為何物，下場還是為人作嫁的革命。後來中共或許發現了這種作法並不妥當，不准幹部再借用別人的招牌，要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爭取群眾，但如 1934 年 3 月唐山工人罷工後陸續爆發的唐家莊礦的搶煤鬥爭與林西礦響應唐家莊工人的鬥爭（4 月 17-18 日），⁴⁶ 以及趙各莊失業工人「要工」等諸多鬥爭（4 月 28 日前後）所示，⁴⁷ 沒有足夠資源與關係的共產黨，最終只能在群眾運動中扮演旁觀者的角色。

在結束本節以前還應該提一下孫永勤的抗日同盟軍。孫是今日大陸教科書裡的抗日英雄典範，當 1933 年日軍入侵熱河時，他正擔任興隆縣黃花川民團團總（孫本人亦是黃花川人）。據說，在中共的幫助下，孫於該年 12 月發動抗日起義。隨後，孫的抗日救國軍持續在興隆、遵化一帶活動，直迄 1935 年 5 月才在日軍、滿洲國軍及國軍的圍剿下被解決，孫本人也壯烈犧牲。

確實，當時冀熱邊有許多股「抗日」武裝與中共有聯繫，孫永勤只是其中的一股。但當地負責聯絡與組織武裝游擊隊的黨員，並不清楚游擊運動的正確意義。他們或是「像強盜暗暗地偷人家」一樣，只敢秘密地幹，要不就是因為有了槍桿子，變得無所顧忌，以至忽略了群眾的動員。⁴⁸ 如孫永勤部活動之遵化縣，該縣黨員還是像前一年遷安游擊運動一樣，完全依賴槍桿子的力量去計劃游擊運動。他們「保持著洪秀全、孫中山所謂揭竿而起的革命觀念，以為有了武裝，什麼都不怕」。⁴⁹ 由這些人發動的共產革命，恐怕也難以避免重蹈單純軍

46 〈河北省委給唐山市委第五次指示信〉(1934/04/20)，《河北文件 14》，頁 118、120。

47 〈唐山工作報告〉(1934/04/29)，《河北文件 14》，頁 183。

48 〈冀熱邊區目前的中心工作是什麼？〉(1935/08/10)，《河北文件 16》，頁 309。

49 〈論開展京東的游擊運動與其工作〉(1935/05/14)，《河北文件 16》，頁 492。

事行動的覆轍。

第二節 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與崩潰

一、從河北省委到冀熱察區黨委

在 1935 年後，有關河北省委的資料愈益零散，其中關於冀東和其他農村地區的報告也不多見。所以如此，一個主要的原因便是河北省委自從 1933 年察哈爾事變前後遭受一連串的破壞以來，歷經了 1934 年的鐵夫路線之爭後，已是每況愈下。同時，由於 1935 年以後，中共中央因為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失敗，被迫輾轉遷移，河北省委與中央的關係一度斷絕，經濟來源也因此中斷，其中如自 1935 年 2 月後擔任河北省委書記的高文華還被迫鬻子以籌得黨的經費。⁵⁰ 在此無米可炊的窘態下，省委都自身難保了，當然也無力顧及農村黨的工作。

此一窘態直到 1936 年春劉少奇到來以後才有所緩和。如本文第二章所述，劉在 1928 年初時曾作為中央巡視員前來領導順直省委工作，但當時河北地方黨員頗不喜歡劉，劉也不贊同這些地方黨員的看法，兩者因此爆發了衝突。後來劉被調離河北，並赴東北等地工作，曾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等要職。1933 年劉赴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負責領導工人運動。1934 年底，劉隨中央紅軍長征，並於 1935 年 10 月抵達陝北。當此之時，河北省委也透過時任陝西省委書記的前河北省委書記（1934 年 7 月至 1935 年 2 月）朱理治與中共中央接上了頭，中共中央因此獲知河北省委的窘態，也得知

50 高文華，〈抗戰前夕的河北省委〉，《河北黨史資料》，輯 2，頁 13-15。

1935年原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在離開天津赴蘇聯之際，曾成立了一個北方局。該局雖然擔負河北及鄰近諸省的指揮職務，但實際上與河北省委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兩者的書記、組織與宣傳部長皆是高文華、柯慶施與李大章），實需派人去加強工作。因此緣故，193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便決定派劉少奇作為中央駐北方代表，去平、津領導北方局的工作。⁵¹

劉少奇在隔年春抵達平、津後，接收北方局的領導工作，並先後指派前一年剛出獄並在天津活動的彭真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陳伯達擔任宣傳部長，以及林楓擔任北方局秘書，另外開始積極恢復河北、山東、河南、山西省委的組織，其中原本由北方局成員負責的河北省委工作，書記仍舊由高文華擔任。⁵²從此，北方局與河北省委就分開成上下從屬的兩個機構。

根據當事人的回憶，此一時期的河北省委與過去的河北省委有很大的不同。儘管沒有直接的資料證實，但可以推測的是，河北省委自劉少奇來到以後，其所管轄的範圍已縮小至冀東、冀南，以及省委的所在地天津。根據馬輝之的回憶，當時北方局設在北平，在天津則另設有一個北方局工作組（馬連河北省委都沒提到），負責領導天津市委、京東特委和直南特委的工作，馬在1935年9月出獄後不久即被派到該工作組工作。⁵³1937年4月在延安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後，河北省委再度改組。鑒於河北省當時已形成冀東的淪陷區與平漢路沿線的國統區兩部分，中共中央決定將河北省委一分為二，其中平漢路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45。

52 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共中央北方局 綜合卷》，頁199-200。

53 馬輝之，〈回憶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前後〉，《中共黨史資料》，輯4（北京，1982），頁262。

沿線設立了一個平漢線省委，由李菁玉擔任書記；至於仍設在天津的河北省委，只負責管轄北寧路沿線的各城市及冀東地區，故又被稱為冀東省委，由冀東出身的李運昌擔任書記。⁵⁴

如前文所述，李運昌是一位頗富黨內鬥爭經驗的幹部。當 1928 年時，他曾參加京東護黨請願團，向中共中央控告劉少奇與陳潭秋。1931 年河北省委籌備處事件前後，他剛從滿洲回來，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並與籌備處有關係。1936 年夏，李擔任京東特委書記。當時冀東地區的黨領導機關有兩個，一個是冀熱邊特委，另一個便是京東特委。兩者管轄範圍以北寧路為界，路北地區由王平陸擔任書記的冀熱邊特委領導，李運昌的京東特委則負責管轄路南地區的黨務。

1937 年，李運昌自白區工作會議歸來後，擔任河北省委書記一職。7 月底，平、津失陷，劉少奇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太原建立新的北方局，同時還請中央電示河北省委負責領導平津、冀東工作，並把工作重心轉移至農村。⁵⁵ 隨後，中共中央於 8 月下旬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在敵後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其中毛澤東在該會上還提出「紅軍可以一部於敵後的冀東，以霧靈山為根據地進行游擊戰爭」。⁵⁶ 基於此一山地游擊戰的路線與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在 9 月底、10 月初致信河北省委書記李運昌，

54 《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頁 105。不過，根據劉少奇在 1938 年 5 月 25 日致河北省委書記馬輝之的電報：「你們現在應集中力量去加強與佈置冀東工作，並援助鄧華部隊。冀魯豫邊區另組省委負責。」可見河北省委直到當時以前仍負有領導冀南黨的職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217。

5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186-187。

56 中共河北省黨史研究室編，《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頁 19。

要他準備發動冀東游擊戰爭，以配合八路軍建立以燕山山脈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⁵⁷

李運昌接到指示後，旋即回到冀東擔任冀熱邊特委書記，從事路北地區抗日游擊戰之準備工作。隨後河北省委又派胡錫奎赴冀東擔任京東特委書記，負責路南地區的準備工作。胡是湖北孝感人，1925年入黨，後赴莫斯科學習，曾參加六大，回國後即在河北工作，1931年河北省委一連串的破壞中被捕，抗戰前夕出獄，是日後冀東抗日根據地的首要領導人物之一。另外，李運昌所遺留下來之河北省委書記的遺缺，則由馬輝之接任。當時河北省委設在天津租界，成員除馬輝之外，還有任宣傳部長兼天津市委書記的姚依林、組織部長吳德、軍事部長林鐵，他們的工作也是以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和準備冀東暴動為重點。馬輝之是湖南長沙人，工人運動出身，1926年入黨；姚依林是安徽省池州人，學生出身，1935年在北平念書時入黨，日後曾當到中共國務院的副總理；吳德是河北豐潤人，唐山工人出身，1933年入黨；林鐵則是四川萬縣人，學生出身，1926年入黨，後一直在法國、莫斯科活動，1935年才回到東北、北方地區活動。他們都是後來河北、冀東地區活動的主要領導者，也是中共建國後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

在1938年7月冀東抗日大暴動以後，河北省委領導成員奉命轉移至冀東地區工作，另成立冀熱察區黨委，領導冀東、平西、平北地區敵後根據地工作（不包括城市，平、津、唐山另成立平津唐點線工作委員會負責），⁵⁸書記仍由馬輝之擔任。省委機關也在同年10月被

5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1。

58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抗戰期間中共平、津、唐點線工作委員會組織發展概況〉，《中共黨史資料》，輯18（北京，1986），頁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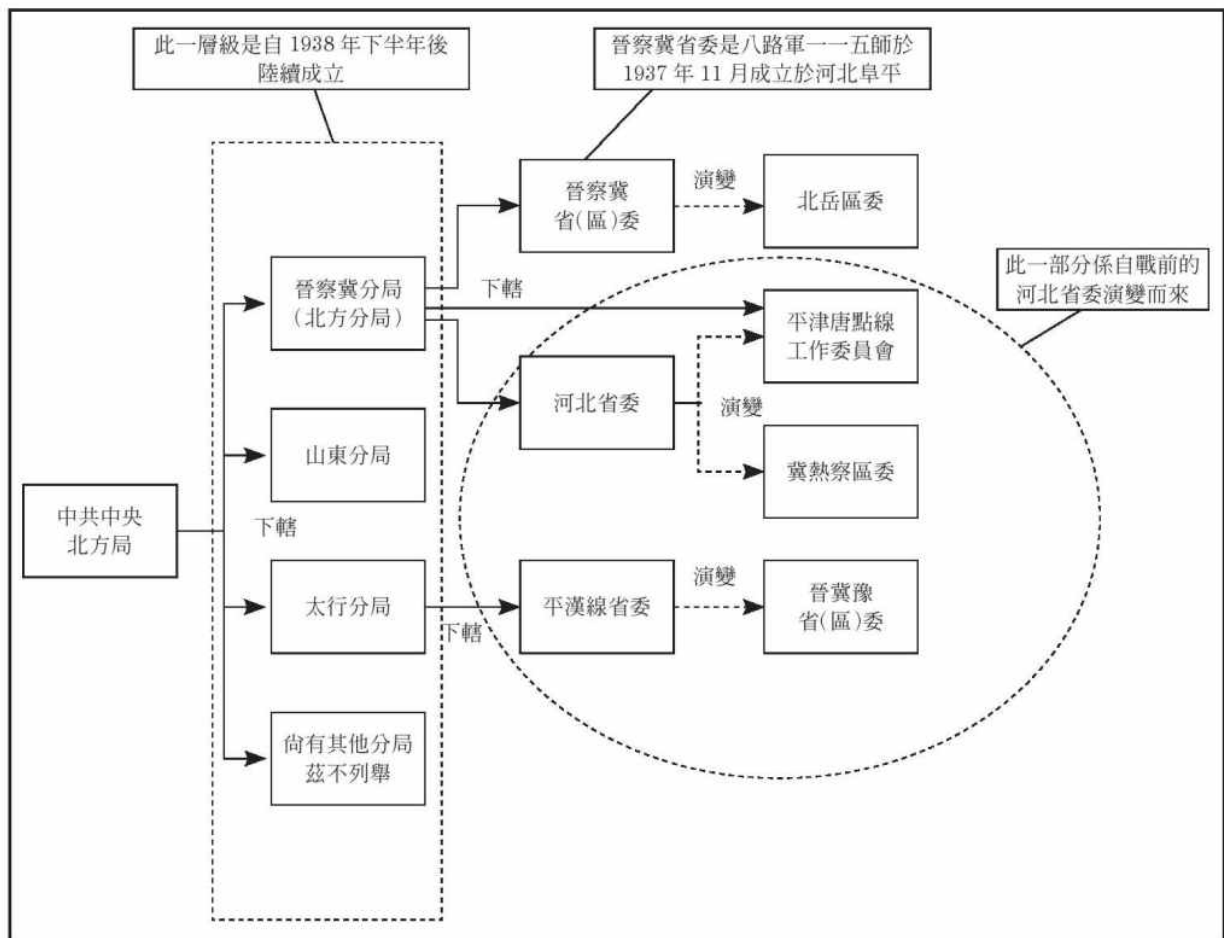
撤銷，以城市工作為重心的河北省委時代就此結束。

二、八路軍的東進與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創建

抗戰初期中共是透過兩個管道進入冀東，一是與冀東出身之上層份子的統戰關係，其次則是直接派八路軍進入冀東。

中共在河北與北方地區的上層統戰，如前幾章所述，一直斷續存在。有的是黨公開或暗中推動者，有的則是地方幹部自作主張的行動。大概在察哈爾事變以後，以平津城市為中心，出現越來越多的統

圖 5-2 抗戰初期北方局與河北黨的黨務系統



戰團體與運動。其中較著名者如楊秀峰、張申府、張友漁等人發動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其他還有「華北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等各式各樣的團體。由於資料與篇幅的局限，我們無法個別深入探究共產黨在這些團體中的作用。但從中共文件來看，中共與河北省委自從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後，是有意地指示各地黨員在武裝自衛的旗幟下，加入到這類的群眾組織中。對於武裝團體，黨員要「不問其任何的黨派關係」，打入其中，在保證黨的正確領導前提下，實行統一戰線，爭取他們的下層群眾，其中已成為「滿洲第二」的北方地區當然更需要積極去推動此一運動。⁵⁹ 對於其他像是「救國會」或「救亡會」等抗日群眾團體，中共也是採取類似手段，要求黨員在「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和不放棄自己面目的原則下參加該組織，爭取大多數群眾到「我們」方面來。⁶⁰

但直迄劉少奇在1936年春來到平津重組北方局前，河北黨似乎並沒有重視此一工作（事實上也是因為當時河北黨屢遭破壞，力不從心之故）。所以劉少奇一來後即在河北省委內部刊物《火線》上撰文痛批過去完全拒絕與其他政治黨派以及非黨份子合作的關門主義，號召黨員從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⁶¹ 可是，如前所述，過去河北黨不是完全沒有「統戰」，甚至經常為了統戰而放棄了黨的領導與階級鬥爭的立場。曾與河北黨有過爭執的劉少奇也清楚知道此一事實，

59 〈中共中央局關於開展武裝自衛運動的指示信〉（1934/07/25），《中央文件 10》，頁 373；〈河北省委關於開展武裝自衛運動的決議〉（1934/08/19），《河北文件 15》，頁 36-55。

60 〈河北省委執行中央關於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信的動員計劃與方法〉（1934/05/08），《河北文件 14》，頁 241-244。

61 〈肅清關門主義冒險主義〉（1936/04/10），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 23-24。

所以他批判關門主義後，旋即撰文警示「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右傾思想就將逐漸成爲主要危險」，其具體表現就在於「放棄與忽視爭取領導權的鬥爭，取消無產階級的獨立，放棄與停止對於階級鬥爭的領導」等等。因此，劉少奇疾呼：「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運動中，絕不停止與忽略階級鬥爭，統一戰線也需要這種鬥爭來充實自己。」⁶²沒有黨的領導與階級鬥爭的基礎，統一戰線就不能鞏固，抗戰也必然失敗。因爲，如同劉在隔年於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所言，如果統一戰線的領導人「是資產階級，那對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就不可能；是無產階級，那對日戰爭必然徹底勝利，並將使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⁶³

在此一原則下，劉少奇自從重組北方局以來，就積極派遣黨員與北方各實力派及上層份子聯合。其中較著名者如派遣薄一波赴太原做閻錫山的工作，派張經武到山東韓復榘部工作。關於本文所欲談的冀

62 〈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1936/11/20），《劉少奇選集》，上卷，頁47、53。

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78-179。眾所皆知，把階級鬥爭當作維繫統一戰線的關鍵，並不是當時中共黨內支配的路線。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才折服那些認爲中共不能完全獨立自主的將領，堅持「防人之心不可無，（國共兩黨）在階級上根本是敵人」的立場。在1937年底，王明從莫斯科回到中國，又要求中共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和服從統一戰線的行動口號，許多中共黨內領導也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但毛澤東仍相信問題的關鍵在於堅持階級鬥爭，與王明的觀點在黨內形成對立。毛在1938年9-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堅稱「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能忘記統一的同時，不能不輔之以鬥爭的原則，因爲鬥爭正是爲了統一，沒有鬥爭就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也是在這場會議上，毛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獲得確認，他的觀點也支配了全黨。而劉少奇在1936年毛的觀點還沒支配全黨之際，就開始提出與堅持和毛相同的看法，也可窺見其在黨內與毛的關係，並足見劉對河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建設之重要性。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352-372。

東地區，北方局與河北黨也透過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從事統戰活動。

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位於天津，1937年9月改組為華北各界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其宗旨雖高舉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領導，⁶⁴但據姚依林的回憶，該會是共產黨外圍的統戰團體。共產黨透過黨員個人的社會關係，聯繫政要名流。如姚依林的五叔姚國楨、六叔姚震，是段祺瑞時代安福系要人，北伐後雖然退隱天津當寓公，事實上還是對平、津政局有相當影響，其中姚國楨後來還在冀東與華北防共自治政府擔任要職。姚依林在一二九運動後，避居姚國楨家，結識許多黨政要人，如國民黨CC派、朱家驊的德國同窗王若僖。後來救國會改組為華北各界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名義上的領導就是王若僖。該會透過王與朱家驊的關係，獲得國民黨的認可與經濟上的援助。當時冀東黨還利用姚國楨等人的關係，打入日偽政權，如為朱欣陶在冀東防共政府裡安插職位。⁶⁵ 後者是同情共黨人士，他雖然在1945年才入黨，但此前一直暗中與共黨往來，提供共黨日偽方面的情報。

當時與共黨有統戰關係的冀東上層份子，還有如來自遷安縣楊團堡的基督教徒楊十三（楊彥倫）。楊是南開中學出身，曾參加五四運動時周恩來所創辦的覺悟社，後來赴美國留學，抗戰爆發前夕在天津河北省立工業學院擔任教授，在天津教育界與冀東地區頗富盛名。另外，在楊十三介紹下擔任工業學院齋務課課員的洪麟閣（洪占勳），原是國民黨員，曾在馮玉祥的部隊裡當過軍法處長，同樣是在天津和冀東地區聲望很高的社會名流。⁶⁶ 除了教育家外，中共還聯絡了一些

64 〈華北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政治綱領草案〉(1937/10)，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東抗日暴動》(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頁37。

65 姚依林，《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頁83-84、100-101。

66 《唐山市志》，頁3344；連以農，〈楊十三先生投身冀東暴動的前後情況〉，冀熱遼

民團團長等地方武裝領導出身的上層份子，如灤縣多余屯村的地主高志遠，他雖未在天津工作，但也是救國會的成員。高志遠是灤縣馬城民團團總，因為與灤縣「偽」保安隊長劉佐周不和，在 1935 年時曾聯合灤縣小陳莊出身的聯莊會會長陳宇寰一同反對劉佐周，後來陳因此被捕入獄，高則在灤縣車站把劉刺死。⁶⁷ 這些冀東上層份子，後來都成爲「冀東大暴動」的發起人。

順便一提的是，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之共黨黨團負責人是李楚離、王仲華二人。李楚離是前述 1929 年間曾在山東煙台劉珍年部中工作並於 1931 年遭到逮捕的中共北方軍運幹部之一，他和胡錫奎一樣是 1936 年時被釋放出獄者。王仲華（董毓華，湖北蘄春人）則是一個早在 1926 年時便在董必武介紹下入黨的老幹部，曾領導家鄉的農民暴動，1933 年到北平念書，後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他與李楚離皆是抗戰時期冀東黨的重要領導人物。⁶⁸

除了通過地方上層份子的關係外，中共打入冀東的另一個管道就是派八路軍直接到當地建立敵後根據地。在 1937 年 8 月下旬中共洛川會議後，中共與國民黨達成協議，改組紅軍爲八路軍，由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任副司令。隨後，八路軍開赴前線作戰，其中由一一五

人民抗日鬥爭史研究編輯室，《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 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頁 121-123。

67 《唐山市志》，頁 3326-3327、3362-3363；李運昌，〈冀東抗日大暴動〉，《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 1》，頁 41。根據冀東黨員曹致福的回憶，高志遠與劉佐周的衝突實係兩個地方武裝派系的衝突，並不是由於劉是漢奸而高是個抗日份子的緣故。曹致福，〈灤南暴動和西撤〉，《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 1》，頁 127。當時河北省委也說「劉佐周的死是漢奸內部爭風的火拼」，這似乎意味著高志遠原本也是個「漢奸」。〈冀熱邊區目前的中心工作是什麼？〉（1935/08/11），《河北文件 16》，頁 311。

68 《唐山市志》，頁 3367。王仲華於 1940 年病逝於中共平西抗日根據地。

師政委聶榮臻所率之部在晉東北五台山地區一帶活動，並乘國軍敗退、地方政權空虛之際，在 1938 年 1 月先斬後奏地於河北阜平成立了晉察冀邊區政府，作為該地區最高的政權機關。

聶榮臻的軍隊在 1938 年前並未越過平漢路。事實上，毛澤東是在 1937 年底才提出擬趁敵人空虛，要八路軍一二九師與晉察冀邊區的聶榮臻部各派一個支隊到平漢路東部游擊。⁶⁹ 而八路軍所以遲遲未跨越平漢線，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平漢線以東是廣大的平原地區，不僅向來嫻熟於山地游擊戰的紅軍相當懷疑能否在平原地區作戰與建立根據地，剛由國民黨陣營叛降過來的冀中呂正操部對於在平原地區進行游擊戰爭也沒有信心。⁷⁰ 八路軍不敢跨越平漢線，中共就難以在廣大的河北平原建立根據地。正如劉少奇所形容般，當時河北敵後地區存在著各種派別與矛盾，是一個「中國政府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也是我們抗戰力量比較小、敵人力量比較大的地方」。⁷¹ 事實也確是如此，如前所述，河北社會原來就是一個被各式各樣的黨派、網絡與關係所撕裂的社會，日軍的入侵，國民政府的後撤，只是激化了這些既存的分裂，並使其浮上檯面。共產黨或許可以依循這些既存裂痕，打入其中，但這只是使自身成為此一分裂社會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對於中共來說，更重要的是要駕馭此一分裂的社會。這也正是中共何以要派八路軍深入敵後，而不僅僅是依靠上述那些冀東上層份子的合作建立根據地的原因。

1938 年初，日軍南下進窺武漢，河北後方因此空虛，中共乃乘

6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41-42。

70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頁 393。

71 〈華北地區工作經驗〉，《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206-207。

此機會躍進「路東」，⁷² 在冀中地區由叛降的國軍呂正操部負責路東二十七縣的活動，⁷³ 在冀南地區有來自山西遼縣、由徐向前領導的一二九師「路東縱隊」。⁷⁴ 至於在冀東地區，毛澤東最初也希望藉由八路軍的力量去開創根據地。在1938年2月初，毛澤東便致電朱德、彭德懷等人說以冀東「霧靈山為中心的區域，有擴大發展前途，但是獨立作戰區域，派去部隊須較精幹，且不宜過少，軍政黨領導人需有獨立應付新環境的能力，出發前須作充分準備」，此即所謂「霧靈山計劃」。⁷⁵ 劉少奇也在隨後3月27日致電聶榮臻、彭真：「冀東游擊戰爭的發動應取得晉察冀邊區八路軍的直接幫助。」⁷⁶ 這些電報告訴我們，冀東抗日根據地的開創與否，外來八路軍的力量立於相當關鍵的地位。

但是，要派哪支隊伍去呢？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在2月10日電示主持晉察冀邊區的聶榮臻，要他立即準備派一支一千五百人左右的精幹支隊，由楊成武或鄧華指揮，準備向冀東出發。⁷⁷ 在同一時間河北省委派李楚離去阜平與聶榮臻就冀東游擊運動之事商談後，晉察冀軍區旋即決定派第一軍分區政委鄧華赴平西活動，準備東進冀東。⁷⁸ 鄧華是湖南郴州人，1927年入黨，國民黨清黨後隨紅軍到井

72 日軍南下是中共躍進敵後的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見：蕭克，〈抗戰中的冀熱察挺進軍〉，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512。

73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16。

74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404-405。

75 〈毛澤東關於以霧靈山為中心開展游擊戰爭致朱德、彭德懷等電〉（1938/02/09），《冀東抗日暴動》，頁38。

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209。

77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頁222。

78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22。

崗山、贛南活動，是個有豐富軍事經驗的紅軍幹部。在接到晉察冀軍區的命令後，鄧華支隊即赴位於現今北平市門頭溝區的齋堂川建立「平西根據地」，以作為向東發展的準備。與此同時，來自雁北地區的宋時輪支隊也於 1938 年 5 月 25 日抵達宛平縣的杜家莊，奉命與鄧部合組成由宋時輪擔任司令員，鄧華擔任政委的八路軍第四縱隊，並於 6 月 8 日正式向冀東開拔。⁷⁹ 根據聶榮臻所言，當時第四縱隊的首要目標是要先佔據霧靈山所在的興隆縣，作為進一步向東發展的中心。⁸⁰ 6 月中旬，鄧華部佔領興隆縣城。6 月下旬，整個第四縱隊抵達薊縣的靠山集、將軍關、下營一帶，聶榮臻即致電宋、鄧，要他們以霧靈山為中心向四周發展，建立興隆、遵化、遷安三縣的根據地。⁸¹ 很明顯的，聶榮臻與宋、鄧最初所屬意的是位於冀東西部並接鄰熱河的山地地區，而不是冀東東部的平原地帶。

與此同時，冀東地區也爆發了幾起群眾抗爭。1938 年 4 月中旬，開灤五礦礦工發動同盟罷工運動。這場罷工儘管是地方工人為爭取自身利益所發動者，但與包工大櫃（礦方欲取消包工大櫃）、地方商人（礦方所設之合作社搶了商人的生意）的煽動也不無關係。尤有甚者，如同前述之 1934 年開灤五礦同盟罷工運動般，日本在 1938 年的罷工運動中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中由「漢奸」趙萬年所成立之「防共自治工會東礦辦事處」即吸收了相當多的工人加入。此一事件最後由於英方資本家答應工人的要求而結束，這中間恐怕也有日本方

7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214。

80 〈聶榮臻關於乘敵空虛速進冀東建立根據地致毛澤東、朱德、彭德懷並劉少奇電〉（1938/06/12），《冀東抗日暴動》，頁 43。

81 〈聶榮臻關於第四縱隊在冀東活動部署給宋鄧的指示信〉（1938/06/22），《冀東抗日暴動》，頁 45。

面的貢獻。⁸² 因此，開灤五礦的同盟罷工是否能說是冀東「抗日」大暴動的一部分，不無問題。

我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在八路軍第四縱隊到來以前，共產黨在冀東地區並沒有廣泛的下層基礎。事實上，在第四縱隊出發後不久，劉少奇才致電河北省委書記馬輝之要他們集中力量去加強與佈置冀東工作，以援助鄧華支隊。⁸³ 大概在這個時候，河北省委才計劃發動冀東地方暴動聲援第四縱隊。1938年5月，華北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在天津召開會議，該會冀東分會負責人李運昌、洪麟閣、高志遠等人皆參與討論，會議最後決定發動冀東暴動，並組建抗日聯軍。⁸⁴ 5月底，馬輝之赴延安向劉少奇、張聞天等人彙報冀東暴動的籌備狀況。當時劉少奇告訴馬輝之，暴動的時間與地點都必須配合第四縱隊。⁸⁵ 這也就是說，冀東抗日大暴動原本便是為了聲援八路軍之到來才發動者，而且是透過地方上層份子的關係，並不是由下而上地動員群眾起來的。

1938年5月，前述的京東特委與冀熱邊特委合併成一個冀熱邊特委，胡錫奎擔任書記，李運昌擔任軍事部長。6月下旬，甫自天津開會歸來的李運昌等人在豐潤縣田家灣子開會，決定在各地發動暴動，並預計成立六支抗日聯軍總隊（以下簡稱抗聯）。隨後，洪麟閣回到其家鄉地北頭，與楊十三、李楚離等人於7月8日發動了暴動，並成立抗聯第一與第二總隊；王仲華與灤縣民團團長高志遠、聯莊會

82 佚名，〈唐山開灤五礦同盟罷工與反日暴動〉（1940/10），《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1》，頁4-17。

8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217。

84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24。

85 馬輝之，〈回憶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前後〉，《中共黨史資料》，輯4，頁271。

會長陳宇寰則在隔日於灤縣馬城等地發動暴動，並於倂城（今灤南縣縣城）會合來自路北地區的張鶴鳴部，向東發展，攻克了樂亭縣城。至於冀熱邊特委所在的豐灤遷邊界地區也爆發了岩口暴動，暴動的領導者有經常替鄉人寫訟狀的「刀筆先生」豐潤西莊人魏春波、小學教員豐潤蘇莊村人蘇林彥與岩口民團班長閻錫九，他們也都像洪麟閣、高志遠般，是在地方上頗有影響力的上層份子。岩口暴動後成立了抗聯第四總隊（隊長孔慶同、副隊長閻錫九、政治部主任是小學教員出身的灤縣人丁振軍），此一隊伍在隨後的二天內先後佔領了鐵廠、興城（今遷西縣城）等重鎮，還擴編成十一至十四總隊，是抗聯的主力之一。⁸⁶

除此之外，當時冀東各地還建立了共約 39 支的抗聯及其他各式各樣名稱不一的武裝隊伍，由於數目繁多，我們無法在此一一詳細介紹。⁸⁷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這些隊伍並不全是由共產黨所領導者，甚至在那些由共產黨員或與共黨關係密切的份子所領導的武裝中，中共也不見得能夠穩固地掌控該隊伍，如高志遠部便是個例子。據該部黨員曹致福的回憶，高志遠在部隊裡鬧宗派，打擊異己，還鎮壓「革命者」，排擠貧雇農出身的幹部。李運昌後來也批評高志遠部相當差勁，因為該部隊裡甚少黨的骨幹。⁸⁸ 這些事後批評難免誇大，但高志

86 中共豐潤縣委、遷西縣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岩口暴動〉，《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 1》，頁 113-120。魏春波後來死於 1940 年的一場戰役；蘇林彥則一直留在冀東地區工作，1960 年病逝；閻錫九於 1940 年犧牲；丁振軍是灤縣沱子頭人，1935 年入黨，1944 年犧牲。《遷西縣志》，頁 679-680；《唐山市志》，頁 3354、3365-3366、3381-3382。

87 冀東大暴動的經過可見：李運昌，〈冀東抗日大暴動〉，《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 1》，頁 36-42。

88 李運昌，〈冀東抗日大暴動〉、曹致福，〈灤南暴動和西撤〉，《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 1》，頁 43、129。

遠在隔年春被共產黨殺害於平西地區卻也是事實（見下述）。由此看來，所謂冀東「抗日」大暴動，恐怕僅係河北省委太急於呼應外來的八路軍，臨時結合某些立場模糊的地方上層份子，發動的地方暴動。⁸⁹ 若是如此，這些活動與過去抗戰前河北地區的革命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單純軍事行動」，並無二致。

三、八路軍的西撤與冀東抗日勢力之瓦解

冀東地區地形北高南低，大抵說來，在長城以北（口外）地區是以山地為主，長城以南（口裡）則是灤河等諸河流交錯縱橫的平原和低地。第四縱隊最初設想的根據地中心興隆縣位於長城以北的山地地區，這與紅軍習於山地游擊戰以及該地接近後方晉察冀邊區當然不無關係。但冀東抗聯部隊活動的地區卻多位於冀東東部與南部的平原地帶，該地區不僅不適合部隊藏身，且由於敵方交通便利，以及河流眾多、地勢低窪而不適於行軍，⁹⁰ 所以第四縱隊最初並沒有打算向東與地方抗聯部隊會合。

然而，在「冀東大暴動」爆發後，河北省委即致電中央要求「冀東我軍」（即第四縱隊）向冀東東部的遷安、遵化、盧龍一帶發展。⁹¹ 聶榮臻並不贊成這種看法，他認為第四縱隊還是應該留在薊縣、平

89 馬輝之後來也自我批評承認，當時冀東幹部太看輕敵方，以為日本只會派偽軍而非日軍來鎮壓；還抱著「要幹就大幹」的心態，輕率地發動暴動。馬輝之，〈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1939/01），《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24-29。

90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委會冀熱遼分會編，《冀熱遼報告(-)》（出版地不詳：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輯部，1982），頁2。

91 〈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冀東敵情與幾點要求致中央電〉（1938/07/02），《冀東抗日暴動》，頁47。

谷、密雲等西北部地區，待站穩腳跟後再逐漸向東南延伸，蓋「在敵人的遠後方發展游擊戰爭，沒有根據地是比較困難的」。⁹² 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倒也不是反對聶榮臻的看法，但他們還是致電聶榮臻，要他速命第四縱隊立刻派一營左右的兵力東出玉田、豐潤、灤縣一帶，援助地方游擊隊。蓋這些游擊隊的系統相當紊亂，而且由於日軍已開始向它們發動進攻，若沒有適當的援助，這些游擊隊將可能遭到殲滅的命運。⁹³

就在毛澤東、劉少奇的催促下，第四縱隊總算派了一部分主力東進，並於 1938 年 8 月中旬在遵化鐵廠與李運昌等人領導的冀東抗日聯軍會師。8 月下旬，四縱黨委、冀熱邊特委與抗聯各領導人在鐵廠召開會議，決議成立八路軍冀察熱寧軍區與冀察熱寧邊區行政委員會。⁹⁴ 不過，這些決議並未付諸實現，因為毛澤東、劉少奇認為第四縱隊應先從下層的縣、區政府開始建設起，待一、二個月後再成立邊區政府。另一方面，毛、劉等中央領導還致電聶榮臻、宋時輪、鄧華與馬輝之，要他們把隊伍分散到各區，與各游擊隊混編，使地方游擊隊迅速正規化，事實上就是要加強對地方部隊的控制。⁹⁵ 這兩個辦法，建立下層政權的目的是要繞過地方上層份子，紮根下層群眾；混編地方游擊隊，則是要奪取地方上層份子的武裝。從這兩點來看，毛

92 〈聶榮臻關於宋時輪、鄧華部隊必須在薊縣平谷密雲地區加緊工作等問題致劉少奇電〉(1938/08/04)，《冀東抗日暴動》，頁 52。

93 〈毛澤東、王稼祥、劉少奇關於宋時輪、鄧華應立即派遣兵力並帶幹部東出玉田豐潤灤縣配合游擊隊行動給聶榮臻、彭真的指示電〉(1938/08/13)、〈劉少奇關於速令宋時輪、鄧華派部隊和幹部去冀東指示電〉(1938/08/15)，《冀東抗日暴動》，頁 55-56。

94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 33-34。

95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233-234。

等人的戰略與過去河北省委片面聯絡地方上層份子的「單純軍事行動」，有本質上的不同。

毛澤東等人以為，只要有群眾，共軍就能夠如魚得水般，在廣大的河北平原地區進行「平原游擊戰」。⁹⁶ 但是，對於向來嫻熟於山地游擊戰的外來領導如宋時輪、鄧華，以及只知聯合上層份子進行「單純軍事行動」的河北地方幹部李運昌等人來說，平原游擊戰戰術窒礙難行，所以他們還沒接到上面的指示，就斷然決定把部隊向長城外的都山開去。途中，部隊慘遭痛擊，再度打擊第四縱隊留在冀東發展的決心。隨後，四縱黨委在遷安的蓮花院召開會議，主張冀東是平原地區，交通便利，利於敵軍調動，加上青紗帳倒後，部隊難以堅持，乃決議部隊主力撤回平西，僅留下陳群、包森、單德貴三個支隊在冀東地區堅持活動。⁹⁷

共黨在冀東地區由於太依賴外來的八路軍，不能打入地方群眾，以至不相信平原游擊戰的可行性，此乃當時華北平原敵後根據地普遍存在的現象。如冀南的徐向前、冀中的呂正操，雖都曾撰文介紹過平原游擊戰，⁹⁸ 但結果都未能很好地貫徹。如冀中主力八路軍第三縱隊

96 在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劉少奇致朱德、彭德懷等八路軍領導說：「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和群眾工作正在深入這兩個條件下，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大地發展與堅持游擊戰爭是可能的。黨和八路軍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採取盡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鬥爭。」《毛澤東年譜》，中卷，頁64。

97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35。陳群是安徽六安人，1930年加入紅軍，是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出身的幹部，抗戰時期在冀東地區擔任軍事領導工作，1941年陣亡。包森（趙寶森），陝西蒲城人，1932年入黨，1933年被捕入獄，抗戰爆發後隨八路軍第四縱隊赴冀東活動，1942年陣亡。單德貴則因日後叛降日本，故其經歷不詳。

98 徐向前，〈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1938/05），《冀南歷史文獻選編》，頁8-13；呂正操，〈論平原游擊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司令員呂正操，政委先後為王平、程子華)，直迄 1940 年仍依循「保衛邊區山岳地帶，基本根據依靠山地為依托，堅持長期持久的平原游擊戰爭」的方針，主力不敢離太行山太遠，⁹⁹ 就像冀東的四縱不敢輕易地向路南平原地區發展一樣。冀南的劉伯承在 1941 年時也痛斥，地方幹部還是有「單憑軍隊打天下的觀點」，「非用大兵不能挽回政治頹勢」，結果招致更大的失敗，以及根據地的萎縮。¹⁰⁰ 這正說明了，外來的軍事組織力量，沒有發動地方群眾由下而上地配合，不可能立足地方。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相信地方群眾是能夠而且應該被發動，所以他們堅持平原游擊戰的可行性，也極力反對四縱西撤，主張四縱的主力仍應留在白河以東活動，只以部分的力量到白河以西發展根據地。¹⁰¹ 鄧華在接到此一指示後，也曾一度堅持繼續留在冀東開創根據地。但宋時輪當時卻因為日軍的圍剿，催促鄧華儘速率部西撤，而宋本人也於 1938 年 9 月中旬開始西撤。但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還是反對四縱主力西撤，並致電宋時輪、鄧華說部隊撤退到白河以西將會發生許多困難，只有到萬不得已時才向白河以西撤離。¹⁰² 原來主張先

99 第八路軍第三縱隊司令部，《三年來堅持冀中平原游擊戰爭關於戰術問題的參考》（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0 年 8 月）。但這不是說中共只要平原根據地，而不要山地根據地。相反的，兩者應是互相依存。但是，迂迴於山地，「只能看作為打破敵人進攻而採取的一種手段」，所以部隊只能「短促地」離開平原，更不應該主觀上存在依靠山地的觀念。因為這會使部隊一遇到困難，輕易離開平原。蕭克，〈新的抗戰根據地的創造問題〉（1940/03），《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80。

100 劉伯承，《一二九師一九四一年軍事工作總結報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1）。

101 〈毛澤東等關於以高度克服困難的精神去創建冀熱察根據地的指示〉（1938/09/26），《冀東抗日暴動》，頁 63。

102 〈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關於在遵化、玉田、遷安地區建立根據地指示電〉（1938/10/08），《冀東抗日暴動》，頁 66-67。

在興隆、薊縣等冀東西部地區站穩腳跟後再向東南部地區發展的聶榮臻，此時也不贊同宋、鄧放棄冀東根據地西撤，要求他們在「現地立下決心站穩自己足跟，以便解決一切問題」。¹⁰³

然而，當時不僅宋時輪、鄧華等八路軍將領主張西撤，連河北省委領導馬輝之、姚依林等人也認為在「遵、玉、豐建立根據地的指示，是非常不利的」，乃帶著高志遠、洪麟閣等抗聯隊伍一同西撤。¹⁰⁴ 劉少奇對此相當不滿意，乃致電河北省委說「冀東游擊隊四、五萬人一起西退，是很不妥的計劃」，頂多也只能允許其中一萬人在宋時輪、鄧華的護送下西撤至察哈爾南部交八路軍收編，其他隊伍仍應留在冀東地區發展游擊運動。¹⁰⁵ 然而，為時已晚，自10月上旬第四縱隊、河北省委、冀熱邊特委與抗聯負責人在豐潤縣九間房召開的聯席會議上一致決議西撤後，四縱與抗聯總數達五萬人以上的隊伍早已浩浩蕩蕩地走上西撤之途。也正如劉少奇等人預測般，此一總退卻是很不妥的計劃。在西撤途中，隊伍不斷遭到敵軍襲擊，傷亡慘重，某些重要將領如抗聯領袖洪麟閣在途中陣亡。部分冀東領導人如李運昌、李楚離與胡錫奎因此認為繼續西撤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故在途中又率領部分抗聯東返冀東，只剩下高志遠的抗聯隊伍擔任的先頭部隊隨四縱抵達平西。¹⁰⁶ 聶榮臻後來也感嘆地向毛澤東報告說：「這次從冀東撤

103 〈聶榮臻關於請決心在冀熱立足，不宜回平綏南部指示電〉（1938/10/11），《冀東抗日暴動》，頁 67-68。

104 〈馬輝之、姚依林、鄧華關於建議還是以西進為有利致總部、中央電〉（1938/10/05），《冀東抗日暴動》，頁 69-70。

105 〈劉少奇關於冀東游擊隊轉移及堅持冀東問題給河北省委指示電〉（1938/10/17），《冀東抗日暴動》，頁 70-71。

106 關於四縱與抗聯西撤的經過，見：《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 37-40。

回，沿途減員很多，地方武裝大部分未帶出，很可惜。」¹⁰⁷ 無論如何，共黨首度建立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嘗試，至此為止可說是以失敗告終。

四、「三位一體」方針

對於此一結局，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當然是既失望又不滿，正如彭真日後的評論，此一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主觀領導上的錯誤和缺點。¹⁰⁸ 還有，在失敗前夕，冀東部隊內部便曾為西撤問題發生「不團結」現象，¹⁰⁹ 這更加深毛等中央領導的不快。為此，在 1938 年 11 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毛澤東乃致電朱德、彭德懷與聶榮臻說冀熱察區仍有許多有利條件可供堅持游擊戰爭和建立游擊根據地，並派蕭克從延安前去晉察冀邊區成立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與軍政委員會，以待他日再入冀東發展。¹¹⁰

蕭克在 1939 年初抵達平西地區，當時中共中央業已於該年 1 月在河北省平山縣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晉察冀分局（又稱北方分局），以彭真為書記。蕭克抵達後也立即成立了冀熱察挺進軍與冀熱察軍政委員會，而原由馬輝之所領導的河北省委則被改組為冀熱察區黨委，仍由馬輝之擔任書記。¹¹¹ 從此以後，冀東根據地便完全劃歸晉察冀邊區之北方分局管轄。

107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頁 266。

108 彭真，〈冀東過去及今後工作〉（1940/04/10），《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89。

109 〈毛澤東等關於在冀熱邊區創造根據地指示電〉（1938/10/02），《冀東抗日暴動》，頁 65-66。

110 〈毛澤東等關於冀熱察區工作的指示電〉（1938/11/25），《冀東抗日暴動》，頁 72-73。

111 馬輝之，〈回憶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前後〉，《中共黨史資料》，輯 4，頁 282-283。

這個時候，中共與晉察冀邊區領導關於冀東地區的策略發生了轉變。蓋自 1938 年的西撤以後，中共留在冀東的部隊所剩無幾，其中正規軍隊總計約 2,500 人左右，地方游擊隊則不足千人，加上彈藥、食糧補充的困難，處境維艱。¹¹² 特別嚴重的是，自從 1938 年的冀東大暴動以後，日本方面加強對冀東地區的控制。根據蕭克在 1939 年 4 月的報告，當時日方已控制燕山山脈各要隘，並在北寧路的各戰略要點築起堡壘，還修築了唐山、馬蘭峪等共九處的機場，因此緣故，非待 6 月青紗帳再起時不能行動。¹¹³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當時北方分局也認為，冀東根據地雖未能鞏固起來，但這並不能說冀東游擊戰根本失敗；相反的，在冀東依然要成立與創造根據地，儘管這是一個長期且艱苦的事業。¹¹⁴ 也正因為是長期的事業，所以目前不急於派八路軍孤軍深入。朱德、彭德懷在 1939 年 4 月 21 日致聶榮臻的電報中便指出，冀熱察挺進軍應以平西為中心，穩固地向北發展，待在冀、熱、察三省邊區山岳地帶建立游擊根據地後，再相機向冀東、熱南發展。6 月中旬，北方分局在唐縣軍城召開會議，研究冀東問題。會議正式決定：八路軍正規部隊不再挺進冀東，冀東的堅持與發展，主要依靠地方黨發動冀東的群眾鬥爭，以建立小股的游擊隊和多塊小根據地，並由此發展成大股游擊隊和大塊根據地。¹¹⁵ 簡單地說，當時共黨在「冀熱察」區執行的方針

112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頁 266、273。

113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頁 281。

114 〈聶榮臻：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黨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39/01），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 149-150。

115 蕭克依據根據地穩固程度，把根據地分成根據地、游擊根據地兩種，其中後者又分為大塊與小塊游擊根據地。而冀東在此時只是小塊游擊根據地。蕭克，〈新的抗

是「鞏固平西根據地，向北發展，相機向冀東挺進」（鞏固平西、發展平北、堅持冀東）。其中，冀東地區的發展是放在此「三位一體」方針中的最後順位。¹¹⁶

平西是以涑水、宛平、涿鹿交界一帶為中心的根據地，平北則是位於昌平以北，赤城、延慶、懷柔一帶的根據地。雖然圍繞在北平周圍，但在中共看來，這兩個地區的環境與群眾極其落後。當時中共的報導員形容平西農民「還穿著明朝時代的服飾，直到民國十八年才知道天下是變成了『民國』了」；女人「光著上身，露著乳房，在山中走著」，男人「常常裸露著粗黑的肉體，在深山曠野烤火」，他們既不知有「祖國」，也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仿佛是一幅原始人的形象。¹¹⁷平北更是落後。該地在日本、偽滿的長期佔領下，敵人統治鞏固，群眾「奴化」深入。在豐寧、灤平一帶的兒童都知道「日滿一體」，十幾歲的學生完全不知道「祖國」，反稱中日戰爭是大日本皇軍為「正義」來打「蔣政權與共產黨」。¹¹⁸

群眾落後，黨本身也沒有基礎。在三位一體戰略中，冀東的順位雖然排在最後，但平西、平北原來也是因為中共欲發展冀東才乘勢發展起來者。如前所述，1938年5月前後，鄧華支隊欲前往冀東，經過宛平齋堂，順勢解決該地依附日偽的「反動勢力」後，旋即開拔赴冀東。途中四縱路過平北延慶、永寧一帶，留下伍晉南兩部在該地活

戰根據地的創造問題〉(1940/03)，《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72-86。

116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頁281、284、285；張明遠，《我的回憶》，頁216-219。

117 陝纓，〈創造與發展冀熱察邊游擊戰的平西根據地〉(1940/06/25)，《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123-124。

118 鋒，〈在戰鬥中發展著的平北根據地〉(1940/06/28)，《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133。

動。¹¹⁹ 這個地區過去完全沒有黨的活動，¹²⁰ 四縱留下隊伍一舉，恐怕也只是為保全退路，並沒有要發展根據地的意圖。所以等到三位一體戰略提出後，中共還要另派隊伍到平北發展，而沒有既存的力量可以依靠。

因為中共在平西與平北的基礎比冀東還要薄弱，所以這兩個根據地對外來八路軍的依賴更是嚴重。張明遠後來就直言不諱地說，平西完全是依賴軍事的優勢以及軍隊派出的工作人員，「由上而下」發展起來者。¹²¹ 這些外來軍隊與幹部，很多是帶著游擊主義「抓一把」的心態——用蕭克的話來說，就是來要槍、要錢和要人，¹²² 看在地方上層份子與群眾的眼中，八路軍也不過是另一支外來客軍。故在1938年6月鄧華支隊路過平西開赴冀東後，涞水三坡（今野三坡）等地立即發生地方武裝暴動，趕跑共黨工作人員。迨冀東計畫失敗，宋、鄧支隊開回平西，三位一體逐漸成形後，中共才開始打算在平西建立正式的根據地。¹²³ 蕭克後來即承認，直到武漢失守後，平西才被中共當成根據地來看待。¹²⁴ 據馬輝之的回憶，1939年元旦晉察冀北方分局召集冀熱察邊區領導去平山開會討論日後的發展策略（也就是在這時候三位一體戰略開始成形），鄧華因為正在圍剿宛平堂上一

119 蘇梅，〈開闢平北抗日根據地概況〉，《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575。

120 伍晉南，〈挺進軍在冀熱察的游擊戰爭〉（1940/10/25），《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164-165。

121 張明遠，〈黨的建設總結〉（1942/03/02），《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398-401。

122 蕭克，〈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擴大幹部會議上關於冀熱察軍事問題的報告提綱〉（1940/04），《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96。

123 平西考察團，〈平西區政權工作簡述〉（1940/09/01），《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152-153。

124 蕭克，〈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擴大幹部會議上關於冀熱察軍事問題的報告提綱〉（1940/04），《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96。

帶的地方叛亂武裝，所以只有他一人赴會。堂上鄰近涑水三坡，正是平西根據地的中心，也是叛亂最嚴重的地區。¹²⁵ 馬與蕭克回來後，立即正式提出三位一體戰略，平西被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但這時鄧華還在平叛，而且據說冀東民團團總出身、跟隨宋、鄧支隊從冀東來到平西的抗日聯軍領導高志遠，陰謀與三坡逃亡的叛亂團體地主領導魏福昌勾結，故同時被蕭克等人鎮壓，逮捕處死。¹²⁶ 平西的局勢才穩定下來。

隨後，中共在平西才慢慢地吸收地方黨員，主要以「革命知識份子」居多，其中又多集中在宛平。¹²⁷ 不過，這些新吸收的幹部大部分作風極差，單純依憑共黨的政權與軍隊力量進行統治，既不與地方上層份子聯絡，也不會深入下層群眾。當共黨勢力坐大時，他們仗勢欺

125 姚依林日後回憶時說道，中共在平西立足時，首要工作就是消滅地主武裝，其中三坡是最主要的目標。姚形容三坡是位於房、涑、涿間的一塊「飛地」，統治者是一個叫「老人」的大地主，當地人民極其落後，不知民國，也不向政府繳稅，完全唯「老人」是從。共產黨如派幹部進去，立即被殺掉。姚依林，《姚依林百夕談》，頁 121。

126 馬輝之，〈回憶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前後〉，《中共黨史資料》，輯 4（北京，1982），頁 283。關於高志遠的「陰謀」，說法不一。蕭克說他與日本人，以及失意軍閥吳佩孚秘密聯絡談判。朱其文只是說中共懷疑高有叛變陰謀，蕭克用計誘請他吃飯，逮捕審訊，高始供稱。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 269；朱其文，〈平西抗日政權及武裝鬥爭紀實〉，《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572。又，朱其文是江蘇如皋人，北平學運領袖出身，1930 年即入黨，曾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活動，抗戰時期在平西、冀東活動。中共建國後歷任駐保加利亞、越南大使等職。

127 共黨在宛平吸收的「革命知識份子」中，較著名者有魏國元者，宛平縣青白口村人。他在 1933 年即已入黨。抗戰爆發後，他與國民黨縣長譚體仁（齋堂地區人）爭奪群眾。後來就是他引鄧華支隊入宛平齋堂，解決譚體仁。蘇梅口述，雲平、京雲整理，〈平西根據地宛平縣的初創與魏國元同志〉，《門頭溝文史》，輯 2（北京，1993），頁 82-84。

人，固步自封，官僚命令，甚至貪污腐敗；但是當共黨失勢時，他們也驚慌失措，乃至屈服投降。¹²⁸

共產黨沒有尋求上層份子的合作，也缺乏下層基礎，兼之來到平西的外來軍隊與幹部，都想抓一把，結果更加深了根據地內部的矛盾。原來，當時平西是「兩面」政權，同時受到日偽與共黨的統治，所以群眾也是雙重負擔，生活苦不堪言。他們除要給日偽繳納各種捐稅外，也要負擔共黨方面的公糧、抗戰勤務與村款。其中公糧的實徵數往往超過應徵數，山地尤其嚴重，因為山地是共黨統治較鞏固的區域。而地富負擔的公糧又較普通群眾多，有的甚至為繳公糧而無力生活，此即可見救國公糧本身就帶有階級鬥爭的意味。抗戰勤務即勞役，男子運輸，女子做鞋，同樣很重。平西人民平均每月都要負擔10日以上勞役（有的達25、30日），而且不合理，有的家中婦女較少者要出錢請人做，負擔很重。¹²⁹村款就是村的行政辦公費用，事實上就是不正規的苛捐雜稅，通常數量比公糧還要高，而且許多被村幹部用來招待來往軍隊或幹部，以及作為自己生活補貼所用，他們的生活又較一般老百姓好，因此引起人民不滿。根據後來的調查，1940年1月涑水平平均每村每月村費開支191.89元，到1941年中共開展整風，調查遏止村款開銷浪費後，每村每月開支僅為42.72元。¹³⁰這期間的差距，適足以說明1939年下半年中共重視平西根據地以來，

128 張明遠，〈黨的建設總結〉（1942/03/02），《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398-401、417-418。

129 馬輝之，〈在冀熱察區黨委高級幹部會議上關於平西工作報告提綱〉（1941/05），《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193-197。

130 李德仲，〈平西地委11月擴大幹部會議報告提綱〉（1941/11），《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335-336。

爲了維持其日益擴張的黨政軍機構與人員，給人民帶來的沉重負擔。

雖然中共加諸這些負擔於人民身上時，有注意到階級間的差別，但因爲是單純透過黨國機制由上而下地榨取，沒有動員群眾由下而上地配合，結果不僅上層份子不滿，民眾也怨聲載道。到 1940 年初，中共事實上已注意到此一問題，並開始逐步推動整風。但還來不及糾正錯誤，爭取群眾的支持，日軍大規模的圍剿已於 1940 年下半年大肆展開。湯各莊、齋堂等村人民叛變響應日軍，中共大敗，直到 1941 年還不能恢復被圍剿前的一半力量。¹³¹

中共在平北也遇到類似的困境。如前所述，1938 年宋、鄧支隊開赴冀東途中路過平北之際，留下伍晉南一部武裝在平北活動，但旋即又退出。1939 年青紗帳起（大約夏至秋初），中共爲了貫徹三位一體戰略，故而又派挺進軍三十四大隊向平北發展，但「在執行對土匪政策上有偏差」，沒得站住腳，隔年 1 月即退出。¹³² 到底中共對平北土匪做錯了什麼事呢？¹³³ 蕭克與馬輝之都沒有再作進一步說明，但

131 〈蕭克關於冀熱察的情況及地方武裝統計的報告〉（1941/04/06）、朱其文，〈平西抗日政權及武裝鬥爭紀實〉，《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185、573-574。

湯各莊事變相當慘烈。該村位於涑水北部接近涿鹿邊界山間，即在前述 1938 年發生叛變的三坡一帶，是中共平西根據地的中心，也是中共涑水縣委與縣府所在地。事變發生於 1940 年 10 月，當時有來自浙江寧波的一位女學生黨員應唯魯（沈鞠如），爲採訪邊區，恰巧住宿當地。事變發生之夜，暴徒闖進縣委，殺害中共工作人員，應本人也被擄走輪姦，後遭石頭打死，被棄屍在山谷間，年僅 22 歲。70 年後的今天，他的親人才尋訪得知應的死因及其埋葬之地。〈晉察冀日報新聞烈士名單〉，《新聞與寫作》，2005 年第 9 期（北京，2005），頁 6；王衛國，〈尋覓，問英魂何處〉，《新聞與寫作》，2010 年第 7 期（北京，2010），頁 74-80。

132 蕭克，〈抗戰中的冀熱察挺進軍〉，《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526。

133 馬輝之也有同樣說法。馬輝之，〈回憶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前後〉，《中共黨史資料》，輯 4（北京，1982），頁 300-301。

根據伍晉南事後的經驗總結，中共在平北的軍隊也是帶著抓一把的游擊心態，「不注意建立地方武裝，只注意擴大主力部隊，企圖抓一把就走」。¹³⁴ 這種抓一把的作風，在平北這樣敵人統治較鞏固的地區，更容易引起敵視。蓋共產黨在這些地區勢力甚微，對於各式各樣的地方武裝（包括被偽政權收編成偽軍者），如果採取敵對的態度欲予消滅或收編，乃至視敵對政權統治下的群眾為「漢奸」，只是孤立了自己。所以 1940 年後被派赴平北工作，並擔任平北地委書記的東北人蘇梅也警惕說，當地偽軍與偽組織事實上不可能完全被消滅，共軍應該尋求它們的合作，使成為兩面派，既不要軍事上消滅它們，也要等待有利時機再使之反正，甚至是那些「成份最壞的偽軍」，也應如此，藉此避免與其和地方群眾形成對立。¹³⁵ 這是蘇梅等人的後見之明，可見得中共在平北一開始遇到的挫敗，也是因為過分依賴外來的八路軍，不注意統一戰線與群眾動員的緣故。

冀東、平西與平北在抗戰初期的歷史，在在證明了本文的論點，即河北社會本身早已為各派既存的勢力與團體所撕裂，抗日戰爭激化了此一分裂性。共產黨最初雖然也試圖利用某些上層份子的關係去打入河北敵後，但主要還是依恃外來的八路軍力量，其目的就是想要駕馭分裂的地方勢力。可是，前引平北蘇梅的說法告訴了我們，單純地依賴外來軍隊肆行統治，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平西、平北的挫敗即是其證。共產黨還需要的是，上層的統一戰線與下層的階級鬥爭。

134 伍晉南，〈挺進軍在冀熱察的游擊戰爭〉（1940/10/25），《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165。

135 蘇梅，〈對平北偽軍偽組織的方針與具體辦法〉（1940/12），《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167-171。

第三節 統一戰線與群眾動員

一、統一戰線的恢復與冀東抗日根據地的重建

1939年初，共產黨提出三位一體的戰略，把平西放到首要地位。但如前所述，平西與平北過份依賴外來的八路軍，既未動員群眾，事實上也摒棄了上層統戰，以至1940年日軍入侵之際，內部眾叛親離，先後崩潰瓦解。與此同時，被放在此一戰略最後順位的冀東，卻反而在此時日益發展起來，乃至超過前兩者。如下所述，冀東的成功，以及平西、平北的失敗，首要關鍵就在於共產黨能不能恢復統一戰線。

讓我們先回到1939年初中共在冀東嘗到大敗，西撤回平西時的情形。由於受到西撤政策及其失敗的影響，當時冀東地方幹部間普遍瀰漫著失敗情緒，沒有幾個人對於在冀東地區建立根據地抱有信心。¹³⁶ 因此，雖然共黨在冀東地區有以朝鮮人周文彬¹³⁷ 為書記的冀東地委（1939年3月成立於遷安松山峪、灤縣楊柳莊一帶，7月改稱為冀東區分委員會，簡稱冀東區分委）負責領導冀東黨務，還有四縱留下來的陳群、包森、單德貴三個支隊，以及由李運昌、李楚離在西撤途中帶回冀東的部分抗聯隊伍，實際的工作卻無甚開展。後來李楚離還在9月時把陳群、單德貴兩個支隊與部分抗聯部隊帶回平西「整

136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頁5。

137 周文彬，原名金成鎬，朝鮮人，1926年在通縣就學時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前後被調到唐山工作，是1938年開灤五礦罷工的領導人。佟德敏，〈1938年冀東抗日暴動有關人物簡介〉，《冀東抗日暴動》，頁345。

訓」，這使得聶榮臻等北方分局領導很不滿意，蓋他們雖然不再派八路軍正規部隊東進冀東，卻沒說要放棄冀東，而是要冀東黨想辦法依賴地方群眾「自力更生」。可是冀東黨卻在游擊運動才剛有起色之際，又把游擊隊調回平西，聶批評這就是「抓一把」毛病的表現。¹³⁸

就在李楚離率陳群、單德貴支隊西撤後不久，參加軍城會議的冀東代表李運昌返回冀東。奉北方分局的指示，李將冀東地區的所有隊伍統編成「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第十三支隊」（司令員李運昌，副司令員包森，政治委員李楚離）。1940年1月初，冀東區分委在遵化縣閣老灣召開會議，向黨員傳達軍城會議的指示。此後冀東黨才逐漸放棄大軍東來的宣傳，開始有了「自力更生」的信念。¹³⁹

但是，共產黨在冀東沒有群眾基礎，憑什麼去自力更生呢？如果還是像平北、平西一樣，只是依賴外來的政權、軍隊去建立根據地，不也是會落得同樣下場嗎？關鍵就在上層統一戰線的恢復。

如果從武漢淪陷算起，共產黨迄此打入河北敵後也已經有了一年的時間。它們已經充分認識到，中共在河北敵後地區原來無甚群眾基礎，如果單純依賴八路軍去消滅地方武裝，像前面平北地委蘇梅評價般，根本不可能達成目的。所以，像是在平北，中共在1940年初前後的大挫敗後，也覺悟最初向敵後發展之際，「應特別著重在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避免過早的階級分化」，藉此「首先與當地上層份子建立關係，逐漸深入開展與深入下層」。¹⁴⁰ 後來中共也因此得已在平

138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對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的意見〉（1939/09/22），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東武裝鬥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17。

139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一）》頁6。

140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平北兩年來工作的指示〉（1942/01/31），《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378。

北立足，並慢慢地與同時在發展的冀東地區打成一片。

平北的例子或許算不上是經典，冀中八路軍（三縱隊）對當地聯莊會與上層份子的統戰史則具有代表性意義，甚至還被編成文字，用來教導地方幹部與八路軍如何在敵後地區推動統戰。我們這裡就以冀中和冀東的比較，說明當時中共如何恢復以及鞏固上層統一戰線。

聯莊會是河北地區一種非常普遍的地方武裝。如前所述，張明遠等地方黨員就是利用此一組織名義，在 1927 年發動玉田暴動，可見得聯莊會對農民的號召力很大。根據冀中三縱隊的分析，聯莊會的領導者咸為地主階級（因為他們能夠出錢組建武裝），成員都是地方農民。聯莊會的範圍至少包括一整個村，有時會形成聯村的組織。抗戰爆發後還有許多散兵游勇、將官，以及地痞流氓混入，成為聯莊會的軍事領導。聯莊會的行動主要受狹隘的地方自衛心態支配，所以在抗日，乃至於反共的態度上，並不明確（如主張救家不救國）。在抗戰初期，冀中普遍興起聯莊會，它們對待外來的共軍，或是武力驅逐，或者暗中與之聯繫，但仍不供給給養；有的則是互不侵犯，只准共軍路過其地盤，共軍因此受到很大的束縛。¹⁴¹就好像共軍鄧華支隊 1938 年路過平西時，地方武裝竟在村莊周圍，築起工事，架起機槍以待一般。¹⁴²這些平西地方武裝，在當代大陸官方黨史中，也被稱為「聯莊會」。¹⁴³

可是，有的聯莊會或地方武裝的領導本身就是共產黨員或與共黨有關係者。就像 1938 年的冀東大暴動般，所有的抗聯領導都是事先

141 冀中軍區，《爭取聯莊會經驗教訓》（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0 年 5 月）。

142 陝纓，〈創造與發展冀熱察邊游擊戰的平西根據地〉（1940/06/25），《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124。

143 宋柏主編，《北京現代革命史》，頁 141。

已與共黨有聯絡者，日後姚依林即評論，他們領導的「聯莊會、伙會（按：與聯莊會相同的地方武裝），在形式上都是地主階級爲了保護他們自己的財產的組織」，當八路軍進冀東時，他們「不僅沒有反對抗日力量，反而動搖地給了抗日力量以某些援助」。¹⁴⁴這就和冀中三縱隊面對的情形迥然不同了。聶榮臻所謂，冀東一開始的發展「是統一戰線的成功」，正是此意。¹⁴⁵

這些事先就與共產黨聯繫的上層份子，大多是農村知識份子出身者。這是因爲知識份子較易受抗日宣傳影響，也更容易接觸外面的世界與革命訊息。這些人在下層群眾間具有號召力，也只有他們才有財力組織聯莊會等地方武裝。事實上，中共對此是再了解不過了。他們很早就注意到透過知識份子去打入農村，特別是那些回鄉擔任鄉村教師者，一開始就是中共「農民運動的著手處」。¹⁴⁶前幾章談到抗戰前河北地區中共的農村幹部，大部分也都是回鄉的知識份子黨員。抗戰爆發後，中共也有意地故技重施，透過知識份子回鄉動員。毛澤東就曾明確指示，要大量吸收知識份子黨員。¹⁴⁷冀中軍區也說要用知識份子去打入分化聯莊會。¹⁴⁸在前述平西地區，張明遠也說新吸收的地方黨員大多都是農村知識份子。在冀東，除了一開始抗聯的領導外，後來國民黨地方黨部的調查也發現，冀東地方的「奸黨」大多是先從鄉村小學教員做起，而且很多「奸黨」鄉村黨政人員就是小學教員（或許也正是在「奸黨」的啓發下，國民黨在當地的地方黨員也同

144 姚依林，〈冀東游擊戰爭是怎樣堅持的〉（1940），《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180。

145 聶榮臻，〈關於冀東工作估計問題〉（1939/07），《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21。

146 〈鄉村教師運動決議案〉（1925/12/23），《中央文件 1》，頁 541。

147 毛澤東，〈中央關於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1939/12/01），竹內實編，《毛澤東集 7》（東京：蒼蒼社，1983，第二版），頁 88-89。

148 冀中軍區，《爭取聯莊會經驗教訓》。

樣是以小學教員居多)。¹⁴⁹

有了關係只是第一步，共產黨還要利用上層份子間，及其與敵偽統治間的矛盾，分而治之。¹⁵⁰這一點在冀東地區尤其重要。原來抗戰爆發後，地方上層組織伙會反抗日偽軍，引起後者不滿，乃大肆洗刷中小學校長，取消伙會，上層份子因此更仇視日偽，這也是他們願意起來響應共黨冀東抗日大暴動的原因之一。但大暴動失敗後，上層份子多跟隨八路軍西去，或逃往平津唐等城市。日偽害怕他們再做亂，重編保甲與大聯鄉，¹⁵¹成立自衛團，收編改組上層份子及其武裝，但事實上還是不相信上層份子，上層份子也自覺不安。¹⁵²而且他們擔任的保甲長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職位，要為日偽籌措糧餉與控制地方，還經常成為日偽軍隊、特務勒索與欺侮的對象，根本就是「挨打的架子」，故不少地方上層份子也視保甲長為畏途，多僱用流氓或窮人擔當之。¹⁵³

149 〈河北省黨部及各督導區關於建立組織情況的報告〉，河北省檔案館：611-1-17；〈關於視導各區黨務工作情況向中組部的報告〉，河北省檔案館：611-1-6。

150 冀中軍區，《爭取聯莊會經驗教訓》。

151 冀東地方的基層政權，在中日戰爭以前是採行縣、區、鄉、閭、鄰制。1939年以後，「日偽」開始在冀東地區推行「保甲」制。事實上，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國民黨為剿共需要，也曾在剿共區推行保甲制，並擬將此制推行於全國。其中河北省政府即在1935年計劃推行此制，但不久後冀東地區即淪為殷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故未及推行。直迄中日戰爭爆發後，日偽始編戶入甲、編甲入保，聯保成鄉，在河北省逐步開始推行保甲制。一般說來，日偽的保甲制十戶一甲，十甲一保，一保約等於一個自然村，而一鄉則以十保為原則，此與國民政府時期以一自然村為一鄉的制度頗為不同。魏宏運主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頁27-33、45。

152 分局秘書處，〈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1943/08/15)，《冀熱遼報告(二)》，頁80。

153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一)》，頁7-8；朱德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

共產黨也注意到此一情形，故指示地方幹部與軍隊利用上層份子與敵偽間的矛盾，吸收上層份子為兩面派。姚依林說，保甲、自衛隊就是自聯莊會、伙會改編而來，前者是後者在日偽強迫底下「進一步的漢奸化」。¹⁵⁴ 所以，就如朱其文分析般，冀東上層份子雖然「作了日寇統治的工具，其中有一部分是迫於不得已」，假如不了解這一點，而把他們都當著漢奸來看待，會使「我們」工作不易開展，逼著他們真當了漢奸。¹⁵⁵ 1939年下半年開始，中共重回冀東後，首要工作就是「爭取保甲長為兩面，求得站腳」，更重要的是，「求得可以進行征糧款」。¹⁵⁶ 如此一來，冀東八路軍就能夠達成聶榮臻所謂「自力更生」的目標了。

但有了關係，利用敵偽矛盾還不夠，共產黨與八路軍必須向地方上層份子與群眾宣傳與證明，他們願意也有能力幫助地方人民保衛家園，抗擊土匪，乃至於日偽的劫掠。這一點是贏得上層份子合作最重要的關鍵。冀中三縱隊便是藉由消滅高建勳等匪軍，攻打高陽的日軍，贏得聯莊會領導與地方民眾的讚賞，願意與共軍合作。¹⁵⁷

中共在冀東薊縣的成功也證明此點的重要性。薊縣在抗戰爆發後便有所謂救國會之組織，參與此一組織者多是中小學教員、士紳等類的上層份子。而李子光領導的中共薊縣縣委在1938年4月3日於盤山千像寺召開的擴大會議，也是以爭取保甲長、士紳等上層份子為主

科學出版社，1994），頁111-118。

154 姚依林，〈冀東游擊戰爭是怎樣堅持的〉（1940），《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180。

155 朱其文，〈在敵人遠後方日益壯大中的冀東抗日政權〉（1940/05），《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111。

156 分局秘書處，〈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1943/08/15），《冀熱遼報告(二)》，頁119。

157 冀中軍區，〈爭取聯莊會經驗教訓〉。

要工作。該年7月，六百戶、馬伸橋、邦均等地爆發多起反日鬥爭事件，並成立多股抗日武裝。這些地方武裝的領導大多也是地方上層份子，他們後來還在第四縱隊的配合下，攻佔薊縣縣城，成立以王巍（朝鮮人，原名朴一禹）為縣長的縣政府。¹⁵⁸

冀東大暴動失敗後，薊縣地方上層份子與伙會也如同冀東其他地區般，遭到日偽的打壓與收編，不敢抬頭。1939年後，土匪蜂起，借抗日旗幟綁票，不少上層份子更是懼怕地跑到日偽據點避難。當時共產黨主動爭取上層份子的合作，特別是1940年包森率部赴薊縣盤山活動後，協助肅清地方土匪，上層份子因此對共黨印象良好，不僅掩護共產黨員逃避日方的掃蕩，還籌款協助共產黨。隨後，共黨成立薊平密抗日政府，上層份子竟抬著機槍、錢、糧去找共產黨。¹⁵⁹包森支隊藉此在地方上樹立相當大的威信，後來共產黨想要吸收冀東一宗教會門「家裡」的群眾時，竟向群眾欺騙說包森就是「家裡」的。¹⁶⁰隱身冀東地區的國民黨中統特務也不得不承認說，包森等在當地活動的八路軍，輿論甚佳，頗得各界擁護。¹⁶¹

158 1938年薊縣爆發的幾起抗日暴動，分別是由共產黨員王克興（民團出身）與徐智甫（小學教員）煽動馬伸橋民團隊長趙合與夏德元所發動的兵變、共產黨員王建国（村長、保董、民團團長）所領導的邦均暴動、國民黨薊縣縣黨部負責人李維周組成的「薊北抗日救國軍」。關於這些暴動的經過和各該領導人的出身，見：王文，〈冀東西部的抗日暴動〉、張克增，〈抗日暴動中的薊縣三區隊〉，《冀東抗日暴動》，頁218-232；薊縣志編修委員會，《薊縣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頁948-949、953、955。

159 分局秘書處，〈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1943/08/15），《冀熱遼報告(二)》，頁76、80、83。

160 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頁105。據中共的調查，家裡在冀東非常普遍，在興隆南部，甚至高達90%群眾參與。分局秘書處，〈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1943/08/15），《冀熱遼報告(二)》，頁10。

161 中央調查統計局，〈冀察熱邊區概況〉，臺灣法務部調查局：575.29/815/7065。

贏得上層份子初步的支持後，中共還給予他們軍事與政治上相當的名分。冀中軍區在關於聯莊會的政策中就規定，「在爭取過來的開始，可以應之其要求與以較大的名義」，所以他們請聯莊會原領導在軍隊和聯合政權中擔任較高的職位，儘管只是形式上的意義。¹⁶² 在冀東，自 1939 年下半年李運昌自軍城會議歸來以後，中共亦在地方上層份子的配合下，開始建設地方政權。1939 年 10 月，豐灤遷聯合縣政府成立，這是中共冀東抗日根據地的第一個縣政權。隔年 1 月，晉察冀邊區冀東辦事處成立，負責領導並建立冀東各縣政府。隨後，遵化與豐玉遵各縣政府紛紛成立。迄 1940 年中為止，中共在冀東地區至少建立了五個縣政權（如表 5-1）。這些政權，都是上層份子合作下的成果，而且中共也在其中給了上層份子「較大的名義」。彭真在 1941 年就稱贊說，冀東地區某些縣議會「吸收了大批有聲望的紳吏、聯莊（會）首領參加」，在敵我接連區選舉開明士紳擔任村長，既滿足了上層份子的心理，爭取其多數的支持，還達到孤立敵人很大的成效。¹⁶³

中共在抗戰初期即尋求上層份子的合作，但由於冀東大暴動的失敗，以及隨後中共過份依賴外來八路軍遂行統治的結果，中共與上層份子的關係一度中斷。1939 年底、1940 年初，中共在平西、平北等地已嘗到眾叛親離的惡果，加上日偽方面對上層份子的壓迫，中共因此把恢復上層統一戰線作為其最重要的工作。此一政策收獲了豐碩的成果，在上層份子的合作下，中共得以重回冀東，並建立了抗日政權。論者有謂，統一戰線是共產黨致勝的法寶之一，由此得證。

162 冀中軍區，《爭取聯莊會經驗教訓》。

163 彭真，〈對冀東、平北工作的意見〉（1941/08/17），《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295。

表 5-1 晉察冀邊區冀東辦事處所轄各縣區劃表（1940 年）

| 縣 名 | 縣 長 | 所 轄 地 區 |
|-----|-----|---|
| 遵 化 | 王常明 | 包括遵化城西，東八堡、新莊子以東，堡子店左右地區，約 300 多村。 |
| 豐灤遷 | 魏春波 | 包括小嶺圈以南劉城子、馬莊戶一帶地區，約 200 多村。 |
| 豐玉遵 | 胡 光 | 包括魯家峪、黨峪以南地區，共 200 村。 |
| 遷遵興 | 姚鐵民 | 包括洪山口、三屯營、撒河橋、灤河東與東王堡一帶地區，共 200 多村。 |
| 薊平密 | 張耀東 | 盤山前一帶約 100 多村，平密縣全境及密雲白河東一部。1940 年 11 月，地區擴大，改劃薊寶三與平密興兩縣。 |

資料來源：河北省稅務局等編，《華北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頁 23。

二、「上層」的政權

但是，統一戰線並不是共產黨致勝的唯一法寶，它還需要階級鬥爭和黨的領導。魏宏運對抗戰時期冀東的上層份子及其領導的地方武裝有很高的評價。他形容道，當抗戰爆發後，冀東各界如灤縣僑城鎮（即今日的灤南縣城）的商界、士紳與鄉民代表，在抗日情緒鼓舞下，出錢出力，歡迎中共的軍隊。「軍民同仇敵愾，共紓國難」。¹⁶⁴ Mark Selden 等西方學者也認為，中共與地方菁英的團結合作，使前者得以動員原為後者所領導的整個地方社群，投入重建農村社會的改革（即靜悄悄的革命），這是革命成功的關鍵。但陳永發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在關於抗戰時期華中地區新四軍的研究中指出，外來的共產黨在抗戰初期會為了求得生存，暫時與地方菁英合作；但其最終目的仍是打

¹⁶⁴ 魏宏運主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頁 329-331。

入下層，造成農村的兩極分化（controlled polarization），取代地方菁英對農村社群的統治。有人認為這兩種情形都存在於共產革命的過程中，完全視地方的不同而異。¹⁶⁵ 然而，如後所述，抗戰時期冀東地區的情形，更接近陳永發的描述。

首先，共產黨並不相信「上層」。前面我們已經引述劉少奇等人的說法，即中共堅持黨必須掌握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不要讓給資產階級或第三陣營，如此才能獲得抗日的最後勝利，並進一步推動中國向社會主義的境界邁進。這就說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一開始就是分不開的。1940年下半年，平西根據地大崩潰。隔年5月，冀熱察區黨委在平西根據地的中心涑水縣平峪召開幹部會議，總結批判平西根據地過去的錯誤。其中談到統一戰線時，馬輝之便露骨地公然說道，「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統一戰線教育就是階級教育」。但這不是說只要階級鬥爭，不要統一戰線，而是要「教育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在各種不同情形下，如何與不同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進行團結抗日，同他們各種不同程度的妥協性、反共性、動搖性作各種不同程度的鬥爭」。既要聯合，也要鬥爭，簡潔扼要地說，就是「一拉一打」。¹⁶⁶

165 關於 Mark Selden 與陳永發兩種不一樣的觀點，可見 Pauline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pp. 130-131 的介紹。Keating 個人則認為中共對菁英的態度是「因地制宜」的。如在延屬地區，階級分化不嚴重，菁英力量也不大，所以中共無需予刻意打擊，也容許其存在，蓋菁英階層具備落後地區所需要的技能。但在綏德地區，土地分配極端不平均，菁英力量較大，故共黨在該地發動階級鬥爭打擊菁英階層。但這樣的階級鬥爭卻撕裂了綏德社會，不能像延安地區般建立黨國與農村社群間和諧的合作，破壞性極大。由此看來 Keating 的看法更接近 Selden，兩者皆認為延安代表的寧靜革命更有助於革命的成功與農村的重建。

166 馬輝之，〈在冀熱察區黨委高級幹部會議上的結論提綱〉（1941/05），《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243-244。

平西、平北的失敗，以及冀東的重建，已經證明中共在建立根據地之初，拉攏地方上層份子的必要性。在上一節我們也已經闡明共產黨如何具體地拉攏上層份子。但僅只於此，統一戰線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關鍵在於接下來如何去「打」上層份子。中共中央在1939年的一份指示中訓令黨員，在八路軍與新四軍活動的區域，必須實行「激進的，有利於廣大抗日民眾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前者指透過減租減息、廢止苛捐雜稅等辦法改善群眾生活，後者則是要發動群眾起來參與政治活動。中共指示透過這些辦法，「孤立」與排除那些阻礙這些政策的地主階級與壞份子，但同時繼續「與一切公正士紳和幫助抗日的地主商人進行一定程度的統一戰線」。¹⁶⁷ 這一段指示清楚表明了，「打」不是意味著消滅上層份子或完全不要統戰，而是要孤立他們，鎮懾其威勢，使上層份子屈服在基本群眾與黨的權威面前，所以是打中有拉，拉中有打。而且幹部必須透過群眾動員的手段達成上述目的，而不是單純以組織的力量去鎮壓上層份子。只有這樣，中共在樹立基本群眾優勢的同時，事實上鞏固了其統治，正所謂基層農民的奪權與共產黨國家建設的結合。¹⁶⁸

當然，上述的說法只是統一戰線的理想型式，地方黨員在實際執行時，難免出現或左或右的偏差。那麼，當時冀東地區的實際情形又是如何呢？

如前所述，共黨一開始能夠發動冀東抗日大暴動，就是因為上層份子的協助。1939年下半年後，共黨能夠回到冀東重新立足，甚至建立自己的政權，也與地方上層份子的合作不無關係。可是，冀東黨

167 〈中央關於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1939/11/01)，《中央文件 12》，頁 191。

168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 499.

對這些合作者一直感到不安。因為，從階級成份來說，這些人大多是地主資產階級，有的還是日偽政權的保甲長，甚至是極反動者。正如彭真在 1940 年的指示，要善於利用舊的保甲制度，對其中最反動的保甲首領固然應予以打擊，但在游擊根據地不應該這樣做。¹⁶⁹ 像冀東這種地區就應該爭取這些人，以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有的合作者則是頑固的反共派、國民黨員，如前述參與冀東大暴動的上層份子洪麟閣等就是國民黨員。共產黨對這些人雖有好的評價，如說冀東國民黨員並沒有參加敵偽活動，基本上同情抗戰。但同時中共又批評他們表現頑固，反共成見很深，不願實行共產黨的「民主」，不願交共黨政權的糧款，不站崗放哨，不出抗戰勤務，還背後說怪話，說八路軍是紅燈照，不相信八路軍抗戰會勝利，或是表面上遵從共產黨政權的法令，但私底下活動，吸收黨羽。後來共產黨受挫，這些國民黨員還語帶諷刺地「關心」說：「你看，多可惜啊！幾年來的心血毀於一旦，這如何是好？」¹⁷⁰ 共產黨對此深感憤恨。

共產黨仇視上層份子，但建立根據地之初，為求立足又不得不暫時與之聯合。就像日偽必須透過上層份子為他們籌餉籌糧一般，中共也是把他們與上層份子合作成立的政權（或政權的前身，作為群眾團體的「救國會」），當作「八路軍的支應機關」。但中共又抱怨這些機關根本沒有群眾基礎，全為「舊勢力所把持」；有時中共向他們要糧

169 彭真，〈冀東過去及今後工作〉（1940/04/10），《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93。

170 分局秘書處，〈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77-80。至於國民黨員是否抗日，周文彬對此有不同評價，他說國民黨員有個別不錯的，「但大多數抗日立場不堅決」。至於對國民黨頑固反共的指控，周的說法與北方分局的考察相同。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一)》，頁 103。

款，「還得說些客氣話」。¹⁷¹ 中共不會繼續容許這種合作關係。

迄此為止，中共認為地方仍舊「保持地主的統治」。冀中軍區爭取聯莊會會首合作後，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們提出更進一步的辦法，那就是改編聯莊會，把他們調離本村，或派共產黨員到裡面擔任政治工作與副職。¹⁷² 冀東共黨事實上也曾採取過類似的辦法。如1938年冀東大暴動失敗後，冀東上層份子與地方武裝隨八路軍西撤到平西，當時共黨就採取了殘酷的手段，整肅抗聯領導高志遠，混編其隊伍。但要上層份子與群眾離開其家鄉，原本就不容易。況且採取整肅手段，也不是一個辦法。所以此一事件只能算是特例。

1939年共產黨政權在冀東建立後，鑒於舊勢力繼續把持地方，他們採取另一個辦法，用當時中共的說法，即政權的正規化。他們企圖在既存的保甲長外，設立能為自己控制的村政人員。這些人包括負責收糧款鞋襪的辦事員、負責整頓村財政的財糧委員，以及負責武裝與交通等工作的武裝班長。¹⁷³ 其中又以辦事員最為重要，故在一般文件中大多僅提到辦事員。當時共產黨文件中所謂的「村幹」就是指這些人。嚴格說起來，村幹不一定是黨員，但大多數的時候，村幹多由黨員擔任。¹⁷⁴

171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頁5、55。

172 冀中軍區，《爭取聯莊會經驗教訓》。

173 崔西山等，〈憶建立與恢復豐玉遵寧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鬥爭〉，《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2》，頁206。

174 當時共黨文件在談到如何吸收黨員時就說：「由區委在『村幹部』中找到抗日積極的進行介紹。」可見得村幹不等於黨員。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32。但村幹大多是由黨員擔任，見：楊文漢，〈豐灤遷聯合縣的創建和發展〉，《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2》，頁156。

根據戰前的調查，當時冀東地區的一個村約在 100 戶左右。¹⁷⁵又如前述，根據當代學者的研究，日偽統治下的一個保即十甲，相當一個村，就是百戶；一個大鄉則是十保，以千戶計。中共的辦事員等村幹，是以村為單位，就是日偽的保。在村以上，即是區。但區又太大了，一個區最少有 50 個村，後來政權擴大後，甚至有一、二百村者，所以中共又細分出區以下的分區、中心村等區劃。如此多層次的建制，幹部根本不敷使用。因此，中共一開始就設想動員群眾，把村幹交付群眾選出，如此既可以建立一套不為地方上層份子或保甲長影響的體制，還可以由群眾自己管理自己，減輕統治的重負。¹⁷⁶

但這不容易做到，事實上村幹大多仍由上面指派，只是形式上交付村民大會通過。後來由辦事員演變而成的「村政委員會」，仍舊如此。而上面的指派，又多是通過既存的保甲長推薦，或至少經過他們的同意而產生。¹⁷⁷結果共產黨的辦事員，在群眾眼裡，仍舊是上層支應共產黨的代表人，¹⁷⁸相當於日偽的保甲長。他們還是「上層的腿」，還是像保甲長一樣，恣意妄為，濫行權威。共產黨也管不住下面的幹部，以至地方政權缺乏紀律，財政收支紊亂，貪污腐敗的情形相當嚴重，大家搶著抓錢，唯恐晚了抓不到手。冀東政權在 1940 年前半年，因此一度陷入紊亂。¹⁷⁹

175 張培剛，〈冀北察東三十三縣農村概況調查〉，《社會科學雜誌》，卷 6 期 2，頁 270。

176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頁 27；〈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74、118。

177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119-121。

178 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頁 97。

179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頁 11-12、21-22。

中共深知沒有動員群眾，他們不可能擺脫地方上層份子與保甲體制的束縛，也無從實現所謂政權的正規化。然而，事態的發展，使得冀東根據地還未來得及深入動員群眾與重整、鞏固政權，就被要求因應上層的政策與環境的改變，迅速地向外擴展。

原來，1940年下半年以後，冀東以及整個河北的抗日局勢有了一大丕變。還在1940年4月，彭真論及冀東的形勢時仍說，以為冀東又可以立即大規模行動的主張是錯誤的、有害的；¹⁸⁰冀熱察挺進軍領導蕭克在談到整個冀熱察根據地的情勢時也說，目前根據地內尚有許多問題，當下的中心工作仍在於打開平北局面，否則向冀察、熱河、遼寧進一步發展都只是空談。¹⁸¹言下之意無非是當時還談不上向冀東發展，這實際上也是去年制定的「鞏固平西、發展平北、堅持冀東」三位一體方針的重述。

然而，如前所述，原來作為三位一體方針中心的平西根據地，由於內部的叛亂，以及日軍的掃蕩，在1940年幾近崩潰。同年8月上旬，八路軍總部在以正太路、平漢路、同蒲路等交通線為中心的敵後地區發動一次大破襲戰。此次破襲戰原預定投入二十二團兵力，後場面失控，不少地方武裝自動參與，成為所謂的「百團大戰」。¹⁸²為了呼應此一破襲戰的計劃，當時冀東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皆做了相當大的調整。首先，1939年9月被李楚離帶去平西整訓的陳群、單德貴兩個支隊，被改編成冀熱察挺進軍第十二團後，於1940年6月復由李楚離、曾克林¹⁸³帶回冀東。7月，原包森領導的第十三支

180 彭真，〈冀東過去及今後工作〉（1940/04/10），《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90。

181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頁306。

182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236-237。

183 曾克林，江西興國人，1929年在家鄉參加紅軍，1931年入黨，後隨中央蘇區紅

隊番號撤消，改編成第十三團。另外還成立一個以李運昌為司令員的冀熱察挺進軍冀東分區，指揮整個冀東地區的軍事工作。隨後，第十二與十三團分別以東部豐灤遷、豐玉遵和西部薊縣一帶為中心，向北寧路與日偽據點發動攻擊，獲得多次勝利。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勢力也因此從豐灤遷玉邊區一帶的基本區，向灤東（灤河東部）、路南等外圍地區擴展。

在政權方面，1940年7月，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撤消晉察冀邊區冀東辦事處，另成立一個以焦若愚為專員的第十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冀東專署），負責領導冀東地區的抗日政權。同年12月，冀東區分委、冀東專署與部隊的負責人在盤山召開會議。根據時人的說法，盤山會議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推動冀東政權進一步的正規化，包括採取統籌統支、加強辦事員的權力等等。¹⁸⁴

為什麼共產黨這時候要大力推行政權的正規化呢？就正面的意義上來說，這意味著冀東根據地由於1939年以來的急速擴展，提高了自身的地位。在1941年前半年，冀東根據地的發展達到其高峰。它持續向熱南（熱河南部）、灤東與路南地區擴展，並建立了包括青（龍）、平（泉）邊界之都山游擊根據地（後來成為遷青平根據地）在內的新區。當時冀東黨的上司冀熱察區黨委對此相當興奮，指出冀東已基本實現了建立大塊根據地的任務。¹⁸⁵ 冀熱察挺進軍的領導蕭克

軍長征到延安。1940年被調到冀東地區工作後，曾任冀東軍分區參謀長等要職。國共內戰時期被調至遼寧作戰。中共建國後曾任海軍工作。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頁884。

184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頁10；李運昌、李中權、曾克林，〈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2》，頁108。

185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68。

也說，「三位一體」的政策就要過去，冀東乃至於平北的重要性已超過平西，後者尚未恢復至 1940 年下半年日軍掃蕩前的狀態。因此，蕭克指示，平北與冀東當前應設法鞏固與站穩腳跟，所以才要加速政權的正規化。¹⁸⁶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共產黨在此時大力鼓吹政權的正規化，正意味著過去的政權是不正規的。像是辦事員等村幹還是「上層的腿」，如同日偽的保甲長一般，共產黨無法約束他們，還要透過他們去間接地動員地方資源，不可避免地使村幹淪為新的特權官僚，乃至於貪污腐化，徒增人民的反感與負擔，並危及根據地的鞏固。1939 年底以來，中共為求得生存，極力尋求地方上層份子與保甲長的合作。但中共一直很不滿意這些合作者，他們不希望永遠把政權建立在此一合作關係上。一年多過去了，冀東根據地已有了一定的基礎。百團大戰後河北敵後革命勢力的擴張，更讓中共產生了這樣的信心與假象，即他們已經可以向那些「異己階級」出身的合作者攤牌了！

三、不徹底的群眾動員

中共在冀東開始強調正規化，第一個措施就是反對貪污浪費。如陳永發所述，反貪污浪費鬥爭經常被中共用來作為剷除階級異己份子，以及推動隨後減租減息運動的一種手段。不過，由於貪污浪費定義模糊，無論是否為階級異己份子出身的幹部都有可能成為被鬥爭的對象。¹⁸⁷ 但此種模糊性，也保證了共產黨能夠利用任何矛盾發展成為階級鬥爭。

186 〈蕭克關於冀熱察的情況及地方武裝統計的報告〉(1941/04/06)，《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186-187。

187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151-154.

在冀東，反貪污浪費鬥爭至遲始於 1940 年下半年。根據李楚離的說法，冀東專署在該年 8 月成立後，就開始厲行反貪污作私政策，槍斃了兩個區長，嚇跑一個供給主任。¹⁸⁸ 在遷遵興一帶，共黨指控許多村幹都是流氓與上層份子，他們打罵群眾，強迫命令，貪污浪費，成爲新的作威作福勢力。共產黨於 1941 年開始在該地發動反貪污浪費鬥爭，但沒有發動群眾，單純是依賴政府的力量，甚至威脅說不執行反貪污腐敗與官僚作風政策者，就是漢奸。結果並不徹底，但不是沒有效果。許多新開闢地區的保甲長害怕共產黨，「原因是他們大部貪污發了財」，怕中共算舊帳。¹⁸⁹

冀東共黨並不是沒有嘗試去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但顯然不夠充分。我們接下來從 1941 年前後，冀東根據地最重要的一項政策——合理負擔，來論證此一命題。

如前所述，日偽是依靠保甲長去向群眾籌措糧餉。這些保甲長有的是依賴過去的老地畝冊（即自然畝）攤派，但該冊登記早已不準確，有利於富戶瞞地；而且在租佃地中，又多由佃戶出，極不公平。有的保甲長則是以每十戶爲一單位（即甲或牌），按戶均攤。這種辦法不計貧富差異，也不符公平正義的原則。¹⁹⁰ 1939 年共產黨重回冀東立足後，一開始仍是因循舊制。地方上層份子也極力拉攏八路軍，把負擔轉嫁下層，甚至禁止共產黨與群眾接觸，試圖壟斷其與共產黨政權的關係。¹⁹¹

188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爲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一）》，頁 22。

189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77、123。

190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96。

191 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一）》，頁 93。

這種情形當然不能讓中共滿意。一開始，他們用「標準畝」取代「自然畝」，即用產量計畝，每 200 斤紅糧折合一標準畝，藉此避免占有好地的富戶收入多負擔少的不公平現象。隨後，其他的收入也按市價折合糧價再折成標準畝計算。1940 年夏、秋開始，中共在冀東開始推行合理負擔，即按收入分不同等級，採取累進稅率，等級越高者負擔越重。這種看似合理的辦法實際上是不合理地把負擔集中到幾個大戶身上。因為一級戶是用錢或勤務繳納負擔，二級以上者是用糧繳納負擔（有些地區是一級戶免稅，二級征款，三級以上負擔糧款）。當時錢賤糧貴，八路軍要的又多是糧，事實上全部係向富戶索要。在租佃地方面，租率超過 50%（有地區規定 40%）者也全由地主負擔，在此一租率以下者，則按比例分攤。結果地主富戶出身的上層份子負擔不起，甚至有的貼錢把地讓給他人，經濟上大受打擊。¹⁹²

合理負擔不僅從經濟上打擊上層份子，更重要的是藉由動員群眾實際參與的過程，在政治上打壓上層份子。當時中國沒有精確的地畝與營業收入統計，產量也沒有客觀估算標準，所以根本無從確定各人的收入。長期以來政府是透過保甲長等上層份子去間接地攤派賦稅，結果難免給了地方上層份子上下其手的空間，造成不公平。中共對此則是訴諸自報公議的辦法，召開村評議會，動員全村人一起評定各人的地畝與產量，藉此確定各人的收入，還挖出黑地。更重要的是，在此一過程中，群眾被動員起來了。他們不願意讓上層份子佔便宜，所以在會上揭露地富的收入與土地。上層份子在會上如果反駁，就會丟臉；不反駁，也意味著他們已讓出其權威，因為村裡的事情已不再是他們說了算。除非他們能夠事先串通全村群眾一起瞞地，造成外來共

192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97-104。

表 5-2 十三級合理負擔

| 等 級 | 地 畝 數 | 各級攤納比例 |
|------|----------|--------|
| 第一級 | 0-1 畝 | 1 |
| 第二級 | 1-3 畝 | 1.1 |
| 第三級 | 3-5 畝 | 1.2 |
| 第四級 | 5-8 畝 | 1.3 |
| 第五級 | 8-12 畝 | 1.5 |
| 第六級 | 12-16 畝 | 1.6 |
| 第七級 | 16-20 畝 | 1.8 |
| 第八級 | 20-25 畝 | 2 |
| 第九級 | 25-35 畝 | 2.2 |
| 第十級 | 35-50 畝 | 2.5 |
| 第十一級 | 50-70 畝 | 2.8 |
| 第十二級 | 70-100 畝 | 3.2 |
| 第十三級 | 100 畝以上 | 3.6 |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北方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委會冀熱遼分會編輯室編，《冀熱遼報告(二)》(出版地不詳：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輯部，1983)，頁 97-98。

產黨政權與全村的對立。這個時候，共產黨如果指出瞞地之事，就會脫離群眾，反而符合上層份子的心意。所以，黨員在這時也只能贊成瞞地，先推行合理負擔政策再說。¹⁹³

193 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一)》，頁 93-95。地主必須要普通農民的協助，才能夠瞞地，挫敗政府調查地畝的目的。國民黨與中共都遇到相同的阻礙，但共產黨的群眾動員卻解決了國民黨長期無法解決的困境。見：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376-377.

在確定地畝與產量後，隨即開始推行合理負擔政策。同樣是召開村評議會，而且一定要讓上層份子參與。如果上層份子有意見，幹部不僅不該阻止，還要讓他們講話。重點就在於動員群眾與上層份子「說理」，讓上層份子最後心服口服，無話可說。如有上層份子抱怨說你們群眾有一部分在免征點以下，一個錢不花，有什麼資格說話。這時候幹部索性取消了免征點。表面上的退讓，實際上對基本群眾的損失不大，上層份子終究還是主要的負擔者。而且此一退讓使得上層份子更沒有立場，也降低了他們在群眾間的威信。群眾則認識到上層份子的自私，覺悟以後應該選舉自己的人當領導。結果共產黨不僅得以順利推行合理負擔，還順勢通過政權的三三制，重選地方政權。這就是群眾動員的力量。黨在此一過程中要抓緊會議的主導權，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有些上層份子知道群眾動員的厲害，就搶在黨的前面主持召開評議會，主動推行合理負擔，結果整個會議被其主導，失去群眾動員的原意。¹⁹⁴

在合理負擔政策推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共產黨所謂「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的重要性。黨員要動員群眾跟上層份子「說理」，而不是用政權力量粗暴地執行政策。黨員要在群眾有利的基礎上動員之，而不是執行抽象的政策與原則，如前面提到的集體瞞地，直到農民真正認識揭露地富土地對他們是有利時，才有可能與地富決裂。最後就是有節，中共沒有從一開始就要一下子打倒上層份子，而是「一打一拉，試探前進」。而且他們到最後也沒有徹底地消滅上層份子，沒有分他們的土地與財產，甚至在冀東連減租減息也沒有提出來，還在政府裡給予他們名義。但這只是表面上的退讓，實際上合理負擔已

194 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頁 95。

給予上層份子經濟上極大的打擊，收取租息的地富也被要求更多的負擔，這等於間接的減租減息。迨群眾動員起來後，上層份子政治上已是顏面掃地。他們即使不滿，也無可奈何，甚至離不開村莊，因為他的群眾全被共產黨奪走了；即使叛變投敵，終究是光棍一條，只好苟且地生活在村裡，態度上也變和睦了。¹⁹⁵ 這就是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辯證地結合。凡是貫徹合理負擔政策的地區，村裡舊的共產黨辦事員也被黨員與群眾取代，不再是上層的腿，有些保甲長向敵偽繳納負擔時，甚至還要事先獲得他們的同意。¹⁹⁶ 這也就證明了本文的論點，即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與由上而下的黨國統治，並不總是非此即彼，而應該是相輔相成者。

但是，上述情況也只是最理想的狀態。根據中共後來的調查，在遷青平、遷遵興、薊寶三、平三密四個縣中，三分之二的地區群眾沒有被動員，基層政權還是被「舊勢力」掌握，村幹部大多是地主、富農，即使中農擔任者，也只是上層的腿。另三分之一的地區，也只有一部分地區發動了群眾，並維持著「一拉一打」的統一戰線。總之，許多地區沒有動員群眾，共產黨只是用粗暴的政權與軍事力量，打壓上層份子，命令群眾。¹⁹⁷ 結果既引起上層的不滿，也沒有樹立群眾的優勢，共產黨政權只是「裸體跳舞」，成為整個村莊的對立面。¹⁹⁸

195 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頁 98。

196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頁 11。

197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75。

198 「裸體跳舞」是當時共黨指責地方幹部採取過左政策，以至脫離群眾的用語。這種情形相當普遍，除前述的平西、平北外，冀東以及聯接平西與冀東，以固安、霸縣為中心的冀中十分區，都犯了這樣的錯誤。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便批評十分區的黨員，脫離群眾，裸體跳舞，還濫殺人、濫罰款，把中間勢力和外圍力量嚇得花

這樣粗暴的行爲，表現在負擔上，就是沒有動員群眾參與，在評議會上沒有與上層「鬥理」，¹⁹⁹ 而是像過去日僞對待保甲長般，用強迫命令的高傲態度向上層份子要糧餉。後者不服氣說：「我們出點東西都沒有問題，但不要給我們難看的樣子。」結果就像前述共產黨1939年剛在冀東地區建立政權時一般，他們要看上層的臉色拿糧餉，而且還約束不住後者，致地方政權貪污腐敗嚴重異常，一般群眾也不滿。²⁰⁰

表現在政權上，就是黨包辦政。這就是因爲黨在群眾間的威信不如上層份子，沒法替代保甲長，選舉自己的村幹。遷青平縣某村在1942年舉辦村選，五位候選人完全由黨提出，但爲民主之故，其中有一位是富家子弟出身的非黨員，還採取不記名投票。中共爲保證黨員當選，事先曾向村民拉票，過程中還作票（如替村民寫票時，寫黨員的名字）。但是最後還是由非黨員高票當選辦事員，因爲群眾認爲他辦事公平，沒有得罪人。四個月後該辦事員被調到區，該村再選，共產黨這次怕選壞，就採取舉手投票，這才保證黨員當選。²⁰¹

凡是在那些群眾越少被動員的村莊，中共的統治就愈益粗暴。有的村政完全由黨的支部包辦，有些則在既存保甲長外另立辦事員，對保甲長視若無物，開會不通知。但共產黨沒有群眾，結果還是要保甲長與上層幫忙。可是幹部根本瞧不起這些人，他們到處宣傳，「有錢人抗日不堅決」、「地主資產階級抗日靠不住」，公開辱罵在「舊社會」

容失色，依附敵人，成爲「鐵桿漢奸」。〈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對開展十分區工作的意見〉（1941/06/15），《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271。

199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106。

200 〈冀熱察邊區蕭克、馬輝之關於工作報告與意見〉（1941/11/18），《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299。

201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59。

或敵偽機關做事和有關係的都不是好人。上層份子飽受羞辱與恐嚇，只好低聲下氣地討好共產黨幹部。但後者卻不領情，還當著上層份子的面把他們招待的飯菜潑在地上，或把他們送的紙煙拿給乞丐，極盡難堪之能事。共產黨幹部還威脅上層份子說，不執行合理負擔就是漢奸，或「你小心著，我遲早將你鋤了」！所以中共幹部如果需要保甲長與上層幫忙時，索性就用命令乃至恐嚇的辦法，保甲長若不聽命，即以漢奸罪名予以處罰乃至處死，嚇得他們不敢不聽共產黨的話，但恨之入骨。²⁰²

究其實，鋤奸（即消滅漢奸）的恐嚇手段，也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可是中共如是藉由黨國的力量，而不是群眾動員的方式進行鋤奸，其結果雖然鎮懾了階級異己份子，但事實上不能讓其心服口服，甚至可能在群眾間引起普遍的赤色恐怖。冀東黨從 1940 年開始就亂殺人，頑固派殺、兩面派也殺，流氓、白面客或有一點嫌疑者都可能被當成漢奸殺掉。而且共產黨殺漢奸時是採取殘酷的活埋手段，這一方面反映了農民的報復心理（因為敵人也是這樣對待抗日份子），再則是農民出身的幹部不敢用刀槍殺人，所以選擇活埋了事。更糟的是，殺掉了不還屍首，引起被殺者家屬大憤。²⁰³ 群眾間也人心惶惶，怨聲載道，還有根據地裡的女人這樣嚇小孩說：「你哭，活埋你！」小孩就噤聲了。可見得鋤奸在群眾間引起的威懾效果。²⁰⁴

當然，上述情形也不是普遍的現象，我們無從證明到底哪些地區群眾已經發動起來，哪些地區沒有。如同下節所示，當日偽軍另一波

202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84-86、126、129。

203 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一)》，頁 100-101。

204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140。

更大規模的掃蕩來到時，有些地區的幹部與群眾堅持了下來，或隨八路軍轉移；也有些地區的上層份子甚或幹部，背叛了中共，投靠日偽一方。

四、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再崩潰

當時中共的上層與地方領導，都沒有注意到冀東根據地迅速擴張背後隱藏的危機。一方面，不少華北的共黨與八路軍領導還沉浸在前一年百團大戰帶來的意外成功；再者，冀東的迅速發展，使蕭克、彭德懷等軍政領導在 1941 年上半年也不無得意地宣稱，三位一體的口號就要過去，冀熱察大塊根據地的目的已經實現。

但是，這樣的樂觀，從後見之明來看，沒有根據。一方面，百團大戰吸引日軍回過頭來，從 1941 年開始對中共華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帶給中共極大的傷害。原來就懷疑百團大戰之必要性的部分中共領導者，如毛澤東，看到日軍的反擊，更是深感不安。²⁰⁵

再者，從當時的局勢來看，中共領導的樂觀也沒有道理。平西根據地在 1940 年下半年才大崩潰，到 1941 年初還沒恢復。馬輝之、張明遠還在 1941 年 2 月致信彭真，訴說平西與平北根據地的困難，抱怨自己已經很拼命工作，身體不堪負荷，請求調離休養。²⁰⁶ 如前所述，1941 年 5 月冀熱察區黨委針對平西的困境，在平峪召開高級幹部會議。會後北方分局總結承認，平西根據地缺乏群眾基礎，地方黨員以為兵力是鞏固根據地的主力，徒增兵力，導致物力更加缺乏。加上制度不夠正規化，黨政軍都是用「抓一把」的態度，向人民強迫

205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頁 414-415。

206 〈馬輝之、張明遠關於平西工作開展需要負責幹部的請示〉(1941/02/08)，《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183。

索要，本身貪污浪費也極其嚴重，致人民反感益增，連黨員自己都不滿意黨，結果當然是日軍掃蕩時眾叛親離。²⁰⁷ 參與平峪會議的北方分局代表許建國、姚依林，此時也已發現冀東根據地存在著和平西一樣的情形，貪污浪費嚴重（冀東黨員自以為冀東富庶，浪費一點沒關係）、群眾負擔苛重，群眾化也才剛起步，90%的村政權沒有改造，危機重重。²⁰⁸

但是，當時冀東的共黨，早已喪失危機意識。原來，自八路軍1939年後重回冀東以來，由於日軍主力南下，對冀東的注意力降低，八路軍所面對的多是戰鬥力較薄弱的偽軍，這也是冀東在1940年能夠迅速擴展的原因之一。百團大戰後，日軍回過頭來對付華北的八路軍，並自1941年3月起推動一連串的「治安強化運動」（治強運動），但最初日軍的掃蕩重點仍是太行山地區而不是冀東地區。²⁰⁹ 冀東共黨「只聽狂風響，不見暴雨來」，以為日軍掃蕩不過如此而已，甚至還積極發動大破襲戰，於5月1日在玉田縣渠梁河伏襲日軍。日方當即宣布唐山戒嚴，並投入大批日軍配合偽軍圍剿共軍。共軍此時才發現，原來日偽方已準備多時，形成一個東至灤河、北至長城、西至蘆運河的大包圍圈，對圈內的共軍進行分割封鎖。共軍處於一路挨打的態勢。至6月初，八路軍十二、十三團已被擠壓到玉田南部一

207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冀熱察工作的意見〉（1941/06/14）、〈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平西工作向中央和北方分局的報告〉（1941/06/19），《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268、282-284。

208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冀東工作向中央和北方局的報告〉（1941/06/19），《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278-280。

209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 267-271.

帶，最後乘機突圍渡過蘆運河，往寶坻、薊縣一帶逃竄。此次掃蕩，八路軍傷亡慘重，主要領導如陳群、楊作霖等陣亡。²¹⁰ 面對此一失敗，蕭克也不得不承認，這完全是領導上的錯誤造成者。²¹¹

八路軍主力退出冀東後，要往何處去呢？當時平西、平北一帶也正處於日偽掃蕩中，自顧不暇，他們只能選擇逃往長城外（口外）的熱南山區。中共在不久前就曾注意開闢熱南山區，但因為滿洲國在該地統治時間較長，不易打入，所以冀東與平北黨一直也沒有認真經營該地。²¹² 現在被迫退出冀東平原，臨時想依賴沒有基礎的山地獲得給養，也不容易。因此，冀東黨決議，在建立熱南山地根據地以前，部隊盡可能打散回到「內線」，在敵人的夾縫中求得生存。²¹³

幸運的是，在掃蕩勝利後，日本正規軍隨即撤出，留下以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總署督辦齊燮元為指揮官的治安軍維持地方。八路軍乃乘此機會，自1941年11月起至隔年2月止，發動一連串的反治安軍戰役。由於這些治安軍戰鬥力薄弱，八路軍輕而易舉地便獲得了勝利（但十二團團長包森在2月陣亡），並重回以豐玉灤遷邊界為中心的基本區。²¹⁴ 鑒於過去掃蕩的經驗，八路軍在重回基本區後也開始

210 〈中共冀東區黨分委關於1941年春季反掃蕩的經驗教訓與冀東今後的武裝工作〉（1941/11/08），《冀東武裝鬥爭》，頁53-61。

211 〈蕭克等關於敵「掃蕩」冀熱察後各地變化情形的報告〉（1941/08/13），《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292。

212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冀察熱地區形勢及目前中心工作的報告〉（1941/06/16），《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276。

213 〈中共冀東區黨分委關於1941年春季反掃蕩的經驗教訓與冀東今後的武裝工作〉（1941/11/08），《冀東武裝鬥爭》，頁64-68。

214 關於反治安軍戰鬥的經過，見：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頁46-49；婁平，〈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史軍事工作資料（1939年~1942年春）〉，《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3》，頁164-168。

積極準備應付可能到來的日軍掃蕩。不過，當時八路軍反掃蕩的戰略卻是將大部分主力部隊預先撤出內線，向外圍的新區轉移。這一方面是為保存實力並順便開闢新區，再則是欲藉此轉移敵人對中心地區的注意力。²¹⁵

果不其然，自 1942 年 4 月 1 日起，以日本陸軍一一七師團（師團長源田熊及）二十七步兵團（團長鈴木啓久）為首的「敵寇」開始包圍冀東，而八路軍主力也如預期般向口外的熱南山地轉移。²¹⁶ 隨後，日軍於 4、6 月對豐潤北方之冀東抗日根據地基本區等地區展開先後兩次的掃蕩。在第二次掃蕩以後，日軍由於沒有再得到八路軍的消息，判定八路軍已不在冀東地區，放鬆對八路軍之掃蕩。²¹⁷ 但是，退出口外地區的八路軍在掃蕩期間仍經常跑到口裡地區騷擾，並在 6 月日軍放鬆戒備後，意圖乘青紗帳起展開「反蠶食鬥爭」的復仇戰役。²¹⁸ 日軍對於八路軍的騷擾相當苦惱，特別是日軍當時正在南海地區作戰，不可能留下過多兵力維持後方治安。因此，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乃在 8 月上旬決定，強迫沿長城一帶之遵化、遷安兩縣居民悉數遷移，劃該地區為無人區，在此構築「遮斷壕」，把八路軍鎖在口外地區。自 9 月開始，日軍除大規模徵用地方居民挖掘遮斷壕並修築瞭望樓外，還採取「集家併村」之法，把零散戶集中到村莊，

215 〈中共冀東區黨分委關於反掃蕩的工作佈置〉（1942/02/07），《冀東武裝鬥爭》，頁 75。

216 〈第十三軍分區司令部命令〉（1942/04/14），《冀東武裝鬥爭》，頁 81-83。

217 〈鈴木啓久審訊錄〉（1962/07/08），中央檔案館等編，《華北大掃蕩》（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710-718。

218 〈第十三軍分區司令部命令——反蠶食鬥爭的軍事行動〉（1942/06/10），《冀東武裝鬥爭》，頁 84-86；王文，〈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史軍事工作資料（1942 年春～1945 年 8 月）〉，《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 3》，頁 173-175。

後又把長城沿線的村莊居民整個遷移到離長城四十里外的大村裡，名曰「部落」或「人圈」。²¹⁹ 那些拒絕搬遷者，則被燒燬住屋甚至遭到殺害。²²⁰ 在口外的八路軍雖然早在 9 月便已得知此一計劃，²²¹ 並積極籌劃「多路挺進返回基本區」，以免被日軍的隔離政策困守在基礎尚不穩固且資源不足的熱南山地。²²² 然而，迄該年年底日軍「無人區」建設完成之際，八路軍仍舊未能返回基本區，不得不留在口外地區遊蕩。

共軍的失敗與日軍掃蕩的成功，與後者強力與恐怖的鎮壓當然不無關係。1941 年第一次的大掃蕩，日軍把八路軍主力趕出冀東平原後，即在根據地進行戒嚴，路上斷絕行人，田野不准工作，還對根據地民眾百般侮辱，如使男女在街上站成兩行，實行裸體檢查，逼婦女給他們裸體做飯，甚至將裸體男女捆在一起，用火燒男子的屁股，強迫性交，供日軍觀賞娛樂，「真是用奸淫、燒殺、搶掠等字眼誠不能形容日寇的殘暴於萬一」。²²³

1942 年的掃蕩中，日軍重施恐怖鎮壓的故技，其中尤其令人髮指者就是灤縣潘家峪慘案。1942 年 10 月 28 日，由鈴木啓久所領導的騎兵隊進入該村，把所有村民趕到村角的空地上，用部隊將其包圍，逼問村長和村民，要他們交出八路軍及其工作人員，但沒有一個

219 〈冀熱遼行署關於日軍在熱南冀東制造無人區罪行的調查報告〉(1946/06/22)，《華北大掃蕩》，頁 697。

220 〈鈴木啓久口供〉(1955/05/06)，《華北大掃蕩》，頁 701。

221 〈中共冀東地委關於 1942 年秋反掃蕩方針與部署〉(1942/09)，《冀東武裝鬥爭》，頁 87-91。

222 〈第十三軍分區司令部訓令〉(1942/11/06)，《冀東武裝鬥爭》，頁 92-94。

223 〈中共冀東區黨分委關於 1941 年春季反掃蕩的經驗教訓與冀東今後的武裝工作〉(1941/11/08)，《冀東武裝鬥爭》，頁 56-68。

人出來。鈴木等人對此早有預料，也已經打算如果村民不供出共產黨員，即將其全部殺害。因此，日軍騎兵隊乃先讓聚集的民眾自己挖了一條壕溝，然後再問誰是八路軍及其關係人，但仍然沒有一個人出來。於是鈴木等人開始把村民都趕到溝裡，予以活埋。村民見狀，慌亂地到處逃跑，但仍遭到日軍殺害。最後全村約一千二百餘人盡遭屠戮，村內所有糧食、家畜、衣物，以及運輸工具全被搶光，農舍也遭日軍燒燬。此即潘家峪慘案。²²⁴

但是，僅僅是恐怖鎮壓，不足以打敗共軍，甚至可能起到為淵驅魚的反效果。1942年初八路軍一度重回冀東，因為估計日軍大掃蕩將來，決議再撤出冀東。當時有群眾因為日軍的殘暴，希望隨八路軍一起走。但中共拒絕，鼓勵群眾繼續留下堅持，教導他們如何疏散逃亡與堅壁清野，鄰村之間互相合作監視敵情，甚至還要群眾協助掩埋日偽軍屍首，並報告日偽當局這是八路軍幹的，以減輕日偽軍對他們的仇恨。²²⁵ 這些措施，為中共贏得群眾支持，並使堅壁清野政策成為可能。

然而，也不是所有群眾都支持八路軍。如前所述，當時冀東共黨在執行合理負擔等政策時，沒有遵行一打一拉，以及有理、有利、有節等原則，也沒有充分動員群眾，而是單純依賴政權的力量去命令推動，引起當時根據地內部的上層份子，乃至下層群眾間頗多不滿。當時日偽軍對此亦已知悉，所以他們這次的掃蕩，即放棄一味鎮壓的辦法，配合拉攏的手段。在薊縣，日偽即下令不准搶掠上層，並找他們談話，尊重其意見，邀其參加公益組織。在遵化，日偽則利用「階級

224 〈鈴木啓久審訊錄〉(1962/07/08)，《華北大掃蕩》，頁 726-728。

225 〈中共冀東區黨分委關於反掃蕩工作準備補充辦法決定〉(1942/03)，《冀東武裝鬥爭》，頁 78-79。

矛盾」，拉攏上層，推翻合理負擔。在遷安，日偽抓住共黨過去錯誤的政策，到處宣傳「八路軍活埋人」，「有錢人就有罪」等。共黨對此也承認，是自身工作的弱點，讓敵人有機可乘。²²⁶ 大多數的地區，日偽允許上層份子恢復伙會（但係以反共自衛團之名）。整體來說，如蕭克所言，日偽過去多用燒殺，「最近則主要是用政治上的進攻」。²²⁷

日偽的恐怖鎮壓、政治拉攏，以及共黨過去政策的錯誤，導致許多地區上層份子，乃至於幹部，自願或被迫地背叛投降。在遵化，許多保甲長或是為報復中共，或是害怕日偽，供出村幹，村幹因此暴露，被迫自首，擔任反共自衛團的工作。在薊縣，新民會日人顧問柿島到村裡，召集小學教員，發給紙筆，要求供出中共組織與幹部，稍不符其意即當場槍殺。在同縣某區，柿島召集群眾訓斥：「你們欺騙我幾年了！」群眾害怕，請柿島救老百姓，柿島即要每村交五個活八路軍，並供出其組織，群眾說沒有，當場即被殺害。薊縣的村幹部也因此大批自首，工作垮了三分之二。在豐灤遷，日偽甚至用利誘的辦法，允許恢復伙會的村莊任意劫掠未成立伙會的村莊。至於其他地區，還有上層份子以為交出共黨後全村即可倖免，磕頭請求村幹去自首，還有強迫擔任村幹的弟弟去自首等事例。²²⁸

中共冀東黨對於日偽的威脅利誘，一開始係採取強硬的手段，嚴禁幹部自首，甚至下令成立伙會者，殺！結果上層份子與地方群眾，既害怕共產黨，又對敵人存有戒心，兩相比較下，最後還是決定成立

226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80-83。

227 蕭克，〈目前冀熱察形勢與我們幾個工作任務〉（1941/06/12），《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258。

228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15-16、20、77-78。

伙會，村幹也選擇自首。²²⁹

既然強硬的手段適得其反，加上當時上層領導如彭真也指示，冀東黨要執行比冀中、北岳等較穩固地區更廣泛的統一戰線。²³⁰ 所以從 1942 年開始，冀東黨即改弦易策，允許伙會成立與幹部自首。在遷青平某一村，敵人多次來壓迫成立伙會，村裡老人與婦女皆主張成立，說：「成立伙會，保存房子。」還向共黨保證成立伙會後，會更堅決地抗日。但村幹部因為上級沒有允許，不願答應。最後村裡知道了中共上級允許成立伙會，便幾人聯名找村幹，保證成立伙會後，還是會聽中共「抗日政府」的話，村幹部只好允許。至此為止，中共還是處於被動狀態。但伙會成立後，中共反而主動起來。原來群眾也是為敷衍日偽才成立伙會，所以伙會成立後，沒人願意當負責人。中共村幹此時威脅：「誰主張成立的誰幹。」不幹的話，這些人就要把交給敵偽的伙會名單拿回來，不然就到中共「抗日政府」打官司去。那些原來主張成立者，只好當起負責人。其他群眾也害怕共產黨責罵他們成立伙會，因此表現得更加抗日。²³¹

從上述例子中，我們發現，地方上層份子與群眾對中共和敵偽政權同樣害怕，他們成立伙會只是為敷衍日偽而已。這個時候，如果共產黨願意表面上讓步，允許成立伙會，反而會贏得群眾的支持，得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再一個例子是遷遵興的另一個村莊。敵人在 1942 年 10 月時來到該村要求成立伙會，該村上層沒辦法，找中共商量，中共允許成立。但這些上層又不願意當負責人，中共即順水推舟召開村民選舉會議，

229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22。

230 彭真，〈對冀東、平北工作的意見〉(1941/08/17)，《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295。

231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18-19。

選舉下層群眾擔任。結果伙會名義上的領導是中共的人，實際上中共也繼續影響該地群眾，還教導群眾如何敷衍敵偽。上層份子反而成爲不負責任的提議者，而且該村由於伙會成立後，對敵負擔增加，群眾因此對上層深表不滿。伙會的成立，反而促成了村裡的兩極分化，加深了群眾對共黨的信賴。²³²

共產黨表面上對上層份子的退讓(允許成立伙會)，反而促成了群眾與上層的對立，這讓中共進一步體悟到如何在合法的掩護下進行活動，事實上奪取村莊的領導權，以及深化階級鬥爭。當此之際(1942年底)，整個北寧路以北與長城以南間的冀東根據地已爲敵偽占領，變質爲敵占區或游擊區，八路軍主力也被迫轉往熱南山區求得立足。²³³但是，如果共產黨能夠如上述般繼續靈活地結合灰色的掩護與合法的鬥爭，以及一打一拉的政策，日偽再建立更多的人圈或無人區，也束縛不了共產革命的蔓延。

小 結

馬輝之日後的回憶提到，在抗戰初期，國民黨當局派了一個「沈某」來到天津，向共產黨抗議八路軍「吃」掉了他們在冀東的武裝力量。當時國共雙方就在前述與國共兩黨都有關係的王若僖天津家中說理。馬輝之當面名正言順地宣稱：「散在華北的各種武裝力量，基於民族義憤，堅持抗日，自願接受八路軍的委任和指揮，這有何不對？怎

232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19-20。

233 王文，〈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史軍事工作資料(1942年春~1945年8月)〉，《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3》，頁 179。

麼能說是被八路軍吃掉了？」辯得國民黨代表「沈某」啞口無言。²³⁴

姑且不論馬輝之的說法是真是假，這段回憶告訴了我們幾件事。第一，抗戰爆發後，河北敵後地區出現了許多自發性的地方武裝力量。這些團體，如前述的聯莊會、伙會般，是依據某些既存的網絡或關係結合而成，其領導者多是地方上層份子。其次，國共雙方與這些上層份子都有關係，兩者都試圖以抗日的名義去駕馭這些分裂的地方武裝，但最後由八路軍拔得頭籌。這又告訴了我們，單純地依賴與上層份子的統戰，不足以稱霸敵後地區，誰的槍桿子多才是關鍵。如前所述，中共在河北的敵後根據地，最初主要就是依賴外來八路軍建立起來的。

可是，過份依恃外來的軍隊力量，也不能保證敵後根據地的鞏固。在本章我們已經證明，中共事實上並不信任上層份子，因此最初相當依賴八路軍的力量遂行統治，忽略動員群眾，結果雖然鎮懾了上層份子，但也引起群眾不滿，以至日偽軍掃蕩來到時，整個根據地眾叛親離，根據地政權也難以立足。這一點就證明了本文的主要論點，即共產黨不能單憑黨國組織的力量，建立與鞏固其統治。

有些學者因此得出了相反的論點。如 Odoric Y. K. Wou 便認為，中共抗戰時期所以能夠在河南敵後地區立足，就是因為中共能夠聯合地方上層份子，透過他們動員整個既存的地方社群為其所用。所以 Wou 以為，中共為了維持與上層份子的統戰，不允許地方推動過激的階級鬥爭，甚至像合理負擔般的社經政策，中共也是事先向上層份子說明該政策不會侵害其既得利益，在他們的支持下，才得以推

234 馬輝之，〈回憶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前後〉，《中共黨史資料》，輯4，頁273-274。

動。²³⁵ 這種說法，事實上與前述 Mark Selden、Ralph A. Thaxton 等人的觀點如出一轍，以為共產革命勝利的關鍵在於地方幹部能否因地制宜地推動緩和且有限的社經政策。然而，本章所述冀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卻告訴了我們，如果共產黨只是與這些地方上層份子維持合作關係，而沒有進一步予以控制，那中共就不得不看他們的「臉色」動員農村資源，而且也難保他們哪一天不會為了維持自身或地方的生存與利益，背叛共黨。這事實上也是在激烈的敵後抗戰過程中，反覆出現的插曲。

所以，我們業已證明，中共不能摒棄上層統戰，但必須予以掌握。這就是 Lyman P. Van Slyke 所說的，統戰是革命中一個恆久的概念，但它必須是為黨的革命目的服務，由黨領導的統戰。²³⁶ 我們也證明了，中共不可能單純依恃黨國的組織力量去控制統戰，而是要透過階級鬥爭的發動，如前述冀東黨貫徹合理負擔政策時的情形所示，讓群眾在黨國力量的背後支持下，公開地與上層份子進行表面上有理、有利、有節，實際上卻蘊含階級鬥爭意味的抗爭。只有透過此一再撕裂農村社群的動員，中共才能夠把下層群眾奪取過來，孤立與控制上層份子。所以我們說，被控制的統一戰線是建立在所謂「被控制的農村兩極分化」²³⁷ 之上。再簡單地說，就是「一打一拉」。

1941 至 1942 年間，冀東八路軍因為日偽軍的圍剿被迫轉移熱南山區。當時地方幹部間也有像當代學者般，採取非此即彼的態度，批

235 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54-286.

236 Lyman P.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16, 121.

237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11-12.

判過去合理負擔等政策太過激進，以至背離了上層份子。但是，北方局後來結論說，冀東黨統戰上的錯誤，並不是錯在沒有拉攏上層份子，而是在於沒有動員基本群眾，只是依賴政權的一紙命令去強迫推動工作，結果既嚇跑了上層份子，也脫離了群眾。這種錯誤，表面上看來是「左」，實質上是「右」。所以那些主張爲了拉攏上層份子而放鬆群眾動員的觀點，也是錯誤的。²³⁸ 這段總結，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238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87-89。

第六章

從減租減息到土地改革

1943–1949

Mark Selden、Ralph A. Thaxton 與 Odoric Y. K. Wou 等人因為把統一戰線、減租減息和階級鬥爭、土地革命，以及黨國和群眾、外來組織領導與地方社會對立了起來，所以他們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 1945 年抗戰結束以前，中共採取的諸如減租減息等策略，傾向於團結而非分裂、重建而非鬥爭。抗戰結束，特別是 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以下簡稱〈五四指示〉），開始推動分配土地的土地改革後，革命的性格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如 Wou 所形容般，五四指示發布後，政治目的凌駕經濟建設，中共放棄了抗戰時緩和且有利於農村上層階級的非抗爭性統戰策略，開始推動不符合地方實際的土地分配政策。幸好，有經驗的地方幹部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而中共中央事實上也不願意推動那麼激進的政策，所以很快地又回到有利於中農以上階層的緩和路線。¹

在 Mark Selden 等人研究的饒陽縣五公村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五公黨在抗戰結束前，因為緩和與合理的社經改革政策，與地方群眾和傳統蜜月地結合一致。抗戰結束後激進的土地改革既無益於改善群

1 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pp. 342、346–347.

眾生活，還分裂了此一蜜月的結合。幸好這也只是短暫的脫軌，中共沒多久即放棄激進的革命路線。² 在 Ralph A. Thaxton 研究的南樂縣千佛村，激進的土改也給予那些不受群眾歡迎的流氓地痞機會，取代表徵廣泛統一戰線的菁英領導，攫取村莊的領導權。同樣的，中共建國後，這些壞份子雖然繼續擔任領導，但已離開村莊，被提拔擔任公社幹部，所以村裡人民還是依據其傳統邏輯過生活。³

這些看法告訴了我們，階級鬥爭不是革命的正道，外來的組織領導也沒有那麼重要。革命要獲得勝利，關鍵在於有否「有經驗的」地方幹部推動「因地制宜」的緩進改革，以及聯絡地方菁英推動民族主義的統一戰線。但是，實際情形果然是如此嗎？

我們在前文已經證明，抗戰前河北革命的失敗就是因為缺乏黨的領導，放任地方幹部跟隨其他黨派與群眾走；抗戰初期冀熱察邊區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太依賴外來的軍隊，以至屢遭失敗。這就說明了，黨的領導與群眾動員、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不是非此即彼。革命的成功，固然要有統一戰線，但它必須為黨所控制；而這樣一種被控制的統一戰線，又必然要建立在被控制的農村兩極分化的基礎上。所以，中共能否把這些表面上二元對立的面向，辯證地結合起來，才是革命成功的關鍵。

在本章中，筆者將證明中共在抗戰後期推動的減租減息或合理負擔等貌似緩和的政策，事實上並沒有否認，而且是以各式各樣的藉口，繼續深化階級鬥爭。正所謂，矛盾無所不在，中共可以利用任何矛盾去發動階級鬥爭。所以，把 1945 年或 1946 年的土改發動當作

2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pp. 80–110.

3 Ralph A.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pp. 23–88.

分水嶺，以為在此之前的共產革命較傾向團結的統一線線，之後則突然發生階級鬥爭脫軌的說法，站不住腳。

Suzanne Pepper 也注意到抗戰後期減租減息與抗戰結束後的土改運動間，作為深化階級鬥爭的延續性，但她的論述更令人難以信服。Pepper 在她的成名作 *Civil War in China* 第二版序言中，明言她寫作的動機（1972 年以該文獲得博士，1978 年出版）是為批判 Chalmers A. Johnson 的論點，後者認為中共因為滿足了日本侵略所激發的農民民族主義，獲得勝利。⁴ Johnson 的說法規避了國民黨政權的責任，同時也無法解釋中共既然以民族主義訴求獲致勝利，為何抗戰時期還要推動減租減息，以及國共內戰時還要發動土地改革呢？所以，Pepper 意圖證明，土地矛盾雖然不是華北農村地區的主要矛盾，但各種形式的財富不平等，意味著階級鬥爭並不是沒有其正當性，這點是筆者個人所贊同者。但是，Pepper 的原意是欲證明國民黨的貪污腐敗應為自身的失敗負責，所以她刻意突顯國民黨政策的不當，以及官員與既得利益菁英份子的貪污、腐敗與對群眾的殘暴。她抬高階級鬥爭，也是為了說明中共如何發掘各種形式的財富不均，擊敗她所貶低的既得利益統治階級（不一定是地主階級），滿足大多數貧民的需求。她認為這就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化。而中共所以能夠貫徹此一政策，並有別於國民黨貪污腐敗的統治，關鍵在於整黨。作者完全無視整黨的黑暗面，實在令人費解。⁵ 可以說，Pepper 的觀點和

4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5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2nd), pp. xix-xxxiii, 229–330, 434–435.

Mark Selden 等人如出一轍，都是從一個國家(國民黨政權)與社會(共產黨與農民的結合)二元對立的視角來理解共產革命，同樣無助於我們理解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線、組織領導與群眾動員間，既對立又合作的辯證關係。而這也正是本章所欲闡明的論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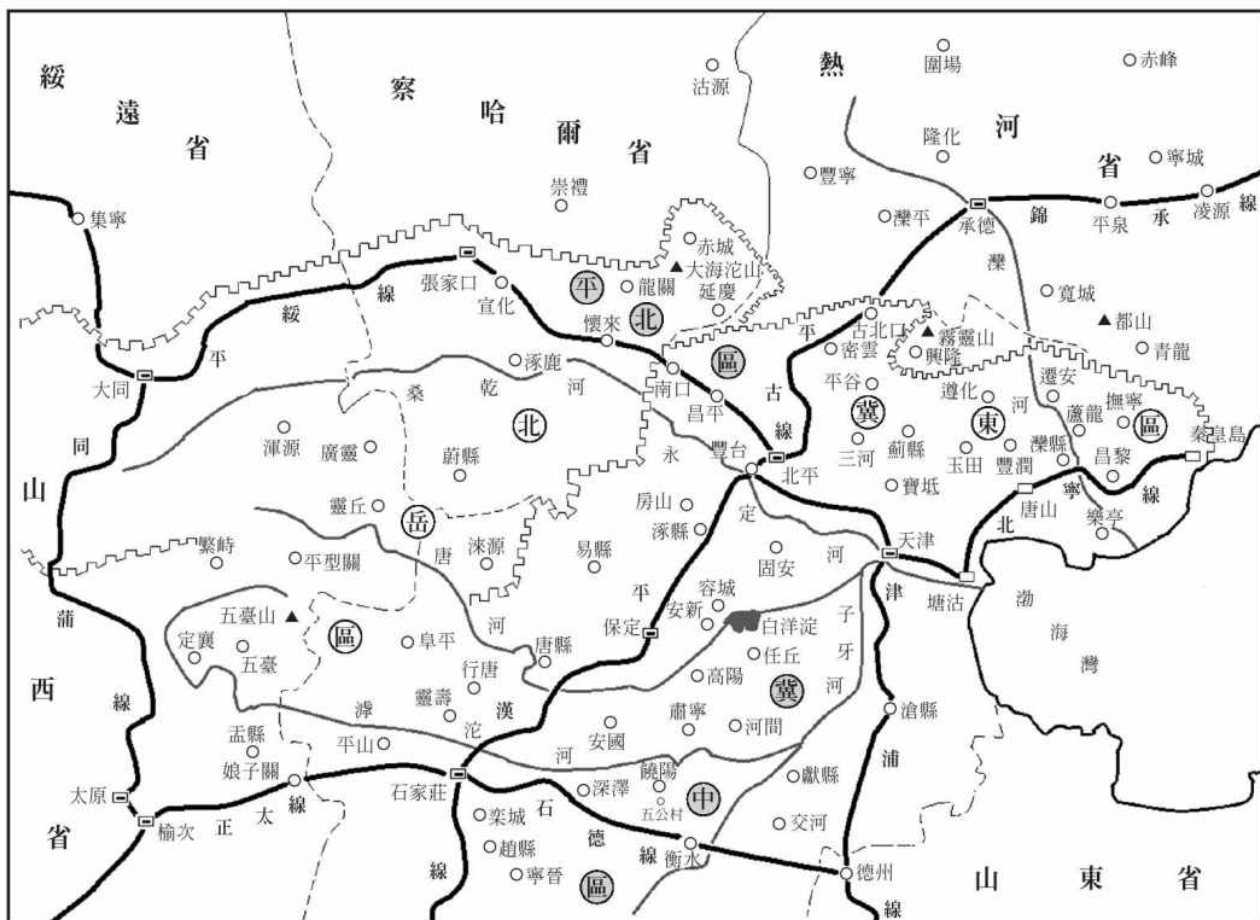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減租減息是爲了什麼？

Mark Selden、Ralph A. Thaxton 等人認爲，中共在抗戰時期華北抗日根據地推動的社經政策是緩和與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共並未訴諸徹底的平均分配，而是採取有限的減租減息或稅制改革的政策。此一漸進的政策被認爲是因地制宜與符合實際，蓋如黃宗智等人所證明，中國農村落後的主因是過密化，分配土地不能解決問題，只有發展商業市場才能夠富裕農村。抗戰時期中共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既不執著於分配土地，也沒有像後來五〇年代的中國般，急於推行社會主義集體化而破壞市場經濟，像是 Selden 的五公村、Thaxton 研究的千佛村，農民都是因爲中共能夠維護土鹽市場等地方副業經濟，而不是平分土地而致富。結果，貧下中農富裕起來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地富階級雖然被打擊，但並不嚴重。總結地說，這是一場寧靜的革命——過程是緩和的，結果是革命的。它不單純是一場窮人的革命，而是有利於整個農村各階級的革命，其最終結果造就了一個以中農、富農爲主體的農村社會。

上述的觀點，不是沒有道理，但只流於表面的觀察，未能洞悉中國共產革命的辯證性格。

中共始終宣稱它的政策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減租減息亦是如此。蓋此一政策只是要實踐國民黨所提出二五減租、一分減息的

圖 6-1 抗戰時期中共晉察冀邊區圖



口號，並不是「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頂多是限制土地再集中），⁶ 其最終目的也不過是要取消封建剝削的部分，不是要消滅地主。⁷ 甚至中共直到戰後還明言規定：「要叫地主活下去」！從表面看

6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於減租減息的意義與執行問題的指示信〉（1940/02/01），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頁 12-13。

7 〈中共冀南區黨委關於發動群眾中幾個政策的決定〉（1945/12/12），《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85。

來，減租減息似乎確實是緩和的社經改革政策。⁸

再者，減租減息不僅要消滅封建的剝削，還要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蓋中共宣稱，資本主義「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而農村裡最能夠代表資本主義的就是富農階級，⁹ 所以「我們的政策不是削弱富農生產」，而是獎勵其帶有資本主義性質部分的生產。¹⁰ 就像 Mark Selden 等人所主張般，中共也期望農村市場可以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促進新富農經濟的產生，¹¹ 讓每個農民都可以成為發家致富的「吳滿有」。¹²

因此，減租減息被認為是有利於農村各個階級，所以它也是一項統一戰線政策。如 1940 年 2 月晉察冀邊區發布的減租減息條例所規

8 〈中共冀中六地委關於深入減租查租及開展控訴復仇運動的思想領導與鬥爭策略的指示〉(1945/12)，《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413。

9 毛澤東在 1939 年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為抗戰時期，乃至於中共建國後的階級政策定調。在該文中，毛指出被稱為農村資產階級的富農，大多帶有半封建性。但因為富農的生產在一定時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不應過早採取打擊富農經濟的政策。中農則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者，貧農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所有的農民（主要指中農與貧農）都是「小資產階級」。有趣的是，毛在這裡沒有特別指出雇農的角色，只是含糊地說「貧農連同雇農在內，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12/15)，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 7》，頁 120-121。

10 〈查田減租放手發動群眾〉(1945/12/07)，《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84。請注意這篇文件是抗戰結束，中共即將開展土地改革前發布者，可見得中共始終是抱持此一原則去推動減租減息。

11 芳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晉察冀邊區之實施〉(1944/12/23)，《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28。

12 〈中共北岳區四分區地委關於當前執行土地政策初步檢查糾正的偏向的決定〉(1943/06/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64。吳滿有是當時被毛澤東欽點的一位陝甘寧邊區「富裕農民」的代表。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12)，竹內實編，《毛澤東集 8》，頁 340。

定般：「本邊區爲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制定本條例。」¹³ 在稅制改革方面，1941年初晉察冀邊區推動農業統一累進稅政策（即前章所談的合理負擔進一步的形式）時也說，此一稅制「是統一戰線的稅收制度」。¹⁴

但是，這樣表面上「有理，有利，有節」的統一戰線政策實際上的執行又是如何呢？接下來我們試圖根據冀東與平西、平北以外的河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回答此一問題。本節所以選擇此一方式論述，就是欲證明「因地制宜」的減租減息政策如何與普遍性的階級鬥爭結合起來。

在冀中，中共至遲從1938年開始推動減租減息運動。但從後見之明來看，中共認爲1940年以前各地的減租減息都不徹底、是「右」的！原因就在於政權還被上層份子掌握。¹⁵ 隸屬冀中第八地委所轄的青縣、滄縣、河間、獻縣、饒陽（Mark Selden研究的五公村即位於饒陽），原本就是一個不穩固的游擊區。1938年開始，這個地區初步推動減租減息。隨後，地方黨爲了聯合上層份子，竟因此不貫徹減租減息了，頂多也只是用「恩賜」包辦代替群眾的動員。中共日後自我批評，這是最「右」的階段！¹⁶

13 〈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1940/02/01），《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18。

14 劉瀾濤，〈論晉察冀邊區財政建設的新階段——統一累進稅〉（1941/03/18），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等編，《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財政金融篇》（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頁292。

15 〈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去年大減租中幾個問題的總結〉（1945/12/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394-396。

16 〈中共冀中區八地委關於減租工作的指示〉（1944/10），《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198-199。

但是，既然減租減息是統一戰線的政策，聯合上層份子又怎麼說是「右」呢？冀中八地委指出，地主階級是相當陰險的。1938年以來，中共到冀中後，地主階級死命地不放開村政權，公開或隱藏地破壞「抗日」政權，分化拉攏幹部與群眾。所以要「削弱」地主階級，不要可憐他們，也不要害怕破壞統一戰線。冀中八地委警告，基本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以前，地主階級一貫頑固，不存在所謂的開明士紳。所以，冀中八地委規定，對地主階級、上層份子要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採取一打一拉的辦法。¹⁷ 這就證明，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是互相依存的兩個面向。

所謂的一打一拉，前章已經證明，晉察冀邊區日後也具體規定，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地從政治上打倒上層份子（打得他們心服口服），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團結他們，藉此擴大中共自身的影響與力量，¹⁸ 至少不要把他們逼得投靠敵方。¹⁹ 但在具體的執行上，容易流於非此即彼，即把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對立起來。如前章所述，中共在初入平西與冀東時，為求立足，無原則地拉攏上層份子，一旦得勢又拋棄統一戰線，兼之沒有動員群眾，單純依賴政權去推動政策，致眾叛親離。在冀中，中共顯然也遇到此一情形。前述冀中減租減息初期「右」的現象，即反映地方黨對上層份子的退讓。當時中共中央也

17 〈中共冀中區八地委關於減租工作的指示〉（1944/10），《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02-204。

18 〈晉察冀邊區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關於如何貫徹大減租工作指示〉（1945/12/05），《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78。

19 中共冀中黨也這樣詮釋打拉政策，即打垮地主「在政治上的統治，經濟上削弱而又能活下去」，同時要在打中進行拉的一面，「使其不致離我附敵」，這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的體現。〈中共冀中六地委關於深入減租查租及開展控訴復仇運動的思想領導與鬥爭策略的指示〉（1945/12），《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415。

訓斥冀中黨，太偏重地主階級利益，會「使統一戰線政策，失去了正確的階級內容」。²⁰ 隨後，冀中黨竟矯枉過正地擺向另一個極端，單純「由上而下地鬥爭」，致產生許多「亂打、亂抓、亂殺、亂罰等過左現象」。²¹

晉察冀邊區得意忘形的左傾高潮，反映了當時的局勢。²² 1940年，中共在華北各地大肆擴張，如陝甘寧邊區在4月前後從國民黨手中奪走綏德分區，山西共軍也自1939年底所謂「晉西事件」以來嚴重地挫敗閻錫山的晉軍，冀南共軍則在1940年3月前後痛擊石友三等國軍。同年8月，中共又發動以晉察冀邊區八路軍為主體的百團大戰。其他在山東及前章述及的冀東等地，中共也獲得相當大的發展。國軍及日偽對此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後者在隔年發動對華北中共根據地的大圍剿，國軍則是從1940年即開始不斷與共軍發生「磨擦」。中共中央也覺悟此一局面會嚴重破壞統一戰線，陷自身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乃警告各地黨「糾正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中的左傾錯誤」，²³ 號召「廣泛地開展統一戰線」。²⁴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依據此一精神，在1940年8月13日公布〈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共二十條，

20 〈中央關於冀中工作的指示〉（1939/10/28），《中央文件12》，頁187。

21 〈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去年大減租中幾個問題的總結〉（1945/12/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396。

22 據當代學者的研究，毛澤東在1939年下半年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未來設想，實際上吹響了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公開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這與隨後中共在華北地區的擴張與國共兩黨磨擦的加劇，不能說沒有關係。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頁392-393。

23 〈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之決定〉（1940/07/07），《中央文件12》，頁422。

24 〈中央關於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1940/08/15），《中央文件12》，頁454。

故又稱〈雙十綱領〉)，其主旨即是「堅持國共合作，團結抗戰」，²⁵ 抬高統戰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抬高統戰的重要性，只是要提醒黨員打中有拉。可是，地方幹部在實際執行時卻又流於只拉不打。許多地主在〈雙十綱領〉發布後，斷章取義地理解中共的法令，「向我基本群眾反攻」。幹部也因為政策的轉變，放棄了階級立場，犯了單純「法律觀點」的錯誤，允許地主的要求。²⁶ 如中共一開始即規定減租 25%，減後的租額不得超過總產量的 37.5%，並在雙方自願下重訂租約。²⁷ 但許多地區減租後咸低於後一數值，一些地主據此法令要求提高至 37.5%。在晉察冀邊區最鞏固的北岳區平山等縣，地主甚至因此到邊區政府打官司，農民當然打不起官司，結果就讓地主得了逞。²⁸

1941 年，被百團大戰警醒的日軍，回過頭清剿華北中共敵後根據地。如前章所述，包括冀東在內的許多中共根據地因此受到重創，冀中、北岳等區也在 1942 年 5 月遭到抗戰以來日偽軍最大規模的掃蕩，在中共黨史裡被稱為「五一大掃蕩」，是中共敵後根據地，以及減租減息運動歷史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

根據中共的說法，原來在執行減租減息時便相當右的晉察冀邊區地方黨，在 1941 年日軍開始壓迫以後更向右傾，原因就是地方幹部

25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1940/08/13），《中共中央北方分局 抗日戰爭時期卷（上冊）》，頁 266-269。

26 〈中共冀中區八地委關於減租工作的補充指示〉（1944/12/04）、〈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去年大減租中幾個問題的總結〉（1945/12/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13、396。

27 〈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1941/03/20），《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4-25。

28 〈中共北岳區四分區地委關於當前執行土地政策初步檢查糾正右的偏向的決定〉（1943/06/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65、67。

把階級鬥爭與民族抗戰對立起來，他們害怕激進的群眾動員會嚇跑上層份子，乃至提出「醫治創傷，彌補裂痕」的政策，放棄群眾鬥爭。地主階級因此更進一步反攻，其具體表現主要就是在五一大掃蕩前後浮現的贖回典當地問題。原來在抗戰爆發初期，許多地富階級因為恐懼而逃離家鄉，他們把土地用一定的當價和年限當給無地少地的中農與貧農，但所有權仍在地主手中。五一前後，中共的退讓，地主大量贖回典當地。²⁹ 許多幹部竟也根據單純法律觀點，在「雙方自願」，保護地主所有權的前提下，允許地主贖地，而且沒有規定新的租約（據中共的說法，地主為報復減租，不再租給農民），使無地少地的農民陷入困境。事實上，土地的典出與回贖在農村裡相當普遍，不必然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反攻。中共所以在此時提出典當地的問題，無限上綱上線地控訴地主，一方面是要藉此發動農民在減租減息政策的名義下，事實上向地主奪取土地；再則是反映了，五一之後，中共的態度轉趨激進。³⁰

根據上述「事實」，中共決定從 1943 年開始，³¹ 向地主階級發動「有理、有利、有節」的反攻。中共不是不跟地主講「法律」，而是希

29 〈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去年大減租中幾個問題的總結〉（1945/12/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91-393、396-397。

30 典當地問題成為中共關心的焦點，可見當時發布的幾篇文件：〈關於目前執行土地政策中的典當問題〉（1942/10/30）、〈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於處理典地回贖辦法令〉（1942/11/07）、〈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於執行處理典地回贖問題辦法的指示〉（1942/12/04），《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5-41。

31 當時晉察冀邊區的文件，咸指出各地的減租減息運動從 1943 年後才步上正軌，可見得 1943 年是中共路線轉變的一個關鍵年代。如晉察冀邊區十一分區（即平西地區）即指出，群眾性的減租減息運動「是在 1943 年的基礎上進行的」，到 1944 年才普遍深入。〈中共十一分區地委關於貫徹政策發動群眾是當前的重要任務〉（1945/10/20），《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48。

望幹部不要被法律條文束縛，要站在「階級立場」上，「因地制宜」地發動群眾主動地掌握法律。³² 其最終目的就是動員群眾根據法律去和地主「說理」，「大義」地說服後者如何地違背了法律，如藉口以 37.5% 為標準，事實上沒有減少 25% 的地租，或者要求那些希望贖回典當地的地主，賠償承典人這幾年對土地的投入，以及他們為這塊土地所負擔的稅賦等。透過這樣的說理，地主被要求退還事實上沒有減少的地租，而且其數額要追究至 1941 年，此即「退租」；關於典當地，則是藉由各式各樣的要求，最後達到不讓地主贖回的目的，或只是名義上贖回，但最後還是由原承典人依照有利於佃戶之二五減租後的租額承租。³³

實際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以冀中的新樂縣與邢台縣內羊村為例，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這些地區的地主自雙十綱領後，即開始復辟反攻，奪回過去因減租運動而喪失的利益。村幹則犯了右傾錯誤（如認為租子在 1942 年前就減了）和恩賜思想（即未動員群眾），助長地

32 關於「階級立場」與「守法」之間既衝突又合作的辯證關係，也存在於其他根據地，陳永發對此有詳細討論。見：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191–194. 晉察冀邊區對此也有具體指示：「幹部與群眾必須熟悉〈租佃債息條例〉的基本精神，以便掌握『法令』這一武器，為實現這一法令而鬥爭。」並警告幹部既不要拘泥於條文、不顧實際情況，也要克服單純「鬥力」而忽視法令的現象。〈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冀中區行署關於「冀中區減租查租暫行辦法」執行問題的說明〉（1945/12/01），《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69。

33 〈中共十一分區地委關於貫徹政策發動群眾是當前的主要任務〉（1945/10/20），《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56。

中共不僅是二五減租，還進一步根據土地的產量，規定最高租額。如產量不超過 5 斗者，最高租額不得超過總產量的 15%，1 石者不超過 25%，2 石 5 斗者不超過 30%，2 石 5 斗以上者不得超過 35%。事實上全部沒有超過 37.5%。馬佩珍，〈對減租工作的一些意見並介紹簡便計算法〉（1945/02/16），《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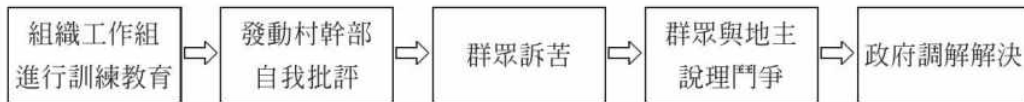
主的反攻復辟，並在 1942 年五一掃蕩後達到高潮。1943 年後邊區決定貫徹減租運動。首先，由縣、區幹部組成工作組，以村為單位（在新樂，選定一個示範村，然後向外推廣）。工作組先是繞過地方幹部訪問群眾，調查減租運動沒有貫徹的事實，然後召開村幹與積極份子會議，向他們攤開事實，要求自我批判檢討，藉此進行再教育。迨村幹與積極份子認錯與掌握政策後，即要求他們挨家挨戶進行調查訪問，串連佃戶與貧苦群眾，並召開佃戶座談會，向佃戶進行翻身教育（即灌輸其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時事教育（告訴佃戶勝利將屬於共產黨）與政策、法律教育等。在會議期間，事先被串連的佃戶上台訴苦，鼓動大眾情緒。在新樂，中共還召開地主座談會，向他們宣導政策。最後，工作組與村幹退到幕後，由群眾自己組織起來去與地主說理。在邢台的例子中，一位佃戶（事實上是積極份子）指控他的地主租期未滿即收回土地，也沒有拿同等的土地賠給他。該地主一開始駁斥說，區長承認這是「合法的」，但區長等地方幹部當時已被工作組批評檢討，所以此時也改稱這是不合法的。地主因此無話可說，心服口服，請求政府當局（減租委員會）解決此一問題。在新樂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中共並非發動群眾同時向所有地主進攻，而是選擇其中最頑固者進行鬥爭，藉此影響其他地主。總結來看，在此一過程中，黨只是扮演幕後的推手，從事鬥爭者是群眾本身，政府則是擔任調解仲裁的角色；再者，中共始終是秉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用新樂縣委的話說，即先打後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進行鬥爭，但卻沒有絲毫減損階級鬥爭的意味。³⁴

34 〈中共新樂縣委關於貫徹減租與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總結及今後的幾點意見〉（1945/01/08）、孫琦，〈邢台內羊村的減租問題〉（1945/10/07），《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

減租運動不僅過程本身充滿階級鬥爭的意味，就結果來說亦是如此。如前述平山縣地方幹部在 1942 年五一前後，因為犯了單純法律觀點的錯誤，讓地主贖回土地，導致基本群眾吃虧。1943 年後，特別是 1944 年，中共藉此指控地主非法，發動群眾向地主清算土地改良費（即地主把地當給佃農後，佃農投入的成本），還有對敵負擔（即承典人這幾年為這塊土地付給敵人的賦稅）等。這些全只是藉口，中共事實上的目的是要地主因無力償還上述帳目，最終把土地轉移給佃農。³⁵ 至於那些仍維持租佃關係的土地，全部按照中共的標準減租，結果平均租率只剩 25-30%，沒有達到最高標準 37.5%。而且按照中共的農業統一累進稅，地主還要承擔大部分的稅額。結果減租減息這

選編》，頁 251-268、338-342。

減租運動流程大抵如下：



各地減租運動的細節或許有些許差異，但整個過程大致相同。如在太行區，中共也是派工作組下去調查，先發動整風審幹，再號召群眾訴苦，迫幹部與群眾掌握法令後，即動員群眾去向地主說理。其對地主的態度是「民主說理，仁至義盡，自己出力，大家出力，說服地主，執行法令」。這樣情、理、法兼顧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結果不僅迫使地主減租，還奪取了地主大量的土地、房屋與財產。謝豐，〈貫徹減租與扶植群眾運動〉（1945/02/26），《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79-281。

35 中共當時發明向地主「算帳」的名目繁多，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藉此向地主奪取土地。如太岳區阜平縣史家寨，原來當地大多數土地咸為和尚所占有，1942 年前地方幹部也因為右傾、恩賜而沒有貫徹減租。1944 年中共派外來工作組來批判地方幹部，並發動群眾向和尚清算追溯自 1941 年以來和尚因為災荒等原因多收的地租。結果和尚還不起，只好賣地折款。中共當局這時還擺出調解人的身份，提高土地價格，以照顧地主生活。無論如何，最後地主被迫讓出大量土地。〈阜平史家寨減租經過〉（1945/04/17），《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85-290。

樣被 Mark Selden 等西方學者僅從表面文字判定是緩和的改革政策，事實上卻達到激烈地轉移財富、改變階級的土地革命效果。³⁶

我們指減租運動是一場激烈的運動，不僅就財產的轉移與階級的轉變而言，還是指它帶來的殘酷、混亂與暴力。以冀中饒陽縣的例子來說（Mark Selden 等人研究的五公村即位於饒陽縣）。自從中共發動反攻以來，冀中黨愈益激進，其中饒陽縣的上級領導冀中八地委為鼓勵群眾動員，曾發布指示說「群眾有些左是必然的」，³⁷ 還說「目前以鬥力為主，輔之以鬥理，其次是鬥法」。³⁸ 下級果然因此放手發動群眾，放縱群眾「自流」的過火行爲，結果導致階級混亂，貧下中農之間互鬥，還發生村與村之間的械鬥。在饒陽等地，還有打架、打仗，乃至於打死人的現象。³⁹ 減租運動出現暴力混亂的現象，事實上正是由於所謂地主、富農、中農等階級區分並非如此截然分明。後來冀中黨調查，地方黨動員農民奪回五一前後被地主贖回的土地時，竟然連「死契」地也要回（如前述，活契即典當地，是指地主保留所有權，暫時當給佃戶之地；死契則是抵押地，即債戶為保證償還債務作為抵押之地，到期未贖回即為死契）。這些地的債主多是中農，所以奪地鬥爭的對象變成以中農為主，導致貧農與中農互鬥的階級混亂。⁴⁰

36 〈冀晉四專區貫徹減租政策總結〉（1945/06），《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92、299-300。

37 〈中共冀中區八地委關於減租工作的指示〉（1944/10），《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06。

38 〈中共冀中區八地委關於減租工作的補充指示〉（1944/12/04），《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14。

39 〈中共冀中區八地委關於減租工作二次補充指示〉（1944/12/27），《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239-241。

40 〈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去年大減租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45/12/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391、397-399。

超階級的亂鬥，混亂了階級界線，固然不理想。但鬥爭鬥到中農頭上，卻不是完全沒有其意識形態上的根源。毛澤東便認為矛盾無所不在（矛盾的普遍性），雖然在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的階級之間有其特殊的表現（矛盾的特殊性）。⁴¹ 所以減租運動固然鼓勵新富農經濟，但這不意味著放棄對富農的鬥爭，至少要削弱其封建經濟的部分。中農是貧農和無產階級最堅定的同盟者，也不意味著他們彼此間不存在階級矛盾，況且中農裡也包括出租土地的富裕中農，佃戶裡也有富農、中農與貧農的不同。⁴² 矛盾或許有主要與次要的差別，但中共可以也應該利用任何矛盾激發階級鬥爭，造成農村的兩極分化，進而達成分而治之的效果，卻是不變的。⁴³ 無論如何，激進的階級鬥爭在抗戰結束前即已存在的事實，否定了共產革命是一場訴諸團結的寧靜革命此一命題。

41 毛澤東，〈辯證唯物論〉（1938），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補卷5》（東京：蒼蒼社，1984），頁247-258。

42 〈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去年大減租中幾個問題的總結〉（1945/12/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389-390。

43 鬥爭中農是過激的，但在維護與樹立貧雇農領導的前提下，並不是不被允許的。毛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中早就表明，中農和貧農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得到解放。後來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發動土地改革時也表明，聯合中農不是遷就中農，而是要把貧雇農發動起來，形成領導力量，迫使中農跟隨後者的領導，這與毛的觀點是連貫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總結報告〉（1947/07/27），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冀熱察解放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頁63。

第二節 抗戰後期冀熱察邊區的發展

一、轉移口外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冀東、平北、平西地區，並以冀東為中心，承接上一章的論述，繼續探索冀熱察邊區在抗戰後期的發展。⁴⁴

大陸學者魏宏運關於冀東地區的研究指出，冀東地區的土地分配儘管不均衡，但與中國其他地區比較下，冀東由於商業的發展，兼之人民得以出關外謀生等原因，故階級矛盾不是冀東農村的主要矛盾，真正帶給冀東人民災難的是日本的入侵。中共抗戰時期在冀東地區的成功，也應歸咎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緩和的減租減息政策，此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至於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在冀東推動暴力的土地改革，魏也頗不以為然，批評這是下層幹部的官僚主義，以及農民無政府主義的行徑所致，並非正確的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路線。但他也認為這是短暫的脫軌現象，中共很快就糾正了此一錯誤，重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道。⁴⁵

魏宏運的看法和 Mark Selden 等人有異曲同功之妙，也犯了同樣

44 冀東、平北、平西在抗戰時期屬於晉察冀邊區的一部分，但在不同階段被劃歸不同的行政區。如前章所述，抗戰前期中共設冀熱察區委統理此三地。但在抗戰後期，平北、平西被劃歸冀察區，後擴大為冀熱察區；而冀東則與熱南地區合併為冀熱區，後擴大為冀熱遼區。魏宏運主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頁 26-32。儘管劃歸不同的行政區，三個地區之間的发展仍密切相關。到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又設立冀熱遼分局（1947年4月後擴編為冀察熱遼分局，相關組織系統見下文圖 6-2 示），統轄冀熱察、熱南與冀東等地區。本文採取的論述策略，係以冀東與熱南（冀熱邊區）為中心，兼述平北與平西的概況，以求文章的連貫性。

45 魏宏運主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頁 131-152。

的錯誤，即他們都忽略了不管是貌似緩和的減租減息、統一戰線，抑或激進的土地改革，中共始終意圖促成農村社會的兩極分化，乃至達成分而治之，強化黨國領導的目的。接下來，就讓我們來探討抗戰後期，中共在冀東等地所推動之統一戰線與社會改革政策的概況。

如前章所述，被百團大戰警醒的日偽軍，從 1941 年中開始回過頭來掃蕩華北的中共抗日根據地，冀東、平北與平西的共軍首當其衝，傷亡慘重。挫敗後的中共覺悟，他們過去在冀東等地的政策犯了嚴重錯誤，既未動員基本群眾，還嚇跑了上層份子，致使日偽掃蕩之際，根據地內部眾叛親離。在平北，當地黨領導蘇梅即感慨說，中共在平北根本沒有群眾化，黨完全取代了政權，包辦了一切，所謂民主選舉幾乎沒有實現；而群眾或許對八路軍有信仰，但沒有真正地認識共產黨及其政權。⁴⁶ 在 1942 年前後日偽掃蕩後，平北共軍從昌（平）延（慶）向外轉移至赤城南部的海沱山區。⁴⁷ 鑑於過去的失敗，以及新落腳處的陌生，北方分局即指示平北黨當前應著重「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首先與當地上層份子建立關係，再逐漸深入下層工作。⁴⁸ 隨著情形愈益惡化，北方分局更進一步指示平北黨應分散開來，沿熱河向察哈爾北部（龍關、赤城以北）外線深入，其辦法是透過上層統一戰線，隱蔽行動。⁴⁹

中共在冀東地區也面臨相同的困境。如前章所述，冀東共軍在 1941 年 6 月即被日偽軍痛擊，輾轉逃亡熱南的口外地區避難。對於

46 蘇梅，〈建設政權問題〉（1942/01），《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387-391。

47 蘇梅，〈開闢平北抗日根據地概況〉，《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576。

48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平北兩年來工作的指示〉（1942/01/31），《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378。

49 〈冀熱察區黨委及軍政委員會及平北地委及軍政委員會的指示〉（1942/03），《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424、427。

八路軍來說，熱南是一個陌生的地區。冀東共黨一直以口內地區為主要根據地，1941年4月才派周治國領導的青（龍）平（泉）工作團與游擊隊赴都山一帶開闢工作。同年8月，日軍第一次大圍剿後，冀東區分委復組織由原豐灤遷縣縣長高敬之擔任主任的長城工作團，北出長城，開闢興隆、承德地區的工作。但直迄此時，共黨仍只是把熱南作為冀東共軍的「回旋區」，沒有長期待在該地區的打算。⁵⁰

伴隨著日偽在口內地區的封鎖愈加嚴密，中共逐漸開始有長期立足熱南地區的想法。1942年2月，為施行「精兵簡政」，中共撤銷冀熱察區黨委與冀熱察挺進軍建制，原屬此一建制下的冀東區分委改組為中共晉察冀邊區第十三地委（以下簡稱冀東地委），冀東軍分區亦改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十三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前者由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直接領導，後者則歸晉察冀軍區指揮。同年5月15日，北方分局和晉察冀軍區致電第十三地委與軍分區：「已有工作的山區，應求鞏固並發展之，不應單純從戰役觀點看作戰役回旋區……」，並且「今後應注意向北發展」，把工作進一步向錦承路以北及東北地區推進。⁵¹隔月下旬，中共冀東地委舉行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大力開闢包括熱河南部、灤河東部及北寧路以南地區在內的新區，其中熱南地區尤其重要，被作為一個「游擊根據地」來發展，至於灤河以東與北寧路以南則分別作為游擊區與隱蔽區來發展。⁵²同年10月，冀東地委復在大車峪舉行擴大會議，決議採取「敵進我進」的方針，即以向四面廣泛出擊的策略來對抗日偽的清剿。⁵³就在此一敵進我進的方

50 〈中共冀東地委關於建設山地根據地問題的指示〉（1942/11/27），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長城線上無人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52。

51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88。

52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90-91。

53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97-98。

針下，中共的勢力進一步向錦承路以北與灤河以東的敵後地區發展。其中，錦承路以北地區後來發展成承（德）平（泉）寧（城）邊區，灤河以東及北寧路以南地區則成立了豐灤昌樂辦事處作為最高的政權機關。

熱南對於冀東共黨來說，是一個陌生且缺乏群眾基礎的新地區。當時冀東黨也像平北黨一樣，從聯絡上層份子著手。事實上，如前文所述，自建黨以來，中共就是透過像韓麟符之類上層份子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去打入熱河等內蒙古地區。但韓麟符等人始終停留在上層活動，並沒有打入下層群眾間，致最後與共黨不歡而散。中共在熱河的發展，也因此受到很大的打擊。

1933年日本侵佔熱河，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爆發，一直被忽略的熱河黨一度受到中共重視。但當時熱河黨還是不得不透過上層份子去從事活動。此時熱河黨主要的領導人叫陳鏡湖，字印潭，化名李鐵然，熱河建平富農家庭出身。陳在五四時期與韓麟符一同在天津求學，同屬新生社。韓被驅逐出黨後，陳還留在黨內，並曾赴蘇聯活動。1930年10月，陳與另一名劉剛受中央指示，負責重建內蒙特委。陳利用上層的關係，吸收了許多同樣是菁英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例如圍場縣的督學惠世如，教師郭品三，他們曾發動奪取圍場縣教育局領導權的鬥爭。⁵⁴再如中共建國後曾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赤峰人王逸倫，當時是赤峰的高小教員，他在1932年赴北平謀職時結識了陳鏡湖，經後者介紹入黨。⁵⁵

諷刺的是，當時陳鏡湖雖然痛斥他過去的同儕韓麟符、鄭丕烈犯

54 劉景恩、李久榮，〈陳鏡湖〉，《黨史人物(-)》，頁355-356。

55 王逸倫，〈對熱河地區黨的早期活動的回憶〉，《韓麟符》，頁104-105。

了軍事投機的錯誤（即只限於聯絡上層軍事領袖），但陳自己同時也拉了許多九一八事變後在熱河各地蜂起的「義勇軍」（事實上大部是土匪）領袖，如建平的土匪宮恕孔部，朝陽、凌源、錦西一帶的畢振一，後者曾是韓麟符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的成員，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九一八事變以後成立了一支四千多人的武裝在冀、熱、遼邊界活動。⁵⁶ 據陳鏡湖的說法，「內蒙黨的成份大多數是學生」，義勇軍「大部分官長多是富農之子弟（熱河所謂槍馬戶）」，⁵⁷ 他們只知反日，若沒有與土地革命聯繫起來，「是無有前途的」。⁵⁸ 可見得陳也很清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兩者缺一不可，但是他終究未能促成兩者的結合。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變時，他甚至在中央的指示下，前赴被他斥為投機份子的韓麟符活動的孫殿英部裡活動，最後在張北縣被民團擊斃。⁵⁹ 他所聯絡的義勇軍如宮恕孔部，果然也如他生前預料般，最後投降日本。⁶⁰ 陳本人也因為始終像韓麟符一樣，只限於上層統戰活動，而且被傳言曾當過國民黨的縣長、軍官，因此被戴上「官僚路線」的帽子。⁶¹

根據戰前中共的階級分析，他們非常仇視內蒙的上層份子。中共認為內蒙革命最大的敵人就是代表封建階級的王公貴族、活佛喇嘛、地主，以及操控前者的外來帝國主義者。至於資產階級，他們在內蒙

56 〈中共內蒙特委關於內蒙古一般的政治經濟狀況的報告〉（1931/03），《內蒙文件》，頁 138-141。

57 〈中共內蒙特委三個月工作計劃草案〉（1933/02/22），《內蒙文件》，頁 179。

58 〈中共內蒙特委書記李鐵然報告書〉（1932/12/16），《內蒙文件》，頁 159。

59 劉景恩、李久榮，〈陳鏡湖〉，《黨史人物(-)》，頁 363、366。

60 〈王逸倫關於熱河黨過去工作的錯誤與今後任務的報告〉（1933/11/21），《內蒙文件》，頁 233。

61 〈王逸倫關於內蒙特委工作報告〉（1933/11/02），《內蒙文件》，頁 220-221。

力量薄弱，早就投降了封建階級；富農雖然也可能反對封建階級，但早已成爲反革命者；中農、黑人（畜牧者）和其他中間階級（手工業者、知識份子）也有兩面性；流氓無產階級（土匪）因爲革命性不堅定，只能暫時利用；只有貧、雇農才是最堅定的革命者。⁶²

抗戰以來，中共對上層份子的態度，已如前章所述，係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名義下，待機發動群眾鬥爭，予以有理、有利、有節的打擊，儘管實際上經常流於非此即彼的結果，而這也是 1941 年冀東根據地失敗的一個原因。隨後冀東黨雖然警悟到應該放鬆對上層份子過激的態度，但是當他們來到口外熱南地區時，發現該地的上層份子比口內還要糟。這一方面是由於從冀東到熱南，越往北邊土地越集中，大地主越多；再則是熱南被日僞統治的時間更久，「他們與敵人早已勾結起來，敵人統治就建築在他們的基礎上」，許多人本身就是協合會會員，其子弟也多參加僞政權工作。⁶³

儘管如此，由於缺乏群眾基礎，冀東共黨轉移熱南之際，仍必須聯合地方上層份子，如興隆縣把持官府的要人、青（龍）平（泉）一帶的大煙販子。甚至中共還通過煙販，聯絡承（德）灤（平）興（隆）一帶的秘密會社「家裡」與紅槍會。⁶⁴ 中共非常無奈，明知這些上層份子「與佃戶窮人間的關係並不和善，生活上也有很大懸殊」，還有不少抽大煙的人，但仍必須與他們進行統戰，仰賴這些人以求立足，

62 〈河北前線工作委員會關於內蒙階級狀況的分析〉（1933/07/10），《內蒙文件》，頁 203-212。戰前日人的調查也證實熱南地區土地分配不平均的狀況，而且還指出該地許多地主是關內來的漢人。木下壽男，〈承德、平泉ヲ中心トスル熱河 喜峰口古北口ヲ起點トスル北支比較農業調查報告〉（1934/05），黑龍江省檔案館編，《滿鐵調查報告（第一輯）11》（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5），頁 61-62。

63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7、77。

64 周文彬，〈關於冀東工作的補充報告〉，《冀熱遼報告(一)》，頁 104-105。

同時避免他們為敵人所用。⁶⁵這讓人聯想起戰前中共內蒙黨的狀況，那時的黨員很多也是上層家庭出身，而且「同志不吸（鴉片）的很少」。⁶⁶

但是，中共並沒有為了開展上層統戰而放棄階級鬥爭。事實上，經歷了1940、1941年來的挫敗（平西、冀東根據地的相繼崩潰），共產黨越益執著於黨員的成份與立場，以及基本群眾的階級鬥爭。以下就讓我們從中共內部的整黨與整軍先談起。

二、整黨與整軍

中共在開展上層統戰之際，也非常重視黨員的成份及立場問題。在冀東、平西與平北，我們發現，在1941年後，即根據地遭逢挫敗，八路軍被迫向外轉移，並尋求上層份子合作以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之際，中共也開始在各該地黨內發動大規模的整黨運動。

在平西，中共即於1941年5月平峪高級幹部會議後進行整黨運動。根據中共的調查，平西黨過去因為是由上而下發展起來的，故是以小資產階級為主。這些人入黨動機大多是為改善生活、假黨營私、報仇等原因，只有小部分是為自己與階級的解放。所以他們的作風極差，像是貪污腐敗、性行為不檢、吸鴉片、官僚作風等等。更嚴重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使他們面臨敵人之際，極可能投降背叛。因此緣故，中共發動整黨運動，主要目的是要把內奸、階級異己份子及落後份子清洗出去。在涑水縣，整黨以前村支部領導以中農為主，

65 〈中共冀東地委關於建設山地根據地問題的指示〉(1942/11/27)，《長城線上無人區》，頁53。

66 〈河北前線工作委員會轉關於內蒙平民革命黨向前書的報告致河北省委的信〉(1933/07/03)，《內蒙文件》，頁195。

占 57.5%，貧農與工人占 40.3%；整黨後中農降為 31.8%，貧農、工人占 65.6%。⁶⁷ 在隔年張明遠的報告裡，我們知道，此一整黨運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如涇水縣在 1941 年的整黨後，又進一步掃出一些中農、富農階級份子(降為 26%)，貧農、工人成份提高至 74%。當然，這不是說階級成份是整黨的唯一標準。根據張的說法，在當時區以上的黨委中，雇農與工人只占 30.1%，中農有 24.1%，知識份子為 38.5%，這主要是因為越是上層，對幹部能力的要求越高。⁶⁸ 而且被洗刷或處份者，都出於具體的原因(如貪污腐化、變節投敵等)，其中也包括貧農階層。⁶⁹ 由此可見，異己階級出身者，只要服從黨的領導，為黨國服務，也能夠獲得留任；階級出身好的份子，如果流於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習性，失去控制，也可能遭到洗刷。這就證明了，中共不單純促成農村的階級分化，它還欲塑造可為黨所控制的統一戰線與基本群眾。

在冀東，中共在 1941 年遭到大挫敗而被迫轉移口外之際，也開始推動整黨運動。如下圖所示，薊寶三、平三密、遷遵興是被掃蕩前中共在口內的主要根據地，遷青平與遷遵興裡的興隆是掃蕩前後中共新開闢的口外地區。從該圖所示各該行政區支部委員成份調查可見，掃蕩前口內基本區的貧、雇農成份所占比率較低，而愈是後期新開闢的口外地區，貧、雇農的比率愈高。中共對此作了解釋，即 194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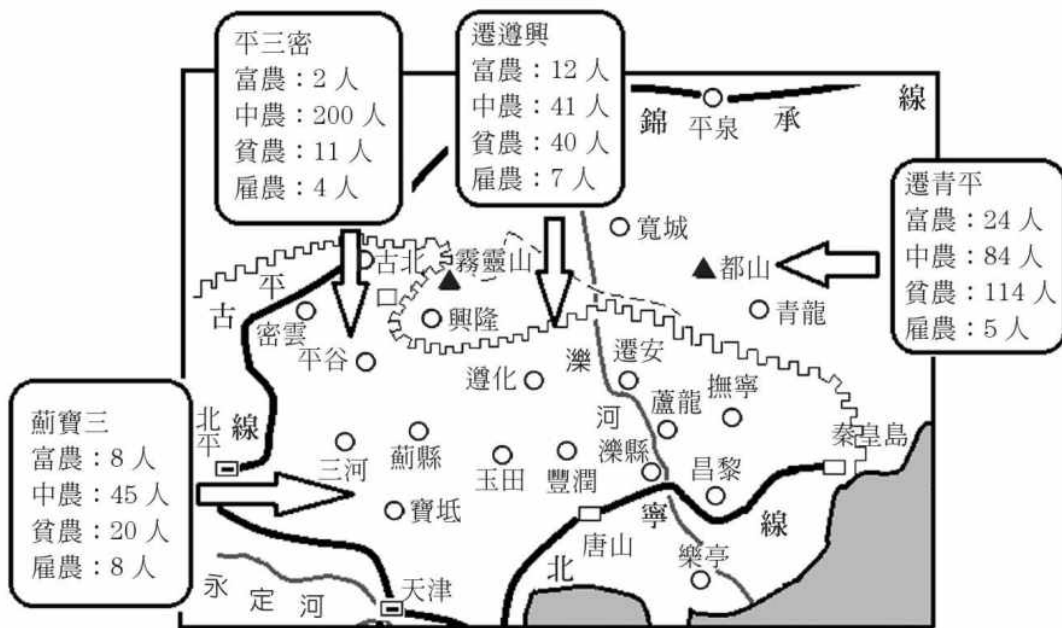
67 李德仲，〈平西地委 11 月擴大幹部會議報告提綱〉(1941/11)，《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305-328。

68 田原史起關於中共建國初期農村地方幹部的研究也指出，階級出身不是提拔幹部唯一的標準，教育程度等相關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指標。田原史起，《現代中国農村における権力と支配》(東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1999)，頁 257。

69 張明遠，〈黨的建設總結〉(1942/03/02)，《冀熱察抗日根據地》，頁 398-422。

他們開始大量吸收貧農。⁷⁰ 這就證明前文所述，冀東黨在轉往口外之際，雖為求立足暫時與地方上層份子合作，但他們並未因此放棄階級鬥爭，而是訴諸整黨的辦法，更加強調階級成份。

圖 6-2 1943 年冀熱邊支部委員成份調查



再從中共對冀東黨員入黨動機的分析來看。根據調查，冀東黨員大多是為抗日而入黨，他們抗日情緒極其高昂，認為為抗日犧牲是無限的光榮，叛變投敵則是可恥的罪行。據中共所言，占支部委員大多數的中農份子都是積極的抗日份子。但是，中共並不以此為滿足，甚至批評這些人「階級意識模糊」、「成份不夠好」、「政治上落後」，指摘過去黨的教育偏重於「抗戰教育」，對「階級教育、政策教育和黨的組織教育，重視不夠」。所以整黨就是要加強階級與政治教育，洗

70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36。

刷成份不好和不起作用者。但由於係採取秘密開除的手段洗刷黨員，致許多黨員因此惶恐不安。如有一位女黨員便懷疑自己被壞份子誣陷而遭到洗刷，因此自殺。⁷¹ 無論如何，以上論述告訴我們，中共並不滿足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還要階級鬥爭。

當時中共面對的形勢相當嚴苛。已轉移至熱南等口外地區的八路軍，由於過去中共在該地沒有基礎，致在物質經濟上陷入嚴重的困境。因此緣故，冀東黨一直設想籌劃重回冀東基本區。⁷² 在1943年1月，冀東地委於興隆縣河南大峪會議上即確定該年度的計劃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被蠶食的冀東基本區。同月中旬，根據李運昌的提議，冀東地委與軍分區決定由李運昌親自率部入關，進行恢復冀東基本區的戰役。⁷³ 隔月初，蟄居熱南地區的八路軍部分主力兵分三路向冀東基本區挺進，其中東、西兩路在途中由於遭到敵軍的阻擋而未能到達預定地區，至於由李運昌、彭壽生所率領的中路雖由喜峰口暫時進入基本區，但最後還是被迫撤出。⁷⁴ 事實上，除了冀東地區外，整個晉察冀邊區在1943年初時也日益縮小，許多地區還游擊化，處境維艱。⁷⁵

但是，與此同時，整個抗戰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則有顯著

71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37-41、48-52。

但是，當時冀東黨對女黨員的評價確實也相當低，認為她們都是為求自身從家庭中解放而入黨，既沒有階級覺悟，也只關懷婚姻、家庭而不是抗日的問題。

72 〈第十三軍分區關於恢復基本地區的總結報告〉(1943)，《冀東武裝鬥爭》，頁159。

73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105-106。

74 彭壽生，〈冀東軍民是怎樣恢復基本區的〉，《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2》，頁410-413。

75 〈中央對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發表宣言的指示〉(1943/01/11)，《中央文件14》，頁9。

的進展，加上中美英廢除不平等條約協定的簽訂，國民黨政權之聲望也由此水漲船高。⁷⁶ 因此緣故，中共不得不暫時緩和兩年前新四軍事變以後日益惡化的國共關係，並指示各地黨政軍領導說「蔣在抗戰中有功勞，同時人民心理厭惡內戰，故我們應爭取在抗戰後與國民黨建立和平局面」；⁷⁷ 要所有黨員「不放鬆每一機會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動地加強局部統戰工作，改善關係，以求更加促進國內整個形勢的好轉」。⁷⁸ 然而，緩和與國民黨的關係只是策略上的問題，中共對內仍不斷教育黨員幹部要「打破對國民黨的幻想」，告訴他們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挽救中國民族於危亡。⁷⁹ 當時冀熱邊區也是這樣宣傳：「一九四三年來，抗戰勝利之年；中國英美反抗，日本必敗無疑；我八路軍來此，奉令收復失地……。」⁸⁰ 他們並未提到國民黨與國軍。

很顯然的，毛澤東沒有因為國民黨政權的國際地位高漲，而放棄對它的挑戰。也是在 1943 年初，延安整風達到其高潮，毛澤東在黨內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地位。⁸¹ 同時期的冀東等敵後抗日根據地，似乎也是呼應了延安整風，以及為了配合整個局勢的發展，蓄積力量，準備反攻，⁸² 發動了一場以軍隊為對象的整軍運動，以堅定黨員

76 關於 1942-1943 年國際形勢之轉變及其對中共決策的影響，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頁 428-432。

77 〈對戰後形勢的分析和關於當前工作問題的指示〉（1943/01/25），《中央文件 14》，頁 14。

78 〈關於主動加強統戰工作的指示〉（1943/02/07），《中央文件 14》，頁 20。

79 〈關於打破對國民黨的幻想的指示〉（1943/07/23），《中央文件 14》，頁 80-81。

80 〈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十三軍分區司令部政治部布告〉（1943/01），《冀東武裝鬥爭》，頁 95-96。

81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頁 435-436。

82 〈第十三軍分區 1943 年上半年工作計劃〉（1943 年上半年），《冀東武裝鬥爭》，頁 154。

與幹部的階級和政治立場。⁸³

事實上，李運昌自 1939 年底偕紅四方面軍老幹部劉誠光自唐縣軍城會議歸來後，便已在冀東八路軍中提出整軍工作。⁸⁴ 但根據後來接替陣亡之劉誠光擔任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權所言，⁸⁵ 冀東八路軍直迄 1943 年時仍舊不夠正規化，不僅軍政制度未好好地建立起來，部隊中還充斥著濃厚的游擊主義習氣，特別嚴重的是許多幹部「黨性」不純。所謂黨性，簡單地說就是對黨的忠誠程度，對共產主義前途的信仰。中共認為，幹部由於階級成份不純，致黨與軍隊內充斥著各式各樣不良的風氣，最主要的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因此，所有的黨員與幹部都要認識自己的不足，經常學習，整頓黨內的風氣，這就是整風運動。據李中權的說法，軍隊內的整風係先從領導幹部著手，「特別是主要的負責幹部，都應認識到自己的黨性是急需要鍛鍊的」。隨後深入下層支部，所有人員都要通過政治審查與教育。表現好者獲得表揚，成為大家學習的模範；政治問題不清楚者，必須受到審查與鑒定；更嚴重者，則被當成敵人與頑固份子，遭到鏟除。⁸⁶

83 〈第十三軍分區政治部 1943 年下半年政治工作計劃〉(1943/07/28)，《冀東武裝鬥爭》，頁 130-132。

84 李楚離，〈堅持冀東游擊戰爭，為創造大塊游擊根據地而鬥爭〉，《冀熱遼報告(-)》，頁 34-35。劉誠光，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31 年加入紅軍，1933 年入黨，抗戰時期曾任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等職，1942 年陣亡。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頁 658。

85 李中權，四川達縣人，1928 年入團，1932 年加入紅軍，隔年入黨。抗戰時期曾任冀東與冀熱遼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等職。中共建國後曾擔任華北與北京等軍區的空軍參謀長與司令員等職。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頁 706。

86 李中權，〈當前建軍的中心問題是強化部隊政治整軍〉(1943/01)，《冀東武裝鬥爭》，頁 97-103。

如同延安整風般，冀東等地的整黨、整軍不僅是爲了肅清黨內的不良份子與教育黨員、幹部，同時還樹立了毛澤東最高的領導地位。正如李運昌後來在 1944 年的一場演講上所報告的般，雖然過去共產黨擁護蔣介石作抗戰領袖，但他「不識抬舉、死不進步」，軍事上消極抗戰，政治上則採取反動的法西斯政治路線。相反的，「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給全國人民以抗戰出路，勝利信心」。毛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是「爭取抗戰勝利的指針」，《新民主主義論》則是建立新中國的指導原則。⁸⁷ 因此，只有擁護共產黨，緊緊跟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抗戰才能勝利，建國也必將成功。

在整黨、整軍運動後，中共在冀東等地再發動反攻。1943 年 6 月，冀東地委改組爲冀熱邊特別區委員會（簡稱冀熱邊特委，書記李運昌，副書記李楚離），決定乘青紗帳時期「恢復老地區，保衛山地，鞏固路南、河東」。⁸⁸ 老地區是指口內的基本區，山地則是熱南山區，路南與河東即昌黎、盧龍、撫寧等地，其中當然以恢復老地區的工作最爲重要。此次重回基本區的戰役最終也獲得了相當成果。迄該年 11 月止，中共已恢復了豐灤遷、豐玉遵邊區的全部地區，西部的薊寶三也有部分恢復。⁸⁹ 八路軍終於回到了冀東根據地的基本區，整黨與整軍運動在此一過程中，不能說沒有它的貢獻。

87 〈李運昌同志在特委分直黨的廿三週年紀念大會上報告〉，中共冀熱邊特委，《堅持》（1944/08/10），臺灣法務部調查局：052.1/816/15959 n.11。

88 〈中共冀熱邊特委第一次執委會對於今後工作的決議〉（1943/07），《冀東武裝鬥爭》，頁 145。

89 〈軍政委員會關於 1943 年青紗帳工作總結〉（1943/10/12），《冀東武裝鬥爭》，頁 152。

三、人圈裡的群眾鬥爭

然而，只是整黨與整軍，沒有群眾運動配合，共產黨不能獲得勝利。如前所述，抗戰後期中共最重要的群眾動員機制就是減租減息運動。關於冀東等地的減租減息運動，我們留待下一段再談。這裡要先插入一小段插曲，即人圈裡的群眾鬥爭，這是冀東等地區特有的一種鬥爭運動。

原來，自 1942 年以來，日偽政權即開始在口內外，普遍實行「人圈」政策，把地方居民集中到公路附近或據點的人圈中，在人圈周圍修築高牆、碉堡，以隔絕八路軍的進出。在人圈的外圍 10 餘里不等的地區是所謂的「無住地帶」，不准居住，但還准許路人來往及農人種地、砍柴。在無住地帶外統為「無人區」，一概不准見人，見人就殺。⁹⁰ 人圈內設有負責行政事務的部落長，下面有甲長、牌長，⁹¹ 另外還有協和會的組織，地方武裝皆歸其領導。居住在人圈中的人民皆必須接受思想改造，那些思想不良者將被作為勞工移民遣送到東北地區做工。⁹²

群眾不願意搬離自己的家鄉，共產黨也不樂見人圈政策的實現，

90 姜宇，〈中共冀熱邊特委關於 1943 年下半年冀熱邊情況報告(節選)〉(1943/12/30)，《長城線上無人區》，頁 63。

91 如前所述，在口內冀東地區，日偽推行大鄉與保甲制。至於口外的熱南地區，屬滿洲國屬，其基層行政建制與口內不同，是採取大村與甲牌制。每牌 10-20 戶，每甲 14-15 牌，每大村約 10 甲。所以，大村約千戶以上，比口內的大鄉規模還要大。分局秘書處，〈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118。

92 〈冀東李政委關於關外敵製造無人區及人圈統治概況的報告〉(1944/10/26)，《長城線上無人區》，頁 91。

所以中共一開始鼓勵群眾消極地拖延或積極地打游擊，抗拒搬入人圈。⁹³ 但是，由於日偽的誘降與強迫，自 1943 年 1 月起，群眾還是不得不開始搬入人圈。迄該年 10 月，大部分群眾都已搬入人圈。⁹⁴

有些共黨對此不能諒解，特別是在熱南地區。如前所述，中共轉移到熱南山溝原是情非得已，所以他們一直籌劃著回到冀東平原區。對於熱南地區，共黨幹部總是無法擺脫某種仇視的態度，事實上也是一種自卑的心理，即認為該地敵偽統治歷史較長，力量雄厚，革命陣營則相對薄弱，群眾異常落後，所以許多幹部不願意到熱南工作。至於人圈，在熱南，共黨一開始即採取完全對立的政策，強迫群眾不准搬入人圈，或要求搬入者「拆圈」。但事實上中共不可能禁止人民搬入圈內，他們也清楚搬入者許多是被迫的，而且圈內矛盾重重（如原居住者輕視剛搬入圈內者）。可是當時共黨卻批評「到人圈去的大部係上層的」，採取完全對立的態度，結果就導致革命的山溝與反動的人圈間相互對立。兼之人圈外人煙與資源愈益稀少，共黨更難以立足，熱南局面也就因此無從打開。⁹⁵

這就是當時冀東黨面臨的孤立困境。他們既待不住熱南，也回不了冀東，關鍵即在於地方幹部不能更靈活地執行統一戰線與群眾鬥爭的策略。前面所述 1943 年初口外八路軍重回冀東基本區的嘗試所以招致失敗，也是因為中共事先未動員地方群眾及幹部起來配合，致使

93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熱邊考察團考察報告〉，《冀熱遼報告(二)》，頁 25。

94 姜寧，〈中共冀熱邊特委關於 1943 年下半年冀熱邊情況報告〉(1943/12/30)，《長城線上無人區》，頁 63-64。

95 〈中共冀熱邊特委關於熱南地區一年來敵我鬥爭的總結〉(1944/04/18)、〈中共冀熱邊特委關於恢復口外工作決定〉(1944/09/01)、〈冀東李政委關於關外敵製造無人區及人圈統治概況的報告〉(1944/10/26)，《長城線上無人區》，頁 82-93。

行動最終流於單純的軍事行動。⁹⁶ 想要突破此一困境，中共必須要使自己「轉入人圈」當中，靈活運用「合法抗爭」，為自己尋得一個立足之地。

我們沒有冀東、熱南的案例，但有一份來自平北根據地昌（平）延（慶）地區的報告，可以讓我們一窺當時中共如何從事人圈裡的合法抗爭。

如前所述，平北與平西根據地在 1941 年也遭到日偽的掃蕩，而逐漸向口外退出。如同冀東一般，平北與平西共黨始終沒有放棄口內，他們在口內的基礎也大於口外。針對日偽政權在該地開展的人圈政策，平北黨採取了以下相應措施：⁹⁷

首先，用合法鬥爭的手段消極抵抗。當敵人來要求修圍子時，已與共黨有聯繫的甲長代表居民向敵人請求，迨春耕後再修，藉此拖延工事。

春耕結束後，敵人再來壓迫，這時甲長便出示他們與八路軍早就準備好的告示，說八路軍威脅甲長和地方居民不准修，修了還是要拆，增加敵人修圍子的困難。

最後，在敵人的強迫下，終究要修圍子。已與共黨串通的甲長，對此採取消極怠工與應付的態度，即派少數人修，敵人來時才增加人數；同時依八路軍指示，先修哪裡，後修哪裡，而且在圍子下修地道，還邊修邊破壞。

在拖延五倍以上時間後，圍子最終還是修成，人民被迫遷入。這時共黨區幹向縣裡建議，撤出圍子裡的抗日村幹，拆毀圍子裡的房

96 〈第十三軍分區關於恢復基本地區的總結報告〉(1943)，《冀東武裝鬥爭》，頁 159。

97 〈平北辦事處關於 1943 年政權工作總結〉，《長城線上無人區》，頁 75-82。

屋。但這可能會造成像前述熱南地區般，圈裡與圈外人民非此即彼的對立。所以縣幹部否定了這一辦法，堅持抗日幹部繼續留在圈內，藉此影響與領導圈內群眾鬥爭。

後來證明了縣裡的政策是正確的。共黨因為繼續留在圈內，才能利用偽組織與各種關係發動群眾，從事合法鬥爭（如抗夫），甚至鎮壓打擊壞的甲長，繼續發揮其影響力。

但中共最後的目的還是要破壞人圈。所以他們在人圈裡鼓動人民，慢慢地遷出。待時機成熟，外來的八路軍與圈內的群眾鬥爭配合，燒燬人圈。當然，這時甲長還是表面上作為偽政權人員，向敵偽報告八路軍燒燬了人圈，請求敵偽想辦法。敵偽這時無可奈何，也只好允許人民「走你們的吧」！

這是一個成功的人圈裡合法抗爭的案例。在此一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幹部的作用極其重要，他們必須在與敵偽的交往中，不失卻自身立場；同時又能在艱苦的環境下，堅持黨的政策（如縣領導要求村幹繼續留在人圈中）。由此也可見得，中共所以要在這一愈益艱困的環境裡推動整黨、整軍運動的必要性。

但是，只有幹部的堅持，沒有群眾的動員，仍不足以保障政策的貫徹。同樣在平北根據地，中共就沒辦法支配龍（關）、赤（城）等地群眾任意搬入人圈的行動，而不得不採取「行政辦法」，堅決聲明制裁搬入據點者。⁹⁸ 龍、赤地區相較昌、延地區來說，也算是新開闢的口外地區，就好比熱南與冀東的相對位置般。由此可見，共產黨只能夠在較有基礎的地區才能夠靈活地結合統一戰線與群眾鬥爭來反人

98 〈中共平北地分委關於反併村鬥爭的指示〉（1943/10/15），《長城線上無人區》，頁61。

圈，在沒有基礎的地方，中共或是採取完全敵對的態度，或者只能尋求上層的幫助。雖然上層的關係可以幫助中共打入人圈，如熱南的承（德）平（泉）寧（城）地區，中共利用甲、牌長使成兩面政權，透過他們向人民征收，同時還尋求當地的紅槍會、青紅幫合作。⁹⁹但是，這些上層與秘密會社的成份令人擔心，李運昌後來就批評，中共在熱南「只注意聯絡上層」，沒有關心人民的困難，致力於改善佃農生活與推動減租減息，以至沒有雄厚的群眾基礎。¹⁰⁰因此，中共能否成功，最關鍵仍在於能否造成一個二元分化的社會，並把底層群眾由下而上地動員和組織起來。

四、冀東等地區的減租運動與游擊運動的開展

冀東等地區的減租運動，開展的較晚。據晉察冀邊區在 1943 年底時所言，「平北大體上才初步執行，冀東則基本上尚未開始執行（減租減息）」；¹⁰¹隨後又指示「冀熱邊將重點放在山地的中心區與已恢復了的平原基本地區，平北是繼續推行與深入貫徹」。¹⁰²由此可以推測，平北執行減租政策的時間較冀東早。

曾是「三位一體」政策的重心、後來被劃歸北岳區的平西，減租的歷史則更長久。根據報導，平西的涞水縣，從 1939 年起就開始推

99 姜寧，〈中共冀熱邊特委關於 1943 年下半年冀熱邊情況報告〉（1943/12/30），《長城線上無人區》，頁 71-72。

100 〈冀東李政委關於關外敵製造無人區及人圈統治概況的報告〉（1944/10/26），《長城線上無人區》，頁 92。

101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關於徹底實行減租政策的指示〉（1943/10/1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84。

102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於貫徹減租政策的指示〉（1943/10/28），《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90-91。

動減租減息，但由於不夠普遍深入，加上 1940 年掃蕩後的破壞，一度混亂；雙十綱領後，地主又曲解法令，進行反攻；1942 年以後，地方當局為推動農業統一累進稅，重新注意減租減息，但仍沒有走群眾路線，不夠徹底。從 1943 年 9 月起，平西黨才注意領導與群眾的結合，即事先調查，教育幹部，動員群眾，最後在黨政監督下，召集租佃勞資雙方調解，事實上是要求地主退租、退地，重訂契約。這段歷程與前述冀中、北岳等其他地區的減租運動比較，看似重覆的陳腔濫調，但也帶有平西的特殊性。如平西算是較不穩固的游擊區，涑水等地減租運動的貫徹，對於中共來說，正足以駁斥一些幹部所謂游擊區「不能實行減租」的錯誤看法。¹⁰³

游擊區可以也應該推動減租，這是因為中共認為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線原本便不相妨礙，而且還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在平北的龍（關）延（慶）懷（來）區，某村的地主全都住在敵佔區，該村佃戶要求減租，地主不允，要佃戶上偽警察署，佃戶反要求地主親自來收租，地主沒辦法，只好允許減租。減租後，地主僱不了人，鋤不了地，眼看地就要荒蕪，佃戶就組織起來，用一天的時間幫地主鋤了地。此一事件最後並沒有破壞統一戰線，還促進了階級團結，但前提是發揮、動員群眾的優勢。平北黨因此證明，減租既打破了地主頑強的階級立場，事實上還加強了統一戰線。¹⁰⁴

在游擊區發動減租，既可以發動群眾、鞏固統一戰線，還有助於「地方軍事化」的開展，使群眾自己組織起來，保衛自身，也協助八

103 丁原，〈平西的減租運動〉（1944/02/24）、〈中共平西地委關於全面貫徹土地政策發動群眾總結〉（1944/06），《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117-125、165-182。

104 〈中共平北地分委關於一九四三年工作檢查與總結〉（1944/04/01），《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頁 155-156。

路軍的活動。

以冀東爲例，中共上層批評，冀東八路軍在 1942 年被迫轉移熱南，以及 1943 年由熱南回到冀東之際，由於沒有建立地方基礎，以至主力軍隊一轉移，整個地區也因此崩潰瓦解。此一現象，中共北方分局認爲，正反映了冀熱邊黨太過依賴主力軍，一心只想打運動戰，忽略游擊戰的結果。在敵人反覆掃蕩的冀熱邊區，此一戰略並不恰當，所以，北方分局指示，冀熱邊黨應投入游擊戰爭。¹⁰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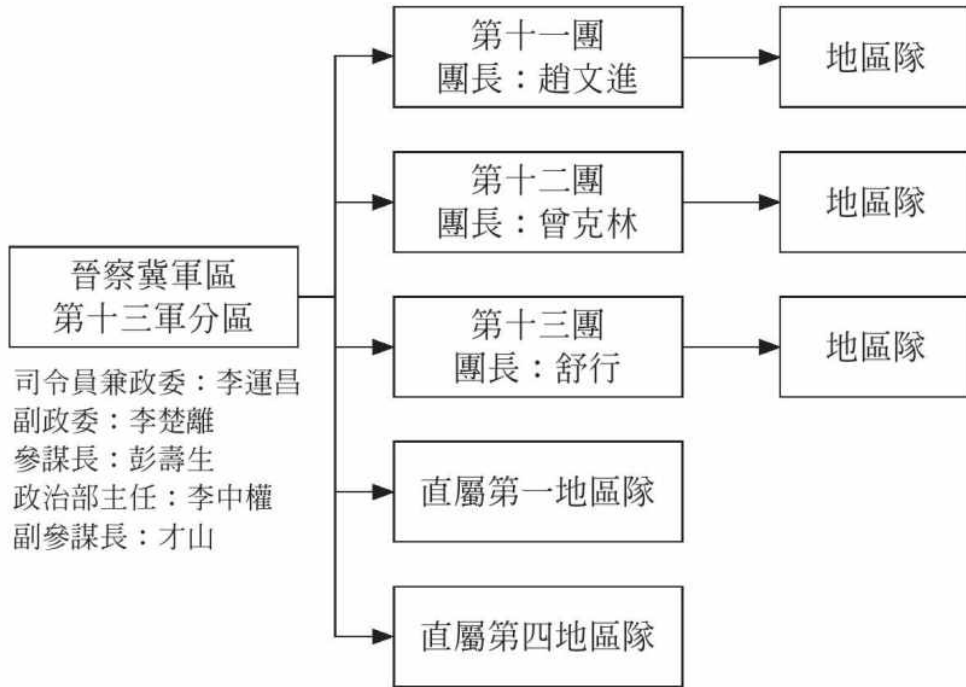
要發動游擊戰爭，一方面要設法使主力軍隊地方化，同時還要建立地方武裝，即民兵。根據冀熱邊特委 1943 年 7 月的規定，冀熱邊最高軍事領導機構是「軍分區」，軍分區以下爲從事運動野戰的團與原本便具有地方性色彩的直屬地區隊。現在爲了提高團的地方性，團也被要求抽調部分組成地區隊，堅持地方。再者，縣及區也要成立基幹游擊隊，配合主力軍作戰。¹⁰⁶事實上，地方武裝的建立在敵後根據地相當普遍，當時冀中就以地道戰聞名，河北敵後民兵也常以爆破與隱蔽射擊的方式騷擾敵人。1945 年以來，民兵進一步區分爲負責作戰的民兵，以及負責後勤的自衛隊，兩者皆不脫產。到國共內戰後，民兵成爲常設制度，象徵共產黨統治下的「地方軍事化」。¹⁰⁷

105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對冀熱遼工作的意見〉(1944/11/02)，《冀東武裝鬥爭》，頁 246-248。

106 〈中共冀熱邊特委第一次執委會對於今後工作的決議〉(1943/07)，《冀東武裝鬥爭》，頁 143-144。

107 抗戰末期民兵的進一步發展見：〈中共冀熱遼區黨委對一年來人民武裝工作的檢討與今後人民武裝建設的決定〉(1945/07/18)，《冀東武裝鬥爭》，頁 341-346；國共內戰時期關於民兵的規定，見：〈熱河省人民武裝委員會、熱河省政府頒布熱河人民武裝各種條令〉(1947/09/01)，《熱河解放區(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 426-440。

表 6-1 1943 年 9 月至 1944 年底晉察冀第十三軍分區編制



資料來源：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史研究會編，《冀熱遼子弟兵，1937-1945》（唐山：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史研究會，1991），頁 173-176。

無論是「軍隊的地方化」或「地方的軍事化」，前提要件都是要把群眾動員起來。1943 年以降中共河北敵後根據地的減租運動所以變得愈益激烈，與此也不無關係。冀熱邊區亦不例外。

1943 年 7 月，冀熱邊特委下令建設地方武裝的同時，也要求在熱南山區與冀東平原開展減租運動。¹⁰⁸ 冀熱邊特委發現，雖然過去的合理負擔也包括一部分減租的作用（如前章所述），但後來冀東被敵掃蕩後，地主普遍地增租奪佃。這一過程頗類似冀中、北岳等地所

108 〈中共冀熱邊特委第一次執委會對於今後工作的決議〉（1943/07），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東土地制度改革》（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 18。

謂「五一」以後的地主反攻，後來也成爲中共要求退租的藉口。無論如何，減租勢在必行，而且必須是群眾的行動，而不是黨政幹部的包辦恩賜。¹⁰⁹ 過程也如前述，由外來的幹部先向地方幹部進行宣傳教育，後動員群眾（甚至爲發動群眾，容許流氓份子在一開始時加入），找地主說理算帳。結果不僅要達成減租的目的，還要地主退租。¹¹⁰ 其他如典地問題，也像其他地區般，被冀熱邊特委提起。¹¹¹ 整個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把群眾動員起來，造成農村的階級分化，加強黨國的領導。

遷安縣反地主石振東的例子，很好地說明中共如何發動有理、有利、有節的減租鬥爭。石振東是一位開明士紳，但也逃不過被鬥爭的厄運。1944年冀東普遍地深入發動減租運動之際，農會代表去找石要求減租，石卻反而宣稱他每畝地租不超過120元，以現在糧價每斤小米5元計算，最多只算24斤，占畝產120斤不到37.5%，所以不僅無需減租，農會還應該「找」他錢。農會代表掃興而返。後來重新討論，發現交租時糧價每斤小米才2元，所以石的地租折米將近60斤，再加上應減未減導致利息的損失，就更多了。農會因此告到政府，政府開了15個村的大會，石也被迫在會上公開道歉，承諾退租。但大會後，石振東卻又偽造縣長的法令，說只給10畝以下的佃戶退租。農會代表因此要拉石去找他所謂的縣長說理，石腦羞成怒，當場把一位農會代表的鼻子打破。此一舉動使石自身陷於理屈。這時中共

109 〈中共冀熱邊特委關於進行減租運動決定〉（1944/09/01），《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35-36。

110 〈中共冀熱遼區黨委關於發動群眾的初步檢查與今後的意見〉（1945/01/25），《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40。

111 〈冀熱邊抗戰期間典地回贖暫行辦法〉（1944/04/01），《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29-31。

區幹部才出面，以「調解的態度」跟地主說：「無論怎樣，你伸手打人不對的。」「和這一群莊稼人鬧個什麼勁？乾脆找錢退給他們還好看，不然，你打了他們鬧大了，還要受政府制裁。」石因此承諾將全村租子都退了。

但事情還沒結束，群眾愈聚愈多，要跟石振東算打人的帳。區長這時又跟地主說：「過去我和你講減租的道理，讓你早些退給佃戶，要早辦事哪有今天？」石的兒子此時也埋怨他父親，請區長幫幫忙。這時石本人也不知如何是好，但又沒有錢立即退租。所以區長又說：「沒錢也不怕。……我這裡公家還存著 6,000 元，先借給你。」儘管如此，區長還是乘群眾尚聚集之際，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區長在臺上一面扮好人為地主解釋，一面又說減租是政府法令，打人不對。結果區長說得越多，群眾越生氣，甚至喊出：「把打人的地主殺了！」石振東因此更希望政府當調解人。最後，在區長的「調解」下，地主被迫減租、退租，還被要求訂立五年的契約。

整個過程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群眾被動員起來，當面與地主完全撕破臉。而共黨幹部則作為一個調解人，公開地站在「公正無私」的立場，假好意地幫助地主的忙，事實上卻起到鉗制地主與煽動群眾的目的，同時贏得群眾的尊敬，以及地主心甘情願的臣服。在這裡，統一戰線、階級鬥爭，以及黨的領導，完美辯證地結合一致。¹¹²

但是，這也只是少數成功的典範，至少在中共上層看來，冀熱邊區的減租運動並不徹底，普遍犯了右的與左的錯誤。右的錯誤，例如，冀熱邊黨沒有解決「租地帶差」的問題，即減租時沒有同時把佃

112 〈冀熱遼區的減租運動〉(1945/09/12)，《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60-63。

農替地主拿的對敵我負擔算進去，有的則是原來只由地主負擔（如前章所述的合理負擔），但減租後為顧及統一戰線，改由地主與佃農按比例分擔。¹¹³而中共認為正確的作法應是租照減，負擔歸地主，這又再度證明「合理」負擔根本不合理。但實際上冀熱邊很多地方並沒有這樣做，結果當然招致中共上層的不滿。¹¹⁴

至於左的錯誤，最普遍者是發生貧農奪取富、中農所佃之土地的現象，導致階級陣營的混亂。¹¹⁵原因是地主係看誰出的租子多就租給誰，加上貧農投資力低，地主怕土地被糟蹋，所以多租給富農、中農，不願租給貧農。¹¹⁶因為此一現象如此普遍，以至許多地方黨乾脆不做減租運動，專致力於「調劑土地租種」，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中農與富農，導致後兩者的不滿，甚至還引起貧佃與中、富佃之間的械鬥。冀熱邊黨這個時候還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但已經暗示「只有以貧、雇農為骨幹的減租運動，中農才能被帶領起來，從而建立起基本群眾的優勢」。¹¹⁷因為中農是被領導者，而且帶有中間階級的動搖性，所以對中農的聯合並不是理所當然，同樣也是要在「一打一拉」下，把他們置於貧雇農的領導下。¹¹⁸這就是戰後土地改革採取的邏輯。

中共上層批評冀熱邊黨在減租運動方面未能普遍發動群眾，在前述的「軍隊地方化」與「地方軍事化」方面也做得不夠。一方面，主

113 〈冀熱遼區的減租運動〉(1945/09/12)，《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67-68。

114 〈中共冀熱遼十四分區關於發動群眾工作的總結〉(1945/12/31)，《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81。

115 〈冀熱邊行署 1945 年 1-3 月份工作綱要〉(1944/12/15)，《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38。

116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研究室關於冀熱遼四個縣 1944 年的減租增資情況〉(1944/08/15)，《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45。

117 〈冀熱遼區的減租運動〉(1945/09/12)，《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64-66。

118 〈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總結報告〉(1947/07/27)，《冀熱察解放區》，頁 63-64。

力軍與地方武裝沒有配合行動，¹¹⁹ 或者，軍隊根本就不重視群眾，認為「群眾工作只是為著軍隊，而不知道我們軍隊本身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和不顧犧牲進行戰鬥，就是為著群眾」，這一點被批評是「脫離群眾的軍閥主義習氣」。¹²⁰

但是，局勢的迅速發展，中共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去慢慢地動員群眾。當時冀熱邊已納入滿洲國的統治。原來，早在 1944 年初，滿洲國已成功地完成熱南地區無人區的建設，大幅縮小共軍活動的範圍。¹²¹ 隨後，滿洲國軍隊大舉入關。1944 年 7 月 1 日，滿洲國當局宣佈劃「冀東道」為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區公署，以姜鵬飛為行政長官兼行營主任及新民會總裁，實行軍政會一元化領導，積極推動滿洲化，以密切日本、滿洲國與中國的關係，加強對冀東共黨的圍剿。¹²²

看似嚴峻的環境，卻是黎明前的黑暗。蓋將成為冀東主要守軍的滿洲國軍與日軍比較下，戰鬥力較差，而且中共早已獲悉，滿洲國軍新兵多，士氣不振。兼之當時國際反法西斯陣營抬頭，在中共看來，1944 年恰是反攻的一年。況且，滿洲國軍迄 1944 年冬才開入冀東，雖然一度造成根據地的混亂與收縮，但中共認為這是由於主觀因素所致，如幹部與群眾的悲觀、厭戰與消極，以及軍隊只企圖打大仗，不願打小仗的結果。¹²³ 整個客觀環境看來，則是樂觀的。所以，從 1945

119 〈第十三軍分區關於恢復基本地區的總結報告〉(1943)，《冀東武裝鬥爭》，頁 159。

120 〈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對冀東工作指示〉(1944/02/19)，《冀東武裝鬥爭》，頁 163。

121 〈中共冀熱邊特委關於熱南地區一年來敵我鬥爭的總結〉(1944/04/18)，《長城線上無人區》，頁 83。

122 〈中共冀熱邊特委關於秋季反掃蕩準備的指示〉(1944/08/17)，《冀東武裝鬥爭》，頁 232。

123 〈中共冀熱遼區黨委關於鞏固冀東基本區的決定〉(1945/04/12)，《冀東武裝鬥爭》，頁 283。

年初始，中共即計畫趁滿洲國軍立足未穩前，予以打擊與爭取。冀熱邊黨因此被要求一方面鞏固基本區，同時開闢與恢復熱遼邊區。¹²⁴當然，中共當時也未能預知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但從 1944 年底毛澤東的指示來看，中共確實有打算乘國軍被日軍一號作戰擊潰之際，更進一步擴大根據地及其勢力，以與蔣介石爭天下。其中，察哈爾、熱河及冀東，係被毛澤東點名的重點擴大區域。¹²⁵

第三節 國共內戰與土改運動

一、向北發展、向南防禦

爲了響應中央擴大根據地的號召，冀熱邊特委、行署與軍分區在 1945 年 1 月，於薊縣林口改組爲冀熱遼區委員會、冀熱遼區行署和八路軍冀熱遼軍區，作爲冀熱遼邊區最高黨政軍領導機構，並由李運昌擔任區黨委書記、行署主任與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在國共內戰開打，李運昌被調赴東北作戰後，由張明遠接任各該職務。

1945 年 4 月，晉察冀邊區指示冀熱遼區黨委要開闢熱河工作，並下最大的決心在熱河建立根據地。隔月，冀熱遼區黨委和軍區制定了「擴大解放區戰役計劃」，決定派數支「挺北支隊」，以擴大熱遼解

124 〈中共冀熱遼區黨委關於目前對敵鬥爭的決定〉（1945/01/15），《冀東武裝鬥爭》，頁 264-266。

125 毛澤東的指示，見：〈關於擴大解放區的指示〉（1944/12/18），《中央文件 14》，頁 430。中共直迄 1945 年 8 月都還以爲日軍一年後才會失敗。在該月中央給豫鄂邊根據地的指示即說：「估計日寇明冬可能失敗，還有一年時間供你們作準備工作。」見：〈中央關於發展豫鄂根據地對付將來的內戰危險給鄭位三等的指示〉（1945/08/04），《中央文件 15》，頁 200。

放區為目標，向北發展。¹²⁶ 與此同時，冀熱遼邊區還發動「打偽滿軍戰役」。甫進駐冀東的偽滿軍雖然配備騎兵與裝甲車，但只會打正規運動戰，戰略呆板，缺乏實戰經驗，內部又多新兵，他們對擅長游擊戰的共軍，以及配合後者發動地道戰的民兵，束手無策。迄該年5月止，滿洲國試圖在冀東複製口外集家併村無人區的計劃，由於共軍與民兵的反抗與破壞，終告失敗。可是，共軍方面在反偽滿軍的過程中，也由於主力軍與地方軍未能密切配合，以至主力軍屢屢「裸體跳舞」，透露了中共迄此還未能充分地動員地方群眾的現實。¹²⁷

8月8日，蘇聯正式對日宣戰。隔日，蘇聯紅軍約150餘萬人，從東、西、北三個方向進入中國東北、熱河及察哈爾地區。同日，毛澤東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後一戰〉，指示所有共黨領導下的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猛烈地擴大解放區」。8月10日與11日，朱德也自延安總部先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中第二號即指示舊東北軍出身的呂正操、張學思、萬毅部，及現駐冀熱遼邊區的李運昌部，即日分別向東北、熱河、察哈爾三個地區進發。¹²⁸ 但此一命令實際上主要是為「對外宣傳，以搶先取得國內外公開地位而發」，並不是真的要呂、張、萬三部馬上開往東北地區。所以，最初開往東北的主力，係李運昌率領的冀東軍隊。¹²⁹

當時中共急切地想配合蘇軍入境之際，在後者的幫助下，占領過

126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149-150、152-153。

127 〈冀熱遼軍區司令部反偽滿軍戰役總結〉（1945/05），《冀東武裝鬥爭》，頁328-335。

128 〈延安總部命令第二號〉（1945/08/11），《中央文件15》，頁219。

129 〈中共中央關於延安總部第二號命令的補充電報〉（1945/08/11），《熱河解放區（上）》，頁18。

去淪陷區的大城市與交通要道。¹³⁰事實上他們也達成了目的。以李運昌為書記的冀熱遼區黨委東進工作委員會和軍區前方指揮部，領導先遣部隊分三路進入東北與熱河地區。其中由曾克林率領的東路自8月中旬從冀東地區出發後，配合蘇聯紅軍打下山海關、錦州等重要據點，並於9月6日進入遼陽縣城，曾克林還被蘇聯紅軍委為瀋陽衛戍司令。曾部在蘇聯的協助下，收編偽保安隊，短短不到一個月內，部隊從出發時的1,500人擴充至2萬餘人，數量增加十倍有奇。¹³¹至於經熱河向東北進發的西路與中路軍，也同樣在蘇聯紅軍的協助下有了驚人的戰績，其中如承德就是由蘇聯紅軍占領交給八路軍，並不是中共靠自己的力量佔領者。當時負責接收承德的冀熱遼區黨委熱河分委（11月改組為熱河省委）書記胡錫奎就承認，中共在熱河兵力單薄、幹部缺乏，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工作基礎。¹³²他們如何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佔領熱河？

在平北，中共也於8月底接收了張家口，並旋即將晉察冀邊區最高的黨政軍領導機構遷入張垣，還立即派詹大南等部到張北與蘇聯紅軍聯絡。隨後，中共宣稱為反抗國軍傅作義部自綏遠方面向張家口的侵犯，發起綏遠戰役。但此一舉措恐怕也是蘇聯紅軍由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8月14日簽定），必須退出熱、察、綏地區，通知中共火速派兵前往接收所致。¹³³無論如何，綏遠戰役沒有成功，聶榮臻

130 〈中央關於蘇聯參戰後準備進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08/10），《中央文件15》，頁215。

131 〈中共中央關於東北情況的通報〉（1945/09/16），《冀東武裝鬥爭》，頁349。

132 〈胡錫奎、趙毅敏關於熱河情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45/10/22），《熱河解放區》，頁24。

133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頁533。

的回憶錄也事後諸葛地判斷，以當時中共的力量，事實上不可能奪取綏遠全省。¹³⁴

蘇聯紅軍由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得不撤兵。中共也了解此一點，他們必須在蘇聯紅軍撤退後，國軍進入前，搶占紅軍曾占領的地區，主要就是東北三省與熱河、察哈爾兩省。¹³⁵9月中旬，中共中央指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戰略，目的係爭奪東北，完全控制熱、察兩省。¹³⁶具體的作法是公開地南面撤兵，秘密地北面進兵，¹³⁷從冀東、山東等地，抽調大批的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東北與熱、察兩省，同時佈署重兵在冀魯豫邊區周圍，阻礙沿平漢路等交通要道北上的國軍。¹³⁸

中共為配合蘇聯紅軍，急促地占領大城市，這在戰略上是很大的轉變，意味著中共將脫離他們熟悉的分散游擊戰術，改採集中行動的正規戰。¹³⁹1945年9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積極擴兵，成立能夠「調離本地區行動」，直接受中央指揮的主力軍團。¹⁴⁰其中於10月成立，由林彪擔任總司令的東北人民自治軍，統轄包括東北、熱河、冀

134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615。

135 〈中央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08/29），《中央文件15》，頁257-258。

136 〈中央關於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致中共赴渝談判代表團電〉（1945/09/17），《中央文件15》，頁278-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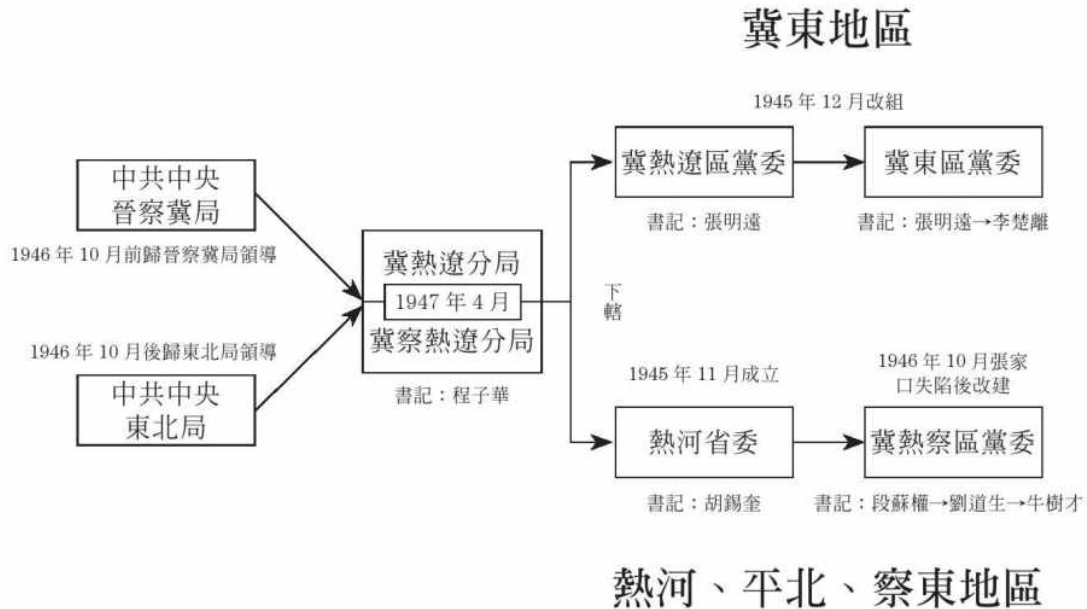
137 〈中央關於撤退江南部隊向北進軍問題給華中局的指示〉（1945/09/20），《中央文件15》，頁287。

138 〈軍委關於阻止國民黨軍北進掩護我向東北進軍給劉伯承、鄧小平等的指示〉（1945/10/06），《中央文件15》，頁317。

139 〈中央關於日本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1945/08/11），《中央文件15》，頁228。

140 〈中央書記處關於擴兵與編組野戰軍的指示〉（1945/09/21），《中央文件15》，頁288-289。

表 6-2 國共內戰時期冀察熱遼邊區黨組織系統圖



東等地區的軍隊，係第四野戰軍的前身。¹⁴¹ 野戰軍的任務，即阻止即將來到的國軍之入侵，有計劃地予以殲滅。殲滅地愈多，愈乾淨，愈徹底愈好。¹⁴²

但是，中共本身並不具備發動正規戰的條件。沒有蘇聯紅軍的支持，共軍實際上無能奪取與維持城市。在冀東，自8月中旬起，詹才芳（冀熱遼軍區副司令員兼冀東軍區副司令員）、¹⁴³ 李中權（冀熱遼

141 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頁 46-47。

142 〈中央關於過渡時期的形勢和任務的指示〉（1945/10/20），《中央文件 15》，頁 370。

143 詹才芳，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27年入團，1928年入黨，後參加紅軍，是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出身的幹部。抗戰時期在晉察冀邊區工作，抗戰結束後被派赴冀熱遼邊區擔任軍事領導。中共建國後曾先後在湖南、中南與廣東軍區擔任軍事領導工作。1992年病逝。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頁 891。

軍區政治部主任兼冀東軍區政治部主任) 領導部分主力擬攻佔唐山。但由於國民黨政權與唐山日方當局接洽，日方答應協助暫時維持地方秩序，包括滿洲國軍隊在內的地方偽軍也被改編成國軍，暫留地方工作，八路軍攻佔唐山的企圖因此踢到了鐵板。隨後，在晉察冀中央分局「盡量廣佔農村，奪取小城市，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的指示下，冀熱遼區黨委決定放棄攻奪唐山的計劃，將部隊轉向進攻周圍的小城市，並佔領了玉田、薊縣、三河等縣城。¹⁴⁴ 這些小縣城的攻佔，雖然不是先由蘇聯紅軍佔領並交給中共的，但中共主要也是依賴八路軍主力，而不是群眾的力量去攻佔這些縣城。甚至當時八路軍還因為地方民兵和群眾的紀律不好，不准他們進城（如攻占開平之際），使這些攻城的舉動流為「單純的軍事行動」。¹⁴⁵

1945年10月，國軍十三軍與五十二軍等部，在美軍的幫助下，開始登陸秦皇島。中共不願放棄到口肥肉，指示東北局集中力量堅拒國軍登陸，並予殲滅。¹⁴⁶ 但是，中共中央也很清楚，「如無蘇軍協助則不能成功」。¹⁴⁷ 可是當時蘇聯因為外交的局限，也不敢明目張膽地過問「中國人自己事」，不得不讓國軍登陸，中共只好調集大軍靠自己的力量抵拒國軍登陸。¹⁴⁸ 當時共軍在冀熱邊一帶的部隊，只有戰鬥力薄弱的李運昌「冀東縱隊」，以及駐在承德的黃永勝等部，後者將由10月成立的冀熱遼分局書記程子華指揮，編成熱河野戰軍，在

144 《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頁160-161。

145 張明遠，〈目前形勢與任務〉（1945/09），《冀東武裝鬥爭》，頁351。

146 〈中央關於集中主力拒止蔣軍登陸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10/19），《中央文件15》，頁364。

147 〈中央關於全力控制東北拒止蔣軍登陸著陸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10/28），《中央文件15》，頁388。

148 〈中央關於增調兵力控制東北的指示〉（1945/11/04），《中央文件15》，頁401。

古北口抗擊國軍。另外，自平北出發，由蕭克為司令、羅瑞卿為政委的「晉察冀第二野戰軍」，將擔任側擊國軍之任務。¹⁴⁹ 中共希望這些隊伍至少能撐上半個月，等待來自山東的新四軍黃克誠等援軍。¹⁵⁰ 然而，等不到援軍到來，山海關已在 11 月中旬失守。

中共素來擅長游擊戰，他們當時根本沒有能力跟國軍打正規戰。根據李運昌的報告，攻守山海關的國軍與共軍分別是 4 萬與 1 萬人，¹⁵¹ 相差懸殊。即使中共調派大軍來援，但這些「主力初到，甚為疲勞，不能進行決戰」。¹⁵² 共軍的後方熱河等地，由於日偽初降，蘇軍甫退，中共也才剛占領不久，故地方混亂，土匪蜂起，人民心存觀望，還有長久歷史的蒙族、回族與漢族間的衝突。¹⁵³ 更不用說中共不顧質量迅速吸收的軍隊與黨員，素質不佳，經常做出令人痛心的欺壓老百姓的劣行。¹⁵⁴

1945 年 12 月起，國軍開始對熱河發起攻勢。勢力微薄的共軍由於國軍的多線進攻，被迫分散兵力。如冀東共軍的主力被用於圍攻遵化縣城，¹⁵⁵ 而蕭克、羅瑞卿的第二野戰軍則堅守在西線一帶，以至

149 〈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編組熱河、冀東野戰軍給彭真、程子華電〉（1945/10/25），《熱河解放區》，頁 29。

150 〈中央關於發動群眾創造戰場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11/10），《中央文件 15》，頁 419。

151 〈李運昌、沙克關於山海關敵我兵力情況及作戰意見向中共中央的報告〉（1945/11/09），《冀東武裝鬥爭》，頁 382。

152 〈中共中央關於熱河極為重要所去幹部留熱工作的指示〉（1945/11/27），《熱河解放區》，頁 47。

153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中共熱河省委關於熱河形勢與軍事方針的指示〉，《熱河解放區》，頁 44-46。

154 〈冀東軍區政治部給全軍領導幹部的一封信〉（1946/02/09），《冀東武裝鬥爭》，頁 394-395。

155 〈冀熱遼軍區關於熱河形勢與部署報中央軍委、中央局〉（1945/12/15），《熱河解放

東線一帶相當空虛。¹⁵⁶ 後來國軍也是從東線一帶進行突破，從錦州發動進攻，沿錦承線向西推進，並於 12 月 28 日攻占了義縣。¹⁵⁷ 同時，又有一支國軍部隊在 1946 年初開始向凌源、平泉一帶進攻，中共大為震驚，蓋平、凌兩縣一失，承德的失陷便指日可待。因此，中共中央乃下令前方部隊死守平、凌、承三縣，「不得退讓」。¹⁵⁸ 然而，由於當時負責領導熱東地區戰事的東北局本身並不重視熱東地區的保衛，¹⁵⁹ 北票、朝陽兩縣終於由於守軍李運昌的無力抵抗而失守，¹⁶⁰ 平泉也隨後失陷，¹⁶¹ 承德城已可說是國軍的囊中物了。

當此千鈞一髮之際，由於美國和蘇聯的介入調停，國共雙方被迫停止軍事行動。蔣介石下令自 1946 年 1 月 13 日 24 時起全面停止軍事行動，¹⁶² 中共方面也自同一時間開始停止攻城行動，但鄉村中的軍事行動則是根據中共中央「鄉村中可稍有出入」的電示，直迄隔日 7 時才停止。¹⁶³ 隨後，衝突雖未完全停止，但至少有所緩和，第一

區》，頁 52。

156 〈中共中央關於部署消滅由錦州進攻熱河之頑軍給林彪的指示〉（1945/12/17），《熱河解放區》，頁 53。

157 〈冀熱遼軍區關於迎戰東線之敵的軍事部署〉（1945/12/31），《熱河解放區》，頁 56。

158 〈中共中央關於死守平泉、凌源、承德的指示〉（1946/01/04），《熱河解放區》，頁 61。

159 李運昌，〈一年來戰役戰鬥總結〉（1947/02/25），《熱河解放區》，頁 254-255。

160 〈程子華、蕭克、羅瑞卿關於請組織一有力行動配合熱河作戰致林彪、李富春電〉（1946/01/06），《熱河解放區》，頁 65。

161 〈蕭克、李運昌關於平泉被敵侵占致程子華電〉（1946/01/14），《熱河解放區》，頁 75。

162 〈蕭克、李運昌關於停戰命令發表須堅守陣地的指示〉（1946/01/12），《熱河解放區》，頁 71。

163 〈蕭克、李運昌關於二十四時停止攻城的指示〉（1946/01/13），《熱河解放區》，頁 74。

階段的國共內戰戰事至此可算告一段落。

二、從清算復仇到土地改革

共軍的節節敗退，使得中共領導也開始深思，是否應該放棄大城市與正規戰的戰略，再退回農村，重拾他們擅長的群眾動員策略。當山海關失陷，中共中央覺悟到蘇軍必將撤退，共軍決難堅守大城市，乃指示東北局撤出大城市，加強熱河、冀東等地工作，「作長久打算」，即發動群眾控訴漢奸及減租運動，以爭取廣大農村及中小城市，待他日再收復大城市。¹⁶⁴

事實上，如前節所述，中共自抗戰後期以來，一直持續推動愈益激化的減租運動，乃至於用算帳的辦法變相地沒收土地。但此一情形主要限於中共勢力較穩固地區。在抗戰結束後，中共占領許多新地區，他們不可能立刻在這些地區推動激進的減租運動，只能選擇為多數群眾痛恨的首要份子，主要是敵偽殘餘份子和漢奸特務，發動群眾予以鬥爭。但這並不意味著去階級化，對中共來說，這些漢奸本身就是階級異己份子，冀熱遼分局便明白地指示，「控訴復仇」（或「清算復仇」）運動，「是最初發動群眾必須經過的階段，這一鬥爭，以民族的形式出現，實質包含著階級鬥爭」。¹⁶⁵

控訴復仇必然發展成階級鬥爭。1945年10月下旬，冀熱遼區黨委規定，幹部應該發動「基本群眾」（農民不包括富農，小資產階級包括中農與教員）的鬥爭，並在此基礎上，鞏固統一戰線（也就是一

164 〈中央關於東北撤出大城市後的中心任務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11/20），《中央文件15》，頁433-436。

165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中共熱河省委關於熱河發動群眾的指示〉（1945/11/25），《熱河解放區》，頁41。

打一拉)。統戰的對象係抗日、不反共也不反對民主改革的中間勢力(當時中共自詡為民主勢力，批評國民黨是反民主的獨裁政權)，打擊的對象則是抗日但反共又反民主的「頑固力量」，以及親日反共與反民主的「親日力量」，也就是漢奸。¹⁶⁶此一反頑、反漢奸，反貪污惡霸的鬥爭，¹⁶⁷因為是「統一戰線的」，很容易就擴大開來，並且可以也應該很快地轉變成贖地、清債和減租、減息的鬥爭。¹⁶⁸

但是，控訴復仇並未如預期般適時地轉變成階級鬥爭，一個原因就是中共一直不甘心放棄城市，¹⁶⁹轉入農村，所以仍堅持更廣泛的統一戰線，以期逆轉戰局。1946年1月，國軍已湧入熱河，中共中央乃指示程子華等迅速組織承德、赤峰二市的物資向安全的鄉村地區撤退。¹⁷⁰但是，張家口與承德等大城市，提供共軍許多物資，係中共得以站住熱河、冀東的關鍵，所以事實上冀熱遼共軍仍未準備退出城市。¹⁷¹儘管後來由於外交上的因素，以及本身實力不足的考量，中共中央再於4月指示林彪「不以固守城市為主」，趕緊普遍地實行

166 〈中共冀熱遼區黨委關於發動群眾的決定〉(1945/10/22)，《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77-80。

167 反貪污鬥爭也是為爭取群眾的多數，而與清算復仇的鬥爭同時展開。見〈晉綏分局關於新收復區工作經驗的報告〉(1945/10/30)，《中央文件15》，頁409。

168 〈晉冀魯豫局關於進一步發動群眾工作的指示〉(1946/03/24)，《中央文件16》，頁121。

169 如前所述，在山海關失陷後，中共已覺悟到沒有蘇軍的支持，他們不能防守城市。但是，已承諾退兵的蘇聯，因為不滿意國民黨政權向美國一邊倒，亦暗中鼓舞與支持中共，這是中共一直未完全放棄城市的原因之一。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頁501-505。

170 〈中央關於堅持熱河陣地以配合重慶談判給程子華等的指示〉(1946/01/02)，《中央文件16》，頁5。

171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關於軍事、財政等工作向毛主席、中央及中央局的報告〉(1946/04/25)，《熱河解放區》，頁114。

減租減息，發動群眾，鞏固後方。¹⁷² 但東北局有些幹部非常不諒解為何共軍主動讓出大城市給國軍。¹⁷³ 事實上中共中央本身也猶豫不決，並在隨後又指示林彪保衛長春等城市，「注意堅持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只得罪少數人」，就是只打擊漢奸、惡霸等，不要牽連太廣。¹⁷⁴ 這也就是當時各地仍一直停留在控訴復仇階段的緣故。

我們說鬥爭僅止於控訴復仇階段，並不意味著這場運動不激烈。如在平北的懷來各地，運動搞得轟轟烈烈，還有小女孩拿棒子打死「惡霸」。¹⁷⁵ 各個地區控訴復仇運動發動後，也一發不可收拾，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乃至於造成階級混亂的情形。在冀東，自前述冀熱遼區黨委 1945 年 10 月的指示以來，群眾鬥爭愈益擴大，到處出現「左」的現象，如鬥爭中農、富農，濫捕濫罰，群眾單純為經濟利益而鬥，缺乏政治覺悟，以至許多投機份子混入等等，¹⁷⁶ 在遵化甚至發生村與村的械鬥。¹⁷⁷ 在熱河，熱河省委雖然也在 1946 年初指示「發動群眾的重點主要是減租減息」，¹⁷⁸ 但事實上下面仍一直把重心

172 〈中央關於軍事鬥爭與群眾工作問題給東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04/12），《中央文件 16》，頁 118-119。

173 〈中央關於東北問題談判方針給東北局和中共赴渝談判代表團的指示〉（1946/03/13），《中央文件 16》，頁 89。

174 〈中央關於組織力量保衛長春給彭真、林彪的指示〉（1946/04/19），《中央文件 16》，頁 134-135。

175 〈關於發動群眾土地改革的檢討〉（1947/07/16），《冀熱察解放區》，頁 59。

176 〈中共冀東區黨委關於糾正群眾運動中過左行動的指示〉（1946/04/02）、〈中共冀東區黨委關於群眾運動問題初步檢討及執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初步意見〉（1946/05/30），《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85-87。

177 〈中共冀東區黨委根據十五分區發動群眾的經驗給各級黨委的信〉（1946/07/15），《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94。

178 〈中共熱河省委關於減租減息增資和生產的指示〉（1946/02/28），《熱河解放區》，頁 81。

放在「收集物資」等戰事準備上，¹⁷⁹ 群眾鬥爭在3月省委擴幹會以前也主要是強調清算漢奸，而且像冀東一樣，普遍出現村與村、幹部與農民，以及農民自身之間階級亂鬥的情形。¹⁸⁰

如熱河省委日後檢討，控訴復仇所以造成階級的混亂，主要就是因為幹部是「沒有階級內容地復一切的仇」。¹⁸¹ 如「黑地」問題，中共原初的設想是打擊霸占黑地的大地主，特別是那些與敵偽政權有關係者。但隱瞞黑地實際上在中國農村裡是普遍的現象，清查黑地難免波及各階層，以至冀東黨不得不禁止再清查黑地，以免過份打擊中農。¹⁸² 再者，所謂的漢奸，實際上也不只限於大地主，還包括農村各階層。所以名義上的清算漢奸，遲早也會擴大到其他階級頭上。如後來冀東區黨委就指出：「地主階級與漢奸敵偽爲了加強其統治，曾迫使或引誘過一部分農民爲其當過傀儡，執行過村正副、鄉保甲長的職務，或爲他們跑過腿，服過務，賺過他們薪水，受過他們的提拔，或在抗日時期被迫暴露革命秘密，有一些過失」。但是，這些過錯並不大，「並且大部分已成爲過去」，所以冀東區黨委爲避免擴大鬥爭面，嚴示各地應公開宣布針對這些份子的過錯，「一概不予追究」。¹⁸³

爲了避免階級混亂，無限擴大打擊面，中共必須明確其階級政

179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中共熱河省委關於熱河省委擴大會開會經過報中央、中央局〉(1946/04/26)，《熱河解放區》，頁118。

180 〈熱西彙報土地改革運動中反映的幾個問題〉(1946/07/01)，《熱河解放區》，頁156-157。

181 〈土地改革與群眾運動〉(1947/03)，《熱河解放區》，頁262。

182 〈閻達開在財經會議上關於放手發動群眾的報告〉(1946/03/18)，《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84。

183 〈中共冀東區黨委爲解決土地問題中幾個重要問題給遵化縣委的指示〉(1946/07/20)，《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101。

策。如冀東區黨委在 1946 年 4 月 2 日即發布指示，指摘群眾濫鬥的過「左」行動。¹⁸⁴ 熱河省委書記胡錫奎也在 1946 年 3 月省委擴幹會上說，雖然一開始從清算復仇出發是對的，但必須儘快把運動轉向減租運動，這主要就是害怕清算復仇如拖得太長，會失去階級焦點。¹⁸⁵ 胡指出現下主要的打擊對象是大地主，因為這些人堅決地反對共產黨。當八路軍於抗戰結束進入熱河之際，他們竟然拉攏蘇聯紅軍，企圖反抗中共接收。待中共建立政權後，他們又表面討好，事實上則是敷衍與破壞，還勾結成立土匪，擾亂後方。胡錫奎說，這些大地主是熱河唯一渴望國軍來到的階級，中小地主、富農與中農等同樣是受害者，所以應該把鬥爭焦點集中在大地主身上。¹⁸⁶

超階級亂鬥所以不理想，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太過激烈，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失卻了階級內容。像是村與村之間的械鬥，其所反映的是既存的超階級的關係。這種鬥爭既不能啓發群眾的階級覺悟，達成中共所期望階級分化的目的，甚至可能為反革命者利用，阻礙了共產黨的動員與統治。

我們應該從這一視角來理解五四指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 年 5 月 4 日）。此一指示向來被學者視為中共發動土地改革的開端，但實際上，如前所述，中共自抗戰後期以來，即透過減租等手

184 〈中共冀東區黨委關於糾正群眾運動中過「左」行動的指示〉（1946/04/02），《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85-86。

185 這也是當時各地普遍的政策。如晉冀魯豫局就嚴示地方幹部：「漢奸鬥完了，惡霸鬥完了，要不轉彎老是拖下去，一定會鬥到基本群眾身上來，那就很不好。」所以清算復仇鬥爭不要「拉得過長」，要儘速轉變到減租減息鬥爭。〈晉冀魯豫局關於進一步發動群眾工作的指示〉（1946/03/24），《中央文件 16》，頁 122。

186 〈胡錫奎在熱河省委擴幹會上的總結報告〉（1946/04/01），《熱河解放區》，頁 93-94。

段，沒收地主土地，此一指示事實上只是承認了此一既存事實，要求幹部與群眾繼續透過算帳等辦法，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所以不是無條件地直接沒收），實現耕者有其田。因此五四指示將自身定位為1942年以來減租政策的延伸，規定目前的土地政策並非意味全部廢棄減租政策。指示規定，幹部要積極爭取中農的參與，不要過份打擊富農與中小地主，以爭取建立90%以上農村人口支持的反封建統一戰線。¹⁸⁷ 放在當時的背景，我們認為，五四指示反映了當時中共避免被孤立的策略意圖，所以它有意緩和前一階段過「左」的鬥爭；在另一方面，五四指示則是把農村裡超階級亂鬥的現象，導入中共所規定的階級框架當中，深化了中共期望的階級鬥爭。

冀東區黨委在五四指示後即規定，對地主採取「安定政策」的方針，即先威後恩，恩威並施，先發動群眾予以打擊，但又要避免他們狗急跳牆，逃往敵占區，所以在地主交出土地後，應施以安定政策，即使對那些狡猾甚或反動者亦是如此。再者，關於黑地問題，冀東區黨委也規定「地主黑地沒收，農民黑地歸農」，避免造成階級混亂。甚至區黨委還指示雇農停止鬥爭富農或經營地主等等。¹⁸⁸ 這些政策既緩和了鬥爭，但又同時深化了共黨的階級政策。其對地主恩威並施的態度，也反映了長期以來中共一打一拉的政策。

時任冀東區黨委書記張明遠也回憶，五四指示後鬥爭確實有稍緩的現象。他指出，在1946年初，冀東各地出現過「左」現象，有群

187 劉少奇，〈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05/04），河北省檔案館，《河北省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以下簡稱爲《河北土改檔案》），頁1-6。

188 〈中共冀東區黨委爲解決土地問題中幾個重要問題給遵化縣委的指示〉（1946/07/20），《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102-105。

眾組成「吃喝拉大隊」，成群地到各村殺豬宰羊，大吃大喝。隨後，區黨委才發布前述4月2日的糾正過「左」行動的指示。五四指示則更進一步區別對待各階級，以縮小打擊面。由此見得，張明遠所謂五四指示後的土地政策是「健康的，正常的」，指的是農村裡的亂鬥，已逐漸地納入共黨規定的階級框架當中。¹⁸⁹

在熱河，五四指示發布後，中共也規定目前不要急於解決蒙古人地區的土地問題，¹⁹⁰這主要是反映避免被孤立的策略考量。但這樣的策略考量沒有否定階級鬥爭。在主要是漢人居住的地區，熱河黨一方面試圖糾正超階級混亂的現象，如規定關於黑地與高利貸等可能引起階級混亂的問題，放到最後再解決。¹⁹¹但是熱河黨又同時採取「適當分散土地」的政策，動員群眾「找岔子」，藉口清算過去過高的租息，以及大地主霸占的掛地等，¹⁹²轉移土地。其具體過程，是由群眾在找岔子前，先算好地主的家產，然後通過算帳，「算到他拿不起的程度」，強迫地主交出土地。當然，最後還是要給他留下夠吃夠喝的，表示群眾的寬大，這就是恩威並施，一打一拉。有的地主不買帳，幹部動員也不聽，說理也不給，惹得農民生氣，索性把地主的兒子也弄了來，父子倆被迫住在農民家裡直到算帳結束。地主受不了，

189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256-257。

190 〈中央關於解決東北、熱河等地的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05/06)，《中央文件16》，頁155。

191 〈中央轉發冀熱遼分局關於熱河農民運動情況的報告〉(1946/06/19)，《中央文件16》，頁201。

192 據中共宣稱，熱河與冀東的大地主，在民初旗地變民之際，利用其關係與狡猾，勾通官府，欺騙農民，占有大片土地，此即掛地。清算掛地也成為中共沒收地主土地的藉口之一。〈胡錫奎在熱河省委擴幹會上的總結報告〉(1946/04/01)，《熱河解放區》，頁87-88。

又心疼他的兒子，最後只好應了農民的要求，交出土地。¹⁹³此一過程加深了農村裡的階級對立，無庸置疑。

所以我們認為，五四指示後的土地政策，是要造成一個按照黨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進行的群眾運動。其中固然要「安定」地富階級，但這主要是出於戰略與策略的暫時考量，並沒有否認階級鬥爭，也還是依循一打一拉的路線。¹⁹⁴

只不過，土地政策的緩和，姑且不論有否為中共贏得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卻沒有換來戰事上相應的勝利。事實上，在五四指示發布的同月，林彪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就因為無法堅守，撤出長春、四平。至此，中共在東北與全國的戰略亦隨之轉變。在東北，中共已決意退出城市，並放棄正規戰，而改採運動戰與游擊戰的戰略。¹⁹⁵ 中共全國的戰略，也由「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整個顛倒過

193 〈熱西彙報土地改革運動中反映的幾個問題〉（1946/07/01），《熱河解放區》，頁160、164。

194 我們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中共土地政策上的緩和，是出於暫時的政策上之考量。例如，中共中央當時就指示各地暫不宣傳土地改革，也不要宣傳改變1942年的減租政策，「以免過早刺激反動派的警惕性」，也方便「繼續麻痺反動派一個時期」。〈中央關於目前解放區土地改革宣傳方針的指示〉（1946/05/13），《中央文件16》，頁159。

另外，中共還考慮用「征購」的辦法，收購地主土地，其目的是欲宣傳中共只是要實踐孫中山「照價收買」的理想，藉此減少民族資產階級和中間人士的懷疑。〈中央關於要求各地答覆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指示〉（1946/07/19）、〈中央關於向民盟人士說明我黨土地政策向周恩來、董必武的指示〉（1946/07/19），《中央文件16》，頁252-253、257。後來熱河省委確實也曾試圖用收購的辦法，以「爭取和平民主的統一戰線」。〈中共熱河省委關於土地改革運動的第三次報告〉（1946/08/06），《熱河解放區》，頁175。

195 〈中央關於同意放棄哈爾濱採取運動戰、游擊戰方針給東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06/03），《中央文件16》，頁185。林彪領導的東北局也在7月召開擴大會議，接受由正規戰轉向運動戰與游擊戰的戰略轉變。

來，決意派劉伯承等領軍插入國軍後方（即中原地區），使集中注意力在向北發展的國軍處於被動；¹⁹⁶ 至於原來的東北、冀、熱、察等地，則改採防禦策略，拖住國軍。

此一戰略上的轉變，事實上正反映了共軍在北方戰事的慘敗，他們並非是主動地、靈活地改變此一戰略方向。1946年8月，熱河承德、興隆、灤平相繼失守，赤峰以及察哈爾的張家口（即晉察冀邊區的首府）也在10月淪陷，中共熱河省委與冀熱遼分局被迫遷往熱北的林西。冀東也如中共預期般，因為承德失守，孤懸於外，「處於不能想像之情況」。¹⁹⁷ 中共中央乃立即致電冀東守軍詹才芳，要他改採「圍城打援」之戰略，即軍隊撤到城外，不以攻城為目的，專打援軍，以消滅國軍的有生力量，困守城內守軍。¹⁹⁸

當共軍節節敗退之際，如李運昌所報告般，內部混亂，幹部失去信心，不敢工作，連群眾都有變天思想。¹⁹⁹ 更糟的是，由於地主配合國軍大反攻，竟然有黨員（熱河）說：「地主本來能和我們合作，就是因為我實行土地改革逼反了。」²⁰⁰ 12月，當冀熱遼分局退到林西後，即發出指示，糾正「左」的錯誤，批評幹部沒有照顧地主生活

196 〈中央關於全面破裂後作戰方案給劉伯承等的指示〉(1946/06/22)，《中央文件 16》，頁 210-211。

197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對備戰工作和軍事部署的意見報中央、中央局〉(1946/06/20)，《熱河解放區》，頁 142。

198 〈軍委關於冀東作戰應取圍城打援方法給詹才芳等的指示〉(1946/10/24)，《中央文件 16》，頁 319。

199 〈李運昌等關於熱河失利原因向中共中央、中央局的報告〉(1946/09/06)，《熱河解放區》，頁 186-187。

200 〈中共熱河省委關於檢查與深入熱河土地改革問題〉(1946/12/12)，《熱河解放區》，頁 220-221。

出路，致可以爭取的地主堅決與「我」對立。²⁰¹冀東區黨委書記李楚離也因為地主大反攻，主張在接下來領導群眾做新的鬥爭時，「必要時領導群眾對地主讓步」。²⁰²冀熱遼分局與李楚離等人的態度，讓人不由得不想起 1941-1942 年，冀東遭到日軍大掃蕩時，也有許多幹部批評過去對上層份子的政策不適當，主張應緩和政策，以便爭取上層份子的支持。然而，也像那時候一樣，當時中共上層領導並不贊同此一退讓的作法，反而堅持更深入的階級鬥爭，與內部的整黨。

三、共軍反攻與土改覆查

群眾的「變天」思想，以及幹部在國軍當前下的混亂狀態，對於正在延安領導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一些中共領導來說，正足以說明土地改革還不夠深入，所以群眾與幹部還不能站穩階級與政治立場。當時正在隴東、晉綏推動土改的康生給了劉報告，指出土改中發生許多問題，特別是幹部與機關占有土地，致土改未能徹底，劉批准了康生的報告。1946 年年底劉在致林伯渠的信中也指出，土地只分一次不夠，要再多分配幾次，徹底平均的分配，不要怕農民的平均主義。²⁰³劉的想法，揭示了 1947 年土改覆查與整黨的序曲。

1947 年 1 月，劉少奇致電各解放區領導，就黨內外部分人士多占土改果實，導致分配不公的「富農路線」之情形，以及是否需要再平均分配土地的問題，徵詢各領導的意見。各解放區領導意見為何，不

201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關於熱河土地改革問題向中央與中央局的報告〉(1946/12)，《熱河解放區》，頁 245。

202 〈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及土地改革初步總結〉(1946/11/19)，《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116。

2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頁 57、59。

得而知，但劉顯然認為問題嚴重，故旋即為中共中央起草代電，決定於該年5月4日召開土地會議，並立即發電東北局，指示後者注意分配問題，「在分配不公，群眾不滿的地區，可以重新分配」。²⁰⁴

東北局接受了劉少奇的看法，並立即發文包括冀熱遼分局在內的所屬下級機關，警示各地還存在許多事實上沒有貫徹土改的「夾生飯」地區。²⁰⁵冀熱遼分局收到東北局的批評後，承認很多地區還是「夾生飯」。但在追溯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時，冀熱遼分局則歸咎於方法上的問題，說過去強調發展，「到處點火」，難免粗枝大葉，今後為補正此一缺點，必須「微風細雨，點點下地」。分局也承認，現在與抗戰時期的減租政策不同，後者只是要削弱封建（七分資本，三分封建），但現在要完全消滅封建。鑒於前一年五四指示還是自身定位為減租政策的延續，我們可以看出冀熱遼分局此時的土地政策有進一步激化的現象。但是，具體上冀熱遼分局還是把鬥爭矛頭指向大地主與漢奸豪紳，其他如中小地主、開明士紳、經營地主與富農等，雖然也要分配其土地，但不是採取鬥爭的辦法，而是訴助和平的仲裁。不過，從分局嚴禁幹部「矮子林中找高林」（即鬥爭那些稍稍較貧農富裕的中農）的指示來看，當時下層的土改事實上已走上劉少奇所主張的激烈的「平均主義」道路，而冀熱遼分局立場上仍相對緩和。²⁰⁶

2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頁62-64。

205 〈關於土地問題〉（1947/05/07），《熱河解放區》，頁356。

206 〈土地改革與群眾運動〉（1947/03），《熱河解放區》，頁266、269、278。雖然從中共中央到各級領導，表面上仍一直表示對富農不要打擊過重，以及不要侵犯中農利益，但實際的鬥爭中，卻很難不波及這「中間階級」。在1947年初的察南、平北等地區，「割封建尾巴是普遍的」，農村裡的富農全被鬥了。在涇水等地，連中農的土地都被拿來分配。時任察哈爾省委副書記的劉杰顯然已接受劉少奇的看法，他認為打擊富農過重或侵犯中農利益等不是主要問題，關鍵在於幹部分配果

1947年3月，延安被占領。同月，中共中央決定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赴晉綏、晉察冀邊區等地工作。途中，劉對晉綏邊區發出極其激進的指示，要求該邊區徹底地放手發動群眾，解決土地問題，乃至於鬥爭幹部，要各級幹部接受群眾的考察與鑒定，並給予群眾批評與撤換幹部的自由與權利。同時，劉還指示不侵犯中農利益與不能徹底消滅富農經濟等，雖是中共堅持的政策，但如果群眾再三要求，就讓他們辦。「讓群眾犯個錯誤，有了教訓，會改正，以後會相信我們」。²⁰⁷此一說法，無異間接地允許鬥爭中農與富農，乃至於無限制地整肅幹部。

陳永發已證明，中共當時深入土改是爲了動員農村資源，維持戰事。²⁰⁸劉少奇當時急促地鼓勵無限制地動員群眾，亦是出於同樣動機。1947年4月底劉與朱德抵達晉察冀中央分局，旋即指出：「以覆查爲中心，動員黨政軍民的力量搞個徹底。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明確地指出土改覆查就是爲了方便動員人力、物力。事實上，劉少奇與朱德所以來到晉察冀邊區指揮工作，一個原因就是當時晉察冀邊區在軍事上沒有獲得中央預期的成果，而劉、朱也理所當然地把其原因歸咎於該邊區土改的不徹底，沒有放手

實不公。他還說，雖然還要照顧和拉地主，但這件事等農民取得土地後再說，不要一開始就說，以免束縛群眾。最後，他借用一個群眾的說法，點明了土改覆查的意義，即「土地改革要改三回」，被鬥過的地主如生活變好要再「改」，連一般農民生活變好了也要改。〈劉杰同志關於察哈爾省土地改革的彙報〉（1947/01），《河北土改檔案》，頁142-153。劉杰係河南威縣人，1932年入黨，抗戰時期在平西、北岳區工作，中共建國後曾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2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頁74-76。

208 陳永發，〈內戰、毛澤東和土地革命：錯誤判斷還是政治謀略？〉，《大陸雜誌》，卷95期1-3（臺北，1996年1-5月）。

發動群眾。²⁰⁹

究竟當時中共中央期待晉察冀邊區獲致的軍事成果是什麼呢？文獻裡沒有明確指出，但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來，這個時候，晉察冀邊區，以及過去屬於該邊區但此時已劃歸東北局統轄的冀東、熱河、察哈爾等地，已轉入共軍反攻階段。共軍為殲滅國軍，必須集結成大規模的野戰軍才有可能。劉少奇的到來，就是為加緊動員地方資源，並予以統籌領導（劉的一項任務是召集華北財經會議，該會議的目的就是統籌領導華北各邊區的資源），以準備發動大規模的運動戰，殲滅國軍。

如前所述，1946年下半年，共軍因難以抵抗國軍勢如破竹的攻勢，紛紛退出大城市，轉入農村，改採游擊戰的戰略圍困國軍。當時冀熱遼分局書記程子華即預期，國軍因深入解放區，戰線拉長，補給不易，兼之兵力不足，難以面面俱到，反而增加自身的困難。所以，程當即指示共軍著力於消滅國軍突出的隊伍、其後方的補給線，以及與國軍合作的地主土匪武裝。²¹⁰此一圍點打援的戰略果然奏效，據冀東共軍在1946年底的報告，國軍於冀東通縣到薊縣之間，共有19個據點，由於兵力分散的緣故，每個點只有不足兩營的「頑軍」，其中較小者甚至只有一個排。他們只能靠優勢火力，配合碉堡防禦，始能擊退共軍的進攻。²¹¹再如表6-3所示，自1946年6月至12月間，國軍在冀東地區所佔領的據點與修築的碉堡雖逐漸增加，兵力也有相當擴充，但實際上每個據點的平均守備人數卻大幅下降。這就意味

209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頁567、594-596。當時朱德也在晉察冀中央分局上指出土改的不徹底，造成該邊區動員困難。見同引書。

210 〈關於目前熱河形勢與任務〉（1946/11/21），《熱河解放區》，頁193、197。

211 〈通香武三通香兩次戰役總結〉（1946/12），《冀東武裝鬥爭》，頁469。

表 6-3 1946 年下半年冀東地區國軍占領勢力變化

| 項目 月份 | 點碉 | | | 兵力 | | | | 每點、碉 平均兵力 |
|-------------|-----|----|------|--------|--------|-------|--------|--------------|
| | 據點 | 碉堡 | 總點碉數 | 國軍 | 偽軍 | 伙會 | 總兵力 | |
| 1946 年 6 月 | 193 | 55 | 248 | 28,300 | 19,830 | 2,640 | 50,770 | 204 |
| 1946 年 12 月 | 231 | 83 | 314 | 32,500 | 11,800 | 8,960 | 53,260 | 170 |

資料來源：〈中共冀東區委國工部關於半年來國軍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的確定〉（1947/03/22），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冀東武裝鬥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 511-512。

著，國軍越是深入，其兵力就愈加分散，破綻也更加明顯。

國軍自身錯誤的政策，加速了它的失敗。他們與地方武裝團體合作，但又要這些團體打先鋒，想順便借共軍之力予以消滅。結果共軍果然從武力上重挫這些地方武裝，還發動土改挖掉他們的經濟基礎。而國軍對這些地方武裝「只有要而很少給」，以至後者無法維持，其中許多竟因此倒戈投靠共軍，使國軍更加孤立。²¹² 當時駐守冀熱邊區的國軍第十三軍軍長石覺便痛心指陳國軍地方基礎的薄弱：「地方政府缺乏戰鬥性格，未能組織掌握民眾，培植地方自衛武力，控制領域，紮根生存於民眾之中，致有軍隊之處方有行政，軍隊移動，行政立刻瓦解，徒使軍隊負擔行政掩護，而不獲行政助力」。²¹³ 如表 6-4 所示，1946 年底迄 1947 年初，香河、三河、平谷周圍地區的國軍與伙會的人數雖然增加了數倍，但由偽軍與伙會所鎮守的據點卻大為減少，而國軍所鎮守的據點雖未減少但也沒有增加，這正證明了國軍由於缺乏地方援助，以至只能居於守勢，難以擴張。

212 〈土地改革與群眾運動〉（1947/037），《熱河解放區》，頁 275。

213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 235。

表 6-4 冀東西部地區國軍、偽軍與地方伙會勢力之變遷
(1946 年 12 月與 1947 年 2 月)

| 類別 | | 日期 | |
|----|----|-------------|------------|
| | | 1946 年 12 月 | 1947 年 2 月 |
| 國軍 | 據點 | 25 個 | 25 個 |
| | 人數 | 502 人 | 5,526 人 |
| 偽軍 | 據點 | 23 個 | 6 個 |
| | 人數 | 3,175 人 | 1,070 人 |
| 伙會 | 據點 | 19 個 | 6 個 |
| | 人數 | 1,669 人 | 2,175 人 |

資料來源：〈冀東軍區第十四軍分區半年來反蠶食鬥爭報告〉(1947/02)，
《冀東武裝鬥爭》，頁 498。

1947 年 4 月初，中共成立冀察熱遼分局與軍區，歸東北局指揮，統轄冀東、熱河、察哈爾等地的工作。分局書記程子華在 4 月 2 日分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即指出，該邊區自承德失守以來，即採取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但目前戰局已逆轉，國軍想回到前一年 11 月敵進我退的局面，已永遠不可能。現在共軍已可以採取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戰略，積極殲滅國軍。因為運動戰必須依賴主力軍（即野戰軍），程也擔心現時主力軍兵源不足，尚不足擔負此一任務，所以他督促各地必須積極動員各種資源，一切為前線戰事服務。²¹⁴

冀察熱遼分局第一次黨代表會傳達的訊息，與前述劉少奇在 4 月底於晉察冀分局的講話，方向上是一致的，即動員所有資源以發動大規模的運動戰殲滅國軍。但前者的立場仍稍稍緩和。如分局宣傳部長

214 〈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1947/05/03)，《熱河解放區》，頁 295-316。

趙毅敏在代表會上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中，雖然承認爲了滿足基本群眾的要求，「對富農是可以清算其土地的」。但趙的報告，整體來看，主要傳達的是這樣的訊息，即國軍已是眾叛親離，兼之邊區目前主要的任務是「收復失地」，所以共方應想方設法拉攏包括地主在內的份子回到解放區，加速國軍的瓦解。²¹⁵ 整篇報告強調拉的一面大於打的一面。

但是，此一「偏向」很快就獲得糾正。在冀東，富農問題一直是個很大的爭議點，因爲冀東土地不如熱河集中，地主較少，「從消滅地主經濟的角度上看，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但因富農、中農較多，「所以在土地改革後，大量貧雇農仍感土地不足」。²¹⁶ 對此，冀東區黨委於 1947 年 4 月指示，對富農必須既聯合又鬥爭，以分化富農與地主的封建聯盟。所以，沒有封建剝削的富農，一般不動其土地；即使帶封建剝削的富農，清算他後，至少要讓他保留「富裕中農」等級的土地。²¹⁷ 此一政策反映了當時冀察熱遼分局的指示，即目前對地主與富農「應採取適當拉的政策，以緩和他們反對」，避免他們造謠。²¹⁸ 但是，劉少奇對如此強調拉的政策，非常不滿。他與朱德在 5 月即指示冀東黨，批評冀東地主還保留過多土地財富，富農的土地一般未動，劉要冀東學習太行山的經驗（該邊區只給地主、富農分別保留貧農與中農等級的生活）。²¹⁹ 尤有甚者，劉說過去中央曾要冀東

215 〈關於土地問題〉（1947/05/07），《熱河解放區》，頁 343-365。

216 〈關於土地問題〉（1947/05/07），《熱河解放區》，頁 346。

217 〈中共冀東區黨委關於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的總結〉（1947/04/09），《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147。

218 〈中共冀熱遼分局覆冀東關於土地改革中對富農及中農的政策問題〉（1947/04），《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156-157。

219 〈中共太行區黨委土地改革報告〉（1947/06/15），《河北土改檔案》，頁 204。

對地主採取拉的政策是過早的，他要冀東黨支持農民一切反地主、富農的行動。²²⁰

冀東黨根據劉少奇的糾正，旋即再發動更激烈的土改覆查。其具體辦法，首先是「翻縣、區幹部的心」。除幹部大會外，每天早晨還要幹部學習，自我批評，敘述自己的成份經歷，以及對貧農的態度。毫無意外，大部分幹部被批評階級覺悟不高。幹部翻心後，再領導農民分組翻心，每人都要翻心訴苦，連地主、富農也要翻心悔改。全村翻心過後，再逐人逐戶，自報土地財產。接下來就是運動的高潮，即階級鬥爭大會。農民在大會上訴苦控訴地主惡霸的罪行，而且通常在訴苦後把地主惡霸綑綁遊街，打得頭破血流，許多還被打死。最後才是清算財產，地主所有土地、房屋及一切財產（特別是地富為避免被沒收而埋藏起來的「底財」）全被沒收後——農民稱之為「搬家」、「抄家」，然後才由農民民主評議分給壞房、壞地。連富農也要獻出或被清算部分土地與財產，割去封建尾巴。²²¹ 根據張明遠的回憶，此一過程觸目驚心，在薊縣馬伸橋，1947年舊曆5月初7上午的鬥爭大會，半小時即打死48人。全冀東區在此一時期共殺死7,600餘人。²²²

在熱河，彭真於5月底來到林西，指示徹底的土改包括消滅富農

220 〈朱德、劉少奇關於徹底完成冀東土改的指示〉（1947/05/06），《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158。

221 〈中共冀東十四地委覆查土地報告〉（1947/06/22），《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160-162。

222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259。吳德當時的報告證明了張明遠的回憶，他指出「覆查時殺了7,000以上，薊縣馬伸橋一次大會就殺了45人之多，平分殺了約800多，興隆一個縣就殺了200多個」。不同的是，張明遠只把濫殺歸咎於左傾錯誤，吳德則進一步指出農民對地富的仇恨，與1946年9月以來國軍的反攻、地主的報復，不無關係。〈吳德關於冀東土改及整黨工作總結報告〉（1948/09），《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265-266。

的封建剝削在內，還說中農參加是好的，但不能把他們放在主要地位，因為他們反封建的鬥爭性要差些。他甚至露骨地說，現時中共政權雖然是三三制，但先把地主打倒在地，壓上一塊大石頭，等農民翻身後，再談三三制也不遲。²²³ 隨後，熱河的土改也發生激化的轉變。例如，過去中共因顧慮上層統戰而暫不處理的蒙民土地問題，現在也必須毫無例外地實行耕者有其田，²²⁴ 因為「今天主要的不在上層統戰路線，而在下層群眾路線，上層統一戰線要為發動群眾服務，不能因上層統一戰線，而束縛發動群眾」。²²⁵ 這就證明了中共的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是相輔相成的，對地主、富農如此，中農亦是如此。當時隸屬冀察熱遼分局的冀熱察區黨委書記劉道生就直率地批評，中農（許多幹部即中農出身）自私動搖，走富農路線，瞧不起貧雇農，所以「聯合中農不是遷就」，而是要把他們「放在貧雇農的領導下」。²²⁶ 劉道生是湖南茶陵人，1930年即入黨，算是個老革命，抗戰及內戰時在晉察冀與冀熱察邊區工作，他堅信「人類歷史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史，任何一件事，你不反對就是贊成，絕沒有中間路線與超階級的思想。」²²⁷

1947年9月，共軍剛在東北結束夏季攻勢，準備展開另一波秋季攻勢。冀察熱遼分局書記程子華也於該月從東北回來，傳達其上級

223 〈彭真關於熱河工作講話紀錄提要〉（1947/05/31），《熱河解放區》，頁389、392-393。

224 〈中共熱河省委關於土地問題指示熱北地委並告熱中、熱遼地委〉（1947/07/11），《熱河解放區》，頁405。

225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關於目前熱察蒙民工作的意見〉（1947/06/15），《熱河解放區》，頁399。

226 〈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總結報告〉（1947/07/27），《冀熱察解放區》，頁63-64。

227 〈關於發動群眾土地改革的檢討〉（1947/07/16），《冀熱察解放區》，頁58。劉道生在中共建國後曾赴蘇聯學習海軍，回國後一直擔任中共的海軍司令。

東北局關於「土改壓倒一切」的任務。隔月，高崗也來到熱河，親自領導土改工作。²²⁸ 曾任冀熱察區黨委書記的段蘇權在報告中透露了，當時東北局對熱河很不滿意，因為熱河黨竟有人認為不用解決土地問題，也可以擴兵。相反的，東北局像前述的劉少奇、朱德一樣，主張前方的勝利取決於後方送去多少人，而人力就是「從土改中來的」。據言，時任西滿分局書記的李富春就親自下鄉推動土改，還自豪地宣稱：「我自覺作個兵販子，不搞成強大野戰軍，有何辦法打敗蔣介石呢？」東北局比喻國共內戰，就像「螳螂螞蟻之鬥」，螞蟻能否勝螳螂，關鍵在於人力。²²⁹ 他們打算打海戰術。

當此之際，於 1947 年 7 月中旬開始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歷時兩個月以後，業已於 9 月中旬落幕，會中通過了〈土地法大綱〉。〈土地法大綱〉事實上只是承認劉少奇自 1946 年底以來即開始鼓勵的徹底平均主義的作法，並使長時期以來下層土改過程中鬥爭富農、中農的行為合法化。²³⁰ 11 月，冀察熱遼分局參加全國土地會議的代表胡錫奎歸來後，立即召開建昌會議，傳達土地會議指示。胡稱高崗在前一個月所謂地、富要加以區別的作法是錯的，應該「是對外宣傳，對內不區別」。會議上雖沒人主張侵犯中農，但也沒提團結中農。事實

228 〈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關於熱河省土改中的一些問題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工委、東北局的報告〉(1948/02/11)，《熱河解放區》，頁 443。

229 〈段蘇權傳達中共中央東北局與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會議的報告提綱〉(1947/10/05)，《冀熱察解放區》，頁 88-90。

230 〈大綱〉的注釋裡說平分土地時要注意中農意見，如果其不同意，應該向其讓步。〈中國土地法大綱〉，《河北土改檔案》，頁 6。但據 Suzanne Pepper 的考證，這是中共中央在 3 個月後，即下文將談到的「糾偏」時期才加上此一注釋。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pp. 316-317. 況且此一注釋裡也沒說不能動中農，只規定中農可以分得較貧農平均水平高的地。

上，自6月以來，「地方恐怖已相當嚴重」，「殺人問題已搞得很兇」。建昌會議之後，恐怖更進一步擴散開來，各處不難聽到「殺了比跑了強」、「地主、富農抓住就殺沒錯」之類的口號，地方幹部以殺的方式來動員群眾。²³¹

張明遠日後回憶時承認，土地會議的精神本身是「左」的，而且大家都接受了這個錯誤的東西，所以不能把錯誤歸咎於少數幾個人身上。這與過去中共官方黨史把過激的土改一股腦推給康生、陳伯達等人的說法比較下，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是，張明遠與魏宏運等學者一樣，把土改當成革命過程中一段特殊的個例，就像 Mark Selden 等人視土改為歷史的脫軌般，張也認為統一戰線才是中共勝利的關鍵。他說抗戰時期中共在冀東獲得「勝利」，就是因為統一戰線。²³²

張明遠無視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所謂一拉一打，兩者之間統一辯證的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此一觀點的錯誤，並證明抗戰以來中共便一直強調只有深入階級鬥爭，才能夠穩固統一戰線。此一政策，不僅在抗戰時期的冀熱察獲得貫徹，戰後的土改也是此一拉一打政策的延續。確實，1947年以來，在劉少奇的鼓勵下，土改覆查朝向愈益激進化的方向發展，以至毛澤東至遲於1948年1月致電劉少奇，批評土改「過左」。劉隨後也接受批判，並指示包括熱河、冀東等各地區，迅速糾正左傾錯誤（冀察熱遼解放區即自1948年2月開

231 〈黃火青在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總結土改的擴大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8/10），《熱河解放區》，頁536、540-542。在冀東亦是如此。高崗原本亦指示冀東黨不要動中農。10月，土地會議代表王逸倫回冀東後，黨內發生爭議，最後仍維持高崗的說法。可是，迨高崗離開後，冀察熱遼分局又發指示給冀東黨說「中農可動」，「土地法大綱是對外宣傳的東西」。〈東北局關於糾正冀東土改中左傾錯誤給程子華的指示〉（1948/04/30），《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210-211。

232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271-272。

始制止土改中的偏向，重劃階級)，²³³即「糾偏」。但是，劉與張明遠不同，他辯稱左的傾向在土地會議以前即已發生。再者，劉也沒有像張一樣把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線對立起來。1948年1月底，當時中共已開始制止包括打擊中農在內的過激行動，劉仍對晉察冀邊區的彭真說，對待中農時，要先讓他們「嚇一跳」，使他們先恐慌，然後才能積極，隨後再拉他們一把，就可以予以團結。²³⁴這就呼應了前面冀熱察區黨委書記劉道生所說的，聯合中農不是遷就中農，而是一打一拉，先打後拉，如此才能置中農在貧雇農的領導下。換言之，統一戰線必須建立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之上。

四、黨領導下的整黨

劉少奇鼓吹深入土改，再徹底地撕裂農村社會，由此加強代表貧雇農的共產黨對農村的領導。同一時期，劉也發動整黨運動，再撕裂黨組織。同樣的，我們也要證明，中共撕裂黨組織是爲了加強黨的統一領導。

如前所述，劉在1946年底回覆康生的報告時，即注意到幹部與機關本身已成爲貫徹土改的阻礙。事實上，在各個地區，很早就發現此一現象。例如，在收到五四指示以前，熱河省委書記胡錫奎即抱怨熱河的幹部與軍隊大多是外來者，他們彼此間存在著派系偏見，如冀東老幹部自認比來自後方（如陝甘寧邊區）的幹部更有實際經驗，能吃苦耐勞，抱怨自己打天下，畜子（外來人）來當官。²³⁵外來幹部則

233 〈平分土地中的打擊面問題〉（1948/09），《熱河解放區》，頁523。

234 《劉少奇年譜》，下卷，頁117、124、141。

235 〈胡錫奎在熱河省委擴幹會的總結報告〉（1946/04/01），《熱河解放區》，頁101-102。

帶著暫留此地的「客軍思想」，與地方關係不密切。²³⁶ 所以他們沒能貫徹放手發動群眾，動員不過是走馬看花，結果「欽差大臣滿天飛」，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實際負責分配土地的當地下層幹部、積極份子與群眾之間，又因為分配果實不公等原因，矛盾重重。熱河省委批評這些下層幹部與積極份子，是「中農當道」。這時還只是 1946 年 12 月，可見得在劉少奇與中央指示來到以前，熱河等地方黨對幹部的作用與土改的不徹底已相當不滿。²³⁷

中共雖然很早就注意到幹部有問題，但因為顧慮地主趁機破壞等原因，一直不敢放手解決幹部問題。²³⁸ 迄 1946 年底以後，即劉少奇開始推動土改覆查之際，中共對處理幹部問題的態度也有所轉變。例如，1947 年初冀熱遼分局接受東北局關於「夾生飯」等的批評指示後，也指摘幹部所謂「窮山惡水出刁民」，瞧不起熱河民眾，以為「死狗扶不上牆」的心態，並承諾可以發動群眾鬥爭幹部，而不只是撤職或扣押辦法，但還是禁止用「拖」和「打」的方式，這也意味著在地方上已出現此一「偏向」。²³⁹

236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對備戰工作和軍事佈置的意見〉(1946/06/02)，《熱河解放區》，頁 133。

237 〈中共熱河省委關於檢查與深入熱河土地改革問題〉(1946/12/12)，《熱河解放區》，頁 204-206、218。

238 如冀中區黨委在 1946 年 6 月即指出，針對某些村幹部嚴重違犯政策與脫離群眾的現象，「處理時仍應無條件地站在幹部方面」，為的是避免地主乘機反攻。在隔月冀中區黨委再指示「決不能採取群眾對地主鬥爭的方式去鬥爭村幹部」，或使「村幹部公開或秘密地向地主承認錯誤」。和此一態度比較下，冀熱遼分局在 1947 年初允許鬥爭幹部一事，確實係激進許多。〈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老解放區內檢查政策糾正錯誤的指示〉(1946/06/18)、〈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具體執行中央五四指示及中央局指示的決定〉(1946/07/28)，《河北土改檔案》，頁 34、74。

239 〈土地改革與群眾運動〉(1947/03)，《熱河解放區》，頁 273-274、289。

既然地方幹部有問題，由他們領導的土改當然也不能徹底。中共領導後來就批評，過去土改太強調組織的領導。原來舉凡土改或前述的減租減息等運動，都結合了由上而下的「撐腰作主」與由下而上的「串通醞釀」。²⁴⁰ 前者強調的是組織領導，後者是群眾動員，兩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熱河省委在 1946 年 4 月時就指示，在開始動員時，一定「要給予一定的行政力量」，但也必須迅速地轉變到讓群眾自己去幹。²⁴¹ 有時候，中共會出於特別的政治考量，特別偏重某一端。如 1946 年上半年，中共便因為清算復仇出現超階級亂鬥的現象，警示各地提高組織領導，避免「跟著群眾自發性跑」。²⁴² 冀東黨在五四指示後，也批判超階級亂鬥的發生，就是因為許多群眾是「自動起來」的，所以鬥爭「一定要服從區裡縣裡的領導」，召集積極份子聯席會、宣講黨的階級政策（如不鬥爭富農、不侵犯中農），鬥爭對象也必須由區幹部掌握。²⁴³

然而，到了 1946 年下半年，中共上層越來越不滿地方黨如此強調組織的領導，前述劉少奇、康生與熱河省委等地的報告中，也紛紛指出幹部本身已成為貫徹土改的阻礙。所以中共此時的態度也偏向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的領導被低估（如劉少奇宣稱「政策不要阻礙發揚群眾民主」），²⁴⁴ 整黨與鬥爭幹部也就隨著土改覆查的開展，熱火朝

240 此一說法是來自太行區黨委關於 1946 年上半年長治、武安兩縣從清算復仇發展到減租減息運動經驗的總結，長治與武安經驗，是當時備受推崇的典範。〈中共太行區黨委土地改革報告〉（1947/06/18），《河北土改檔案》，頁 207-208。

241 〈胡錫奎在熱河省委擴幹會上的總結報告〉（1946/04/01），《熱河解放區》，頁 98。

242 〈晉冀魯豫局關於進一步發展群眾工作的指示〉（1946/03/24），《中央文件 16》，頁 123。

243 〈中共冀東區黨委根據十五分區發動群眾的經驗給各級黨委的信〉（1946/07/15），《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94-96。

244 《劉少奇年譜》，下卷，頁 76。

天地發動起來了。²⁴⁵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不要黨的領導了呢？張明遠日後的回憶，把1947年的整黨比喻為文化大革命，指責當時「強調貧雇農路線，把黨組織都不要了，黨員和基層幹部一律靠邊兒站，交給貧雇農審查」。²⁴⁶ 確實如此，劉少奇在1947年4月時，便要求「任何幹部，包括各級的負責人在內，均必須受群眾的切實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鑒定」，而且群眾還有批評、撤換任何幹部的權利和自由，毛澤東贊同地把劉的信轉發各地。²⁴⁷ 直迄該年底，中共開始糾左後，劉才又指示，中共「不只是群眾自發運動的追隨者，而必須努力去領導自發運動，使自發運動盡可能地變成自覺運動」。²⁴⁸ 從這些指示，我們可以知道，在1947年土改、整黨高潮時，各地在實際的執行上，確實發生抬高群眾到黨組織之上，乃至於否定後者的現象。但是，黨組織只是領導形式，予以整頓並不意味否定黨的實質領導。在1947年9月全國土地會議即將結束，土改、整黨步入最高潮之際，劉少奇私底下即對與會的晉冀魯豫代表說道：「黨內鬥爭是為了好黨，而不是弄垮黨。」²⁴⁹ 因為黨內問題重重，已成為樹立自身領導權威的障礙。整黨是為鞏固黨的領導，這又再突顯了共產黨一打一拉的辯證思維。

幹部的問題源自其階級成份。劉少奇在1945年6月中共七大上

245 據太行區黨委的說法，他們在1946年9月即發現幹部、積極份子侵占果實現象，11月開始「重新調整幹群關係」。此一時間點與康生和熱河省委的報告相近，可見得批判幹部是一場普遍發動的運動。〈中共太行區黨委土地改革報告〉（1947/06/18），《河北土改檔案》，頁210-211。

246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263。

247 《劉少奇年譜》，下卷，頁74-75。

248 《劉少奇年譜》，下卷，頁110-111。

249 《劉少奇年譜》，下卷，頁95。

〈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從明確的階級路線出發，指明當時黨內存在的命令主義、官僚主義，乃至於跟在群眾後邊的尾巴主義等左、右傾錯誤，源於「黨員的絕大多數，是出身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工人成份很少」。²⁵⁰ 這篇報告成爲後來整黨的指導思想，也是貧農團等群眾團體被抬高到黨組織上的根據。如劉道生在 1947 年 7 月冀熱察區黨委擴幹會上的批評般，「過去抗日統一戰線的影響，和平發展的結果，我們黨的成份極不純潔」，「極大多數的村幹部和一部分黨員多爲中農成份」，他們自私地追求自身利益，不滿足貧雇農的需求，相反的，「貧農團很純潔，就要經過貧農團改造支部」。²⁵¹

又，如劉道生所言，不只黨，連軍隊、政治、財經體系內部也充斥官僚主義、紀律鬆弛等問題，他引用劉少奇的批評說「等不到勝利你們就有垮台的危險」。所以，劉道生指示建立一個財經辦事處，繞過既存的黨政軍機構，作爲一個最高領導的「權威機關」。²⁵² 在地方，段蘇權在冀熱察區黨委收到全國土地會議指示後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把縣以下黨政軍民機關幹部、積極份子等，全部歸當地農會領導，「一改過去多頭而分割的指揮，這樣浩浩蕩蕩數千人的大軍力量既集中領導也統一」。²⁵³ 所以，整黨把既存的組織放在一邊，並不是否認組織的領導，而是透過另立的組織，如劉道生提到的財經辦事處，或地方的農會、貧農團等，加強統一的領導，並爲戰爭服務。

段蘇權把整黨形容成「過關斬將」，所有的黨政軍民幹部都要通

250 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香港：中國出版社，1947），頁 8。

251 〈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總結報告〉（1947/07/27），《冀熱察解放區》，頁 64、67。

252 〈關於財政經濟與軍隊建設問題結論〉（1947/08/06），《冀熱察解放區》，頁 70、73。

253 〈段蘇權在中共冀熱察區黨委土地會議上致開幕詞〉（1947/11/03），《冀熱察解放區》，頁 96-97。

過整黨「關口」。那麼，實際的情形是如何呢？時任冀熱察區黨委副書記（1948年初轉任書記）的牛樹才很詳盡地說明三查三整運動（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作風）的步驟。首先，樹立領導核心，由上而下地逐級審查幹部。然後，以縣為單位，組成工作團，黨政軍幹部全部加入工作團，帶人下去工作。這個時候，所有的黨支部「一般凍結」，待經過土改考驗後，再吸收其中的貧農骨幹入黨，在此以前，暫以貧農小組代理支部；縣以下的政權也一概凍結，成立由縣委書記或副書記任主任的農會籌備處工作團，同樣也是以貧農骨幹為中心；軍隊方面在連隊以下單位或軍直機關裡，也成立貧農骨幹小組。²⁵⁴ 據孫敬文的說法，軍隊的連支部也普遍凍結。²⁵⁵ 此一過程說明了，整個運動仍必須在縣級以上的領導下發動，真正被打散重整的是縣以下的機關。當時負責冀熱察軍區政治工作的蘇啓勝在總結軍直機關的整黨運動時，便堅稱「整個運動必須在黨委的完全領導之下進行」，「最好由較高的負責同志親自動員」。²⁵⁶

254 〈牛樹才關於冀熱察土改運動初步總結與今後任務報告〉（1947/11/15），《冀熱察解放區》，頁104-119。牛樹才是河北曲陽人，1925年即入團。牛曾任家鄉農村學校董事兼校長，本身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典範。抗戰與國共內戰時期先後在冀中、北岳、冀熱察等區活動。1949年隨解放軍入華東等地工作，曾任上海市副市長等職。1960年回到河北省工作，文革時被迫害。以後繼續在河北省工作。

255 〈孫敬文在區黨委會議上關於整黨問題檢討的發言〉（1947），《冀熱察解放區》，頁147。孫敬文是河北省黃驃縣人，1935年入黨，曾參加一二九運動，抗戰時期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工作，國共內戰時期在冀熱察邊區負責整黨等工作。中共建國後，主要擔任城市建設等工作，曾任城市建設部副部長等職。

256 領導與負責幹部要先做自我批評，作為典範，但這恐怕只是形式，真正的高潮是隨後人人過關的互相批判與思想檢查。〈蘇啓勝在軍直各單位查階級思想運動的初步總結〉（1947/12/10），《冀熱察解放區》，頁126-131。蘇啓勝係閩西永定人，1929年加入紅軍並入黨，隨後在賀龍麾下的紅二方面軍、八路軍一二〇師工作，

所以，整黨沒有否認黨的領導，同時期的群眾運動也沒有。在談到婦女運動時，冀熱察區黨委就堅持要組織領導，因為農村保守，沒有領導由上而下的撐腰作主，「用力拉一把」，婦女很難動員，而且可能走上混亂階級的鬥爭道路，如鬥破鞋、鬥壞男人與鬥婆婆等。²⁵⁷ 所以，組織領導與群眾鬥爭，終究需要相輔相成。

我們在這裡突出黨領導的重要性，並非否認整黨的殘酷性。前面提到的孫敬文，他不像張明遠般，強調抗戰時期入黨黨員的貢獻，反而批評這時期的黨員多立場不穩，其根源就在於大部分是中農、小資產階級份子。但孫也指出整黨過程中的荒謬與殘酷性，如許多追究到瑣碎的私人生活問題，像是和幾個女人有過不當關係，多少次，都要追清。而且動不動就要打、要吊、要開除黨籍，乃至於處死。有的人喊冤，說被批評的錯誤是領導的歪曲事實，或是領導的指示，自己只是代罪羔羊等等。可是，總結地說，孫贊許整黨加強了黨的團結，解決了過去黨內存在的本位主義、官僚主義等現象。²⁵⁸

整黨是一場普遍的運動。在熱河，據胡錫奎在全國土地會議上所言，在 1946 年底，承德、赤峰失守後，冀熱遼分局就已組織工作團下鄉，許多領導機關都已清空。當時的地方政權，據胡所言，農民委員會也已成爲最高權力機關。²⁵⁹ 胡的發言或許只是爲呼應全國土地會議的整黨號召的誇大說法而已，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會議以後，中

國共內戰時至冀熱察軍區擔任政治工作，1961 年病死。

257 〈張文秀在冀熱察土改會上關於婦女工作問題的發言〉（1947），《冀熱察解放區》，頁 157-158。

258 〈孫敬文在區黨委會議上關於整黨問題檢討的發言〉（1947），《冀熱察解放區》，頁 146-153。

259 〈胡錫奎在全國土地工作會議上的發言〉（1947/07/25），《熱河解放區》，頁 415、422。

共中央就要求胡錫奎回去後立即發動熱河地區的整黨，步驟同樣是先由上而下地整，打通各級領導幹部的思想，再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運動來改造與整頓黨政。²⁶⁰ 如前所述，胡回熱河後，冀熱遼分局召開建昌會議，提出非常激進的政策推動土改，同時還確定一併推動整黨，「不另花時間單搞」。各地著急起來了，高呼「又快又好呀」，幾天內就要把貧雇農組織起來，地富抓起來。²⁶¹ 各地支部則是「無區別」地被凍結或一腳踢開，黨員交付貧雇農「公審」，其中被扣押吊打，乃至於被打死者，所在多有。²⁶² 整個過程與前述同屬冀察熱遼分局統轄的冀熱察邊區並無太大差別。

五、糾偏

1947年11月，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致冀東的指示信中，明確提到成立「人民代表會」作為「各級政府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會是以前述的貧農團等群眾團體為基礎發展起來者，但作為政權機關，它又有別於群眾團體。²⁶³ 此一指示意味著，「大破」的階段即將過去，「大立」也就是「糾偏」的階段將要到來。但劉仍警惕說，人民代表會「決不是和平可以建立的」。²⁶⁴

糾偏，即糾正過左的土改與整黨，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冀察熱遼

260 〈中央工委關於土地會議的精神給熱河分局的指示〉(1947/09/28)，《中央文件16》，頁535-536。

261 〈黃火青在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總結土改的擴大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8/10)，《熱河解放區》，頁540-542。

262 〈熱河黨的狀況與今後建黨任務〉(1948/11)，《熱河解放區》，頁561。

263 〈中央批轉中央工委關於政權形式問題給冀東區黨委的指示〉(1947/11/12)，《中央文件16》，頁590-591。

264 《劉少奇年譜》，下卷，頁110。

分局至遲從 1948 年 1 月開始糾偏。²⁶⁵ 隔月，分局指示雖然要「大放手」動員群眾，但也說不要以為有了貧農團就行，把代表黨政的工作團和農會當絆腳石，「最主要的是領導問題」。²⁶⁶ 同月，冀東區黨委在堅持貧農團為骨幹核心的同時，也指示批評各地貧農團犯了嚴重的關門主義錯誤，即用嚴格的標準（像查三代等），鬥爭與嚇跑那些理應被團結的中農，乃至於貧雇農，導致自身孤立。區黨委要求各地立即依循前述中央工委的指示，成立包括中農在內的代表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堅決保護中農。²⁶⁷ 事實上，冀東行政公署已在前一月指示成立人民法庭，決議死刑必須經縣政府核准後執行，²⁶⁸ 不再像過去般由群眾說了算。這些指示，都大大地降低了貧農團的重要性（儘管仍堅持其領導地位），並突出恢復正規黨、政領導的工作。

糾偏最重要的工作是恢復生產，蓋為戰爭服務原本就是土改、整黨最主要的目標之一。中共在 1947 年深入土改之際，沒有注意到土改應該避開農忙季節，致該年歉收，隔年夏播種時各地普遍缺糧，在熱西圍場還爆發災荒。²⁶⁹ 為亡羊補牢，冀熱察區黨委在 1948 年 3 月

265 〈黃火青在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總結土改的擴大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8/10），《熱河解放區》，頁 545-547。

266 〈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關於熱河省土改中的一些問題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工委、東北的報告〉（1948/02/11），《熱河解放區》，頁 446-447。

267 〈中共冀東區黨委關於目前深入發動群眾給各級黨委及工作團的一封信〉（1948/02/02），《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181-187。

268 〈冀東行政公署關於成立人民法庭的通知〉（1948/01/20），《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179。

269 〈冀熱察區婦聯關於春耕至夏鋤婦女生產總結〉（1948/09/30），《冀熱察解放區》，頁 324。雖然沒有確切資料，但從中共文件看來，這場糧荒的影響相當廣泛，以至中共必須發放貸糧搶救。迄 1948 年下半年，牛樹才仍指示注意災荒的嚴重性與普遍性，還特別提到圍場救災，說「餓死人是了不起的事情」，要軍隊主力減少糧食以共渡糧荒。〈中共冀熱察區黨委、冀熱察行政公署關於發放貸糧消滅災荒的指

指示「把一切土改機構轉變為生產戰爭機構」，工作重點從鬥爭轉向生產，那些已大體分完土地的村莊，不再重分。²⁷⁰但這不是說以後就不分了，而是要等到農閒時、夏季後再進行，²⁷¹新區則待秋收前暫不分土地，並要爭取逃亡地主、富農歸來。²⁷²但這還是不能解決這些逃亡地富的疑慮，群眾也摸不著中共政策的底，生產力依舊不見提高。²⁷³不得已，冀熱察區黨委於9月再指示，迄1949年2月以前，都要以糾偏、生產為重點工作。²⁷⁴事實上，此一政策是東北局的指示，所以整個冀察熱遼邊區都將土改推遲到隔年2月以後再繼續進行。²⁷⁵

共產黨只是推遲而不是取消土改，這就提醒了我們，在回顧1947年那一段「左」傾過激的歷史時，不要把它當成與先前的減租減息，或後來的糾編，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即像 Mark Selden 等人般，說成是歷史暫時的脫軌。1948年3月被派任冀東區黨委書記的吳德，

示〉(1948/06)、〈牛樹才在區黨委財經會議上的結論〉(1948/10/16)，《冀熱察解放區》，頁272-273、358-359。

270 〈中共冀熱察區黨委關於動員起來開展全民生產運動的第一號指示〉(1948/03/12)，《冀熱察解放區》，頁184。

271 〈平分土地問題〉(1948/03)，《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197。

272 〈中共冀熱察區黨委對當前新區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1948/05/12)，《冀熱察解放區》，頁244。

273 〈中共冀熱察區黨委關於新收復區工作指示〉(1948/06/10)，《冀熱察解放區》，頁259。

274 〈中共冀熱察區黨委關於執行中央和分局一九四八年土改整黨指示中幾個問題的意見〉(1948/08/29)，《冀熱察解放區》，頁291-293。

275 〈中共中央對東北局關於執行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黨工作指示的情況與計劃的批示〉(1948/07/05)，《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243-244；〈黃火青在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總結土改的擴大幹部會議上的結論〉(1948/10)，《熱河解放區》，頁550。

他在3月指示冀東黨糾偏的同時，也不忘警惕幹部說：「從思想上講，地主對我（中共）是不滿和仇恨的，因此我們不能麻痺自滿，應該警惕地主、封建富農的反攻復辟叛亂。」²⁷⁶5月，中共中央批評東北局要冀東「停止一切土改」的指示，說得太死，特別是在挖底財方面，如果農民用「緩慢辦法」、「調查談判」去挖底財，不應該禁止。²⁷⁷顯然的，有些幹部在糾偏時，從階級鬥爭的一端走向統一戰線的另一個極端，這不是中共想要的。吳德在9月時就批評有些幹部用強迫的辦法要貧雇農賠償過去沒收太多的財產，反而給了地主、富農撐腰，助長後者的反攻氣焰，導致遵化、密雲等地發生數起規模龐大，且由地、富領導，假教門等名義而起的群眾叛亂事件。²⁷⁸警惕地富的反攻，這事實上是整個東北局及其下所轄冀察熱遼分局的政策，黃火青當時在指導冀察熱遼分局糾偏時也明確地說，那些被拿走土地的地主富農，不是三年、五年，乃至於十年就會消除他的仇恨的。²⁷⁹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忘了階級鬥爭。

吳德說，正確的退賠辦法，應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先整肅那些「不好的貧農團」（中共把過去左傾錯誤歸咎於貧農團的不純），然後由積極份子出面，一面既代表貧雇農自我批評過去的偏激，自願退賠，但又向中農勸說「貧雇農翻身也不容易」，要兩方讓步。如果對方太「難辦」（指不願退賠的貧雇農和要求太多退賠的中農），就動員

276 〈平分土地問題〉（1948/03），《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202。

277 〈中央關於糾正土地改革中左傾錯誤時不要限制農民必要的鬥爭給東北局的指示〉（1948/05/01），《中央文件17》，頁156-157。

278 〈吳德在冀東區黨委擴幹會上關於今後工作的報告（之二）〉（1948/09/07），《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246-247。

279 〈黃火青在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總結土改的擴大幹部會議上的結論〉（1948/10），《熱河解放區》，頁559。

更多的積極份子，以及對象的親朋好友，向他說道理，一次不行再來一次，說到通為止。²⁸⁰ 吳德說這不是強迫，但分明就是中共的專斷橫行。在這一過程中，不管是貧雇農的階級鬥爭，還是與中農乃至於富裕中農或被打倒的地主富農的統一戰線，完全被中共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糾偏須由支部領導，這也意味著先前在整黨時被凍結的支部已逐漸恢復。但是，整黨時把黨員交付貧雇農審查造成的幹部與群眾，或老、新幹部間的分裂依舊，現在欲予團結，整黨時被提拔的新幹部不敢開口，被整的老幹部則是幸災樂禍地等著看新幹部鬧笑話。²⁸¹ 中共的作法是，恢復支部，吸收貧農團骨幹入黨，同時派支部中的積極份子加入貧農團。²⁸² 此一作法意味著，糾偏固然有打壓貧農團的意味，但不是要從群眾鬥爭一端走向組織領導的另一極端，而是欲尋求兩者間的結合。黃火青明確地指出，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性格還是存在，過去土改過激就是此一性格左的表現，現在糾偏如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右的表現。²⁸³ 所以，黨還是必須整，只不過側重在整工作、思想與作風，那些已被查過階級的支部不用再查，也不准再用「公審」與「搬石頭」的辦法。

中共持續地警惕不要忽視階級鬥爭與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偏向，在

280 〈吳德在冀東區黨委擴幹會上關於今後工作報告（之三）〉（1948/09/09），《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250-251。

281 〈黃火青在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總結土改的擴大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8/10），《熱河解放區》，頁 548。

282 〈中共冀熱察區黨委關於執行中央和分局一九四八年土改整黨指示中幾個問題的意見〉（1948/08/29），《冀熱察解放區》，頁 295。

283 〈黃火青在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總結土改的擴大幹部會議上的結論〉（1948/10），《熱河解放區》，頁 552-554。

在證明了土改與糾偏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它沒有爲了糾偏而放棄階級鬥爭與整黨，走向另一個極端。當此之時，即 1948 年底，中共已攻陷東北大部分城市，承德與張家口等大城市也已漸次「解放」，熱河、遼西與隔年 1 月察哈爾省政府相繼成立。²⁸⁴ 整個河北除了平、津地區外，也大部淪陷。困守平、津的國軍，幾近彈盡糧絕。²⁸⁵ 在即將展開建國大業之際，中共從長時期的革命歷程中，想必已充份體認到如何在一個被撕裂的社會乃至於黨組織的基礎上，鞏固與壯大自身的統治。

小 結

Mark Selden 等人在關於五公村的研究中指出，1947 年土改以來，共產革命與傳統文化的蜜月結合，逐漸讓位給痛苦的分裂。²⁸⁶ 這樣的論斷是來自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二元對立的前提。Selden 與前述的 Ralph A. Thaxton、Odoric Y. K. Wou 和魏宏運的論述，咸認爲 1949 年（或至少 1945 年）以前，標榜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共是由於強調和諧團結的統戰與緩和的減租減息政策，才得以擴大勢力並獲致成功。土改時期與 1950 年代中期中共向社會主義過渡後，因爲過份強調階級鬥爭，終於招致災難。

這樣的說法，事實上只對了一半。中共從沒有否認統一戰線，但

284 〈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關於成立熱河、遼西兩省委、省政府的通知〉（1948/12/26），《熱河解放區》，頁 572；〈華北人民政府關於北岳、冀熱察兩區合併的通知〉（1949/01/19），《冀熱察解放區》，頁 415。

285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頁 269–272。

286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wicz,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p. 271.

堅信只有在「孤立少數」的前提下，他們才能團結多數。被 Odoric Y. K. Wou 等人視為激烈土改開端的五四指示宣稱，打倒占人口少數的大地主階級，革命就能夠團結 90% 以上的農民。即使是被 Mark Selden 等人斥為革命脫軌的 1947-1948 年間土改覆查之際，劉少奇仍自信地宣稱，革命能夠團結 80% 以上的農民。²⁸⁷ 各地的統計：熱河的平均打擊面占總戶數 13-15%，占總人口數的 20-25%；冀熱察所占戶數與人口數比為 20% 與 25%，冀東為 13% 與 17%。²⁸⁸ 打擊面無疑較原定標準寬，但還是「團結多數，孤立少數」。1948 年開始糾偏後，如前所述，中共推遲卻未放棄土改。到了 1949 年，中共「解放」了許多新區，依據東北局的指示，冀東等地打擊面「戶口不得超過 8%，人口不得超過 10%」。²⁸⁹ 中共如此降低打擊面，顯然是為爭取新區的中間階級，但其背後的基本邏輯，仍不脫「團結多數，孤立少數」，也就是一打一拉。

所以，與 Mark Selden 的論斷相反，中共堅信，鞏固的統一戰線與黨國統治，必然要建立在依據他們所規定的階級標準分化的社會與黨國組織之上。當 1946 年底國軍反攻之際，在中共地方黨的報告中，我們發現一些地區出現「超階級」的合作現象。地主與群眾協議，「八路軍來時群眾不講地主壞，中央軍來時地主不講村幹壞」，或「八路軍來了你（農民）就說（土地）改革了，中央軍來了我（地主）就說

287 《劉少奇年譜》，下卷，頁 91-92。

288 〈黃火青在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總結土改的擴大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8/10），《熱河解放區》，頁 533；〈中共冀熱察區黨委關於土改運動的基本總結〉（1948/09/01），《冀熱察解放區》，頁 300；〈吳德關於冀東土改及整黨工作總結報告〉（1948/09），《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261。

289 〈中共冀東區黨委關於新區土改指示〉（1949/01/22），《冀東土地制度改革》，頁 274。

你（農民）已退（土地）了」。²⁹⁰ 這樣的妥協顯然是出於農民與地主自身生存的邏輯，他們希望在國共激烈的戰火下求得一線生機，但這卻不能不令中共擔憂。蓋群眾與幹部如果只是根據此一生存邏輯，而不是中共所規定的階級和政治立場行動，難保他們在國軍來到時，不會背叛革命。如此也難怪劉少奇會在 1947 年開始推動土改覆查與整黨，而冀熱察區黨委書記劉道生會說那一席話：「人類歷史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史，任何一件事，你不反對就是贊成，絕沒有中間路線與超階級的思想。」²⁹¹

中共把自己的領導，建立在一個按照他們規定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所分化的社會與黨國組織之上。這樣的裡解，告訴了我們，單純的群眾動員，抑或組織的力量，都不足以保證中共革命的勝利與政權的鞏固。

最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雖然我們在這裡不能詳盡地予以答覆，卻值得簡單一提。

關於革命與戰爭時期的共產黨政權，究竟依賴如何的經濟來源，維持自身的生存，並達到勝利？一種幾近於陳腔濫調的說法——其具體代表是 Mark Selden 在 1970 年代提出的「延安模式」，即中共是透過動員農民由下而上地投入生產，以及精兵簡政政策，節省開支，達成自給自足。此一說法有很大的盲點。第一，它太過強調群眾的力量。陳永發後來在 1990 年代證實抗戰時期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相當的程度上是依賴鴉片貿易。陳的說法正足以指正 Selden 民粹主義式論點的偏差，蓋鴉片貿易必須在黨國統籌領導下才可能運

290 〈土地改革與群眾運動〉（1947/03），《熱河解放區》，頁 276；〈劉杰同志關於察哈爾省土地改革的彙報〉（1947/01），《河北土改檔案》，頁 147。

291 〈關於發動群眾土地改革的檢討〉（1947/07/16），《冀熱察解放區》，頁 58。

作。其次，既然 Selden 如此強調在群眾動員基礎上達成的自給自足，他又爲什麼批判國共內戰時期的土地改革呢？當時中共抽調幹部下鄉發動土改，不也是爲了精簡機關，節省開支嗎？²⁹² 分配土地與其他財產，同樣也是爲了解決群眾生產的困難，激發其熱情，達成自給自足。²⁹³ 就像劉道生在土改覆查高潮時自信滿滿地宣稱般：「只有自己動手，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²⁹⁴ 所有一切都指向國共內戰時期的中共像延安時期般，繼續高呼自給自足，那爲什麼 Selden 批評前者而頌揚後者呢？究其實，Selden 認爲抗戰時期中共是以緩和的社經政策動員群眾自發自願地實現有限度的集體化，而國共內戰時期的土改則是訴諸激烈的階級鬥爭，撕裂了農村的和諧。關於這一點的謬誤，我們前面已經論證，不再多說。

Mark Selden 未能體認自給自足只是中共宣傳的神話，是他最大的盲點。土改時期在冀熱察區黨委擔任審計工作的楊春甫就公開承認，當時邊區「巨額收支的赤字，完全依靠自給是無法平衡和解決的。」²⁹⁵ 那麼，中共靠什麼維持戰事呢？關鍵還是在於鴉片！原來內蒙在滿洲國時期，就是鴉片的盛產區，爲滿洲國與日軍帶來龐大收益。²⁹⁶ 抗戰甫結束，共軍開入熱河，既沒錢，又沒糧，也沒群眾，

292 〈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關於作戰方針及目前中心工作的指示〉（1946/08/20），《熱河解放區》，頁 181。

293 〈冀察熱遼經濟與財政問題〉（1948/02），《熱河解放區》，頁 450-455。

294 〈關於財政經濟與軍隊建設問題結論〉（1947/08/06），《冀熱察解放區》，頁 72。

295 〈楊春甫在區黨委擴大會議上關於財經工作發言提綱〉（1947），《冀熱察解放區》，頁 138。楊春甫是河北任丘人，1932 年入黨。抗戰與國共內戰時期分別在平西和冀熱察地區工作。1950 年代時服務於解放軍空軍與機械工業部。1958 年後調遼寧工作，曾任遼寧省委書記。1978 年被撤銷一切職務。

296 江口圭一編著，《資料日中戦争阿片政策—蒙疆政權資料を中心に—》（東京：岩波書店，1985）。

如何是好？他們就接收了滿洲國的偽產，包括大量的鴉片。當時被派到承德，負責接送幹部進出東北的趙毅敏說，他因為一個錢也沒有，沒法工作，去找胡錫奎，胡立即給了他一些「大煙土」，就是鴉片。²⁹⁷在當代出版的冀察熱遼中央分局文件中，有一件提到了當時中共的財政來源說：□□（原文如此）仍按每畝產 24 兩徵稅，稅收全部歸大公（指中央分局），而且由大公完全收買，嚴禁小公（指地方單位）或私人買賣，盡可能作到徵稅與收購同時並進。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同一份文件的其他部分洩了底。它說，熱河人民每人要負擔公糧與「煙稅」97 斤，煙稅即針對種植鴉片者抽取的稅；它又說，熱河貿易公司與供給部保存十數萬兩「大煙」。可以見得，□□就是鴉片。文件還說，很多小公單位與部隊，雖然不准動鴉片，但實際上他們的「自給自足」，是靠「亂捉與買賣□□」而來的！這讓中共很是生氣，嚴格規定小公只能靠農業生產謀求自給，鴉片一定要由大公統籌統支。²⁹⁸由於篇幅與資料的限制，我們不可能在此針對此一議題再深入論述。但上述簡單的描述，已向我們證明了，單純的自給自足與群眾動員，不足以保證革命的成功與鞏固，它們只能作為一個龐大的黨國統籌領導中的一部分而已。

297 〈趙毅敏同志答熱河史編輯人員問〉（1985/08），《熱河解放區》，頁 741。

298 〈冀察熱遼經濟與財政問題〉（1948/02），《熱河解放區》，頁 458-469。

結 論

1945年中共中央出版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自我批評地承認，中共黨員大多是小資產階級成份出身，他們由於「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別由於中國的落後的、分散的宗法社會和幫口社會的社會環境，小資產階級在組織生活上的傾向，容易表現為脫離群眾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以及「左傾路線」等錯誤。¹ 這段話裡雖充斥著一些模糊且空洞的中共政治術語，但也貼切地說明了早期的共產黨，特別是本文所探討的河北黨的概況。

最初河北黨主要就是由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組成，他們依循某些既存的政治社會網絡與關係進行結合，推動革命活動。然而，這些既存的網絡與關係，固然有助於小範圍團體的結成，事實上也分裂了整個中國社會。誕生於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的共產黨，無疑把這些既存的裂痕帶入黨內，其具體表現，也就是前述該段文字所謂「脫離群眾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早期的河北黨事實上就是由分散各地的小團體所構成，其本身及各該小團體都不能算是一個有組織紀律的政黨，毋寧是依恃某些個人的關係維繫結合。因為個人的因素是如此重要，中共至遲在1927年底就警示，黨的組織「容易流於首領個

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頁54。

人的獨裁形式」。²

早期河北黨最重要的「首領」就是李大釗。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達把陳獨秀比擬成一個封建宗法家庭的大家長，³平心而論，李大釗又何嘗不是這樣的一個人。早期河北黨的重要幹部咸是李大釗的好友與學生，他們對李極其尊敬，唯其命是從。像是 1923 年一度非常反對國共合作的張國燾，最後就是在李大釗的調解下屈服；1926 年韓麟符另組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與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對抗，也是因為李大釗的反對，無疾而終。考慮到張、韓二人日後在中共黨內如何的桀驁不馴，我們可以想見，當時李大釗在河北黨內發揮著如何大的家長統治權。

李大釗死後，維繫河北黨各個鬆散小團體的結紮時解開，過去隱藏在李大釗家長統治下的黨內裂痕也就浮現了出來。瞿秋白時期試圖由上而下地加強黨的組織紀律於河北黨，卻事與願違，引起河北黨內持續將近一年有餘的衝突分裂，此即順直省委事件。

劉少奇也是當時被中共中央派來順直省委，為貫徹組織紀律的一位代表。長期從事工人運動的劉少奇，不會不清楚早期共黨如何利用既存的政治社會網絡與關係去推展革命活動，⁴也應該能夠理解在順直省委裡王藻文等工人黨員鬧著要錢的僱傭革命問題並非一日之寒。

2 〈中央通告第十七號〉(1927/12/01)，《中央文件 3》，頁 533、535。

3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08/02)、王會悟，〈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等編，《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 16、76。

4 例如，劉少奇與李立三在 1922 年初打入安源路礦當中時，即與工人間的紅幫頭子打交道，請他們不要破壞罷工。後來劉還結識了作為北方工人代表參加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的孫雲鵬，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孫是正太路工人團體「禮民」的領袖，河北黨就是靠他的關係打入正太路工人間。《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23、34。

可是他與陳潭秋不滿意順直省委內部的派系鬥爭，採取粗暴的組織紀律手段，排斥河北黨老幹部，批評河北黨的舊基礎都爛掉了，要中央由上而下地另立一個省委取代舊省委，結果引起河北黨內的大張撻伐。劉最後也痛苦地致信中央說「北方同志中有些對我確實有了些成見」，請求調離。⁵ 劉少奇當時並不清楚，如同他在 1945 年八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所說的般：「凡是專制主義傾向較嚴重的地方，那裏就可能出現極端民主化的現象。」⁶ 中共如果單純依賴黨組織的力量去駕馭這樣一個龐大且分裂的中國社會與黨組織本身，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得出相反的結論，如 Hans J. van de Ven 所言，只要彼此間能夠以馬列主義的話語進行溝通，中共就應該包容不同的團體去追逐各自不同的利益與理念？⁷ 這種說法太空泛，事實上也很難做到。確實，每個個人與團體都有其各自的利益考量，群眾團體也不例外。如 David Strand 關於北平人力車夫運動的研究所示，「街頭政治」並非不理性與不實際的。⁸ 像人力車夫般的城市貧民，其所關注的是眼前的利益。他們會與各式各樣的政治團體合作，但主要是依其利益而定。中共也清楚這一點，可是他們沒辦法滿足群眾的需求，只好借用別人的招牌或某些關係去動員群眾。本書一開始提到二七罷工北方鐵路工人與吳佩孚及共產黨的合作，正是如此。然而，此一辦法有很大的危險性，即中共在此一過程中，如果沒有讓群眾從中覺悟到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與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獲得解放，而總是依循

5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86、89。

6 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頁 50。

7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p. 242.

8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pp. 258–259.

那些既存的政治社會網絡與關係去滿足自身的需求，最終群眾還是別人的群眾，甚至淪為地方派系衝突的工具，就連中共自身也難以倖免。李大釗與順直省委時期張慕陶領導的河北黨，就是任憑地方幹部利用別人的招牌與關係去動員組織群眾，以及追逐各自的利益，又未能啓發群眾的政治與階級覺悟，與公開自己的政治面目，結果就是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成了為人作嫁的革命。

然而，在此一嚴苛的環境下，如何拿捏經濟鬥爭向政治鬥爭轉變的時機，以及在合法的掩護下進行非法的抗爭，是很大的難題。李大釗、張慕陶沒能做到，中共中央以及甫在順直省委事件中受挫的劉少奇也未能做到。

1929年，劉少奇被派到滿洲省委工作。1930年初，中東路裁員，工人失業，劉少奇領導的滿洲省委聯絡失業工人積極份子李梅五等人，組織「東鐵工人失業團」，向路局請願。該團的目的，不只限於爭取工人復工，更重要的是開闢中共在中東路工人間的影響力。⁹然而，當時中東路工人與路局本身情形非常複雜：路局有白派、紅派之分，工人團體有當局把持的工業維持會與共產黨的失業團之分，工業維持會裡又有白派與改組派之分，後者的領導是過去被中共開除的份子，所以向中共大吊膀子。李梅五本人也是個投機份子，他一開始和中共親近是因為想「聯絡紅毛子，開除白毛子，不裁一個中國人。」其終極目的就是復工（經濟鬥爭）。後來中共要求政治總罷工，李梅五動搖了，最後投降維持會。連中共派去領導運動的孫秀峰也動搖了，他說「東路工人生活太好了」，如何會鬥爭？¹⁰劉少奇在經歷此

9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02。

10 〈劉少奇關於中東路工人鬥爭的總報告〉（1930/03/13），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4》（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9），頁207-263。

一事件後，消極了許多，承認中國目前「黃色工會力量強大且合法存在，赤色工會力量弱小且不能合法存在」，以至主張赤色工會會員頂多只能加入黃色工會裡「廣交朋友」，不要成立赤色反對派。這一點和我們在第二章談到張慕陶的觀點類似，而且兩者同樣最後都被李立三領導的中央斥為「右傾機會主義」。¹¹

立三路線要張慕陶等地方幹部，直接打出自己的招牌，高呼空洞的階級鬥爭口號，發動反國民黨的軍事暴動，結果只是使自身變得更加孤立，地方黨也因此受到很大的破壞，怨恨中央的左傾路線。隨後，王明上台，中共內部既存的分裂衝突，結合了對立三路線的不滿，掀起另一波更大的黨內紛爭，乃至於有羅章龍等人另起爐灶，另立中央。在河北黨內，也有曹策、張慕陶等人響應此一分裂運動，此即本書第三章所述河北省委緊急會議籌備處事件。中共中央最初也是訴諸由上而下的組織紀律平息糾紛，結果卻像順直省委事件般，加劇了黨內分裂。最後，由於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鎮壓，逮捕了許多反對派份子，此次的黨內分裂才告平息，但河北黨本身也元氣大傷。

隨後，王明等國際派領導的中共中央試圖證明自身政策的正確，於 1932 年召開北方會議，設想乘九一八事變所掀起的反帝高潮之際，發動群眾暴動，建立北方蘇維埃政權。高蠡暴動與直南鹽民暴動或許可算是北方會議的成果之一，但其過程與結果已如第三、四章所示，群眾即使對現況不滿，但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是依賴少數有辦法的菁英領導起來抗爭，結果還是流於「單純的軍事行動」。一旦該菁英領導離去，整個運動就煙消雲散。當時被留在上海接受觀察的劉少奇，曾在 1932 年 3 月代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北省委的指示信，

11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106。

說當時河北城市裡自發性的工人抗爭，「帶著了濃厚的政治性質」。¹² 但如前所述，這根本不是事實。

即使劉少奇已如此露骨地表態，當時中共中央仍批評他政治上估量不足，有嚴重的經濟觀點。¹³ 1933年，劉隨中共中央轉移到中央蘇區工作。過去在白區領導工人運動屢遭挫敗的劉少奇，來到蘇區以後，看到蘇區工人運動在共黨政權掩護下，蓬勃發展，他因此愈益相信群眾應該為鞏固與擴大蘇維埃政權而鬥爭，正所謂「一切服從於戰爭」，¹⁴ 非如此不足以解放工人自身。隔年初，他在〈唐山礦工的總罷工〉一文中就指出唐山工人的罷工要與紅軍的鬥爭相呼應，給予帝國主義、國民黨嚴重打擊。¹⁵ 他或許不知道，如本書第五章所示，當時唐山工人以為在日本統治下生活要更好，中共在工人間的影響力還不如日本與政府當局。

高蠡、直南的農村暴動，與唐山等城市工人群眾運動的相繼失敗，以及劉少奇所謂「一切服從於戰爭」的認識，在在證明了，沒有槍桿子和政治勢力的支持，群眾鬥爭很難發動起來。即使發動了，但如本文第四章所示，那些依循既存政治社會網絡與關係結成的自發性群眾運動，也不會如 Ralph A. Thaxton 所設想般，靠自身的力量轉變成為長期的革命運動。

事實上，王明等中共中央領導雖然左，但也不只是紙上談兵的書生而已。如前所述，河北黨自 1928 年張慕陶時代以來，即在地方黨外慢慢地發展出一個特科系統。前者負責群眾動員，後者專事上層份

12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117。

13 《劉少奇傳》，頁 181-182。

14 〈用新的態度對待新的勞動〉(1934/03/20)，《劉少奇選集》，上卷，頁 19。

15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127、133。

子的統戰，此即「紅蘿蔔主義」與「西瓜政策」。特科人物許多是河北黨內的右派與脫黨份子，如韓麟符、張慕陶等人，他們在北方上層社會間有辦法，但卻桀驁不馴，又脫離群眾。察哈爾事變之際，中共就是靠韓麟符等人打入起事軍隊的，但最後卻落得灰頭土臉的下場，就是因為中共根本管不住這些人，加上後者只知推動上層統戰，不重視群眾動員，結果還是「單純的軍事行動」。關起門來專事統戰的特科系統，與地方黨務系統脫節，像是李鐵夫般始終堅信群眾革命的地方黨員，就不諒解特科的做法，還批評黨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孰不知韓麟符等人也是他的「同志」。

不論是特科的西瓜政策，還是地方黨的紅蘿蔔主義，兩者最後都淪為脫離群眾的單純軍事行動，使得中共在河北的影響力愈益縮小，1936年春被派到河北工作的劉少奇就批評這是「關門主義」！¹⁶ 當時已有十五年左右革命鬥爭經驗的中共與劉少奇，已經認識到，他們面對的是一個被各式各樣政治勢力與社會網絡和關係所分裂的中國社會。考慮到當時中共的力量，他們不可能消滅盤踞各個地區與領域的分裂勢力，故必須與之聯合，以求得生存。這就是劉少奇當時首要的任務，即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達成此一任務，劉還尋求他過去瞧不起的河北黨老幹部合作。他當時撰文說，有些黨內同志認為「過去全黨是腐敗的，舊的幹部都是官僚」，「舊的瓶子不能裝新酒」，事實上，如前所述，這就是他在1928年時對順直省委的批評。可是，現在他為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願意承認「舊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裝新酒的」。¹⁷ 蓋那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河北黨老黨員，在

16 〈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1936/04/10)，《劉少奇選集》，上卷，頁23-33。

17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60-161。

北方上層社會間有辦法，沒有他們的幫助，劉少奇恐怕難以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然而，過去河北黨也不是沒有上層統一戰線，只不過他們總是利用別人的招牌與既存的社會關係，去發動群眾與滿足其需求，下場就是流於爲人作嫁的革命，黨本身也成爲地方派系衝突的一部分。劉少奇對此當然知之甚詳，所以他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也強調「無產階級在目前階段中，不應充當資產階級的幫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獨立領導」，因爲「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斷加強，才更能團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力量」。¹⁸ 這一段話明確表明了，劉想要建立的是一個能爲黨所控制的統一戰線。

但是，中共憑什麼去掌控統一戰線呢？關鍵在於實力。抗戰爆發後，國軍後撤，八路軍趁虛而入，建立自己的政府，並藉此掩護動員群眾。1938年，國民黨政權警覺到中共在河北敵後擴張勢力，派鹿鍾麟爲河北省主席，聯絡冀中有力人士張蔭梧等，與中共爭奪地盤。劉少奇等中共領導就指示鄧小平等前線將領，只要中共在河北的軍隊與群眾間有「實際的力量，鞏固的信仰，對於一切都好應付，可使鹿鍾麟、張蔭梧不得不與我們合作」。¹⁹ 換言之，軍隊與群眾就是實力的基礎。實力雄厚，不怕那些上層份子不與之合作。這正是「一打一拉」，雖然當時中共還沒明確提出此一口號。

可是，一開始許多敵後根據地只是訴諸外來的軍事力量，遂行統治。如本書第五章業已證明，冀東抗日根據地最初就是主要依賴外來八路軍建立起來者，沒有群眾基礎。所以當宋時輪、鄧華建議在冀熱邊建立政府時，劉少奇就回覆說，「目前時機尚未成熟，下層基礎尚

18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168。

19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218。

不穩固」，正式政府待一段時期再成立較好。²⁰ 果不其然，在宋、鄧軍隊撤出後，冀東根據地立即瓦解，這就證明了沒有群眾的基礎，中共政權不能穩固。

隨後，共黨提出平西、平北、冀東三位一體的戰略，以平西為中心，建立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可是，幹部與地方黨還是過份依賴外來軍隊建立政權。他們也曾試圖推動合理負擔等政策，建立政權基礎，但因為是單純依賴政權由上而下的推動，結果既激怒了上層份子，也沒有動員起群眾，致使自身愈益孤立。一旦遇到日偽軍或國軍的掃蕩，地方上層份子乃至於群眾就群起反抗共黨政權，迫使中共退出。如平西根據地在 1940 年前後就是因為日軍的掃蕩與內部的眾叛親離而瓦解，很長時期未能恢復。冀東根據地在 1939 年恢復以後，雖然逐步地動員群眾起來與地主鬥爭，但仍不夠徹底，幹部依舊經常訴諸粗暴的黨政力量推動政策，結果也導致某些地區共黨政權與社會隔離，「裸體跳舞」。1940 年的百團大戰，激怒了日軍，導致後者於隔年發動對中共華北根據地的大掃蕩，冀東八路軍因此一度撤至長城之外的熱河地區，即口外地區，久久不能回到冀東基本區。

根據地內部的上層份子與群眾，乃至於幹部，在日偽軍掃蕩期間，背叛與響應敵軍，這使一些幹部質疑，過去執行的政策是不是太「左」了？當時正在華中指揮新四軍的劉少奇，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在 1941 年初的報告中就提到：「半年來在各地注意糾正過左的錯誤」，「在皖東地主暴動後，本大半逃跑，現已大部回來，表現尚好」。²¹ 然而，如同陳永發所證明，地主的叛變，與日軍的掃蕩，反

20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233。

21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323。

而更堅定了劉少奇動員群眾的立場，促成所謂「鹽阜模式」的出現（鹽城、阜寧是新四軍在蘇北的主要根據地）。²² 在該年2、3月間，劉不斷發表講話，批評新四軍事件的發生，就是因為項英、袁國平被統一戰線束縛了手腳，沒有試圖求得自身的壯大。他說，統一戰線「必須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所以，強調群眾鬥爭並不是不要統一戰線，反之亦然。在該年6月劉與毛澤東的電報往返中，劉第一次提到「一打一拉」，毛甚表贊同地說「對大地主大資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目前由於時局艱困，雖然「拉還是主要的，打是輔助的」，但沒有打就不能拉，正所謂「打是達到拉之手段」。²³ 如本書第五章所論證，也是在此前後，冀東黨提出「一打一拉」的政策，駁斥那些以為過去太左而主張暫緩群眾鬥爭的地方幹部。

但是，中共如何確保幹部在統戰的同時，不會喪失自身的立場，還能夠貫徹群眾路線呢？在冀熱邊區，幹部大多是小資產階級出身。他們來自地方上層家庭，有的還會吸大煙。過去在河北黨內惡明昭彰的韓麟符，就是一個例子。這類幹部雖然有助於推動上層統戰，但其家庭背景、階級出身、桀驁不馴的性格，及其脫離群眾的作風，不能不使中共深感憂心。劉少奇在順直省委時期的挫敗，可以說就是栽在這些地方幹部的手上。抗戰爆發，劉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往不咎，尋求他們的合作，但他一直對地方幹部的階級出身耿耿於懷。1939年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劉就表明「每個社會成員都作為一定階級的人而存在」，許多共產黨員「是從舊社會中生長教養出

22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126-127.

23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36-337、354。

來，總帶有舊社會中各種思想意識的殘餘」，如果不予以改造，使之端正無產階級的立場，那麼他們在處理革命問題時，便不能正確地掌握政策，由此造成左的或右的錯誤。²⁴ 1941年，劉少奇提出「一打一拉」政策之際，先後發表〈人的階級性〉與〈論黨內鬥爭〉等文章，重述他一貫的論調，即改造黨員，使之服從黨的組織紀律，為黨的利益與使命而犧牲奉獻與奮鬥，此即1942年中共推動整風運動的先聲。劉認為唯有整風，中共才能確保幹部不會在貫徹一打一拉政策中，出現或左或右的錯誤，也不會喪失自身政治與階級的立場。

整黨的提出，正是中共為了因應當時愈益嚴苛的局面之一種手段。由於日偽軍的分割圍剿，逐漸縮小了中共的活動空間。因此，黨員更需要堅定抗戰必勝與革命必成的信念，幹部也必須在此一四面楚歌的環境下，採取更靈活的政策，維持下去。1942年初，劉少奇從華中啓程赴延安，準備開始推動全黨的整風運動。啓程之前，劉便囑咐新四軍應該要開闢新區的工作，必要時可以「利用聯莊會灰色的掩護」。²⁵ 當時河北的敵後地區，如在冀東等地，也由於日偽軍所建立之無人區與「人圈」的包圍，處境維艱。最初地方黨對人圈採取敵視的態度，卻陷自身於更加孤立的狀態。劉在1942年赴延安途中便指示北方局在敵占區活動時，如敵人的統治「在相當期間不能推翻」，可以採取合法鬥爭的策略。²⁶ 中共在冀東等地隨後也改變政策，「轉入人圈」，或日偽占領的村莊，利用村長、保甲長的掩護，發動群眾合法的抗爭。成功的群眾動員，使得中共掌握了人圈與村裡的上層份子，後者即使不滿意，卻由於群眾已被中共奪走，而無能為力。這就

24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07)，《劉少奇選集》，上卷，頁98-99、114-117。

25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74。

26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06。

是所謂「被控制的統一戰線」。

被控制的統一戰線一定要建立在農村二元分化的基礎上，這是中共於 1943 年開始大力推動減租減息運動的一個主要目的。被中共煽動起來的群眾，在政府的公開支持下，與地主進行表面上有理、有利、有節，實際上卻是非常激烈且蘊含階級鬥爭意味的減租減息運動。而且就結果來說，雖然中共當時沒有公開倡導平分土地，但農民也已透過算帳等辦法，達成事實上農村裡財富的重新分配。

1944 年 6 月，英美聯軍在諾曼地成功登陸，整個世界大戰局勢起了一大轉變。中共也預期中國戰事將發生逆轉，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在該年底至隔年初，先後指示北方局、南方局等前後方領導幹部，盡快結束整風運動，專心投入減租減息等群眾工作，以待將來國內局勢轉變之時，中共能有雄厚的基礎發動游擊戰爭。²⁷

1945 年 5 月，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後來以《論黨》為名出版）。在報告裡，劉高舉毛澤東為中共偉大的領袖，宣稱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他批評「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這就證明了像河北黨過去發動的高蠡暴動、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以及冀東黨過份依賴八路軍建立抗日根據地等脫離群眾的「單純軍事行動」，抑或相反地只是依循群眾自身經濟需求而缺乏黨領導的自發性群眾運動，都是錯誤的。也是在這篇報告中，劉提出了所謂「凡是專制主義傾向較嚴重的地方，那裏就可能出現極端民主化」的說法。他說中共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同時實行高度的集中。但所謂的民主，不是像過去順直省委或河北省委緊

²⁷ 《劉少奇年譜》，上卷，頁 459-460。

急會議籌備處事件時期般的宗派分裂，以及向黨鬧獨立性的極端民主化，它必須是在不妨害黨內的集中原則，有利於黨的事業下的黨內民主。固然中央的決議不可能符合每個地方的情況，劉也說「我們就不是提倡盲目的執行與服從」，但遇到這種情形，黨員應該「提出意見，請求上級收回或修改」，因為「黨的決議必須無條件地執行」。²⁸ 這種「因地制宜」，不是像當代學者 Mark Selden 或 Ralph A. Thaxton 等人所謂，貶低黨組織領導與階級鬥爭的因地制宜。蓋黨的領導、階級鬥爭是原則問題，借用劉在 1941 年發表的〈論黨內鬥爭〉一文的說法，遇到政策問題的分歧，是可以「作必要妥協的」；但如果是原則問題，那就應該進行「不調和的鬥爭」。²⁹

再進一步論證，中共確實如 Hans J. van de Ven 所說的般，不可能建立一個無所不及的黨國系統，但中共也不可能像該作者所形容般，容許不同的個人或團體，依據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追逐其自身的觀點與利益。讓我們引述劉少奇在 1939 年發表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的一段話來說明此一論點，即：「個人利益服從於黨的利益，地方黨組織的利益服從全黨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從整體的利益，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這是共產黨員必須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³⁰

河北黨誕生於一個分裂的中國社會，其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各式各樣「民主」的小團體，追尋各自的理念與利益。共產黨不可能像 1950、1960 年代西方學者所設想般，建立一個無所不及的極權主義

28 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頁 24-25、53-54。

29 〈論黨內鬥爭〉(1941/07/02)，《劉少奇選集》，上卷，頁 187-188。

30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07)，《劉少奇選集》，上卷，頁 129。

(totalitarianism) 體制，³¹ 消滅這些分裂。它最後還是必須把自身的黨國統治建立在一個分化的社會之上。但是，這個經歷過共產革命後的社會，必須也應該是依據中共所規定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而且是被由下而上的群眾鬥爭所分化的社會。簡言之，這是一個被黨所控制的二元分化社會，如此也就完成了所謂共產革命乃農民由下而上的奪權與共產黨由上而下的黨國建設兩個互補的過程。³²

關於中共與劉少奇在戰後的土改與整黨時期，如何透過階級鬥爭分化農村，並在此基礎上重建與鞏固黨的統治，我們在第六章已有非常詳細的討論，茲不贅述。最後，我們要交代的是，在經過此一統合與分化的過程後，上層份子固不待言，對於基本群眾，中共也採取分而治之的辦法，牢牢地將其掌握在手中。在 1948 年糾偏時期，我們就看到中共把貧農團份子，分成好的與壞的，前者可以被吸收入黨，後者則成為土改過左錯誤的代罪羔羊。

1948 年底，解放軍準備進入北平。時任北平市委書記，並將於 1951 年接任北京市長的彭真訓示負責接管北平的幹部，當前必須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接管北平，不要急著推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度，因為「在工人、農民不敢講話的情況下，民主容易被流氓與反革命份子利用」。³³ 當然，這不是說不要動員群眾了，中共早晚也會重施「一打一拉」的故技，發動下層群眾鎮懾上層份子，使後者像毛驢或羊般

31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pp.17-21.

32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 499.

33 彭真，〈掌握黨的基本政策 作好入城後的工作〉（1949/01/06），北京市檔案館等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48-1949》（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頁 70。

「供我驅使」。³⁴ 但當時彭真更擔心的是廣大的下層群眾。他認為北平的工農群眾，對中共並沒有深刻的了解，成份複雜，兼之國民黨殘留特務採取「左」的口號煽動群眾，如果立即大張旗鼓動員群眾，可能反而引起大亂。³⁵ 因此，中共最後決定重拾老辦法，從積極份子找起，再慢慢地教育、組織群眾，按部就班地去做。一年以後，中共對群眾的再教育收到成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當時北京市委鼓勵群眾自願不勉強地放棄年終獎金，事實上許多工人是被迫自願地放棄，他們說：「共產黨真有辦法，叫你自己打自己，還得自己叫好。」³⁶ 這就是中共群眾運動的極致。雖然此一「偏差」隨即被糾正，但據彭真該年下半年的報告，工人還是「自願」地降低工資，以協同資方渡過目前難關。³⁷ 由此可見，群眾動員不僅有助於中共控制上層統戰，也使群眾自身成為中共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

本文並不打算也不可能去處理中共建國後北京市或河北黨的概況。在這裡，筆者只是想指出，中共即使在建國後，依舊將其統治建立在一個被斷斷續續的群眾運動所分化的社會之上。學者 Pitman B. Potter 以為彭真是依賴正規的國家與法律體制去加強黨的領導，乃至於把彭真與代表群眾動員路線的毛澤東對立起來，³⁸ 根本忽略了共產

34 〈北京市軍管會物管會接管工作總結報告〉（1949/04/16），《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48-1949》，頁 413。

35 彭真，〈關於進城初期的敵情和群眾動態向毛主席並總前委、華北局的報告〉（1949/02/16），《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48-1949》，頁 147-148。

36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年終雙薪或獎金問題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50/01/20），《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50》，頁 21。

37 〈在北京市第二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50/08/10），《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50》，頁 402-403。

38 Pitman B. Potter,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革命中「民主」與「集中」兩者間的辯證關係。事實上，這也是西方學者普遍持有的看法，如前述的 Mark Selden 等人關於冀中五公村或 Ralph A. Thaxton 關於南樂千佛村的研究便認為，在國共內戰時期的土改過後，中共暫緩了破壞性的階級鬥爭，致力於恢復穩定的秩序，及社會的團結。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學者日後進一步的論證。但當時有些人恐怕不贊同這種說法，並向主持北京市政的彭真質疑，中共建國以來繼續推動的土改會否太激烈了？彭真在 1951 年即回答說：「這樣偉大的（土改）鬥爭不要鬥爭是不可能的，而且歷來的鬥爭都是很激烈、很凶猛的」；針對那些反對用鬥爭方式分地主土地的說法，彭很不客氣地說：「這樣已經是和平的了，再和平就沒有了」，「就不用搞土地改革了」。³⁹ 三谷孝在 1980 年代帶了一批日本學者前赴北京順義縣沙井村等 1930、1940 年代滿鐵曾經調查過的村莊參訪，雖然村民也籠統地告訴他們，中共建國以後北京近郊的農村土改沒有什麼大的鬥爭，但調查結果卻告訴了我們，土改時期村莊被劃分為貧、富兩個群體，此一界線，一直持續到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以後。⁴⁰ 最後還是證明，中共是將其政權建立在一個分化的社會之上，一個依據中共階級鬥爭意識形態被撕裂的社會。

Press, 2003), pp. 59-94.

39 〈關於三大運動的一些問題〉（1951/11），《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51》，頁 533-534。

40 三谷孝編，《中国農村変化と家族・村落・国家—華北農村調査の記録》（東京：汲古書院，1999），頁 27-29。

徵引書目

一、檔案

河北省檔案館典藏資料

- 611-1-6，〈關於視導各區黨務工作情況向中組部的報告〉。
- 611-1-17，〈河北省黨部及各督導區關於建立組織情況的報告〉。
- 645-1-36，〈河北省立大名師範學校一覽〉。
- 680-4-2596，〈長蘆區官鹽銷數暢滯原因〉。
- 680-4-2607，〈本邦工業鹽自給政策上北支鹽業開發重點之經濟的理由〉（1938）。
- 680-6-1050，〈長蘆鹽區改良鹼地委員會第一次幹事會議紀錄〉（1935/11/14）。
- 680-6-1050，〈長蘆鹽區改良鹼地委員會暫行組織章程〉。
- 680-6-1050，〈據查報冀魯豫等省查禁硝土鹽工作應分別切實推進令仰籌議辦理具報由〉（1935/11/01）。
- 680-6-1060，〈大名區技術分處工作報告（自3月24日起至5月20日止）〉。
- 680-6-1062，〈滄縣、鹽山兩縣改良鹼地推廣植棉報告書〉（1936/07/13）。
- 680-6-1064，〈武強區技術分處九月份工作報告〉（1936/09/30）。
- 680-6-1064，〈爲呈復武邑縣點軍村等處棉籽不發芽情形仰祈鑒核示遵由〉（1936/09/23）。
- 680-6-1070，〈大名技術分處七月份工作報告〉（1936/07/22）。
- 680-6-1096，〈大名區技術分處二十六年五月份工作報告〉（1937）。
- 680-6-1111，〈改良鹼地植棉須知〉（1936/01）。
- 680-6-1112，〈長蘆區改良鹼地經過事略〉。
- 680-6-1115，〈各縣土鹽產量估計表〉（1938年7月製，根據事變前長蘆鹽務管理局附設改良鹼地委員會調查）。

- 680-6-1142，〈二十六年度改良鹼地工作進行計劃(技術會議紀錄)〉(1936/11)。
- 680-11-298，〈長蘆稽核分所片函據緝私第四大隊呈報饒陽縣村民聚眾阻撓緝私毆打官兵請飭縣究辦等情抄送原呈請飭縣究辦呈報〉(1934/01/11)。
- 680-11-298，〈商人永泰呈為私硝充斥官鹽滯銷懇恩偵查滯銷根源設法嚴禁以維稅收而保商業〉(1933/10/23)。
- 680-11-298，〈商人永泰呈為梟匪益形猖獗聚眾毆傷緝私官兵官引幾成廢弛續再呈明懇恩准密派廉明幹員前往查行縣拘辦並平毀硝池以免效尤〉(1934/01/06)。
- 680-11-298，〈據商人義昌店呈大城青縣硝鹽甚熾請轉飭各縣長派警協緝由〉(1933/12/30)。
- 680-11-299，〈為第五大隊第一分隊前赴河間查緝硝私所獲鹽犯被迫獲釋請飭縣依法究辦〉(1934/02/06)。
- 680-11-328，〈為磁縣緝私兵力單薄祈准續調稅警並令縣協助以維稅銷由〉(1934/06/01)。
- 680-11-338，〈為呈報遵令布告嚴禁硝匪聚眾並轉令公安局查明制止各情形請鑒核備查由〉(1934/06/25)。
- 680-11-739，〈緝務會議紀錄〉(1934/05/11)。
- 680-11-740，〈硝鹽會議大會紀錄〉(1934/07/3-5)。
- 680-11-741，〈交議提議各案暨報告調查事項草案〉(1934/06/29)。
- 680-11-741，〈河間萬慶餘對硝鹽會議擬具議案〉(1934/06/28)。
- 680-11-741，〈財政部長蘆鹽務稽核所稅警第七區整頓硝私提案〉(1934/06/26)。
- 680-11-742，〈呈報硝鹽情形及整理進行辦法仰祈鑒核〉(1934/10/30)。
- 680-11-742，〈呈請將救濟戰區公債改為救濟河北農村之用仰請鑒核轉請立法院核議施行〉(1935/01)。
- 680-11-742，〈財政部長蘆鹽運使署鹽務稽核分所公函〉(1934/08)。

- 680-11-742，〈據雞澤縣縣長代電陳報該縣地方硝鹽情形詳加體察似應妥籌根本解決辦法以消弭各縣永久糾紛函請核辦見覆〉(1934/07/30)。
- 680-11-742，〈擬具冀西南硝地整理計劃呈請諮商辦理並令示祇遵〉(1935/01/08)。
- 680-11-742，〈函爲准函據雞澤縣長陳明禁止硝鹽兩項計劃窒礙難行經擬訂禁止復請查照由〉(1934/08/20)。
- 680-11-743，〈財政部長蘆鹽運使署、鹽務稽核分所會呈財政部鹽務署總所呈文政字第五六八號〉(1935/03/19)。
- 680-11-743，〈稅警局長張中立報告書〉(1935/02/15)。
- 680-11-743，〈調查冀省產硝土鹽各縣報告〉(1935/04)。
- 680-11-744，〈呈文政字七〇〇號〉(1935/08/16)。
- 680-11-744，〈爲函復查禁各縣硝土鹽治標治本方法鈔錄出產硝土鹽各縣之名清單請察照知由〉。
- 680-11-744，〈遵部令會同考察冀南各縣鹼地情形暨擬具改良方案仰祈鑒核施行由〉。
- 680-11-746，〈長蘆鹽區改良鹼地委員會一年來工作情形概略〉(1936/12)。
- 680-11-747，〈整理鹽務討論會會議提案〉(1934)。
- 680-11-765，〈委員李佩恩呈長蘆鹽運使署〉(1934/06/18)。
- 680-11-765，〈財政部河南督銷局鹽務稅收總局致長蘆鹽運使署公函督字第四三三號〉(1934/06/14)。
- 680-11-771，〈呈報調查職區硝土鹽產製情形並造送圖表硝土鹽樣仰祈鑒核轉由〉(1934/10/09)。
- 680-11-771，〈呈復奉令飭查七區硝鹽情形仰祈鑒核由〉(1934/11/02)。
- 680-11-771，〈長蘆鹽務稽核所稅警局第六區調查硝私事項表〉(1935/03)。
- 680-11-771，〈稅警第八區調查硝私事項表〉(1934/11)。
- 680-11-959，〈五中全會改革鹽政兩提案原文〉。
- 680-11-959，〈呈爲謹在瀝陳實行新鹽法關於長蘆之稅收私鹽灘產皆與國計民生有絕大關係引懇慎加考慮由〉(1935/03/25)。

- 680-11-959，〈爲五中全會議決新鹽法二年完成困難實多謹臚列長蘆情形祈准收回成命〉(1935/01/05)。
- 680-11-959，〈鈔山東東綱公所快郵代電〉(1935/02/19)。
- 680-11-960，〈爲覆送私鹽稽查線圖說祈核轉由〉(1935/03/07)。
- 680-11-1462，〈鹽稅與財政及地方治安之關係〉。
- 680-26-99，〈督察員劉伯揚呈爲據報調查大名一帶八大隊駐防緝私情形〉(1932/10/04)。
- 680-26-99，〈調查員馮毓良呈報調查情形〉(1932/08/16)。
- 680-26-99，〈調查員馮毓良報告8月5日至12日調查完竣情形〉(1932/08/12)。

臺灣法務部調查局典藏資料

- 052.1/7432/60986，〈濮陽通訊〉(1932/07/25)，《北方紅旗》，期10。
- 052.1/804/16093 n.9，中央組織局，〈臨時通知(不列號)〉(1932/04/05)，《黨的建設》，期9(1932/04/20)。
- 052.1/809/2777 v.1-2，〈中央政治通訊〉，期16。
- 052.1/809/V.1-2，〈中央通信〉，期14。
- 052.1/816/15959 n.11，中共冀熱邊特委，〈堅持〉(1944/08/10)。
- 052.4/732/16737 n.1，〈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是怎樣創造起來的〉，《八路軍軍政雜誌》，創刊號(民國28年1月15日)。
- 255.31/803/11399，〈山西特委對十一師工作決議〉(1931/05/13)。
- 255.35/809/9302，〈天津來往信件登記〉。
- 294.902/421/5594，〈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1942/11/17-18)。
- 575.29/815/7065，中央調查統計局，〈冀察熱邊區概況〉。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資料

- 一般 230/1502，〈路友于傳〉。
- 一般 535/12，〈河北省政府委員兼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丁樹本從政抗敵報

告書)。

部 10957,〈直隸省農民部工作報告〉(1927/03/05)。

部 10958,〈直隸省之農民反抗運動(1926年12月~1927年3月)〉。

部 10999,〈北京特別市黨部工人部五月份報告〉(1927/07/04)。

會 3.3/176.42,〈平津黨務整理意見書〉(1931/04)。

會 3.3/176.44,〈平津冀黨務視察總報告〉(1931/07/10)。

漢 12917,〈京津黨部駐漢辦事處致中央黨部報告〉(1927/07/02)。

漢 12975,〈天津青年團國民俱樂部報告〉(1924/01/10)。

漢 9165,〈北京黨員王文彬等呈總理文〉(1924/07/0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蒐藏之全國經濟委員會檔

26-01-39,土地委員會,〈鹽區土地調查報告〉(1935/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蒐藏之鹽務檔

S-02-69-(1),〈民國十八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

S-02-69-(2),〈民國十九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

S-02-69-(3),〈民國二十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

S-02-70-(1),〈民國二十一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

S-02-70-(2),〈民國二十二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

S-02-70-(3),〈民國二十三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

S-02-70-(4),〈民國二十四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

S-02-71-(1),〈民國二十五年鹽務稽核總所年報〉。

S-02-71-(2),〈民國二十六年鹽務總局年報〉。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el S348, file S9440-3,〈北平特別市黨部ノ紛糾ト對電車大暴動ノ經過〉

(昭和4年12月)。

二、報紙、期刊

《大公報》，天津。

《民國日報》，上海。

趙世炎主編，《政治生活》，期 20。北京，1924 年 11 月 7 日。

三、史料彙編

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1986。文中引用之《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簡稱為《山東檔案》。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2。文中引用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簡稱為《中央文件》。

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1–1999。文中引用之《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為《河北文件》。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3–1984。文中引用之《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為《河南文件》。

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文中引用之《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為《湖北文件》。

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文中引用之《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為《廣東文件》。

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9。

中央檔案館等編，《華北大掃蕩》。北京：中華書局，1998。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7–1933）》。北京：中共中央

- 黨校出版社，1983。
- 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雛型——華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
- 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 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 綜合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2002。文中引用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簡稱為《國際檔案》。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 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安徽現代革命史資料長編》，卷2。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冀熱察解放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長城線上無人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東抗日暴動》。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順直省委》。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熱河解放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東土地制度改革》。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東武裝鬥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南歷史文獻選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黨史人物(-)》。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4。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
-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2。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編輯組，《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輯1。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
-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等編，《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第2編 第5冊》。臺北：正中書局，1975，第三版。
- 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 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的足跡——北大地下黨有關史料選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北京市檔案館等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
- 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鄉村經濟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 沈雲龍主編，《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依據1927年京師警察廳編譯會所編版本影印出版。
- 河北省稅務局等編，《華北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鹽務史資料選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

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委會冀熱遼分會編，《冀熱遼報告(一)》。出版地不詳：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輯部，1982。

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委會冀熱遼分會編，《冀熱遼報告(二)》。出版地不詳：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輯部，1983。

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史研究編輯室，《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文獻·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農業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

四、專書

丁龍嘉、張業賞，《王盡美》。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丁龍嘉、張業賞，《鄧恩銘》。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史（1920—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卷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關山渡若飛：王若飛百年誕辰紀念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中共井陘礦務局委員會，《石家莊黨史資料 輯5 井陘煤礦工人鬥爭史》。石家莊：出版者不詳，1987。
- 中共天津市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天津市組織史資料》。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1。
- 中共天津市紅橋區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紅橋黨史資料彙編》。天津：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7。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北京抗戰圖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東（冀熱遼）革命根據地黨史大事記》。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 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魯西北革命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
- 中共湖北省孝感地委、孝感市委黨史資料徵編委員會辦公室編，《胡錫奎紀念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選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9。
- 中國鹽業總公司編，《中國鹽業史 近代當代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王健英，《中國紅軍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 王鴻賓等主編，《東北人物大辭典》。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2。
-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玉田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玉田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 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吉合口述，徐建源、韓光整理，《我的革命生涯》。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
- 安作璋主編，《山東通史 現代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
-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 民國上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朱志敏，《李大釗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 朱德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東京：蒼蒼社，1983，第二版。
- 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補卷》。東京：蒼蒼社，1984。
- 西村成雄著，曾淑卿譯，《張學良「滿洲」與日中之霸權》。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 吳林泉、彭飛，《草嵐春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呂正操，《論平原游擊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1994。
- 宋柏主編，《北京現代革命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赤峰市元寶山區政協文史資料，《韓麟符》。北京：華齡出版社，1993。
- 赤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赤峰市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孟伯謙，《回向人道》。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
- 河北大學地方史研究室、政協高陽縣委員會，《河北文史資料 輯 19：高陽織布業簡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省志：鹽業志》。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
- 姚依林，《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 洪家祿編，《大名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依據民國 22 年版影印。
- 唐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唐山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 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 郝維民主編，《內蒙古革命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
- 馬先陣等編，《西北軍將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張子豐、張英甫，《河南省火硝土鹽之調查》。出版地不詳：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1932。
-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 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

- 張靜如編，《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梁斌，《紅旗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 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
-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第4版。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79。
- 陳森甫，《西北軍建軍史》。臺北：春秋雜誌社，1975。
-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
-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
- 陳潭秋文集編輯組，《陳潭秋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2。
- 喀喇沁旗志編纂委員會編，《喀喇沁旗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馮文綱等著，《一代名將——彭雪楓傳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 楊雲慧，《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
-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 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 廖永武，《天津現代革命運動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 趙潤生、馬亮寬，《辛亥灤州兵諫與灤州起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香港：中國出版社，1947。
- 劉伯承，《一二九師一九四一年軍事工作總結報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1。
- 劉道華、黃小同編，《中共北方區黨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遷西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遷西縣志》。北京：中國科學科技出版社，1991。
- 鄭超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 冀中軍區，《爭取聯莊會經驗教訓》。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0年5月。
- 冀南革命鬥爭史編審委員會編，《冀南革命鬥爭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 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史研究會編，《冀熱遼子弟兵，1937-1945》。唐山：冀熱遼人民抗日鬥爭史研究會，1991。
- 穆欣，《續範亭傳》。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 穆欣，《陳賡大將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薊縣志編修委員會編，《薊縣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 薛鳳旋，《北京：由傳統國都到社會主義首都》。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6。
- 瞿秋白選集編輯組，《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魏宏運主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

魏宏運主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社會調查與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

龔子同等著，《中國土壤系統分類》。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五、論文

〈晉察冀日報新聞烈士名單〉，《新聞與寫作》，2005年第9期。北京，2005。

〈羅章龍教授談唐山、開灤五礦罷工〉，《黨史研究資料》，輯1。成都，1982。

K. B. 舍維廖夫提供，〈張國燾關於中共成立前後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北京，2002年2月。

于學忠，〈東北軍討伐石友三的戰爭〉，《文史資料選輯》，輯6。北京，1960。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抗戰期間中共平、津、唐點線工作委員會組織發展概況〉，《中共黨史資料》，輯18。北京，1986。

中共南宮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一九三八年南宮縣六離會事件始末〉，《河北黨史資料》，輯6。石家莊，1986。

牛清明，〈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四軍創建始末〉，山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西革命回憶錄》，輯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王夫，〈冀中星火〉，《河北革命回憶錄》，輯6。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84。

王志遠，〈博蠡地區的建黨和農民運動〉，《河北文史資料》，輯2。石家莊，1981。

王啓明，〈回憶山西軍官教導團地下黨的活動〉，山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西革命回憶錄》，輯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王衛國，〈尋覓，問英魂何處〉，《新聞與寫作》，2010年第7期。北京，2010。
- 王積衡，〈回憶大革命時期我在天津的一段經歷〉，《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3。天津，1983。
- 王積衡，〈江浩先生革命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3。天津，1983。
- 丘政權，〈察哈爾抗日前三年間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民國檔案》，1990年第1期。南京，1990年2月。
- 司呈祥，〈參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動的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10。天津，1980。
- 市地名辦公室，〈育德中學的革命活動〉，《保定文史資料》，輯1。保定，1984。
- 安子文，〈我的一段經歷〉，《革命史資料》，輯1。北京，1980。
- 何智霖，〈閻錫山策調客軍出山西省境史料選錄〉，《國史館館刊》，復刊第33期。臺北，2002年12月。
- 佛鼎，〈內蒙古革命的發生、發展簡況〉，人民出版社編輯，《革命回憶錄》，輯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吳蕤，〈民初鹽政之產銷與徵權〉，《鹽務月刊》，期48。臺北，1973年9月。
- 呂職人，〈于方舟同志革命的一生〉，《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23。天津，1983。
- 完縣黨史辦公室整理，〈完縣五里崗暴動〉，《河北黨史資料》，輯2。石家莊，1985。
- 李君山，〈論一九三三年之「察馮事件」——以「軍閥政治」觀點之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期60。臺北，2004年5月。
- 李德明，〈余澤鴻〉，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17。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 李騰俊等著，〈江浩〉，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

- 2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 阮玄武，〈方振武的生平〉，《安徽文史資料》，輯 20。合肥，1984。
- 味根，〈取締硝土鹽與改良鹼地〉，《鹽業與鹽工》，期 8。臺北，1975 年 8 月。
- 河北省南皮縣檔案館編，〈《張隱韜烈士日記》連載(-)〉，《歷史檔案》，1988 年第 3 期。北京，1988 年 8 月。
- 胡華，〈蕭鳴〉，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 2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 唐永良，〈商震歷史概述〉，《文史資料選輯》，輯 8。北京，1960。
- 耿傳明，〈植根鄉土的「革命敘事」——紅旗譜與二十世紀鄉土中國的革命〉，《北方論叢》，2004 年第 6 期。哈爾濱，2004 年 11 月。
- 馬芳庭，〈蹉跎歲月裡的戰鬥〉，山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西革命回憶錄》，輯 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馬輝之，〈回憶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前後〉，《中共黨史資料》，輯 4。北京，1982。
- 馬輝之，〈白區工作局部情況的回憶〉，《河北黨史資料》，輯 1。石家莊，1985。
- 高文華，〈抗戰前夕的河北省委〉，《河北黨史資料》，輯 2。石家莊，1985。
- 張秀岩，〈往事回憶〉，《河北文史資料》，輯 8。石家莊，1981。
- 張明遠，〈玉田一帶農民運動的回憶〉，《天津歷史資料》，期 1。天津，1964。
- 張明遠，〈有關玉田農民暴動幾個問題的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23。天津，1983。
-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輯 7。北京，1960。
- 張培剛，〈冀北察東三十三縣農村概況調查〉，《社會科學雜誌》，卷 6 期 2。北京，1935 年 6 月。
- 梁金保、景占魁，〈激流勇進——記前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劉天章〉，山西省

- 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山西革命回憶錄》，輯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 梁金保等著，〈賀名播幽燕——記青年革命活動家賀昌同志〉，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山西革命回憶錄》，輯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 陳永發，〈從 Ralph Thaxton 的研究論抗日時期中共在太行山區及其附近的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3。臺北，1984年6月。
- 陳永發，〈內戰、毛澤東和土地革命：錯誤判斷還是政治謀略？〉，《大陸雜誌》，卷95期1-3。臺北，1996年1-5月。
- 陳玉梅、林宜昭，〈你每天吃多少硝酸鹽？〉，《康健雜誌》，期17。臺北，2000年2月1日。
- 陳華魯，〈趙鎔〉，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15。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 陳耀煌，〈路線之爭？——中共湖北省委事件（1927-1928）〉，胡春惠、吳景平主編，《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變遷》。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香港：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
- 陳耀煌，〈中共閩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1927-1931）〉，《國史館學術集刊》，期4。臺北，2004年9月。
- 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8。臺北，2010年6月。
- 陳豔紅，〈對路友于的評價之辨正〉，《北京黨史》，1996年第3期。北京，1996。
- 焦實齋，〈新中學會與新中革命青年社〉，《文史資料選輯》，輯119。北京，1989。
- 項瑞芝，〈記一九二五年砸裕大事件的前前後後〉，《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10。天津，1980。
- 楊獻珍，〈入草嵐子監獄前後〉，《革命史資料》，輯1。北京，1980。
- 趙憲、王德琦整理，〈紅二十四軍的創建和阜平蘇維埃始末〉，《河北黨史

- 資料》，輯 5。石家莊，1986。
- 劉清揚，〈回憶建黨初期黨領導北方人民進行的英勇鬥爭〉，《河北文史資料》，輯 2。石家莊，1981。
- 劉清揚，〈辛亥革命時期的天津共和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六）》。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 樂天宇，〈大革命時期張家口地區革命活動的回憶〉，《河北文史資料》，輯 8。石家莊，1981。
- 鄧哲熙，〈韓、石叛馮和閻、馮聯合反蔣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輯 1。北京，1960。
- 諶小岑，〈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天津覺悟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 謝曉雲，〈亞硝酸鹽、防腐劑、色素：熱狗裡藏著致病危機？〉，《康健雜誌》，期 60。臺北，2003 年 11 月。
- 羅健，〈西安事變前後的黎天才〉，《抗日戰爭研究》，2000 年第 3 期。北京，2000 年 8 月。
- 羅章龍，〈緬懷早期北方工人運動的幾位戰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29。天津，1984。
- 羅章龍，〈憶太雷同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回憶張太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蘇旭、黃占江、沙友林，〈張兆豐烈士生平〉，《河北文史資料》，輯 8。石家莊，1981。
- 蘇梅口述，雲平、京雲整理，〈平西根據地宛平縣的初創與魏國元同志〉，《門頭溝文史》，輯 2。北京，1993。

六、外文資料

- Atwood, Christopher P.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Leiden: Brill, 2002.

- Averill, Stephen C.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y."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Benton, Gregor.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6.
- Bianco, Lucian.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Chen, Yung-fa and Gregor Benton. *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Critique*.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86.
- Chesneaux, Jea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Ch'i, Hsi-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Dirlik, Arif.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Dorris, Carl E.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8 (Dec., 1976), pp. 697-719.
- Dryburgh, Marjorie. *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3-1937: Regional 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Richmond: Curzon, 2000.
-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Esherick, Joseph W.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7, No. 4 (Oct., 1981), pp. 387-411.
- Esherick, Joseph W.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Feng, Chongyi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0.
- Friedman, Edward, Mark Selden and Paul Pickowicz.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Friedman, Edward, Mark Selden and Paul Pickowicz.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amble, Sidney D. *Peking: A Social Survey Conduc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in China and the Peking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1.
- Goodman, David S. G.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0.
- Grigoriev, Alexander M. "The Far Eastern Bureau of the ECCI in China,

- 1929-1931.” In Mechthild Leutner et al., ed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 Grove, Linda. *A Chinese Economic Revoluti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 Hartford, Kathleen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9.
- Hartford, Kathleen. “Fits and Starts: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ural Hobei, 1921-1936.”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 Hershatter, Gail.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Hofheinz, Roy, Jr.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 In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 Hofheinz, Roy,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Issacs, Harold R. and Albert Treint. “Document 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5 (Jan.-Mar., 1971).
-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Keating, Pauline.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uo, Tai-chün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 Li, Huaiyin.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i, Huaiyin.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 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Little, Daniel.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Liu, Chang.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i Delta*.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Myers, Ramon H.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Nathan, Andrew J.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Pepper, Suzanne.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

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Perry, Elizabeth J.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Pomeranz, Kenneth.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Potter, Pitman B.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aich, Tony.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 1994).
- Saich, Tony, e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E. J. Brill, 1991.
- Schoppa, R. Keith. "Contour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a Chinese County, 1900-195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4 (Nov., 1992).
- Schoppa, R. Keith. *Revolution and its Pasts: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2002.
- Schrecker, John 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Schwarcz, Vera.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cott, James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elden, Mark.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Selden, Mark.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 Sheel, Kama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mith, Stephen A. *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 Richmond: Curzon, 2000.
- Stranahan, Patricia.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
- Strand, Davi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Thaxton, Ralph A.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haxton, Ralph A.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Thaxton, Ralph A.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van de Ven, Hans J. *From Friend to Com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van de Ven, Hans J.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 Van Slyke, Lyman P.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7.
- Wakeman, Frederic, Jr.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Weigelin-Schwiedrzik, Susanne. "What is Wrong with Li Dachao?"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 Wilbur, C. Martin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Wou, Odoric Y. K.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Zhang, X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Henan, 1900-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三谷孝編，《中国農村変化と家族・村落・国家—華北農村調査の記録》。東京：汲古書院，1999。
- 片岡一忠，《天津五四運動小史》。京都：同朋舎，1982。
- 木下壽男，〈承德、平泉ヲ中心トスル熱河 喜峰口古北口ヲ起點トスル北支比較農業調査報告〉（1934/05），黑龍江省檔案館編，《滿鐵調査報告（第一輯）11》。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5。
- 支那問題辭典編輯部，《支那問題辭典》。東京：中央公論社，1942。
- 天津地域史研究会，《天津史—再生する都市のトポロジー》。東京：東方書店，1999。
- 田原史起，《現代中国農村における権力と支配》。東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1999。
- 石川禎浩，《中国共産党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
- 永野，〈京奉沿線に於ける労働運動の趨勢〉，《滿鐵調査時報》，卷9號5。大連，1929年5月。

- 江口圭一編著，《資料日中戦争阿片政策—蒙疆政権資料を中心に—》。東京：岩波書店，1985。
-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1928-37年》。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7。
- 長野朗，《土匪、軍隊、紅槍會》。東京：支那問題研究所，1931。
- 東亞同文會，《中國省別全誌 第十八卷 直隸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20。
- 馬場毅，《近代中国華北民眾と紅槍会》。東京：汲古書院，2001。
- 冀東地區農村實態調查班，《第一回冀東地區內選擇農村實態調查概要報告書》。天津：冀東地區農村實態調查班，1936。

人名索引

C

Cohen, Paul A. / 1

D

Dorris, Carl E. / 288

Duara, Prasenjit / 1,3,5,151

E

Esherick, Joseph W. / 6,10,23

G

Gamble, Sidney D. / 29,51,90

Goodman, David S. G. / 26,27,288,289

Grove, Linda / 152,153,197

H

Hartford, Kathleen / 26,81,152,167

Hofheinz, Roy, Jr. / 25-27

J

Johnson, Chalmers A. / 369

K

Keating, Pauline / 288,339

M

Meisner, Maurice / 26,27,80

P

Pepper, Suzanne / 369,434

Pomeranz, Kenneth / 2,3,5

Potter, Pitman B. / 467

S

Schoppa, R. Keith / 7,288

Scott, James C. / 230

Selden, Mark / 8-10,23,152,283,284,
287,289,290,338,339,364,367,370,
372,373,381,383,435,445,448-451,
465,468

Stranahan, Patricia / 81,82,152,153

Strand, David / 42,150,455

T

Thaxton, Ralph A. / 1,3,5,7-11,21-23,
227,229,230,244,247,248,251,256,
258,265,274,283,289,364,367,368,
370,448,458,465,468

V

van de Ven, Hans J. / 11,455,465

Van Slyke, Lyman P. / 364

W

Wou, Odoric Y. K. / 363,367,448,449

二畫

丁君羊 / 85
 丁恩 / 250
 丁振軍 / 316
 丁惟汾 / 42,46,65,66,118
 丁樹本 / 284,285
 卜錫珺 / 71

三畫

三谷孝 / 468
 于方舟（于蘭渚） / 31-34,54,78
 于澄 / 199
 于學忠 / 211
 于樹珊 / 33
 于樹德 / 33,39-41,46,54,66,91,95,118
 于蘭田 / 33,162
 才山 / 403

四畫

丹巴道爾吉 / 85
 孔原 / 221,294,295,304
 孔祥禎 / 164
 孔慶同 / 316
 尹才一 / 100
 尹寬 / 44
 支應遴 / 200
 方振武 / 67,68,214,218-220
 毛毓泳 / 33
 毛澤東 / 4,8,26,29,88,225,226,305,309,
 312,313,318-323,333,354,372,375,
 382,383,393,395,408,409,435,439,
 462,464,467
 牛清明（牛清玉） / 201-203
 牛樹才 / 412,441,444
 王一飛 / 68

王乃寬 / 33
 王子凡 / 298
 王子清 / 124,137,138,141,177,270
 王元昌 / 85
 王文田 / 33
 王平 / 320
 王平陸（高永祥） / 296,297,299,305
 王永錄 / 33
 王仲一（王振翼） / 92,94,98,100,104,
 133
 王仲華（董毓華） / 311,315
 王光祈 / 28
 王光華（郭杰） / 273
 王成奎 / 104
 王克興 / 336
 王志遠 / 146,191
 王沛南（王霖） / 216,219
 王育民 / 286
 王其彭 / 71
 王定南（王作賓） / 160,207
 王明 / 4,5,20,152,155,158,166,222,225,
 309,457,458
 王松亭 / 137
 王法勤 / 38,66
 王者興 / 33
 王近瑞 / 140
 王金銘 / 36
 王青士 / 157
 王俊 / 48
 王俊賢 / 33
 王卻三 / 77
 王建國 / 336
 王若飛（黃敬齋） / 208
 王若僖 / 310,362
 王貞儒 / 33
 王振華 / 72,140

王常明 / 338
 王從吾 / 262,263,265,268
 王荷波 / 87,92
 王富國 / 33
 王斐然 / 55
 王森桂 / 192
 王翔千 / 42
 王逸倫 / 386,435
 王鈞 / 33
 王開基 / 33
 王雅堂 / 160
 王順興 / 257
 王葆真 / 36,38,47
 王盡美 / 42
 王維綱 / 181,182
 王銀山 / 257
 王鳳齋 / 192
 王德振 / 93
 王德萊 / 33
 王樂平 / 41,42,65,118
 王積衡 / 39
 王興 / 168
 王錫疆 / 71
 王濟眾 / 33
 王鴻訓 / 33
 王蓋臣 / 69,92
 王識行 / 33
 王耀郁 / 71
 王藻文 / 88,91-95,97,98,100,101,104,
 115,116,129,136,454
 王巍 (朴一禹) / 336
 王麟書 / 49

五畫

加拉罕 / 58,59
 包悅卿 / 61

包惠僧 / 30,51
 包森 (趙寶森) / 319,330,331,336,344,
 356
 司呈祥 / 54,93
 史文彬 / 48
 史可軒 / 66
 史名溢 / 168
 史達林 / 4
 布勃諾夫 / 59
 平杰三 / 165
 田秉和 (田園) / 269
 田原史起 / 390
 田順德 / 192
 田維勤 / 64
 田誦堯 / 33
 白之鈺 / 110,113
 白永倫 / 85
 白庭桂 / 33
 白堅武 / 37,53
 白雲梯 / 61-63,85,101
 白毓崑 / 35,36,38,39,47
 石之琳 / 33
 石友三 / 162,178,179,201,375
 石本權四郎 / 211
 石原莞爾 / 169
 石振東 / 404,405
 石學曾 / 71
 石覺 / 429

六畫

伍晉南 / 324,328,329
 伏龍芝 / 59
 任弼時 / 313
 任曙 / 207
 光田剛 / 225,226,283
 吉合 / 208

- 吉鴻昌 / 163,209,214,217-220
 向忠發 / 98,109,151,155
 向警予 / 86
 多松年 / 34
 安子文 (安志翰, 徐子文) / 163
 安志成 / 71
 安幸生 / 31,32,54
 安毓文 / 33
 安鍾英 / 33
 安體仁 / 95
 安體誠 / 30,40,41,54,95
 成蓬嵐 / 33
 曲步霄 / 162
 朱老忠 / 196
 朱其文 / 326,335
 朱林森 / 124
 朱欣陶 / 310
 朱家寶 / 17
 朱家驊 / 310
 朱務善 / 30
 朱培德 / 199
 朱理治 / 303
 朱漢章 / 33
 朱德 / 44,311,313,319,322,323,334,409,
 427,428,431,434
 朱錦棠 / 86,87,93,98
 朱鶴洲 / 33
 江浩 (江注源) / 38,39,46,66-68,76,91
 江震寰 / 39
 江韻清 / 39
- 七畫**
- 佛鼎 / 63
 何孟雄 / 30,69,156
 何雪 / 33
 何資深 / 30
- 何應欽 / 17,211,212,245
 佟麟閣 / 213
 余澤鴻 (曉野) / 147,148,160
 吳化之 (吳化梓) / 159,163,207,208
 吳正庭 / 140,144
 吳成方 / 210
 吳廷康 (魏金斯基) / 27,37,39,52,56
 吳佩孚 / 19,52,53,56-58,326,455
 吳新民 / 33
 吳殿三 / 78
 吳瑞燕 / 33
 吳祿貞 / 36
 吳滿有 / 372
 吳德 / 306,432,445-447
 吳寶華 / 71
 吳耀禮 / 202
 呂正操 / 312,313,319,320,409
 呂建齋 / 33
 呂培烈 / 33
 呂職人 / 79,162,218
 宋乃明 / 33
 宋子文 / 244,248,251
 宋介 / 30
 宋洛曙 / 191,194
 宋哲三 / 105
 宋哲元 / 17,200,211,213,219,245
 宋時輪 / 314,318-321,460
 宋維新 (穆維新) / 294
 李九思 (李劍森) / 178,182
 李大山 / 72,73
 李大釗 / 5,18-20,25,26,28,30,35-41,43,
 45-47,52,53,56-58,63-66,68,69,77,
 79,80,82,83,90,91,96,98,101,103,
 106,110,114,116,118,150,153,166,
 202,225,293,294,454,456
 李大章 / 304

- 李子光 / 335
李子芳 / 116
李子芬 / 119
李中權 / 394, 403, 412
李丹山 / 85
李予昂 / 115, 136
李仁 / 168
李天民 / 168
李太黑 / 259
李生達 / 136, 202
李石曾 / 66
李立三 / 4, 5, 100, 130-132, 134, 135, 147-149, 153-156, 209, 225, 454, 457
李任權 / 33
李吉辰 / 118
李有祿 / 137
李竹聲 (李致竹) / 166
李老正 / 270
李希逸 (李廉祺) / 31, 33, 103, 105, 114, 161, 162, 167, 168, 210
李季達 / 57, 83
李延瑞 / 159, 161, 163
李延齡 / 33
李昌榮 (李友才) / 159, 161, 164
李欣然 / 181
李師同 / 33
李海青 / 216, 217
李烈鈞 / 213
李素若 / 113, 123
李國暄 / 30
李國瑜 / 167
李培良 / 31, 54
李梅 / 33
李梅五 / 456
李梅羹 / 30
李富春 / 67, 71, 434
李斌 / 55
李景林 / 54, 112
李景漢 / 76, 297
李渤海 (黎天才) / 69, 167, 168, 210
李發鈞 / 33
李萃 / 33
李菁玉 / 270-272, 285, 305
李華生 (畢根) / 271, 272
李楚離 / 112, 164, 311, 313, 315, 321, 330, 331, 344, 347, 395, 403, 412, 425
李葆華 / 294, 296
李運昌 (李芳歧) / 104, 105, 164, 305, 306, 315, 316, 318, 319, 321, 330, 331, 337, 345, 385, 392, 394, 395, 400, 403, 408-410, 413-415, 424
李達 / 454
李漢俊 / 47
李維周 / 336
李維漢 / 71
李德威 / 167
李德貴 / 93, 94, 105, 115
李德蔭 / 71
李樂三 / 118
李毅韜 / 38
李震五 / 33
李震瀛 / 38
李澤 / 168
李錫九 / 39, 67, 210, 218
李駿 / 30
李懷才 / 30
李懷印 / 151
李藜春 / 168
李耀庭 / 286
李鐵夫 (韓傳鑒, 胡國明) / 221-224, 459
杜真生 (杜振聲) / 31, 102, 162, 168, 210

沈克 / 203
 汪盛荻 / 33
 汪精衛 / 84,174,178
 谷雄一 / 119,201-203
 阮章 / 49
 阮嘯仙（石恪） / 50,157,159,160,164,
 165,177,261
 阮錦雲 / 217,221,268,294

八畫

周天元 / 51
 周文彬（金成鎬） / 330,341
 周仲英 / 163
 周有志 / 33
 周作人 / 28
 周宗蓮 / 33
 周治國 / 385
 周恩來 / 31,38,44,87,99,100,107-110,
 155,161,310
 周啓敦 / 160,163
 周啓瑜 / 167
 周啓鋼 / 250
 周達光 / 51
 孟和烏力吉 / 85
 孟庫爾吉 / 208
 孟堅（孟用潛） / 223,224
 尙佩榮 / 300
 岡村寧次 / 357
 岳兆麟 / 40
 岳維峻 / 66
 拓克寬 / 204
 林伯渠 / 425
 林育南 / 159
 林彪 / 411,417,418,423
 林喻屏 / 139,177
 林楓 / 304

林詳謙 / 51
 林夢書 / 71
 林鐵 / 306
 板垣征四郎 / 169
 武止戈 / 209
 武百祥 / 41
 武恩詔 / 33
 武振華 / 71
 邵力子 / 76
 邱鍾衡 / 74
 金永昌 / 61,85
 金谷蘭 / 259,260

九畫

侯樹功 / 33
 侯樹垣 / 33
 侯樹德 / 33
 俞振邦 / 168
 南桂馨 / 115,119
 南漢宸 / 210
 奎壁 / 34
 姜鵬飛 / 407
 姚依林 / 306,310,321,326,333,335,355
 姚國楨 / 310
 姚震 / 310
 姚鐵民 / 338
 宣俠父 / 210,216,219
 施從雲 / 36
 柯慶施 / 214,217,218,304
 段純 / 87
 段祺瑞 / 52,310
 段蘇權 / 412,434,440
 洪秀全 / 302
 洪麟閣（洪占勳） / 310,315,316,321,341
 紀庭梓 / 158
 紀德貴 / 179,180,270

- 胡九皋 / 33
 胡九源 / 33
 胡允恭 (胡萍舟) / 112, 113
 胡光 / 338
 胡金山 / 180
 胡喬木 / 26
 胡景翼 / 58, 66, 205
 胡鄂公 (胡南湖) / 36, 46, 47, 69, 164
 胡敬民 / 165
 胡漢民 / 118, 174, 214
 胡熙庵 / 115
 胡適 / 52
 胡錫奎 / 164, 306, 311, 315, 321, 410, 412, 420, 434, 436, 442, 443, 452
 胡錫錄 / 33
 范鴻劫 / 30
 韋大同 / 33
- 十畫**
- 凌鉞 / 40
 唐士奎 / 71
 唐生智 / 178
 唐壽山 / 138, 182
 夏之栩 / 30
 夏德元 / 336
 孫中山 / 36, 44, 50, 56-58, 65, 302, 423
 孫永勤 / 302
 孫永鋒 / 33
 孫亦訓 / 33
 孫有曾 / 71
 孫秀峰 / 456
 孫岳 / 54, 55, 58, 59, 66, 67
 孫承恩 / 33
 孫洪伊 / 36
 孫彩 / 298, 299
 孫雲鵬 / 48, 49, 54, 55, 454
- 孫傳芳 / 64
 孫敬文 / 441, 442
 孫楚 / 202
 孫殿英 / 74, 75, 201, 204, 205, 210, 211, 213, 216, 218, 387
 孫學謙 / 33
 宮恕孔 / 387
 徐永昌 / 66, 102
 徐全直 / 165
 徐向前 / 286, 313, 319
 徐步雲 / 146
 徐智甫 / 336
 徐樹文 / 168
 徐樹榮 / 163
 徐謙 / 46
 徐蘭芝 / 160, 161, 163, 167
 晁哲甫 / 72, 140, 177
 殷汝耕 / 334
 殷樹林 / 33
 殷鑒 / 164, 202
 烏蘭夫 (雲澤) / 34
 耿炳光 / 207, 209
 耿繼周 / 199
 袁乃祥 / 159
 袁子貞 / 55
 袁世凱 / 17, 36, 61
 袁行莊 (袁靜) / 160, 207
 袁炳輝 / 157
 袁家鏞 / 166
 袁國平 / 462
 貢桑諾爾布 (貢王) / 61
 郝仲青 / 71
 郝清玉 / 101, 125, 139, 140, 146, 160, 184
 馬汝邵 / 33
 馬克勤 / 71
 馬林 / 44, 45, 56

- 馬芳庭（馬富春）/ 201, 202
 馬寅初 / 250
 馬載（馬存漢）/ 179, 180, 182
 馬價人 / 33
 馬輝之（馬星榮）/ 165, 304-306, 315, 317, 318, 321, 322, 325, 326, 328, 339, 354, 362, 363
 馬駿 / 38, 41
 高仁山 / 69
 高文華 / 273, 303, 304
 高克林 / 178, 179, 262, 265, 270
 高克謙 / 55
 高君宇 / 30, 47, 69, 133
 高志遠 / 311, 315, 316, 321, 326, 342
 高建勳 / 335
 高恩洪 / 53
 高振鴻 / 71
 高桂滋 / 110, 111, 200, 202, 203
 高崗 / 152, 434, 435
 高敬之 / 385
 高樹勳 / 160, 218, 219
- 十一畫**
- 商震 / 17, 118, 201, 202, 211
 崔廷獻 / 115, 119
 崔浚 / 33
 崔溥 / 32, 33
 康生 / 425, 435, 436, 438, 439
 康遜 / 168
 張人傑 / 201, 204, 214
 張子英 / 167
 張中立 / 252, 254, 258, 276
 張中孚 / 214
 張之江 / 66
 張友清 / 164
 張友漁 / 69, 114-116, 119, 120, 135, 308
- 張太雷 / 30, 32, 39, 41
 張申府 / 30, 38, 43, 44, 308
 張仲毅 / 71
 張仰文 / 33
 張兆豐 / 30, 66-68, 104, 105, 107, 109, 110, 112, 114, 140, 141, 148, 177, 202
 張存真 / 211
 張次屏 / 102
 張自忠 / 200, 213
 張作霖 / 17, 52, 53, 56, 57, 60, 64, 137
 張伯根 / 42
 張含輝 / 140
 張廷瑞 / 71, 145
 張志全 / 143
 張秀岩 / 224
 張良翰 / 63
 張宗昌 / 64, 65, 67, 112, 142, 205, 270
 張宗義 / 162
 張昌旭 / 33
 張昆弟 / 30, 135, 159, 165
 張明遠（張金言）/ 76-79, 101, 142, 325, 332, 333, 354, 390, 408, 412, 421, 422, 432, 435, 436, 439, 442
 張信卿 / 139
 張星五 / 33
 張根泉 / 33
 張國燾 / 5, 28, 30, 43, 45-48, 52, 55, 57, 58, 89, 163, 454
 張培剛 / 293
 張寅卿 / 118
 張紹曾 / 36
 張開運 / 102, 167
 張敬堯 / 102, 103
 張經武 / 309
 張維瀚 / 113
 張聞天 / 315

- 張賓 / 168
張慕陶 (張金印·張金刃) / 99,107,
109,110,112-114,116,120,121,125-
127,129-134,136,150,159,160,162,
163,166,167,202,205,207-209,211,
214,216-220,223-225,456-459
張樞敬 / 33
張澍 / 162
張蔭梧 / 460
張儒林 / 33
張學良 / 17,69,137,169,178,179,205,
210,211,235,244,245,247,249,299
張學武 / 67
張學思 / 409
張樹堂 / 167
張積信 / 33
張錫珩 / 177
張錫鑾 / 17
張霖之 / 271
張勵生 / 216
張隱韜 / 41
張寶泉 / 33
張繼 / 37,38
張耀東 / 338
張鶴鳴 / 316
曹承宗 (李才先) / 191,193,194
曹冠英 / 71
曹恢緒 / 33
曹致福 / 311,316
曹策 / 130,143,144,148,157-160,162,
168,457
曹錕 / 17,47,66
梁斌 / 196,197
梁樹芳 / 33
梁鵬萬 / 49,50,90
畢振一 / 387
章士釗 / 36,37,43
符如璋 / 33
符秀 / 33
習從真 (習靜波) / 201,202
莫易琨 / 71
許建國 / 355
許權中 / 216,219
郭人麟 / 43
郭可詠 / 33
郭亞先 (郭兆祥) / 164,167
郭宗鑒 / 105,115,116
郭官林 / 137
郭松齡 / 59
郭品三 / 386
郭春濤 / 42
郭棟鳴 / 168
郭隆真 / 38
郭道甫 / 61,62,85
郭滌生 / 294,296
郭靜民 / 167
陳允登 / 71
陳少敏 / 300
陳幼雲 / 71
陳永發 / 10,11,24,287,293,338,339,346,
378,427,450,461
陳宇寰 / 311,316
陳竹君 / 218,294
陳伯達 / 304,435
陳延年 / 44
陳服遠 / 114
陳果夫 / 118
陳爲人 / 30,83,85,92
陳原道 / 160,161,163,164,182,184,198,
207,209,266,267
陳喬年 / 30
陳復 / 133,147,160

- 陳群 / 319,330,331,344,356
 陳滌雲 / 168
 陳碧蘭 / 47
 陳肇英 / 250
 陳慶餘 / 156,157
 陳潭秋 / 47,87,94,97-101,103-107,125,
 127,130,132,139,165,305,455
 陳賡 / 206
 陳學榮 / 33
 陳樹人 / 133
 陳獨秀 / 26,41,44,45,53,84,86-89,100,
 127,128,133,156,203,454
 陳濟棠 / 178
 陳翼龍 / 50
 陳鏡湖 (陳印潭, 李鐵然) / 31-33,386,
 387
 陳寶泉 / 188
 陳鐵錚 (陳士杰, 魏蘇) / 144
 陸沉 / 68
 陶永立 / 71
 鹿鍾麟 / 460
- 十二畫**
- 傅作義 / 18,410
 傅尉如 / 105
 博古 / 175
 單德貴 / 319,330,331,344
 彭述之 / 47,83,85-89,91,92,94,96,98,
 100,102,104,127,128,169,207
 彭桂生 / 30,71
 彭真 (傅茂公) / 55,93,104,105,304,313,
 318,322,337,341,344,354,361,432,
 436,466-468
 彭國政 / 213
 彭雪楓 / 113
 彭幹臣 / 198
- 彭壽生 / 392,403
 彭德懷 / 311,313,319,322,323,354
 惠世如 / 386
 惲代英 / 159
 曾玉良 / 51
 曾仰豐 / 252
 曾克林 / 344,403,410
 曾健 (曾健人) / 166,198
 湘農 / 193-197,207,267
 湯化龍 / 36
 湯玉麟 / 211,213,219
 焦若愚 / 345
 程子華 / 320,412,413,417,428,430,433
 童長榮 / 158,160
 童冠賢 / 40
 粟澤 / 57
 舒行 / 403
 賀昌 (毅字) / 127,133-136,139,144,
 147,149,156-158,160,200
 賀龍 / 441
 越飛 / 56
 雲潤 / 34
 項英 / 130,462
 項瑞芝 / 54
 馮世昌 / 33
 馮占海 / 213
 馮弗能 / 203
 馮玉祥 / 17,19,58-60,62-64,66,67,109,
 113,138,178,200,203-205,209,210,
 213,214,216-220,223,245,249,299,
 310
 馮自由 / 42
 馮治安 / 201,213
 馮金福 / 204
 馮洪國 / 203,204,210
 馮欽哉 / 218

馮溫（馮和齋）/ 74, 124, 139-141, 173-175, 177, 261

黃日葵 / 69

黃火青 / 446, 447

黃永勝 / 413

黃克誠 / 414

黃宗智 / 2, 5, 370

黃金榮 / 95

黃桂榮 / 51

黃郛 / 17, 58, 212, 245, 283

十三畫

奧斯羅夫 / 62

楊立垣 / 33

楊吉安 / 168

楊宇霆 / 64, 65

楊成武 / 313

楊作霖 / 356

楊十三（楊彥倫）/ 310, 315

楊秀峰 / 308

楊其綱 / 71

楊叔九 / 33

楊虎城 / 66, 103, 110, 111

楊度 / 64-66, 69

楊春甫 / 451

楊春霖 / 77-79

楊洪濤 / 102, 103

楊培芝 / 167

楊景山 / 30

楊進才 / 265

楊新之 / 182

楊新華 / 162

楊德輔 / 51

楊獻珍 / 164

楊繼錄 / 115, 167

源田熊及 / 357

溥儀 / 58

溫振剛 / 123

葉善枝 / 76, 77, 104, 105, 107, 142-145, 159, 160, 162, 168

葉楚傖 / 76

萬福麟 / 211

萬毅 / 409

董必武 / 311, 427

董紹良 / 33

解學海 / 77, 78

詹大南 / 410

詹才芳 / 412, 424

賈臣（賈振峰）/ 186, 194, 267

賈湘農 / 196

路友于 / 65, 66

鄒舫 / 71

鄒魯 / 42

鈴木啓久 / 357-359

雷震甲 / 33

靳雲鶚 / 64

十四畫

廖劃平 / 67, 114, 134, 144, 148, 164, 167, 177, 198

榮耀先 / 32, 34

漆中權 / 280

福明泰 / 61

翟少癡 / 162

蒲振聲（蒲秋潮）/ 163

褚玉璞 / 102

赫光（萬錫勳）/ 203

趙大中 / 199, 301

趙文進 / 403

趙世炎 / 30, 44, 57, 58

趙立金 / 286

趙合 / 336

趙作霖 / 157,160,171,207

趙彥卿 / 210

趙紀彬 / 72-74,123

趙致中 / 33

趙茨平 / 158

趙巽 / 300

趙萬年 / 314

趙達 / 39

趙廣湘 / 33

趙毅敏 / 431,452

趙學勤 / 271

趙聲（趙琛） / 166,221

趙縛 / 102,105

齊燮元 / 356

十五畫

劉大風 / 72,73,139-141,177,180,181,
270

劉子厚 / 168,271

劉不同 / 173,174

劉仁靜 / 30

劉天章 / 200-202

劉少白 / 164

劉少奇 / 71,94-102,104,106-108,153,
224,303-305,308,309,312,313,315,
318-321,339,425-428,430-432,
434-440,443,449,450,454-466

劉文忠 / 271,273

劉文松 / 53

劉永清 / 254

劉成章 / 131,132,149

劉汝明 / 201

劉自立 / 78

劉佐周 / 311

劉作民 / 33

劉伯承 / 148,320,424

劉伯堅 / 63

劉伯莊 / 57,83,85,92,127

劉希賢（劉小辯） / 74

劉志丹 / 175,203

劉亞雄 / 163,164

劉和 / 279

劉官諤 / 71

劉承浩 / 71

劉杰 / 426,427

劉直甫 / 33

劉俊閣 / 300

劉昶 / 151

劉珍年 / 112,113,311

劉剛 / 386

劉晏春 / 261-263,268

劉桂堂（劉黑七） / 218,219,269,270

劉清連 / 168

劉清揚 / 30,31,37,38,43

劉清瑞 / 168

劉尊棋 / 164

劉誠光 / 394

劉道生 / 412,433,436,440,450,451

劉德承（顧卓新） / 170,171

劉潤之 / 123

劉稷臣 / 33

劉學信 / 168

劉憲增 / 146,191

劉錫九（劉武年） / 112

劉錫五 / 160,164,171

劉瀾濤 / 164

樊順 / 296,299

樊鍾秀 / 68

歐陽欽 / 148

潘文郁 / 210

潘問友 / 167

蔣介石 / 3,4,22,60,84,113,173,178,205,

213,214,225,229,230,244-249,275,
393,395,408,415,434
蔣國鈞 / 33
蔣曉海 / 158,159
蔣靜一 / 33
蔡元培 / 44
蔡兆麟 / 123
蔡和森 / 30,44,77,85-89,92,93,95-100,
102,104,106,125
蔡書林 / 192
蔡鴻賓 / 123
鄭丕烈 / 31,102,162,168,210,218,386
鄭澤生 / 113,114,162
鄧小平 / 460
鄧中夏 / 28,30
鄧文 / 216
鄧家彥 / 42
鄧恩銘 / 84,85
鄧培 / 49,50,120
鄧發 / 209,217
鄧華 / 305,313-315,318-321,324-326,
332,460
鄧潔民 / 41
鄧穎超 / 38
鄧寶珊 / 68
黎元洪 / 17,46
黎日暉 / 173-175
黎玉 (李嘉年, 李興唐) / 186,187,270,
300
黎亞克 (李濟道, 李任予, 李力一)
/ 192-194
黎樹容 / 192

十六畫

冀丕揚 / 160,207
憨玉昆 / 205

盧文燧 / 33
盧文焯 / 33
盧文煥 / 33
盧成銘 / 33
盧東白 (盧曉謙) / 33,162
盧煥章 / 33
盧碩亭 / 54
盧碩棠 / 33
盧福坦 / 84
蕭三 (蕭子暉) / 63
蕭克 / 322,323,325,326,328,344-346,
354,356,360,414
蕭忠貞 / 65
蕭鳴 / 160,171,206-208,210
賴德 / 164,167
閻紅彥 / 175,204
閻錫九 / 316
閻錫山 / 16,64,104,114,115,125,178,
200,201,205,249,275,299,309,375
閻懷聘 / 99,101,125,168
鮑立維 / 28,37
鮑剛 / 201,204,214
鮑羅廷 / 58

十七畫

優林 / 56
應唯魯 (沈鞠如) / 328
戴季陶 / 65
繆伯英 / 30
薄一波 / 115,136,198,200,309
薄以眾 / 115
薛傳峰 / 259
謝子長 / 175,203
謝台臣 / 72,123,140
謝玉田 / 74
謝持 / 42

謝寶光 / 33
 鞠少清 / 168
 韓方剛 / 286
 韓永祿 / 146
 韓玉如 / 181
 韓東莊 / 296
 韓政平 / 33
 韓國禎 / 33
 韓欲明（韓根仔） / 137, 138
 韓連會 / 98, 100, 101, 110, 159, 160, 162, 167
 韓復榘 / 113, 178, 179, 213, 270, 309
 韓麟符（韓致祥） / 29, 31-34, 60-64, 69, 70, 101-103, 107, 109, 114, 142, 161, 162, 166, 210, 211, 216, 218, 292, 386, 387, 454, 459, 462

十八畫

瞿秋白 / 4, 5, 84, 86, 98, 100, 127, 149, 152, 153, 155, 225, 454
 聶榮臻 / 133-136, 144, 148, 312-314, 317, 318, 321-323, 331, 333, 335, 410
 藍天蔚 / 36
 魏世麟 / 33
 魏宏運 / 290, 338, 383, 435, 448
 魏承恂 / 33
 魏春波 / 316, 338
 魏益三 / 64
 魏國元 / 326
 魏野疇 / 109, 111

魏頌堯 / 145
 魏福昌 / 326

十九畫

龐炳勳 / 201, 218, 266
 羅亦農 / 30, 89
 羅章龍 / 28, 30, 32, 48, 50, 76, 156, 158, 159, 224, 457
 羅登賢 / 165
 羅瑞卿 / 414
 譚平山 / 95
 譚體仁 / 326
 關向應 / 130, 132

二十畫

嚴志和 / 196
 嚴靜平 / 167
 蘭笑秦 / 124, 137
 蘇老煥 / 181
 蘇亞文 / 33
 蘇林彥 / 316
 蘇啓勝 / 441
 蘇梅 / 329, 331, 384

二十一畫

攝政王 / 38
 續西峰 / 66
 續範亭 / 66
 顧順章 / 109, 151, 20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書目

| 書名 | 作者 | 出版年 | 精裝 | 平裝 | 頁數 |
|-------------------------------------|------|------|------|------|------|
| 2. 甲午戰前臺灣之煤務 | 黃嘉謨著 | 1961 | 140元 | 90元 | 303頁 |
| 5. 外蒙政教制度考 | 李毓澍著 | 1962 | 160元 | | 444頁 |
| 6. 中英開平礦權交涉 | 王璽著 | 1962 | 120元 | 70元 | 243頁 |
| 7. 黎元洪評傳 | 沈雲龍著 | 1963 | | 200元 | 194頁 |
| 8. 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 | 李恩涵著 | 1963 | 150元 | 100元 | 371頁 |
| 11.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 張朋園著 | 1964 | | 200元 | 263頁 |
| 13. 中美工約風潮 | 張存武著 | 1965 | 130元 | 80元 | 269頁 |
| 14. 美國與臺灣 | 黃嘉謨著 | 1966 | | 300元 | 477頁 |
| 15. 曾紀澤的外交 | 李恩涵著 | 1966 | | 250元 | 398頁 |
| 16. 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 呂實強著 | 1966 | | 250元 | 284頁 |
| 17. 西方曆算學之輸入 | 王萍著 | 1966 | 130元 | 80元 | 251頁 |
| 18. 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 | 李毓澍著 | 1966 | 170元 | 120元 | 461頁 |
| 19. 清末革命與君憲論爭 | 亓冰峰著 | 1966 | | 200元 | 268頁 |
| 21. 魏源年譜 | 王家儉著 | 1967 | | 70元 | 204頁 |
| 22. 淮軍志 | 王爾敏著 | 1967 | | 120元 | 457頁 |
| 23. 咸同雲南回民事變 | 王樹槐著 | 1968 | 160元 | 110元 | 407頁 |
| 24. 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 張朋園著 | 1969 | | 250元 | 340頁 |
| 25. 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 | 趙中孚著 | 1970 | | 200元 | 238頁 |
| 26. 袁世凱與朝鮮 | 林明德著 | 1970 | 170元 | | 440頁 |
| 27. 張之洞的外交政策 | 李國祁著 | 1970 | 160元 | | 437頁 |
| 28. 清季的立憲團體 | 張玉法著 | 1971 | 190元 | | 554頁 |
| 30. 丁日昌與自強運動 | 呂實強著 | 1972 | | 200元 | 416頁 |
| 31. 庚子賠款 | 王樹槐著 | 1974 | | 250元 | 612頁 |
| 33. 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會政權 | 陸寶千著 | 1975 | | 100元 | 346頁 |
| 34. 清末留日學生 | 黃福慶著 | 1975 | | 250元 | 237頁 |
| 35. 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 蘇雲峰著 | 1976 | 150元 | | 376頁 |
| 39. 清韓宗藩貿易 | 張存武著 | 1978 | 140元 | | 279頁 |
| 40. 劉蓉年譜 | 陸寶千著 | 1979 | | 160元 | 371頁 |
| 42. 李鴻章與中日訂約 | 王璽著 | 1981 | | 200元 | 238頁 |
| 44.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閩浙臺地區(1860-1916) | 李國祁著 | 1982 | 450元 | | 656頁 |

| 書名 | 作者 | 出版年 | 精裝 | 平裝 | 頁數 |
|---------------------------------------|------|------|------|------|------|
| 45. 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 | 黃福慶著 | 1982 | | 300元 | 324頁 |
| 46.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 張朋園著 | 1983 | 350元 | 300元 | 467頁 |
| 47. 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至十八年) | 陳存恭著 | 1983 | | 200元 | 278頁 |
| 48.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 | 王樹槐著 | 1984 | 500元 | | 677頁 |
| 49. 民國初年的政黨 | 張玉法著 | 1985 | | 500元 | 679頁 |
| 50. 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 | 朱宏源著 | 1985 | | 450元 | 416頁 |
| 52. 華工與歐戰 | 陳三井著 | 1986 | | 250元 | 257頁 |
| 55. 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1905-1937) | 張瑞德著 | 1987 | | 200元 | 176頁 |
| 56. 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 | 黃福慶著 | 1988 | | 300元 | 386頁 |
| 57. 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 | 呂芳上著 | 1989 | | 400元 | 615頁 |
| 58. 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1860-1945) | 陳慈玉著 | 1989 | | 300元 | 312頁 |
| 61. 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 | 蘇雲峰著 | 1990 | 300元 | 250元 | 210頁 |
| 62. 趙聚鈺先生年譜 | 魏秀梅著 | 1990 | | 350元 | 450頁 |
| 63. 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1876-1937 | 張瑞德著 | 1991 | | 250元 | 299頁 |
| 64.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 | 謝國興著 | 1991 | 550元 | | 721頁 |
| 65. 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 | 楊翠華著 | 1991 | 350元 | | 267頁 |
| 66. 清代之迴避制度 | 魏秀梅著 | 1992 | | 300元 | 311頁 |
| 67. 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 1901-1911 | 李孝悌著 | 1992 | | 300元 | 237頁 |
| 68. 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 | 張瑞德著 | 1993 | | 250元 | 164頁 |
| 70.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 黃克武著 | 1994 | | 300元 | 217頁 |
| 72. 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 | 張壽安著 | 1994 | | 200元 | 190頁 |

| 書名 | 作者 | 出版年 | 精裝 | 平裝 | 頁數 |
|---|------|------|------|------|------|
| 74. 清代臺灣土著地權—— 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 土地變遷，1700-1890 | 陳秋坤著 | 1994 | | 350元 | 265頁 |
| 75. 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 認識與評價：1906-1932 | 黃自進著 | 1995 | | 300元 | 248頁 |
| 76. 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 現代化，1860-1937 | 朱宏源著 | 1995 | 550元 | | 614頁 |
| 77. 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 | 張啓雄著 | 1995 | | 350元 | 353頁 |
| 78. 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 | 王爾敏著 | 1996 | | 250元 | 241頁 |
| 79. 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 蘇雲峰著 | 1996 | 500元 | 450元 | 439頁 |
| 81. 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 經濟生活 | 賴惠敏著 | 1997 | | 300元 | 359頁 |
| 82. 三(兩)江師範學堂： 南京大學的前身 | 蘇雲峰著 | 1998 | 250元 | 200元 | 236頁 |
| 84. 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 | 蘇雲峰著 | 2000 | 300元 | 250元 | 326頁 |
| 85. 北一輝的革命情結： 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 | 黃自進著 | 2001 | | 300元 | 294頁 |
| 86. 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 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 | 張壽安著 | 2001 | 400元 | 350元 | 496頁 |
| 87. 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 與實踐 | 呂妙芬著 | 2003 | | 350元 | 480頁 |
| 88. 西洋稅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 | 林美莉著 | 2005 | 350元 | 300元 | 374頁 |
| 89. 郭嵩燾先生年譜補正及補遺 | 陸寶千著 | 2005 | | 250元 | 340頁 |
| 90.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 張朋園著 | 2006 | 300元 | 250元 | 297頁 |
| 91. 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 (1895-1949) | 翟志成著 | 2007 | 400元 | 350元 | 490頁 |
| 92. 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 女子體育(1895-1937) | 游鑑明著 | 2009 | 400元 | 350元 | 431頁 |
| 93. 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國律師 (1912-1937) | 孫慧敏著 | 2012 | | 350元 | 412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4)

統合與分化：
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

著者／陳耀煌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30號

電話：(02)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戶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購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16號8樓

電話：(02)8227-8766

初版／中華民國101年8月

定價／新台幣4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03-3345-9

GPN 101010160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 / 陳耀煌著.

-- 初版. -- 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民 101.08

面； 公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4)

ISBN 978-986-03-3345-9 (平裝)

1. 中國共產黨 2. 革命 3. 歷史

628.266

101015551



Domin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Hebei, 1921-1949

